

---

# 北京大学 95 级回忆文集

## 前 言

在我们年级入学 50 周年的聚会之后，很多同学感慨良多，不断发函鼓励在北京的同学，对出版拟议中的相关纪念文集出谋划策，并寄予厚望。编辑组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决定以“两书一盘”的形式奉献给全年级的同学。“两书”是一本纪念册和一本回忆文集，“一盘”则是收入了部分同学自愿展示给全体同学的本人作品的光盘。这样就可以让大家相互了解 50 年来各自的经历和心路历程，也能使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参加聚会的同学分享聚会的欢悦，以慰藉自己对昔日同窗的思念。

我们年级在北大就读的那六年是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上一段很特殊的年代。我们是 1959 年 9 月入学的，此前的一个月在庐山刚刚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极端错误地整肃了以忧国忧民的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这是继 1957 年反右和 1958 年大跃进之后又一次给中华民族带来后果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的非常错误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的就是由此三大运动所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华大地饿殍遍野，非正常死亡以千万计。然而极左思潮却没有因此而有丝毫收敛，从 1960 年开始的中苏公开论战又掀起了一波高过一波的“反修防修”的浪潮，一直延续到文革爆发并贯穿了整个十年文革。我们的整个大学时代正好就处在这种极左思潮和个人崇拜急剧膨胀的特殊年代。

我们年级的同学来自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当时大家都还只是十几岁的小青年，能来到全国最高学府北大读书，心里充满着对国家对党对人民的无限感激，只想着好好利用这宝贵的青春年华学好本事，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将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一份力量。然而怎么也想不到那些由极左思潮催生的政治运动是如此错综复杂与应接不暇。那个年代的特殊性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也造就了同学们之间许多特殊而复杂的情感，让人时时萦绕心怀，终身难忘。这种情感是以后各届学生很难体会得到的。记录下这些特殊的情感和思绪，实际上也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将这笔财富留给后人，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说起这次聚会，至少可以追溯到 1995 年 8 月以数学专业同学为主的毕业 30 周年聚会。那时大家都还在职，还算年富力强，外地同学来了很多，即使不能前来的也多因为工作难以脱身。那次聚会主要是由在首都师大工作的李世新等五位同学筹办的，他们不辞辛苦全力投入，卓有成效地举办了同学们毕业以来的第一次大型聚会。此后，1998 年盛况空前的北大

---

百年校庆又提供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同学聚会的机会。在座谈会上一些同学畅所欲言，真情流露，使大家倍感同学情谊弥足珍贵，更增添了对聚会的热情。2003年适逢北大数力系建系90周年，这次来母校的同学多是住在北京的，大家不约而同地有了把这种聚会变成一年一度例会的想法，于是从2004年以后，在北京的同学基本上是一年一次相聚，且“轮流坐庄”。特别是2007年的聚会上还特邀了当年教过我们解析几何课程的程庆民老师一起座谈，程先生做了很感人的即席发言。

最后敲定举办2009年入学50周年大聚会是在2008年5月12日上午由李辛同学组织的聚会上。凑巧的是，当天就是“5·12”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日子。

这年的4月28日徐明曜同学去上海出差时，将举办入学50周年聚会的设想与上海的同学进行了详细的沟通，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徐明曜返回北京后，带回来与十九位住在上海的老同学的合影照片。5月12日参加聚会的二十来名同学都仔细地辨认过这张照片，大家惊讶地发现，实在认不出几个了，有人甚至连一个也认不出来了！也就是说，如果在大街上相遇，当年如此熟悉的同窗如今竟然会“相逢不相识”了，于是这更加坚定了大家一定要举办入学50周年聚会的决心。

当时在北大的59级同学只有徐明曜、雷功炎以及张立昂、耿素云夫妇共四人。雷功炎当时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了，张立昂、耿素云已离开数学系多年，且耿素云又怪病缠身，夫妇二人十分辛苦。大家经过商讨一致决定由徐明曜、李世新、唐云、张国斌和雷广玉组成筹备小组，由徐明曜挂帅，其他在京同学通力合作，在上海和南方的同学则由孙建国牵头联系。此后筹办工作就一直在相互协作中逐步地有序展开。

举办这次聚会最初是由数学专业的三个班发起的，很快计算专业就加入进来了，又过半年多即2009年的春节后，力学班同学得知消息也欣然加入，这样就变成了全年级的大型聚会。

如此大型的盛会没有一定的资金支持显然是不行的，很多同学慷慨解囊。为不增加同学们的负担，最后筹备组决定只接收代数拓扑班的张立昂、麦结华、徐明曜、唐云同学和函数班的刘开弟同学的赞助。

经过一年的努力筹备，数力系1959级入学50周年纪念的盛大聚会终于如期在5月16日上午9点拉开了帷幕。

同学们都早已年过花甲、直奔古稀而来，许多人自从毕业离校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次重逢时，不少人相互对视半天后才恍然大悟，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有的对视也无法于事，不得不看清对方胸牌后再仔细辨认才终于醒悟。会务接待办公室就设在外地来京同学住宿的旅店内，聚会期间每天晚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人人有说不完的话，迟迟不愿回去睡觉。特别让人感动的是一位同学因得过脑血栓行动不便，为了见到大家，让夫人搀扶着

---

用“专车”送来与老同学相见。同学之间的深厚情谊令人感动，对昔日的缅怀和反思尽在不言中……

重逢的喜悦和感慨代替了一切，对这次举办聚会的感激与赞扬淹没了筹备工作中的诸多不足和欠缺。其实不足之处是很多的。

筹备工作起步阶段，最困难的是如何尽可能多地搞出一份同学的通讯录，徐明曜为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了无数次电话之后，总算奠定了一个不错的基础。原想在聚会报到时提供给每位同学一份便于核对、更正或重新填写的表册，以便得到每个人最准确的联系信息，从而为以后的通讯联系打下一个牢固的基础，结果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做到，致使报到过程有些混乱；聚会之后邮寄聚会实况光盘时，由于投递地址出了很多差错，在精力与财力上造成了不少本来可以避免的浪费。这是想到了却没能做好的事例，还有一些事先没想到自然也就做不好的事情，例如聚会实况光盘的质量很不好，事前完全没有预计到，导致许多同学收到光盘后播放不出来，这实在是一大失误，一定会使一些同学很扫兴。好在这还可以补救，准备再用质量好的盘重新刻录寄给有关同学。此外，值得庆幸的是，也有当初没能想周到而后来却做好了的事情，那就是集体合影照片应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原以为此事很简单，觉得图书馆前面有几排台阶，人往台阶上一站，有了层次就可以了。幸亏听了照相馆技术人员的意见才有了那几张效果不错的合影照片。当然最多的遗憾还是有些东西虽然想到了、也努力去做了，却仍然留有缺憾。比如为参观鸟巢、水立方准备午餐的事儿，由于人数总也统计不准确，多次组织同学采购才凑足份数，那一天准备的那些食品确实难以适合大家的口味。

说了聚会，再回到咱们的“两书一盘”上来。

最初的想法很简单，聚会就是为了更好地沟通，这是大家共同的目的。可是怎么来实现沟通的目的呢？我们就想通过聚会的激情激发大家对往事的回忆和反思，从而使我们对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一个较为准确清晰的认识。由于每个人的背景、处境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必然会导致认识上的一些差异，然而最基本的全局性的共识也必定是有的！有一位当年担任学生干部的同学在一次同学聚会时诚恳地说：“……我作为当年的一名学生干部，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对某些同学造成了一些伤害，我深感内疚，我在这里表示道歉，并希望得到同学们的原谅。”这不仅说明他对那个年代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而且他也相信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与他是一致的，所以他才会做出如此诚恳的表示。显然，他得到的回报一定是大家的（包括挨过整的同学的）理解、原谅、尊重甚至钦佩。也有当年的学生干部打了一个多小时的长途电话，给挨过整的同学赔礼道歉，这同样说明大家对过去的那个年代还是有相当多的共识的。这个共识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应该留给后人。然而我们收到的回忆或反思的文章并不太多，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有人觉得写过去的事情太痛苦伤神，应该多“向前看”。向前看是对的，但是为了更清楚地向前看，必须立足于对

---

过去的清醒认识。诚然，痛苦已大可不必，毕竟事情过去了好几十年，我们还是相信前途是光明的！也有人担心写过去的事情会伤害一些同学的感情，其实我们都是对事不对人。还可能有人“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就更加没有必要，相信中国的历史不会再倒退了！鉴于以上情况，有人建议借鉴北大1948级同学聚会后出版的文集的经验，将我们原先计划出版的文集改为分成两册出版，也就是前边提到的“两书”。其中一册是“纪念册”，另一册就是这本回忆文集，它收录了部分同学撰写的50篇回忆文章和10篇诗词。文章和诗词分别按作者姓氏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回忆文集终于出版了。尽管文章和诗词没有华丽的词藻，但这都是这些同学真实的经历和人生感悟，希望读者通过它们能了解我们这些人这半个世纪是如何走过来的。

编辑组

2011年1月16日

---

## 目 录

008 有益祖国，无愧人生	力学班	蔡扶时
012 天伦乐，儿女情	力学班	蔡扶时
017 自我介绍	计算班	蔡仁泰
019 我的退休生活	力学班	金德圭
023 缘	力学班	邝东英
026 回忆在北大的故事	数学一班	李福星
028 忆入学 50 年	力学班	李明智
033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数学二班	李沐兴
035 我这五十年	数学二班	刘开弟
039 往事	计算班	刘志峰
041 往事今回首	力学班	吕洪生
043 献给母校的赞歌	力学班	吕洪生
045 离开北大之后	数学一班	麦结华
069 纪念李同孚先生	数学一班	麦结华
074 我与逢九的岁月	数学三班	马长冰
078 我带领二班种蓖麻	数学二班	莫国端
079 同学聚会，往事回忆	数学三班	倪忠仁
084 水调歌头（二首）	力学班	欧阳土中
086 北大毕业后的生活	力学班	裴凯华
090 老天待我不薄，夫复何求？	数学一班	彭先度
097 数字时代领头雁，蓦然回首写春秋	计算班	戚志峰
105 雨霖铃·北大入学五十周年有感	计算班	戚志峰
106 我经历的阪神大地震	数学三班	戚宗信
112 回忆恩师廖山涛先生	数学二班	唐 云
117 北大杂忆	数学二班	唐 云
136 一个小小心愿	数学二班	汪进仁

---

139	沉痛悼念雷功炎同学	计算班	王 琨
140	快乐度晚年	计算班	王 琨
142	我的个人简历与自述	数学三班	王昆明
145	难忘的大学时代	数学一班	王 理
169	走出北大的第一站	数学一班	王 理
205	感恩与怀念	数学一班	王树禾
208	大学生活片忆	数学二班	王则柯
219	同学五十周年聚会札记	数学二班	王则柯
222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59 级入学 50 周年聚会有感	计算班	吴广茂
226	忝列北大学子	计算班	吴广茂
243	功炎“满七”祭	计算班	吴广茂
246	身练太极，生命闪耀	力学班	许国安
250	追忆激情岁月	力学班	许国复
252	纪念入学北大五十周年有感	力学班	许国复
253	走出北大校门以后	数学一班	徐明曜
280	我的人生经历	数学二班	严德人
281	聚会小诗	数学二班	严华祥
282	怀念鲁梓成同学	力学班	杨庆曾
284	入学五十周年聚会发言	力学班	杨庆曾
286	小诗一束	数学一班	杨彦昌
291	我眼中的徐明曜	数学一班	杨彦昌
296	歌声中的记忆	数学二班	杨振明
302	沉甸甸的校徽	计算班	杨 质
306	县长、警官和记者帮我们找到了同窗好友张忠旭	计算班	杨 质
310	文理双全的杜珣老师	力学班	姚玉霞
311	回忆与感悟	力学班	于晏悦
319	我的职场二三事	数学三班	余耀伟
322	关于 59 级力学班文体活动的回忆	力学班	岳曾元
328	关于力学专业 59 级大事的回忆	力学班	岳曾元
333	你可曾记得	力学班	岳曾元
337	燕园三首	力学班	岳曾元
338	回忆的珍珠连连串	数学二班	张葆丽

---

343 数学学习之外的大学生活	数学二班	张葆丽
350 北大给了我扎实的知识基础	数学一班	张本宗
352 我从老师那里学到了什么?	数学三班	张存桂
355 唐山这些年	数学三班	张存桂
362 毕业后的工作简况	数学三班	张国斌
363 大学生活二三事	数学三班	张国斌
365 诗一首	数学二班	张立昂 耿素云
366 北大入学五十周年感想	力学班	张庆华
369 毕业后的经历和感悟	力学班	张汝光
372 我的大学生活	数学二班	张饴慈
389 入学北大五十周年同学聚会有感	力学班	章本照
390 零星记事	力学班	朱光文

---

# 有益祖国，无愧人生

力学班 蔡扶时

今年是我们入学北大五十周年，国内北大数学力学系 59 级的同学们张罗着搞一次聚会，还要出版一本纪念册，庆曾要我“写一点东西，以寄托对祖国的怀念”，他的要求打开了我对往事回忆的闸门，连日来夜不能寐，思绪万千。

啊！时光过得真快。可不，从 1959 年我们入学到今年已经整整五十年了，回首我这五十年，前二十八年是在北大度过的，起初六载与大家朝夕相处、同窗共读，毕业后又留校任教二十二年，我的青春、学识、事业、爱情都在这里开花结果，北大是我永远的眷恋。我来美至今也二十二年了，在这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成了真正的海外游子，经历了异域文化的碰撞和冲击，尝尽了酸甜苦辣各味，遭受过种种磨难，但我的这颗心永远属于我的祖国，永远是一颗中国心。

本文的标题“有益祖国，无愧人生”是我们大芝加哥地区华侨华人联合会第一、二任主席、著名爱国侨领陈济明先生送给我的一幅条幅，他于 2002 年不得不离开芝加哥回国定居之时，亲自用苍劲的隶书写成送我，我想这八个字是陈先生几十年来在美国打拼的座右铭，也是他在美国几十年生活的总结，他将这八个字送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期许、鼓励和鞭策。我把这八个字作为本文的标题，藉此表明我的心志、我的方向。

1987 年 2 月我应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邀请，由他们出资来美做访问学者，进行气溶胶动力学 (Aerosol Dynamics) 和非牛顿流体力学 (Non-Newton Fluid Dynamics) 的研究，当我乘坐的飞机离开祖国，在太平洋上空，飞向美利坚合众国之时，我在心里发誓：第一，在国外决不做任何有损祖国的事；第二，尽力多做有利于祖国的事。1991 年我来芝加哥 I. I. T.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伊利诺州理工学院) 给副校长作科研助理。大家还记得大学时给我们讲授弹性力学的王仁教授吗？他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 I. I. T. 拿的博士学位，八十年代初他曾任北大力学系主任，后来患癌症，不幸英年早逝，中国力学界痛失一位大师。

芝加哥位于密执安湖畔，风光秀丽，是美国第三大城市，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发源地，但这里没有把这两天当作节日，反倒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把这两个日子定为法定节日。这里华人比较多，在市区北面有个北华埠，主要居住着几千名越裔华人，在市区南面有个南华埠（芝加哥的唐人街），主要居住着来自广东的移民，大约两、三万人，

---

开有很多食品、日杂、工艺品等店铺和中餐馆，很具规模，是芝加哥华人活动的主要场所。我刚来时，美国政府对中国还很敌视，还在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制裁”，美国民众还不大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电视和报纸上充满着对中国的妖魔化。CBS 主播宗毓华（Connie Chung）公开造谣说“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和学生都是间谍，他们看起来和普通人一样，就生活在你我周围”，“在美国，每八个华人中就有一个是潜伏的间谍”等等，藉以蛊惑人心。那时，在美华人、尤其是来自大陆的学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芝加哥的“台独”、“藏独”、“疆独”等势力都很猖狂，那时唐人街到处悬挂着青天白日旗，走在唐人街上，心里很不是滋味，很想做点事情改变这种状况。

我来芝加哥后很快结识了陈济明先生。他出生在广东，求学在香港和台湾，几十年前从台湾大学毕业后就来美国谋生，虽然长期生活在美国，但他对祖国依然充满着无限的热爱。当时他担任着全美华人协会芝加哥分会会长，做了许多爱国事情，是芝加哥爱国侨胞的一面旗帜。我也相识了其他一些大陆学人，共同的理念使我们很快地走到一起。陈先生所开的“乐声书店”和“会宾楼”餐馆成为我们聚会的场所，在这里，我们商议、筹划、组织了一系列弘扬中华文化、“反独促统”等爱国活动。由于“六四”风波的影响，那时芝加哥敢于表明自己爱国立场的人还不多，许多人连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都不敢去。大陆学人还没有建立自己的社团，搞活动困难重重，但我们始终不渝地努力着。每年办完活动，陈先生都感叹地说：“年年难过年年过。”我们的活动引起了反华势力的注意，“乐声书店”和“会宾楼”餐馆被反华势力的线人盯梢和骚扰，甚至在“乐声书店”外放置炸弹进行恫吓，“乐声书店”被迫关门。后来他们又对“会宾楼”餐馆下手，税务局不断查税查账找麻烦，卫生局也三天两头上门以查卫生为名找茬，最终以卫生不合格而查封。《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Times）在头版头条登载这个查封消息，还配有一副几乎半版大的照片，真是兴师动众、大动干戈。这样对待一个小小的餐馆，实在是空前，这不是存心要把陈济明先生的餐馆搞垮、让他失去生计，又是什么呢？无奈之下，陈济明先生夫妇只得离开美国回广东番禺定居。

1998 年由三十多个社团组成“大芝加哥地区华侨华人联系会”（后改为联合会，简称“华联会”）。“华联会”每年要作三件事：春节联欢会、中国文化节和中国国庆活动，成为芝加哥侨界爱国社团的龙头，侨界的大型活动都由我们牵头操办。“华联会”目前已发展到七十多个社团。随着祖国的日益强盛和中美关系的改善，由于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历任领事们的辛勤工作，近年来芝加哥侨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爱国的越来越多了，每当“十一”国庆节，唐人街到处飘扬着五星红旗。今年初，芝加哥市政府下令摘下唐人街标志性建筑“天下为公”牌楼上的青天白日旗，真是大快人心。有侨胞说：“祖国的飞船飞多高，我们侨胞的头就能昂多高”。祖国强大了，我们侨胞的腰杆就更硬了，更加扬眉吐气了。

---

1996年底我受雇于美国联邦政府环保署，为了工作的方便，我加入了美国籍。有人把我们这样的人比作是从中国嫁出的女儿，中国是娘家，美国是婆家，我们既爱娘家，也爱婆家，但决不容许婆家欺负娘家。十年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我们义愤填膺。我与陈济明先生，还有当时芝加哥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侯大正先生三人，走进留学生组织的抗议示威游行队伍，在芝加哥市中心边走边高呼口号，反对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无耻行径，陈济明先生的手还被突然飞来的一枚硬币打肿，但我们毫不畏惧，昂首挺胸，坚持从UIC（伊利诺州州立大学芝加哥分校）走到总领事馆。

“身在海外，心系中华”。我们的脉搏是同祖国一起跳动的。香港回归祖国、澳门回归祖国、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加入世贸、神州飞船升天、奥运成功举办等，我们都组织活动、热烈欢庆；当“台独”、“藏独”、“疆独”、“法轮功”及国际反华势力兴风作浪时，我们就举办座谈会、批判会、声讨会予以迎头痛击；当祖国发生水灾、雪灾、地震时，我们就组织赈灾筹款、慷慨解囊。1997年我回国游长江三峡，看到游轮上将收集起来的泡沫塑料饭盒和垃圾直接抛入长江，我的心好痛啊！我就找船长讲环保，他们表示很无奈。后来我给国务院侨办写信反映这种情况，呼吁保护好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回美国不久，CCTV“东方之子”栏目主播敬一丹播报了我的信，还加了好大一段评论。能为祖国尽绵薄之力，我十分地欣慰。

感谢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高瞻远瞩、以雄伟的气魄开放国门，千万中国人走向世界各地，这些人都是播撒到世界各地的种子啊！试想，如果没有这些种子，去年在世界各地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走上街头“迎奥运、反藏独”护卫奥运火炬呢？在芝加哥，我作为总指挥和“华联会”同仁们一起，组织了4月24日在市中心联邦广场和5月4日在市中心戴利广场的两次“迎奥运、反藏独”集会，两次集会的场面都很壮观，红旗招展、标牌醒目、口号震天，表达了我们坚决支持北京奥运、坚决反对藏独、坚决反对CNN等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心声，引起主流社会的关注和主流媒体的采访。一对从南京来探亲的老夫妇拉着我的手，含着泪花激动地说：“想不到海外华人这么爱国！”是啊！炎黄子孙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他们的根，一旦有什么风浪，他们都会挺身而出维护祖国的尊严和利益。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两亿中国人移居到世界各国，那该是一副怎样的情景啊！

同学们！我们求学的年代是个充满理想、激情澎湃的火红年代，那个年代铸就了我们的品德、精神和灵魂，让我们终生无悔、勇往直前。我为那个年代而骄傲和自豪，我为我的同学们而骄傲和自豪。毕业之后，几十年来，你们在航空航天、卫星发射、原子能、军工、造船、石油、天然气、水利水电、机械、地矿、地物、热能、交通运输、海洋、装备、土木、通讯、计量、情报、统计、钢铁、计算机、教育、化工、地震、勘探设计、汽车、系统工程等部门和方面勤奋地工作着，有的同学长年跋涉在黄沙滚滚的大西北，有的同学长期披星戴

---

月、风餐露宿在油田，有的同学披荆斩棘战斗在卫星发射架旁，有的同学百折不挠地拼搏在实验室里，有的同学运筹帷幄地领导着国家重要部门，有的同学诲人不倦地坚守在七尺讲台……你们默默地为祖国奉献着，你们成为了科学家、研究员、总工程师、总设计师、将军、教授、博士生导师、领导干部等等，你们是共和国的脊梁，我深深地敬佩你们。

我记得，著名苏维埃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通过他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英雄保尔·柯察金，说出他自己对人生的追求：“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说：‘我的整个生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奋斗！’”同学们，再过两、三年，我们都是七十岁的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们还会继续奋斗下去，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走着自己的人生轨迹，但我们心中的目标是决不会改变的，我们的这颗心是永远向着祖国、是永远属于祖国的。

2009年5月于芝加哥

---

# 天伦乐，儿女情

力学班 蔡扶时

十月初，在北卡工作的女儿来电话说，北京邀她去参加中国第一届 DNA 诊断会议，请她在会上作报告并主持一个专题讨论会。我们为女儿的学术成就高兴，全力支持女儿去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我们义不容辞，断然决定去帮分身无术的女儿一把，去北卡照顾三个外孙女。

两年前，女婿作为他们公司的首席科学家被派到中国去建立研究基地，虽然他们公司照顾他，让他每一至两个月从中国飞回美国呆上十天半月，但平时照顾三个外孙女的任务全部落在女儿身上。三个外孙女，最大的文迪(WENDY)十四岁，老二海迪(HEIDI)十岁，最小的明迪(MINDY)才六岁，女儿一边工作(研究室主任)一边带这三个小不点，实在不容易。我和老伴在芝加哥工作，千里之外，想出点力，怎奈鞭长莫及。

我们原本计划利用今年的假期陪同儿子回国观光，只得同儿子商量推后。说起来，这几年我们和儿子相处的时间也很少。1991年，儿子十五岁在北大附中念完初二就来美，2002年他在UIUC拿到电机系硕士学位后就去了加州硅谷一家半导体公司工作，专门负责欧洲市场的技术支持，每个月都要去欧洲或日本、韩国出差，成了“空中飞人”。三十多岁的人了，还是光棍一条，每年同我们也只能短暂相聚。为了帮助女儿，只能以后再陪儿子了。

以前去女儿家，都是女儿或女婿开车，这次十来天里，三个外孙女参加的全部活动，都由我开车接送。为了熟悉情况，我和老伴在女儿走之前就去了北卡。三个外孙女分别就读于两所学校，文迪上初中二年级，海迪和明迪分别上小学五年级和一年级。虽然都有校车，但在一些情况下还得送她们，而且女儿给三个外孙女安排了学中文、钢琴、游泳、网球、排球、芭蕾、戏剧、绘画、珠算、吹笛以及学 SAT 等许多课外活动，都得接送。熟悉各处的地址是必须的，况且北卡研究三角地区(RESEARCH TRIANGLE PARK)属丘陵地貌，山岚起伏，树木参天，道路弯弯曲曲，多是双向单车道，马路很窄，中间只隔一条分界线，路的两边是深沟，急转弯很多，上下陡坡很多，往往难以看到对面来车。女儿怕我开不惯他们的七人座大车，专门租了一辆小型车我用。女儿陪我两天到各处熟悉熟悉，我都快转晕了，真不知道女儿一个人每天接送三个小不点跑来跑去，还要管她们的学习、吃、喝、拉、撒、睡，还有一大摊工作，怎么忙得过来的。

一天凌晨五点多钟，我听有人开门，起来一看，见女儿进来。她是在半夜里等三个外孙女睡着之后去二十英里之外的研究室工作的，她说经常这样。看见女儿疲倦的面容，好让人心疼。

---

女儿于 1991 年在国内大学本科毕业后，获得 A&M 大学全额奖学金来美留学，她跳过了硕士阶段，只用四年时间就拿到了生物学博士学位，随即被哈佛大学医学院录取做了三年博士后研究。女婿在北大生物系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后，来美两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也同女儿一起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2000 年，他们同时被瑞士罗氏 (ROCHE) 公司录用去做研究。两年后又被一家美国公司高薪聘请回美，女儿还考得 DNA 诊断执照。从 google 搜索结果，见到女儿、女婿研究成果颇丰，这是他们多年奋力拼搏的结果，我们很为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而骄傲和自豪。

女儿自幼勤奋聪颖，责任感很强，对父母很孝顺，对比她小七岁的弟弟很照顾。记得她十来岁时，深秋的一天，我在北大东门外力学系办公室开夜车通宵达旦备课，半夜里下起了大雨，噼里啪啦下到清晨还不停，我没带雨具，正在犯愁怎么回家之时，晨光烟雨朦胧中，我看一个穿着雨衣的矮小身影顶风冒雨从力学系院子大门口向我办公室走来，我正在疑惑是谁这么早来办公室时，随着“爸，爸”的叫声，我看到了来给我送伞的女儿。雨衣下，她的裤管和鞋子都已湿透，满脸雨水、汗水，小手通红。呼地一下，我的心猛地热了起来。那时，我们家住在北大西门外的蔚秀园，从蔚秀园到力学系办公室要从北大西门进，穿过整个北大校园，再出北大东门，经过成府几条小街，少说也有三、四公里吧。在又下雨又刮风黑黝黝的深秋清晨，一个穿着雨衣、拿着雨伞的十来岁小女孩孤零零地走在空旷的北大校园和偏僻的小街上，穿树林、爬山岗、绕湖边、过小桥、涉积水，该要多大的勇气啊！如果没有对父母深深的爱，是绝对做不到的。

女儿从小也很机灵。大约是在 1980 年吧，她还在北大附小上学。那年月，自行车等日常生活用品十分紧俏，都要凭票供应，我们好不容易积攒到相当于我和老伴俩人整整一个月工资的钱，托上海亲戚买来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那时这样的自行车是响当当的名牌，这是当时我们家最贵重的财产和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全家人倍加珍惜。但是，不到半个月，有一天上午，我骑着这辆自行车去第一教室楼给学生上课，将自行车停在第一教室楼前。当我上完课出来时，到处找不到自行车，十分着急，去校卫队报案，他们也只是登记而已。我又在第一教室楼周围转了好几圈，还是没有，只好垂头丧气地从教室楼走回二、三公里之外的北大西门外蔚秀园家中吃午饭。女儿中午放学后也从北大东门外的北大附小走回家吃午饭，她听说家里自行车丢了也很着急。她吃完饭后就同住在同一栋楼的同学去上学了。过了一会儿，女儿气喘吁吁、满脸大汗地跑回来，说她在教室楼那里看到了我们家的自行车了。我将信将疑，但立刻随她向教室楼跑去，只见我们家的自行车躺倒在文史楼前的松墙下。文史楼在第一教室楼东南方向。原来女儿知道家里自行车丢了，她在上学穿过北大校园时就去教室楼那里找，她发现了这辆躺倒并藏在文史楼前松墙下的自行车，其座位下塞着的擦车布是她的旧衬衣，就赶紧回家报告。可能是小偷见中午人多，不敢公开撬锁，先将自行车后轮

---

提起，假装推着车，悄悄地转移地方藏起来，等人少时再撬开锁偷走吧。女儿的责任感和机灵劲使我们家在那个经济困难的年代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全家人都十分高兴。

这次由老伴和我来照顾三个外孙女，点点滴滴，加深了我们同她们的感情，享受了天伦之乐。三个外孙女都眉清目秀，有着忽闪忽闪的水汪汪的大眼睛，一个比一个靓，也都很懂礼貌，“姥姥”、“外公”叫得亲热极了。特别她们去年回趟中国之后，中文都有很大长进，海迪和明迪表演唱“北京欢迎你”有滋有味、配合默契，她们自编自导的动作和所用的道具亦恰到好处，看来她们上戏曲班还是学到了东西。每当晚饭后文迪练习弹钢琴，海迪练习吹笛子，明迪练习跳芭蕾舞，真是一场美仑美奂的音乐舞蹈晚会，琴声扬扬、笛声悠悠、舞姿婆娑，我和老伴都陶醉其中。

老大文迪文静爱读书，每天放学回家后，吃点姥姥做的韭菜合子或蒸的肉包子就上楼呆在她的闺房里，或写作业、或看书、或上网、或听歌，偶尔也到玩具室看看电视。有时晚上让我送她去同学家做功课或学习中文，周末上 SAT 班和去体育馆游泳，安排井井有序，学校里功课门门优秀。她用中文写的中国旅游记还获得了 2008 世界华裔青少年征文比赛奖。文迪也很自觉，每天早晨六点我去叫她时，她总是立刻起床，梳洗吃早饭摸黑去马路边等校车。文迪身材高挑、长发披肩、亭亭玉立，美人坯子已初长成。她爱好名牌，喜欢打扮，她自己买的衣服和饰物搭配，穿出来很有品位。这次女儿从北京给她买回两只 COACH 手提包让她高兴极了。

海迪皮肤黝黑、身体强壮，运动素质极好，游泳是她的强项，拿过所居小区的游泳冠军。现在每周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训练三次，蝶泳、蛙泳、自由泳和仰泳各项成绩都提高很快。她性格倔犟、豪爽、慷慨、侠义。我们这次在北卡，正赶上文迪生日，在一个小型的家庭生日聚会上，海迪毫不犹豫地从她不多的零花钱里拿出 20 元送给文迪作礼物。她的闺房收拾得最整洁，自己也很会打扮，上衣和裤子的搭配很得体，一方小头巾，她变换着花样系在头上，让人耳目一新，既美观又时尚。对家里的事很有责任感，我们问她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她都知道得很清楚。可能是代沟，也可能是我们用中国家长式管她们三个小美国佬，她们不习惯，引起海迪的不快和逆反最明显。有一天早饭时，她和姥姥用中文夹杂英文针对针、芒对芒地大吵起来，海迪气哭了。后来我送海迪和明迪去学校回来，见老伴还在生气，嚷着“不管了！不管了！”我对老伴说：“你一个堂堂的北大退休教授，海迪是一个十岁的小学生，水平相差好几截，跟她生气降低了你的水平呀！”下午海迪放学回家，见到姥姥就说：“姥姥，对不起，早上我惹您生气了。”并给姥姥一个拥抱，姥姥也被感动得紧紧地拥抱着她。看到这个祖孙俩相拥的场面，我亦激动不已，我的眼眶都湿润了，什么是血浓于水哟？这就是亲情啊！

中文学校的叔叔、阿姨们叫明迪“小章子怡”，的确，明迪很耐看、最乖巧，十分天真

---

可爱，才六岁，但懂事很多。在我每次接她回家的路上，她同我聊天，谈一些学校的趣事，有一次还谈到美国大选和奥巴马，很有见地，让我大吃一惊。当然，有时聊着聊着就睡着了。她一大早起来，在学校上了一天课，紧接着是去优胜学院上几个小时的课外课，实在是太累了啊！有回吃饭，我见她磨蹭，就同她说，让我们比赛，看谁先吃完，她不动声色地说：“外公，你平时不是让我多嚼嚼慢慢吃，有益健康吗？”问得我无言以对。她经常知道答案，却来一个反问，在别人说出答案之前，她来个说明。比如有一次，她问为什么她会生病，我们就说，着凉了、身体抵抗力差等等，她马上笑嘻嘻地补充道：“还有不洗手。”她鼻子不通气，我用热毛巾给她敷，一会就通了，她高兴地连说“谢谢外公”，还给我一个拥抱。姥姥每次给她们做好吃的，她也连说“谢谢姥姥”，很懂礼貌。她还常拿一根香蕉递给我，并说：“外公，你不是每天要吃一根香蕉吗？”很是善解人意。明迪的绘画别具一格，很有风味。她的一幅水彩画被选中作为装饰，挂在一个青少年学习活动中心走廊的墙壁上，画上的几只白天鹅在碧蓝的水里戏水，形态逼真可爱，更妙的是画上用歪歪斜斜的中文写着“一群白天鹅被人赶下河”，让人禁不住捧腹大笑，仿佛那些白天鹅都动了起来。她画的北京奥运会八枚游泳金牌获得者菲里普斯也很有趣，他的八枚金牌不是挂在脖子上，而是挂在他超长的两只胳膊上，在水中奋力游向前方。

当然，孩子毕竟是孩子，总是会有小孩子脾气的。有一天，我接她们仨回家，也不知为了什么事，她们在车上就吵起来，声音很响，还有小规模武斗，弄得车都有些晃动，我要她们别闹了，再闹我就不开车了，才稍稍平静一些。回到家后，文迪、海迪立即跑到楼上去继续大吵，还有摔东西的响声和嚎啕大哭声，姥姥上去劝了两次也不管用。我跑上去大声吓唬她们：“你们再吵，我和姥姥回芝加哥，不管你们了。”过了一会儿，海迪下楼来对我们说：“你们答应妈妈照顾我们的，你们不能走。”同我们讲道理，她们的战火才平熄下来。

我们回芝加哥的前一天是个星期日，女儿、女婿都已回来，有女婿接送三个外孙女，有老伴和女儿做饭，我可以放松一下。女儿的家座落在一个半山坡上，面对一大一小两个湖泊，我早就想在这湖里钓鱼，看来时机来了。女婿准备好了渔具和鱼饵，找好了地方，就忙他的去了，我握着两支鱼杆钓起来。那天，阳光灿烂，微风轻拂，虽已十月底，仍然仿佛春天一般温暖，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五颜六色的水鸟划过水面发出欢快歌唱，我坐在湖边的石头上，一边等着鱼儿咬钩一边欣赏着四周的美景。碧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湖的四周一栋栋别墅，涂着湖蓝色、米白色、黄色和红色，隐映在高耸的松树和橡树丛中，湖边的芦苇虽然已有些枯黄，一些不知名的小花仍然夹在其中开放，真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

突然，我感到有一根鱼线被拉紧、鱼杆晃动起来，“鱼儿咬钩了！”我赶紧收线，经过一番较量，终于将这条两磅多重的鲢鱼(CAT FISH)拖上岸来。这个家伙太馋了，把鱼钩和鱼饵深深地吞进喉管里，幸亏女婿准备的钓鱼工具箱里有一把尖嘴钳，撬开它的嘴巴才把鱼钩取

---

出来。旗开得胜，信心大增，把战利品送回家之后，拿了一只水桶，准备装鱼，接着再战。不久又钓上一条，放在水桶里养着。在拖第三条鱼时遇到了麻烦，这家伙个头大，少说也有五磅吧，在离岸边丈余处水中的石头间滚来滚去，顽强地与我对峙，突然“啪”的一声，鱼线断了，已经到手的鱼带着钩和沉子跑掉了，让人好生遗憾，应验了“跑掉的是大鱼”这句俗语。只得重新系好新钩和沉子再来。不久另一支鱼杆又钓上一条。

将近晌午，“外公，回来吃饭喔！”“外公，回来吃饭喔！”海迪和明迪稚嫩甜美的喊声从湖堤上飘下来，在湖面上传播开去，直达对岸的树林，又反射到湖面上来。我赶紧收拾好渔具提着水桶爬上湖堤，海迪和明迪向我欢快雀跃地跑来，海迪力气大，接过装鱼的水桶就往家走，我一手拿着渔具，一手牵着明迪的小手紧跟在后。突然，我有一种时空变换的感觉，仿佛置身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渔村或一个小山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幅多么宁静、和美的画卷啊！

我醉了！我真真地醉了！

2008年11月于芝加哥

---

# 自我介绍

计算班 蔡仁泰

## 任职概况和退休生活

蔡仁泰，男，1939年3月生，海南文昌人。1959年考入北大数力系计算数学专业。1965年毕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原子能院）。1995年上级将我所在研究室——核工业核电软件中心（软件中心）整体并入核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计算机所）。该中心管理整个核工业系统核电软件开发及其管理工作。因计算机所内部矛盾，我于1999年退休。

在职期间，是原子能院科技委委员、计算机所科技委副主任、软件中心主任、核工业计算机软件标准化委员会委员。

中共党员、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工作期间，主要从事下列几方面的科研工作：核物理理论计算、核武器数据计算、核反应堆堆物理及工程计算、核潜艇材料考验计算、核电软件开发建库及其管理工作等。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其中三篇发表在英文杂志上。

同他人合作或独立完成的工作中，获取了十几项部级科技成果奖，奖项名称、等级如下：

- 【1】数值计算在核物理研究中的应用，1979年国防科工委三等奖。
- 【2】 $255^\circ$  双聚焦电磁场分离器的物理设计，1983年国防科工委三等奖。
- 【3】轻水堆系统瞬态分析程序 RELAP5/MOD1 移植开发和应用，1984年部级三等奖。  
(以上三项奖，上级未设获奖证书)。
- 【4】氘核中子反应数据理论计算，1986年部级二等奖。证书号：86-2-094-2。
- 【5】KENO -2 等 6 个核电软件的开发，1987年部级三等奖。证书号：87-3-281-4。
- 【6】核电软件管理工作，1988年部级二等奖。证书号：88-2-060-2。
- 【7】为大亚湾核电站移植开发十一个放射性释放计算程序，1990年部级三等奖，证书号：90-3-290-7。
- 【8】轻水堆系统热工水力瞬态分析程序 RETRAN-02 的开发和应用，1995年部级三等奖。  
证书号：95-3-190-1。
- 【9】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核电软件库第一版，1995年部级三等奖。证书号：95-3-169-2。
- 【10】核工业计算机软件验收规范，1996年部级三等奖，证书号：96-3-231-1。

---

**【11】**600MWe 核电站放射性排出物环境弥散及后果的研究，1996 年部级二等奖，证书号：96-2-030-7。（获奖证书见附件，各 1）。

我的科研工作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对核工业做出了一点点贡献。也对得起北大和老师，他们对我六年的培养和教导。

## 退休生活，丰富多彩

**锻炼身体，天天运动。**在居住社区里有一个正规的操场，我坚持天天走操场，上午、下午各走六圈，每圈 400 米。当阳光太强时，我改为走小公园里的树林。每周去一次颐和园或植物园。有时在社区里打打乒乓球。

**文艺活动，天天快乐。**常在家里开小型演唱会，我拉二胡，老伴拉小提琴，常演奏的曲子有《达坂城的姑娘》、《喀秋莎》、《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我爱唱歌，老伴给伴奏，经常唱《在那遥远的地方》、《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大海啊，故乡》、《怀念战友》、《敖包相会》、《三套车》等。每周三下午，社区里有唱卡拉OK。我常去唱的歌有《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红星照我去战斗》、《牡丹之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的太阳》、《我爱你，中国》、《祖国我的妈妈》、《我的中国心》等。

**学弹钢琴，陶冶身心。**我于 1986 年出国回来买了一台电子琴，闲放了十几年。退休后，买了一本学习弹钢琴的书《钢琴》。将电子琴当成钢琴，学习弹钢琴。当然弹钢琴，弹电子琴的手指的力度是不一样的，但指法完全是一样的。在电子琴上会弹的曲子，稍加努力，在钢琴上很快就会弹奏。我学会了弹奏很多的钢琴曲子。比如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柴科夫斯基的《小天鹅舞曲》、肖邦的《圆舞曲》、巴赫的《G 大调小步舞曲》、《匈牙利舞曲》、圣桑的《天鹅》、还有改编的美国歌曲《送别》、《雪绒花》等。

**关心国家大事，天天看（听）新闻。**原子能院老干办大楼里，有各种各样的文体设备，还有种类繁多的报纸和杂志，我经常抽空去阅读报纸和杂志。晚上看电视，经常看“新闻联播”或其他时段的新闻。也经常在夜间晚一点，收看香港凤凰卫视新闻和各种政治评论。这样可以丰富新闻的内容，了解各种政治观点。

总之，退休后的安排得很充实。当然，主要的还是养好身体，追求快乐，享受人生。

---

# 我的退休生活

力学班 金德圭

快到 63 岁的时候，我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开始做准备。现在我生活中主要有如下三件事。

## 一、圆了钢琴梦

年轻时喜爱音乐，由于条件所限只能吹个笛子、口琴什么的。大学时同班同学刘志富有把小提琴，借给了我，很是高兴。从海淀旧书店里买来一本霍曼教程，自学拉了一阵子，班上活动时，还曾与朱蔚文二重奏过，也就学到第二、三册就拉不下去了。搬到十三陵后，同班的同学中又有了几位拉小提琴的，记得有竺培、陈靖齐。由于快毕业了，我就不再拉琴了（好像没有琴了）。同学毕业分手时，柴振彝把他的一把吉他送给我作为留念。参加工作后偶尔弹一弹，要知道那可是封资修的玩意儿，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玩一玩。文化大革命期间，说来凑巧，单位文艺宣传队长与我同屋，他经常把乐器——手风琴带回宿舍来，我有机会玩玩，就凭在大学时的那点音乐底子，竟然学得很快，技术可谓“突飞猛进”。一两个月就上台演出了。那时能演的无非是毛主席语录歌，头天《人民日报》发表，第二天（或当天晚上）就演唱。于是我就成了单位的手风琴手，一直活跃在单位的舞台上。后来经济上有了条件，用回国的指标买了一架当时觉得不错的电子琴（也只能算是个玩具而已），弹了些日子，但总不过瘾。可是弹电子琴也还是能练手指灵活性的，这为后来的钢琴弹奏打下了基础。

63 岁到了，为退休做准备吧。在柴振彝的鼓动下，买了一架钢琴。柴振彝弹钢琴比我早，他常约我去他家玩，他住在山东东营，在他的熏陶下，他的孙女从小就学电子琴和钢琴，现在弹得不错了，最近要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属小学，我们一个住在北京，一个住在山东东营，但我很愿意去他家，我们爱好相同，一起弹琴（他家除有钢琴外，还有两架高级电子琴），合奏很有意思，我们还一起打乒乓球，一起上网。

北京有个青年宫中老年钢琴联谊会，我参加了，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朋友。有一位名叫林建武，是北大 60 级无线电系的，我们同在十三陵待过，现在是联谊会会长。他原来是北大乐队成员。此外还结识了今年 92 岁的刘育毅老先生，他是刘天华的长子，我们成了忘年交的朋友。联谊会每月小组活动一次，还经常有不定期的大组活动，与天津的王莘钢琴俱乐部结成兄弟组，每年互访。弹钢琴，动手又动脑，有益健康，可延迟老年痴呆的到来。

---

## 二、乒乓球走到哪里打到哪里

我的第二个爱好是打乒乓球。在学校时我就爱打乒乓，北大二体是我常去的，到了十三陵，我们住在一层，二层就有乒乓球室。记得同学间经常一起打球的有柴振彝、唐燮黎、康德泉，有时还与黄敦老师一起打球。分到单位（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后，一直没有间断过，现在时间更多了，更是几乎每天都要打，走到哪里，打到哪里。在打球的过程中，结识了许多球友，有工人、农民、企业老板等等，还有在德国结识的许多国家的球友和俄罗斯的球友。真正体会到乒乓是我们的国球，爱好者太广了！2008年北京举办全民乒乓球和谐杯比赛，每一位居民都可参加比赛。在我居住的居民小区中我和我儿子金全获得了冠亚军。在区级比赛中我们也取得了好名次。

## 三、玩电脑

退休后我仍然喜爱动动脑，我的动脑方式有：讲课，辅导，玩电脑。

我们单位有个研究生院，我为研究生开了一门基础课——“高等流体力学”。所谓“高等”无非是多用了一点数学，给他们补上一点场论数学知识，为他们以后自学打下基础。



我将在这里返聘至 2015 年

---

此外还开设一门“核电厂安全”，为核电厂新员工介绍必要的安全知识。通过讲课，与青年人接触，互相学习，很多电脑知识就是向他们学习来的。

通过打球，弹琴，认识的人多了，有人就请我帮他们的孩子补习初、高中的数学、物理，只要我能抽出时间，我一般都是很愿意帮助他们的。特别是经过我的帮助，他们的孩子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我也分享到很多的快乐，很有成就感。

我工作一直与计算机打交道，自己很早（1986年）就从国外买回过电脑（commodore64），不断更新换代，直到现在的64位的双核笔记本，硬盘500G。目前用的电子产品越来越多，数码相机、摄像机、数码伴侣，多功能手机等等。过不了多久，现有电脑又觉得不够用了。我很早就开始上网，开始使用单位的邮箱，我在北大的网上建立了一个59级力学1班的班集体，希望能有同学也参加进来，可是等了好几年也不见一个同学进来。北大有校友网网站，我还申请了邮箱，他们给我发来——

亲爱的金德圭校友：

恭喜您！您在北大校友网上申请的邮箱 [jd400817@pku.org.cn](mailto:jd400817@pku.org.cn) 已经开通，您的用户名是 jd400817，密码是 XXXXXX，您可由校友网主页 <http://www.pku.org.cn> 或者邮箱网址 <http://mail.pku.org.cn> 直接登陆，关于邮箱使用的意见、建议及问题请发 e-mail 至 [emailadm@pku.org.cn](mailto:emailadm@pku.org.cn)

祝您度过愉快的每一天！

北京大学校友会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有一天终于有了信息——

金德圭：你好，祝元旦快乐工作顺利。我在浏览网页时，发现有校友网并有免费邮箱，注册之后发现还有同学网，我找了五九级，只有你创建的一班，我想创建一个二班的，几次未获成功。按其登记到所在专业就无下文了。你是如何成功建班的？在网上漫步像我所处的西北一样荒凉，仅见你一个熟悉的名字，估计上网者不多。

请代我向你们那里的同学们一并致以节日的祝贺。李明智，任王荷，符国干，张重珠等，前年一别又两年了！

我的邮箱还有 [share398@sohu.com](mailto:share398@sohu.com) 及 [wang7628@hotmail.com](mailto:wang7628@hotmail.com)

如若有同学有邮箱，请交流。再见！

王燮昌 2003.12.24

后来又有贺大拙，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 13167592463 北京顺义区巴马坡花园二区 3-5-302号 [hedazhuo@hotmail.com](mailto:hedazhuo@hotmail.com) 参加了进来。

---

2008 年，章本照也加入进来了。章本照（学号：5901181），浙江大学力学系  
zbx@zju.edu.cn

直到现在，总共 3 个人。我们两个力学班有 31 位同学有 EMAIL 信箱，完全可以在北大校友网建立广泛的联系。希望同学们都能加入进来。

王燮昌也建立了二班班集体，加入的同学可能也是寥寥无几。

就在我们 5 月 15 日在北大聚会之日，好像失去多年联系的李德芳知道此事似的，在网上出现了，他的信息如下——

用户 ID: 李德芳      昵称: 兰亭      真实姓名: 李德芳

电子邮件: wenyuanjinhua@163.com

性别: 男      在校信息: 本科, 数学科学学院 1960

所在单位: 家      办公电话: null      手机: null      通讯地址: 河北邢台南宫

我们很快就要进入 70 岁的高龄了，希望大家珍惜晚年生活，提高生活质量，活得健康快乐。

愿每为同学在今后的日子里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

---

# 缘

——北大连着我和你

力学班 邝冬英

一转眼，50年过去了。自从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与母校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半个世纪以来，不论何时何地，每当提起光荣的北大，特殊的情感就涌动心头。

是因为考取、就读、毕业于北大而自信、自豪，还是因为北大的美好，换来一生的骄傲？是回忆校园生活的甜蜜，还是对影响我们一生的恩师的感激？是校友们出色业绩激励着我们天天向上，还是北大光荣的革命传统使我们时刻不忘肩负对国家、民族的责任？这种种纯粹的情感汇集成一种北大的魅力。这就是岁月沉淀的饱含人间最美好的亲情、爱情和对祖国、民族伟大事业激情的“魅力北大”。

## 我与叔父邝明的亲情缘于北大

我的邝明叔叔，故去已经二十多年了，他的高尚品格，影响我一生。叔叔生前是国务院副部级干部，青年时代经我父亲介绍，抗日战争前参加革命，不久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曾跟随周恩来总理在重庆新华日报社作统战工作，以后到延安，跟随毛主席转战南北。解放后得知我的父亲已被日寇杀害，留下唯一的女儿，就到处寻找我的下落。回想当年，他到北大一个系一个系地找寻，找到我时，热泪盈眶，深情地对我说：“找了这么多年，可把你找到了！没有你的父亲，就没有我的革命生涯。你爸爸走得太早了。今后，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当年，刚刚十八岁的我，家庭突然遭受变故。早在1927年白色恐怖下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入党的继父，一夜之间从老革命被打成右派，母亲受牵连，弟妹随之下乡，家也散了。年轻的我对冷酷的政治斗争百思不得其解，身心备受打击，甚至生了场大病，不得不休学。大概是我父亲在天之灵指引执着的叔叔在北大不停地找，才使我在复学以后又有了一个新的家。父辈崇高的革命亲情温暖着我。叔叔大公无私、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常常给我讲述父亲的优秀品质和革命故事，鼓励我继承父业。当时我叔叔家有三个孩子也就读北大：我的大堂妹在中文系，二堂妹也在数力系，六堂弟在国际政治系。同是北大学子，我们相互鼓励和帮助，周末一起回家，谈论起天下大事来各抒己见、慷慨激昂，犹如北大论坛。叔叔常为家中有四个孩子就读北大而欣慰。我在北大的学业和生活从此又充满阳光。每当想起北大，都会怀念

---

邝明叔叔，心中不禁想道：叔叔啊，北大连着我和您。

## 我与我先生的爱情也缘于北大

我的先生容文杰，故去已十年了。他也是北大的优秀学子，毕业后，无私无畏地奔赴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在那荒凉的戈壁滩上，把如火的青春无怨无悔地奉献给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因为他的无私、无畏和对中华民族的忠诚，我嫁给了他。

容文杰生前曾是国防科委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转业后，曾是广州市优秀党员、广东省先进工作者、广州市劳动模范。他曾是我北大的同窗好友——忘不了他那矫健的身影，曾光着脚丫子赢得北大爬山比赛第一名；忘不了他在几丈深的高崖水库游泳，勇救落水同学，被传为佳话；忘不了他为治好我的风湿性关节炎，冒险翻过天山雪顶，采来朵朵洁白的雪莲花。当年，望着那些晶莹的天山雪莲，深深感受着他那质朴、刚强、纯洁、无暇的爱情；更忘不了他面对“不治之症”的坚强、乐观、豁达——他是我和两个儿子一生的骄傲，他的音容笑貌将陪伴我终生。

## 我对“两弹一星”的激情也源于北大

我高中毕业于广东广雅中学，该校由清朝两广总督张之洞负责创建，校史比北大还长，当时是广东省排名第一的中学，和北大一样，也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高考时，报考北大数力系力学专业，是听说这个专业培养目标之一是为国家培养航天工程人才，没想到考上北大并学成之后，真的有机会投身祖国的航天事业，与“两弹一星”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在北大毕业时，正值我国“两弹一星”研制进入技术攻关的关键时期，需要从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和科大等重点院校选拔人才。容文杰被分配到新疆核试验基地，而我有幸被分配到北京空间控制工程研究所，从事卫星和宇宙飞船姿态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

青春的梦想成真，我成了为捍卫祖国和振兴中华而艰苦奋斗的“两弹一星”团队的一员，有幸与钱学森为首的留美归国学者、留苏归国学者、北大学子、清华学子等知名和不知名的精英并肩战斗在研发第一线。我所在的研究室是该所的第一研究室，担负着宇宙飞船、侦察卫星、科学试验卫星、资源探测卫星的姿态控制系统的研发工作，负责制造飞船和这几个系列卫星的姿态控制系统。而我具体负责这些系统的心脏——控制飞船和卫星姿态的计算机的软、硬件设计工作。事业的神圣、美好和责任重大使我心中充满激情，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忘我地工作，曾被评为所里、院里、部里的先进，曾代表航天部被中央首长接见，并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二等奖和国防科委(部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我国第一颗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后，曾获航天部嘉奖。作为航天英雄杨利伟背后平凡的航天人，能忠诚于中华民族，

---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履行职责，对祖国航天事业有所奉献，一切都缘于北大的培育。既有丰富学识的滋润，又有严谨科学的学习、工作方法的培训，还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熏陶。

忘不了当年面对陌生的宇宙飞船和人造地球卫星，虽然很兴奋，但感到任务艰巨，束手无策，怎么办？想到北大教会我的：一切从概念入手，打好扎实基础，要让所需的知识在工作实践中得心应手，我就深入钻研钱学森的“空间控制论”，并没日没夜地补回我们专业没学到而工作中又急需的其他专业知识，从电工原理开始，晶体管半导体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到计算机原理。

忘不了面对美国技术封锁和苏联撤走专家后留下的一个个技术难关，总是北大时学会的学习方法“一题多解”在起作用，使我能从不同的角度开阔思路，找到创新的技术关键，使我们一次次度过难关。

忘不了面对宇宙飞船和卫星姿态控制的心脏——计算机平台测控系统，由于在我们大学时，国内高校还没有设置计算机系，同事们都没接受过有关的基础训练，感到生疏和畏惧，不敢接受设计该系统的繁重任务。我想到“广雅”和“北大”的光荣革命传统：为了国家和民族振兴，敢为人先。我勇敢地承担了神舟飞船的预研项目——我国“曙光一号”宇宙飞船平台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主设计的任务，顺利完成后，再接再厉，完成了我国“实践二号”姿态测量编码器和姿态控制系统的设计工作。随后又承担了我国“实践三号”卫星计算机系统的软件设计工作。

忘不了当年，为了去基地执行卫星发射任务，毅然忍痛为不满五个月的小儿子断了奶，拜托家人照料幼小的婴儿，牵肠挂肚地奔赴国境边界线。忘不了当年在基地，发现脚趾上长了个小瘤子，疼痛难眠，但为了集中精力完成发射任务，我忍痛坚持到圆满完成任务返京后才去住院，结果是患了半恶性的巨细胞瘤。医生说再拖下去，就会有生命危险，只好截去脚趾头。只要是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再大的牺牲和奉献也在所不惜，无怨无悔。这就是母校培育的革命精神。北大培育我的、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得以发扬光大的精神财富将伴我终身。

面对校友们、特别是来自航天部校友们灿烂的笑容，一个个脸上都写着精彩的人生。相信我们都是怀着感恩之心相聚北大的。我们事业的成功、精神的富有、生活的幸福都缘于光荣的北大。面对已经须发花白依然神采奕奕的校友们，我只想说：祝愿大家健康、长寿！北大永远连着我和你。

---

# 回忆在北大的日子

数学一班 李福星

---

—

1960年冬天，学校派我们到十三陵修筑公路，准备造铁路到十三陵分校。当时我们在一个近山坡的高地上临时搭了几个帐篷作为集体宿舍。前面挖了两个大的灶坑，放上大铁锅烧饭烧菜，一个野战式的战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每天五点半吹哨起床，到二十里外的工地上去劳动。晚上回来已经是八点半了。三年自然灾害，供应紧张，菜饭凑和能吃饱，晚上能打盆热水洗脸洗脚，然后带队的老师同学进行讲评小结。那时候都讲政治、讲表现，大家都很认真。身体不好的可以到旁边的一个卫生室，护士可以给你配点药。

十多天后的一个早上，我们都准备出发到工地劳动。我们班的方肇满同学说身体不舒服，不能去，就他一个人留在家里。他是福建人，不太爱说话，老实巴交的。晚上我们回来，看他已经不行了。领导立即向学校汇报，叫他福建的父母前来处理后事。接着我也拉肚子，不到两个小时拉了28次，刚离开厕所又得回去。医生说“脱水了！赶快与学校联系！”学校知道此事后立即派车到工地。大约是晚上十点半车子赶到了，午夜十二点到达校医院急救室。接着吊了一个晚上的输液瓶，到第二天人才好起来。我想要不是方肇满这件事的前车之鉴，也许我早到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是方肇满救了我的一条命。

—

二年级的时候，我是班里的劳动委员。系里分给我们一大块地在物理楼的旁边。领导叫我们种大白菜，每周和大家去浇一两次水和肥料等。长得蛮不错的。这叫做“天不负有心人”吧！

三

我是广东客家人，普通话讲不好。徐明曜为了帮助我学好普通话，还买了一本书《广东客家人怎样学好普通话》送给我，鼓励我好好学习，平时多注意纠正自己的发音，这样才能

---

和大家交谈。可是我这个人比较笨，学话能力差。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客家话与普通话的差别在哪里，发音不正确，所以普通话一直没有学好，给自己以后的工作和交友都带来极大的影响。回想起来，真是对不起徐明曜和同学们对自己的帮助。

## 四

武北读书到时艰，刻苦攻读心血捐。

父母双亡都未见，卖衣回家哭坟边。

正直宽容在一块，学话交友最为贬。

人生有梦失青春，功名富贵成在天。

---

# 忆入学五十年

力学班 李明智

在我人生的旅途中，  
五九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年代，  
当手捧北大录取通知书时，  
其心已飞瞑湖光塔影的燕园之中，  
渴求着老师的殷切教诲，  
倾听着朗朗的读书声。

我真时运  
坐上了贵阳新开到北京的第一列火车，  
也真幸运  
在前门的火车站停运前到达  
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

心啊  
激荡！  
血啊  
沸腾！  
在迎新的校车中  
目睹了雄伟壮丽的天安门，  
眺望了巍然屹立的西单电报大厦的楼钟，  
路过了全国顶级的北京动物园，  
见到了兄弟院校人民大学的校门，  
开进了秀丽如画的梦幻燕园。

在报到处  
一张张愉悦的笑脸，  
一声声动听的语音。

我欢快  
神往，  
在云雾中不知不觉

---

被徐明瑜同学带进了  
28 斋 258 寝室，  
即溶入新生活的浪涛之中。  
我迎进了室友武进长笛王燮昌，  
盖平苹果乡吕洪生，  
河南豫剧才子薛文富……。  
在年级辅导员周巢尘的主导下  
我们力一（2）成立了。  
团支书名张克清，  
许国富是班主任，  
我为班长，  
全班共 40 人。  
新集体，  
新生活，  
充满了诗情画意；  
新学习，  
新课程，  
包藏着奋发艰辛。  
我们开始了  
静静的  
紧奋的  
三点式的  
六年校园生活。  
北京大学是祖国最高学府，  
她铸造我们建设祖国的擎天本领；  
燕园的湖光塔影，  
造就我们忠于祖国的精骨灵魂；  
数学力学系  
给予我们专业知识；  
力学专业  
授予我们航天技能；  
高超讨论班

---

赋予我们探索宇宙的航天使命。

我们

一群天真烂漫的学子，  
从五湖四海会聚燕园，  
满怀着奇妙的飞天梦想；  
憧憬着美好的锦绣前程。  
深深地投入 28 斋的襁褓怀里，  
轻轻地吮吸燕园的丰育乳汁，  
渐渐地溶入北大人的血液之中。

我们

一群如饥似渴的学子，  
努力、认真、刻苦、奋斗；  
不倦学习老师的每一滴知识，  
孜孜吸收老师的每一个方法，  
充分消化教授的每一个技巧。  
这样慢慢地溶合不断促进了我们的头脑，  
使我们的知识学库藏珍贮宝。

我们

一群生龙活虎的学子，  
严肃、虚心、分析、专研，  
聚精会神听好每一堂课，  
专心致志查阅有关参数，  
一丝不苟完成作业。  
随时光流逝逐渐潜变了我们的心胸，  
使我们的技能本领增异添枝。

我们

一群天性活泼的学子，  
任凭燕园四季往复的熏陶；  
静静地头脑丰满，  
默默地筋骨强化，  
悄悄地成长成才。  
我们怀着北大人的精神热切响应母亲召唤，

---

立志为祖国的宏图建设添砖加瓦。

我们

一群北大筋骨的学子，

坚定、果敢、顽强、奋斗，

带着燕园哺乳的宽大胸怀，

北大人顽强的奋斗精神，

服从祖国的分配

步入各行各业的建设岗位，

去体验事业的伟大，

去感受任务的艰巨，

去领略时代的风采，

去品尝生活的乐趣。

无论是对宇航的探索，

还是对火箭、导弹的专研；

无论是各类飞机的研制，

还是核战线的攀登；

无论是深海攻克难题，

还是在石油工业的勘探；

无论是在生物实验室

还是在卫星、飞船发射场地；

无论在大学教授，

还是在中学育人；

无论是在管理岗位，

还是下海创业……

条条战线

都活跃着我们的身影，

奋斗着我们的心灵，

流淌着我们的血液和汗水，

贡献着我们的青春和活力。

个个岗位

都留下了我们前进的足迹，

记载着我们攻克的每一项艰难课题，

---

铸造着我们的各项成果，  
建树着我们的闪光业绩。  
我们——  
我们是一群北大人！

---

#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数学二班 李沐兴

我出生于印尼西爪哇省一个叫做展玉的小县城。初中至高中毕业,我是在印尼万隆华侨中学学习的。在万隆最值得我回忆的是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期间,克什米尔号飞机失事,多名我国记者在这次失事中遇难。这是蒋帮分子所为,大家非常愤慨。当时,万隆华侨总会号召万隆全市的爱国华侨行动起来与印尼军警一起确保周总理及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我能为周总理及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出力,这是令我难以忘怀的一件事。

高中毕业后,当时我多么想回到祖国深造,但由于父母养育了七个子女,经济条件不允许我毕业后马上回国,便在万隆华侨中学任教,教初二班的数学兼任初二的班主任。经过两年多的积蓄,才于1958年12月18日乘船离开印尼,经过9天的海上波涛汹涌,到达深圳,然后乘火车去广州。数日后于1959年1月5日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学习了半年多,于1959年秋考上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初到北大,在学习上,老师高水平的教学,同学之间的相互帮助,相互切磋,形成很好的学习风气,自己的学习成绩也蒸蒸日上,获得优良的成绩。在生活上,也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当得知我没有经济来源时,校方及时给了我助学金。在困难时期,校方还为在校的归侨学生办了华侨食堂。

在校期间有两件事使我难忘。一件就是入学不久,组织上要求大家“向党交心”,写自己所想的一切事。同学们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及体会都写出来交给了组织,没想到有些同学却被说成“思想反动”,给这些同学造成很大的精神负担,有的同学还被勒令退学,对我们来说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大部分同学都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向组织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就像向母亲讲真心话一样,多么真诚,所以我对受批判的同学照样与他们接触,从不歧视他们。使我难忘的另一件事就是当时在批判“右派”老师时,有的同学走上台殴打老师。每个学生都应该尊重老师,因为他曾经传授给我们知识,不管老师当时犯过什么错误,作为学生更不应该殴打老师,这是最起码的道德修养。

在分专门化的前夕,我在印尼的家出事了,反华分子将家里的一切物品哄抢一光,而此时我的女友又离我而去,这些事给我很大的打击。班里的有些同学却安慰并鼓励我,使我下决心用自信的笑脸,去迎接人生的挫折,用百倍的勇气去战胜一切不幸。

确实,我们二班同学曾同窗数载,浇灌手足情谊,从花香弥漫的春天,到风萧虫唧的秋日,洋溢欢乐,充满情趣。

毕业前夕,我父亲来信,鼓励我“要听毛主席、周总理的话,要服从祖国的分配,到祖

---

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是到农村为父的都赞成你去”，所以，当时我向组织表示毕业坚决服从分配。

大学毕业后，我暂时留在北大，在653工程驻京办事处参加北大在汉中分校的建设。1967年1月，被分配到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国际部，本来计划到上海培训外语后，作为科学家的外语翻译工作者留在科协的。由于文革，1969年一月被首批下放到河南确山干校劳动，虽然条件艰苦，但我还是积极参加劳动，插秧、挑粪、耙地、拉牛车、喂牛、当炊事员等样样都干，获得领导的好评并被评为五好战士。在干校劳动了三年半，于1972年7月被分配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当时计算机正在兴起，我请求到计算机科学室工作，获得批准。

1985年1月，数学所派我们5人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奥地利维也纳技术大学应用信息研究所与奥方共同开发面向问题的数据库操作系统（pore1），在出国前，只学了3个月的德语，我个人要研读近2尺厚的德语资料，看懂资料后还要上机操作，虽然难度很大，经过日以继夜的两年努力，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退休后，为发挥余热，我的同事鼓励我到在京的德国曼内斯曼外国企业工作，当时有30多人在应聘，只录取两名，而只有我是岁数较大者，德国负责人看了我的简历后，用英语问了一些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临走时我用德语与他说了一句话，最后居然录用了我。在外企工作了近两年，我又被北京中医药大学聘为顾问，共同研制中药数据库系统。

北京大学是誉满世界的名校，她培养了许多名人，这是因为名校必有名师，必有优秀的精神传承，必有高品位的文化熏陶。在111年漫长的岁月里，可谓群星璀璨。能在这样的名校里学习，对每个人来说，是多么荣耀。

我们年级的同学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各地，在北大、清华，在科研单位，在全国各大学里，在中学里都有我们的同学积极为伟大祖国献出毕生的精力。在此我们要感谢北大的老师们，你们用满腔的热血，铸就了人类不朽的灵魂。你们用涓涓知识源泉的浇灌，一番耕耘的辛劳，才会有桃李的绚丽，稻麦的金黄。

悠悠岁月，50年既漫长也短暂，一切犹如昨天。岁月已飘远，而悠悠的往事常如丝如缕般涌现在我的脑际。岁月不会再回来，而在北大的往事却在我的记忆里沉淀为永恒。

岁月如烟五十载，同学相聚乐开怀。

无私奉献为国强，感谢北大育人才。

---

# 我这五十年

数学二班 刘开第

## 离校

1965年4月的一天，天空中的阴霾还没有散去，刚刚经受三年困难时期洗礼的校园或许因为我们沮丧的心情，显得有些不安。是的，几个月来的“毕业教育”，人们都累了，我们——这一帮子也该离去了。再见了，拥抱我们六载的燕园，但此时我们所能留下来的，只有对先生们深深的思念。

我们这一小帮十几个人，到天津等待“分配”，天津会收容我们吗？当然，这不过是弃儿们的一种奢望。匆匆离开天津，我们，一个个都去了我们该去的地方。我、傅立福、杨振明，分到廊坊的一所“半农半读”学校，位于京津间的一座万人小镇上。

4月28日这一天，天气很凉爽，云缝间还透过一线阳光。我们走过一道没有校门的院墙，几栋陈旧平房、还有一辆不算很旧的马车，这就是我们来工作的地方。

同年龄与我们相仿的学生一起劳动、学习，心情也渐渐开朗。虽然我们不再存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和理想，但是，我们仍然血气方刚。“就着老咸菜啃窝头”，我们不觉得苦，挥舞镰刀和锄头，使尽全身的气力也不觉得累。我们没有抱怨，只是拼命地干，因为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

不知不觉间，已到了1966年。

## 在那个动乱年代

令人不安的气息已穿过学校的围墙，夹杂着血腥味的批判和声讨声不时扰乱着课堂，原本平静的校园已开始动荡……

6月一天的早上，突然间大字报满墙，人群中怪异的眼光都不时投到我身上。原来所有大字报都是针对我的，廊坊师专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从我开始了。

一夜间，我成了陆平的种子、“三家村”的黑扒手、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这些今天看来并不算吓人的称呼，但是在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那是怎样的一种灾难啊。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五雷轰

---

顶。我在深渊中苦苦挣扎，我不明白，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后来学生跟我说：刘老师，你档案里写着“对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三面红旗有错误观点”。原来如此……

也许是我不算太坏的“出身”帮了我，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口诛笔伐的“舆论”解放了。但是，傅立福、杨振明这两个“三家村”的另外两名黑扒手就没有那么幸运，先后进了“小黑屋”，还尝受过“拳脚”。

自此以后，校园里再也没有了朗朗读书声。

学农、学工、学军，无休止的批判会，名目繁多的学习班等等，成了那个年代我们这些“臭老九”们活着的理由。

无情岁月在无奈中慢慢地把我们都送到了而立之年。

## 中学十四年

1970年的最后一个月，在一位好心的军代表帮助下，为照顾两地分居，邯郸市一所初中同意接收我。可我报到的却是邯郸一中——当年邯郸的最高学府。后来才知道，一中的余先桥主任，在教委的一张桌子上无意中看到我的调令，不忍心一个北大毕业生到一个只有几个初中班的学校去，于是就把我拎到了一中。谢谢你，余先桥主任。

中学——我从未向往过的地方。但是，天真烂漫的中学生，慢慢融化了我那颗冰冷的心。我开始全身心投入到中学教学中，一下子就是十四年。有那么多有作为的学生，王亚杰、周东华、杨振斌、迟玉和、张建坤、刘文玲……提起他（她）们，我这心里有说不出的满足。这十四年是我一生中最有成就感的十四年，也是最舒畅的十四年。

十四年中，我得到了那个年代一名中学教师所能得到的一切荣誉——记不清明目的各种先进、市劳动模范、省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但是，这一切早已淡去，惟独两件事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一是那么多学生“因为是我的学生而感到自豪”。学生的认可是我永恒的财富。二是一中已故张家仁校长的一席话：“开第，你档案里一个黑点都没有，全是红点，你不入党谁入党！”看着老校长严肃而凝重的眼神，我不禁热泪盈眶，因为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受到政治上的温暖。不久，我递上了原本一辈子都不想写的入党申请书，1979年的7月1日，我也成了一名中共党员。

## 第二道坎

1983年，从知识分子中选拔领导干部的浪潮把我卷进了漩涡，1984年5月，我被任命当上了某教育学院的教学副院长。

---

从教学生到在领导圈子里混，我是那么的不习惯。天生“一根直肠子”的我，把所有的“看不惯”都摆在了人家面前，那么的“不合群”，又那么的不讨“领导”喜欢。我也慢慢领略到了官场上的黑暗。辛苦忙碌了四年多，虽说新上了音、美专业，稳定了教学工作，但这些不足以支撑人际关系，似乎越忙越给“领导”添乱；但最使我心痛的是1986年在申报高级讲师职称时，受到“不同政见者”的层层阻拦。一些水平很一般的人可以轻松“过关”，而我，所谓的邯郸“数学教学第一人”，却如履薄冰几乎过不了关，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个官真的不能再当了。“回头继续当我的中学教员”，但是，走回头路不是我的习惯；去科研院所吗？可临近知天命之年，我哪还有从头做起搞科研的本钱；去高校，对，反正教书我习惯，看来只有这“华山一条路”。可当时邯郸尚没有一所真正的高校，要想去高校，就得离开邯郸。

但是，离开邯郸对我而言谈何容易，若能离开的话，早在十年前我就去哈工大了；谁叫我是岳岐峰书记钦点的邯郸教育界第一个劳动模范呢？我知道，我碰到了人生中的第二道坎。从不求人的我，不得不为求得自己生存的一线空间求人。

谢谢王建忠副书记，在我最无奈时帮了我，他终于同意了让我走，派市委组织部兰部长亲自送我到矿院（我现在工作的河北工程大学），并再三与矿院领导讲我是“县团级”。

虽然这已过去了二十一年，但建忠书记的一席话犹在耳边：“开第兄，不是我不想放你走，因为你走了不只是邯郸的损失，也是邯郸的耻辱”。

谢谢你，建忠兄弟。

## 弃官从教

1988年9月的一天，我终于站到了大学的讲台上，但是这一天来的太晚；与同龄人相比，整整晚了二十四年。

从高等数学教起我还习惯，但是，在科研路上迟到了二十四年该是一个多大的差距；所学专业早已荒废，到哪去寻求属于我的科研切入点呢？苦苦探索着……谢谢北大先生们给我打下的知识基础，也多亏了十四年中学教学赋予我对知识的驾驭能力，更感谢那么多人给我的帮助。五年中我终于摸索出适合我走的那条科研小路，由此我也成了教授，了却了二次从教以来的第一个心愿，也抹平了心中的那个“结”。

当了教授后，不得不兑现五年前给矿院领导的那个承诺：“当了教授后再干事”。于是，在1993年，我受命组建矿院经管系，全力以赴搞学科建设，一搞就是八年。领导—教学—科研三肩挑，好在我们这一路上没有人勾心斗角，上下一条心。当年挂牌建系，三年上本科，四年上研究生，再一年获得本院第一个省级重点学科；八年三大步，到2001年，经管系已

---

发展成学院的大系。

工作得到了认可，学校把这两年中所能给予的光荣称号，一个不少地全堆到了我的头上：市劳模，省教育书育人先进个人，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教师。

2001年也是我退休的期限，是激流勇退还是继续我未完成的事业，我又一次面临选择，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没有无奈的选择。

## 我的花甲之年

我正常工作中的最后一个八年，大部分花在了学科建设上，经管系从无到有是我人生中做成的第一件事。但是八年后2001年，需要我做的另一件事才刚刚起步，如果把好不容易才摸索到的、属于我的那条科研通道的门就此关上，怕是我死后也不会甘心。

回想当年那动乱年代，无所适从五、六年，“而立之年不能立”那是怎样一种感觉；“误入官场”四年半，学业荒废处处是麻烦；无为的十年早已逝去，留下的只是无法修复的遗憾。我真希望时光会倒流，再能给我一个十年。

我认定2001年是我想做的、另外一件事的起点。为此，我只能把“古稀”看作是“花甲之年”。这是命运的安排，我认命，所以我没有激流勇退，而是选择了“继续”。为此，我一直努力为实现继续而继续。到2011年，当我完成手头上这第四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还清那十年欠账；届时，我想我会选择退休，安心享受晚年。

2010年元月

---

# 往事

计算班 刘志峰

我是 59 级计算班的刘志峰。

1940 年的初冬，我出生在江南水乡——江苏省江阴县申港镇徐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中。我们村有两三百户人家，村子北面约三百米处，便是浩瀚的长江。村中还有一条大河，直通长江，所以这里既不会旱，也不会涝。村中有大大小小许多池塘，每排住房的附近，便有一口水井，村民们喝井水，用河水。

全村有三户富农，几户普通中农，没有地主，其他大部分人家属于贫下中农，既没有非常富裕的人家，也没有过于贫困的。

1947 年刚过春节，我就从半年级（因为是寒假过后开始上的学）开始了我的十八年学习生涯。我的小学坐落在村中一个叫“老太堂”的庙中，庙里有两排各四间房舍，坐北朝南，以一个侧厢房连接，另一面则是高墙。庙里到处供奉着或青面獠牙、或慈眉善目的涂金泥人，我们教室四面的墙边，满是泥人们注视的目光。半年级、一年级和二年级合用一间教室，一名老师按班轮流授课。

我的父母十分勤劳，所以我从小受他们影响，读书也特别努力。记忆中最清晰的就是，每当临近考试，母亲很早就叫醒我，做一碗热气腾腾的醪糟汤给我喝，然后就着一盏小油灯，我开始温习功课。从半年级到小学毕业，我考试总是第一名，不过全年级也不超过十个人。

小学毕业后的中考，是在镇中心小学进行的。那年，全镇所有小学中只有五个人被江阴市内的江苏省立南菁中学（原南菁书院）录取，我也名列其中，其余几个都是镇中心小学的。我就要离开徐村，去县城读中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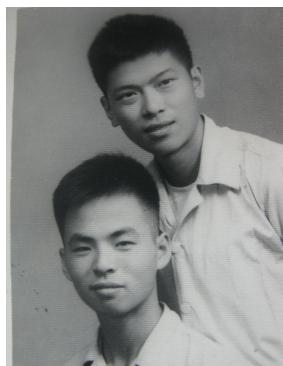
我喜欢我们的村庄，也忘不了那些儿时的玩伴。大伙儿在池塘里抓鱼虾，在稻田里捉青蛙，用竹子做成的尖头圆筒，一头开口一头密封，放到田边的黄鳝洞口，引诱黄鳝入瓮。还爬上高高的桑树采桑椹、掏鸟蛋。春天里，我们牵着风筝在田间奔跑，一起去割野草喂猪；夏日里，我们光着腚在长江边的沙滩上摔跤，在长江里畅游。晚上，我们又到稻田边在捉萤火虫，放入小瓶里，拿回家放进蚊帐；秋天来了，我们在稻草垛上打滚，在打谷场上捉迷藏。冬天，要是遇上下雪，我们踩着高跷上学，踩着高跷走乡串户，还会在高跷上互相打闹，笑声朗朗。

1949 年新年刚过，村子里进驻了国民党的部队，在江边修碉堡，挖战壕。打谷场上，军人们开始操练，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二月的某天晚上，枪炮声大作，人们钻到八仙桌下，

---

上面盖上湿棉絮，以防不测。到了后半夜，一直在门边把风的父亲说，解放军来了。我们徐村，是解放军过江进驻的第一村，有一条过江战役中的木船，至今保存在江阴博物馆中。

这就是我的童年，一段无法忘怀的记忆。



左边这幅照片中，站在我背后的是我六年的同窗好友（1959年合影），考大学时他报考了清华大学，在他的影响下，我才报考了北大，结果他遗憾地只考上了徐州师院，如果不是他，也许我会报考南京大学，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毕业后的合影，右边这一位多年后让我儿子去深圳发

展，退休后我也来到了深圳，不然我将在安逸的成都渡过我的退休生涯。

左边这幅照片中的她，是我的夫人，也是我们的校友，1962年考入北大生物系。右边这幅



是我的近照。



---

# 往事今回首

——为数力系 59 级同学聚会而作

力学班 吕洪生

阔别近半百，今日喜重逢，  
长谈不眠夜，难述离别情。

回首同窗日，浮想联翩生；  
永记得，同聆恩师传经典；  
更难忘，共领先生教诲情。  
燕园求知相提携；  
学府攻尖共攀登。  
——一代学子，苦读成风。

曾记得，教学楼中人潮涌；  
仍记得，阅览室内静无声。  
书写作业挑灯战；  
思解难题到天明。  
常记得，共产食堂人壮美；  
亦记得，三年饥荒人凋零。  
未名湖畔观塔影；  
校景亭上听钟声。  
总记得，金水桥下狂欢夜；  
永记得，天安门前大游行。  
农场劳动挥汗雨；  
昌平筑路忍饥凌。  
——往事件件记心中。

数载同窗匆匆过，  
分道扬镳各登程。

---

——时光不留情！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几十载的奋斗航程。

满头青丝换白发，一双锐眼变朦胧。

——岁月真无情！

且喜得，今朝诸公：

遨游学海多建树，勇创大业志恢弘。

功名赫赫标青史，身体刚健老返童。

再过几十年，我们再相逢。

古时有彭祖，今朝有诸公。

望君多努力，再会燕园中。

---

# 献给母校的赞歌

——纪念北大校庆 110 周年

力学班 吕洪生

伴随奥运圣火傲然地盛传，  
北大喜迎华诞一百一十年。

她开我国高等教育之先河；  
她为中华崛起做出伟大的贡献。

百年来，她华光四射；  
百年来，她豪气冲天。  
她是我国最高的学府；  
她是学者大师的圣殿。  
她曾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李大钊、陈独秀；  
她曾有蜚声中外教育大家：蔡元培、马寅初和周培源；  
她有文坛巨匠：胡适、鲁迅、季羨林；  
她有科学泰斗：邓稼先、黄昆和王选。

她培育的精英辈出；  
她造就的栋梁千万。  
她的贡献震撼世界；  
她的功绩高耸云天。  
她器宇轩昂；  
她传统正端。  
她扬中华之国威；  
她博世界之盛赞。  
看今天，百年学府仍在书写最美的画卷！

---

作为她的学子，我们要衷心地祝愿：

祝福她青春永驻；

祝福她辉煌灿烂；

祝福她世界一流；

祝福她科技夺冠！

今献母校诗一首，

略表深情与祝愿。

2008年5月4日

---

# 离开北大之后

数学一班 麦结华

## 一、1964年12月至1969年1月

1964年11月上旬回到家乡，那是一个古老的县城。县城是珠江干流与它的最大支流交汇的地方，水运交通便利。但不在铁路线上，陆路运输不太方便。当时，县里只有一个糖厂规模较大，其余的工厂企业，数量既少，规模又小，因此就业岗位极少。

1964年12月到1965年6月，安排到街道办的一个小的农场，该农场离县城约五公里，有十来个知识青年（应届的高初中毕业生）和几个中年职工。

1965年7月至1969年1月，离开那个小农场，回到街道参加体力劳动，都是做临时工。主要工作是把船上的货物（工厂的煤，粮仓的稻谷，糖厂附属石灰厂的石灰石等等）挑到岸上或把岸上的货物挑到船上，按件计酬。那时我身体好，平均每次挑的重量是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斤。属短途运输，挑的距离多半在一百到三百米之间。偶尔有装车、卸车的工作，即使是一百斤一包的水泥、化肥，也觉得是轻活了。最辛苦的工作是挑东西上坡（从船上到岸顶，高度差有约二十米）。挑东西走平路或下坡便觉得比较轻松一些。那时的问题不是劳动辛苦，而是重体力工作的机会也不多。街道安排轮值，几天才有一天有工作，其他时候闲着。所以那几年里每月收入都很少。

其中，1966年4至6月，曾和街道的一个青年合伙去县城东边二十多公里之外的一个地方挖锰矿。那是一个国营锰矿的外围地带，锰矿的含量少，便允许私人采挖。那里的锰矿的形状像打碎的瓦片，直径三、五厘米不等，厚度则为一厘米多，夹杂在泥土中，称之为“瓦片锰”。用锄头把泥土挖松之后，用筛子筛去泥土，再用水把筛到的瓦片锰表面粘着的泥土洗去，便可以运到三四公里外的一个国营的收购点出售了。锰的含量低一些的，是每吨三四十元；锰含量高一些的，收购价格也高一些。

洗净的瓦片锰像煤一样，黑色的，其貌不扬。但是，如果把瓦片锰敲断，那断面却是极其美丽的深蓝色（如果锰的含量低一些，则是浅蓝色），闪耀着光芒，比蓝宝石还美丽。它的价值之所以不能与蓝宝石相比，我想，第一个原因是它的产量，它一点也不稀有；第二个原因是它没有蓝宝石的硬度；第三个原因是它的极其美丽的深蓝色不能长时间保持。无论如何，那瓦片锰的断面的极其美丽的深蓝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现在想为它写一段文字。我后来一直遗憾没有带几块瓦片锰回来收藏，也遗憾当时只挖了一个多月的锰矿便

---

返回县城，回去关注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了（当时，县城还处在四清运动阶段，文化革命的风暴还没有刮到县城）。其实，当时我们是没有什么约束的。虽然挖锰的收入也一样低，但回到县城也没有多少工作可做。我遗憾没有在那里多挖两三个月，多体会一下那种自由自在的野外生活。当然，风吹日晒雨淋，收入也不高，那种工作也就做几个月有意思，长期则难坚持。

另外，在1967年，有几个月的时间，我报名参加了县城的糖厂的一种重体力的工作。工作的内容总是搬运糖包。有时候是把二百斤一包的粗黄砂糖从仓库里面扛到仓库门口的铁轨上面的平版车上，扛的距离只有一、二十米，偶尔从仓库的深处扛到门口，至多三十米。然后由人力推动那平板车到一、两百米外的炼糖车间门口，再由人力把一包一包的粗黄砂糖从门口扛到炼糖车间里面，扛的距离也是一、二十米。有时候则是把炼好的精白砂糖从炼糖车间运到堆放精白砂糖的仓库存放。有时候是把精白砂糖从仓库运到船上（都是一百多吨的船，在内河算大船了），准备出口到外地。有时候是把进口的古巴粗黄砂糖从船上运到粗黄砂糖仓库存放。此外，运输的线路还有粗黄砂糖从船上直接运到精炼车间或者精白砂糖从精炼车间直接运到船上，等等。运输的方式都是“一、二十米的人力肩扛（+）一、两百米的人力轨道平板铁车（+）一、二十米的人力肩扛”。糖包的重量多数是二百斤一包，但偶尔有从古巴进口的粗黄砂糖，是二百三十斤一包。如果涉及到船，从岸上到河面那一段，高度差约有十米（偶尔洪水涨起的时候）到二十米（秋、冬、春的大多数时候），那个平板铁车是通过卷扬机提升、放下。

我当时以为自己好歹也是个业余运动员，身体方面能吃得消。但后来发现，还是比不上那些从小就不间断地参加劳动的人。

那个年代，有些劳动妇女，能量惊人。我作为年轻力壮的“业余运动员”，短途运输，挑担的平均重量达到一般二十到一百四十斤。而她们身材瘦小，一天下来，挑担的平均重量也有一百一十到一百三十斤。而她们还要考虑养家糊口，收工回去还有家务，没有工作的日子还要上山打柴草，等等。但妇女的弱项是臂力，遇到拿铲子铲土铲煤的工作，我们觉得比较轻松，她们却从不争拿铲子而愿意挑土挑煤。

我引以自豪的一个“纪录”是，1967年冬的一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既然是冬天，就不热。阳光明媚，就不冷。那天扛县粮食局收购上来的稻谷，从船上扛到仓库。从河面到岸上约有二十米的高差（那是费力的部分），从岸边到仓库还要再走约二、三十米的距离（那是平路，是比较“轻松”的部分）。每一包稻谷净重一百三十斤（连同麻袋包装则是一百三十二斤）。那天，别人是两人抬一包，我是一人扛一包，总共扛了五十九包。算起来，那天等于扛一百三十二斤重的东西上了一座一千多米的高山。而且那天还很轻松，中午跑回约两

---

公里以外的家中吃午饭，还休息了一下，下午约四点左右就搬完稻谷收工了。想想现在，如果去旅游，即使几十米高的小山，也要风景很好才愿意爬上去。

后来我看到，我那个“纪录”比起那些从小就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其实还是差距甚大。1990年游览黄山。当时黄山的缆车只供客运，不供货运。我看到那些挑夫，挑二百多斤重的货物，从黄山后山的山脚到山顶，一千多米的高差。他们每上十多级台阶就歇一歇。黄山的台阶，每一级都比较高。我回想自己，即使是身体最好的时候也挑不了那么重，上那么高的台阶，而且挑一整天。

1965年年底，那个街道小农场年终结算，我扣除伙食费之后，还有十多元（或者二十多元？记不准确了）的结余。当记分员把结余款交给我时，我想到的不是购置一点生活用品，而是邮寄给光华出版社，订购了国内影印的1966年的《Bull. Amer. Math. Soc.》和1964—1966年的《Comm. Math. Helveticici》（瑞士数学通讯）等两种数学刊物，至今仍然珍藏。当时之所以选订《瑞士数学通讯》，是因为该刊1964—1966这三年里只有两卷，共8期，且每期都不到一百页，比较薄，订费较低。幸亏我当时没有放弃。当时订的这两份期刊，发表的文章多数不是所学专业，绝大多数看不了。但1964年的《瑞士数学通讯》上有一篇内射度量空间的文章，能看懂。后来，1983—1991年与唐云合作，在美国的《Proc. Amer. Math. Soc.》和国内的《数学学报》和《数学年刊》英文版发表了几篇关于内射度量空间的文章，也算是SCI了。

我1965年6月至1966年3、4月期间，从头到尾专心读了几本英文专业数学书，包括Hilton and Wylie的《Homology Theory》，Hu Sze-Tsen（胡世珍？）的《Homotopy Theory》，Richard and Ralph的《Introduction to Knot Theory》，Auslander and Mackenzie的《Introduction to Differentiable Manifolds》，Milnor的《Morse Theory》等。好像还看了一本中文的《李群论》，但后来一直没有研究李群，印象不深。当时觉得这些书都能读懂。其中《Homotopy Theory》一书不是自己的，是借SGH的。在读完该书寄还原主之前，我大体上抄下了全书的主要内容，并基本上能做出该书的各个练习题。此外，在1968年春，我阅读了邦德列雅金的《连续群》中译本的上下册，也是比较系统的阅读，但没有看完全部，只是看了部分。

当时还缺乏研究经验，没有积累下什么研究课题，后来又没有继续订购期刊，所以，那时多半只是读书，打基础。除了内射度量空间和一些图论问题，当时未能开展什么研究工作，更未能投稿多少文章（记得那时唯一投稿了一篇文章，给《数学学报》，是把一个定理从微分流形推广到组合流形。但编辑部回函要求补寄去单位介绍信，便放弃了。后来觉得那篇文章似乎不怎样，便也没有注意保存手稿）。当时所读的书，多半与后来的研究工作没有很直

---

接的关系。如果不经过复习，也不能立即回想起所读的书的具体内容。但当时的打基础的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例如，1984年写，1986年发表在《中国科学》上的那篇文章“ $C^1$  封闭引理的较简单的证明”，就是因为有了六十年代阅读《Introduction to Differentiable Manifolds》一书的基础，不然的话，即使  $C^1$  封闭引理这个问题本身也理解不了。

当时，在县城，以及后来在农村，在那里的环境下，你想读书，想钻研数学，只要你有条件，有毅力，根本就没有人管，不会与周围的人有冲突，别人也不理会你在做什么。在那里，如果说要抓阶级斗争的话，那多半是在抓偷盗、抓投机倒把、抓破坏生产等方面。在县城，在另一个方面，又不像在农村。在农村是战天斗地，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且不讨论当时是否有些工作是人为折腾，是否不讲求效益，是否有影响生态环境之处）。当时，在县城的问题是就业机会太少，闲着的时间太多，经济收入太少。

但是，从1964年12月到1969年1月，除了上面提到的时间段看了好几本书之外，其余时候我就没有再阅读更多的数学书籍。一个次要一点的原因是文化革命的风云变幻吸引了注意力，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我感到自己从事了重体力劳动之后，两天之内思考数学的血液好像没有充分地流回大脑，须休息两三天之后才能较清醒地思考数学问题。所以，虽然那时候几天才有一天干活，其余时候十分空闲，但那些空闲时光还是浪费掉了。

本来，1966年秋街道的四清运动结束之后，成立一个松散的搬运专业队，安排我做一个脱产的记分员，我也做了几个月。这个记分员的工作是跟随几十劳工到工地现场，给他们称量计件，计算各人的报酬，然后每十天一次到劳动服务社（一个官方色彩——集体性质，不是国营的、承接雇主任务转发给街道劳工的中介机构）开票，到银行取钱，分发给各劳工，带有一点“干部”性质。但这记分员与劳工一样，也是几天才有一天工作，收入也一样低。后来我想去糖厂，与那些强劳动力一起扛糖包，便辞去了记分员的工作。如果我当时注意到了“从事重体力劳动之后，须休息两三天之后才能较清醒地思考数学问题”这点，我想，还是安心做一个记分员较好一些。

1966年9月，文化革命的风暴刮到了县城，但很快就被压了下去。同年12月，风暴再次刮到县城，这次没有被压下去。我当时也投身进去，参加了一个组织，名称是“城镇青年战斗队”之类。县城文革的核心组织是县城高中的红卫兵以及由产业工人和正式国家职工组成的“工总司”。那个“城镇青年战斗队”只是一些无固定工作的街道青年组成的松散的凑热闹的外围组织，没有自己的目标、纲领，只是跟着外面传来的口号喊。我觉得自己有些时候也算积极参加了集会、游行、写大字报、贴标语之类活动，不过都是抛头露面的公开的活动，没有接触过核心组织的成员，没有参加过秘密决策的会议，所以运动后期也没有被清算，没有因为高学历而被认为是幕后黑手。

---

在那几年里，我没有感到什么太大的政治压力。一个原因是家庭成分好，另一个原因是家门口挂有“光荣军属”的牌子（我大哥是三线企业的工程师，算是参军了）。当然，当时也没有看到什么希望。当时的理想就只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并且能够有多一些业余时间从事数学研究。

## 二、1969年2月至1978年9月

以往，上山下乡只是应届初中毕业生的事。1968年发布了最高指示，波及的面就广了许多。县城的无业青年，不管是高中毕业的，初中毕业的，或者是小学没有毕业的，统统都要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然，操作起来仍然有些人情味，许多家庭都可以留一个青年不用去农村。也有一些成分不好的，全家下放，与知青上山下乡性质不同。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上山下乡是到几千公里以外的云南、黑龙江。县城的上山下乡是在本县内解决，到离县城几公里至几十公里的公社。我也在1969年2月作为知识青年，到了本县的一个公社，离开县城约四十公里。

那些上山下乡的，都被作为革命的知识青年看待。即使家庭出身成分是地主、资本家，公社、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也不歧视他们，政治待遇比本乡土的地富子弟好一些。但是，下乡一两年、两三年之后，遇到外面有工厂来招收工人，那些家庭成分较好而本人又表现较好的下乡青年便比较有可能被招去。而那些家庭成分不好的，以及那些家庭成分虽好但本人表现过于糟糕的，便比较难离开农村。于是，这些人便退而求其次，即使有国营农场或者国营橡胶场来招收农业工人，他们也愿意去了。一些青年吊儿郎当，长期不在所下放的生产队劳动，回到城里，或者到处流浪，本地干部也不管或者管不了他们。

这是我见到的一些背景情况。城市的青年不太适应农村的劳动，他们觉得，即使从事重一些的城市的体力劳动也比轻一些的农村劳动好。此外，就我的体会而言，即使重一些的旱地的劳动也比轻一些的水田的劳动好（不过，水田的产量比旱地的高）。

我去的那个公社开办有一个铅锌矿场，在离开我落户的那个生产队约四五公里的地方。公社规定各个大队为这个矿场提供劳动力，大体上是每个生产队派出一名成员。1969年12月，我觉得矿场有公共食堂，不用自己做饭，比在生产队好，便提出要求，去了矿场劳动。

矿场的原址是一片庄稼地，大概是产量不高的较贫瘠的旱地。地表大体上平坦，略有点起伏。挖去地表上的浮土，下面是连绵不断的石灰石。我来到矿场的时候，看到那里已经从平地开始，挖了两个平行并列的大坑，每个长约六、七十米，宽约二、三十米，深约十米。坑中不断地有地下水冒出来，需要不断地用抽水机把水抽去才能开展工作。两个大坑之中，

---

有一个废弃不用，积满了湛蓝湛蓝的地下水，幽深幽深的。另一个正在开采的大坑，如果遇到假期停工，很快也会积满一池湛蓝幽深的清水，重新开工时需要提前排水。对着那个积满了干净的地下水的大坑，我当时想，如果到了夏天，那倒是极好的游泳的去处。不过，太深了，有点恐怖，不会游泳的千万别靠近。

采矿的方式是露天作业，像林县修红旗渠一样。不过那里是在山上，这里是在平地以下。分许多小组，每组两人，一人手扶钢钎，一人拿几公斤重的软柄大铁锤（硬柄铁锤比较震手，他们都爱用软柄的），在石头上打出炮眼，打到足够深度，填上炸药，已经是下班的时候，人员撤出，便点燃炸药把石头炸碎。

再上班的时候，再把那些较大的碎石敲得更碎一点。那带一些颜色（印象中好像是淡紫带蓝的颜色）的石头便是铅锌矿，纯白的便是普通的石灰石，是废料。把铅锌矿与石灰石用人工分拣开，用簸箕（南方用竹子编的簸箕，不像北方用柳条编的筐）分别挑到矿坑旁平地上堆放矿石和废料的地方。县的民矿站（好像是个国营的企业）在矿坑旁一百多米外开设有一个收购点，随时收购集体性质的矿场开采出来的矿石。那些没有人收购的石灰石废料，堆放在矿坑的四周（主要是东面），形成了一列高约三到四米、坡度平缓、由矿坑口逐渐往外延伸的小山。

矿场好像有二、三百个劳工。我初到矿场，对那带点技术的打炮眼、放炸药和分拣矿石的工作还不能胜任，便只做肩挑运输的工作，把矿石和废石从矿坑里挑到坑口外。因为那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不是短期的劳动竞赛，所以大家迈的都是慢悠悠的步伐。分拣矿石的人，每次都只往两个簸箕中装进几十斤的重量，不会装满，所以工作起来倒也不太辛苦。

矿场劳动没有工资。矿场只是把劳动的天数告诉派出劳力的生产队，由生产队记工分。我不清楚矿场的收益是否返还和如何返还给生产队。矿场的矿长虽然脱产，但好像也是生产大队抽调过来，也需要回生产队去记工分。矿长喜欢下棋，晚上，在电灯下，他常找我到他的简陋的办公室对弈，大家水平差不多，没有其他活动，倒也可以打发时光。矿场看到我来了，好像有过办夜校的打算，让我给那些民工们上点文化课。不过不久之后我便调回生产大队的学校任教，矿场办夜校的计划便没有实施。我回生产大队的学校任教之后，想起矿场要办夜校的热心，还曾在某一个晚上回去过一次，义务地给民工们上了一次几何课。不过矿场并没有空余的教室，民工们挤在一个大宿舍中，水平又参差不齐，多半没有听懂。后来工作忙了，便没有再去那个矿场。

本来做好了在矿场里较长期劳动的思想准备。但 1970 年 2 月春节过后，我落户的生产大队通知我回去做民办教师。我本来对在农村中做教师不是很感兴趣，但有了前面所说的“重体力劳动之后，须休息两三天才能较清醒地思考数学问题”这个体会，便觉得还是从事脑力

---

劳动比较合适。于是就接受了大队的任命。

当时，教育已经比较普及，每个大队都有学校，而且是小学与初中合在一起的公办学校。只是学校里公办教师不够，需要加聘几个民办教师。学校的学生人数不多，每个年级都只有一个班，每班只有三十人左右。我的课程主要是初中两个班的数学，兼初中的地理、音乐等课，每周总共约十六至十八课时。有的年份开设初中班的英语课，只有我能上。这些年份，我便只教一个年级的数学。后来有一个河南（或者什么其他省？）的中学生寻死觅活，说“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此后全国的初中（至少是农村初中）便都不开设英语课了。有一两个学期，我还曾兼任小学四年级的图画课，那倒是比较轻松的课程。图画作业可凭印象立即打分，不像批改数学作业那么费神。

当时的农村学校的教师要兼一些社会工作。每当有什么政策文件下来，便要学校老师分别到各个生产队去宣传，组织社员学习、讨论。每年春、秋的农忙假，也要下到生产队去支援春耕秋收兼做一些政策宣传。

当时的中学数学课，很少讲理论推导，只是讲一些定理公式，不加证明，然后偏重于运用公式进行计算，同时也比较注重测量。我当时倒是喜欢带学生到外面，用简陋的工具测量山的高度和水平的距离。我当时思考，如何用同等精度的测量工具取得更精确一些的测量结果。这个思考，涉及到极值问题，涉及到微分学。后来，在 80 年代，我把思考的结果写成一篇文章，题为“几何测量的误差分析”，发表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上。该文的理论含量不高，但涉及一些应用，所以还是觉得比较有意义。

1975 年秋和 1976 年春的农忙假，本大队学校的教师安排到同公社的其他大队去工作。我对所到的生产队的社员们说：“让我帮助你们把生产队的田亩图画出来吧！”那里的地势并非十分平坦，那些水田建立在不太平坦的土地上，顺着地势，水田的边界（称之为田塍）便弯弯曲曲，水田的形状多半不太规则，大小也各不相同。我当时凭着一块木板，一张白纸，一支笔，走遍每一条田塍，全凭目测，把田亩图画出来。画好之后，社员们都能辨认出图上的每一块“田”是真正田野中的那一块田，大小比例和形状等应该也误差不太大。1976 年春那一次，我用了三天的时间，把所去的生产队的所有的水田，共几百块，画成十多幅田亩图，加上一些彩色，装订成一册，留给他们供讨论生产计划或者讨论农田改造什么时使用。自己也留了一份副本，珍藏起来，现在更用扫描仪扫描，存放到计算机中。80 年代时，我把当时目测绘制田亩图的理论依据、具体的测绘方法和测绘时的注意事项等写成一篇文章，题为“农田平面图的测绘”，发表在《广西科学院学报》上。该文的理论含量也不高，但由于涉及到应用，所以也觉得是比较有意义或比较有趣的事。

当时的初中民办教师，月工资是三十元，个人生活是足够宽裕的了，要成家立业则有点

---

紧巴巴的。民办教师的工资，由所在大队统筹解决。我当时落户的生产大队，远在县城西面约四十公里，经济状况、群众的生活水平要比县城近郊的农村差一些。当时（包括现在）时常听说拖欠民办教师的工资。但我所在的那个大队却从来没有拖欠，每到年底，放寒假之前，都能把全年的工资如数结算清楚。或者，我不能完全肯定本地的民办教师的工资是否从来没有拖欠过，但起码没有拖欠过我这个外来插队青年的工资。

在农村学校当教师的六年半时间里，印象中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生活上则比较平淡，比较单调。记忆中的一些片段，如果要作为流水帐记录下来也可以，有空时再写吧。

1976年8月，县城的中学招收我回去，教高中数学，仍是民办教师，但户口转回去，不是农村户口了。当时，户口是十分重要的，拿回城镇户口，吃国家粮，好些事情都主动许多。该县城中学规模比较大，高初中共有约三千学生。当时高中仍然是二年制，高中两个年级共十八个班，每班都满员，五十多人。在那里我又工作了两年，第一年教高二两个班的数学课。这个年级毕业之后，第二年转回高一，仍然是教两个班的数学课。第一年的月工资仍然是三十元，但能够按月发放，不用等到年底才结清。第二年遇到工资调整，好像月工资升到了三十六元。

合起来，我总共在中学教了八年半。当时，无论在农村学校还是在城镇中学，除了上课之外，还都要兼一个班的班主任的工作。不过，我都是做副班主任，由语文老师做正班主任。当时，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下午的生产劳动，都要带学生去劳动。

在那八年半时间里，只要是业余时间，我都仍然在研究数学。但教学活动用去了大部分时间，只有周末晚上、星期天和寒暑假可以利用。在那里，只要你是用业余时间，那就没有问题。你爱研究数学，不会有人管。但那时我没有多少资料，所以那几年主要是思考四色猜想和一些图论问题，也写了几篇论文的初稿。

### 三、1978年10月至现在

1977年恢复高考。那时，我作为县城中学的老师，还参加了高考的监考工作。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我便报考了。我的报考得到所在中学的一个副校长的支持，他还同意，让我少上一个班的数学课，以便多一些时间复习。该副校长曾经是我高中时的数学老师（虽然不是上我的高中数学课最多的老师），他希望我能够有更好的归宿。我报考中科院的研究生，没有录取。材料直接转到第三志愿，广西大学数学系便通知我5月时去参加复试。9月初得到录取通知，10月初到广西大学报到，从此返回大学。

那时广西大学数学系还没有硕士点，所以招收的是研究生班。导师龙季和教授也是广西

---

人，也是北京大学毕业，原来在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教学。1958年广西大学复办，他便调回来做系主任。他称我为校友，对我非常好。1958年广西大学复办时，有不少中山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分配来工作。这些老师觉得我有北京大学的背景，理应功底扎实。加上当时报纸上登出来的第二十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六道试题之中，他们还差第三题没有解决。我在县城高中时已经解答了这一届的奥林匹克试题。我把第三题的解答包括思考过程交给他们。因此他们对我十分友好、器重。

现在常常说，那个时候是科学的春天。从1979年春开始，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抓紧研究，尽量多出一些成果，多写出一些论文。当时所写的论文稿，有后来在1985年发表于《中国科学》上的“Hill方程的一个绝对稳定区域”，和1987年发表于《数学学报，英文版》上的“An answer to the Markov's conjecture”，等等。

1980年1月，快放寒假了。本来，为了错开交通高峰的时间，研究生们通常都可以比本科生提早几天离校回家。南宁离我家所在的那个县城只有两百多公里，很近。但我当时正要赶完一篇论文，便一直坚持到本科生放假的时候。当我赶完这篇文稿时，我已经腰痛得厉害，走路都只能慢慢走了。

其实，从1974年开始，我便有时觉得腰部有点酸痛，可能是60年代在街道参加重体力劳动时积累下来的吧。特别是有一次扛二百斤重的糖包下船。这本来不算什么，路程很短。但汗水沾湿了眼镜，视力受到影响。从船头到船舱，有一块斜的跳板。可能是跳板上沾有水珠，或者是粘有一点湿的泥巴，反正我踩到跳板时，滑了一下，扛着二百斤重的糖包坐了下来。结果当天我就不能再工作了，而且此后也就永久地退出了扛糖包的工种，转回街道的搬运队。但当时并没有觉得有多么严重的后果，只不过是当天不再工作而已。实际上，我后来转回街道的搬运队，也仍然有挑一百五六十斤重的时候。后来带学生劳动，挑土上山种甘蔗，也仍然有以身作则挑一百几十斤的时候。我有时腰部有点酸痛，可能是长期的多方面的因素的积累，包括上山下乡的第一年，所去的那个地方比较穷，生活条件较差，等等。那次扛糖包滑倒，仅仅是坐了下来而已。当时并不需要那些靠扛糖包挣钱养家糊口的穷阶级兄弟们停止工作，给予帮助，我当时仍然可以自己一人从糖厂走回五公里以外的县城家中。

1980年1月赶完那篇文章之后，找了一个同乡的本科生作伴，一起回家。回到家里，我便病倒了，而且是一病多年。1980年时最为严重，有一次在一个医院的挂号窗口掉了五分钱（相当于现在掉了十块钱）到脚下，竟弯不下腰去捡，只好装做没有看见。遇到一米宽的水沟，那肯定跳不过去。那几年，体验验血，“血沉”和“抗O”的指标都高出正常值许多。我原来的身高是1.69米到1.70米，病了之后，各节腰椎之间距离缩短，身高变为1.64米甚至1.63米。1980年2月到8月，我休学在家，以为是风湿或者类风湿，但治疗效果不

---

明显。1980年9月到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检查，结论是骨结核，治疗则以服用雷米封和维生素B6等为主。原因明确之后，1980年10月便转回广西大学校医院住院治疗。1981年1月，又要放寒假了，在广西大学校医院住院，生活终究不太方便，反正服用药物不变，便返回家乡休养治疗。这一休养，又休养了一年多。到1982年5月才返回广西大学，到1983年9月才开始安排我上课，上一个预科班（好像是少数民族的），帮助他们补习中学的数学。

当时病得那么重，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60年代在街道参加重体力劳动的积累；生活条件较差，特别是上山下乡的第一年；以及思想的压抑）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服用了不当的药物“强的松”。当时，一般人不知道有“骨结核”这个病（起码当时我没有听说过），凡是腰酸骨痛，便都以为是风湿。所以，1974年至1980年5月期间，我每当觉得有点腰骨酸痛时，开头便擦一点风湿跌打酒之类，后来便到医务所开一些“强的松”等药物服用。当时还觉得有点效果，只是不能持久。但“强的松”会引起骨质疏松，特别是对于骨结核来说，“强的松”是非常禁忌的药物，服用之后会引起病情的加重。

当时确诊为骨结核的时间，好像是1980年5月前后。当时在家乡的县人民医院拍了X光片，由亲戚拿到南宁给广西最权威的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鉴定，结论就是骨结核。当时把这个结论带回来告诉县人民医院的医生（那算是县里最权威的医生了），他还不服气，还坚持说是类风湿，只是因为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更权威，他在保留自己的意见的同时，同意按照广西医学院的结论进行治疗。因此，我服用雷米封的时间，应该是从1980年5月前后开始，而不是1980年9月住进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之后。

由于我从一开始就病得严重，所以广西大学一直没有要求我上本科生的课，只要我作科研和招收研究生、上研究生的课即可。我后来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5年）和全国模范教师（2004年），主要是因为科研有成绩和申报博士点成功。如果按照现在的新的标准，大学教授必须至少上一点本科生的课，那就为难一些了。

《广西日报》1980年9月4日在第一版左上角的位置发表了广西科协一位同志的一篇关于我研究生期间里写了多篇论文受到专家赞扬的报道，该报更在1981年1月1日新年第四版以整版的篇幅，以“在希望的地平线上”为题，分三段分别报道了一位县委书记、一位工程师和我。广西科协又为我出了一本油印的论文集。其实，当时我的论文基本上都还没有投稿发表。当时我既感领了广西有关部门对我的重视，又觉得这也是一种鼓励，一种期望，略微带有一些压力。不过我想，无论有没有压力，我都会努力的，只希望自己的能力能够不辜负广西有关部门的期望吧。

1981年在家养病期间，研究图论带宽等问题，写了几篇论文初稿，其中有两篇发表在1984年的《应用数学学报》上，有一篇发表在1984年的《科学通报》上，还作了一些内射

---

度量空间的研究。其实，我觉得我只是有腰痛的毛病。其他方面，如肠胃、心脏、思维等等，感觉还是很好的。比起身体方面的表面上的健康，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有研究数学问题的愿望（甚至渴望），在研究问题有了思路取得进展时要能够产生激情，在解决了一个问题之后要能够感到喜悦。我现在的一些条件、状况比起70—80年代时是改善许多了，但却好像变得有点麻木了，不容易产生激情和感到喜悦了。

1982年8月收到北大数学系总支的一封信，告知“你的结论材料，已重印两份寄给你校人事处。请你及时去催问”，“其中有一份是应给你本人存留的”。后来从学校人事处拿到了这份材料，那是一个盖有红章的1981年12月21日的中共北大委员会的关于撤销开除、恢复学籍、发毕业证书的决定。1982年时，北大还寄来了一张“学历证明”给我（好像是寄给广西大学人事处再转交给我），证明我“一九五九年九月入本校数学系数学专业学习。于一九六四年七月毕业”。

1983年9月到北京参加了廖山涛先生为主席的双微国际会议。1984年5—11月，北大数学系邀请我去访问了半年。张芷芬先生告诉我，那是廖先生的意思。在访问期间，在1984年10月26日到学校办公室拿到了补发的北大毕业证书（用1982年时给我的“学历证明”交换），其中写有“学制五年半，一九六五年一月毕业”等内容（这与“学历证明”中所写的时间“于一九六四年七月毕业”略有不同）。

1981年之后，腰痛病逐渐、缓慢好转，但没有彻底根治。1986年夏，腰痛病忽然复发，并且颇重，有一个月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中间只起来过一次）。后来看到报纸上的一篇短文（不是广告），寄钱到山西吕梁地区的医院邮购一种“骨结核丸”。服后感觉效果很可以。1990年到合肥开会，会后去黄山，不敢（也不能）爬上去，只能坐缆车上去，但可以从山上走下来了。

时间不够，暂不回忆更多了。以后有时间再补写吧。

以上所写，主要限于一些大的、阶段性的经历，或者一些与数学有关的，或者一些虽然小、但感觉良好的事情。其实，过去常有许多困苦、愁闷、不愉快，但如果不是大的事情，就不伤脑筋追忆写出了。

作为回忆录的补充，再把我上传到汕头大学数学系网站的一些材料复制（copy）如下：

---

## 麦结华

### [个人简历 - 科学研究](#)

---

麦结华，男，汉族，籍贯广西桂平县。

#### (一) 简历

1965 年 2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学制 5 年半）

1980 年 10 月毕业于广西大学数学系研究生班

1980 年 10 月至 1996 年 1 月在广西大学数学系任教

1996 年 1 月至今在汕头大学任教

1985 年 7 月晋升为教授

1990 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

#### (二) 主要获奖项目

1986 年以“微分动力系统的若干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9 年以“推广的 C 封闭引理等动力系统课题的研究”获广西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3 年以“二维流形上的周期运动”的研究获广西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0 年以“拓扑动力系统的混沌性质的研究”获广东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类)二等奖

#### (三) 主要荣誉称号、证书

1988 年获广西人民政府科技工作突出贡献荣誉证书

1988 年获人事部颁发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和证书

1990 年获国家教委和国家科委联合颁发的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及证书

1991 年起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4 年获中共广西党委和人民政府颁发的优秀专家称号和证书

1995 年被国家教委和人事部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并获颁全国优秀教师证书及奖章

2004 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人事部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并获颁全国模范教师证书及奖章

#### (四) 论文发表情况

多年来共发表了 100 多篇中、英文论文，其中超过半数发表在国际及全国性的著名刊物上，包括《Trans. Amer. Math. Soc.》，《Proc. Amer. Math. Soc.》，《Nonlinear Analysis》，《Nagoya Math. J.》，《J. Math. Anal. Appl.》，《Ergod. Th. & Dynam. Sys.》，《Int. J. Bifurcation and Chaos》，《Top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Fund. Math.》等国际刊物。

在权威刊物《中国科学》A 辑英文版上迄今为止共发表了英文论文 12 篇，其中有 11 篇英文论文的中文原文在《中国科学》A 辑中文版上发表。另有二十多篇论文在《科学通报》、《数学学报》、《数学年刊》、《数学进展》的中、英文版及《应用数学学报》、《系统科学与数学》的中文版上发表。

---

### (五) 招收研究生情况

1987 年起先后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十多名

1990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查批准，成为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

1991 年至 2001 年先后得到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聘任为兼职教授，并挂靠这些大学招收培养了 5 名博士学位研究生

2003 年作为汕头大学数学学科负责人和学术核心骨干，主持申请博士学位授予权，得到批准。目前招收指导一名博士学位研究生。

### (六) 主要科研基金情况

1989 年 1 月至 1992 年 12 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993 年 1 月至 1997 年 12 月应邀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八五》重点项目 “动力系统与 hamilton 系统”

1998 年 1 月至 2002 年 12 月应邀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八五》重点项目，项目名称仍为“动力系统与哈密顿系统”

1999 年 12 月至 2005 年 12 月应邀参加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即 973 项目)，负责其中的子课题“拓扑动力系统”

### (七) 代表性研究成果

1、1985—1986 年分别在《中国科学》中、英文版上发表论文，给出  $C^1$  封闭引理的较简单的证明，将原来已有的长达四、五十页的非常艰难的  $C^1$  封闭引理的证明简化为长度只有几页的巧妙的证明，其结果被国内和国际上一些知名数学家引用，其思想方法被这些数学家所借鉴 ( $C^1$  封闭引理乃微分动力系统结构稳定性理论的基石之一)。

2、2003 年 10 月在《Trans. Amer. Math. Soc.》上发表了题为 “The structure of equicontinuous maps” 的论文，该文研究了从度量空间  $X$  到  $X$  自身映射  $f$ ，在一个相当弱的附加条件下(例如，只要求  $X$  紧致，或其他更弱的条件)，证明了  $f$  是等度连续的当且仅当存在一个逐点回归的保距自同胚  $h$  及一个逐点收敛于一个不动点的非扩张的自映射  $g$  使得  $f$  与乘积映射  $h \times g$  的一个子系统  $h \times g|S$  拓扑等价，这个结果具有广泛、深入彻底、清晰等特点：给出了很广泛的一类等度连续映射的结构的深入彻底而清晰的描述。

### 附录一、离校之后与北大的同学的联系

1964 年 11 月上旬离开北大之后，有一些北大同学继续与我保持联系，使我得到极大的安慰与鼓励，不至于那么消沉。

首先，离校之前，王树禾、刘永才、苗振国等同学分别在几个晚上与我作了告别谈话，在五四运动场及未名湖畔等处。记不清谈话的内容了，大概也没有很需要记住的具体内容。总的感觉就是他们给了我安慰与鼓励。

---

王理是与我联系最密切，持续时间最长的，无论是离校前还是离校后，是给了我最大的同情、安慰与鼓励的同学。离校之后，我与王理就开始了通信来往，说说各自近来的情况和见闻等等。记得离校之后不久，我曾写信告诉王理，说是到了一个街道办的农场，在那里基本上就是做农活，没有什么运动，几乎没有政治学习。还说过，有几天的工作是把一条小溪的水排干，挖取小溪里的沙，用于建造一个三合土（石灰、沙和黏土加水混合）的晒谷场。在排干小溪的水的过程中，与那些高、初中毕业之后到农场的年轻的男女学生一起，抓了不少小鱼小虾，改善生活。好像王理曾回函大加赞赏，说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胜似他们那里白天劳动，晚上还要学习，检查交代思想。可能王理只是在说些安慰我的话，但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使我宽心了许多。与王理的联系使我觉得北京仍然不是很遥远。由于我与王理来往的信件多，持续的时间长，我的母亲都记住了王理的名字。有时，邮递员送信来的时候，她会问是不是王理的信。

杨燕昌同学也与我有过长时间的联系，从1965年到80年代末，但不频繁，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还中断了一段时期。杨燕昌的来信没有专门说一些安慰我的话。但他与我保持联系，这本身就是对我的一个安慰，表明他还是相信我，不担心我有太大的问题。杨燕昌曾告诉我一件事：他在毕业之后不久，在去劳动锻炼期间，在一个周末的休息日，他拿起一本代数书，想复习一下，以免日久生疏。但不幸被人发现，结果受到训斥、批判，说是不专心改造，劳动锻炼期间还看专业书，没有放弃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他说的这件事，也使我宽心了一些，我觉得自己虽然处境不佳，但在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数学这方面还是用不着担心受到批判的。

此外，1965年时，王树禾分配到了秦皇岛的中学之后，李福星分配到了上海市市东中学之后，都与我有过信件来往。他们来函告知分配后的工作情况，以及其他同学的分配去向，使我感到十分的温暖，觉得没有离开同学们太远。我至今仍然保存有这些信件。

1967年5—6月间，先后收到了李福星（上海市市东中学）、秦嘉宏（上海市奉贤县上海市半农半读师范学院）和王树禾（秦皇岛五中）的来信，他们说，现在还是乱糟糟的，未到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还没有建立起权威的领导班子，建议我先不要到北京上访，以免耗费路费，徒劳无功。他们表示会主动联系数59一班的同学，向北京大学有关部门反映，支持给我平反。其中，秦嘉宏那封信还署了秦嘉宏、张本宗、金嘉华、祝长忠、赵仲玉等五个同学的名字。王树禾的信则说要联合苗振国、马汉卿等同学一起反映情况。

我离校之后，与之保持联系的同学，基本上都是数59一班的，原因是在数59一班的时间较长，他们对我了解多一些，放心一些。但唐云是个例外。与王理一样，唐云也是与我联系最密切，持续时间最长的同学。不同的是，由于我与唐云都是拓扑专业的，所以来往的信件之中有较多的内容是讨论数学问题的。后来，通过唐云，还认识了中科院计算所的屠规彰，也一起讨论图论的问题，交流研究的笔记。

在我那几个同学之中，当时分配得最好的就是唐云了。他分配到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中学。虽然朝阳区名义上也是郊区，但雅宝路中学就在城墙边，可以算是市区了。相比之下，王理分到顺义中学，就远一点，但进城还是很方便。而杨燕昌就分得远了，在密云，还不是县城里，是在一个山区。由于唐云在市区里，而且他乐于助人，办事热心，不怕麻烦，所以那时我想买的英文数学影印书，都是托他从北京买了寄

---

来。在唐云帮我买了寄来的书之中，最有用、现在还经常查阅的是一本日本数学会编、中科院数学所及北京大学等二十几个高校合作翻译、科学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的《数学百科辞典》。该书起到一本工具书的作用，遇到什么不太熟悉的数学名词，可以在该书中查到定义。相比之下，国内编的《数学百科全书》和《数学辞海》，就只是规模极其宏大却几乎没有什么用处。

除了书籍，我甚至还托唐云从北京买过生活用品寄来。当时在广西很难买到自行车的传动链条，黑市价比门市部的价格高一倍，我就曾托唐云从北京买了寄来。1974 年前后，我曾托唐云从北京帮我买了一副指定度数的眼镜。那副眼镜是我觉得最好看的，其镜框是透明塑胶材料做的。戴起来是最舒服的，无论看远看近都看得清楚。直到 1988 年，广西大学数学系联合广西师范大学数学系到广西北海市开一个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我戴着这副眼镜与其他老师一起到海边的沙滩泡海水。虽然我们离岸边不远，海水深不到腰部，但一个海浪打来，把眼镜打到水里，立即冲走，各老师一起帮助也摸不着。从此我就不再喜欢去泡海水了。虽然说我也可以算是游泳池里和流动的河水里游泳的好手了，但到了海上，在无规则的海浪里游泳却是不太适应，游不出速度。1988 年之后换了其他眼镜，便无论如何都没有那么舒服了。渐渐地，看远处要用一副度数深一些的眼镜，看近处要改用一副度数浅的眼镜。也许是随着年纪的增加，眼睛里的晶状体的调节能力减弱了吧。

1968 年 3 月，我曾返回北大，得到曾到数 59 一班学习的生物系的李立钊同学的接待，在 34 斋他的宿舍里住了十多天。当时是试图上访，看看是否可以给予平反，但由于未到运动后期，没有找到能够负责的部门，便不想停留更多时间，继续纠缠下去。离开北京之前，到顺义县城关中学王理那里，住了几天。记得曾与王理在顺义县城附近的铁路边上散步，火车开来，路基上下振动，初春的凉风吹来，产生许多感触。最后一天，与王理一起从顺义返回北京，到了雅宝路中学唐云那里。他们二人凑了三十元送我，远远超过我返回广西所需路费了。

1980 年前后，唐云、王理二同学多次返回北大，积极反映我的问题，要求改变处理的决定，给予平反。好像赵宝玲同学也返回北大反映情况了。我 1981 年 12 月得到平反，这中间包含有许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广西方面给我的大力宣传，广西大学人事部门的积极联系，甚至还需要到我担任民办教师时的乡村学校去调查一下，但北大同班、同年级同学积极主动反映的材料，无疑是最直接的第一手的材料。

1987 年前后，我曾写信给上海的祝长忠同学，对他过去的关心表示感谢，同时告知已得到平反，并且已于 1985 年 7 月越级兼破格晋升为正教授。我觉得祝长忠才是真正又红又专的同学。他学习成绩好，入学时又是数 59 一班的团支部书记，当然可以说是红了。但他却因积极响应号召，主动向组织检查思想、接受帮助而于第二个学期被免去团支部书记的职务，令人感叹。祝长忠同学收到我的信之后回了一封不短的信，表示祝贺等等。后来听说他去了加拿大，就未能继续联系了。

## 附录二、20111114 美国 MathReviews 上麦的 91 篇文章标题

Shantou University

Matches: 91

---

Publications results for "Items authored by or related to Mai, Jie Hua "

MR2812404 Mai, Jiehua; Zhang, Gengrong; Sun, Taixiang Recurrent points and non-wandering points of graph maps. *J. Math. Anal. Appl.* 383 (2011), no. 2, 553 – 559, 37E25 (37B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805511 Mai, Jie-Hua; Liu, Cui-Jun; Liu, Xin-He Products and decompositions of adding machines. *J. Math. Anal. Appl.* 382 (2011), no. 1, 261 – 274, 37Bxx (54Hxx)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763725 Mai, Jie-Hua; Shao, Song Forcing relation on patterns of invariant sets and reductions of interval maps. *Trans. Amer. Math. Soc.* 363 (2011), no. 5, 2517 – 2549, 37E15 (37Bxx 37E05)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629662 (2011k:37016) Mai, J.-H.; Sun, W.-H. Positively expansive homeomorphisms on compact metric spaces. *Acta Math. Hungar.* 126 (2010), no. 4, 366 – 368, 37B05 (54H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719401 Mai, Jie-Hua; Zhang, Geng-Rong; Liu, Xin-He Tree maps having chain movable fixed points. *Topology Appl.* 157 (2010), no. 16, 2572 – 2579. (Reviewer: Manuel Sanchis), 37E25 (37B20 37B40 54H25)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719389 (2011g:37118) Mai, Jiehua; Shi, Enhui Graphs admitting transitive commutative group actions. *Topology Appl.* 157 (2010), no. 16, 2462 – 2466, 37E25 (37B05 54H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670141 (2011g:37117) Mai, Jie-Hua; Shao, Song Graph maps whose periodic points form a closed set. *J. Math. Anal. Appl.* 371 (2010), no. 2, 649 – 654, 37E25 (37B25)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593708 (2011i:37009) Mai, Jie-Hua; Sun, Wei-Hua Transitivities of maps of general topological spaces. *Topology Appl.* 157 (2010), no. 5, 946 – 953. (Reviewer: Jerzy Szymański), 37B05 (37B20 37D45 54H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537728 (2010g:37028) Mai, Jiehua; Shi, Enhui  $\overline{R} = \overline{P}$  for maps of dendrites  $X$  with  $\text{Card}(\{\text{End}(X)\}) < c$ . *Internat. J. Bifur. Chaos Appl. Sci. Engrg.* 19 (2009), no. 4, 1391 – 1396. (Reviewer: Lyudmila S. Efremova), 37B45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476886 (2010a:37082) Mai, Jie-Hua; Shao, Song  $\overline{R} = \overline{R} \cup \overline{P}$  for graph maps. *J. Math. Anal. Appl.* 350 (2009), no. 1, 9 – 11, 37E25 (37B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448216 (2009m:37025) Mai, Jie-Hua; Liu, Cui-Jun; Liu, Xin-He Topological semi-conjugacies between adding machines. *J. Dynam. Differential Equations* 20 (2008), no. 4, 883 – 892. (Reviewer: Peter Raith), 37B10 (37B05 37C15 54E4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

MR2403202 (2009f:37011) Mai, Jie-Hua; Liu, Xin-He A note on almost periodic points and minimal sets in  $T_1$ - and  $T_2$ -spaces. *Discrete Dyn. Nat. Soc.* 2008, Art. ID 262475, 5 pp. (Reviewer: Jerzy Ombach), 37B05 (54H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390491 (2009b:37075) Mai, Jie-hua; Sun, Tai-xiang Non-wandering points and the depth for graph maps. *Sci. China Ser. A* 50 (2007), no. 12, 1818–1824. (Reviewer: Sylvie Ruette), 37E25 (37B20 54H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370026 (2008k:54060) Mai, Jie-hua; Shi, En-hui The nonexistence of sensitive commutative group actions on graphs. *Sci. China Ser. A* 50 (2007), no. 8, 1197–1204, 54H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363562 (2008j:37034) Mai, Jiehua; Shi, Enhui The nonexistence of expansive commutative group actions on Peano continua having free dendrites. *Topology Appl.* 155 (2007), no. 1, 33–38. (Reviewer: Changming Ding), 37B45 (54H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338540 (2008h:37043) Mai, Jie-Hua; Shao, Song Spaces of  $\omega$ -limit sets of graph maps. *Fund. Math.* 196 (2007), no. 1, 91–100. (Reviewer: Sylvie Ruette), 37E25 (37B99 54B20 54H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344749 (2008g:54053) Mai, Jie-Hua; Sun, Wei-Hua Almost periodic points and minimal sets in  $\omega$ -regular spaces. *Topology Appl.* 154 (2007), no. 15, 2873–2879. (Reviewer: Song Shao), 54H20 (37B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340954 (2008i:37082) Mai, Jie-Hua; Shao, Song The structure of graph maps without periodic points. *Topology Appl.* 154 (2007), no. 14, 2714–2728. (Reviewer: Sergiy F. Kolyada), 37E25 (37B05 54H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338638 (2008c:54035) Mai, Jie-Hua; Liu, Xin-He Fixed-point theorems for families of weakly non-expansive maps. *J. Math. Anal. Appl.* 334 (2007), no. 2, 932–949, 54H25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328013 (2008b:37071) Mai, Jiehua; Sun, Taixiang The  $\omega$ -limit set of a graph map. *Topology Appl.* 154 (2007), no. 11, 2306–2311, 37E25 (37B20 54H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318685 (2008b:54066) Mai, Jie-Hua; Liu, Xin-He Fixed points of weakly contractive maps and boundedness of orbits. *Fixed Point Theory Appl.* 2007, Art. ID 20962, 12 pp, 54H25 (47H1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152087 (2006d:37069) Mai, Jie-Hua What maps can admit two-sided symbolic dynamical systems? *Internat. J. Bifur. Chaos Appl. Sci. Engrg.* 15 (2005), no. 4, 1485–1491. (Reviewer: Louis Block), 37E25 (37B10 37E05)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147363 Mai, Jiehua; Zeng, Suxing Some equivalent definitions of Riemann integral. *J. Math. Study* 38 (2005), no. 1, 35–41, 26A42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

MR2129113 (2005m:37094) Mai, Jie-Hua Pointwise-recurrent graph maps. Ergodic Theory Dynam. Systems 25 (2005), no. 2, 629–637. (Reviewer: Ľubomír Snoha), 37E25 (37B05 37B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121103 (2005k:37079) Mo, Hong; Shi, Song Quan; Zeng, Fang Ping; Mai, Jie Hua An arc as the inverse limit of a single bonding map of type \$N\$ on \$[0,1]\$. Acta Math. Sin. (Engl. Ser.) 20 (2004), no. 5, 925–932. (Reviewer: Lyudmila S. Efremova), 37E05 (37B45 37B99 54H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054803 (2005a:37022) Mai, Jie-Hua Devaney's chaos implies existence of \$s\$-scrambled sets. Proc. Amer. Math. Soc. 132 (2004), no. 9, 2761–2767 (electronic). (Reviewer: Alejandro Eduardo Maass), 37B20 (37B05 54H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2000993 (2004c:37035) Mai, Jie-hua; Liu, Cui-jun The topological semi-conjugacy relation is a preordering but not a partial ordering. Adv. Math. (China) 32 (2003), no. 3, 356–358. (Reviewer: Krzysztof Ciepliński), 37B99 (37C15 54H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990578 (2004e:54021) Mai, Jie-Hua The structure of equicontinuous maps. Trans. Amer. Math. Soc. 355 (2003), no. 10, 4125–4136 (electronic), 54E40 (54H25)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911761 (2003f:39079) Liu, Xinhe; Mai, Jiehua Analytic solutions of iterative functional equations. J. Math. Anal. Appl. 270 (2002), no. 1, 200–209, 39B32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908574 (2003d:37013) Mai, Jiehua; Ye, Xiangdong The structure of pointwise recurrent maps having the pseudo orbit tracing property. Nagoya Math. J. 166 (2002), 83–92. (Reviewer: S. Yu. Pilyugin), 37B20 (37C50 54H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877224 (2002k:37020) Mai, Jiehua Retracts, fixed point property and existence of periodic points. Sci. China Ser. A 44 (2001), no. 11, 1381–1386. (Reviewer: Antonio Linero Bas), 37B20 (54C15 54H20 54H25)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847087 (2002d:37056) Mai, Jie-hua A note on: "Multi-separation, centrifugality and centripetality imply chaos" [Trans. Amer. Math. Soc. 351 (1999), no. 1, 343–351; MR1473450 (99c:58110)]. Northeast. Math. J. 17 (2001), no. 2, 236–240, 37E05 (37D45)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816732 (2002a:39026) Mai, Jie-hua; Liu, Xin-he On a property of roots of polynomials. J. Math. Res. Exposition 21 (2001), no. 1, 17–20, 39B12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804042 (2003b:39031) Mai, Jiehua; Liu, Xinhe Existence, uniqueness and stability of \$C^m\$ solutions of iterative functional equations. Sci. China Ser. A 43 (2000), no. 9, 897–913. (Reviewer: Bogdan Choczewski), 39B12 (37C75)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774478 (2001f:37024) Mai, J. H. Classification of translation maps of tori by topological conjugac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d computational simulations (Chengdu, 1999), 277–283, World

---

Sci. Publ., River Edge, NJ, 2000, 37C15 PDF Clipboard Series Chapter

MR1692146 (2000d:52009) Mai, Jiehua The Brouwer fixed point theorem and tetragon with all vertexes in a surface. *Sci. China Ser. A* 42 (1999), no. 1, 18–25, 52B70 (55M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473451 (99c:58111) Mai, Jiehua Scrambled sets of continuous maps of  $\mathbb{S}^1$ -dimensional polyhedra. *Trans. Amer. Math. Soc.* 351 (1999), no. 1, 353–362. (Reviewer: Katarina Jankova), 58F13 (54H20 58F08)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473450 (99c:58110) Mai, Jiehua Multi-separation, centrifugality and centripetality imply chaos. *Trans. Amer. Math. Soc.* 351 (1999), no. 1, 343–351. (Reviewer: Katarina Jankova), 58F13 (26A18 58F03)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633923 (99f:58142) Mai, Jiehua; Zeng, Fanping Transitivity and chaos. *Northeast. Math. J.* 14 (1998), no. 1, 119–125. (Reviewer: Sergio Plaza), 58F13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641013 (99f:54054) Mai, Jiehua Continuous maps with the whole space being a scrambled set. *Chinese Sci. Bull.* 42 (1997), no. 19, 1603–1606, 54H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612633 (99c:34101) Wang, Shu He; Mai, Jie Hua Estim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 numbers of systems of linear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Chinese) *Acta Math. Sinica (Chin. Ser.)* 40 (1997), no. 6, 901–912. (Reviewer: Jialin Hong), 34D08 (34A3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613866 (99d:58099) Mai, Jiehua; Gu, Rongbao Conditions of  $C^0$  flows on closed surfaces having the pseudo-orbit tracing property. *Sci. China Ser. A* 40 (1997), no. 11, 1166–1175. (Reviewer: Jerzy Ombach), 58F10 (58F15)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481365 Mai, Jie Hua Continuous maps whose Li-Yorke mixing set is the whole space. (Chinese) *Kexue Tongbao (Chinese)* 42 (1997), no. 14, 1494–1497, 58F13 (26A18)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479019 (99g:58046) Mai, Jie Hua Some dynamical system properties of self-maps of the circle and conditions equivalent to them. (Chinese) *Adv. in Math. (China)* 26 (1997), no. 3, 193–210, 58F03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460615 Mai, Jiehua Smale horseshoe maps by  $p$ -adic fractions. *Chinese Sci. Bull.* 42 (1997), no. 10, 799–803, 58F03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453485 (98c:58100) Mai, Jie Hua; Gu, Rong Bao Some classes of local structures of  $C^0$  flows on closed surfaces. (Chinese) *J. Math. (Wuhan)* 17 (1997), no. 1, 8–14. (Reviewer: Bei Ye Feng), 58F12 (54H20 58F25)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452747 (98c:58053) Zeng, Fanping; Mai, Jiehua Maps of the interval containing infinite symbolic dynamical systems. *Nonlinear Anal.* 29 (1997), no. 5, 585–592. (Reviewer: Kamel N. Haddad), 58F03 (54H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446867 (98m:39061) Mai, Jie Hua Generated solutions of the iterated functional equation

---

$f^2(x) = af(x) + bx$ . (Chinese) *J. Math. Res. Exposition* 17 (1997), no. 1, 83–90, 39B12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409789 (97f:54046) Mai, Jiehua Pointwise recurrent dynamical systems with pseudo-orbit tracing property. *Northeast. Math. J.* 12 (1996), no. 1, 73–78, 54H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406943 (97f:05173) Mai, Jie Hua Profiles of some classes of condensable graphs. (Chinese) *J. Systems Sci. Math. Sci.* 16 (1996), no. 2, 141–148, 05C78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384134 (96m:30005) Mai, Jiehua Regional stability of zero points of families of polynomial functions. *Chinese J. Contemp. Math.* 16 (1995), no. 4, 415–427. (Reviewer: Timothy S. Norfolk), 30C15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372559 (96k:13008) Mai, Jie Hua; Wang, L. The symmetry of components containing periodic orbits of power maps on commutative rings. (Chinese) *Acta Math. Sinica* 38 (1995), no. 5, 600–606, 13B1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366968 (96m:93104) Mai, Jie Hua Regional stability of zero points of families of polynomial functions. (Chinese) *Chinese Ann. Math. Ser. A* 16 (1995), no. 5, 604–613. (Reviewer: Kang-Zhi Liu), 93D09 (93C41)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345468 (96d:58041) Mai, Jie Hua A kind of symbolic dynamical systems describing non-chaotic maps. *Chinese Sci. Bull.* 40 (1995), no. 13, 1063–1067. (Reviewer: Pierre Arnoux), 58F03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334917 (96f:58105) Mai, Jie Hua; Zeng, Fan Ping Some families of unimodal functions without the integrity property of the series of kneading orbits. (Chinese) *J. Systems Sci. Math. Sci.* 15 (1995), no. 1, 1–9. (Reviewer: Gong Fu Liao), 58F13 (34C99 58F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332643 (96e:58053) Mai, Jie Hua; Zhou, Xiao Hua The uninterruptedness of series of kneading sequences in families of unimodal functions. (Chinese) *Chinese Ann. Math. Ser. A* 15 (1994), no. 5, 612–617. (Reviewer: Bing Hong Wang), 58F03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331030 (96j:26007) Mai, Jie Hua; Zeng, Fan Ping Unimodal expanding self-maps of an interval. (Chinese) *J. Math. (Wuhan)* 14 (1994), no. 3, 369–374. (Reviewer: Fuyao Ren), 26A18 (58F08)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315620 (95m:58083) Mai, Jie Hua; Zhou, Xiao Hua The uninterruptedness of series of kneading sequences in families of unimodal functions. *Chinese J. Contemp. Math.* 15 (1994), no. 4, 387–395. (Reviewer: Frederick R. Marotto), 58F08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305766 (95j:58115) Mai, Jie Hua; Wang, Li On the integrity of kneading sequences of a  $C^0$ -family of unimodal functions. *Nonlinear Anal.* 23 (1994), no. 9, 1145–1152. (Reviewer: Paweł Góra), 58F13 (58F03)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293579 (95k:58129) Mai, Jie Hua; Luo, Zhi Ming The existence of eventually periodic orbits

---

of designated types in unimodal functions. (Chinese) *Acta Math. Sinica* 37 (1994), no. 2, 269 – 274.  
(Reviewer: Bei Ye Feng), 58F20 (58F03)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343759 (96d:58111) Mai, Jie Hua Infimum of Lipschitz constants of continuous functions having  $\$m\$$ -periodic orbits. *Dynamical systems* (Tianjin, 1990/1991), 137 – 145, Nankai Ser. Pure Appl. Math. Theoret. Phys., 4, World Sci. Publ., River Edge, NJ, 1993, 58F20 (26A16 26A18 58F03)  
PDF Clipboard Series Chapter

MR1266536 (95e:58060) Mai, Jie Hua; Luo, Zhi Ming Some properties of sequences of unimodal symbols and periodic orbits in unimodal functions. (Chinese) *Natur. Sci. J. Xiangtan Univ.* 15 (1993), no. 4, 10 – 16, 58F03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234508 (94h:58140) Mai, Jie Hua Characteristics of continuous functions with orbits having periods that are not powers of  $\$2\$$ . (Chinese) *Acta Math. Sinica* 36 (1993), no. 2, 145 – 152.  
(Reviewer: Gong Fu Liao), 58F20 (58F12)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160742 (93c:58101) Mai, Jie Hua Orientation-preserving periodic self-homeomorphisms of  $\$2\$$ -dimensional orientable manifolds. *Sci. China Ser. A* 34 (1991), no. 9, 1057 – 1067. (Reviewer: Ding Jun Luo), 58F08 (58F22)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150671 (93c:58063) Mai, Jie Hua  $\$3\$$ -periodic orbit implying  $\$6\$, 831\$, 726\$, 876\$, 986\$, 508\$$ -periodic orbits—infimums of numbers of periodic orbits in continuous functions. *Sci. China Ser. A* 34 (1991), no. 10, 1194 – 1204. (Reviewer: Frederick R. Marotto), 58F03 (26A18)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106706 (92e:57033) Mai, Jie Hua; Tang, Yun On the injective metrization for infinite collapsible polyhedra. A Chinese summary appears in *Acta Math. Sinica* 35 (1992), no. 2, 286. *Acta Math. Sinica (N. S.)* 7 (1991), no. 1, 13 – 18. (Reviewer: Robert M. Dieffenbach), 57Q05 (54C20 54E35)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084146 (92j:58055) Mai, Jie Hua Unimodal orbits in continuous functions and generalization of Sarkovskii's theorem. *Sci. China Ser. A* 33 (1990), no. 10, 1182 – 1191, 58F08 (26A18)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070213 (91i:58072) Mai, Jie Hua The integrity of series of kneading orbits in families of unimodal functions. (Chinese) *Acta Math. Sinica* 33 (1990), no. 3, 323 – 329. (Reviewer: Miao Ding), 58F08 (58F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055319 (92e:58164) Mai, Jie Hua Pointwise periodic self-maps of subspaces of  $\$2\$$ -dimensional manifolds. *Sci. China Ser. A* 33 (1990), no. 2, 145 – 155, 58F20 (54C99)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019652 (90k:54021) Mai, Jie Hua; Tang, Yun Free deformation retraction in injective metric spaces. A Chinese summary appears in *Chinese Ann. Math. Ser. A* 10 (1989), no. 3, 388. Chinese

---

Ann. Math. Ser. B 10 (1989), no. 2, 221 - 226. (Reviewer: W. Stephen Watson), 54C15 (54E35 55P99)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001816 (91c:58124) Mai, Jie Hua A simpler proof of the extended \$C^1\$ closing lemma. Chinese  
Sci. Bull. 34 (1989), no. 3, 180 - 184. (Reviewer: S. Yu. Pilyugin), 58F3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1012004 (90g:05115) Mai, Jie Hua; Zhang, Yaoxun The existence of cycles passing through  
a specified set of vertices in a connected graph. (Chinese) Chinese Quart. J. Math. 3 (1988),  
no. 2, 71 - 77. (Reviewer: W.-K. Chen), 05C38 (05C4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977448 (90e:26007) Mai, Jie Hua Comment: "A problem on continuous and periodic functions",  
[Pacific J. Math. 117 (1985), no. 1, 143--147; MR0777441 (86d:26002)] by J. S. Hwang. (Chinese)  
Kexue Tongbao (Chinese) 33 (1988), no. 2, 93 - 94, 26A15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961546 (90d:58082) Mai, Jie Hua Besicovitch's top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of plane and  
Birkhoff's conjecture. Kexue Tongbao (English Ed.) 33 (1988), no. 7, 544 - 547. (Reviewer: Marek  
Cezary Zdun), 58F12 (34C40 54H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944819 Mai, Jie Hua A simpler proof of a generalization of the \$C^1\$ closing lemma. (Chinese)  
Kexue Tongbao (Chinese) 32 (1987), no. 18, 1365 - 1368, 58F30 (58F1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944426 (89h:58096) Mai, Jie Hua Two dynamical systems with designated properties. (Chinese)  
An English summary appears in Chinese Ann. Math. Ser. B 9 (1988), no. 1, 148. Chinese Ann. Math.  
Ser. A 8 (1987), no. 6, 682 - 686. (Reviewer: Jian Ying Zhou), 58F10 (34C4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913777 (88k:34046) Mai, Jie Hua An answer to the Markov conjecture. Acta Math. Sinica (N. S.)  
3 (1987), no. 2, 180 - 189. (Reviewer: D. N. Cheban), 34C35 (34C27 34D20 54H20 58F27)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909415 Mai, Jie Hua Besicovitch's top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lane, and Birkhoff's  
conjecture. (Chinese) Kexue Tongbao (Chinese) 32 (1987), no. 4, 241 - 243, 54H20 (58F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891939 (88i:58081) Mai, Jie Hua Conditi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N\$ th iterative roots  
of self-homeomorphisms of the circle. (Chinese) Acta Math. Sinica 30 (1987), no. 2, 280 - 283.  
(Reviewer: Gong Fu Liao), 58F08 (26A18 54H20 58F99)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877286 (88m:58168) Mai, Jie Hua A simpler proof of \$C^1\$ closing lemma. Sci. Sinica Ser.  
A 29 (1986), no. 10, 1020 - 1031. (Reviewer: J. W. Robbin), 58F30 (58F1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862604 (87j:34048) Mai, Jie Hua An absolutely stable domain of Hill's equation. Sci. Sinica  
Ser. A 29 (1986), no. 5, 488 - 501. (Reviewer: H. Hochstadt), 34B30 (34D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

Article

MR0858083 (87k:05089) Mai, Jie Hua Two types of planar graphs in which group operations can be introduced. (Chinese) *J. Math. Res. Exposition* 6 (1986), no. 1, 163–168. (Reviewer: Zhong Fu Zhang), 05C25 (05C15)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867905 (87m:54113) Mai, Jie Hua; Ouyang, Yi Ru; Yang, Yan Chang An analytic doubly-expansive self-homeomorphism of the open  $n$ -cube. *Acta Math. Sinica (N.S.)* 1 (1985), no. 4, 335–342. (Reviewer: W. R. Utz), 54H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814064 (87c:58105) Mai, Jie Hua Characteristics of some self-homeomorphisms on planes and spheres which can be embedded in flows. *Sci. Sinica Ser. A* 28 (1985), no. 9, 897–906. (Reviewer: Yu. E. Gliklikh), 58F25 (54H20)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840780 (87h:05123) Mai, Jie Hua; Wang, Shu He; Luo, Hai Peng The number of edges of graphs with girth exceeding  $n+1$ . (Chinese) *J. China Univ. Sci. Tech.* 14 (1984), no. 4, 467–474. (Reviewer: Ke Min Zhang), 05C35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794452 (87c:05109) Mai, Jie Hua The bandwidth of the product of two  $\Gamma$ -type condensed graphs. *Kexue Tongbao (English Ed.)* 29 (1984), no. 12, 1575–1578. (Reviewer: J. Sedláček), 05C99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768617 (86c:73024) Mai, Jie Hua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instantaneous changeability of structures and systems of function equations. (Chinese) *Acta Math. Appl. Sinica* 7 (1984), no. 3, 307–320, 73K99 (05C99)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768053 (86d:05067) Mai, Jie Hua; Luo, Hai Peng Some theorems on the bandwidth of a graph. (Chinese) *Acta Math. Appl. Sinica* 7 (1984), no. 1, 86–95. (Reviewer: Fu Ji Zhang), 05C35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766161 Mai, Jie Hua Band width of products of  $\Gamma$  condensation graphs. (Chinese) *Kexue Tongbao (Chinese)* 29 (1984), no. 13, 773–775, 05C35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724844 (85d:05219) Mai, Jie Hua The bandwidth of the graph formed by  $n$  meridian lines on a sphere. (Chinese) *J. Math. Res. Exposition* 3 (1983), no. 1, 55–60. (Reviewer: A. C. Liu), 05C99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R0695270 (84g:54036) Mai, Jie Hua; Tang, Yun An injective metrization for collapsible polyhedra. *Proc. Amer. Math. Soc.* 88 (1983), no. 2, 333–337. (Reviewer: R. A. Piccinini), 54E35 (57Q05) PDF Clipboard Journal Article

Matches: 91 Mirror Sites 美国罗德岛, 普罗维登斯 美国得克萨斯, 休斯敦 巴西, 里约热内卢 德国, 比勒费尔特 德国, 波恩 法国, 斯特拉斯堡

© 版权所有 2011, 美国数学会

查尔斯街 201 号

---

Providence, RI 02904-2294

通讯地址： 广东 汕头大学 数学所

邮政编码： 515063

电子邮件： [jhmai@stu.edu.cn](mailto:jhmai@stu.edu.cn)

---

# 纪念李同孚先生

数学一班 麦结华

## 一、李同孚先生简历

李同孚先生是湖南湘潭人，1925年7月12日出生，1947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曾师从于国际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教授和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江泽涵教授。李先生大学毕业后曾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工作，期间陈省身教授曾打算推荐李先生去美国留学，后因北京将近解放，李先生未能成行。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李先生转到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多年来李先生致力于拓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治学严谨，勤于攻读，学问精深，对教学工作十分认真，受到学生们的广泛好评。

李先生为人正直，待人诚恳热情，乐于助人，深得学生和友人的尊敬和爱戴。

李先生在学术方面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与吉林大学的孙以丰教授一起翻译校对了 M. A. Armstrong 的《Basic Topology》一书。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多次大量印刷，多年来一直被我国的许多大专院校的相关专业作为教科书采用。此外，他还涉猎拓扑学以外的其他许多专业，知识广泛，他翻译的《伽罗华理论》一书曾于上世纪 90 年代出版。

李先生在教学方面成绩卓著。他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 1957 级和 1959 级拓扑班的专业基础课《拓扑学》和《同调代数》的教学工作。这两个班的学生，后来有许多成为我国拓扑学界的教学和科研的骨干。例如，在北大 1957 级拓扑班的同学中，有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四川大学的刘应明教授，有后来到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任教的石根华教授，有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虞言林研究员等人。而在北大 1959 级拓扑班的同学中，有先在广西大学数学学院后来调到汕头大学数学系任教的博士生导师麦结华教授，有先在中山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后来到了中山大学经济学院的数量经济学博士生导师王则柯教授，有曾任北京服装学院副院长后来调回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任教的张立昂教授，还有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的唐云教授等人。

## 二、怀念李同孚先生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1959 级数学专业的学生在 1963 年春即在四年级第二学期时开始分

---

专业。我对拓扑学感兴趣，便主动报了拓扑专业（当时叫做拓扑专门化）。

分了专业之后，首先给 1959 级拓扑班同学上拓扑课的就是李同孚先生。从 1963 年春到 1964 年春，他给我们上了《拓扑学》和《同调代数》两门课程。他教学工作十分认真，每上一节课，都作好充分的准备，写好讲稿。当时拓扑学方面的参考书还很少有出版，我们的学习就全靠在课堂上听李先生的讲解。李先生讲课语言简炼，但他每讲一个定理或引理，却要将证明全文在黑板上写出，不打折扣。我感到李先生这样讲课，就好像是在给我们作写文章的示范，使我们在逻辑推理的严谨性和数学思想的流畅表达等方面得到了更严格的训练。受到李先生的影响，我后来给学生上课，遇到定理和引理的证明，也注意叙述的完整，不是只说一说证明的思想要点就作罢。

李先生的字写得很漂亮，他即使是在黑板上写字也是一丝不苟，十分工整。

李先生基本上每次上课之后都给我们布置作业。他批改作业十分认真，即使是作业中有些小差错或者叙述不够规范的地方，他也在作业的旁边用红笔给予更正。如果差错较多，他还要求同学们重新再做。我至今仍然保存着当年李先生教《同调代数》时做的作业，上面有李先生批改每一次作业的痕迹。

有一次，李先生对我们进行考试，我记不起是考《拓扑学》还是考《同调代数》，也记不起是期中考试还是期末考试了。我记得清楚的是，我做完了各个考题，并且检查了一遍之后，就站起来交卷，准备提前离开考场。但李先生却把我按下，要求我再检查一遍。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之后，我写文章时总要反复检查修改不止一遍，这就与李先生对我的影响有关，虽然不能说纯粹是李先生的影响。

当时师生关系比较单纯，除了教学，同学们在其他方面与李先生的接触不多，这可能也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离开北大之后，我与李先生有许多年失去了联系。

1978 年我考进广西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班。1980 年研究生班毕业之后留在广西大学任教。1983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10 日在北京召开第四届国际双微（微分几何和微分方程）学术讨论会。国际双微讨论会是上世纪 80 年代在陈省身先生倡议和指导下在我国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双微讨论会得到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支持，由北京大学主办，廖山涛先生是这一届双微会的组织委员会的主席。得到廖山涛先生和组织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的关心，我被接纳为这次会议的正式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我离开北京十多年之后第一次重返北京。会议结束后，我和家人在北京多呆了几天。期间，去北京大学看望老师和同学，见到了李同孚先生，这是我与李先生失去了联系十多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李先生见到我，十分高兴，请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到勺园吃饭，还专门带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去颐和园玩了半天。离开北大时，李先生将他合作翻译的《基础拓扑学》一书和他购买的几本英文数学书送了给我。

从 1984 年 5 月下旬到 11 月上旬，应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邀请，我回北京大学作了半年的

---

访问学者。张芷芬先生告诉我，这实际上是廖山涛先生的意思，廖先生是想让我利用北大的较好的环境和丰富的图书资料等条件，补回当年匆匆离开北大时没能做完的一些工作。这次在北京大学逗留的时间比较长，我与李先生便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

此后，直至 1995 年年初李先生去世之前，我多次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每次到北京参加会议，我都抽空前去看望李先生。李先生每一次见到我都很高兴。他对我的成长进步十分关心，每次见面他都给了我许多鼓励。

李先生喜欢收藏图书，他常去海淀图书城、五道口等处的书店选购书籍，他把他的工资收入的大部分都用于购置图书了。当时，比起一些年青教师，他的工资水平还是稍为高一些的。他的房间里堆满了他购置的图书，书架上放不下，便摆放到桌子上，椅子上和床上。我到李先生那里，每次离开时，他都要送几本英文数学书给我。他曾多次对我说过，他打算把他的英文数学藏书中的大部分送给我，由我处置，我想自己使用或是转赠他人都行。他说，他现时还需要与这些书为伴，打算送给我的书，绝大部分还得等到以后才能交给我。我十分感激李先生如此关心和器重我，想不出怎样才能够报答他。他说他不需要我有什么具体的报答，他只希望这些数学书可以对我的学习和工作有帮助。到了 1994 年，李先生更写信与我联系，让我抓紧考虑怎样才能够把他的那么多的书从北京运到南宁。

李先生有一个亲妹妹，比他小十多岁，名叫李珏（jué），在北京东直门外的中国电子器件工业配套中心工作。1995 年 1 月 2 日，李先生去世。突然接到李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十分悲痛。1995 年 1 月下旬，我收到李珏女士寄来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李珏女士说：“（李先生）他生前常和我念叨的是他的一些数学书籍和期刊，你是他最好的学生，首先想到要送给你”。李珏女士请我考虑如何处理这些书。当时我回信说，很感谢李先生这么关心我，赠这么多书给我，但如果我亲自去北京，也不能直接带走这些书的十分之一，还是需要通过铁路托运。而如果通过铁路托运，我到了北京，也没有熟人和学生可以帮忙做整理、打包、请车、搬运等等事务，所以还是请北大的徐明曜教授帮助办理吧。

徐明曜教授是我在北大时的同班同学，他的学习成绩极其优秀。1959 年 9 月进入北大时他与我都分在数 59 级一班。1963 年春，北大数 59 级分专业，他选学代数，与我所选专业不同。但北大数 59 级的代数班与拓扑班的人数都比较少，这两个专业不同的班便合并为一个班，称之为“代数拓扑班”。平时，除了上专业课时分开，日常的政治学习、开会讨论以及参加生产劳动等等都合在一起。所以徐明曜是我在北大的自始至终的同班同学。1965 年春，北大数 59 级的同学提前半年毕业。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以及由于是提前半年毕业，许多单位都还没有作好接收大学毕业生的计划，分配渠道不够畅通，因此北大数 59 级数学各专业的学生之中，超过了半数被分到中学任教。徐明曜也被分到唐山市教育局属下的中学，做了十二年的中学数学教师。1978 年他考回北大，成为段学复先生的研究生，1980 年研究

---

生毕业之后留在北大数学系任教。徐明曜同学为人热心、豪爽而仗义。他不是李同孚先生直接教过课的学生，又与李先生有一些年龄上的差距，但从 1980 年直到 1995 年李先生去世，他都和李先生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成了李先生的忘年交。李先生退休之后，年纪逐渐大了，有时候，生活上有些什么事情，或者身体略有不适，徐明曜都常去看望。这一次，我和李珏女士请求徐明曜帮助把李先生赠送的两千多册数学图书和期刊运来南宁，他立即就答应了。

1995 年 3 月下旬，经过整理、打包之后，徐明曜和他的学生租了一个小集装箱，通过铁路把李先生赠送的两千多册外文数学图书和期刊运到了南宁。

李先生的数学方面的藏书十分珍贵，十分有用，而且都保存得很好，其中还有好些价格昂贵的外文原版图书，更有许多是现在难于再买得到的。当时，在广西南宁，虽然也有中外文书店，也有一些专业书籍出售，但基本上是一些大学本科教学方面的参考书和一些工程技术、农业、养殖、商业及英语考级等方面的书籍，极少有适合数学研究参考的书籍。所以，李先生送给我的书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当时，由于我家中没有那么多书架放这些书，也为了让李先生的这些书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便在留了将近一百册比较适合自己参考的专业数学书之后，在 1995 年 5 月上旬将李先生的这些书的绝大部分转赠给了广西大学图书馆（计有英、德、俄、法、日等语种的图书七百多册）、广西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系（计有英文图书近五百册，英文期刊五百多册）和广西民族学院数学系（计有英文图书四百多册，英文期刊近一百册）。当时，为了能够留下对李先生的纪念，我请刻字店的师傅刻了一个章，刻有“北京大学李同孚教授赠书”等文字，在所有转赠的和自己留存的书上都盖了这个章。此外，我还写了一篇关于“北京大学李同孚教授赠书”的简短的通讯，联系到当时的《广西日报》上发表，并写了一篇题为“北京大学李同孚教授向广西高校捐赠图书”的比较详细的报道，包括介绍他的生平简历等等，在《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3 期（1995 年 6 月 20 日出版）的最后一页上发表，用了该期学报的一个整页。

李先生的赠书之中，还有一些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出版（即 189X 年和 190X 年出版）的数学书，这些书也是用道林纸印刷，也很精美。这些书的内容比较古旧，可能不适合于数学知识方面的学习，但却很具有收藏价值和数学史和出版印刷史等方面的研究价值。这些年代比较老的书，我除了自己留下一两本作纪念，大部分都转赠给广西大学图书馆了。

直到现在，李先生送给我的书还在发挥作用。我写文章时，为了核对一些数学概念的准确定义，常常需要翻阅一些书籍，其中翻阅得最多的就是李先生送的 J. R. Munkres 著的《Topology》一书，还有 Z. Nitecki 著的《Differentiable Dynamics》一书，等等。

多年来，我常常想找一些机会表达对李先生的纪念。1998 年，我在《中国科学》中文版 28 卷第 9 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Brouwer 不动点定理与顶点在曲面上的四边形”，想到李先生正是上我们的《拓扑学》入门课程的老师，便在文末加了一句致谢语“承蒙北京

---

大学李同孚先生多年来的关心与指导，谨以此文表示纪念”。在 1999 年的《中国科学》英文版 42 卷第 1 期上发表的这篇文章的英译文，也同样加了这样一句话。

最近，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与我联系，说打算重新出版李同孚先生翻译的《伽罗华理论》一书，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李先生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他翻译的著作是高质量的。为了配合这本书的重新出版，哈工大出版社的编辑让我写一篇纪念李先生的文章放在该书的后面，因此我怀着对李先生的永远的敬意和对过去的岁月的怀念写了以上的文字。

2011. 02. 06

# 我与逢九的岁月

数学三班 马长冰

1939年，我出生在福州市北郊的农村，那一年，国家陷于危亡之中。

※ ※ ※ ※ ※



1949年，我10周岁。

我家世代务农，皆为文盲。父亲出生于1894年夏，这一年他满55岁，是老农民了。母亲在福州发生瘟疫的两年前病故，父亲种地养牛养家糊口，家里涉外的活动多是10岁的我。

1949年8月17日，人民解放军进入福州城，我辍学在家，正在近郊家乡的山上放牛。进城卖菜的乡亲回来说，我们解放了！卖了菜的乡亲得到的纸币“金元券”都是废纸。

10月1日共和国成立那天，我代表全家到福州北郊的新店小学集会，庆祝共和国的诞生。我拿着写上标语的彩色纸旗，听广播，喊口号，跟着队伍游行。这是头一次参加大型集会。

※ ※ ※ ※ ※

回头去看，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就是十年。

1959年春节过后，高三最后一个学期了，功课就要结束。开始议论分类编班的事儿。当时分文史、理工和医农三大类报考大学。虽然我们对三个门类只有很笼统的认识，几个农村来的同学还是有私下议论的。大家旁观了“反右”运动的情景，觉得搞文字危险，对文学固然有点兴趣，只能业余爱好，于是我们选择了理工类。

大概4月份，我们都编到高三（1）班（理工）。班主任是教物理的余美茂老师，深受同学们爱戴，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

临近高考报名的时候，先参加体检。对我来说情况不妙：右眼视力差加上鼻窦炎。右眼视力差，限报工科和理化，鼻窦炎限报师范类。我一直生活在农村家庭，接触的“上层人物”就是一群高尚的老师群体，他们堪为楷模，班主任就是“偶像”。况且师范类供给制也有吸引力，因此报考师范是我的志向。现在却被限报，而且理工类只能报考数学和图书馆学系。当时全国开设图书馆学的只有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非师范的数学系都是名牌的综合性大学。

学习数学，虽然从小学到中学没有害怕过，成绩也都不错，但是谈不上兴趣，更说不上特别爱好。受到严格的“限报”制约，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报了可以报考的复旦、厦门、

---

武汉等大学的数学系。余老师却要我从北京大学开始填报，我只好怀着敬畏的心情，工工整整地填上“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高考以后，对各科考试情况跟同学们的感觉差不多，好像物理科试题比较难，我感觉还考得不错。那时候对录取与否不是特别在意，考不上回家务农是正常的事。后来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到北大的学制是六年。1963年分专门化的时候，段学复主任请吴文俊先生来讲话，主要是动员一些人学代数。吴先生当时已经在研究用计算机证明几何问题了。我就到了代数班学“群论”，段先生亲自给我们上“抽象代数学”，据说这是他多年未开的课，后来好像也没有再开了。

接下来，好像又有什么事，我们的学制改成了“五年半”，学纯数学的我们也基本上都到中学任教去了。好像没有人做了吴文俊先生的弟子。

我本来就是胸无大志的，任凭学制的改变与毕业分配，都服从。没有福建的分配方案，也不敢提出来（也不容提出），只希望早点拿到工资养家。我跟南方的同学到了上海市人事局报到。在人事局换个介绍信，就到教育局，然后就到中学了。

我别无选择地选择了数学专业，最终却“不务正业”，愧对名校数学大家的培养与期待。当时被限报师范类的我，当上了中学教员，且终身从教。着实被历史开了一回玩笑。

福州七中是北郊的农村中学，我们是第二届高中毕业生，大约一百人。高二的时候，我们参加了修筑寿山公路和大炼钢铁的长时间的强劳动，高三的时候还是很认真地学习功课。我们高考成绩大概也是不错的，这年进京上学共有九人。我们很幸运，是福州市第一批乘火车进京上学的（1959年福州市才通火车）。

1959年，我们参加了国庆十周年庆典。白天游行，晚上在天安门广场联欢。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靠近天安门，晚会集中在金水桥前西华表底下。一天两次近距离见到了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我们从农村出来的青年来说，心情是难以形容的高兴。

※ ※ ※ ※

1969年，非常岁月，我还在上海某中学任教。

1965年春季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的中学教数学，先是给初三毕业班学生复习答疑，夏季接任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那非常的岁月，竟然一待三年，才把学生分送到部队、农村、工厂。1969年刚刚“复课闹革命”，任初一班主任，教数学兼政治课，功课没什么要求，不乱就好。经常带学生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下乡劳动可麻烦了，要管吃喝拉撒睡。实际上没活可干，冬天女生晒太阳聊天，男生“闲则生事”，夏天河塘游水会死人。管松了容易闹出事情来，抓严了会犯“师道尊严”的错误要挨批。那日子可不是好混的。

1971年调回福州，母校收留了我。

※ ※ ※ ※ ※



1979年，知识分子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1979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三个年头。

我从恢复高考开始，就担任一个毕业班的数学课，兼做些行政工作。1979年开始担任学校教务主任。我们在礼堂兼食堂举办高考补习班，大约三百多人听课。当时福州七中教育质量受到全市的好评，到学校参加高考补习的人数很多。大班讲课，师生情绪很高，补贴很低，无怨无悔。

这一年仍然参加福州市教育学院的数学中心组活动，每周半天，仍然参加高考评卷工作，是文科数学评卷负责人之一。这是头一次参与社会活动。

※ ※ ※ ※ ※

1989年，我已经在教育厅干了5年。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全省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我是具体负责“普九攻坚”工作。走遍福建各县农村，1989年夏天在建阳谒朱熹陵。

这一时期，我在《教育评论》杂志发表“对办好福建省普通高中的基本认识和构想”，阐述普通高中的性质、任务及其意义。后被收入《当代福建教育的环视与前瞻》一书。在《福建教学与研究》先后发表“克服短期行为，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是巩固学额的重要环节”和“明确指导思想，搞好今年小学毕业考命题工作”，强调提高教学质量，掌握命题指导思想的重要意义。由此也开始对考试命题的思考。

在一年，父亲以九十六岁高龄辞世。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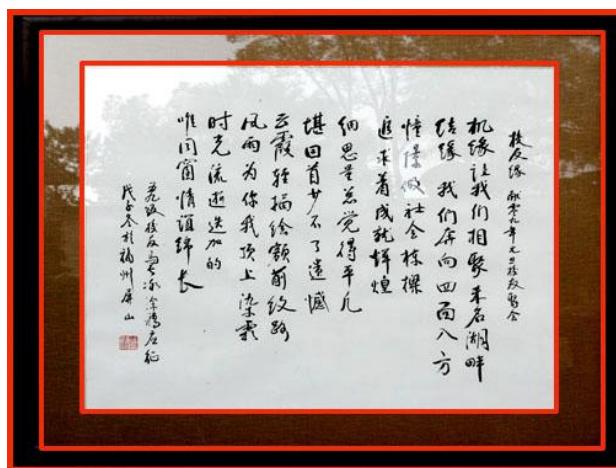
1999年。

福建省刚刚在1998年底通过了国家“普九”验收。在“普九攻坚”中，我走遍了全省所有的县市，主要是在各地农村，促进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初中办学规模，巩固学额，兴办特殊学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最艰巨的是普及初中教育。经过全省上下努力，成功地打了

一场“初中建设翻身仗”，1999年全省初中在校生从1990年的89.38万人发展到197.79万人，初中毛入学率达到107.03%，1999年全省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94.36%（这项指标曾连续五年列全国第一）。完成了初中建设翻身仗的宏伟目标。在福建广大农村，“最漂亮的房子是学校，最优美的环境是校园”，在当时成为有目共睹的现实，也成为当地受灾时的避难所。

※ ※ ※ ※

2009年，准备到北京参加入学50周年纪念活动。感触良多，凑了几句话：



机缘，我们相聚未名湖畔，  
结缘，我们奔向四面八方。  
憧憬做社会栋梁，  
追求着成就辉煌。

心怀国家、民族、天下，  
脚踏实地，敢先，敢担【注】。  
细思量，总觉得平凡，  
堪回首，少不了遗憾。

云霞，轻描绘额前纹路，  
风雨，为你我顶上染霜。  
岁月流逝叠加的，  
唯同窗情谊绵长。

【注】北大学子有敢为天下先、敢于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

---

# 我带领二班种蓖麻

数学二班 莫国端

1961 年到 1962 年，那两年饭不够吃，许多同学都浮肿了。上级号召“大种瓜菜”，我这个农村出身的学生接到班级团支部的命令：生活委员不做了，改任劳动委员，带领大家去“大种瓜菜”！我本来不乐意干这种事，但这是绝对不能说的。因为团支部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那时正在批评个别同学。我能把“政治任务”推掉不干吗？

“新官”上任后，系劳动部给我分配“政治任务”：负责在物理楼旁边一片空地上种蓖麻。我这个海南岛人从未见过这种东西，也不知道它可作何用，但我知道如何松土。在问明种子该埋多深后，就对班级布置种蓖麻的“政治任务”。那时候的大学生很听话，我一说这是党的号召，全班三十四人全部出动！

庄稼长得很好，丰收了！城市的同学不知底细，把我当作“庄稼好把式”。东西收回来了，放在 28 斋门口晒。可是后来不见了，可能是系学生会收去了，我也没有去问，班里也没人来追究我的“责任”。因为这个时候更加饥饿，全校进入“劳逸结合”新时期，谁也不想多动。

---

# 同学聚会，往事回忆

数学三班 倪忠仁

2009年5月16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59级同学在北大举行入学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当天下午的分班座谈会上，与会同学回忆了大学生活的峥嵘岁月和工作旅途的艰辛历程。听了同学们的慷慨陈词，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回到家中，打开计算机，写了下面的往事回忆。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由此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经历跌宕起伏，错综复杂，变化多端。我想，还是少谈心酸经历，多忆做学问的趣事。

## 大学阶段

我出生在江苏省靖江县滨临长江的一个偏僻农村，从小失去父母，由祖父母抚养大。小学毕业后，到苏南江阴县城读初中，1959年从江阴县省立南菁高级中学毕业，考取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本科生，分在数学三班。入学不久，从任课老师那里得知，我的数学、俄语的高考成绩均为满分，俄语任课老师还特地到我宿舍来了解我中学的俄语教学情况，征求对大学俄语的教学意见。

59级数学与计算数学专业的解析几何课开始由姜伯驹老师担任，不久改由“摘帽右派”程庆民老师教。第一学期期中考试评卷揭晓，程老师在数三班习题课上按得分高低的次序分发试卷，我排在第一，而班里一些调干生和学生干部则排在后面。个别同学对此十分反感，认为这是“长白专学生的志气，灭工农子女的威风”，是“右派翻案”，上告到系里，要求撤换程老师，由此导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斗右派程庆民的大会。同时，三班也召开了批斗我的团小组会，说我在领试卷时没有识破右派的伎俩，沾沾自喜（其实，我压根就没有自喜），与右派沆瀣一气，因此撤了我的团小组长。从此，我从积极分子沦为落后分子，一蹶不振，陷入极端消沉之中。不过后来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这件事也就烟消云散了。

大四分专门化，我选择应用性强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专门化课的任课老师有陈家鼎（测度论、马氏过程）、胡迪鹤（分析概率论）、龚光鲁（平稳过程）、卢崇飞（数理统计）等。毕业论文开始选信息论方向，由马希文指导；后来改为试验设计，由张尧庭指导。论文题目是用有限域上的矩阵构造结合方案，难点是计算结合方案的参数。据说这是许宝禄教授出的题，往届概率统计专门化的同学已经做过，但只对矩阵阶数为2、3、4、5这些具体的数字算出了参数。我经过几个月的苦苦钻研，终于对一般矩阵的情形推导了一组参数递推公式，

---

即当阶数小于  $m$ ,  $n$  的矩阵构造的结合方案的参数已知, 那么  $m$  行  $n$  列矩阵构造的结合方案的参数可用这组递推公式求得。张老师看了这个结果, 开始拿不定主意, 就去问许先生, 许先生说这就算解决了。于是, 张老师就让我给论文小组的李辛、李新、谭良三位同学介绍思路, 他们按此方法对一些特殊的矩阵(对角形矩阵、反对称矩阵、安密达对称矩阵)集合构造结合方案, 推导相应的参数递推公式。正当我们的论文行将圆满结束, 北大搞“四清”运动, 张老师突然去渤海湾自杀, 幸好被人发现, 扭送回校, 自杀未遂。不过他在出走以前, 已将我们的论文评语写好。因为这件事, 系里多次要我交代与张老师的关系, 揭发他的问题。其实, 我除了与他讨论毕业论文外, 其它什么事也没谈过。文革后我在北大当研究生时, 将该论文重新整理, 发表在《数学进展》(四人联名发表)上, 著名的联邦德国《数学文摘》转载了该论文摘要。在整理该论文过程中得知, 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的老师在七十年代也研究了这一课题, 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并已在《数学学报》上发表, 但所用的方法和表述方式与我们的不同, 而且他们只研究了一般矩阵, 没有涉及特殊矩阵。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许宝禄教授在北大举办了试验设计讨论班, 讨论班的研究成果由张尧庭执笔整理成文, 以“班成”笔名发表在《数学进展》上。该文是我们做毕业论文的基本参考文献。文中介绍了平面格点方案和三角形方案及其设计, 并将平面格点方案及其设计推广到多维情形。张老师将三角形方案及其设计的推广作为我们这一届某论文小组的题目。该论文小组经过几个月的钻研没有进展, 其中一位同学就来请教我。我苦苦思考了几天几夜, 仔细推敲了格点方案与三角形方案结构特征, 终于发现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 格点方案要考虑对象坐标的次序, 而三角形方案则无需考虑对象坐标的次序, 于是, 我用集合论方法和组合数学的工具, 非常巧妙地破解了这一难题, 简洁明了地给出了多维三角形方案及其设计的参数的解析表达式, 并将这一结果写给张老师看。张老师看了以后, 得知这一问题已彻底解决, 就给那个论文小组追加了研究内容。文革后, 我将这一结果整理成文, 发表在《应用数学学报》上。1989年出版的中国科学年鉴, 有一篇综述新中国组合数学研究四十年的文章, 文中列举了这一成果; 当然, 该文也列举了上述用有限域上的矩阵构造结合方案的结果, 只是列在中国科大老师的名下, 因为他们先正式发表, 尽管我们得到这一结果比他们要早十年。

大学阶段, 尽管多次受到冲击, 但我学习始终刻苦、踏实、认真, 保持各学期各科考试成绩全优(5分)。可是, 1964年报考研究生时, 却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和所谓“只专不红”而被取消了报考资格。

## 文革前的工作经历

1965年4月公布了我们这一届毕业生的分配方案。我被分配到军队科研单位, 报到地

---

点是沈阳东大营。我出身富农家庭，又有“只专不红”的帽子，这样的分配去向，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也是我做梦也不敢企求的。与我分到同一单位的有概率班的刘群生和函数论班的王昆明、温秉钧。我们四人于1965年4月20日离开北大，乘火车赴沈阳，我和刘群生中途在秦皇岛停留一天。4月22日，我们四人到沈阳东大营炮兵第三研究所报到，同分在高炮射击研究室。所领导介绍，这是一个从事炮兵射击学术研究的科研单位，为制定与优化兵力与火力运用方案、提高作战效能提供科学依据，并负责制定射击规则、编写射击教程、教范等。美军、苏军都有这样的科研机构。大数学家、概率论公理系统的创始人、苏联科学院院士柯尔莫哥洛夫在二次大战中曾涉足这一领域，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按照所里的安排，我们这些新入伍的大学生，第一年下放当兵，第二年到炮校学军事，第三年到高炮部队代职，第四年到前线实习。只有经过这四年的锻炼，才能正式进入科研工作。于是，我们四人报到后，在单位呆了一周时间，就打起行装南下，经大连、烟台，到青岛附近的胶县高炮部队下放当兵。在连队，我们与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同劳动，一起摸爬滚打。部队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单调的，对我们来说确是严峻的考验。但由于当时全国开展“四清”运动，我们在部队只呆了四个月，就奉命返回沈阳，参加“四清”工作队。我被分配在沈阳铸造厂搞“四清”，主要任务是配合一位老工人搞外调，走遍了东北三省。1966年6月，随着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发表，文化大革命全面铺开。于是我们又中断在工厂的“四清”运动，返回部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过我们是军队科研单位，在党委领导下搞运动，不准与地方串联。此后的四、五年时间里，我当过一段逍遥派，整天在宿舍里看英语课本，做线性代数习题；后来所里安排我外调，跟随一位党员调查一位老干部的历史问题，走遍了全国很多地方。

1970年军队科研单位进入整改阶段，炮兵第三研究所与第二研究所合并，在北京组建炮兵技术研究所。当年年底，我离开沈阳东大营，来到北京安外北苑。我开始从事的科研工作，主要有编写民兵对空射击教程和各种高炮兵器勤务教程，这些与我所学的专业相差甚远，但却涉及到很多机械、电子工程的知识，我坚持边干边学，努力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1973年，我承担了一项计算某高炮的毁伤概率的课题，这多少能与我所学的专业挂上钩。主要参考资料是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在中国授课的讲义。该讲义以二次大战的防空兵器为背景，以初等数学为理论工具，以手摇计算机为技术手段，给出了模型与算法。我仔细阅读这些讲义，发现很多内容已经过时，决心进行彻底改造。我和项目组同志以当时的先进防空武器为背景，以（晶体管）电子计算机为技术手段，运用高等数学主要是线性代数和矩阵论，建立了高炮射击效率评估的理论体系，推导了一整套毁伤概率的计算模型与算法，并在中科院计算所开发了软件，计算出大量有参考价值的数据，取得了好的效果。这些模型与算法一直沿用到现在。此后，我作为主笔人，以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撰写了一本八十万字的

---

《高炮射击理论》，先是油印散发，后来由解放军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深受军内外有关院校、科研单位青睐。我也因此应邀参加了1978年初召开的炮兵科学大会。

## 文革后的工作经历

文革后的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开始限定考生的年龄为35岁以下，后来放宽到40岁，我也符合报考条件，于是决定报考北大数学系概率统计专业研究生。从报考到考试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当时我手头还有几个课题急需完成，所以备考时间很少。考试结果，英语85分，分析74分，代数72分，政治60分；在1978年那个特定时期，我的成绩尚属前列，两门专业课总分名列同专业考生第一。这样，我被录取为北大数学系文革后首届研究生，导师是江泽培教授。与我同时考取北大数学系研究生的59级同学有徐明曜、雷功炎。

1978年10月入学，我再次来到燕园，住29楼312房间。按照导师的安排，我学习了泛函分析、随机过程、多维平稳过程和解析函数的边界性质、鞅论等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然后进入做论文阶段。在研究生学习中，做学位论文是核心内容，选论文题目是关键环节。在这方面，导师不能越俎代庖，全靠自己。这就需要阅读大量文献资料。我在选题过程中，也走过不少弯路，选的题目不是已经解决，就是无法解决。后来，我在美国著名数学刊物上看到一篇论文，是1964年麻省理工学院两位数学家写的，论文很长，有40余页。该论文研究平稳过程的马氏性，得到一个杰出的成果：一个正则平稳过程具有马氏性的充要条件是：它的谱密度的倒数是一个整函数在直线上的收缩。如何将这一结论推广到多维情形，这既是一个热门课题，又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因为，实函数、复函数的很多性质，无法照搬到矩阵的情形。我擅长矩阵论，决心试一试。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攻克了许多技术难点，终于得到一个正则满秩的多维平稳过程具有马氏性的充要条件，并给出了严密的证明。证明篇幅很长，写了一百多页稿纸。江先生认真审阅了我的论文初稿，结论是：第一，论文结果是新的，是别人所没有解决的；第二，论文推导是正确的，严格的。江先生告诉我：苏联一位著名概率统计学家两年前申明他已把美国数学家的上述成果推广到有限与无限维空间，但直到审阅我论文初稿的1981年初为止，还没有见到他发表证明。江先生充分肯定我所做的工作，认为取得了“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推荐到《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发表，并让我在昆明全国首届概率统计年会上报告。评卷专家、中国科大殷涌泉教授（他是文革后全国首批概率统计专业七位博导之一）认为：该论文难度很大，成果很有价值，达到博士学位水平。1981年10月，我研究生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

本来，我考研究生的初衷，是觉得原工作单位专业不对口，盼望研究生毕业后换个专业对口的单位。但后来我还是回到了原单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虽然是参加全国统考到北

---

大当研究生的，但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生杀大权”还掌握在原单位手中，而且总政规定，如业务不对口可在军内调配，但不准转业地方。于是，避免折腾，我还是返回炮兵研究所。

研究生毕业后，我在炮兵研究所主要从事建模与仿真研究，为武器装备发展论证提供先进的技术手段与工具。我主持开发了多个不同层次的作战效能仿真系统，为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发展规划计划论证和型号论证、技术改造论证、使用研究提供定量分析数据，为实现决策科学化作出了贡献，取得了效益。

1995年，我作为全军首批公派的高级访问学者到美国马里兰大学数学系进修，研究时间序列分析。在此期间，我研究了 Othant 概率的算法，写了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国内与国际刊物上。

2005年4月上级批准我退休。从1965年4月入伍到退休，我在炮兵研究所工作了整整四十年。

## 主要工作成果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军队科研单位，一直致力于射击理论研究、武器系统分析和建模与仿真技术研究，主持或参与完成了四十多项研究课题，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二项，军队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二项、二等奖七项、三等奖十三项，出版学术专著三部，在国内外、军内外刊物上发表各类学术论文六十余篇，1990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科技专家（军队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被解放军四总部授予“武器装备军内科研优秀科技工作者”。

1986年，我被任命为高级工程师（我们单位以工程技术人员为主，上级规定走工程技术系列）。先后受聘担任华东工学院（南京理工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炮兵指挥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担任研究生导师。曾担任总装科技委国防系统分析专业组成员、国家与全军科技奖励评委、军队技术职称评委，担任军事系统工程委员会、军事运筹学会、射击学会等学术团体的理事、常务理事、副主任委员和军事运筹与系统工程、射击学报等学术刊物的编委、副主编。

## 家庭简况

我的夫人是江苏省江阴县人，是我的高中同学，1982年随军迁来北京，做中学教师。我有两个儿子。长子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现在美国从医；次子毕业于厦门大学，现住北京，从事房地产开发。

---

# 水调歌头 (二首)

——纪念北大数力系 59 级同学入学 50 周年聚会

力学班 欧阳土中

—

平生常回首，  
燕园美景殊。  
博雅雄塔高矗，  
倩影未名湖。  
垂柳依依荡漾，  
芳草茵茵吐绿，  
风光绝佳处。(注 1)  
南北有二阁，  
天然入画图。

图书馆，  
临湖轩，  
先贤谱。  
书海遨游，  
知识圣殿享美誉。  
更有临湖轩馆，  
伴松偎竹扶花，  
依山傍水筑。  
蔡李毛马君，(注 2)  
学子皆仰慕。

---

—

北大胜景美，  
精神犹为殊。  
倡导民主科学，  
矢志开新路。  
坚持严谨治学，  
大胆拼搏创新，  
不畏求索苦。  
兼容和并包，  
开放又大度。

披肝胆，  
铸国魂，  
坚砥柱。  
莘莘学子，  
赫赫业绩耀寰宇。  
更怀满腔激情，  
高歌振兴中华，  
兴邦铺坦途。  
身为北大人，  
骄傲复鼓舞。

注 1：“一塔湖图”是燕园美景之诙谐概括。一塔即博雅塔，一湖即未名湖，一图即图书馆。而未名湖景区的湖光塔影是燕园诸景中最典型、最美丽和最具魅力者。在校期间，我常常至此游玩、读书和复习功课，总感觉时间过得飞快，以致流连忘返。有时我曾“痴思长绳系日”，幻想如令太阳停滞不动，让自己能尽情享受母校之丽景该多好啊！正所谓风光绝佳处，魂牵梦萦时。

注 2：在燕园松柏掩映处，坐落着蔡元培、李大钊、马寅初先生等先贤半身铜雕像。在北大图书馆南门入口大厅中，摆放着一尊青年毛泽东同志的半身铜雕像。这些学界泰斗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既为世人楷模，又永远令北大学子所敬仰。

---

# 北大毕业后的生活

力学班 裴楷华

## 前言

我于 1959 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专门化是固体力学。学号是 5901152。在校期间因病休学一年。1964 年复学后只上了一年多课，于 1965 年 9 月至 1966 年 3 月到河北省正定县完民庄公社搞四清。1966 年 3 月返校做毕业论文。可是 6 月份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一切生活、学习秩序被彻底打乱了。不久就开始了大字报、大辩论，整个社会处在“无政府”状态，北大更是如此。什么“飘派”、“零派”，两派争论不休。高音喇叭整天在那叫骂、互相指责，都说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都说自己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当权派，一直闹腾到 1968 年春天，我们 66 届毕业生才得以分配。我被分到北京市冶金局。报到后被分到下属单位——北京特殊钢厂，地址在石景山。

## 一、北京特殊钢厂

### 1. 车间劳动

1968 年 6 月我到厂报到，被分到拔丝车间劳动。当时社会还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专院校也纷纷外迁，我能在首都当一名“工人”，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因三班倒辛苦，有时休病假，可还是坚持上班，干了五年整！

### 2. 厂部自动化室

1973 年—1975 年我被分到厂部自动化室。当时正赶上清华大学茅於杭老师带领工农兵学员来厂实习，与我厂自动化室合作搞可控硅串机调速。我到清华自动化系听课，在茅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了可控硅串机调速技术，并全过程参与了室里自动化轧钢方案的设计与实施。

### 3. 厂部中心实验室

1975 年—1977 年又调入中心实验室。当时国际上推出了鉴定钢材质量又一新的指标，称为“断裂韧性”，用  $J_3$  表示。

---

(1) 我参加了钢院举办的“断裂韧性”学习班。在此期间我通读了“断裂韧性”教材。回厂后在实验室建立了  $J_3$  的测定。规范了从采样到公式计算得出最后结果的全部过程，供实验员执行。

(2) 测定各种特殊钢材中不同元素含量。开始是用光谱比较目视法，后来厂里引进日本造的直读光谱机。我全力投入研读随机器带来的技术资料（都是英文原版的），先学会机器的使用方法，再弄明白数学模型、机器使用的程序语言等。从资料上知道，元素含量与它激光后产生的亮度值是一元二次方程的曲线，故我用对数函数试了一下，得出的结果更精确，机器运算是用代码编的程序。

(3) 因工作需要我又转向某一特殊钢材同时含多种化学元素的测定。为此我自学了周华章编写的《数理统计与概率》一书。我研究了由最小二乘法引申出的多元逐步回归算法，用数学推导的方法从理论上证明了多元逐步回归计算公式的正确性。以 18CrMT 钢作为实例，用 A G O—60 语言编程序在 D J S—127 机上实现了。这一工作的总结报告“多元逐步回归算法在实例中的应用”一文发表在冶金局内部刊物《标准》1977 年 10 月刊上。

## 二、国土资源部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1978 年 4 月我调入地质部航空物探大队。这是一个野外地质队，原在北京郊区，文化大革命后期许多大专院校搬迁，当时的北京地质学院已迁往武汉。地质部借这一机会将该地质队搬入地质学院校园内，不久改名为中国矿产资源部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刚到新单位被分到“引进办公室”。当时“航遥中心”正准备引进美国 I<sup>2</sup>S 公司提供的 S 101 图像处理系统。全室人员都在做相关的技术准备。我给年轻人讲过“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程序设计”等课程。1980 年我还在二外学习英文口语一年。这段时间我在清华大学旁听，先后学了“图象处理”、“模式识别”、“语音识别”、“指纹识别”等课程。因为需要，还在清华计算机系学习了“操作系统”。这些学习给我今后编纂“遥感大辞典”作了良好的知识储备。

1982 年秋天，S101 系统到位。我参加了系统的安装、验收的全部工作。接下来我要读随机带来的大量相关技术资料。首先了解整个系统硬件的配置、软件结构。1983 年 S101 图像处理系统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运行，我主持室内操作人员编写了《IPOS/101 图像处理系统用户手册》，于 1984 年 7 月印刷出版。这时我室改名为“信息处理室”，我的具体工作是负责系统的日常维护，定期转储，清理内存，保证机器正常运行。1987 年我参加地质部组织编纂《遥感大辞典》的工作。这本大辞典对遥感科学技术涉及的学科领域和应用范围，即遥感基础、遥感技术和遥感应用，以及有关的交叉学科领域的约 5300 个常用名词做出简明

---

扼要的概念性阐述。这本辞典可供从事有关遥感科学技术的专业工作者、组织工作者和高等院校师生参考，也可供广大科技情报和翻译工作者、以及对遥感科学技术有兴趣的读者使用。在这本大辞典中“信息科学技术”和“数学基础”（包括计算数学，概率统计与误差）两大领域中我编写了诸如“系统分析”，“最优化原理”，“线性代数”，“协方差矩阵”等，约 140 条名词之解释。《遥感大辞典》由陈述鹏主编，1990 年 10 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7 年我被提为副高工。1994 年地质部有一个内部文件，规定有高级职称的女同志可以提前到五十岁退休，这一年的冬天我立刻办了退休手续，当时我不到五十三岁。

### 三、退休后的生活

1994 年春天有一位香港朋友在北京注册一家科技有限公司，出售美国西电的产品，有 Modem（调制解调器）、路由器等多种通讯设备。退休后我就到这一家公司上班，任副总经理。公司规模不大，约有二、三十人。总经理负责联系市场销售，我负责组织、调配技术人员给客户做技术培训、设备安装指导，也组织开办必要的技术讲座、学习班。另外我也监管公司财务。为了明白公司财务管理的学问，我还参加了一期海淀区办的“公司财务学习班”，负责职员每月工资、奖金发放的审核。虽然刚接触到西电产品时，我也是一窍不通，但我仍然是苦读相关的技术资料，再到应用现场观摩、体验，不久也就掌握了。那时公司的效益还不错，我干的也高兴。因为我不仅仅是多了一份工资收入，而且自己也有成就感。这项工作我一直干到 2000 年。

1998 年夏天我在海淀驾校学开车。用丰田轿车，按小时约车，大约学了约二十几个小时，考下了驾本，结业时我给校方交了一份建议书，其中包括一个按教练本人服务态度考核的一个收费公式，受到驾校领导的重视。

1994 年春天我有机会与几个朋友合伙在海淀区乡下买了九亩地，盖了八套房。我住其中一套，房子面积二百平米，前后院面积约四百多平米。1996 年秋天拿到钥匙。于是我利用工作之余开始忙于这套房子的建设。首先我主持了房内的装修，配置了家具。1997 年我开始做院内的绿化工作。现在我家前院窗前有各种颜色的月季，院内有紫薇，还有一个葡萄架。后院有一个紫藤架，有四块菜地。前后院共有树木三十多棵，其中有樱桃、柿子、枣、香椿等。靠院南侧还有一片竹林，这就是我们养老休闲的家园。

早在 1994 年我就接触了佛法。2000 年我与姐妹们到五台山居士林，在法师带领下正式皈依佛门，做了在家居士。故我看了大量有关佛法的书，也看了许多当代世界有名法师——净空法师讲佛说法的光盘。尤其自 2000 年以后我更是全神贯注地诵经念佛、研读佛法。净空法师在许多讲课当中都提到佛教是教育，他说：“佛教是大智大觉的教育，佛教是智慧觉

---

悟的教学。佛教的教学宗旨是在彻底破除迷信、启发正智、使人人能明辨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得失，进而建立理智、大觉、奋发、进取、乐观、向上的清净慈悲救世的人生宇宙观，达到解决众生一切苦难，获得圆满、真实、幸福的生活目标。因此，佛陀教育确是每个人都应当接受、应当依教奉行。”

佛教承认两件事：

(1) 人是遵循六道轮回的。单针对人而言，人有三世轮回，即前世、今生和来世。这一世人死了，只是由物质组成的肉身坏了，要甩掉。而人的神识（俗称灵魂）是不灭的。它要找一个新的载体为依托。这新载体怎样找？《玉历宝钞》一书上有记载。

(2) “因果规律”是宇宙间的法则。世间发生与人有关的事都受这一规律所制约。人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我们为人应该善良正直，要“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人既然是参与六道轮回，而神识又不灭，那么佛法教我们一个脱离轮回而灵魂永生的方法，那就是修行念佛，往生净土。这是简便而有效的，即用念佛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 结束语

毕业分配把我抛向普通民众企业，不是高科技单位，也不是大专院校，更不是国家保密科研单位，根本谈不上结合专业，这使我从刚入北大时那种对未来充满美妙幻想的心态中醒悟过来。文革的现实告诉我，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我要在现实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要因地制宜地发挥自己的才干；要尽最大努力把学习到的知识用到工作中，做好本职工作。就像前面提到的，无论接触到什么专业技术工作，我都会出色完成。这要归功于北大的教育培养。北大的学习给我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我走向工作岗位后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对于技术工作，碰到什么，学什么；学什么，会什么。

我热爱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她不仅是培养科学家的摇篮，也是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的圣地。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回想过去，特别是改革开放的 30 年，我感慨万千！回想起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高呼超英赶美，钢产量也只能是达到年产量 1070 万吨钢，而目前中国的工业如雨后的春笋，蓬勃发展。在众多企业吃不饱、工人下岗的状况下，去年我国钢产量已达到 5.2 亿吨，比美、日、俄的总和还多，这说明我国的改革开放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劳动生产力，使我国逐步走向繁荣富强。我深深地了解，祖国的富强渗透了多少北大学子的心血，我更加相信，在今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在实现繁荣、富强，自由、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北大学子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感谢北京大学，能考上北大，毕业于北大，这是我一生的荣幸。

2009 年 6 月

---

# 老天待我不薄，夫复何求？

数学一班 彭先度

## 北大

我在北大只呆了四年，没有多少骄傲和乐趣可言。但我忘不了北大，甚至还有魂牵梦萦牵肠挂肚的时候。

第一个使我永生不能忘怀北大是人是马寅初校长。

我第一次见到马校长是到小卖部买饭盆。那天午后不久，外面有人欢呼“有饭盆买了！”28斋出门就是小卖部，营业员正从黑色的乌龟壳骄车里往小卖部搬饭盆，小卖部年岁较长的营业员哈着腰在和一位矮胖的老人说话。轮到我买饭盆的时候，那位营业员进来问我们：“你们认得刚才那位（和我说话的）老大爷是谁吗？”没有人回答，但都表示了不认识。他告诉我们，那就是马校长，并且说要不是马校长，你们怎么买得到这样又好又便宜的大饭盆！当时我不以为然，但饭盆确实是好，厚厚的，很沉（重）。后来才知道那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物资极度匮乏之中。这个饭盆我用了三十年。北大四年，每天带着它穿梭于寝室一大膳厅一教室一图书馆一运动场之间。在劳改队磕磕碰碰一年，回长沙后用到1989年时，底部边缘有个锈点透了孔，我才小心包好收了起来。1994年第二次搬家后清点东西时，那只饭盆不见了，听到15岁的大儿子说他把那个“破盆”扔了，我顺手一记耳光把他打得翻过我的卧床摔到对面墙脚，两天后到医院才退下烧来。又是十年以后，他妈妈告诉我，从医院出来后，他们母子在废品店寻找了一星期，还是没有找到那个饭盆。

第二次见到马校长是在1959年除夕和1960年元旦交接时，马校长带着校领导和学生团拜。马校长不停地拱着手，不停地喊着“恭喜发财！”从主席台南边走到北边，又从北边走到南边。学生们愕然后鼓掌欢呼。

再见到马校长那是在批判和斗争他的大会上，大膳厅一次，办公楼小礼堂一次。舞台上的情形和我在中学时看到的斗右派的情形差不多，许多人围着他指手画脚甚至拉拉扯扯，同时大声吼叫。不同的是马校长不像大多数右派一样俯首帖耳一言不发，他挺着身昂着头挥动手臂予以辩驳。台下的情形和斗右派则大不相同，没有激奋热烈的情绪，只有无声的沉默。即使台上领着喊口号，应声者也是七零八落寥寥无几。台上斗他，人多势众，然而奈何不了他，有人示意把他拉下台了事，不料马校长神威大发，摔开拉架他的人群走到台前郑重宣布：“我的理论，经过严格科学论证，有理有据，你们批判我要拿出理论来，要拿出证据来！我

---

虽年近八旬，仍要单枪匹马和你们战到老死！”

老人从容走下北大舞台，稳步在历史舞台上更上一层楼。

这不是杖朝之驱，是战神！是智慧之神！

此后我再没有见过马校长，他的话却深深地烙进我的心灵。

对于老人家的“团团转综合平衡论”的宏观经济理论当时我就理解了，接受了，因为他已经战胜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谬论。

我在纪念马校长的文字中写过：马先生是同辈和几辈学者的万幸者，他看到了自己的胜利。

第二个使我永生不能忘怀北大是韩其昌先生。

进北大我就参加了武术队，武术队的指导老师韩其昌使我惊异不已：最高学府的讲坛上居然有个一字不识的文盲！

当时国家体委取消了拳击，提出武术向表演发展，北京体育学院武术系指导和训练我们正是这样做的。韩先生旗帜鲜明地反对，他说武术运动的精髓就是击技，没有精髓还有什么项目？看武术表演不如看京剧武打，看动作形体优美不如看舞蹈，武术能够存在就在于他的击技艺术，取消了击技就取消了武术，像拳击一样。我们当时热衷于学国家套路，尤其是健将级套路。韩先生给了我们致命一击：健将级刀枪剑棍拳五组套路，没有一个小节是他不能击破的。为了回击这个风气（路线和方向），他经常带我们到天安门、中山公园、北海、颐和园去表演，真拳真脚地实干，那时是没有皮手套的哦！我师从韩先生练了三年梅花拳，算是小成（大成十年），曾和七位师兄联手与韩先生进行过一次较量：八个人围攻韩先生，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八人全都趴下，两人贴了两个月的膏药，我的膝盖留下个分币大小的永久疤痕。当时韩先生六十八岁，我最小，二十二岁，燕师兄最大，二十四岁。后来，北京市公安局来抓我的时候，三个人中有一个是我的前辈师兄，他是韩先生在志诚中学时的弟子。武术有了散打比赛和擂台以后，前几名通常是韩先生的晚辈传人。武警部队成立，我的师弟、韩先生的儿子健中出任全国武警部队总教练。

韩其昌先生是梅花拳泰斗，武术作为中华文化瑰宝之一，他这个泰斗毫不逊色！我在北大的终生憾事之一，就是没有帮韩先生把他的学说整理成文字。

第三个使我永生不能忘怀北大是程庆民老师。

程庆民老师教我的解析几何时间不长，当时我就已经知道他之所以打成右派，是他不肯把自己的学生打成右派。

第四个使我永生不能忘怀北大是闵嗣鹤先生。

闵嗣鹤先生教我的时间最长，他在课堂上的声影至今历历在目，他推着前筐里装着蔬菜的破自行车的形象仍时常在我脑海浮现。

---

使我永生不能忘怀北大的还有我的许多同学。

徐明曜和我讨论过音乐，说我们湖南民歌喜欢用 6（低音），3（高音）和 4（中音）。我借过一套当时很时髦的毛选，上面的藏书人是徐明川，同学们说毛选是徐明曜的。徐明曜的自行车经常是我进城的脚力。

祝长忠、袁国兴和我排练过民乐合奏《春江花月夜》。

李福星看过我写的东西后笑着用他的客家音骂我：“KI KI GUI GUI GUO GA HUO”（奇奇怪怪的家伙）。

麦结华在双杠上练臂力。

陈华贤在寝室里背外语。

田自贤有机会就哼着他那独特的京剧。

小丁子指挥着唱歌。

腼腆的王理。

张扬的张克仁（大家叫她张克侠）……

1963 年暑假我去福建长乐慰藉没有兄弟姐妹的林世中的寡母，与陈秋农结伴南下，在他家里逗留两天。他领我游太湖，走到一尖角处，看着水天一色的茫茫湖面，我禁不住吟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没想到拐过尖角，一块硕大的湖边石上赫然刻着这一名句，我两大笑，前俯后仰。后来上面审我此行到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我没有说这个故事，但愿秋农没有受到牵连。

学生时代还有件事不能不讲，尽管它悲哀凄凉。

1960 年 10 月，全年级到十三陵理科新校址参加修筑铁路路基的大会战。我把《云雀之歌》的歌词改写成：“蓝天白云风和日暖，矫健（的）云雀高高飞翔，数一数（的）同学个个干劲大，（嘿）愉快地劳动纵情歌唱。”这几乎成了我们的班歌，清晨唱着她整队出发，摸黑唱着她收工回家。可谁也想不到祸从天降，胆小怕事身体虚弱的方肇满突然得了急病，校医草率地诊断为感冒，第二天晚上情况大变，好不容易才找到电话报告校医院，几个小时后校医赶到时，肇满已经死在我的怀里，整个胸腹成了硬邦邦的铁壳，他得的是急性肠梗阻。

1979 年秋北大给我平反，在学校见到徐明曜和田自贤，明曜留北大（当时不知他回北大的辛酸事）和自贤进部队我很高兴，尤其听说在广西的麦结华锋芒初露就锐气凌人，心里得到很大慰藉：总算还是有些结果。前不久通过明曜知道了还有百多位同系同年级的同学保持着联系，高兴的情态是几十年中不常有的，我祝贺同学们的成就，更敬佩同学们的坚韧。功炎同学的离去震动了我，遂决定参加大家的纪念活动。排除自卑自弃，大家搀扶着多活几年，借此机会祝福大家健康长寿，争取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进步。

1983 年 10 月，妻子带着 10 岁的小儿子到北师大探亲，我兴冲冲地领他们到北大，告

---

诉他们当年住在哪里，在哪里吃饭，在哪里看书，在哪里上课，在哪里锻炼身体。一到未名湖，儿子就兴奋地说：“我见过这里，在爸爸的照片里！”妻子说：“不要说是学校，就是公园也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他们还没有去别的地方）我们三人决定绕未名湖一周。走着走着，一个溜须拍马的外国人的墓碑挡在眼前，我大声问天：“这还是圣洁的未名湖吗？”妻子和儿子惊奇地望着我不明所以。其时，我对司徒雷登已经有了一些了解，我不得不坐下来平静一下自己的思绪：人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北大人文管北大事的时代中断三十年了，他还会回来吗？……良久以后我扫兴地说：“我们回去！”患难与共的妻子知道我生了极大的气，拉着儿子默默地跟着，不管儿子怎样地争辩，怎样地不愿。

## 反革命

1963年5月某晚，林世中和生物系的王萃文不知什么原因与我讨论起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们告诉我要想到外面世界去考察一番，看看人家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没有邀我，我有父母等着我抚养，有妹妹们等着我照顾，也从来没有过他们那种想法。期末考试结束后他们走了，没有和我道别。我决定南下林家抚慰一下林世中的母亲，我知道林世中从小死了父亲，是母亲守寡把他养大的。

8月底我回到北大，同学们的冷淡和回避使我知道他两出事了，很快又发现从早到晚都有人盯着我。我照样生活、学习、锻炼。国庆前夕，我从外语课堂上被带走投入不到两米宽的牢房，两隔壁从早到晚不断地响着铁链声。半年后让我写信回家我才知道那里叫北京市德胜门外功德林1号旁门。

我被审讯了两年，第一年是完全的单独隔离，从进去直到半年以后我才抛弃了重回北大的幻想。第二年进入大号，最多时到过八人，一般是四人上下，除偶尔有一两个“闲杂人等”，全部是知识分子政治犯。第一个能接触到的难友是北大地理系的常安之老师，坐牢八年他还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看到王富洲等从北坡登上珠峰的消息时，他不无惋惜地说：可惜我不在，不然可以搞清楚好多课题。

两年的时间要读好多书，要做好多事？而我只是等着提审，等着结果。以前没有时间想的问题在这里想了两年，两年真的把我这个学生审成了“反革命”。给我的定性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我承认反党，确切地说是反对当时的党中央，更具体地说是反对几个决定错误政策的人。我不承认反人民，坚称自己爱国爱人民。给我的定罪是反革命集团和造谣。我否认造谣，我讲的都是在1962年整社运动中看到和听农民说的，坚信农民说的是真的。他们有一个万能的致胜法宝：“你立场反动，所以一切都是错的。”

至此，我总算明白了“章罗联盟”、“彭黄张周”以至于“高饶”“胡风”是怎么回事。

---

## 文化革命

我这一生没有几件值得庆幸的事，文化革命遇到的第一件事却确实值得庆幸：1966年10月我被从黑龙江音河农场遣送回老家长沙，那是从劳改农场遣送回家的最后一批。

长沙车站一下车我就被几个红领巾围住了，一位小同学向我敬了个队礼问道：“大哥哥你怎么不带毛主席像？”我愣了一下很快用东北话答道：“我们那疙瘩还没有。”“那我送个给你，你可要天天戴好。”小同学边说边掏出一枚精致的毛泽东像章端端正正地别在我胸前。我看旁边遣送我的詹队长尴尬欲言又不能言的样子，连忙介绍说：“这位是我们领导，他也没有。”小同学迟疑了一下后还是送了一枚给他，也给他端端正正地别胸前。小同学们一走，詹队长高兴得跳了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真是谢谢你了，彭先度同志！”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长沙饭店煮饭。长沙饭店煮饭是两个编制，两班倒，有一个病倒了就不能工作了。吃饭的人天天增加，找了几个人都不能胜任，我妹妹的干爹叫我去帮忙。我跟了曹师傅一个上午班，他把煮饭的技术和自己的绝活在煮饭的过程中详详细细教给我，说到绝活处他还特别强调，不是事急决不会才见面就教我的。我机灵地说就做他的徒弟，他说就是徒弟也要三年慢慢教。他下班后看我单独操作了一个多钟头后，惊讶不已但是放心地走了。

我接手后，红卫兵串连已达到高潮，长沙饭店是当时长沙最大的饭店，离火车站只有50米，到这里吃饭的红卫兵每天排着长队。当时大饭店都是煤火大甑饭，每锅七八十斤米。煮饭的关键，一是做火，要确保那一甑饭一气呵成；二是撩米沥汤，早了蒸不熟，晚了一团糟，师傅的诀窍和后手都在这里，而且各有一套。红卫兵最高潮时我建议添一台灶，领导说编制没人批，我说一人管两灶，领导说曹师傅年岁比你大，又没有你舍得死，肯定不行的，我说可以统筹优化一下，领导听不懂，我解释说，把煮饭要做的事都列出来，排个最好的顺序，领导默想半天后大声说，你这小师傅真行，帮我过了个大难关，下次评劳模我提你的名。

红卫兵潮水来得快退得也快，不到一个月就冷了下来，饭店也停止了免费供应，所有职工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领导叫我到办公室说：小伙子干得不错，为文化大革命立了一功，临时工好办一点，我们算你做了三十天，发给你四十四块四毛钱。你填个表我们报上去给你转正，工钱不会有这么多，你放心，也不会让你从学徒干起。哪知我填的表把整个办公室人的脸都吓白了，大家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满心高兴的我一下就冷了半截。

我可能比同学们幸运，文革中没挨过打。前期他们互相争斗顾不上我，各派拥护的人我都不拥护、不参加。后期我也挨过批判，但批判我的主力都不同程度地靠我吃饭，事后有些人还要跟我说是被布置的。谁都知道我的脾气，主事的人也不敢轻易给我坐飞机挂牌子。

文革中我打过一架，那时正是立（抢）单车成风，几个人在水风井立我的车，他们当然

---

不是我的对手。

林彪事件发生后，派出所给我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我知道我的事，要他们拿依据拿文件出来，刚从47军转业的杨户籍说：你这样的人还要什么依据！要什么文件！莫须有的事情我已经历多次，像这样直截了当却是头回。

##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曾令我心潮澎湃彻夜难眠。

“先富起来”，“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不但认同，简直就是我所想。我丝毫不在意永远“没有正职的第一副”，放手实践着“伴随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的政治改革”。妻子从没有要我做过家务，正要辅导的儿子很少见到我的身影，连北大补发的毕业证和北师大颁发的硕士文凭都没有去领取。

但是，透明的注重实效的作风和曾经推广宣传的工作方式仅仅是昙花一现，碰不尽的钉子和穿不完的小鞋搞得我焦头烂额鼻青脸肿。曾经承诺过的越离越远，一再严禁过的愈演愈烈。我终于明白，我不属于官群，也不属于利类，更不属于集团。1987年下半年我选择了自由职业，1989年下半年我去了泰国，1994年母亲去世回到长沙。

1996年9月，高中同学40年聚会，有张姓同学告诉我：1984年我在长沙市环保所所长任上得罪了刘副市长，当时有个人到环保所报到，听说我要口试后不敢来了，这个人是刘副市长安排来的。我听后一拍大腿说：他怎么连话也不捎一句，我再清高也不会不食人间烟火！张姓同学淡淡地说：你应该知道的。刘副市长是我初中时很敬仰的教导主任。

## 母亲 妻子

我出事的时候，母亲是居委会主任。1963年底，长沙市东区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即将开始，给母亲准备的大红花、奖状和奖品放在主席台第一位。区长已经宣布大会开始，区委书记匆匆跑过来叫他暂停。区委书记把坐在前排的我的母亲叫了出来带到会场外面，向她传达了我的事情，宣布了他的决定。母亲没有倒下，忍住了眼泪，默默地离开。

无论是亲戚六眷还是左右邻居，没有一个说我母亲不好的人，在我的视野里，文化革命以前的街道主任，在文革中没有挨打，没有人上门找麻烦，母亲是仅有的。

我和妻子是个缘份。

妻子小我十岁，我们1968年结婚，已经四十二年了，期间我的身份不断变化：劳改释放犯—四类份子—国家干部—政府官员—自由职业者，她随我受过白眼，打过地铺，流过浪，

---

游过山水，出过国，始终是低不卑，高不傲，始终是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相濡以沫。

结婚前她们家开了个会，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居委会干部，她所在街道工厂厂长、副厂长，父母亲，姐姐和还不懂事的弟弟。她母亲是治安委员，姐姐是入党积极分子，她自己是厂政治宣传员。开会的人摆出许多男青年与我相比，说我不但一无是处，而且靠不住，很危险。这些人说了两三个钟头，她就是插口不开。大家逼着她表态，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她只好站起来说：“请你们说句公道话，你们说的这些人哪个受过正规训练？哪个走路的姿势有他好看？”众人瞠目结舌，哑口无言，不欢而散。

我戴上帽子以后她们家又开了个会，主题是坚决离婚。这次只有家里人，但有了充分的理由：母亲治安主任当不成了；姐姐的入党积极分子泡汤了。妻子把已经三岁的儿子往中间一站，指着自己的大了起来肚子说：“谁有这样聪明漂亮的儿子？我再生个这样聪明漂亮的女儿，谁比得上我？”（第二个还是个儿子）

当四类分子的第一次劳役是到派出所洗东西。我们一行八分子到了派出所，小坪里堆着要洗的东西。我看有些不对头，叫他们先把东西分开，一堆是棉被、棉褥、棉大衣，一堆是单制服、衬衣和便衣。我指着要洗的东西说：这堆是公用的，我们洗，那堆是私人的，我们不洗。洗完公共东西后我要大家回去，结果没人敢动，我走了。

四类分子最多的劳役是扫大街，差不多每次这样的劳役前，厂长（民众主任）先喊我去有事或加班，母亲和妻子总是加入扫大街行列顶替我做这种劳役。

良母贤妻得一即福，而我两福全得，老天待我不薄，夫复何求？

---

# 数字时代领头雁，蓦然回首写春秋

计算班 戚志峰

## 【本人按语】

这篇文章由作者王夏子于1999年采访本人后撰写，并编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世纪名流》一书中。

文章的脉络和人生经历的叙述基本属实，但有些描述实属文学渲染。望同学读者包涵。

戚志峰 2009年5月

古往今来，凡成就事业，对人类有作为的，无不是脚踏实地艰苦攀登的结果。

——钱三强

采访戚总归来，笔者就怎样写好这篇报告文学进行了多种角度的思索：首先从主题上讲，应该通过我国第一代计算机专家艰苦攀登不图名利默默奉献的史实描写，反映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科技工作者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崇高民族气节和献身精神；从写作手法上讲，应该以纪实的方式叙述的方式准确再现一个电脑工程师的历史风貌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对社会和人生的思索；从语言风格上，应该是平实、朴素、不夸张、不虚拟，力避浮躁的文字，这样才符合戚总真诚做人努力做事的性格特质。相反，这篇文章写得愈华美愈张扬愈是失败之作，这是与戚总精神世界唯真唯实的品质相关联的。戚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笔者见面之后心中就有了定格：他身材颀长，文质彬彬，语音平和，逻辑缜密，记忆力惊人，风格和风度都是那种老牌的历练深刻的大知识分子做派，庄重而平易，高贵而随和。仿佛在他的面前，一切假的丑的东西都不攻自破，一切金钱、名誉、地位的诱惑都显得苍白与虚无。但是，他谦逊，信任人，也让人信任他；他有资历，有本领，但绝不傲慢自得孤高和寡；他骨子里很浪漫，甚至很天真，但在工作与生活中有原则而又严谨，可以称之为理性的浪漫。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生总是把事业放在首位，工作兢兢业业，然后，才稍有自己的精神憩园，才有生活中的家庭……采访中，笔者很激动又很虔诚地倾听他的叙述，倾听新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专家的故事……

## 一、北大学子

---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1941年冬，在沦陷城市上海虹口，戚志峰裹着战争的硝烟呱呱坠地。戚父是一名建筑师，戚母是一名普通家庭妇女。在战争的环境里，戚家象千千万万沦为殖民地的家庭一样生活动荡不安。戚志峰从小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的戳杀与奴役以及国民党军阀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与疾苦，充满了对民族大敌的仇恨和对和平安宁幸福生活的向往，这种潜意识的东西埋在戚志峰幼小的心灵里，上学后，渐进发育为一种爱国主义精神，化着他为民族振兴为祖国强大奋发读书的动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因首都建设需要大量有经验的建筑师，戚父来到北京梁思成麾下，戚志峰随父迁居北京，后就读于皇城根小学和著名的教会学校——汇文中学。他秉赋聪颖，思维敏捷，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中小学阶段一直担任少先队大队长，高中则担任少先队辅导员。戚志峰回忆说：我们是在“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的歌声中长大的，是守望天安门、长在红旗下的最幸福的一代。那时，我的各门功课都很好，数、理、化中，我特别喜欢数学，顺着代数、三角、几何学的课程流淌，我感觉到了数学的一种韵律美。说实在的，因为职业关系，笔者采访过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但笔者是第一次听着戚总讲“数学美”这个概念。能在中学时代体味出数学韵律美的学生可能是凤毛麟角。因为大多数学生对数学恐怕是伤透了脑筋，即便是理科、工科类的高材生，虽然他们对数学充满了乐趣，但又有多少人能品味出数学的韵律美呢？这确实需要一种悟性，一种对数字和逻辑思维的悟性，然而与抽象思维几乎是不能同时发展的形象思维，戚志峰在青少年时代也特别发达。他喜欢地理学，想象的翅膀常常拍打于神秘的宇宙，飞驰于迷幻的星月之际，以至发展到在大学时代迷上天文学，研究天文现象，诸如红移现象、哈雷慧星轨道，或是用爱因斯坦相对论来认识宇宙。他是优秀的作文手，他激动地等待语文老师走进教室的那一刹那，因为他知道老师会在讲台上高声诵读他的作文，或是把他的作文当做范文发给同学们轮流传阅，这或许是一种幼稚的虚荣心，但笔者在这里只能理解为一种上进心，因为对于一个有很强虚荣心的人来说，他的功课是终将做不扎实的，只有时时处处有上进心的人，他的成绩才能永远保持优势。戚志峰在中小学及至后来在大学的成绩都是最堪优秀的。戚志峰谦虚地说：无论是在基础教育还是在高等教育中，取得理想的事业战绩，都不是自己有什么天才，应该感谢老师，老师如红烛一般的燃烧照亮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他记忆深处，小学时，有一位名叫周韵的上海语文教师，温柔美丽，学识丰富，非常地爱护学生，关心学生，在他的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真、善、美”的种子。另一位是他初三至高三的数学老师阎述诗（我国著名五四歌曲《五月的鲜花》曲作者），其人严谨公正、思维敏捷、才华横溢，上课板书整齐，讲课精彩畅达，是青年时代戚志峰心中的偶象。可以说戚志峰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都是阎述诗老师铸就的。

---

1959年，戚志峰高中毕业，班主任闽力援老师指导他这个数学尖子填报了国家保密专业——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经严格政审，这个品学双优的学生如愿以偿。读者不禁要问，计算数学何为保密专业？笔者可以“耸人听闻”地告诉大家，那是制造原子弹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专业，是为国防科学培养重点人才的特殊专业。戚志峰在北大计算数学专业攻读了五年半，由于家庭出身小资产阶级，属团结对象，没有受到所谓走“白专道路”的批判，没有受到强烈的政治思想改造的冲击，因此，戚志峰的大学时代是平静的，即便在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很多学生放弃学业，戚志峰却更加如饥似渴地读书，他除了认真学好专业课外，更多的时间把自己泡在图书馆里，沐浴在知识的海洋里，这使得他的学养深厚，视野高远。戚志峰说，他这一时期经常读俄文原著，还喜欢看《旅行家》、《知识就是力量》、《科学与生活》等俄文杂志，喜欢凡尔纳的科幻系列小说，并经常在《科学画报》和《知识就是力量》等书刊上发表科学小品文，也就是说戚志峰的大学生活充满了读书与创作的乐趣，并已初步掌握了探讨自然规律的科学方法，从读书向研究领域拓展……

## 二、核弹编程

1965年2月，戚志峰北大学成，被分配在中国国防科学的尖端部门——二机部九院九所。第九研究院院址在西宁，但九所亦即理论部设在北京，业内人士戏称研制原子弹的理论部为9的3次方，是极言它在核弹研究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与核心作用。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著名科学家周光召主持该部工作，戚志峰成了邓稼先、周光召的一卒一兵。戚志峰回忆说：能与当代杰出科学家在一起进行科学研究，受到他们严谨科研作风的熏陶，耳濡目染，耳提面命，真是一种造化。特别是刚出大学校门涉世之初能遇到这样好的导师，对人生的发展太重要了，从科学的研究方法上说，他们简直是交给了我一把通向科学殿堂的金钥匙。从人格力量方面论，他们崇高的民族气节、献身科学的精神正像秉烛夜行的烛光，照亮你在科学迷宫中前进的道路，使你在毕生的科学的研究中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能穿越未知的领域看到熹微的晨光。由于戚志峰有五年半的计算数学功底，在理论部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他像是一颗螺丝钉拧在当时中国唯一的一台大型计算机机体上，从事原子弹设计的科学计算工作。事实上，随着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核弹研究的重点是氢弹技术。氢弹与原子弹比较而言，其爆炸威力大、辐射小、比较干净。如果说原子弹的爆炸力是数万吨级的TNT当量的话，那么，氢弹的爆炸力则是百万吨级甚至是千

万吨级的，其数学物理模型也要用二维描述，也就是说，如果研制原子弹的计算量是N的话，那么氢弹则是N的平方。戚志峰将自己置于数字的海洋里，不分白天黑夜地演练计算。那时，中科院仅有一台超庞大物的计算机，机身有几间房子那么大，中央各部委数十家单位共用，第九核弹研究所的使用时间是半夜零点至清晨八点，计8个小时，而中央气象台紧随其后只能使用15分钟。戚志峰等一群科学家衣着便装，由解放军护卫，穿过现今的三环路，军车的响声正像战争的召唤，他们高昂起精神，投身到最神圣的岗位。京郊的深夜，万籁俱寂，而机房内正演绎着一首雄壮的“计算机交响乐”：那是在空调机发出的浑厚的低音背景下，不时响起的打印机的悦耳的高音。每晚，戚志峰是那样的专注，并为计算出预想的结果而兴奋不已。他渐渐成长为核弹编程的骨干，成为编程中不可缺少的骨干。1965年至1972年，是戚志峰23—30岁最堪宝贵的青春年华，尽管文化大革命烈火熊熊，但由于九所的特殊地位，



周总理下令保护所有专家不受批判，因此，九所在急剧动荡的文革岁月依然风平浪静。戚志峰等一群尖端人才才能在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中国国防科学的研究，他们没有把“为国争光”、“振兴中华”的口号喊得响遏行云，也没有“造原子弹不如卖鸡蛋”的种种埋怨，不图名，不图利，没有奖金，默默奉献，成就了中国国防在世界上堪称第三个核大国的伟业，为实现世界和平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赢得了时间。中华民族国防科学的军功章上凝着戚志峰的一份汗水与心血……

### 三、海洋石油普查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是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讽喻和嘲笑，也因此加剧国际政治和国内阶级斗争的紧张局势，整个中国的天空阴霾重重，风声鹤唳。中国首都北京又是这种紧张局势的策源地，一方面，就国防布署实行了紧急疏散，第九研究所疏散内迁，戚志峰本应下派到四川，但因妻子即将临盆，故改派到地质部，仍留北京；另一方面，在阶级斗争这种高压政治下，北京的知识分子多如牛毛，极不值钱。他们戏谑自嘲知识分子（臭老九）的价值比北京夏天的西红柿还便宜（当时北京夏天的西红柿一大筐一毛钱），可见在这样的情形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多么艰难。但戚志峰应该说还是比较幸运的，他来到地质部后，正值地质部提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与禁运的口号，并根据李四光地质力学原理全面开展中国海洋

---

石油资源的勘察。此时，需要一种测量海洋重力场的地球物理勘探仪器——海洋重力仪，这种高科技设备当时我国没有，出产国西德属于帝国主义阵营，自然不会卖给中国，为了完成海洋石油勘探这一神圣的政治任务，国家组织了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大学，地质部等高等学府和研究单位的专家教授进行研制，戚志峰担任海洋重力仪的数学模型及数据处理工作，是这项科技任务关键的工作岗位。值得特别阐述的，他的太太徐珍芳也和他战斗在同一岗位。徐珍芳祖籍浙江，由上海考入北大，与戚志峰属同一专业，系同班同学。那个时代，女子读书的少，考入大学的更少，而能考入北大计算数学专业的就更为珍贵。戚志峰能获得徐的爱情，并结为伉俪，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戚志峰在大学时代是多么的优秀。就是这样一双我国计算数学领域不可多得的人才，战斗在海洋重力仪的数据处理岗位，人们把他们俩的工作室戏称为“夫妻店”，当时这个地质部研究所搞计算机软件开发的就只有他们俩，也只数他们俩。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这双中国科技战线的同飞鸟贴着祖国东海、南海的波涛盘旋低飞，留下了一种美丽动人而又浪漫的回忆：

在南海北部湾，有一个小岛镶嵌在绿莹莹的万倾海涛之中，它就是美丽的涠洲岛。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某一天，落霞把涠洲岛染成金色，中国地质部科学考察团租乘粤海305号机动渔船在经过了诸多的海上颠簸后，平静地泊进了它的港湾。因海上条件艰苦，305号仓位狭小，又因考察工作的需要，多少个日日夜夜，戚志峰夫妇分居作业，戚志峰住进统仓，徐珍芳则住进船长室，好心的船长就这样让出铺位，也挤进统仓。现在终于到了涠洲岛，到了美丽的港湾——不也是爱情港湾吗？冬天的南方，海岛郁郁葱葱，他们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代，在南海的风轻轻地抚慰下，他们兴奋得像两个孩子，时而追风逐浪，时而安静地去捡拾那些五颜六色的贝壳，时而回味美丽的北大生活和初恋的情景。人只有到了极远去，到了天高海阔无涯的极限，人原本善良的天性才得以充分的表现。人在伟大无比的自然力面前，既渺小又快活。戚志峰夫妇走在涠洲岛金色的沙滩，溶进海荒沉醉的暮色，在海岛山坡的木屋里，夫妻聚首，该是一种多么值得，永久回味的人生天伦啊……

科学考察之苦，苦不堪言。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工作者都能带上自己的妻子，这是唯一的一次。更多的时间，从渤海、黄海、东海到南海，在1972年—1979年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徐女士又能有几次与戚志峰共同出海呢！另一方面，为研制海洋重力仪，为改进和提高海洋重力仪的测量精度，他必须随团年年出海，有时一年竟长达半年在海上漂流。遇到恶风险浪，那种彻脏彻腑的呕吐，遇到船舶剧烈颠簸，那种可能会与“死神”不期而遇的惊恐，该是多么地难耐与难熬啊！在琼州海峡，一次，台风骤至，船身左右颠簸达 $+45^{\circ}$ ，海浪峰谷高差五、六米，那一次戚志峰以为一定要葬身鱼腹。然而，即便在这种险情下，他们第一考虑的是海洋重力仪，他们把所有仪器牢牢平平地与船身捆绑在一起，闭着双眼，呼吸南天，等待着一分一秒。

---

这就是历史。历史给予了一批杰出科学家以存活并让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硕果累累。人们也许不知道，如今盛产油气的海上进台，如北部湾，珠江口，东海大陆架，渤海等处，都曾是戚志峰当年参与的地质部海洋石油资源勘察成果图上所圈点出来的。

## 四、编制国家长远软件发展规划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科学的春天姗姗来迟。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戚志峰这个六十年代中期北大计算数学专业的高材生从地质部来到北京市计算中心，回到他本专业的工作单位。虽然在地质部也是搞软件，但毕竟应用范围有限。北京市计算中心，是北京市科委下属的计算机应用单位，该中心主任吴文达是戚志峰北大时的老师，他对戚志峰的才华与人品均甚了解。戚志峰不负老师的殷切期望，组织和领导了计算中心的改革与发展，使北京市计算中心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当时，该中心以“北京国际经济合作中心”为名接受联合国开发署UNDP的无偿技术援助，进口一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电脑，这台电脑当时在国内自然是首屈一指，其功能多多，主要应用软件包有：科学计算、企业管理、数理统计、城市规划、医疗保健、建筑设计、情报检索等等。运用这台大型电脑，戚志峰组织了中央各部委科技情报部门20多个，开创性地开发了我国首个实时联机情报检查系统。为了创建我国软件产业，加速软件出口，国家科委、电子工业部、中科院和北京市科委组成了编制《国家长远软件发展规划(1985—2000)》专家小组，戚志峰作为北京市科委派出的专家参与了此项工作。这项科研成果后获国家科委颁发的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标志着戚志峰在软件管理领域亦取得了很高成就。

## 五、开发银行软件

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软件工程师，戚志峰在日新月异的数字时代追风逐浪。1988年因健康原因他摒弃北京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南下深圳拓荒，担任中国软件总公司深圳分公司总工程师。全面组织了机电一体化软件项目的开发利用，并参与了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的缔造工作，成为深圳市最具权威的资深高级软件工程师之一。

在中软深圳分公司，戚志峰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事业，受到公司员工的尊重，又因业务上的独占鳌头，使得公司的技术发展大有起色。但没有想到的是，客观上却

---

造成了公司领导层的不平衡。对戚志峰来说，除了计算数学，他是不会计算任何人的：读大学时，他两耳不闻窗外事；文革岁月他从不参与派性之争；粉碎“四人帮”后，他把目光聚焦在发展我国的软件事业上；来深圳后，看到与深圳一桥之隔的香港经济那般热气腾腾，他每一种思想都是围绕着国家的经济建设。从根本上说，他务实求真，无心沽名，更与权力和地位无争。而愈是这样，却树欲静而风不止。为了有一个安定的环境，1991年，戚志峰提出调离中软深圳分公司，与此同时，深圳市信息中心和香港中银集团深圳软件中心都请调和高薪聘请戚志峰主阵。

时年51岁的戚志峰选择了香港公司。中银深圳软件中心在国内外聘有一百多名软件工程师，专为香港中银集团开发软件，戚志峰担任管技术的副总，时值中银集团14家银行欲对银行软件更新换代开发，戚志峰肩上的担子又重又沉。于是，数年中他们在封闭的环境中开发和测试，为中银集团新一代银行软件系统开发和深港两地软件合作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5年，深圳率先在全国首家建立城市合作银行。次年，更名为市商业银行。该银行电脑部总经理的职位空缺，但任职条件要求很严格，年龄须在40岁以下，然而，戚志峰是年55岁，当他把他的简历交给商行人事处后，当日，人事处长邀请他共进晚餐，次日他面见商行王钦副行长后，王副行长特意通知他：明天早上上班。

就这样，王钦每日徒步到红荔路华新村商行上下班，却用自己的小车专门接送戚志峰上下班长达近一年之久，王钦的“伯乐”精神一时成为商行的美谈。

戚志峰在商行担任电脑部总经理的三年，是商行电子化项目建设从一张白纸到同业领先水平的三年。也是他在退休前为社会服务呕心沥血的三年。

为了使深商行这样一家小银行在我国金融业中有立足之地并得以发展，戚志峰强烈地意识到虽然在规模、资源、资金上无法同国有大银行匹敌，但恰恰可以利用先进科技手段实现这一点。他的这种科技意识得到了行领导的赞许，并给予项目资金、人才引进、后勤服务的充分保障。

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数十年计算机应用的经历，戚志峰胸有成竹地在一张白纸上绘上了该行电子化建设的三五年蓝图，并在数百人参加的建行以来第一次这样大规模的全行干部大会上宣讲长达两小时。

三年来，戚志峰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带领电脑部全体工程师将具有自己特色的同时达到同业领先水平的电子化建设项目一项一项地予以实现。在深商行建成自己的新的银行大厦的同时，也构筑了一座深商行的“数字银行大厦”。

这些电子化建设项目主要有：

1、以客户管理、大会计、综合柜员制为设计原则的，与国际同业做法接轨的银行综合业务处理系统；

2、率先在深圳银行业推出的、具有IC卡和磁卡复合功能的“万事顺”银行卡业

---

务系统；

3、实现了办公无纸化的全行办公自动化系统。

几年来，国内数十家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纷纷来商行观摩取经，尤其是电子化建设的经验。每当此时，戚志峰总是毫无保留地向对方传授经验，同时也谦虚地指出自己的不足。戚志峰的科技形象在城市商业银行同业中赢得美誉。他在深商行的建树更为他的人生晚霞抹上浓重的一笔。

## 结语

采访结束，我们深情地凝视戚志峰这位电脑专家、广东省机电专业高级工程师评委、深圳市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系专业委员会主任，这位60年代的北大学子，这位深圳商行电子化工程的奠基人，心中充满了无限敬意。半个世纪以来，他两袖清风，把青春岁月献给了祖国的科技事业，为中华民族的科技进步和经济振兴付出了自己的一份心力；如今，“花甲”已到，仍精神矍铄，激情满怀，他正在还将继续为深圳的软件事业作出贡献，尤其让人敬佩的是，数字时代的朝夕变化，知识经济的与日更新，这位计算机专家适应了变化发展的时代，其思维依然那么敏捷，记忆依然那般过人。他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儿女在美国和北京发展，而心态又尤为平和平静，这就是一位自然科学家真诚对待生活之必然。

谨祝戚总健康愉悦！

---

# 雨霖铃 北大入学五十周年有感

——和柳永同名词牌而填之

计算班 戚志峰

佼佼学子，踌躇满志，步入燕园。

朝夕未名湖边，书声朗朗，学问日添。

诗词联唱<sup>【1】</sup>高亢，快板<sup>【2】</sup>亦喧天。

更难忘，皇陵筑路，保尔柯察金重现。

校园往事如云烟，五十年，风雨艳阳天。

而今读书赏乐，游山川，宛若神仙。

定神思之，有幸北大“德”“赛”<sup>【3】</sup>良师，

谆谆教诲铭心间，受益实非浅。

注【1】贾作皆同学参加“毛主席诗词大联唱”。

【2】吴广茂、雷功炎、宋宝忠和戚志峰同学演出的歌唱二龙路人民公社大食堂的快板书。

【3】“民主”“科学”英文字首发音。

戚志峰拙笔于二〇〇九·四

# 我经历的阪神大地震

数学三班 戚宗信

我的回忆，是跟同学们讲一段故事。

## 突如其来的灾难



为宝钢投产新的热轧生产线作生产准备，1994年底我被宝钢派往日本神户三菱电机厂研修。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了有关情况，并提到神户5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地震，很安全，这无疑给了我们一颗定心丸。

1995年1月16日我们从东京乘新干线回到神户住

地，因一天劳累，大家较早睡了，第二天清晨我从厕所出来，刚躺下，忽然感到我睡的榻榻咪整个在翻动，碗橱倒下，碗跌落一地。我本能感到发生地震了，于是大叫“快跑！地震！”大家也很警醒，都冲了出去，跑到外面空地上。这时，住在同一公寓的日本居民也陆续跑了出来，躲在自家私家车里——这是一个流动房间，根据地震发展情况，再驶到安全地方。

不久，从私家车的收音机里传出一条消息：“1995年1月17日5时46分，位于日本国关西兵库县南部，距离神户二十三公里的淡路岛，发生了里氏7.2级的地震。其震源深度约十到二十公里。”

天快亮了，我围绕公寓兜了一圈，由于公寓是全水泥浇注，离震中心较远，没有受到破坏，但沿地基的周围出现了一圈裂缝，附近煤气管泄漏出刺鼻的气味，显然是煤气管破裂了。我们住的房门，关闭也有问题。好在没有人员受伤，我们逃过一劫。

为了防止厨房间煤气泄漏，我们第一时间关闭了厨房的煤气。不久，离住地附近不远的房屋失火。据说是因煤气泄漏，开灯时发生火花引燃煤气而失火。城市地震最怕煤气泄漏，引起熊熊大火。关东大地震95%的人就是死于地震后的市区火灾。我们又避免了一劫。

## 抱团过难关

---

地震当天，我们去三菱电机实习地，厂门紧闭，不能进厂，更谈不上与有关人员联系。电话中断，当时又没有现在流行的手机，我们和周围的日本居民也没有任何联系，我们这里成了一个孤岛，没有人与我们联系，我们也不能联系任何人。

考虑到马上会断水，目前能供我们几个人用水的储存器，只能是供我们平时个人洗澡时用的水池。将它灌满，仅作饮用水估计可用一周。为了节约水，洗脸水几个人同用一盆，留下来再用作冲马桶。

幸好没有断电。能供我们使用的炊具只有一个不大的电饭煲，煮饭、烧水、烧汤、炒菜都靠它。天不绝人，我们自带的一些大米、线粉、木耳还没有吃完。还可以维持几天。

地震后的余震强度也相当可观。为了防震，大家把啤酒瓶倒立在桌面上，一旦瓶倒，或跑出户外，或想法躲避。

神户电视台 24 小时不间断地播出地震变动的信息，一发生余震，就第一时间响应；同时也播放罹难和失踪者的姓名。随着时间推移，罹难者名单增多，失踪者减少。中国也有留学生遇难，电视屏幕也出现哀悼的现场。为了减轻对地震的恐惧感，电视也播放一些轻松愉快的节目。

宝钢和日本伊藤忠商社联系，要求保证我们在日学习人员的安全。他们通过山区从东京到了神户，找到了我们，并运来了一些食用罐头，这样，我们几个人在神户也过了一个还像样的中国春节。

地震期间，我们挤在一个房间，互相鼓励，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与地震中心的受害者相比，我们还是幸运者。

## 民间友好

地震第二天早上，我在一条街上走着，一个坐在十字路口日本人向我招手。

“你是中国人吗？”他问我。

“是。”我回答。

“你住在附近？”

“是。”

“你们几个人？”

我不理解他这样问我的意思，也看不出有什么恶意，也只好如实回答“七个”。

他转过身从椅子背后的盒子里拿出七盒弁当（盒饭），要我收下，我表示不要，但他执意要给我，我看他态度很诚恳，只好收下。七盒盒饭里没有菜，但米饭雪白，热喷喷的。

※ ※ ※ ※

---

地震后的冬天晚上，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一家食品小店的门口，有一口大圆柱形金属桶，大概在煮什么汤，蒸汽不断冒出，围着的几个人端着碗在喝。他们一看见我走过来。就端一碗热汤，示意要我喝一碗，我对他们讲“我是中国人”。他们一听我是中国人，更要我喝，我一边婉言拒绝：“我真诚感谢，今天晚上吃过饭了”，一边向他们鞠躬、退走，他们才作罢。

※ ※ ※ ※ ※

神户也有一条中华街，中国人在这里开店，在街的进口有几张桌子。上面有几部电话，主要是供异国他乡的中国人与家里通话，向家人报平安。我也试着去打电话，一个满口中国话的小姐，穿着也与中国人相同，对我表示欢迎，但每人只能打三分钟。这是我到日本后第一次与家里通话，三分钟的确太少了，时间到了，不好意思希望再打三分钟，小姐没有难为我，打完电话后，还送我一支圆珠笔，上面刻有：“祝你平安”。

※ ※ ※ ※ ※

地震过了近一周，三菱电机工作人员，和我们联系上了。他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问能不能洗一个澡。

几天后，一辆车把我们送到神户山区的一栋别墅里，据说是一个部长的私人住所。他们准备了一些日本料理，大家席地而坐，围在一个长条形矮桌，一边品尝一边交谈。不久，来了两位中国人，我们在异国他乡，一见到他们，感到十分亲切，虽是初次见面，也像老朋友一样。

别墅的洗澡间只能容纳一个人，我们轮流洗。全部洗完，花了不少时间。

晚上，我们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告别了主人，回到住地。

## 阪神地震

神户虽离震中心有一段距离，若你沿着大街走，也可以看到宽一、二十公分的裂缝，延长很远；有的高架也倒塌了。我想看看神户港的破坏情况，在一位日本老者指引下，沿着铁扶梯向下走去，转了几个弯，海水的击拍声把我引到码头边。这里鬼也没有一个，除了水冲击岸边声，死一般沉寂，码头边的石头已被翻转，海水不断冲刷，忽然一股恐惧的冷流，从头顶传到我脚跟，我赶紧沿着来的相反方向，快速离开这个不祥之地。

神户发生地震也波及大阪，所以叫阪神大地震，这是日本关东大地震之后 72 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也是日本战后 50 年来所遭遇的最大一场灾难，死亡达 5400 人。

这次地震发生后，日本自卫队反应迟钝，受到媒体批评。

神户地区长期没有发生过大地震，学者及政府错误判断日本关西地区不会发生大震，使

---

该地区的抗震设防工作滞后于城市建设，市民完全忘记了抗震贮备。政府部门也没有制订相应的救灾方案，致使震后救灾滞后、不协调，加大了震灾损失。震后对震灾的评估又过于保守，致使紧急对策反应过于迟缓，耽误抢救时机。震后五小时，政府对灾情仍无把握，认为仅死亡 300 人。整个救援工作指挥体系不协调，出现救贫物资供应混乱和火灾无法及时扑救等情况。大部分抢救工作是居民自救。

与此相比较，在我国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强度和范围远大于阪神地震，但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干部第一时间到灾区正确指挥；解放军第一时间到灾区抢救；灾区外的志愿者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使得整个救灾工作反应迅速、不留死角、有序进行，把地震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

## 再逃两劫

由于我们实习的场所受到破坏，暂时还不能恢复，在神户生活又得不到保证，日方决定将我们从神户经大阪移动到爱知县的稻泽（いなざわ）市。

三菱电机派了一辆豪华大客车，并配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当快要上高速公路时，从卫星通讯传来消息，百多辆车首尾相撞。因此我们车只好绕道山区行驶。

中午，山区开始下起大雪。不久，沿途山路的前、后、左、右都覆盖了厚厚一层毛绒绒的鹅毛白雪，除了山坡上有时可看见被雪压弯的树枝顽强地伸出头来频频向我们点头外，一片白茫茫。车进入了雪的世界。

傍晚，我们还是顺利地到了中转地——大阪。第二天，从电视里看到，在我们经过的山区已是大雪封山，几百辆车被困，动弹不得。

## 稻泽市的风景线

我们的新家是稻泽市三菱电机升降机研修中心的职工宿舍，房间除了一张矮方桌、一台空调外，几乎一无所有。但其他外围设备还不错，洗澡、洗衣、烘干都方便。吃饭方式类似在北京聚会时的自助餐。楼下有一间教室，供我们随时使用。我们自学为主，日本技术人员不定期来对学习资料进行说明和答疑。

稻泽是一个小城市，没有公共汽车，进出、买东西，当地居民都驾驶私家车。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祭奠活动——“国府神宫裸祭”，却是全日本的一个风景线。

国府神宫裸祭是日本爱知尾张地区非常重要的传统祭奠活动，每年旧历正月十三举行，据传起源可追溯到奈良时代，距今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祈祷国泰民安的神事。



整个“傩追神事（即裸祭）”的高潮是这样：二十岁到六十岁左右年龄不等的成年男子，除了在隐私处包上一块白色的、薄薄的棉布以外，身体的其它部份全都裸露在外。因为裸祭日是每年旧历正月十三，正是年初最冷的季节，所以光着身子的男

人们在出发前都要先吃饱喝足，更要喝很多的日本清酒和甜酒姜汤，直喝到整个身体发红发热，随着一声急过一声的口哨声，热血沸腾的裸男们便齐心协力地扛起“傩追竹”，浩浩荡荡地开始向国府宫神社进发。一路上，裸男们排山倒海的“WASYO—WASYO—”的吼声，透着一股强烈的不可抗拒的阳刚之气。

众裸男扛着“傩追竹”到达国府宫之后，“神男”出现成为神事高潮的兴奋点。为了能触摸到“神男”，让“神男”将一年的厄运带走，裸男们个个争先恐后，甚至不惜挤到头破血流，打架斗殴事件也偶有发生。在神男出现时，有手持水桶的“水桶队”同时登场，为众裸男泼水洗礼。

旧历正月十三日这一天，我们到国府宫神社，目睹了这一祭奠活动，不过这次活动有它的特定内容，那就是对罹难者的哀悼和重建阪神的决心。裸男们簇拥着松枝编织的架子和彩



旗，浩浩荡荡吼着涌向神社，到了神社，开始泼水洗礼。由于天冷，也有人倒地或退出。。

【注】① “傩（nuó）追”一词，在日文中为“驱赶灾难厄运”之意。

②“神男”也称“傩追人”，是傩追神事的核心人物，由志愿者报名，再用抽签的方法选出，一般以在家中挑起大梁的中年男子居多。

## 排除困难

由于我们的实习基地神户三菱电机设备基本恢复，有了上机操作的条件，我们回到了神户，安排的住地是一家宾馆。地震前这是一家十分雅致、豪华的宾馆，现在被地震破坏得面目全非。我们住的建筑物是一栋二层楼，孤立在房屋倒塌后留下的碎石瓦砾中。我们的宿舍门直通外界道路，无人看管。这里也无食堂，但可洗澡。外墙有的已震脱，楼房裂缝从屋顶延深到楼底，从裂缝可直望蓝天。宾馆用泥土把裂缝填满，外面涂上一层涂料，欺骗了眼睛，

---

减少了恐惧感。负责安排我们生活的三菱工作人员解释，这栋楼经专家看过，可以住。另外找房很困难，但这很难消除我们的不安全感。

当时的客观环境，促使我们一定要克服当前的居住困难。首先，根据地震规律，时间过了三个月，当地不会再有更大的地震，也不大可能有更强的余震。其次，这次地震使三万多人受伤，几十万人无家可归，受灾人口达 140 万人，被毁坏房屋超过 10 万栋，找住房的确很困难。最后，这个地方离实习地点还是较近，坐一路公交车即可到达。更重要的是因地震耽搁了不少实习时间，应加快追赶回来。话虽如此，开始住在这里，还是要有点勇气，并要冒一点风险。

至此，我们结束了因地震带来的流动的生活，安心而紧张地投入实习培训。

我经历阪神大地震的故事到此讲完了，祝同学们健康、长寿！

---

# 回忆恩师廖山涛先生

数学二班 唐 云

我认得廖山涛先生是从 1963 年大学高年级选择专门化开始的。当听到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介绍“拓扑学”方向时，我感到里面可能蕴含着一门大的学问，就这样，我便成了他的学生。三十多年来，他的教诲和风范影响着我的人生命运。

一开始是听他的“同伦论”课。他那工整的板书、严谨的推导，不放过任何点滴的细节，讲课中还穿插着丰富的背景知识和直观解释，这些都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我有时也查阅别的参考书，发觉这都是多余的，因为他给出的叙述和证明总是最简练，而又最有说服力的。他给出的“同伦论”课堂笔记我至今还珍藏着，尽管后来在刘旺金的协助下已由北大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大学的最后阶段是做毕业论文，我正好由廖山涛指导。他指导我读斯蒂诺德（N. Steenrod）的那本《纤维丛拓扑》书及一些文献，约好每周去他家一次请教。他很健谈，在课题之外常谈些对数学发展的看法。他的博大精深的观点引起了我对数学哲学的浓厚兴趣。

廖先生当时住在蔚秀园的一间普通的平房里，一张陈旧的方桌和两把木椅便是屋里仅有的家具。冬天添一炉火，但并不热，每次我去他家都得穿厚一些。他的桌上经常放着一本翻旧了的涅梅茨基与斯捷巴诺夫的《微分方程定性论》下册书。当时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看那本与他所从事的代数拓扑领域似乎不相关的著作，后来才知道他这是在创立微分动力学理论的新体系。

上世纪 60 年代是一个畸形的时代，在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下，搞业务常是被怀疑成要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而受到指责、批判、甚至处分，弄得人人自危。只有走进廖先生的寓所，我才感觉像到了“世外桃源”，因为廖先生从不过问政治，政治似乎也无暇过问他。同他可以无话不谈，他决不会同你说教，做“思想工作”，更不会给你“汇报”。毕业后，我们那一届代数拓扑班的同学几乎都分配到中学教书，或去农场劳动，我的考研梦也彻底破灭，心里很苦恼。找到母校老师，一个个都劝我们要安心思想改造，唯有到廖先生那里，听了我的诉说后，什么“道理”都没讲，只是说“有时间多看看书，千万不要把业务荒废了”，而他的这句简短的话却成了我以后的精神支柱。文革中的我“逍遥”在派性之外而花大量时间钻研业务，并与一些搞业务的人来往，可说也与廖先生的影响分不开。

文革过后，百废待兴，我找到廖先生，希望继续“纤维丛拓扑”的研究，他立即回答，要舍得放弃，尽早进入国际最新领域，并谈了他自己放弃代数拓扑而从事微分动力系统研究

---

的体会，展示了该领域的发展前景。在他的指导下我读了亚伯拉罕（R. Abraham）等的《横截映射与流》一书及斯梅尔（S. Smale）1967 年的综述。尽管在 1978 年我报考廖山涛先生的研究生由于其他原因没有考成，后来北大举办微分动力学讨论班，在廖先生的关心下我还是被叫去参加，并报告了纳德茨基（Z. Nitecki）书中的一章。

在那个讨论班上谈到动力系统的发展时，丁同仁先生说“廖先生站在山顶，而我们都在山脚”，听到这话，我想我离山脚大概还有一段距离。但廖先生对我却很器重，他向我列举了国内有希望的十几个点，把我当时所在的北工大也列其中。廖先生是满怀热情要在我国开展微分动力系统方向研究的，并积极筹备后来称之为 DD4 的会议。会议期间我正在伯克利访问，他来信要我问一下斯梅尔参会的可能。我也曾找过，没安排成。

我出国攻读学位也与廖先生有关。那是在 1978 年底成都的数学年会上，我看望廖先生，记得那次刘应明也在场。廖先生勉励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出去看看，对将来的数学发展大有好处。此后我就愈加注意外语，终在 1980 年顺利通过英语而获此机会，廖先生并为我精心写了推荐信。在国外进修的那几年廖先生也经常给我来信，具体指导，并不时地把自己论文新著寄来。

我回国以后，特别是调清华以后，他把我当朋友看待，无话不谈，而且说我任何时候去找他都受欢迎，我想，这是一种师生情、忘年交。

这里谈几件事。

我想从国家说起。我从来没听到廖先生说过“爱国”两字，但他的一言一行又处处体现出民族自尊心。他是 50 年代初从美国回来的少数数学家之一，60 年代初又在我国首创微分动力学的研究，形成一套独特的、真正中国式的理论体系，论文也大多用中文发表。他从来不把外国人看得比中国人高，经常告诫我们不要迷信洋人。就本领域而言，他认为西方普遍采用的几何和泛函的方法有一弊端，就是在“细节”问题上会有差错，要我们读文献时特别小心。

这里我想谈谈作为微分动力学“基石”的封闭性引理。记得那是 70 年代后期在北大一次华裔教授报告会上，休息时看到他同那位教授交谈。会后我陪廖先生回家，第一次听到他向我介绍“ $C^1$  封闭性引理”：这个引理公认为是 1967 年由皮尤（C. Pugh）首先证得，但事实上证明是有问题的，他谈的就是这件事。廖先生跟我说，他早就看出皮尤证明中的问题，并且自己也给出了证明但没有发表。他等了十年没看到皮尤把证明“补全”，事实上按此思路是很难补全的。我当即希望他能把自己的证明发表出来。

廖先生的“ $C^1$  封闭性引理”论文后来是在北京大学报上发表的。在伯克利时我遇到皮尤说起此事，皮尤说他也特别注意到廖的这个工作，但看不懂中文，只能看英文摘要。其实有

---

不少外国数学家因看不懂中文而不能理解廖先生的工作。后来（80年代中）我曾同廖先生谈起能否把他的论文译成英文，因为外国人看不懂。廖竟说：“就让他们先学好中文再来看好了，既然中国人读外国文献要先学英文，外国人读中国人论文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们先学中文呢？”

那篇“ $C^1$ 封闭性引理”论文英文本是1996年出版他的英文专著时才附上的。原来在我协助编辑廖先生的中文专著时曾建议将此论文加上，他没答应，担心会冲散主题。后来他看到一些学者在谈到此引理时总是引用一大堆外国人名心里很不高兴，因而在出英文版时再三嘱咐要把这篇附上。

廖先生的中文版书是80年代末开始编的，在这以前我曾几次希望他能把自己的工作另整理成书以便大家系统学习，他总说不急。他认为他的那套方法能克服西方学者的某些弊端，因而待中国学者掌握了这套方法，就有可能在一些方面超过西方。

在他1997年去世前几年我向他谈到数学界受到的“SCI”风的冲击，并列举SCI的杂志种类，结果发现刊登他的那些获国际大奖论文的杂志大多不属此范围。他为国内数学刊物水平下降感到忧虑，曾设想在中国创办国际一流的数学刊物，邀请国内外数学家一起编。

有次我谈到有些院士应聘到外地工作，他有无此打算。他说他也收到些邀请，但他如去，就要给自己立下“规矩”，比如，若干年内在当地培养出国际一流的数学家。我饶有兴趣地问起他的培养方案，他说将从拓扑学作为起点尽早进入现代数学。我也向他探讨过能否在清华实现的问题，并就此向当时的系主任萧树铁反映，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廖山涛教授在其最后十年表现出对应用数学特别感兴趣，曾不只一次跟我说，如果他年轻二十岁就要改搞应用数学，因而是非常支持并鼓励我从事应用数学方面的研究的。每次我去看望，他都要问起这方面的进展，从化学反应器到生物医学中的凝血动力学，再到经济模型，直到大型旋转机械系统等，什么都问，包括一些细节。我也谈到搞应用数学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他总是鼓励我独立地做下去，不必有任何顾忌，要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根据他的建议，我们在清华大学开展了应用动力系统课题的研究，从选题、研究方法到发展方向，他都给予极大关注。

廖先生对国内数学界中偏重于理论的倾向是很有看法的，后期几乎不参加这方面的学术会议。而对应用方面的会议却十分关心，每次我参加这方面的会回来他都要详细询问。在他看来，21世纪的数学发展历程中应用将占愈来愈重要的比重，正是应用为数学的创新提供了最丰富的源泉。记得在1990年中国科大筹备非线性中心的前夕，廖先生忽然提出一定要去参加，要我帮着定票，因为我也参加那次会。我知道他身体不好，半开玩笑地说，请他路上放心，我们会一起“保驾护航”的（后因医生劝阻他没去成）。

我想，廖先生对应用数学的兴趣同湍流问题的研究有关。早在80年代初我在美国时他

---

就问起国外湍流问题方面的专著。后来听他说，有次在介绍自己工作时周培源曾跟他说：“你的阻碍集里边有湍流”，这大概是引起他兴趣的一个原因。当时钱学森在 710 所举办“大系统”方面的讲座，廖先生是积极参加的，并介绍我也去。后来我协助编廖先生的那本中文版专著时才开始比较仔细读他阻碍集方面的论文，并萌生用阻碍集研究湍流的想法，得到他的热情支持。廖先生对于混沌和湍流有一套独到的想法，他认为两者之间应当存在着一种相当的“过渡”。一谈起这种“过渡”他的精神就来了，只可惜当时我没能详细纪录下来。当时我想用阻碍集方法研究一类非双曲性混沌吸引子，这同斯梅尔提出的动力系统十大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有关。我提出一些算法在北大等地介绍，并让我的一名硕士生计算包括洛伦兹(E. Lorenz) 方程在内的一些系统的“局部阻碍集”。廖先生看到这些计算机图象时十分高兴，也想得很多。有一次还特地把我叫去，说我对流体和阻碍集都有些了解，因而建议我立一项目，题目就叫“阻碍集与湍流问题”。我担心这个题目太大，遂改为“与流的问题”，并希望他直接指导。后来（1996 年 9 月至 1997 年 3 月）我去美国访问，他还来信说“我们在北京所议之题目，待你归来后再议吧”。那期间我应邀到多处访问，通过讲自己的“阻碍集计算”课题介绍廖先生的工作，引起很大反响。一些西方学者听到廖先生有如此前瞻的想法很吃惊，纷纷要去订购刚出版的廖先生的英文版书来阅读，有的还建议“你这两年什么都别搞，就把廖山涛的理论搞上去，把中国的数学搞上去”。我回京时廖先生还在，我们对计划作了几次讨论，当时他显得很有信心，甚至想自己也学些电脑，没想到会走得那样早，待我那篇与他反复讨论过的“阻碍集计算”论文在《数学进展》上发表时，他已离开我们了。而第二年我申请的“阻碍集”面上项目未获准，这项工作也只得暂停。

廖先生一生著述甚多，对名利却十分淡泊。记得在 1986 年得知他荣获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时，我曾问起他到意大利领奖事，他竟说不想去，因为“浪费时间”（后大概在别人劝说下去了）。在他 70 岁寿辰前我曾提出想同他的学生一起举办学术研讨会，遭到他的反对（后来听说只在北大有次小型聚会）。他对有些人大搞寿庆活动是有看法的。他做得很多，但总不愿留下自己的名字。记得 1978 年底他推荐我看狄多纳 (J. Dieudonne) 的“现代纯粹数学动向”一文，里面谈到数学的主流与支流的关系，鼓励我翻译出来。他对译文作了大量修改，我说应写上同他合译，或至少应写上“廖山涛校”，他都拒绝（那篇译文当时只作为内部传阅，后来又有了别人的译本）。

廖先生总是把人家的事挂在心上，有一次我偶尔谈起詹汉生住院事，没想到当天下午他就拖着行动不便的身子去校医院看望。但他自己搞研究是经常不注意休息的，几次住院多要求早出来。他总是在不间断地思索，思索着数学的现在和未来，而把自己的许多事忘了。

廖先生对自己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甚至到苛求的地步。他有一笔科研经费，但从不看到他使用。他跟我说，他搞研究，每年就买些书，加上复印邮寄，用手头的这些工资就够了，

---

因而每次都自费，也不申请项目，尽管他要拿到项目是很容易的。他发表文章的版面费都自己掏，而稿费也多用来买书赠人。有次我谈到现在论文用计算机录入修改很方便，他很有兴趣，要帮着买一台只用于录入的低档电脑。我说这项按理可以出科研经费，想问一下北大系里，被他阻止，最终还是自费，不愿意花国家一点钱。他常说钱要化在最值当的地方。他曾对发展我国的基础教育事业十分关注，订阅了多份报纸，认为应当多投资。

我知道廖先生身体不好，每天用大量时间撰写和修改论文很费神，便提出想请我们那边的录入员帮他，边录入边修改，可加快速度，他最后也同意，但强调要自费。我已同录入员说好了，谁知这项计划还没开始他就离开了。现在廖先生留下大量珍贵的手稿有待整理，我也知道他生前曾有着许多想法和一套计划，这套计划只能等我们后人来完成了。

廖山涛教授是作为我国数学界的一代宗师离开我们的。他培养造就了一批很有数学功底的人才，他毕生追求数学的真谛，他的学术成就使外国人刮目相看。他关于数学的思想是超前的，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他就观察到数学的未来，日后才为人们所理解；他还有许多想法至今仍未被广泛理解或接受。廖先生是作为一名学者出现于世的，他的许多富有远见的思想的实现需要有个时间过程。

---

# 北大杂忆

数学二班 唐 云

## 一、报考北大

1959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前我是把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作为第一志愿填报的，这是出自两方面考虑：一是对数学的爱好，二是对北大的向往。

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奥数班”之类，但对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对数学的兴趣源自于一些数学题，初中的平面几何老师在讲课之余经常出些有趣的难题。课余时同学们常为解难题争论不休，谁要是做出就会受到老师的表扬。课上的题做完了，便课外找题，比着做。记得那时《数学通报》每一期后面都有些初等数学的难题征解，我就把那些看得懂的题写在小纸片上，空闲时便思索。后来发现，一些看不懂的数学词语正是高中数学要讲的内容。于是，高中入学不久便把哥哥姐姐留下的高中数学书大致自学了一遍。但这也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上数学课时反而不太认真，一看到那堂课的内容都懂了，便干别的事，甚至看起小说来。数学老师也很宽容，大概看到我作业和考试成绩还可以，便很少管我。高考前学校组织模拟考试，一次数学题目比较难，在500余名毕业生中很少有得满分。听到学校在广播里把我的名字列入得满分的学生名单中，我感到很兴奋。于是，在填报志愿时我便把“数学专业”填入第一志愿。其实数学只是我的兴趣之一，当初并不想一辈子搞数学。小时候喜读爱迪生发明之类的故事书，萌生过搞工程技术的愿望。后来听说工科对家庭出身等要求有许多限制，为“保险”起见便报了数学。

高中时的另一个爱好是看小说。当时班里要求每个同学都有社会工作，我分配做图书管理员，每个月到学校图书馆换取同学预约的书，看各类小说可说是近水楼台。一时期读到《约翰·克里斯朵夫》长篇小说，爱不释手，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这类书使我向往个性解放。语文课本中选的鲁迅文章多记不住，惟独对文中引用的裴多菲诗极为欣赏：“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中学时代我话不多，但遇到疑点就喜欢争论，总想弄个水落石出。1957年从报刊上读到北大的一些“右派”，如北大谭天荣等人的言论，我看不太懂，却对北大产生了某种神秘感。后来读《青春之歌》小说，许多细节忘了，但上世纪30年代北大的那种自由风气却给我留下了印象。于是，就把北大放在第一志愿。

---

## 二、北大校长

在 1959 年入北大时我们的校长是马寅初。至 1960 年 3 月马寅初被迫辞去校长职务，而由党委书记陆平兼任校长。此外，教过我们“高等代数”课的丁石孙老师后来（从 1984 至 1989 年）也成为北大校长。这里就谈对这三位校长的一些印象。其中陆平是我们大学时期的主要校长，他的理念和做法给我们这一届毕业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谈得也更多些。

### 1. 马寅初校长

早就听说马寅初很有名气，敢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令人敬仰。在 1959 年北大新生的入学典礼上终于见到了马寅初校长，并聆听到他的简短讲话。但到年底，北大就掀起了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高潮。

那时在我们每天路过的三角地一带贴满了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一些专业术语我不太懂，记得上面有说，马寅初不是马克思的马家，而是马尔萨斯的马家。还有一幅漫画，画着马寅初光膀子在淋浴，水滴上写着“批判”的字样。原来马寅初那时说，我这个人不管多冷的天都洗冷水澡，现在给我洗热水澡就更不在乎了。

马寅初曾表示愿就“人口论”问题公开辩论。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还说：“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记得我们参加了一次全校性的辩论会，是到小饭厅听实况转播，经济系的师生则同他面对面“辩论”。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我听了很新鲜，他的浓重的江浙口音北方同学听不懂，我还充当起“翻译”。但说是“辩论”，我听到几次都是没等马寅初把话讲完，便响起一阵批判声，像事先排演好一样，心里很不是滋味。

最后一次见到马寅初是在 1959 年除夕的团拜会上。当时“党的号召青年的心，提前跨进一九六零”的歌曲响彻北大校园。全校的师生聚集在大饭厅（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期待着 1960 年的到来。先是由马寅初校长讲话，记得他说了句“恭喜发财”之类的诙谐话后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便走下了台。我有一种不祥之兆。接着是党委书记陆平上台讲话，随着新年钟声响起，一群人便上台载歌载舞围着陆平转，开始跳起全校性的集体舞。跳的是龙舞，倒很简单，不管相识不相识，后面的人搭着前一个人的肩膀，踩着节奏跟着大家挥挥手就是，连我这个缺乏舞蹈细胞的人也能跟着充数。

1960 年春季学期开学不久，便听到学校宣布马寅初“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决定，由党委书记陆平兼任北大校长。但马寅初的那种维护学术独立的精神一直留在我心间。

### 2. 陆平校长

在北大生活期间的校长主要是陆平。但与其说他是校长，更多的是作为党委书记出现。因为他主要抓的不是业务发展方向，而是抓政治思想教育。除了听大会报告外，我没有直接

---

跟他接触过，这里谈一些陆平的印象及关于他的评价。

记得在 1960 年陆平校长上任不久，就开始“折腾”。先是全校性大扫除，为了应付评比，宿舍之间交换被子，调整书架，大搞形式主义；再是整整一个月到校内外参加“技术革命”运动，劳民伤财；接着是一系列的政治学习。那个学期几乎没有学什么专业课。时不时听到陆平的报告，其内容多为“又红又专”，青年人的道德品质，及做好“接班人”之类。印象中他喜欢敲桌子，像是在训斥什么，再经过麦克风的放大有点烦人。

1960 年深秋，学校组织我们到十三陵工地参加筑铁路的修路劳动。每天早起晚归，有的同学路上走着就睡着了。那时“困难时期”已经开始，同学们多吃不饱饭，干的是挖土方重活，工地上还不停地鼓动竞赛。记得有次陆平来工地视察，大家被干部们领着齐声欢呼，我躲到一边。他走后不久，我年级就有个同学因忍不住长期饥饿，吃过多的柿子而不幸死去。

后来搞“劳逸结合”，政治活动少了。陆平的报告也比较强调“以教学为主”，大家能比较专心学点功课。

但从 1963 年进入高年级以后，开始在学生中搞“阶级斗争”，政治空气又紧张起来。搞了几个月的毕业“清理思想”后才分配。数学专业的毕业生大面积分配去教中学，我所在的代数拓扑班则几乎全去教中学。我们分配在北京市教育局的几个北大同学是到 1967 年底才去中学教书的。此前是到北京郊区参加劳动和“四清”，直到“文革”。

1966 年 6 月初“文革”开始时，我们在密云劳动工地听到了聂元梓等批判陆平等人的大字报广播，多感到幸灾乐祸。当时大家多把对北大的怨气发泄到陆平身上。回城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北大看大字报，这才知道，自从 1964 年“社教”工作队进驻北大后，陆平自身的日子也不好过。

关于陆平，有一件事要提一下。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我姐姐说起她在上海的业余英语班上认得了一位讲课的老教授，叫陈传方，是老北大的，陆平的同班同学。后来陈教授来北京中关村住儿子家时，我还去拜访过他。据陈讲，在他们班的同学中，当时在世的就剩下他和陆平两个人了，所以他每次来京总要同陆平见面叙旧。陈传方念书时在班里是管学习的（相当于学习委员）。我饶有兴趣问起陆平当年在北大时的学习情况。陈教授说，陆平的学习不好，热衷于搞政治。抗战开始时，陈随北大南迁到西南联大继续念书，直到毕业；而陆平没有去，留在北京搞他的政治。这样看来，陆平并没有拿到北大的毕业文凭。

还听说，陆平在大学时期一次交不出作业，便借陈传方做的作业抄了一遍，后来得到的分数反而比陈还高。为此，陈找到老师，老师只好说，因为陆平的字写得比你的端正，所以要高些。这虽只是陈教授闲谈中抖出的“笑料”，但也印证了人们对于陆平“不学无术”的评价。

陆平重用的干部也多不学无术。如聂元梓这类人就是陆平利用手中的资源调到北大来

---

的。没想到北大“社教”期间聂元梓又起来，以极左反对陆平的左，由此触发了文革，陆平被打倒。可说是陆平自己栽下的一颗“苦果”。当然，聂元梓后来也不得好下场。

据了解，我们入学时的数力系党总支书记刘沙也是由陆平带来的。刘沙是“高干的夫人”，“其实是小知识分子”（见[1]），但发现手下的人不听她的，都听“党内专家”林建祥的，就搞权力斗争。1959年她利用“反右倾”组织批判，把“所有科研方向的领导权都剥夺了”。“陆平要用他的一批人取代老的一批人。各个系情况不一样，多数系都有和数学系类似的情况”。刘沙在任时间不长，却开创了数力系“左”的先河。系党总支的这条“左”的路线通过年级党支部和辅导员，贯穿在我们近六年的大学生活中，摧残了不少人才。

同样是1959级，把北大与清华的毕业生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学校的反差。据了解（参[2]），清华大学的59级的毕业生中产生了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和吴官正）、三位部长和七位院士。而北大的59级就听说出了一个许智宏院士（生物系，曾于1999年任北大校长）。

北大在陆平任期内，通过左的基层路线不断打压学生，摧残人才，在全国高校中是出了名的。以数学系我们年级为例，我在“纪事”（即《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9级纪事》，见《纪念册》）中已提到，在1959年秋入学不久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时一些学生就挨整。此后一些同学或以“反革命”罪被捕，或以“思想反动”为名被开除。至1965年春季毕业时，还按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见[3]），搞清理思想，再次挫伤了一批学生。据统计，北大清理出来的“反动学生”在高校名列前茅，还记入档案欲使其终生不得翻身。虽然后来这些学生多已予甄别和“平反”，但他们宝贵的青春已一去不复返，留下的伤痕也难以磨灭。

而清华则不然。据我遇到一些老清华的同事说，他们当时也搞“清理”，但在批判的同时还搞“评功摆好”正面教育。这种“清理”实际是走过场，毕业前还把清理出来的材料当着本人面销毁，不记入档案，所以清华就没有反动学生。

应该说，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学校的学生在1959年入学时的高考成绩都差不多，所处的大环境（1959—1965）及地理位置也相同。两个学校的毕业生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反差，同北大的陆平校长和清华的蒋南翔校长的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密切相关。

陆平是在1957年10月“反右”期间从铁道部调到北大任党委书记的，在陆平任期北大的极左思潮愈演愈烈。我们知道，自1957年的“反右”起，中国的局势就不断向极左方向发展，至“文革”达到顶峰。这期间的北大成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而这又同陆平密切相关。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讲了。

而清华以培养人才为重，用原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的话说，当时“蒋南翔希望清华大学的院墙可以高一点，学校受到墙外政治风浪的影响少一点，学生们的学习环境安静一点。”清华的学生辅导员爱护青年学生，甚至与学生“一起住宿，一起吃饭”，对学生讨论的各种

---

问题“完全不设防”。

当然，笔者对蒋南翔的某些理念（如要培养“高官人才”）并不认同。但在爱护学生方面，蒋南翔比陆平要强得多。在清华，今天仍有不少毕业生对蒋南翔很怀念。北大则不然，我读到一篇北大校友的文章，说他“最遗憾的就是毕业证书上是陆平的名字，而不是马寅初的名字”。这种想法在我们那几届的北大毕业生中应该是普遍的。

关于北大 1959 级的学制，先说都是学六年，后来把数学等少数专业改为五年半。我认为这也与陆平喜欢“跟风”有关，而且这直接导致数学专业的毕业生大面积分配到中学。清华的 1959 级就都按原来的计划为六年，没有改。

原来在 1967 年，我们几个同学曾到燕东园拜访过数力系主任段学复老师。记得在陪段老师去系办公室的路上，我曾问起我们年级的学制和分配问题。据段学复老师说，那是在一次校务会上，陆平为贯彻“学制要缩短”的中央指示，提出要把数力系的学制由六年缩短成五年。当时段老师提出 59 级已按六年计划安排。于是，作为“过渡”，59 级便改为五年半。段学复还回忆，在校务会上他曾强调，数学专业的分配指标大多是安排在暑假的，担心寒假分不出去。而那次会上正好教育部长杨秀峰也在场，杨当即表示能够分配出去。原来教育部 1964 年中学口有大量空缺，于是 59 级数学专业毕业生就去填补空缺，大面积去教中学。

在 1967 年中，我们几个分在北京市教育局的北大同学，曾套上“革命造反队”的红卫兵袖章，闯进了教育部，以批判“修正主义分配路线”为名要弄清我们那届的毕业分配到底是怎么回事。分配处处长郭厚敦耐心地接待了我们，帮我们查阅了原始的分配档案，证实了采用教育部 1964 年的“剩余指标”一说。我们还走访过当时中科院数学所的负责人关肇直先生。据关讲，数学所原是留些指标给我们年级毕业生的。听一位朋友（按：指张饴慈的父亲）提起自己孩子毕业后去教中学的事后，他遇到杨秀峰，还提出想留一些北大毕业生到所里。但杨说，这批学生正在劳动锻炼，不能动。于是便取了下一届的北大毕业生。

文革之后，陆平和马寅初的问题都获得了平反。马寅初还被聘为北大的名誉校长，活到百岁高龄。现在，马寅初的铜像坐落在北大校园，而陆平的名字早已被人们淡忘了。

### 3. 丁石孙校长

丁石孙担任北大校长时我们已经毕业多年。在大学期间丁石孙老师教我们的“高等代数”课。他那清晰的思路、严谨的逻辑、简练的语言、声声入耳，句句抓住学生的心，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讲课似乎从不看讲稿，只看学生，以学生为主体。而作为一个学生，我感到每次听他的课就好像是一次享受。那时我们也听说他是被列为有“问题”的老师，提醒要注意，但这反增添了对他的几分尊重。

记得在 1980 年代后期，丁石孙已是北京大学校长，有次我去中关园教师楼看望一位老师，走错了楼层，开门的竟是丁校长。堂堂北大校长跟普通老师住在一起，没有一点特殊化，

---

是令人感动的。

2008年春节，我跟徐明曜同学一起去丁石孙老师家拜年，有幸能与之畅谈，并得到丁老师签署的《自述年谱》和《丁石孙：有话可说》两书。由于事先已读过他的“年谱”，有一些思想准备，那次谈话使我了解到更多的事情。对于2009年5月16日北大数力系59级入学50周年的纪念大会，我们原以为丁石孙校长由于身体缘故是不会来的。徐明曜说，丁老师表示一定要来参加。后来丁校长还在大会上讲了话，我们感到很受鼓舞。

在北大百年校庆时季羨林先生曾撰文，把蔡元培和丁石孙看成是“值得记住”的两位校长。我想，这两位校长管理北大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着兼容并包的精神。蔡元培校长时代的北大经历了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五四运动，丁石孙校长时代发生的事也将可能会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 三、学习生活

1959年9月到北大，也是我第一次到北方，一切都觉得新鲜。记得那年11月份就开始冰冻了。博雅塔附近的未名湖一带成了冰场，体育课也改上滑冰课。我们南方同学第一次尝到了滑冰的滋味。先是在湖畔换上冰鞋，一个同学站起来就是一个跟头。体育老师教我们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学会如何“摔跟头”。边滑边摔，慢慢地，我也能滑一段距离了。后来每到冬天，总找机会到未名湖的冰面上滑一阵子。同班的北方同学罗启成就成了我们的“教练”。罗启成后来不幸死于唐山地震，他在冰场上的那矫健的身姿至今还印在我脑海里。

夏天上游泳课是在红湖游泳池，但后来我们更多的是到颐和园昆明湖去游泳。在炎热的下午，常是约好几个同学从北大西校门出发，穿过海淀的田野，赶到颐和园知春亭附近。然后冒着满头大汗跳进昆明湖中，享受着湖水的清凉。一次，看到别人一个个游得很远，我也试着往佛香阁方向游去，谁知游了一大半就没有力气了。看着周围茫茫的水面，而岸上又没有人注视着我，心里不免慌了起来。最后还是勉强游到对岸，但再不敢去逞强了。

我们当年在北大学习住的宿舍是28斋，后来改成28楼。把书斋的斋改称楼，大概是為了迎合时代潮流的需要，但却失去了点学术殿堂的气息。新生报到时每人领到一张方凳，方凳有些陈旧，显然都是高年级同学留下来的。正是这张方凳伴随着我们度过了近六年的校园生活：在宿舍里自习要用，到室外参加小组会、到饭厅听报告、去看电影或演出，都得随身带着。那时候经常有小组政治学习，女生来到男生宿舍不带方凳，只好坐到床边。

在北大近六年的学习生活，包括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两个方面。

#### 1. 业务学习

数学专业的业务学习，在低年级主要是基础课学习；进入到高年级，继续补了些基础课，

---

但主要是专门化课学习。

北大数力系很重视低年级学生的基础课教学，派了最好的老师来讲。如一年级主讲数学分析课的是闵嗣鹤老师，主讲解析几何的是姜伯驹和程庆民老师。只是我们入学时正值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学习，搞极左的那一套，影响了正常的业务学习。

如1960年初大搞“教改”，为了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方针，把现行的许多数学教材扣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要编写一套“无产阶级”的教材。弄得老师也无所适从。如闵嗣鹤老师的讲课本来是很严谨的，注重内在的逻辑性。但在那次“教改”浪潮中就变得小心翼翼，据说曾因不愿意使用学生参与编写的“教材”也曾遭到过批判。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新编的教材还加进了不少“生产劳动”的内容。比如，还不知道微分方程是怎么回事，就在一开始引进一个机电模型，讲里面的微分方程数学理论。于是，为了弄清微分方程理论，我还去查了电机方面的书，结果越学越糊涂。由于都没有接触过这类实际课题，大家越学越没劲。

后来还用“大跃进”的方式搞突击学习俄语，要求在短时期内掌握俄文版《列宁主义万岁》中的单词语法。一些同学为此弄虚作假，影响很坏。

1960年在十三陵劳动时，大家吃不饱饭，只好拼命喝粥。不久，我发现有些同学“胖”起来了；后来，我自己也“胖”了起来，身上一按一个坑，原来是得了浮肿病。回到学校，增加了豆制品之类的供应，才好起来。到实行“劳逸结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才松一口气，可以坐下来看点书。

至1961年秋季进入大学三年级，学校贯彻以教学为主的原则，学习生活才开始走上正规。针对低年级教学的不正常情况，重新补基础课。前面提到丁石孙老师讲的高等代数课就是在此期间安排的。后来，丁老师的讲稿正式出版，我在给本科生讲课时还用过。又如方企勤老师讲的数学分析和习题，步步深入，那些习题后来也编成集出版了，其特点是不给答案。那时候教科书的习题都不给参考答案，老师们批改作业又十分认真，一些“细节”都不放过。所以我们常是被“逼”得花大量时间去认真完成作业，有时一天要花费十几个小时。每逢周末，眼看着中文和外语系的同学去看电影或跳舞，数学系同学一个个只得为解数学题躲在一边苦思冥想，这也是数学系的同学与其他许多系的不同之处。现在出版的许多数学教科书中的习题多给出答案，这样是省事了，但对于培养学生的刻苦钻研精神未必有利。

北大数学系的教学很注重“三基”训练，即加强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老师讲课时特别注重问题的总体思路和证明过程中的细节，而不是用“显然”、“易见”之类的字眼去代替，这使我们养成严谨思维的习惯，并打下良好的基础。当时开设的数学课程并不多，但却很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为我们进一步钻研打下了良好基础，使我们终生受益。老师们严谨认真的学风，也影响了我们的人生。几十年来的风雨历程中，我感觉到，

---

凡是北大数力系的校友，无论在什么岗位，多能挑起“大梁”。并不是学得多，而是通过扎实的基本功和自学，使我们具备较强的适应能力。我认为这种能力比学到的知识更加宝贵。

在北大的学习生活是紧张而愉快的。记得常是一早就去图书馆等着开门，放上书包占个座位，以便坐上一整天看书。吃饭时候便在饭厅里顺带阅读各系办的黑板报或墙报。我们开始时在大饭厅，后来到新饭厅，离海淀近。于是，常在午饭后从南门逛到海淀旧书店去看书，或寻找廉价的旧书。那时候有句笑话，说是手中的窝头，或身上的粥迹，便是出入北大校门的“校徽”。

我的专门化方向是代数拓扑，喜欢查阅相关的书籍，还去旁听有关课程。看到有些专业书是法语或德语本，便去自学这些外语。特别是进入高年级以后，开设了“讨论班”，每周一次，由学生轮着报告，其材料多很有趣。记得在姜伯驹老师的指导下，我就报告过的“曲面的拓扑学”和“实体空间与绝对收缩核”等专题，那些讲稿现在还留着，上面有老师端正的批语。几十年后，我也用这种方法指导学生，有效地提高了他们的业务水平和能力。

我在 1964 年秋本科最后一个学期的毕业论文由廖山涛先生指导，属于代数拓扑方向。那是对一年前国外的一个结果做点推广，至今还珍藏着。后来我评审过不少学位论文，觉得现在有许多硕士生，甚至博士生所做的工作，就学术水平而言，还不如我那篇本科论文。

此后一个很长时期，廖先生便成了我与北大联系的纽带。我在《回忆恩师廖山涛先生》一文中回顾了与廖先生的交往。廖先生在“文革”动乱中坚持数学前沿领域的研究。他在 1985 年获得的第三世界科学院科学奖，据说这是我国数学家首次拿到的国际大奖。当时北大曾热烈庆贺。但廖先生为人却极其低调，以至于在国内只有少数一些人知道，尽管他当年开拓的方向至今还在影响着国际数学界。

正如丁石孙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八十年》(参[4]) 中所说的，北大数学系具有优良的传统。几十年来，虽然历经风浪，但由于有像廖山涛等相当一批专家做中流砥柱，其数学水平(比如说，院士数) 在国内始终荣据榜首。

## 2. 政治学习

在北大近六年业务学习的同时，还充斥着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构成了那时特有的政治生活。在《纪念册》的“纪事”一文中我已对这些做了详细记录，还对大家关心的一些史实做点考证。从 1959 年秋入学时的“文件学习”到 1965 年春毕业时的“思想清理”，所有这些，都围绕着改造我们思想进行。这里主要谈一些个人在这方面的体会。

思想改造，又称“洗脑筋”，小时候听大人说起过。记得我父亲在被“改造”期间，家里就添置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著作，封皮上多印着“干部必读”字样。我虽喜读书，但对这类书多不感兴趣，仅读了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觉得有点意思。想不到在北大学习期间，这种“洗脑筋”也轮到自己头上了。

---

事情要从“入团”问题说起。在1959年9月的新生入学典礼上，学校领导说，现在你们已是国家仓库里的材料，通过大学的培养要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我听到后很兴奋，写信告知远方的亲友，同时勉励自己，决心改造思想，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实现自己想往的目标。开学后不久便递交了入团申请书。

其实在中学时代我对政治活动一贯表现得不积极，长期与团组织疏远。一个重要原因是与我的“家庭问题”有关。先是父亲的“历史问题”；至1958年，我姐姐又据说是由于“站错队”而被打成右派，遭到厄运。后来班里团干部向我伸出了热情之手。我想，从自己的前途出发，也得表现出“靠拢组织”的样子，便提出了入团申请。直到1980年以后才获知，我姐姐的“右派”帽子当时并没有得到校党委的批准；同时，我父亲的“历史问题”也获得了平反。白冤枉了二、三十年，但这已是后话。记得在大学期间，为了同家庭“划清界限”，我曾留心了解过父亲和姐姐到底有些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发现到有些材料确是冤枉的。但在北大一次思想汇报中我对家庭问题提出疑点后，马上就被扣上了与家庭“划不清界限”的帽子，要求“深刻检查”，所以就不敢再提了。

既然要争取入团，就得认真参加每次的政治学习，就得经常汇报自己的思想，就得虚心听取组织的批评帮助，就得接受组织一次次的考验。尽管直到大学毕业还入不了团，但大学几年我却充分尝到了这种“考验”的滋味。

在入北大不久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学习中号召大家“向党交心”。一些同学说出了自己对于“三面红旗”的想法，却引来猛烈的批判。接着是“红专辩论”，要求大家“引火烧身”。一些包括平时表现不错的团员干部，暴露了自己的思想，也被当作“白专”或“粉红专”的典型遭到没完没了的批判。对此类“引蛇出洞”我那时还不理解，只庆幸自己没有像他们那样“交心”，什么都“交”，躲过了这一关。

接着我们被要求制定“红专规划”。当时读了“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之类的书，里面把共产主义社会描述得像天堂一样美妙，还冠以“科学社会主义”之名，使人确信无疑。于是，我也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还读到一本《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书，里面讲了一个个学者如何通过思想改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后来到文革，他们大多遭了殃）。这些学者有许多是我知道并仰慕的，我便把他们作为制定自己“红专规划”的目标，希望也像他们一样，把入党作为我未来的归宿。

然而，在读到一篇关于“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文件后，我就犹豫了，因为对于“驯服”一词，心里实在感到别扭。我认为只有当牛做马的奴隶才谈得上“驯服”，现在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怎么还要遭受“驯服”呢？因此，每想到“驯服”两字，耳边就常响起中学时代我非常喜欢听的一首歌，那是由聂耳谱曲，田汉作词的《热血》：“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传遍了整个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的代价，甚至

---

我们的头颅……”。

那期间从报刊上我读到批判文艺评论家巴人的文章。巴人把人们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看成是共同的人性，认为古今中外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之所以会受到喜爱，正是因为描写了这种共性。而当时的许多批判文章则认为这都属于“资产阶级人性论”。对那些文章我看得很仔细，因为文中所涉的一些文学作品正是我曾经读过，并且极为欣赏的。我想，自己一定是受到“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毒害”太深，需要好好“改造”。于是便结合学习的《人的阶级性》等文件写了一篇思想汇报，试图用“阶级观念”来批判自己对于“驯服工具”提法的反感情绪。但那篇汇报始终不敢交给团组织，想起此前我们同学在“交心”后受到的批判，我担心汇报中提到的这种反感情绪一旦表露出来，可能会遭致更严厉的批判。如果再同“家庭根源”联系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期的运动和政治学习接连不断。有时我也感到很无聊，心里总惦记着要看点业务书。便在“毛著”或什么文件下面塞一本业务书，趁人不注意时看起来。但那时总心惊胆战，怕被发现后扣上“白专”的帽子，弄得很紧张。当时成天说要“又红又专”，批判走“白专道路”，但对“红专”和“白专”的界限谁也说不清。后来学校传达了《共青团在学校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纲要》（即“38条”），其中第16条讲到红专标准：“红首先是指的政治立场。红的初步要求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引导学生不断地进行世界观的改造，‘白’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据此，我认为我们的同学几乎都已达到“红专”的“初步要求”，剩下就是如何改造世界观问题。

如何改造世界观呢？记得大学入学时我们班里有个团员干部，出身好，每次“表决心”调子总很高，表示坚决要听党的话，党说干啥就干啥。年级辅导员也总表扬他对党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我曾一度把“听党的话跟党走”看成是改造世界观的必要途径。因而对那位团员干部，及其他一些表示要“跟党走”的先进分子都很崇敬，检查自己为什么没有这种感情，总不敢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请他们帮助自己找差距，并仿效他们的行为。但后来发现，那位团员干部在入党以后，却非常追求物质享受。回想起他当初坚定地表示过要“听党的话”，我感到很失望。因为那是在“困难时期”，党号召要“艰苦奋斗”，他却做不到。我认为一些工农出身的同学当初对共产党仅出于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世界观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造好。还看到其他一些团员干部也常言行不一致。接触中我感到他们的知识太贫乏，头脑简单，对遇到的一些新问题不懂得如何从理性上进行分析和处理。一开始我还以为年级辅导员的话就代表党。后来发现也不尽然，不然为什么还要对受到批判的同学进行甄别和道歉呢？于是我觉得不能什么都听领导干部的，对他们的话也得经过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才是。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利用当时“劳逸结合”的空闲时间有选择

---

性地读了一些书。

先是阅读了一些革命领袖人物青年时代的传记，如《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和《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等书。还读了一些列宁曾给予重视的一些著作，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别林斯基关于文艺批评的著作，以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从传记和回忆录中看到列宁年轻时候也很受这类作品影响。我注意到这些人青年时代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不畏强权。列宁把这些归为“民主主义者”，并谈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我认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要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也至少应当熟悉这种民主主义，并通过“革命的实践”，然后才能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而那些团员干部虽然出身好，但由于没有结果这个过程，头脑太简单。只知道听领导的，自己不懂得分析。

哲学被称为是世界观的学说。哲学课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讲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背”得好像还不错，但心里却提存有很多疑问。为了弄个究竟，我又读了其他一些哲学著作。先从《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文章入手，比较好懂，一些段落几能背出。但后来在读列宁的《哲学笔记》等著作时就不太好懂了，因为书中提到的哲学家和名词我多不熟悉。于是我又比较系统地读了《西方哲学史》等书籍。还结合自己的业务读了一些数学史等著作，写了一篇数学哲学方面的文章请孙小礼老师看，得到她的鼓励。

在“困难时期”提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班里添置了一套修鞋工具。我每次都去参加，很快学会了修鞋技巧。那时候劳动多，大家的鞋子很容易坏。我帮别人修，班里就让我负责“修鞋小组”。于是，在我的床底下就常堆满了一些待修的鞋。约好每周活动一次。开始还有几个人，后来就剩我一个在干。一些好心的同学说他们在“欺负老实人”，叫我要不要干了。但我把这看成是“革命实践”的一部分，没有想太多。直到进入专门化班的新寝室后，室友嫌那些鞋太臭，很有意见，才终止。

那时数力系团总支每周出版一次《插红旗》板报，我参与抄写和美化工作。有时任务紧，得干到深夜。特别碰上寒冬腊月和刮风下雨，比较艰苦。别人溜走了，最后又只剩我一人。于是，系团总支让我当“出版组组长”。后我提出自己连团员都不是，不合适，才换人。

但我心底还是想到要搞科学研究。当时开展“学雷锋”运动。在读《雷锋日记》的同时，我在阅读一些科学家的传记。雷锋固然值得学习，但我想，如果成天像雷锋那样做好人好事，随时检查自己的言行，哪有时间搞科研呢？1963年底，吴子牧在“关于世界观”的报告中说，“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必定是对人类前进抱有热心的人”。我觉得这不符合实际。据科学史记载，许多科学家的伟大发现正是躲避现实纷争而专心于一个领域后才取得的。这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又归结为政治与业务的矛盾，或者说“红专”问题。毛泽东还提到过“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可见无产阶级也是需要科学家的。但我觉得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很难会出历史上的那种大科学家，因为缺乏过去那种“个人奋斗”的动力和一个长期宁静的环境。我试

---

图探讨，在当时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到底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

1964年下半年开始学习“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我看这些条件都很高。比如第三条，必须是“无产阶级政治家”。我想，只有领导才称得上“政治家”，我这个人连一般干部都不想去当，怎么能成为“家”呢？但我既提出过入团申请，当然得表示要用“接班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但对这种“接班人”与科研的关系感到迷惘。

自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又开始讲“阶级斗争”。学校传达了“双十条”、“五反”和“四清”等文件。我曾以为，这种阶级斗争主要集中在农村和经济领域，与我们将来搞数学研究的关系不大。那期间学习“反修”文件，我觉得这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阶级斗争，离我们也比较远。没想到，后来这种阶级斗争会“斗”到我们自己的头上了。

先是组织参观“阶级斗争教育展览”，听忆苦思甜报告，讨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然后是谈体会，给自己提要求。为显示自己“靠拢组织”，得经常汇报自己的思想。在原来数二班时，每次向团干部汇报思想，谈学“毛著”和一些文件材料的心得体会，还能讲些心里话。但到专门化班后，感觉就不一样了，汇报自己的心得体会常被曲解，没明白我的意思，就被扣上帽子。“入团问题”成了我的一个负担。在北大我有一亲友（相当于我的表姐）。她当时是俄语系党总支的负责人，对我入团问题一直很关切，但我不便多解释。有次我说，像鲁迅那样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也不错。她立即帮我分析这种想法的错误，要我相信党。文革后她离开了北大，跟我说，想起文革中对程民德等教授的揪斗情景心里就受不了。

大学课程结束后，是毕业“清理思想”。先是学文件，听报告，然后是检查自己过去。最后还要给每个人“定性”，写“鉴定”，放进个人档案里。清理的范围很广，从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反修”文件学习、“困难时期”的牢骚，到日常言行，都得检查。

这使我心理紧张起来，因为家里人早就告诫过我，对于档案之类要特别小心。如果在里面放进了一些不明不白的东西，那将跟随一辈子，一遇到新的政治运动，就可能随时被“抖”出来，成为挨整的材料，会很倒霉的。我也看到一些人的凄惨命运。

我们代数拓扑班分成代数和拓扑两个组，每组十多个人，我在拓扑组。经轮流自我检查之后，进入揭批阶段。我发觉自己特别受注意，可能会成为组里的重点批判对象。但一时弄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开始时以为还是“红专问题”，因为我已报考了研究生，无非是可能会被扣上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帽子。但对这个问题我不担心，因为“白”应当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大学期间我说话做事总是比较谨慎的，抓不到辫子。于是我就挖“家庭根源”，批判自己从小受到家庭“唯有读书高”的影响，认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不用怕”，给自己戴上“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帽子，但过不了关。

经过一段反复才知道，原来是同下面要讲的徐明曜问题相关。

---

## 四、与徐明曜和麦结华同学的交往

徐明曜和麦结华读基础课时在数一班，跟我不同班。到1963年初分专门化时他们分别学代数和拓扑，与我同属代数拓扑班，我们才认得。他们的性格和爱好各异，但他们都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并且在后来的数学研究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次他们在回忆文章中都谈了自己毕业之后的一些情况。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与他们交往过程中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也算是对他们回忆文章的一点补充。

### 1. 与徐明曜的交往

先从徐明曜谈起。我这人不善交际，记得那是在1963年春季分班不久的一次晚饭后，徐明曜主动约我谈话时才开始了解他的。几句话就使我感到他这人非常有头脑，本想只谈一两个小时，结果一直谈到深夜。我发觉我们都喜欢读书，并且都有着自己的独立主见。徐明曜还提到组织过学习小组。我在二班时也有过类似想法，但没有实现。

徐明曜谈话中提到过狄德罗和卢梭等人的作品。我没有读过这些人的著作，只从《西方哲学史》中了解到一些大概。我知道这些人在马恩的一些经典著作中多有提起，因此对他们的作品是颇感兴趣的。那段时期我也有许多问题待澄清，如“人性论”，以及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等话题，很希望与别人讨论。而徐明曜也表示很愿意同我一起深入探讨，我感到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语言。

我与徐明曜的来往很快就被团干部注意到了。我觉得他们对徐明曜很有看法，说徐在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并提醒我注意不要受他的影响。于是，我注意每次把与徐明曜谈过的内容及时汇报，以免被抓住话柄，好在徐明曜也说他的一些想法都汇报过。实际上，“人性论”正是我那时候想与徐明曜一起从理论上进行批判的东西。那些年我也与别的同学（主要是老二班的）讨论过此类话题，但他们多不感兴趣。我把与徐明曜的每次谈话都看成是正常的思想交流，觉得没有什么可以保密的东西，因而并没有把团干部的话放在心上。

1963年暑假，原数一班的林世中和彭先度以“反革命”罪被公安局逮捕。我不认得林和彭，曾问起徐明曜，说同他们没有很多来往。后从团干部处也了解到，徐与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当时我想，林和彭是“政治问题”，属于“敌我矛盾”。而徐明曜只要与林彭事情没有牵连，其问题就不应属于政治问题，而只是个思想问题，或者说世界观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没什么了不起。但那期间徐明曜也被要求“检查”，我们的来往一度减少。直到年底，才听说徐明曜的问题已经在团员的组织生活会内部受到了严厉批判。

在1964年初的一次思想汇报中，团干部向我系统地讲述了徐明曜的几个方面的问题：（1）政治上拉拢人与组织搞对立；（2）思想上宣扬修正主义，满套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思想；（3）行动上搞“自由论坛”刊物；（4）根源上是受“家庭（父亲）对党的不满

---

及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影响”；（5）在改造思想上缺乏诚意。还要求我今后多依靠组织对徐明曜进行帮助，同时检查一下我自己。

我感到徐明曜的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至少我并没有被他“拉拢”，“搞对立”。实际上我与徐明曜的来往都及时汇报过，组织上是知道的。尽管我对那些团干部很有看法，但在那个时代，我们的命运都是被“组织”所掌控的，在团干部面前只得表现出谦卑的样子。

关于徐明曜的家庭，我曾问过，感觉很一般。那时候只要出身有点问题，就会同家庭联系起来，我是很有体会的。至于徐明曜搞的“论坛”，那是在数一班，我想大概就相当于“学习小组”之类的交流活动。回想起在1961、62年，搞“劳逸结合”，一些人贪图享乐、精神颓废；另一些人则思想活跃。我所在的数二班团组织就曾鼓励同学之间进行思想交流。记得我曾与当时的年级辅导员焦仲林提过成立“学习小组”事，被当作是一种“新生事物”得到过他的赞同。还同当时班的组织委员谈过具体方案，得到她的支持。只是后来没有实现。

从那次谈话中，我感到班团干部对于徐明曜本人，及与我的来往，有着过多的猜疑。当时已换了新的年级辅导员，我不认得。两天后我找到原来的辅导员焦仲林，跟他谈起了徐明曜的情况、我的看法，以及对班里团干部的意见，希望能得到他的理解，以帮助消除与团干部的隔阂。同时还汇报了那期间学“毛著”的体会，想听听他的意见。不料焦在听完我的长篇汇报后只讲了一句：要我加强“组织觉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组织觉悟”这个词，当时弄不清是什么意思。想起对“驯服工具”曾有的反感，我就没有再问下去。

1964年3月的一天我遇到徐明曜，他说他正在写一份向组织汇报的材料。两个月后，我读到了徐明曜的那份题为《我的自我批判》的思想汇报。材料很长，订成一本，有几万字，内容分九个部分：（1）立场问题；（2）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3）关于民主与自由；（4）关于独立思想、独立人格与党的领导；（5）对党的认识；（6）三面红旗、教育方针、教改；（7）“纯科学”；（8）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革命理想；（9）教训和今后方向。当时还没有写完，到六月份才补完。他要听听我的意见。我不记得提出过什么有价值的意见，只是觉得团干部说徐明曜“在改造思想上缺乏诚意”显然不合适。还觉得徐明曜在材料中把自己否定得太多了，通篇充满着自我检讨，给自己扣了不该扣的帽子。想起在1959年入学不久，我们有些同学正是在“向党交心”中被抓住辫子而遭到批判，我有一种不祥之兆。

那段时期正值“批修”高潮。结合文件学习，我还读一些马列经典。我觉得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指对马列主义的“修正”，而从接触中我发现徐明曜对马列经典并不熟悉，当然也谈不上“修正”，他的思想还只停留在“民主主义”阶段。其实“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早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的法国大革命中就已经提出来了，不是赫鲁晓夫提的。我在与团干部汇报时曾讨论过这类问题，发现他们全然不懂，有点像是在“对牛弹琴”。他们还不懂装懂，逻辑混乱，只会照着“上面”的指示扣帽子，拿不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徐明

---

曜不必去理会。一次徐明曜说，现在别人多躲开我，你还在跟我说话。我感到奇怪，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继续在讨论感兴趣的话题，比如“世界观”和人道主义方面。直到毕业前夕，看到“势头”不对，才知道要疏远。

在1965年初的毕业“思想清理”期间，徐明曜已被系里扣上了“反动学生”的帽子，在全年级受到公开批判。与徐明曜接触比较多的同学多受到牵连。

拓扑组就我与徐来往是最多的，因此也成了组里批判的重点，要交代同他的关系。于是我苦思冥想，花数天时间写了与徐明曜来往的近万字的“交代”材料。其实那些内容我大多已向组织汇报过，大概找不出什么能被抓住把柄的新东西。只是回忆过程很费脑筋。

但我的交代过不了关，对我的批判在不断“升温”。说我的“检查”避重就轻，没有认识到徐明曜的“反动”本质。在讨论到我的那份“鉴定”时，一次次通不过。我觉察到似乎总要在我的鉴定上扣上点什么帽子。如我曾流露出对基层干部的不满，便认为我“怀疑”党的领导，甚至要在我的“鉴定”中写上“与党抗争”等字样。实际上我主要是对专门化班的一些团员干部不满。在原二班时我与团组织还是很齐心的。为了澄清事实，我曾找到原数二班的组织委员（后来到年级党支部），请她帮我作证，介绍我那初的情况。同时提到我与徐明曜的来往经过，是光明磊落的，而且组织上都应该知道。后来又要给我扣上其他种种帽子，每次我都据理反驳。好在拓扑组风气还是比较正，个别人搞极左，大多数都基本保持沉默，也就是说，多数不表示赞同。最后就在给我的鉴定上写了“缺乏阶级斗争观念”等字样。我还写了一份申辩书，希望放进档案以防“后患”。

在全年级组织的批判中，对徐明曜扣了许多“反动”帽子，这些帽子放进了徐明曜的档案，使他后来遭受到的坎坷经历，已在他的回忆文章《走出北大校门以后》中谈到。那篇文章提到在照毕业照时班长叫他也去照，他还在担心自己能否毕业。其实我曾一直认为徐明曜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后来对他的大批判中我也听不出他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能与“反动”挂上。当时我还认为毛泽东“英明伟大”，只是由于基层组织不能深刻领会毛的关于要区分“两类矛盾”的教导。我相信其他许多同学（包括那位班长）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谁也不敢去充当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三岁小孩”。直到后来读到王学泰的文章[3]才知道，原来那次“清理思想”就是依据毛泽东在1963年的一份批示发动起来的。毛泽东认为，有些大学生向党“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份子”，于是有关部门便下发文件，要在大学生中清理出一批“反动学生”。大量的历史事实使我们一次次看清了毛泽东出尔反尔、口是心非的真面目。而那些“毛左”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无视历史事实。

最近在“数据光盘”中从徐明曜的个人文件夹里读到了他在1969年7月被“解放”时所在单位公布的结论：《徐明曜的综合材料》，才了解到徐明曜学生时代的“主要政治历史问

---

题”原来是：“（一）反对……毛主席……”等七条“罪状”。这七条中前面六条，如上所述，在当时我们许多同学就觉察到缺乏根据。只有第七条，“证据”就是徐明曜在1962年写的那份并未刊出的《“青年论坛”发刊词》。这次徐明曜把那份“发刊词”也放进了他的个人文件夹中。今天读起来，仍可以看到当年一个热血青年学生的独立思考精神，和一颗跳动着时代脉搏的心脏。即使是在那时，我觉得也难以扣上“反动”的罪名：“发刊词”中提到了当时“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既反对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有什么不对呢？当然，在那个言论受到严格控制的极左年代，真理是被某些人垄断的。他们要对“发刊词”中的一些词句加以联想，从而扣上“反动学生”的罪名，是容不得别人辩驳的。

我曾想，北大当局为什么要捏造这些“罪状”呢？对照一下文革前清理“反动学生”的几条定罪标准（见[3]，61页），就可以看到两者何其相似。显然，正为了给徐明曜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便按那些“标准”的需要拼凑出了莫须有的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近与徐明曜谈起这事，他回忆说，许多提法实际上是当时组织上要求他加上的。我想起当年情景，如果不给自己“上纲上线”，就不叫“深刻检查”，过不了关。一般青年学生多缺乏政治经验。那时我也是从亲友事例中才了解到，个人的档案里一旦放进了所谓的“污点”，便会像“紧箍咒”那样，永世不得翻身。所以在写毕业“鉴定”时对一些不实之词拒不认可，尽管被说成是“顽固不化”，但免遭此劫。

前面提过，北大自1964年进入“社教”后，以聂元梓为代表的极左势力反对陆平等人的左。在《徐明曜的综合材料》中说，当时属于系总支委员的年级政治辅导员和办公室主任曾找到北大党委副书记彭珮云，要给徐明曜“带上反动学生帽子”，并给以开除等处分，未获批准。从而说明徐明曜“被北大旧党委包庇”。可见这些领导同聂元梓一样，也是以极左反左。他们直接经管了我们毕业时的“思想清理”。受伤害者远不止徐明曜一人。我不知道他们后来的下落，更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忏悔。但我知道，当年搞“极左”的人，在失去其利用价值后，也大多被毛泽东的“红卫兵”或“工宣队”们一个个打倒，其下场不见得比我们最初挨过整的人要好多少。真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在经历过长时期的坎坷风雨之后，徐明曜于1978年通过报考研究生回到了北大，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硕士毕业后留在北大。1988年破格提为教授。

在徐明曜回到北大读研期间我们重新见面。以后，特别是1992年我调到清华以后，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近20多年来，由于徐明曜出面组织，使得我们大学时代的同学常能欢聚在北大校园。特别是，徐明曜作为主要负责人，在2009年成功地组织了有130多位校友及丁石孙等近20位老师参加的，数力系1959级同学入学50周年的庆典活动。

徐明曜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从事的研究领域属于代数，在有限群研究中他所取得的成果已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这只要通过美国数学会的MathSciNet网站，

---

查一下被《数学评论》收录的论文数和引用次数就可以做出评估。到目前为止，徐明曜被《数学评论》收录的论文数有 87 篇，被引用的次数达到 494 次。我还查阅了国内几位熟悉的代数学专家，从同行比较中看出徐明曜的研究成果也是非常突出的。

## 2. 与麦结华的交往

今天，国内从事拓扑动力系统理论研究的专家几乎都知道麦结华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但许多人对于麦结华在北大毕业前夕由于不公正的待遇而造成的坎坷的经历并不太熟悉。北大有着杰出的专家教授，而上世纪 60 年代极左的政治环境也摧残着人才。麦结华同学的遭遇就是一例。

麦结华原在数学一班，1963 年分专门化方向后我们一齐到了拓扑班，并且分在同一房间，与我上下铺。开始时只觉得此人很有个性，经过一段时期后才发现其才能非凡。那是一起听李同孚老师讲的代数拓扑“同调论”课。李同孚对学生要求很严，批评人不讲情面，还有些怪脾气，每次课前由课代表王则柯收作业交去，大家多不敢怠慢。而且李老师布置的习题往往很难，有时候我要花几个晚上才能做出一道。记得有一次课上李同孚却忽然对麦结华大加赞扬，说他不但做出了全部题，而且用了许多很巧妙的方法。对麦也另眼看待。至 1980 年我在北大徐明曜那里遇到了李同孚老师，李还说，当初他听到麦结华这样有才华的学生被开除后还跟系里吵过架，甚至表示过要“罢教”，以示抗议。

记得那时，麦结华给我看了一份他在业余完成的《棋的理论》论文。这篇文章仅从集合论出发，“赤手空拳”式地建立起了一套关于下棋的完整理论。我是很有兴趣地读完的，对他的才能佩服之至。听有专家说，他的那篇文章已涉及到“博弈论”中的核心理论。

麦结华宣布被“开除”事发生在 1964 年秋季，那时课已学完，正开始写毕业论文。一天下午，班里召集大家开会，系领导来到宣布了学校关于“开除”麦结华的决定。我听了感到非常突然，因为我知道这件事应该同他与同学发生的冲突有关，但那只能算是一些“小节”问题，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只要做些思想工作就是。那时期政治学习很多，动不动就是批判，严重的还会受处分，大家多提心吊胆。而麦结华似乎对政治学习没有兴趣，会上很少发言，我想是很难给他扣上政治方面帽子的。因此，听到这个决定后，我十分震惊。记得当晚就以“思想汇报”的形式找到团支部领导谈此事。那期间我也面临着被批判，主要问题无非是“缺乏阶级斗争观念”之类（后来这一条写进了我的“毕业鉴定”中）。谈话开始我还是像每次那样，先自我检讨一番，缺乏阶级斗争观念。然后说麦结华的被开除一定有什么“反动思想”，但我与他长期在一起一直没有觉察出来，因而产生出他不应该被开除的“错误”想法，请组织帮助我与他“划清界限”。那位领导提起麦结华画过的一张画。我想起在那年春天麦结华的确画过一张画，一个强壮的年轻人，光着膀子，伸手朝天欢呼的样子，地上有几根草，自题“春来了”。因为他当时身体魁梧，宿舍同学还开玩笑说这是麦的“自

---

画像”。后来那张画不知哪儿去了。到后来搞“思想清理”，一些同学在 1961 年前后“困难时期”发的牢骚都被抖了出来作为“攻击三面红旗”的材料批判，我想麦的画也许与此挂上了钩，便强调那是在 1964 年画的。领导说，麦结华在以前（一班时）就有“政治问题”，我不了解，不敢再问下去了。

麦结华回到桂平老家后，通过王理我们联系上了。当听到麦结华想继续他的数学研究时，我非常感动。麦说在当地看不到任何数学文献，希望订一份国外便宜一些的数学刊物。我便到王府井锡拉胡同的外文书店给他订了一份《瑞士数学通讯》(Comment. Math. Helv.) 季刊。其中有一篇依斯贝尔 (J. R. Isbell) 关于内射度量空间的文章，麦读后不久便做出了推广，打算与我联名发表。在 1980 年我去美国时把麦的这篇论文也带去了。依斯贝尔恰好就在我所在的那个系。我把麦的这篇论文改写成英文形式后给他看，他很快就写了个便条，称这是“一篇相当好的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依斯贝尔是该系的权威教授，但比较傲慢，很少说人好话。系里教授看到了他的那段评语后，建议我赶紧把那篇文章发出去，应该能够被接受。果然，此文不久便在 Proc AMS 上顺利发表。当时我的身份是博士生，那篇文章的发表很快引起系里教授们的注意。但我解释那项工作主要是我的同学麦结华做的，并趁机介绍了麦的才能。他们很重视，主动问我麦是否愿意来美国深造。后来麦结华担心语言等问题，此事只得作罢。

麦结华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从事他的数学研究的。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他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一次来信说，他找到一个体力活，虽然很费力，但卖力气干半个月就可以赚够一个月的伙食费，这样他便可以在另半个月专门研究数学，写论文。在广西劳动期间，麦结华写出了多篇数学论文。比如，一次他想读图论方面的书，我寄去了手头的一本，他立即着手研究著名的“四色问题”。不久，他寄来了厚厚的一本手稿。我请北京这方面的一位专家评阅，这位专家看后非常惊奇，认为麦结华独立提出的方法与国外近些年用“可约图”思路证明“四色问题”的主流非常吻合。

当时没有复印条件，但这位专家已把国外这方面的研究进展文献抄录了一厚本，我借来给麦结华寄去。麦据此又把其研究工作大大推进一步。本指望通过他们的合作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后来由于国外宣布已由计算机完成了“四色定理”的证明，此项工作才告段落。

1979 年，我每周去北大参加由丁同仁先生主持的微分动力系统讨论班，这是由廖山涛先生倡导的，每次张芷芬先生也来。我知道张先生曾是系里领导，在熟悉一段时期后，我找到她家里，介绍了麦结华被北大开除的遭遇。张先生很重视，详细询问了情况，说当时她不在学校，让我去同系里有关负责人进一步联系。我找到那位负责人，她当场要我写一份为麦结华申辩的材料，说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旁证材料。1980 年我去美国后，经过王理等人的多方面的努力，终于对麦结华当年的处理予以纠正，恢复了其在北大毕业的学籍。

---

麦结华在国内外发表过一百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获得过多项科技进步奖和荣誉称号。现在我们 59 级的同学几乎都已经退休了，但麦结华还在继续他的数学研究。他在 2011 年发表在国际著名刊物《拓扑学及其应用》上的一篇论文，在该刊物选出那期间发表的 25 篇最热论文中名列榜首。

#### 参考资料

1. 丁石孙，《自述年谱》，2007. 第 63 页。
2. [http://www.china.com.cn/culture/weekend/2009-05/11/content\\_17773704.htm](http://www.china.com.cn/culture/weekend/2009-05/11/content_17773704.htm)
3. 王学泰，《文革前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炎黄春秋》2009 年第 4 期 59—63 页。
4. 《丁石孙：有话可说》，2006. 第 187—204 页。

# 一个小小心愿

数学二班 汪进仁



从 1965 年 4 月下旬到 2000 年 9 月，我的教龄 35 年。前 15 年在上海市北虹中学任教，后 20 年任职于虹口区业余大学。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青年人要求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呼声与日俱增。1978 年 2 月，邓小平批准建立面向全国的广播电视台。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上海电视大学于 1978 年 4 月 25 日复校。恢复后的上海电视大学设数学、物理、化学、医学 4 个专业。1980 年 8 月，我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虹口业大。报到后即要求先到上海电大虹口工作站担任上海电大理科和中央电大工科两个专业的辅导工作。我和学员一起收看主讲老师的电视课，回家后精心组织材料，再到教室里上好辅导课。几年来，虽然工作紧张、繁忙，多次胃出血，但从未影响学员的学习。我圆满地完成了学校给我的教学任务。我的努力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在这几年的工作中，我很兴奋。好像又回到北大校园的学习生活，在重新学习着一门又一门的功课。我很激动，因为我有了一个把人民给我的知识还给人民的机会。

从 DOS 到 WINDOWS，从单机数据库到网络数据库，从 BASIC、PASCAL 到 ASP、VB.NET2003，随着知识更新的步伐，进入新世纪后业大、电大课程更新的速度也明显地加快了。当然，这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当班人是有利的。因为他们课堂上学到的，正是社会上所用的。退休后，我在虹口业大又度过了不寻常的七个春秋。领导信任我、敢于放手让我陆续担任了一些电大的新开课程（如数据库技术基础初级、数据库技术基础中级、Delphi 程序设计、VB.NET 程序设计基础、VB.NET 程序设计应用、面向.NET 的 WEB 应用程序设计等）的教学。

除了书本外，我的老师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正是这些编程实践带我走进了一个无比宽广的计算机世界。我为它付出过非常人所能比的大量心血，也从中品尝过多次失败的苦涩、更享受过成功时的无比欢乐。正是这些教学活动满足了我不懈地追求新知的愿望。我学到老教到老，教学相长，既学到了许多新知识，又为培养当班人发挥了余热，还了我为宏伟壮丽的计算机教学事业出一分绵薄之力的小小心愿。我真幸运！



42年，  
我已在教育  
岗位上尽我  
所能地献出  
了自己的全  
部智慧和力  
量。长江后

浪推前浪，世上后人超前人。如今，离开毕生钟爱的三尺讲台的我，特别羡慕那些年轻的同志们。我真诚地希望他们，珍爱拥有的美好年华，在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事业有成，茁壮成长。衷心地祝愿党的教育事业与时俱进、蓬勃发展！衷心地祝愿我亲爱的祖国日新月异、繁荣昌盛！

2008年12月12日

#### 附：为庆祝1990年国庆节所写的稿件

##### 为祖国的振兴出力

再过几天，就是10月1日了。全国人民正在以搞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来迎亚运，迎国庆。处处洋溢着一片节日的欢乐气氛。

在这欢乐气氛的感染下，我不禁想起了在北京——祖国的首都度过的那些美好岁月。那时，每年国庆节，我们都身穿节日盛装，高举彩旗和鲜花，伴着《歌唱祖国》的雄壮乐曲，昂首阔步地行进在宽广的长安街上。当我们走过天安门时，都不约而同地仰望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为祖国的辉煌成就，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为英明的领袖而欢呼！入夜，天安门广场上华灯齐放。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下的金水桥畔，载歌载舞，和领袖一起观看节日五彩缤纷的焰火。清晨到深夜，国庆节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欢乐，那么多的希望，还有那么多的责任……

我是1959年考进北京大学的。与我的同龄人相比，我是幸运的，但同时也该肩负起更大的历史责任。高二时，我母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大一时，父亲又去世了。我是靠人民助学金读完大学的。如果说我还有一点点知识的话，那全是党和人民给我的。因此，我要把自己的知识全部贡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时，我才九岁。我们这一代人长在红旗下，是和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如今，我们伟大的祖国已走过了41年的光辉历程。亲眼目睹祖国日益繁荣昌盛，我的心情十分激动。然而，回顾我大学毕业后25年以来做过的一切，却深感自己为祖国的振兴所出的力是太微薄了。我落在我周围的同志、我的同学、我的同龄人的后面，我深感惭愧。现在我所能做的是，把这种遗憾永远留给历史。到2000年，我还有10年工作时间。我要在这10年中，把自己所能献出的一切智慧和力量都献给生我、育我的这片土地，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

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将翻两番。2000年，我国人民的生活将更加幸福、富裕。2000年，我们伟大的祖国将向更加富强、更加繁荣的未来迈进！假如我曾为实现这一切而向我的祖国无私奉献过的话，那么，在2000年我退休的时候，我就可以自豪地向我的儿孙们宣布：你们的父亲、爷爷也曾为2000年所取得的成就出过力、流过汗。你们也该为祖国的2005年而艰苦奋斗！只要我们一代代地坚持下去，祖国的振兴、中华的腾飞将指日可待！



汪进仁

1990年9月28日于教务处

---

# 沉痛悼念雷功炎同学

计算班 王 琪

2010年1月30日，雷功炎同学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举行。

大厅两侧摆满花圈，花圈上覆盖着多层挽联，要找到谁献的挽联都很困难。我们几个人费了很大的力，才找到了以计算班同学名义献的挽联。我们还试图找到以戚志峰、徐珍芳名义献的挽联，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最后，田多如同学找到写挽联的地方又给补了一副。

在北京的同学王琪、田多如、许慧芳、雷广玉、张学洪、赵长林、余森华和宋宝忠来到灵堂，向我们的老同学三鞠躬，见最后一面，做今世的诀别。我们还代替发来唁函的同学吴广茂、李桂芝、戚志峰、徐珍芳、贾作皆、黄志盛、杨质、刘志峰、段致和、刘才荣和张从金在悼念册上签了名。

告别仪式于上午十点准时开始，功炎的亲属二十余人肃穆站立在大厅左侧。与会人员每四人成一横排向遗体三鞠躬告别。一身蓝色的布料中山装，遮盖住他已变得瘦小的身躯，清瘦的脸上佩戴着一副眼镜，大小已不协调……。当看到我们一向敬慕的楷模被病痛折磨得只剩下皮包骨的时候，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

北京大学各个学院的老师、老同学、学生和悼念雷爷爷的孩童，从大厅内一直站到厅外。悼念人数之多，年龄差别之大，都说明了雷功炎的一生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

# 快乐度晚年

计算班 王琨

跋涉过茫茫雪原，方知太阳的温暖；  
熬过漫长黑夜，才会倾心拥抱黎明的彩霞；  
经过与死神的抗争，更懂得生命的宝贵。

人生有许多不如意，正如一位老人不胜感慨所说的：“人这一辈子，出生时四条腿走路；然后是两条腿走路，最后变成三条腿走路，因为多了一根拐杖；知识退化，血管老化，头脑僵化，万般皆下垂，唯有血压高，坐着就打盹，躺下睡不着，想记住的记不住，想忘掉的忘不掉……。”

但，人生的那些不如意又奈我何？生理上的衰老不可抗拒，心理上的衰老却可以做主。寒繆尔·厄尔曼说得好：“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年岁有加并非衰老，理想丢弃，方坠暮年。”

我是一名有十六年哮喘病和糖尿病的患者，曾几乎无药可治，吃什么药肝脏都中毒，只能使用大量激素，却导致了重度骨质疏松、胰岛素分泌下降。2000年以前，每年有半年住在医院里，多次抢救报病危。每天只能在沙发上过夜，腿肿得没有知觉，真的活得很累！！死的办法都想好了，可是看着老伴、孩子们着急期待的眼神，我决心不能放弃，我也不能躺着等死，老伴扶我站起来，在跳舞毯上只能半步半步地移动，有多艰难可想而知。可是我心里在想：我就是“跳着”死了也不躺下！半年的时间我把跳舞毯跳坏了，然而腿肿消失了，哮喘也缓解了，我便开始有计划锻炼。搬到新社区，我组织了晨练队、合唱团和舞蹈队。

我以顽强的意志从病魔手中挣脱出来，我们的合唱团、舞蹈队每年都参加海淀区的五月鲜花比赛，每年都得奖，我也被评为星级义工。

老年同学们，面对现实，泰然处之，让微笑激情倾注美好的人生，让人生的春天永驻我们心中。最后赠给同学们一副对联——

上联是：夕阳劲舞，舞却十魔百病；

下联是：老树竞花，花展万紫千红。

横批是：青春永驻

## 驻 永 春 青

老树竞花 花展万紫千红



王琨是阳春新纪元社区文体积极分子，热爱公益活动。在的发动下，小区于2005年组建了由20多名60岁左右老人组的舞蹈队，舞蹈队成立后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小区居民亲的称她为群众文体活动的带头人。(图为王琨接受记者采访)

夕阳劲舞 舞却十魔百病

---

# 我的个人简历与自述

数学三班 王昆明

1965年4月北大毕业，被分配到沈阳炮兵第三研究所参军，先后多次调动单位与工作，四十年为国防服务，只因毕业时的一句“希望参军”就真的参军了，而且是一辈子的职业兵。人生就是那么滑稽可笑。我们处在特殊时代，不容你说话就执行的时代。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参军后就更是上级选择你的时代。人生的酸甜苦辣就不用说了，工农兵学商我几乎都干过。但最多最长的是做研究员，军队院校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直到2002年退休，成为军队比较高级别的资深教授。

我1965年4月到1966年6月参加过工厂“四清”运动，以“工作队”的形式进入工厂。那是文革前的一场革命，毛泽东的伟大行动。当时跟班当工人，领导工人学习、搞运动；揭发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应该说那是一场比较好的整风形式的运动。干部所谓“洗澡下楼”也就是自己检查，群众满意算通过，否则就再检查。干部有任何问题都能查个水落石出。后来，尤其是1966年4、5月份，阶级斗争形式突变，文革开始就变味了。毛泽东批刘少奇“四清”提法不妥，说不是四清四不清的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是阶级斗争。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文革的开始，也许“四清”是



文革的序曲而已。幸亏我们工作队撤得快，否则文革期间就要在地方“四清”的单位挨批判了。

军队是特殊的团体，一般来说是比较封闭的。真正让我接触社会，尤其是工人、学生、教师，还是在“四清”和文革之中。这对我后来对社会实践的认识有相当的帮助。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带有文革色彩的运动是正确或者错误的。历史将会对这些我们经历过的东西做出正确评论的，而我们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小卒而已。但确实，我们是历史的亲历者，历史

---

潮流的见证者。它作为史料会证明，人民永远是社会的承载者。

1968年到1971年，我在北京水利水电学院“支左”。作为“军宣队”进驻大专院校，文革的乱与治我不知道。稀里糊涂地又忙活了3年，忙得团团转，大事小事军队都管。与“工宣队”的工人一起，搞所谓“文化革命”。严格意义上说是“领导”那里的所谓革命。其实只不过是稳定那里的师生，不要上街，不要游行，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那时忙得很，一天只能有两、三个小时的睡觉时间，你找谁说理去？“工军宣队联合指挥部”是院校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指挥部。特殊时代特殊产物，回想起来我们都觉得非常可笑。既然前提都错了，你再苦再累又有什么意义？处在那种时代，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理解。但历史就是历史，不能改变。回想起来也有收获，至少它给我了解社会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各个阶层的人你都要接触，话也都要说，各个派别的组织你都得看都得管。仿佛我是神仙加裁判。其实我只不过是刚刚穿上军装的知识分子。

在文革中，我与地方同志一样是“臭老九”。“支左”完后回原单位，就直接送我们去河北蔚县炮兵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那里原来是一个监狱，把我们一批人就放在那儿。种水稻和旱田的玉米等作物。劳动强度之大是我们难以承受的。没有房子自己盖，打水泥地板盖房，一块就是八百公斤。累得晚上无法入睡。自己的床都上不去，腿不听使唤。冬天没有煤烧，自己去煤窑挖，什么最脏最累的活我们都得干。好在那时年轻身体好都能扛过去。走过来就是胜利啊！每天还要受人管制，交待第三层思想。这一下就把我搞晕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由“支左”到改造，做梦一般，不知道这个社会在搞啥东西。不理解也不敢说，只有老老实实服从的份。说点真话，劳动三年回来，我连三角符号都给忘记了。当时非常灰心。

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出来，我们才从“五七”干校回来，继续原单位上班，落实政策。整天争论得脸红脖子粗，纯粹是无事打嘴仗。唉！我们受社会的裹挟也没有一点办法。

1975年以后，我调到张家口炮兵学院从事教学工作。这十年的恶梦总算是慢慢地悟过来。真正做些实事还是在炮兵学院。

我们不单要教军事（我单独有军事方面的学习与培训）还要负责文化课教学。文革之后百业待兴，教大学数学，又要教高中的数学加物理。学员基础不好，良莠不齐，学员又多，精通或者懂业务的教员少而又少。我们那几年又成了香饽饽。再加上1977年高考恢复，要我们辅导考大学的同志多得很，这方面的任务也相当繁重。要知道我们也有十年没有摸过书本。这方面的教学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经过多年教学与磨练以及后来的研究生教学，我们水平也真的上了一个台阶。年轻大学生的入伍，军队素质、成员组成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新装备的武装，军队的知识化、专业化、正规化水平大大提高，给军事院校更大更多地增加军事训练任务。高科技新装备使我们的军事家都有了一个大的飞跃。多学科、多兵种、多层次教学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白手起家编写

---

大量教材，对兵种专业设计、学科建设、人员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我曾多次参加全军性学术会议，作为资深教授参加多次重大项目评审，对兵种本专业建设有创新贡献，也有编著书问世：《炮兵射击教程》（包括多种炮的教程）计数百万字共 9 本书参加编写，由总参部出版，且为全军通用教程；独立编写 4 部计 400 万字，作为全军院校教材；曾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7 项；发表学术文章 30 余篇；获总参某部最高荣誉奖“人梯奖”及军队三等功 2 次。

总之，我没有辜负母校对我的培养，兢兢业业为国家与军队工作四十年，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国家。如今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

我是一个不善言谈，也并不张扬的人。但愿我与同学们做一个忙忙碌碌，平凡又平凡之人。心静如水，平安一生。记得马寅初校长的名言：“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我就以此做本文的结束语吧！

---

# 难忘的大学时代

数学一班 王 理

多年前，我在《人民日报》上曾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美国的一位总统（记不清是卡特还是福特）用了一个多月时间环球一周出访世界各地后返回美国，簇拥在机场的众多记者肩扛闪光灯摄像机，急切等待这位超级大国的总统发表对世界形势的看法，以便及时报道这一重大新闻。但是令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总统走出机舱，兴高采烈地挥舞着双手，不等记者提问便大声说：“我认为人生最重要最难忘的时光是他的大学时代的生活！……”众人愕然！

的确，虽然大学阶段的生活只有短短几年，在人的一生中时间比重并不大，但对一生的经历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北大百年校庆前后，我看到过不少有关北大往事的回忆文章，我发现它们多是有关1957年反右以及此前的人和事，再就是文革及文革之后的巨大变化等，唯独没有从大跃进之后的反右倾到文革前这一历史阶段的回忆文章。难道这一阶段不重要或者没有什么可写的吗？我觉得恰恰相反，因为正是在这个历史阶段，极左思潮（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和个人崇拜才得以恶性膨胀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文革所需要的政治舆论基础业已形成，毛主席才敢于发动这场给中华民族又一次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不妨设想，如果不经过这一个历史阶段（1958年—1966年），在刚刚取得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之后，人们还沉溺于给一个团小组长提意见便可划成右派的极度谨小慎微之中（我有这样的例子），有谁还敢斗胆跳出来给党委领导贴大字报，敢说党委犯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那不是明摆着找死么？

每当人们议论文革中的种种荒唐行为，诸如破四旧、砸孔庙、砸全聚德的牌子、要把交通信号灯红绿对调等等以及随意抄家、两派武斗冲锋陷阵势不两立、夫妻分属两派而导致离婚等等时，5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完全不能理解，感到那个年代的人太可笑了，是不是当时的人都疯了呢！甚至还有人把他不能理解的这种行为解释为太阳黑子的巨变造成人类行为的怪异。

其实，我认为真正正确的解释应该是极左思潮这个毒瘤长期以来侵蚀着我们这个社会的肌体，这个毒瘤越长越壮，越长越大，越长越毒，以致扭曲了人性，颠倒了善恶美丑。这个毒瘤急性膨胀的时期正好是1958年大跃进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的这一阶段，恰好覆盖了我们的整个大学阶段。

---

入学 50 周年聚会，给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相见的机会。昔日生气勃勃的小伙子小姑娘如今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几十年不见，突然相逢有一种梦幻般的感觉，这种美好的记忆肯定会长久地留在我们的脑海里，与此同时也一定会勾起对大学时代的种种回忆。让我们通过自己的点滴回忆，积少成多地来填补前边所说的这段历史回顾的空白吧！

我想说的仅仅是我个人的心路历程，由于个人视角的局限性和水平的有限性，我的回忆难免会有片面或偏颇的一面，所以我真心愿意听到别人的指点、商榷或者讨论。我可以保证的是我决不会说违心的话，绝不弄虚作假。我所说的都是我对那个年代的真实感受。

台湾人柏扬说过一段话：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说法，人们的说法可以千差万别，但事实的真相只能有一个。

## 我的三个阶段

从进入北大到现在整整 50 年，我把我的经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9 年 9 月到 1967 年底。别奇怪！1965 年 4 月 23 日北京市教育局用一辆解放牌载货大卡车，把分配到北京市教育局劳动实习办公室作为劳动实习生的 13 名同学，直接拉到卢沟桥农场劳动锻炼（另有 3 名同学因身体原因直接分配到近郊区中学）。在往后一年半的下乡劳动中，其极左的程度比大家熟知的十三陵修铁路劳动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年半的劳动改造与在北大的五年半，我的心态和境遇有着连续性的相关，所以我把二者合并为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1967 年 12 月 11 日到 1976 年 1 月 19 日，我被分配到北京远郊顺义县的一所农村初级中学。我把这一阶段戏称为“顺义八年抗战”。在这里我度过了与抗日战争一样长的、非常艰苦的八年。这个阶段极左思潮已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人人自危，又多了个地方主义排外不择手段，我又被定性为“裴多菲反革命俱乐部的头子”。加上生活极为艰苦，差一点把命也丢在了那里。

第三阶段：1976 年 2 月到现在，一直在北京工业大学。这三十多年来，我似乎避开了极左思潮对我的直接侵袭，颇感欣慰。略感遗憾的是，控制着北工大数学系的帮派势力一直把我当作第一排斥打击对象。不过，只要不是政治迫害，我对其它一切得失从不放在心上，良好的心态使我还保持着一个基本健康的状态。

在这第三个阶段期间，我想多说两句的是，从 1981 年 9 月到 1986 年 9 月我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又读了五年书，而且是颇具信心、饶有兴趣地读了五年，与北大的那五年半相比完全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心态。心态变好了，生活学习的质量自然也就完全变了，像变了个人一样，这些都还在其次。最重要的

---

是我觉得自己开窍了，解开了我一生中长期解不开的种种困惑。谁都能明白一个人解惑之后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把这五年视为我一生的黄金时段。因为有了它，我感到此前我的一切不幸和遭遇都可以抵消。我看到了这个“腐朽的、没落的、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的美国的真实情况。我也突然觉得自己像个井底的蛤蟆跳到了井沿儿上，原来天有这么大！我好像懂得了 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崇尚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同时我也感性地体会到了人权的深刻含义。想说的话有很多很多。由于本文要写的是我们的大学时代，故后两个阶段另文再写，这里就不赘述了。

## 大学前期的困惑

我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来到北大数学力学系的。从宁夏到北大，对我来说像换了一个世界一样，一切都是那么陌生、那么不习惯不适应。进校后，政治运动是一个接一个，应接不暇，不知如何是好。思想跟不上趟儿，十分被动，对北大的政治氛围感到苦不堪言，悔恨自己倒霉给分到北大来了。这里有这样一个小插曲。

### 1、糊里糊涂进入北大

1959 年以前，北大的理科专业在宁夏从未招过学生。1959 年全国只有清华、北大（文科）、中央民族学院和西安交大四所院校在宁夏一共招收 15 个名额。当年全宁夏只有不足 900 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若考不进这 15 个名额就只能上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农学院和宁夏医学院这三所刚成立一年的本地大学。我的志愿自然是把清华和西安交大放在前边，最后一个志愿才是宁夏师院物理系。当时全区的考生都统一集中在区政府的大礼堂内参加高考，阅卷在宁夏师院进行。那时高考分数对个人是保密的，但许多有关成绩的信息还是从宁夏师院传了出来。如数学成绩的情况是：90 分以上只有一个，是 99 分；80—89 没有；70—79 也只有一个，是 73 分；60—69 有 12 个；其余都在 60 分以下。也传出考 99 分的学生的准考证号是 030 号。

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是北大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时也很奇怪，不过，虽然第一志愿清华没有考上，想到能到首都北京读书心里也是高兴的。来北大报到时，在数力系的新生名单中没有找到我的名字，负责新生报到登记的同学和我都很奇怪。后来周巢尘老师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到北大招生办去查询。原来宁夏招生办曾给北大招生办打过电报说：宁夏有个学生数学成绩 99 分，问北大数学专业要不要。大概因北大理科从未在宁夏招过生，就痛快地答应了。这样我就成了数力系 59 级新生入学报到名单上的最后一名，学号是 5901214。由于原来没有我的名字，也就没安排我的住宿。力学班有空床位，我就被暂时安排在力学班的宿舍和力学班的徐明瑜、康德泉、熊自力等人一个宿舍。我就这样糊里糊涂进了北大数力系。这倒是

---

应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当你还没有准备好去选择自己的职业时，职业就已经选定了你。

## 2、向党交心

入学后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精神、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开展向党交心的运动。不仅在会上鼓励积极暴露思想，而且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组织。大家都大胆地谈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我第一次听到了有些地方大炼钢铁时，基层干部动员砸锅、砸铁门、砸门栓儿等铁器来炼钢的新奇新闻。当时大家都年轻幼稚，积极要求进步，既然向党交心，有什么就说什么。甚至有的事自己没想过，有人提了个头儿，自己也顺势发挥，往自己身上联系，给自己发挥出一个错误认识来，以为这才是真心诚意改造自己世界观积极上进的表现。我觉得有相当一部分同学都有过这种思维模式，并一直延续到最后毕业时的自我鉴定，当然不能否认也有压力使然的因素。

有很多同学都暴露了自己有成名成家思想，有人甚至一入大学就想到了几年后的毕业论文，以后成为一个数学家等等。我听了很惊奇新鲜，因为我确实没有过类似宏图构想。后来批判徐明曜和陈秋农等同学的白专道路时，气氛很紧张，我还庆幸自己幸亏没想过那么多，反而对了。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我暴露了大量问题。

高中三年六个寒暑假，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最后一个暑假因高考没有下乡劳动外，其余五个假期要么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要么义务劳动给郊区农民积肥，要么就是勤工俭学劳动或者大规模的建校劳动等等。由于与农民接触很多，发现农民对集体化牢骚满腹，留恋单干毫不隐讳。从而我认定公社化运动并不是农民自愿的。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经常夜战，经常停课，劳动量极大，只见学校整日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当时，虽然我也承认这种革命热情可鼓不可泄，可心里总觉得这么狂热，明摆着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有那么多家庭困难的同学，连一个月8元钱饭钱都交不起，如果多搞点有偿的勤工俭学，既能培养劳动观念又能补贴生活费用，岂不一举两得。结果团组织生活会上批我是“单纯经济观点，抵制政治挂帅”，但也只以思想落后论，还未给我上升到立场问题的高度。然而“思想落后”的帽子还是给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高中毕业时，前边所说的那十五个外地大学的录取名额不是谁想报考就可以报考的，必须经过组织批准。我们高三年级团总支就是以我“思想落后”而否定了我，我的班主任力排众议以贯彻阶级路线为由向学校党组织上报，最终还是学校批准了我报考清华和西安交大。“出身好”第一次给我带来了良好的“效益”。

当时学习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就是要批判彭德怀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等言论的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我心想，我的言论比彭德怀的重多了，他是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不是比他更反革命了嘛！从而整日心情紧张，情绪低落，在恐慌不安之中

---

度日。开始意识到自己实在是跟不上北大的“时代步伐”。

### 3、搞教育改革和超声波科研运动

接下来便是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口号惊人，要“打倒牛家店”（牛顿），“火烧哥家楼”（哥西），编革命化的教材，而且要我们一年级给高年级的课程编教材。满楼道的大字报，声势浩荡。白天照常上课，要求老师讲课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同学们监督教师的讲课是否有宣扬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倾向。天天晚上开会务虚，批判资产阶级学术体系并写大字报，经常夜战到深夜，搞得人困倦之极，一坐下讨论就打盹，所以只好自己不断摇晃自己的身体，心想可千万别睡着了，否则你就要沦为缺乏革命热情的右倾分子。于是我拼命紧跟形势，可还有同学跟我开玩笑叫我“老右倾”。

当时讲数学分析的老师是闵嗣鹤教授，讲课非常认真、生动且深刻。记得他讲极限的基本概念时，用乒乓球自由落体到桌面上越弹越低的现象来形象地比喻极限的存在概念。他那样高水平的老教授每次上课都还带着经过自己认真准备的教案，但课后还得接受批判。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下课后，一位年轻教师就在课后的教室里训斥闵先生。闵先生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坐在那里，双手放在膝盖上，这位年轻人双手搭在坐椅的背上，翘着二郎腿坐在闵先生对面。闵先生低头说：“我业务水平有限，思想跟不上形势，讲得不好”，年轻人用手指着自己的头以教训的口吻笑着说：“你不是水平问题！你是这里面有问题！”据说，后来在文革闹得正凶的年代，闵先生搞一个石油勘探方面的课题，经常奔走于北京与河北徐水、东北之间，成果卓著，如首创数字石油勘探方法等等。终因劳累过度，于1973年突发心脏病送去医院，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第二天大夫赶到时，人已死在病床上（一说是死在楼道两侧摆放的长椅上）。中国数一数二的数论大师就这样黯然地离开了人世，年仅60岁。

解析几何主讲老师是程庆民先生。他因被错划为右派，更是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对他的批判就更不讲道理。一次在二教一层西边的教室里开大会批判他，刚一开始，就有两三个极左分子跑到台上动手就打，后被拉住。其中一个家伙还是从后排的座位上跳起，跑下一层层台阶到前边去打程先生的，以彰显自己的“阶级仇恨”。我记住了他，直到毕业从未与他讲过一句话，见面也从未与他打过一次招呼。

刚进北大两三个月就碰到这么多应接不暇的冲撞，实在难以招架，只好一天天熬日子过，不知何时能熬到头儿。整个一个寒假也都是这么个过法，一天也没有休息。

到了1960年入春后，又开始了搞超声波运动，也可以用荒唐二字来概括，最后的科研成果也仅仅是澡堂子里的水管子被损坏了不少。这一阶段也是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五一节那天晚上，我实在憋不住了，没有敢向领导请假就偷偷从东操场旁边的东北校门溜出去到清华找同学诉苦。原来人家清华五一到五四放假休息，惊得我目瞪口呆。心想清华真好啊！与北大近在咫尺，却似两重天日。清华当年也有个工程力学数学系，为什么不把我录取到清

---

华的这个系呢？我又没报考北大，为什么非要把我送到北大，哎哟！心中懊丧极了！当晚返回北大走出清华西校门时，我是三步一回头，望着那以水泥灰色为基调、远不如北大西校门典雅壮观的清华西校门，心中的羡慕和沮丧之情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以至于现在想起来都好像是昨天晚上的事儿。现在想来，当年宁夏招生办仅凭偶然的一次高考成绩就误认为我是一个“数学天才”而刻意送我到北大的数学专业来深造，对我来说实在是好心办了一件错事。若当年他们不要别出心裁，按常规录取，我很有可能就是清华的某个系的学生，那样的话我应该是 65 年 7 月毕业，也还在文革之前，我肯定不会被分配到农村的一个初级中学在农村一呆就是十多年，我的经历和家庭完全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从而我的履历也肯定将是另外的一种写法。

我感到文革前清华一贯与北大的校风不同，甚至有时敢于对极左的一些作法顶风而上。比如本文最后一段将要谈的“清理思想”运动，北京市几乎所有的高等院校都搞得沸沸扬扬，采取人人过关的办法，最后再揪出一批“反动学生”送去劳改。唯独清华不仅不搞人人过关，也没揪出一个“反动学生”，甚至在毕业前的毕业鉴定阶段，还搞同学之间的相互“评功摆好”。这种校风真让人向往啊！

#### 4、突击排练歌剧《洪湖赤卫队》

好不容易熬到暑假，本以为可以回家解放一下快要窒息的心灵。结果还是化为泡影。

北大管弦乐队暑假留校要为歌剧《洪湖赤卫队》伴奏。北大管弦乐队的第一小号，是一位高年级的上海人，他执意要回上海，领导就决定要我留下。让我这样一个学吹小号不到一年的新手一个人留下，在一个暑假内，完成这样一部大型歌剧的伴奏。这种作法根本就不合情理，因为我的水平无法胜任这么专业的演奏是明摆着的事情。领导天天做我的工作：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我被逼无奈只能留了下来。本来寒假就渴望回家的心情被一场轰轰烈烈气势非凡的教育革命运动给破灭了，现在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来的暑假回家又落空了，内心的痛苦和失望实在难以形容。和我一起考到北京在清华的那个同学人家寒暑假都回家了，把我给羡慕的呀……。

那个年代做什么事情都搞“群众运动”，动辄就开夜车。全体乐队队员去煤矿文工团抄全剧的总谱和各自乐器的分谱用了一天一夜，凌晨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返回学校。结果一个暑假天天苦练，嘴唇吹肿了也没能全部演奏下来。还请了一个专业小号手（他当时是音乐学院附中学生，后来成了中央乐团的第一小号）来帮我的忙。记得有一段 D 调的主旋律，由于小号本身是降 B 调，就要产生四个升号，演奏起来相当困难，当时他也吹奏不下来，没人再说我右倾保守了，不得不把最难的两三个地方作了修改。开学后在大饭厅举行的迎新晚会上，演出了《洪湖赤卫队》，我堂而皇之地坐在乐池中第一小号的位置上，从上海回来的第一小号则坐在第二小号的位置上。

---

在这个暑假里，只有专业水平低的压力，没有太多政治上的压力，未名湖的湖心岛是我们管弦乐队排练的主要地点，风景宜人。乐队内部的气氛也算和谐，所以心情还算愉快。也就在这个暑假里，我熟悉了蒋筑英同学，他是物理系光学专业的，在乐队中他吹奏次中音号。到1962年他毕业，我们在乐队中一起共事近三年。蒋筑英为人正派爽快，敢于直言，乐队中的一些苦活累活他抢着干，积极热情，群众关系好。在乐队的会上也是喜欢坚持己见，好争辩，从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从不吹牛说大话随波逐流。人长得细高，外号“旗杆儿”。有一次，我有意问他：“蒋筑英，人家为什么管你叫旗杆儿？”他幽默地回答：“观其形也！”最后一次与他聊天是我们在办公楼礼堂的一次演出后，一起坐在台下观看其他节目。他告诉我他要考王大珩教授的研究生，参考书是一本德文版的厚厚的书，还拿出来给我看。我说德文你行么，他说：“我有点儿基础，当然不如英文和俄文那么顺当。”

以我对他的了解，1982年把他树为知识分子英模典型实在是完全正确的，实至名归。建国60年大庆前又把他作为解放后最有影响的“百人”之一，也是好的！此人品高尚，从不趋炎附势，就是这样一位只讲奉献而不计名利、敢于直言的人，直到因公殉职也没能入党，尽管他一生都在积极要求入党。

## 5、十三陵修铁路

此时全国早已饥荒蔓延，我们这些常被教导为“99个农民养活了你们一个大学生”的“天之骄子”的粮食定量刚刚减低了一些，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国内形势的严重性。1960年后半年到十三陵修铁路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饿肚子。我想这一个月的劳动我们每个人都会终身难忘铭记在心吧！

早晨月亮还高高挂在天空，老百姓还没起床，我们就从老乡家出发去上工，晚上又是在月亮下往老百姓家返。强体力劳动我早习以为常，走长路也不是第一次了。只是强体力劳动加上吃不饱肚子还经历得不多。好在这些都还在人的忍受极限范围之内。真正难以忍受而又看不到尽头的是“宁左勿右”的思潮时时缠绕着你，总感到透不过气儿来。

要修的铁路路基很低，劳动任务是把坡底的沙石运到坡顶外的某个地方。筐很大，一筐沙石很重，两人抬着爬上坡顶还是比较累的。用铁锹装筐的人，一筐接一筐难有停歇，也是很累的。可是还要大造声势，红旗飘扬，口号嘹亮，用运动会的形式展开竞赛。人的劳动热情本来就有高有低，要搞竞赛也无可厚非。可有的人就惯于不实事求是，让人心烦。两人抬一筐已不轻松，他非要一个人挑两筐，以显示自己比别人能干，可实际上他每筐中只装了两三锹沙石后，挑起筐就跑了。其效率远低于两人抬一筐，口号再响亮有什么用。

我们数一班分成三个小班，我是一个小班的班长。我们这个班至今我还能记得住的人有于清甫、卢志权、麦结华、柳世儒等。我们就坚持两人抬一筐，每筐装得满满的，于清甫在装满了筐后，往往还拍两下再装两锹，效率自然很高。我们班从来都是最出活儿的，也从来

---

不空喊口号。最困难的地段总是放我们班在那里。

一个月劳动下来，年级领导在全年级的总结大会上，宣布数一班的“保尔”班是那个人挑两筐、光会喊口号而不出活儿的班。这很正常，我一点没觉得奇怪。

以不实事求是搞浮夸喊空口号为荣，早已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在校内各项活动是如此，出来劳动还如此，如果时时事事处处如此。这日子可怎么个过法呀！

## 6、困惑终于酿成恶果

一年半的北大生活是一天天熬着过来的，精神一直感到很沉重。上图书馆太勤，那是白专，班上已有人为此丢了官。政治挤压业务学习的势头越来越强劲，再说整天学  $\epsilon - \delta$  、  $\epsilon - N$  这些纯基础知识能有多大用处也不知道（那时我哪里晓得若干年后我发表的论文中，有几篇用的方法还是  $\epsilon - \delta$  、  $\epsilon - N$ ），在学习方面谈不上有多大动力。总之，内心世界很彷徨，眼前格格不入的现实又无法逃避，怎么办呢？从修铁路回来后，我逐渐酝酿着一个修正自己处世态度的决策。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个决策导致了我从此一直背运走下坡路，再也没有翻过身来。

简单地说，我的这个决策就是急流勇退。既然紧跟形势使自己苦不堪言，那就保持个中游算了，慢慢克服那种争强好胜的思想。常言道无巧不成书，就在我做出这个决策之后不久，一天晚上年级党支部一个同学代表组织找我个别谈话。首先肯定我的一贯表现是好的，尤其修铁路劳动表现突出，希望我再接再厉，努力上进听从组织安排。目前还是先当好团小组长，不断总结工作经验，积极主动靠拢组织，将来肯定会有更大进步。由于这一番谈话的精神与我刚刚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策恰恰相反，所以我毫不犹豫，明白地表达了我的意见：“自从上北大以来，我发现我实在干不了当官的事，要我带头吃苦这没问题，至于培养未来的干部，请组织还是另选他人，要求进步的人很多，何必非要选我呢？”我毫不犹豫的表态使这个同学大吃一惊，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但还是耐心地开导挽救我。而我是主意已定坚持到底。

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数力系全系团员大会在小饭厅召开。系总支书记在会上不点名却非常严厉地宣布了此事：“有的人组织信任他，想提拔培养他当干部，出于信任找他谈话，他竟然一口拒绝。我在北大这些年来，还从来没听说过有这种怪事！这不仅仅是一个不求上进不靠拢组织的问题，这简直是在明目张胆地向组织挑战。请问，你在北大想要干什么？”我一听大惊！坏了，坏了，我闯下祸了！

从此以后，我在班上的境况急转直下。这里仅举一个显然可以证明我被划入另册的一个事例。有一次政治课（是马列主义课还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我记不准了）不及格的同学被召集在一起开会。我看被召集来的人差不多全是“异端分子”：陈华贤、徐明曜、王树禾、麦结华和我等。我相信数一班的人一看这个“另类”名单就应该什么都明白了。我当时还想过：“这是谁干的呢？”现在想来，追究始作俑者是谁意义不大，它的意义在于这正

---

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隐藏在背后的政治运作的实际情况。我感叹，在那个年代一个人要想逃避现实中的极左祸患有多么难啊！

说到这里，有一点我觉得有必要加以说明。上边我说到的组织派人找我个别谈话想培养我当干部被我拒绝一事，确实是我在大学阶段的境况急转直下的转折点，但是责任不在找我谈话的这位同学（该同学不能不向党组织如实汇报这一极为反常的“重大事件”），而是另有其人利用当时极左的政治背景以及“组织”对其的信任，拿我的这个“重大事件”做足了文章以发泄自己深藏内心的、见不得阳光的“嫉恨”，直至毕业前夕都不肯松动。倒是听说找我谈话的那位同学曾为我那极为严重的毕业鉴定（见本文最后一段）做过一些开脱。当下来的人自然是理解不了拒绝组织培养是一个“重大事件”，而当年的北大人谁都能清醒地意识到不被组织信任以致于被划入另册那可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面对北大当时的那种现实状况，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做法。有一个同学平日很随和，学习很专心，政治上积极上进。有一天下午，我一开房门，正巧看见他交给书记一厚叠纸“这是我这学期的思想汇报材料”，我马上退回了房间。我当时也吃了一惊，那一叠汇报要写多久啊！写什么呢？真难死人了！我想他写的时候一定是很痛苦的，他也一定想过，为了保全自己他必须这样做，该同学后来入了团。显然他的作法与我的急流勇退的作法正好相反，应该说比我要聪明得多。说心里话，即使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也并没有嘲笑过他的这种做法，毕竟求生是人的第一本能。

## 困难时期的迷茫与探索

大学二、三年级正是困难时期最严峻的时候，由于经济形势的逼迫，这时已不再搞运动了，开会也少了，提倡劳逸结合。尽管整日饥肠辘辘，但在政治上总算松了一口气。

一个晚上，突然开会宣布实行劳逸结合。对于政治形势的突然宽松，真有点不敢相信，但内心的高兴可想而知。大家面面相觑，丝毫不敢流露出喜形于色的表情，就像获得了解放一样的轻松感觉是入北大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兴之情难以平静。散会后，有一个同学独自悄悄走出北大南校门，像逃出笼子的小鸟一样朝着进城的方向漫无目的地走去，当天晚上的空气都好像弥漫着轻松的芳香。他就一直走啊走，一直走到西直门后，才意识到该往回返了。他告诉我他当时的那种释怀的心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政治环境宽松点儿了，肚子里空空如也是个实际问题。北大同学又多是喜欢念书的，好多人只好躺在床上看书。缺少能量全身发冷，就再围上被子。在困难时期，晚上经常停电，此时海淀商场人满为患。原来，北大学子们尽管晚上肚子已空空如也，还是有不少人跑到学校对面的海淀商场，借商场的灯光站在那里看书。据说当时除了北大、清华的学生外，八大

---

学院那边，只有北医和北航的学生比较刻苦，其他院校的学生晚上基本都不看书学习了。

与此同时，谁也不可能不去想经济形势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重大而又现实的问题。我当时的心态是基本上相信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是两个原因，但是人为的左倾狂热肯定是更主要的原因。我相信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大家不敢直说罢了。但是，对大跃进中的浮夸、瞒报等各种极左狂热行为，应该说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流露过牢骚和不满情绪，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言论也渐渐多了起来。

这时的我依然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没有什么大错，问题是出在各级领导干部“宁左勿右”的工作方法上，为了讨好上级保全自己的乌纱帽，不惜牺牲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对这种人我深恶痛绝，对现实的不满愤愤然于言行之中。

至于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观点，因为我与大家一样对赫鲁晓夫的思想与观点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根本谈不上拥护或反对。在学习“一评”到“九评”文件的讨论会上我是提过一些问题，那也是为了讨论清楚为什么说苏联是修正主义的，而我们中国就是马列主义的。我记得当时出了一本书《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我看了那本书，书上列举了很多苏联国内存在着的阴暗面，诸如地下工厂、投机倒把、行贿受贿、卖淫嫖娼等等，这能说明苏联就是修正主义国家吗？此外，我们批判赫鲁晓夫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是先冒险主义（指在古巴装设导弹）、后投降主义（指撤走导弹）也颇感牵强附会。那你说赫鲁晓夫他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是在我的脑子里有过。但我再傻也不会在会上把这些作为我自己的问题来提问，都是以探求问题的方式提出来让大家讨论。可能提得多了，就引起了组织的注意。

我到现在也依然认为在当时的绝大多数同学的脑子里，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比如，当毛选第四卷出版时，就有很多同学起大早去海淀书店排队购买。我亲眼看到过许多同学通读毛选四卷，并认真做读书笔记。这其中就包括徐明曜同学，他还同时研读马列主义的一些哲学著作，甚至还涉猎有关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的书。再如陈秋农同学也是读了很多马列主义方面的书，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正在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连声称好赞不绝口。我拿过来试着读了两天，实在艰深难懂，又还给了他。

由于我坚信在各级领导中广泛存在着的“宁左勿右”的作风是一个思想方法上的问题，所以除了读毛选四卷外，还认真研读了笛卡尔的《思想方法论》、柏拉图的《理想国》、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以及艾思奇等人的有关思想方法方面的哲学著作。年轻人追求真理的信念和热情是任何困难也挡不住的！不少人都是想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或其它哲学著作，希望以此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并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来解读现实中碰到的实际问题。

在谈到年轻人这种书生气十足的探求真理的方法时，我不能不说我们数一班的一个同学，他与众不同，他走的是一条谁也不曾想过也不敢想的路，他看待现实似乎比别人更透彻。

---

这个同学叫陈华贤，广东人。他 1958 年入学，用功学习了一年，成绩优异。因受不了 58 级的极左风气，借口神经衰弱休学，在困难时期到了我们班，与我同宿舍了很长时间，同学关系融洽。他很少与人交流看法，但他有他自己独特的一套观念和行为。我感到他把现实看透了，他坚信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在我的记忆中，他到我们班后就再也没有用心念过专业书，也没有怎么读马列主义著作或毛选。他只读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且是英文版的。日日苦读乐此不疲，简直达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他英文程度相当高，晚上说梦话都是英文版的《社会契约论》中的话。

我猜想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理念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真正原因在哪里，所以他并不迷茫彷徨，也不低沉消极。整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吹着口哨，哼着小调。看似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走上他那条远离尘世特立独行的路。1963 年底，终于退学回家了，他依然是高高兴兴的。他回家后给我写的第一封信的第一句话至今我记忆犹新：“我一溜烟儿就从冬天跑到了夏天！”似有语出双关的意境，字里行间洋溢着兴奋之情。陈华贤多才多艺，为人友善义气。后来还寄给我一张他自己设计并亲手建造的三层小楼的照片。上世纪 90 年代，他还曾用隔热泡沫塑料箱子放上冰块，再装上他自己果园种的荔枝，托运给北京的几个同学尝。他终于过上了他追求的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

我经常问自己，陈华贤为什么能那么想得开，为什么对卢梭的思想那么崇拜。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去了美国后我才找到了。美国的立国之本《独立宣言》就是卢梭的思想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我们认为下属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距今整整 220 年了。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中国得以翻身是由于十月革命进攻冬宫的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这距今还不到 100 年；如果设想 220 年前的法国大革命进攻巴士底狱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卢梭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那我们中国会演变成什么样呢？

年轻人的这种书生气十足的探求真理的方法暴露了年轻人的天真幼稚。那是根本不可能找到答案的！因为你看不懂社会现实不是因为你的理论水平低，而是因为你了解到社会的真实情况，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愚民政策还在中国延续着。“自然灾害”纯属虚构，有人研究过近百年来的气象资料，那三年全国基本上风调雨顺。我的老家陕北是个十年九灾的贫穷山沟，唯独那三年老百姓说庄稼“痛收”了（意思是大丰收）。苏联撤退专家是真，“苏修逼债”多方面的资料显示也是子虚乌有。当你了解了，了解的越多，自然看的就越清楚。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公开发行了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使我受益匪浅，比看多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都管用。李锐曾是毛主席的秘书、水电部的副部长，庐山会议上负责记录。会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撤销一切职务。没有被定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是

---

因为他不是中央委员，毛说：“李锐还不够资格！”

咱们的一位同学看了该书后，很幽默地对我说：“庐山上批彭德怀的场面跟咱们大学时的批判会，我看也差不了多少！”其实庐山上的批判会的格调，依我看比我们大学时的批判会的格调还要低。入学时的我们怎么可能想得到呢？林彪、康生、柯庆施之流的批判只会骂人：“彭德怀！你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没下文了；李井泉、罗瑞卿、陈正人之辈最多也只会说：“主席健在你就敢这样，百年之后主席不在，谁还管得了你？”这能叫马列主义水平高么？柯庆施因为说了“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和李井泉一起在庐山会议前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就已经越过政治局候补委员，被直接提为政治局委员（其实，柯庆施的这句阿谀奉承的吹捧并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创造。早年周佛海对汪精卫、陈果夫对蒋介石都曾说过与柯庆施对毛泽东完全一样的话）。李井泉得知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时，居然反问“中国哪朝哪代不饿死人？”这种混帐话，把一个“天府之国”的四川搞得在困难时期成为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这种人死后依然还被盖棺论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罗瑞卿则因为庐山上有功，会后成为党政军三大权在握的核心人物：取代黄克诚出任总参谋长，还晋升为国务院副总理、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国的现实原来是如此一目了然！大学时代的我们怎么可能想得到呢？

对于困难时期的成因，不仅我们大学生持一定的怀疑态度，各级领导干部直至中央的绝大多数人也一样，也只是不敢说而已。

前些时候报纸上连载过 1962 年初七千人大会的情况。提到刘少奇有个发言，其中有一段大意是：过去几年我们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三年连续自然灾害以及苏修卡脖子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害，我们的工作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造成了我们的经济出现了十分困难的局面。就全国而言，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可是我认为有些地区恐怕是应该倒过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讲到这里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震动了整个人民大会堂。坐在会场外的服务人员以为会上出了什么大事情，跳起来赶快往会场跑。读到这里时，我不由得想起了鲁迅的一首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掌声是否就是鲁迅这里的“惊雷”呢？刘少奇这么委婉含蓄的一段话，就能引起如此狂风暴雨般的掌声，可见这些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们积压在内心的怨气和郁闷有多大，刘少奇说出了他们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刘少奇的这段躲躲闪闪的话，也似害怕触犯什么，不太敢大胆直说，那么大家都怕什么呢？怕谁呢？

## 从“量变”到“质变”

1962 年中期，经济状况开始出现好转的势头，这时听说学生的粮食定量要增加了。饿

---

了两年了，听到这个消息自然十分高兴。可是又有所担心，担心什么呢？这两年多以来，肚子虽然饿得够呛，可是没有政治运动了，开会也少了很多，自由多了，心情自然也好了许多。现在要给增加粮食定量了，会不会又要回到原来搞政治运动的轨道上去呢？一个同学把这种担心比喻为会不会从“量变”（指粮食定量的改变）到“质变”（指又要搞政治运动）？

不幸的是这种担心还是变成了事实。1962年下半年，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响遍全国，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是时时有、事事有、处处有。北大自然是首先带头响应。徐明曜的“问题”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慢慢地浮出水面的。

这还得从头说起。

在困难时期，实事求是地说，确实有少数同学因长期吃不饱肚子，又未能战胜自我，逐渐萌生了一些颓废的心态。我记得有一次在大饭厅举行的全校大会上，陆平校长举了一些不好的事例后，就严声厉色地呵斥：“不要玩物丧志！”学校的各级领导当时在贯彻劳逸结合政策的同时，也鼓励同学们咬紧牙关不忘进取，战胜眼前的困难。

我们数一班的徐明曜同学大约在1961年年中或年底，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主要是互相讨论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还想学习一些超出课程的知识；同时也讨论有关年轻人应该如何立志，战胜当前困难，如何成为一个有为的青年等这样一些问题。一段时间之后，想扩大一些影响，搞一个内部刊物，起名为“青年论坛”，针对当前个别年轻人思想上缺乏原则、生活上缺乏信念的情况，想讨论一下年轻人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如何寻求正确的生活道路。提倡年轻人应该勇于寻求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

实际上最后也没有搞得多么轰轰烈烈，参加的人也不多，也就拟了一个发刊词，好像连一期也没有正式出版，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原来讨论数学问题的层面上。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动议，正好赶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出台，到1962年底就成了年级阶级斗争的重要案例。现在看来，这实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桩。然而，徐明曜也正是从这件事以后，开始走上了一条不断检讨反省自己“反动思想”的漫漫之路。到最后毕业鉴定清理思想的运动中，更是重中之重的大问题，成了全年级、全系乃至全校毕业生（包括地质地理系的一个年级）大会批判对象。此时的徐明曜要想检讨过关，要想毕业，恐怕也就只能像彭德怀在庐山上那样“要什么就给什么”了！

徐明曜同学在大学时代是一个很活跃的人，他才华横溢品行端正，精力充沛爱好广泛，有理想有追求，他和谁都交往聊天，并无远近亲疏之分，和我也一样，有所交往。对于他搞的学习小组和青年论坛，我虽然没有参加，但对他这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我是持支持态度的。到1962年底时，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了组织上对他的这种做法另眼相看。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不愿意随潮流走。为了表示我对他的支持态度，一次晚上在哲学楼一层北边的一

---

间教室里开团干部改选会，由于是无记名投票，我就投了徐明曜一票。当唱票人念到徐明曜的名字时，徐明曜自己也愣了一下，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还会有人投徐明曜的票。

## 知识分子劳动化

在我们的大学阶段，体力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必修课，每年都有，但比我在中学时还是要少得多。那时北大若在校外劳动，学校还用大轿车连人带行李送去接回。而我在中学时，我们每次外出劳动都是自己背着行李和铁锹等工具，来去都是步行。最远的一次是修宁夏机场，步行四十余华里。晚上就地睡在野地荒滩上（当时是夏天），蚊子咬得人根本无法入睡，条件非常艰苦。

党提出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大家都是身体力行。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向劳动人民看齐，那是当然的事，我没有看出有谁对此不满。现在想起来真是够自觉的，难怪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曾动情地说过：“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素质好！”

刚入学的入学劳动就是挖地沟，后来在 41、42 斋劳动，抬着一大筐水泥沙石，足有一百斤，还要爬上五六楼，一干一上午，也没听见有谁叫苦，当时觉得这很正常。

记得一次在大兴县劳动，在稻田里用手薅草。我是北方人，没干过这种活儿。水有一尺多深，不能蹲下，只能猫着腰，曲着腿，手伸进水里拔草，始终保持一个姿势，一会儿就很累了，从田埂的一头到另一头还挺长。大家并排下水，每人几行，那时年轻气盛谁也不甘落后，自然而然就有点儿竞赛的味道。我们班一名从南方来的同学的速度最快，我用尽全力追他也追不上，等我好不容易到头儿了，刚想直起腰歇会儿，他又回过头下田了，因他早到，已歇了好一会儿了。我真不知道有谁偷懒耍滑。晚饭后，有时学文件开会，有时听忆苦思甜报告，也有自由支配的时候。

我是团员，每个团员都要联系一个非团员同学开展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写入团申请书。一天晚上我和我联系的同学一起散步，我问他：“你怎么不写入团申请书？”他回答得很简单干脆：“我怕开会”。该同学是一个不会说假话的人，他的这句话很有代表性。其实怕开会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谁也不像他这么直白罢了。

记得在大学时，把不安排开会等集体活动的时间叫做“自由支配”。要说哪个晚上班干部宣布是自由支配，心里就非常愉快轻松。现在常听人说退休后有一种失落感，特别一些领导干部退下来后，心里失落以至于很快就病倒了。我说我怎么就一点儿这种感觉都没有呢！是不是因为我从来没当过官所以才不体会，还是因为一生怕开会的本性使然。

困难时期，有一次在十三陵农村劳动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收工回来吃晚饭，那天晚上的粥，特别的稠，差不多就是软一些的米饭了。我的铝制大饭盒装了二两粥

---

后，就已经冒尖儿了。我正吃着粥，一个同学悄悄给我说：“王理，你还不赶紧再去买二两粥吃，今天的粥肯定米下多了，不然不会这么稠，我已经买了六两了。”我一听有道理，我也正在纳闷儿，今天的粥怎么这么稠，赶快吃完又去买了二两。四两粥下肚，上腹部明显地鼓了起来。

大家都觉得奇怪，就调查往锅里下米熬粥的 Z 老师。他用的秤是一个五斤的秤，秤上均匀地分布着五个大一点的“星儿”，一个星儿是一斤，这样满秤一次就是五斤。但是 Z 老师误认为是四斤，为什么呢？Z 老师红着脸腼腆地说：“那第一个星儿我还以为是坐标原点呢！”这样谜底便揭开了，下到锅里五斤米当四斤算，那粥还能不稠吗？

第二天上工时，有同学有意开玩笑：“今天谁在厨房帮厨呢？”有人回答：“还是 Z 老师”，“好！Z 老师帮厨好，Z 老师的粥熬得稠”。

也就在这次的劳动中，和我们一起干活的一位 30 多岁中等个儿十分健壮的贫农，公开表示了他对合作化公社化的不满，一张口就是单干时多么多么好，给我的印象很深。联想到在中学下乡劳动时，农民也是这种口气。这不能不使人质疑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是“农民高度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必然趋势”的这种说法。类似的情况在毕业后的下乡劳动中也遇到过。

毕业后的劳动锻炼期间，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叫老庄子的京郊农村和社员“三同”，有一个生产小队长，说话声音宏亮，个子很矮且驼背。他说他的罗锅儿是解放后形成的，不是解放前，解放前他还是个孩子。为什么呢？土改他家分得了土地，从来没地的农民分得了属于自己的地，如获至宝，不知道该怎么伺候他的地才好。那时他在自己的地里没日没夜地干，一天三顿饭都是他媳妇儿送到地里吃，整天趴在地里忙活，劳动过力造成了他严重驼背，他说“后来合作化了谁还下那个力！”。

质疑归质疑，知识分子劳动化是党和毛主席号召的，方向当然是正确的，那就应该身体力行。无论在中学阶段、大学阶段和毕业后的劳动锻炼中，我实在没觉得有哪个同学厌恶劳动或者有体力劳动低人一等的思想。在劳动中，我自己从来都是全力以赴的，并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各种农活。尤其农村场院上的活儿技术性很强，有的技术活儿很多社员也干不了，但我很快全掌握了，以至于常有社员问我，你家是农村的吧？你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吧？其实我从 6 岁离开农村后，就再也没有回农村生活过。在劳动中，抬筐、拉车等力气活儿与使铁锹相比，后者略显有些技术，所以在劳动中我一般用铁锹的时候多一些。尽管如此，直到现在我右肩上被压出的一块厚厚的“死肉”一眼就能看出，明显比左肩厚得多。如果有人不信，我现在就可以解开上衣展示给他看。

那些让别人劳动化的人，自己却远离劳动人民，人民的真实需求他（们）似乎全然不知，还自称调查研究是一贯的工作作风。人民饿饭的材料报上来不信，亩产十几万斤的“卫星”捷报却笃信不疑。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日常生活起居都得由许多人伺候着，甚至

---

包括拉屎擦屁股。刷牙漱口实在无法由别人代劳，牙齿就只能是黑的。与这样的人比，我问心无愧地说，我比这种人要光明磊落得多，要高尚得多。

## 学习鲁迅文风

我对毛主席和鲁迅一向是很崇拜的。记不清是 1963 年还是 1964 年传达过毛主席与王海蓉的一段对话。大意是主席劝王海蓉要敢于向她的领导造反，对于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是不服从，比如星期天晚上要求返校开会，你就不要回去，看他能把你怎么样，你回去带头造反。王海容说我可不敢，我要是违反了，人家该说主席的亲戚都不带头遵守组织纪律。主席接过话茬：你就说正因为我是主席亲戚，才听了主席的话造反的。接着批评王海蓉：你这个人啊！没多大出息，有什么可怕的，最多不就是开除嘛！毛主席还说了很多，诸如历史上凡中了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平时三四分就可以了，关键是毕业论文要写好；还有，教员应把讲稿发给学生，到了课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等等。

当时听了主席的这番话，我受到极大鼓舞，主席的辩证思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更加确信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全是各级基层干部的左倾狂热造成的，像主席这样精通辩证法的人肯定是最反感那种形而上学的左倾狂热。在文革中主席更是提倡“造反有理”、“敢把皇帝拉下马”，正合吾意，举双手赞成，誓死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是我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主导思想。

众所周知，毛主席讲过很多赞扬鲁迅的话：鲁迅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旗手，鲁迅的骨头是硬的，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等等。而我对现实的种种不解和不满，在大学中后期逐渐成了我心中的一个情结，专业学习反而放在其次的位置上。我按照我对主席的理解，我下决心要学习鲁迅精神，用鲁迅的办法来讽刺现实中违反毛泽东思想、违反客观规律的胡作非为。

如何学习鲁迅的文风呢？我决心通读鲁迅全集，学习鲁迅是如何用他那犀利的笔讽刺鞭挞社会上种种弊病的。我便从位于办公楼礼堂南边的第一图书馆借阅鲁迅全集，差不多每两三个星期一本。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引起了图书馆一位什么人的注意，一次正在换借时，他问我“你是哪个系的？”我说“数力系的。”他又问“你为什么不专心自己的专业学习，老来借鲁迅全集干什么？”我回答：“你难道不知道毛主席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吗？学习鲁迅的著作不就等于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嘛，这难道不应该吗？”由于他的口气有教训的意味，所以我也不甘示弱。我继续着我的做法，持续了近一年。

我学习鲁迅文风的做法，现在想来实在是愚蠢的，也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学到的。事实上我后来也并没有写过讽刺现实的文章。如果真要写了，恐怕麻烦就更大了。为什么呢？

在上世纪 90 年代，我看到一篇回忆文章。反右之后，有一次毛主席在上海召开了一个

---

座谈会，出席者是在上海的十几位有点名气的学者。有人在会上问了毛主席这样一个问题“若鲁迅还在，他在反右运动中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显然，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的挑战性！毛沉思片刻后回答：“那他是在大牢里，但他还在写，……。当然，他若能识大体，那就别吭声……。”尽管此时的我自认为自己早已经从大学阶段的愚昧状态中解脱出来了，但看到这段话时我依然很震动的。我在前边引述过的毛主席对鲁迅高度赞扬的话，与这段话显然是矛盾的！因为无产阶级的一个文化旗手级的大人物这么会蹲在无产阶级自己的用来对付敌人的大牢里呢？一个与毛主席心心相印的人这么会被毛主席的专政工具给专政起来呢？因此，这两段话都是真话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一真一假或一假一真，抑或全是假话。以我现在的判断，前者赞扬是假而后者坐牢是真，到底应该怎么判断，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后来在清理思想毕业鉴定阶段，在一次批判徐明曜的会上，我记不清是在代数拓扑全班的会上，还是只有代数班的会上，我作了个发言。因我早就意识到组织认为我和徐明曜有摘不开的关系，我不发言批判是绝对不行的。我说：“徐明曜有一阵子也是在学习鲁迅的著作上下了一番功夫的，是不是想通过学习鲁迅的文笔来讽刺和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呢？”这是我在大学阶段惟一的一次在批判会上，针对另一个同学的最有“份量”的批判发言，所以我记忆深刻。我估计可能还会有人记得我的这个发言。我发这个言时，我不是没有想到过别人一定会在心中反问我“那么你学习鲁迅著作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时的我已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陪绑批判的地位，所以也就什么都不在乎了。

1969年的一天，我返回北大一次。在29斋的南墙上看到一篇写得很长大字报，是当时的“井冈山公社”的几个年轻教工（名字我都熟悉）写的。主旨是揭露批判“新北大公社”的人包庇重用坏人。以数力系59级阶级斗争为例，点名列举了的人全是数一班的。有林世中、彭先度、陈华贤、麦结华、徐明曜、王理和施家荣，还有一个只说事没点名，那我也知道说的是谁。在我和施家荣的名下的罪名主要是偷听敌台广播等。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感悟到有人捕风捉影向组织汇报过我的“问题”。

在大学阶段，有些同学由于有所谓的“家庭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问题”，为了表示靠拢组织以保全自己，不得不写思想汇报，在汇报中有时难免要汇报其他人的一些问题。现在想来也无可厚非，应予以理解，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求生总是人的一种本能。但在当时，我还不全是这样想的。只汇报你自己是一种积极向上靠拢组织的表现，纯属个人行为，别人无权干涉；若捕风捉影不顾事实地汇报别人就不够意思了；更若偷看别人日记后再向组织汇报，那就是人品问题了。我从高一入团起至今，从未向组织作过一次思想汇报，更别说汇报别人的问题。

---

## 清理思想，毕业鉴定大结局

在这次“5.16”入学五十周年聚会中，大家私下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关于最后的清理思想运动为什么搞得那么厉害。我看到过一篇有关文章，在这里略述一二以供大家参考。

1963年7月7日中央曾下达过一个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文件说“据北京市委反映，今年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北京市的高等院校有这样情况，全国的高等院校也必然有这种情况，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和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于是北京市属高等院校的第一批“反动学生”被清理出来了，于1964年送往红星农场劳动改造。但在全国范围内还未大规模展开，可能是因为当年没来得及。

其实，从1963年3月5日全国开展学习雷锋运动开始，就已显露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势头。困难时期每个周末晚上都要在大饭厅举办的交谊舞会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取消的，因为每场舞会都由我们管弦乐队伴奏，所以我记忆深刻。

1964年7月18日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的吴子牧给北京市高校党委布置如何作毕业生的“毕业鉴定”时，特别强调“要关注学生的政治立场”。划反动学生的标准主要是“对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有攻击性言论”，对“三面红旗”、“反修防修”不满等。这样一搞，仅北京市的高校就抓了几十个“反动学生”，当然不准毕业，于1965年1月4日被送去南口农场劳改，只发生活费。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一贯极左的北大，又特别是数力系，更特别是我们年级能让咱们轻松毕业么！

我们的毕业证上的毕业时间是1965年1月，可我们真正离开北大都要快到1965年的五一节了。那年的前四个月，除了寒假休息了十几天，其余时间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段时间全时（full time）搞清理思想运动，现在想起来仍心有余悸，那真是痛苦不堪。每个人都必须拼命深挖自己思想深处的错误，“出身不好”的更得深挖阶级根源。其实此时大家的心态也是矛盾的，上纲太高了，对自己不利，到时候人家该说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上纲低了，那是对组织不信任，不老实，避重就轻是过不了关的。这个深浅的尺度很不好把握。

实际上，每个人在组织那里早已给你定了位，就看你有没有自知之明了。比如，像徐明曜若不上纲上线到反党反社会主义，恐怕是过不了关的。而我当时不够知趣，自以为相信毛主席是对的，只是对左倾狂热的工作方法不满，产生过一些“模糊认识”而已。直到组织给做的“毕业鉴定”出来之后，才意识到我的“问题”原来极为严重。

实际上，在当时那种极其敏感的氛围下，有些人的心里还是有自己的小九九的。有一个

---

非数一班的同学，上英语课与我是同一个班，平日与我接触较多，分专门化后也经常到我们宿舍来玩闲聊，关系融洽，许多观点都相当一致。相互之间没有戒备，说话都很随便。在毕业鉴定的最后阶段，有一次开完大会返回宿舍时，我心情比较沉重。快走到28斋北门时，我感慨地对他说了几句，意思是在困难时期，谁还不对大跃进三面红旗产生一点看法，现在抓住就没完了，成了阶级立场问题了。他接过话茬：“王理你这就不对了！在任何时候，对三面红旗都不应该动摇嘛！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立场嘛！难道你还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有过动摇？”我一听他这话，冲着他摇了摇头微笑着回了他一句：“行！行！算你狗日的比我灵活！”由于平日关系不错，他也没记恨我骂他。后来他被分去南方一个部队单位工作。

组织给每一个人的定位最终体现为组织给写的毕业鉴定。当拿到这个鉴定时，有相当多的人都感到出乎自己的意料，至少代数拓扑班是这样。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郑健、许云青、杨燕昌等同学拿着组织给做的鉴定，紧紧地皱着眉头反复看，唏嘘不断，心想鉴定做成这样也太过分了吧！而我的鉴定就更严重了，大概有这么几句：长期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认识不清，认为中国是教条主义，困难时期对三面红旗产生动摇，与组织离心离德。当时要求每个人最后是要在鉴定上签字的。我记得我在签名的位置上用特大号儿的仿宋体字写上王理两个字，以表示我并不情愿签这个字，是在逼迫的情况下签的。

后来在紧接着的劳动锻炼中，熟悉了分配在一起的函数班的王长沛同学，他与北大管弦乐队队长是好朋友，而我与我的队长关系很好，所以他早就知道我，尽管毕业前我们从未说过话。据他说在毕业鉴定最后阶段，召集各班的干部开过一次平衡各班鉴定的会，各班都拿出几个典型来在会上通通气，代数班就有我。王长沛说他听了我的鉴定很吃惊：这个王理不是和反革命差不多了嘛！

如果用前边所说的定义反动学生的几条标准与组织给我作的“毕业鉴定”对照，几乎就是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给我定个“反动学生”的罪名，我一点儿脾气也没有。然而有张世林、徐明曜被作为“反动学生”重点批判对象，我和另外一些人才得以逃过点名批判或划为反动学生的劫难。进一步推想，如果没有张世林和徐明曜，也没有我等几个人，那又该轮到谁作为“反动学生”的候选人呢？总不能没有对象可批吧！党组织总不能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吧！谁也不敢与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唱反调吧！恐怕这时候的同学们就会更加人心惶惶了。

整个清理思想运动的过程是以规模大小不同的批判会串起来的，有班级的、年级的、系级的（包括改为五年制的60级）、校级的（包括也改为五年半制的地质地理系的一个年级），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所幸的是徐明曜没给戴“帽子”，准予毕业且与大家一样分配了工作；而作为“右派”的张世林就没那么幸运了，又给戴了一顶“反动学生”的帽子，不过对他来说已有一顶在头上，再多一顶也无所谓。记得一次批判大会刚散，我前脚刚进宿舍

---

门，他后脚也跟了进来。他一看没人就满不在乎地主动和我打招呼说了一句什么，他就好像忘了几分钟前他还站在会场前边挨批判似的。我一回头正想回他的话，嘴刚要张开，就看见一位一贯极左的干部正好就站在我的宿舍门口看着我们，我的话顿时就被噎了回去。张世林看见我张嘴欲说又没说的样子也立刻回过头看见了那个干部，然后他就很知趣地转过身，没敢再吭声，低着头走出了我的房间。很显然，那个干部应该看见了张世林与我打招呼的全过程，或者听见了张世林的话。说老实话，回忆这种尴尬的场面，心是很痛的！我是设身处境为张世林而痛，他连与普通人说一句打招呼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其实我对张世林一点儿都不熟悉，我只知道他是右派，被处理到我们年级，究竟是函数班的还是概率班的我都记不准了。平日很少见面，偶尔碰面时，他主动热情打个招呼，我出于礼貌自然也热情地回个招呼，我与他之间恐怕连一分钟长的对话记录也没有过，他也从来没到我的宿舍来过。他那天为什么要到我的宿舍来，至今不得而知。我估计他并没什么事儿，刚刚挨完批判，又不敢随便与他人说话，见我一人往宿舍返，顺势就走了过来。（但他一定没回头往后面看！）他大概估计我这个人不在意招嫌，又见我的宿舍没人，就想随便说一两句话释放一下久不与人沟通的憋闷而已。

据说张世林后来被送去南口农场劳改，又重新开启了她的劳改生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如果还能有幸再见到他，我一定要问他那天到我的宿舍来究竟是有事想说，还是像我猜测的那样确实没事，就只是想找人说上几句话解除一下没有人身自由的孤独和憋闷。比起这些“右派”同胞们来说，我们可真是够“幸福”的了！

客观地说，经过这个漫长而紧张、痛苦而难熬的清理思想运动之后，有许多同学都是带着一个沉重的毕业鉴定和装着一肚子气离开北大的。例如在北大百年校庆的聚会上，有同学在座谈会上当众站起来发言：“自从离开北大后，有好多年我就再也不想回北大来了，每当坐车路过北大时，我都把头转过去不看北大，北大实在让我伤透了心了。”

## 多说几句

以上所写的文字，我用了约一个月的时间，尽管我打字不熟练，我也没想到会拖这么久。原因是一想起过去那个岁月就心潮起伏难以控制，中途多次失眠，第二天必须睡觉调整精神状态。以上的文字写完之后，越看越不满意，恨自己表达水平太低，好像连一成儿心思也没说清楚。作废吧！又可惜我花费的气力。思前想后又过了一个月到了今天，决定再多说几句合在一起，看看能否提高点儿可读性以供大家批评指正，免得我两个月的心血付诸东流，但却可能要浪费你至少2个小时时间，就看在同学5年半的份儿上吧。

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在我们就读的这5年半（其实差2个月就应该算6年了，因为改

---

为 5 年制的 60 级在我们毕业了 2 个月后就毕业离校了) 的时间里, 北大究竟是在培养造就人才还是摧残扼杀人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估计持肯定、否定和中庸三种态度的人都有。我是持否定态度的!

北大是有很多有真才实学的大家, 可是我们从他们那里受到的教益实在太有限了, 比如像闵嗣鹤、丁石孙、程庆民等这样高水平的教授才给我们上了几堂课就被轰了下来。反观又有多少同学因不堪政治高压, 精神高度紧张在不知不觉中患上终身性的神经官能症(神经衰弱)、心脏病等病症, 严重影响了他们后来的发展空间和生活质量; 我们在北大学到了很多基础专业知识不假, 可是大部分在别的学校也一样可以学到。比如就说高等代数这门课吧, 我看只要买到一本北大编的《高等代数》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会比在北大学得好。那么我是不是把在北大的五年半全盘否定了呢? 非也! 我以在北大能遇到这么多有才气的同学而感到幸运, 以与你们大家为伍而感到自豪。同学之间的相互熏陶感染、互动启迪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别的任何外在因素难以取代的, 我此生再也没有见到过如此人才集聚的地方。有一次张芷芬和丁同仁二位先生让我在北大一院的一个教室里作过一次有关“离散动力系统”的报告, 会后丁先生送我上车时, 我们聊起了北大的一些事情, 他对我说过: “北大出人才多, 并不是北大有什么高招, 主要还是因为北大学生的素质好”。再比如教咱们英语课的一位中年女教授陈瑞兰当时在课堂上就说过: “在全校几十个以英语作为第二外语的教学班中, 包括西语系的学生在内, 最数你们班学得好”。

我在美国学习的那几年, 经常仿效美国学生躺在厚厚绒绒而又干干净净的绿草地上, 四肢张开放松自己。此时很容易就想到, 如果在北大的那些年有现在这样轻松自在的环境该有多好啊! 肯定比在美国更好, 同学们个个都会身体学习双丰收, 门门功课全优实在算不了什么, 因为北大的老师不仅学问好, 而且诲人不倦, 对学生负责, 不像美国。我记得有一个很有些名气的教授, 在代数学的“模论”中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引理常常在“范畴”学(categories)中被引用, 他平日待人很谦和, 人缘特好。他上任何一门课都是只带一壶咖啡和一支粉笔, 其它任何东西都不带, 在课上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我有一次选了他的一门课, 结果他在课上以“一个土豆有多长?”为题讲了多半个学期, 最终我也没太弄清楚他“胡说八道”了些什么。

我经常想我们年级集聚了这么多才华出众的同学, 假如把当时的北大平移变换到美国东海岸的某个城市, 让我们在美国的教育制度下接受 4 年大学教育, 毕业后继续攻读学位, 然后再工作, 那将会是怎么样一个远景呢? 我估计会有 90% 以上的同学顺利地拿到博士学位成为大学教授或其它行业的精英, 当今世界成就卓著的大数学家、力学家中肯定有不少就是我们同年级的同学。然而眼下白发苍苍的我们却远不是这般景象! 尽管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在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后, 还是做出了不少很重要的贡献, 但离开我们大家本可以做出

---

的贡献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也想过北大当年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到哪里去了呢？蔡元培先生能容得下像辜鸿铭这种留着满清时的长辫子、主张一夫多妻制、要作张勋复辟后的外交部长、却能精通 8 国外语的老朽，蔡元培看重的是辜鸿铭的一技之长，当时北大聘请的英国外教们的拉丁文水平都远不及辜鸿铭。如今的北大怎么就变得容不下质疑三年饥荒的成因，认为主要不是自然灾害而主要是人为过失这样一个观点呢？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我想要说的第二点是应该如何看待极左思潮这个“毒瘤”对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的巨大制约掣肘作用。

众所周知，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就是极左思潮疯狂肆虐的过程，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的去世以及他一手精心栽培起来的“四人帮”的被捕宣示了文化革命的结束。但极左思潮的阴魂远没有散去，至今它仍在中国大地的每一块地方大摇大摆甚至理直气壮地游荡着！它还主宰着相当一部分国人的思维模式，使得我们走向民主法制社会的进程是如此之举步维艰！我想用一个事例来加以说明。现在任何一个人在任何场合下都可以不假思索毫无顾忌地说文革十年是荒唐的年代，连陈伯达这种人在 30 年前坐在审判庭的被告席上都敢认同这一观点，但是至今却没听说有人敢在公开场合下理直气壮地说 1957 年反右、1958 年的人民公社大跃进、1959 年反彭德怀、1960 年以后的反修防修与苏联的长期论战、1962 年开始大抓阶级斗争直到文革爆发这近十年同样也是荒唐的年代。应该说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存在的现象吧！难道是因为不荒唐吗？99 · 999% 以上的右派都是冤假错案并已平反，试问反右斗争荒唐不荒唐？现在法律认可 DNA 亲子鉴定、刑事案件 DNA 采样等达到 99 · 98% 的准确度为铁证如山的事实，法律也应该认定反右派运动是荒唐的了吧！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 100% 取消了，更可以认定是荒唐的了吧！彭德怀一案早被中共中央 100% 地翻了案，彭德怀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比任何人都高，却落了那么悲惨的下场，还能说不荒唐吗？修正主义这个词都快要从辞海中消失了，“中国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代表”刘少奇不是也早就“翻”过来了嘛！中国的改革步伐比赫鲁晓夫的大多了，还能说当年的苏联是修正主义国家吗？“反修防修”纯属无稽之谈！不一而足。

两个十年都荒唐，而“待遇”却截然不同，文革十年世人皆骂，而之前的十年不愿意或者不敢谴责者多，很不公正，什么原因？我认为是极左思潮的未亡幽灵依然在惯性地支配着人们的思维神经，却不被人们察觉或者有意而为之。在文革之前的近十年里，基本上是封建落后形而上学的思想意识无情打压先进文明科学的实事求是作风。拥护极左思潮宁左勿右者平步青云，坚持实事求是忧国为民者冤沉海底，几乎就是黑白颠倒，岂有公平可言；而文革主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管青红皂白，领导干部人人受冲击，广大群众也差不多人人自危，上自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大家都倒霉受罪，就有相对“公平”的一面。然而两者的

---

“待遇”却恰好倒过来。个中缘由就是因为极左思潮的幽灵制约我们不能把文革前十年所犯下的错误从思想深处彻底推倒。

建国 60 年，改革开放已经 30 年，不算短了，很多国人包括一些政要都意识到了我们的发展遇到了“瓶颈”。贪官越反越多，贪污犯越贪越大，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报纸头版头条登刊了东北枪毙了一个女会计王守信，贪污金额仅几十万元，已是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贪污犯，现在几千万元的贪官也未必枪毙，全国比比皆是。分配不公造成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犯罪率居高不下人们缺乏安全感，造假制假防不胜防且已蔓延到学术领域，买官卖官明码标价等等，无需我一一罗列。由此有人以为现在民主自由太多了，又留恋起毛泽东时代的“专制”，甚至有人以此否定改革开放政策。恕我直言，这种看法未免太机械太浅薄了。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也逃不出人民群众的视线，全民性的有效的监督机制肯定要依托于一种文明的、科学的、先进的意识形态的确立。我们痛斥过、清算过极左给国家和每一个人带来的灾难，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认真肃清过极左在意识形态领域给人们的思想方法带来的偏执顽症或曰极左后遗症。我们要想巩固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伟大成果，要想突破早已形成的阻碍国家继续发展的这个“瓶颈”，我认为就要从思想意识上铲除上述的偏执顽症做起，而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的一生便是最好的切入点。

人人都能意识到“评毛”是一个棘手的大问题，甚至是一个“危险”的问题，但这是躲不过去的，是迟早要做的事情，邓小平早就意识到了这点。不妨设想，真要拖上一百年甚至一千年，到那时再来评价毛泽东，就会像我们今天评价秦始皇、曹操一样，毫无意义可言，那只是史学家们的兴趣罢了。

前些天我看到一篇署名金冲及刊登在《党的文献》2009 年第 5 期上的文章“如何看待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金先生引用了大量数据阐述“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并引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话：“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据此金先生感叹：“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在有些人心目中似乎已不值得提起而无形消失。这难道是客观的和公正的吗？”金先生在文章的最后又套用了“普京公式”（俄罗斯前总统普京针对前苏联解体说的一句著名的话，不妨称之为“普京公式”）：“如果一味给‘前三十年’抹黑，那是没有良心；如果想‘走老路’，那是没有头脑”。

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地说话，我感到金冲及先生可能就是患有我前边所说的极左后遗症（“偏执顽症”）的典型代表。首先金先生犯了一个低级的逻辑错误，怎么可以用“前三十年”取得的经济建设的成就来抵消或掩饰极左思潮导致的政治运动给我们国家带来的无可挽回的灾难呢？在文革十年期间，我们在工农业、国防、科研、国际外交等许多领域虽然都

---

遭到了极其严重地干扰，甚至有的就是致命地破坏，但由于许许多多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良心顶风而上，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最终也还是取得了很多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我国的第一颗氢弹就是在打派仗最凶的 1967 年中在罗布泊爆炸的；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也是在文革中的 1970 年上天的，并且于 1975 年又成功回收了返回式卫星；从东风—3 到东风—5 中远程弹道导弹的首射和正式生产或试射也是在文革中（1966 年底—1975 年）成功完成的，从而打破了美苏称霸世界的格局；就连大家熟知的陈景润的“1+2”实际上也是在文革中（甚至一度在对他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于 1973 年才最后给出完整严格证明的；其它方面的成就我就不一一说了。面对这许多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党中央集体领导班子顺应全民意志不仅“抹黑”而且彻底否定了十年文革，难道党中央和我们大家都“没有良心”了？就只有金冲及们才有良心？如果按照金冲及们的逻辑，面对文革中取得的那些巨大成就，金先生就应该这么说了：“文革中取得的这些无可辩驳的成就，在有些人心目中似乎已不值得提起而无形消失。这难道是客观的和公正的吗？”由此金先生又可以套用“普京公式”了：“如果一味给‘文革十年’抹黑，那是没有良心；如果想‘走老路’再来一次文革，那是没有头脑”。大家能认同这种观点吗？

与金冲及先生一样患有极左后遗症的人为数并不少，由于偏执症很难治愈，很是经得起正确见解的冲击，所以才叫“经冲击”（“金冲及”想来是其谐音）。作为一个数学教师，面对只会套用现成公式而不善逻辑思维的人，我们首先必须要有耐心，然后再逐步地且慢慢地去教他们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切记不可性急！一旦性急稍有不慎，极左思潮的“有利”态势就会把我们自动推向党的对立面的一个极为不利的地位。记得文革期间我在落后的农村初级中学工作时，面对初中一年级的个别差等生，我经常都是耐着性子、想方设法给他们讲解清楚为什么  $1.1 + 1 = 2.1$  而不是等于 1.2，却又不能流露出性急的态度，否则有可能变成一个看不起贫下中农子女的立场问题。

我罗哩罗嗦说了这么多，也没有做到对 5 年半大学生活有一个较为全面的回忆。还有很多重要的事件我都没有涉及，如“突击俄语”运动；再如仅我们数学一班就有 2 人被逮捕收监、至少 6 人被处理退学、1 人在十三陵修铁路时无奈丧命等等。由于我回忆的只是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故只谈到对我影响较大、并且我也比较了解的一些事件。我未涉及到的重大事件就只能由其他同学来回忆了。

最后，我诚恳地希望同学们多提一些宝贵意见，特别是一些不太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声音我都愿意倾听，因为大家的目标肯定是一致的：求真、求实、求理。

---

# 走出北大第一站

数学一班 王理

## 一、离别北大

1965年4月23日——这个极为普通的一天对我来说却有着特殊的含意，它可以说是我人生道路中的一个拐点。因为在这一天，我怀着十分复杂而又格外惆怅的心情离开了北京大学，开始走向社会。我走入社会的第一站就是北京西南郊约四、五十里地的卢沟桥农场。

与我一起分配到北京市教育局去做中学教师的同学一共16名，除了其中3名同学因身体原因等待被分配到中学外，其余十三名同学被北京市教育局用一辆解放牌运货敞篷大卡车连人带行李直接拉去卢沟桥农场劳动锻炼。

4月末的北京，春意盎然百花争妍，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春风荡漾万物复苏，人的心情通常也总是随着浓浓的春意的到来自然而然会变得愉悦欢快起来。此时的人们早已脱去了笨重的冬装，换上了轻便的春装，要是现在更是年轻姑娘们展现自己时装的大好时间。然而，当时的我却完全是另外的一种心态：无言的失落加低沉的无奈。

我记得那天上午约九、十点钟的时候，数力系办公室主任等几个领导人来到28斋北门为我们十三人送行，与大家一一握手话别。可是又能说些什么呢？“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中学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种口号不知道喊过多少遍了，我们实在不想再言不由衷地重复了！那他们呢？他们心里其实什么都明白，我们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完全是他们创造性地推行极左路线的结果（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后面我再详述）。所以他们来“话别”其实是只“别”而无“话”，互相握手时双方短暂的对视“微笑”，由于是皮笑肉不笑，结果双方的表情都比哭还难看。

当大卡车缓缓驶出北大南校门时，站在敞篷车箱边的我们不约而同地回望了一下平日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南校门。此时无声胜有声：再见了！我引以自豪的北大！此时此刻的我丝毫也没有自豪的情怀。

按说，毕业了走向自己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新的生活即将开始了，心情应该是很激动的，站在行进中的大卡车上的我们大声地嬉笑言谈恐怕是按捺不住的。可事实并非如此！只有无言的沉默与时间同步。反正我一点也没有感受到春风拂面带给人的惬意，倒是在无言中有一丝期盼不由自主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说心里话，做中学教师一直是我比较抵触的一种工作，因为我总是错误地觉得今天老师

---

教给我 $2+3=5$ ，明天我再同样地教给学生，实在没有多大意思。而且我也错误地以为中学教师就好比“羊头上的毛，多长就是多长，一生不变”。不过，现在大家都去做中学教师了，也不是我一个人，那就做吧！以后再等机会跳槽。反正北大的牌子还是硬的，这些都不是我心中的忧虑。

卡车不停地往前开着，我无意查看路过的地方是哪里，反正北京我也没去过几个地方，哪儿都不认识。倒是我心里在不停猜想着或者说是期盼着：这北京市教育局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单位，总该不会像北大这么“左”吧？北京的中学和我们家乡那里的中学差不多吧？去卢沟桥农场劳动锻炼我一点也不怵，对于体力劳动我早已训练有素，可千万别像当年十三陵修铁路劳动那么狂热，这往后的日子就好过些了……。

卢沟桥农场是北京市教育局的劳动基地之一，已有约一、二百名近两年分配在北京各中学做了教师的大学毕业生正在那里劳动锻炼。据说国务院规定从1963年起，全国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必须先劳动实习一年方可有资格上岗，所以这批1963和1964年毕业已当了一两年中学教师的大学毕业生从1965年2月7日起已经开始在这里补劳动实习一年的课了。

载运我们的卡车直接开到卢沟桥农场场部的食堂门口，卸下行李暂时往旁边一堆，我们十几个人排成一行被带进正在开“整风”动员大会的食堂。一阵欢迎的掌声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会场里每一个人不分男女全是一身统一装束——头戴退了色的黄军帽，身着旧军上衣，另外腰间还系一条黄绿色帆布武装带（这与后来文革中的红卫兵的装束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少了左胳膊上的一条红袖箍。现在想来，此后一年多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还确实有点群众基础）。这些换了装的中学教师一人一个小马扎按军队的班排连编制有序地、整齐划一地端坐在那里。

作报告的人是专门从北京八一学校请来的孙政委。后来听说孙政委是经过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洗礼的老革命，所以才特意请他来做这个劳动实习基地开展整风运动的顾问。

孙政委的报告自始至终充满着高昂的革命激情，效仿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的讲话姿势，一会儿双手叉腰，一会儿单手叉腰晃动着另一只手，声音洪亮且唾沫星儿四溅：你们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改造自己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只有勇敢地、不怕丑地暴露灵魂深处的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你才有可能站在工农大众一边来！……我们这次整风运动就是要在暴露问题的同时深挖阶级根源，要彻底铲除你们头脑中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土壤，要狠斗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一闪念！……在全国工业战线的样板是大庆油田，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全国农业战线的样板是大寨大队，口号是“农业学大寨”。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卢沟桥劳动实习基地变成全国知识分子革命化、思想改造的样板，要在全国范围内诞生一个新的口号“改造知识分子学卢沟桥”。

---

我完全被他的气势给镇住了！一种无名的恐惧和压抑骤然袭来。这可真是怕什么还就偏来什么！刚刚在北大艰难地熬过了三个多月“清理思想批判反动学生”的毕业教育运动，现在接茬儿又要搞延安式的整风运动了，又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了！我明白了，也就更灰心丧气了。心想难道这里真的比北大还北大？不知分到上海和河北省当教师的同学现在干什么，是否他们也有此厄运？……我只顾想自己的心思，孙政委再说了些什么，我就一点也没听见了。

## 二、卢沟桥农场

这个国营农场以饲养繁殖奶牛和采集牛奶为主，兼种苹果、葡萄等经济作物，也种一些玉米、高粱等农作物为奶牛做饲料用。

一个规模不大的国营农场，一下来了二、三百号人，住房就成了大问题，我们十几个人又晚来两个半月，只能“委屈”奶牛们了。把圈养奶牛的牛棚用芦苇编成的草帘子隔出一块空间，这个草帘子的两侧再用白石灰浆抹严实，我们住在一边，牛在另一边。文革时，把有“问题”的人关起来隔离审查叫“住牛棚”，大概是形容像关牛一样关在牛棚里，其实他们并没有真住在牛棚里。而我们才是真正住在牛棚里，以牛为邻。那层薄薄的芦苇隔墙根本挡不住牛的屎尿散发出的臭气和湿气，更挡不住小公牛饥饿的嚎叫声。原来，这个奶牛场“重女轻男”，奶牛生下的小牛若是母的便精心喂养，等她长大后再产奶；若是公的，便扔在我们隔壁的牛棚里任其饿死后再埋在地里，沤作有机肥料（至今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把小公牛作为肉牛养大），我曾亲手埋掉一条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公牛。我无法排解臭味和潮湿，曾试图用一舀子水代替牛奶喂小公牛喝，来止住他的嚎叫。结果他在狼吞虎咽了几口之后，发现上当，叫得更欢。在这样恶劣的住宿条件下实在无法入睡，致使我的植物神经系统更加紊乱，整日昏昏沉沉。更糟糕的是，没多久我全身皮肤过敏，大片大片的过敏斑片布满全身。

其实农场的劳动强度并不算大，无非平整土地，引渠灌水等。清理牛圈的屎尿或处理发酵饲料等杂活也只不过脏臭难闻一些，并不需要很强的体力。

真正让人头痛的还是大搞形式主义的种种人为举措，围绕着“革命化”、“军事化”、“延安式整风运动”等等，花样不断翻新地折腾人。

## 三、军事化

从早晨起床号吹响，一直到“晚点名”（军队上的术语，相当于文革中的“晚汇报”）之后上床睡觉的熄灯号响毕，一整天的全部行为实行军事化管理。据说这是为了革命化的需

---

要。为了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必须向解放军学习：班、排、连要争创“四好连队”，个人要争当“五好战士”，因为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起床号一响，必须在几分钟内整理好“内务”。偶尔还来个“紧急集合”，也必须在几分钟内打好行李背包，背在肩上列队站好，接受领导的军风纪检查。

三餐去食堂吃饭都是列队行进。边统一号令“齐步走”，边唱革命歌曲直到食堂门口。各连到齐后，逐级清点人数并向一级首长立正、敬礼、报告人数。然后再一班接一班地列队顺序进入食堂。

班以上的集体劳动，特别是连一级的“大兵团作战”式的劳动，行进中更是红旗飘扬，歌声嘹亮。到了劳动地点把红旗插在地头以壮军威，再立一块小黑板，用粉笔抄一段“毛主席语录”以警示在劳动中别忘了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当“整风运动”进展到某一个段落需要开大会总结或交流经验时，一般都要整队去较远一个的场部礼堂。一路上高唱革命歌曲，到了会场各连队互相“拉歌”，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尽显年轻人的热情朝气，以及听党的话改造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决心。

我是一个善于记住曲调而难得记住歌词的人，但由于天天重复很多遍地唱，事隔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依然可以记得当时唱得最多的几首充满革命豪情的革命歌曲：“四个第一是方向，毛泽东思想闪金光……，革命化加现代化，猛虎插翅更英豪，更英豪！”“巍巍井冈山养育着钢一连，毛代表就在我们的身边，朱军长走在队伍的前边，嗨！走在前边。我们来自南昌城下，我们来自湘江两岸，为了红色的政权，和白匪军决一死战！……”等等。

我从大学三年级起就患上了极为严重的神经衰弱，一遇上大的场合，经常心慌紧张，手脚心出汗，甚至伴有恐惧感。我当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自己比别人缺乏革命激情，所以总是暗中鼓励自己勇于向积极热情的同志们看齐。

但也有怀疑的时候，难道你们真有这么高的改造自己世界观的革命激情吗？难道你们都喜欢天天过这样紧张的军事化加革命化的毫无“自由支配”时间的生活吗？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位好像是来自外国语学校的法语老师，他人高马大，又由于是左撇子，指挥唱歌或“拉歌”时，动作非常夸张，挥动手臂的动作总是左强右弱，左大右小，越人多越发挥尽兴。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什么集会上，我很偶然地遇见了他。尽管我从未与他讲过话，他也不认识我，由于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好奇心使我毫不犹豫地主动上前与他搭话：“你1965年曾在卢沟桥农场劳动实习过吧！我见过你！”他对陌生人的问题先愣了一下，然后很友好热情地与我握手并答道：“是的！你当时也在那里劳动吗？”我未加思索马上就接着说：“你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你那时每当开大会时，指挥唱歌动作很大，激情四射……”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涨红着脸立马扭头就走，不辞而别。惊愕的我立刻意识到我伤了他的自尊心，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为自己的鲁莽行为后悔不已。不过再转念一

---

想，我许多年前的“怀疑”此时也就等于有了答案。

## 四、延安式整风

劳动并不是“劳动实习”的主课，主课是思想改造。而思想改造的手段是孙政委一再强调的“延安式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由北京市教育局下属的相关各层组织早就做了精细的安排，与毕业前夕的“清理思想批判反动学生”运动大同小异。先集体学习并认真讨论毛主席的有关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而后再以林彪的“四个第一”为指导思想，在班组见面会上发言，暴露自己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加以批判并表明自己的认识（当然最后都要写成书面材料上交组织）。最后接受其他同志们的批评帮助，进一步提高认识。为了取得组织的更多帮助和信任，比较认真积极的同志往往在会前或会后还要找正、副两位指导员个别谈话（指导员是党员叫云香艾，年纪三十五、六岁，可能是专职干部。副指导员是和我们一起分配来的北大同学李世新，预备党员）。

在毕业前夕那三个月的运动中，我是被列为“重点对象”对待的，虽然没有公开宣布。差不多还是原班人马现在又搬到卢沟桥来了，自然还应是“重点对象”，这一点我心里是有准备的，我必须老老实实接受这个“地位”。

在整风运动的暴露“活思想”阶段，那些已经有了一两年社会经验的老师们比我们这些“刚出道”的学生毕竟“油”多了。人家的暴露“活思想”那才叫有水平！

一个从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的Y老师，在暴露自己有成名成家思想时，说有一次他在颐和园昆明湖划船，当船到湖心时，他静躺在船上仰望蓝天，高声感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说完他自己首先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大家一起跟着笑。

一个从师院物理系毕业的华侨，在谈到自己如何克服私心杂念，向雷锋同志学习帮助别人时，说他曾慷慨地把一个漂亮的罐头盒送给了一个同学，又引起了一场哄堂大笑。

他们的“水平”使我大长见识，但我却很难效仿。我是怎么熬过这一关的，如今已记不清了。但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帮助”激起了我内心的反感，所以还能记得一些。

改造思想首先必须以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先行，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应该落实在什么上，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认识。当年的报纸及舆论也正在热议这一原则性的问题，针对军队正在搞的军事“大比武”运动，当时最时髦的观点就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是落实在军事训练上，而是还要落实在无产阶级政治上！”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落实在无产阶级政治上”依我看来在逻辑上都是极为荒唐的！所以我固执地认为改造思想必须要落实在行动上，对正在劳动实习的我们来说，就应该落实在

---

劳动上。说到做到，对待劳动我不仅表现积极，简直就是拼命。在劳动中我暗自较劲，要把所有认为我有思想立场问题的积极分子比倒。

由于我在劳动中的“拼命表现”是看得见摸得着有目共睹的，在对我的“批评帮助”时不好否认，但我是“重点对象”这一点大家都心照不宣，从而衍生出了两个观点和看法。其一，“王理劳动表现好是由于他的劳动技能好，这并不能说明思想改造得好”。其二，“如果某个人把体力劳动作为锻炼身体的手段而表现突出，这怎么能和思想改造好联系在一起呢？”

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的任何辩解都将是徒劳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

不过，话再说回来，对上述第一种说法我虽十分反感，却不容易辩解。而第二个观点我虽不喜欢听，倒也是点到了我的“穴位”上。我一直坚信对付神经衰弱的唯一方法是体育锻炼和体力劳动，任何药物只能起辅助作用。

这场“整风运动”映射在我身上实际就是毕业前夕那场阶级斗争的继续，其后果却更为严重。我明显地感觉到教育局派来的“领导”们对我射出的是敌视的眼光，靠拢组织的“同事”们也与我渐行渐远。另一方面，与我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除了几个一起分配来的大学同学外，又增添了三四个新结识的老师，所以并不觉得孤立。对那些“敌视眼光”，我的回赠毫不示弱也是同样的敌视！但我的心里明白今后的日子无疑是凶险的，我的档案里塞进去的东西绝不仅仅是我的毕业鉴定上的那几条。

在此，我想再说几句与这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关系不太大的题外话。

北京市教育局下设一个“劳动实习办公室”，专管全国各地分配到北京做教师的大学毕业生在分配去各中学任教之前的一年劳动实习。除了办公室主任等几个专职领导外，统领这几百名劳动实习生，就需要配置若干“带队”的干部。

我奇怪的是前后几个统领我们这一批人而又为党组织极为信任的干部，都不是“根正苗红”的人，而且有的甚至连党员都不是。比如最敌视我的一个带队干部，他就不是党员，而且出身“反动军阀”。他1960年毕业于男四中，立志要考清华，将来当一个导弹火箭专家。可能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结果被录取到师院物理系。经过四年洗心革面的思想改造后，决心“背叛家庭”做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1964年大学毕业后，在劳动实习中，思想改造表现突出。一结束实习，马上破格提拔为政治干部留在市教育局，当了我们的带队领导，相当于大学阶段的政治辅导员。

起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敌视我。从我到卢沟桥农场直到文革开始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基本上一直领导着我，我从未顶撞过他，他也从未和我说过话。目光相对时，表现出的是明显的冷漠与敌视。

---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我们从密云山区返回城里。紧接着刘少奇派出的“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成了最革命的标志，“保”党组织领导反而成了可耻的“保皇派”，这与1957年反右时代的逻辑恰好相反。

有一天，我的这位从不与我讲话的带队领导突然主动来到我的房间串门，使我非常诧异。他身体倚在同屋的被垛上，双手抱着后脑勺，后仰着身体，一改往日的冷漠与敌视，很随和地与我聊起了天。他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看来呀！过去档案里的许多东西，现在都是需要重新审视的！”听了这句话，我一下就全明白了！原来他之所以投给我那么“敌视”的目光全是因为我档案里的“黑材料”。他“出身不好”，为了显示自己已彻底背叛了自己的“反动家庭”，对我这种“敌对分子”的态度自然要事事处处表现出“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文革爆发后不久，一切都反过来，各单位党的领导成了“走资派”，过去挨整有“问题”的人的“问题”自然不一定再是“问题”了。他脑瓜灵活转得快，这是在向我示好，我怎么能不接受呢？

## 五、工休假

卢沟桥的劳动实习每个月放四天“工休假”，一般安排在月初。所以刚去了一星期就赶上了工休，又正好是五一节。我们这十三个人中只有四五个人在北京“无家可归”。正好离开北大时的宿舍还没有人住进去，无家可归的我们几个就可以回北大度工休假。

一个星期前离开北大时，心情是那么的急切，一天都不想在北大待了。一个星期后返回北大时，心情完全变了！首先感觉到自己不再是“主人”了，有点熟悉而又陌生“客人”的感觉。其次，离开了卢沟桥农场那种紧张揪心的、强制军事化的改造生活，回到北大28斋就像找到了一个“避风港”似的，有种久违的释然感，甚至还有点儿亲切感。仅仅过了七天，就产生了如此相反的心理变化，其实说怪也不怪！

七天前急着想离开北大，是因为实在熬不住在北大的漫长极左岁月，尤其是最后的那三个月“清理思想”运动。7天后回到北大，心里很明白：北大已再也不会有“运动”来找我的麻烦了。28斋此时变成了我的一个逃避现实的“避风港”，感到分外亲切释然，在这座楼里住了快六年了，还从来也没有过这种感觉。

五、六两个月的工休假都是在北大度过的，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短暂的轻松自由。此时，我也不断地反省自己。为什么自从上北大以来，我总是在煎熬中度日？我在中学阶段的生活比在北大时要苦得多，体力劳动也比在北大时多得多，可我并没有这种煎熬的感觉。原本盼望着离开北大后，能有一个稍微宽松的境况，谁知还是一个样，甚至更糟。大好青春年华总就这么个过法！更若一生都要是这么个活法，这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

从七月份起，北大就不让我们再回去住了，据说是因 28 斋要全部腾出来给即将到来的大批越南留学生住。

当下在卢沟桥劳动实习的这批人要到十一月初结束（共 9 个月）。我们这 13 人比人家少了两个半月，局领导决定让我们再随 1965 年暑期毕业新分来的应届毕业生一起继续“劳动实习”。这样，7、8、9、10、11 这 5 个月的工休假，我们这四五个人如果进入市内，不当天返回卢沟桥农场的话，就真正变成了“无家可归”的“盲流”了。

那时的交通很不方便，从农场进城一天只有一趟火车到永定门火车站，还要走很远的一段路才能坐上火车。一到工休假，掩饰不住内心喜悦的大队人马急匆匆涌向火车站，我们几个也被裹夹在人潮中往城里跑，其实我们几个是没有目的地的。

其实在城里我有一个亲戚家可以留住。但我不愿意“寄人篱下”，更不愿意看部队大院里那些“上等人”的“异样眼光”，宁可独自在城里游荡。白天好办，北图阅览室和西单电报大楼里一条很大的石头面写字台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饿了就去饭馆。晚上就比较麻烦，那时住旅店要单位介绍信或工作证，我们什么证明身份的东西都没有，返回农场又不情愿也不方便，就只好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的长椅子上过夜。那个年代晚上候车的人不多，空椅子比较好找。但是执勤民警不时就过来查夜盘问，态度凶煞，怀疑我们是“盲流”。照实情说，人家不信：“单位怎么可能不管你的住宿问题呢？”为了省事不得不编谎话，有时还不得不换个地方睡。一晚上来这么三、四回，觉也根本睡不踏实。

一个从师院毕业分配到灯市口女中的男老师，知道我在火车站过夜后，有一次请我到他住的集体宿舍过工休假。宿舍很大，三个床位只有他一个人住，其他两个人有家，只是白天午休一下。尽管单身宿舍很零乱不洁，我还是很羡慕他有这么温馨的一个“自由空间”，真希望他的现在就是我的未来！然而，后来的事实说明这只不过是我当时的一个像“美丽的肥皂泡”式的奢望而已！

十一月上旬以后，这批 1963、1964 年毕业的老师们结束“劳动实习”凯旋回归各自的单位了。我们 13 人与 1965 年暑期分配到北京市教育局的部分外地毕业生合并，继续劳动实习。这批人都是来自上海、杭州、四川、黑龙江等地的外地人。而来自市教育局的“嫡系部队”——北京师院和北京师专的这批毕业生都去密云搞“四清”去了。这批外地人足有六、七十人，人多势众，劳动实习办公室的领导就不能不考虑这批人在工休假期间在城里的住宿问题。住宿地点安排在师大附中对面的教师进修学校的空置房间内，我们几个人沾了他们的光，从此工休假期间才有了住处，再也不用去火车站过夜了。

## 六、下乡“三同”

---

军事化的“延安式整风运动”持续了两个多月后，领导突然宣布：“我们的劳动实习要贯彻‘集中、分散、再集中、再分散’或者叫做‘上来、下去、再上来、再下去’的原则”。把这一、二百人分成三部分，分别下放到卢沟桥农场管辖的三个生产队与社员“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北大同学中代数拓扑班的李世新、卢才辉、王汝楫、唐云、杨燕昌与我，还有一个1963年从北大原子能系毕业分到教育局、一直劳动改造不予分配工作、有“严重问题”的同学丁士中，我们七个人与其他四十来位老师们一起分到一个叫老庄子的生产队。

到生产队与社员“三同”，分散到社员家里吃住，自然就不能搞“军事化”了。和社员一起劳动，下地干活也就不能再扛红旗带“语录板”了。晚上也不能再开会学毛主席著作了，更不用搞“晚点名”等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精神上松快多了。

与社员“三同”之后，至少大家伙脑子里“阶级斗争，思想改造”的弦不用再绷得那么紧了（当然领导们的眼睛是从来不放松警惕的）。在新的环境下，新的任务就变成了如何向贫下中农学习他们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等优秀品质。社员们都是很朴质无华的，他们只看你做得怎么样，而不是看你说得怎么样。这一点对我很有利。

我和另两位老师三个人同住在一户社员家里腾出的一间堆放柴禾的矮土房里。由于房矮，人不能站在土炕上，只能站在地上。男主人姓李，四十出头，我们叫他李大哥。他一家八口人，他的爷爷、奶奶已经八十五、六岁，由他养老，还有媳妇和四个孩子要靠他养活。李大哥是村里有名的庄稼好手，他看我干什么农活都有模有样，和我很谈得来。我们和李大哥家相处得如同一家人，收工回来，几个孩子总是在我们的土炕上打滚和我们嬉闹，毫不见外。

在农村虽然只“三同”了四个月的农忙季节，差不多干遍了农村所有的活儿。确实感受到了农民的辛苦以及他们身上那种朴质的实事求是的生活态度，确实有很多事值得一说。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说两件印象比较深而又很能反映当时社会背景以及我的心态的事。

一件是“四清”运动的熊熊烈火也烧到了这个不起眼的生产队。不仅烧到队干部身上，连李大哥这样一个下中农出身的普通社员也不能幸免。李大哥在村里是有名的庄稼把式，碰到一些与季节农活有关的技术性问题，队长总要找他商量，社员们都服他。平日里与干部及社员们打交道中难免流露出一些傲气，不够尊重他人，得罪了一些人。

在四清工作组的安排下，有一次全体社员大会上就专题批判他的傲气。农村开批判会，虽然农民散漫惯了，会场上孩子哭，大人说话，妇女做针线活，但是“四类分子”总是要站在会场前边低头“陪绑”的，所以会场上还是有些肃穆气氛的。很多人都发了言，有一个年轻的复员军人站起来批李大哥“眼睛里从来不夹别人”，并举了很多实例。下中农成份的李大哥什么时候经受过这个“阵势”！他根本没想到会批判他。在长达一两个小时批判过程中，李大哥神情紧张脸色蜡黄，一袋接一袋不停地抽旱烟以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划火柴点烟锅

---

时，手不断地在抖，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另一件让我终身难忘的事发生在一次刨土豆的集体劳动中。

刨土豆本是一件简单的劳动。土豆是一垄一垄有规律地埋种在地里，外面看不见土豆。用一个短柄“三齿”（三个铁爪垂直于手柄）来刨挖，不熟悉土豆埋在地下规律的人，很容易把“三齿”扎在土豆上。一扎就是一个窟窿，这个土豆就存放不久，容易坏。

每人一垄，不分男女，从地头开始，各自挖自己的一垄。即使与社员一起干活，谁也不愿落后。刨挖土豆本来应该往垄下稍远一点的地方刨，以免伤着土豆。但若掌握不准距离，离垄太远，就有可能刨一下之后，连一个土豆也刨不出来，影响自己的进度。我们这些“臭知识分子”为了“面子”抢速度，为了每刨一下尽量多地刨出土豆来，就直接往垄上刨，结果往往就扎中土豆了。

在后边监工的队长看到这种情况直着急，可又不好意思批评我们这些老师们，就拿一个“四类分子”出气。他走到一个“四类分子”的身后大声呵斥：“你怎么搞的？光知道往前赶，你看你刨出来的土豆，全都让你给扎坏了，你想搞破坏吗？你给我放老实点！”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大，明显是说给其他人听的。这个“四类分子”听到队长的呵斥后，立刻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身后已经刨出来的土豆，又看看队长的脸色，一句辩解的话也不敢说，默默地承受着队长的无端指责和冤枉。直到队长离开后，才无奈地回过头来继续刨挖。

整个过程全部被我收入眼底，给我的刺激非常非常大！

这个“四类分子”据说是从山东过来的“逃亡地主”，叫什么名字我忘了。高高的个子，看样子也就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完全秃顶了。在工间休息的时候，大家都三五成群坐在一起聊天。他一个人独自坐在一边，举着他的旱烟锅子抽着烟，没人搭理他。我的内心激烈地涌动着一种说不清的情绪，思绪万端，不想与别人说话，也单独坐在一边。我不由自主地把一种同情怜悯而又疑惑的目光投向了他，刚才刨土豆时队长无端呵斥冤枉他，我在揣测着他现在在想什么呢？他又能想什么呢？不知是否由于某种“感应”，突然间他也把目光转向了我。我们俩对视了几秒钟后，他又主动移开了他的目光，继续注视那遥远无垠的远方！

## 七、我想“彻底解脱”

离开北大前，我一直认为北大是个特殊情况，其他地方或者单位不会都像北大这么“左”。你看清华就不像北大，我有两个同届的同学在清华，从他们那里我得知，人家就没有那么多那么“左”的运动。所以我一直期盼着赶快离开北大，无论到哪里应该都比北大好得多。

到了卢沟桥农场的第一天，就给了我当头一棒。革命化加军事化的“劳动实习”不说，还要用“延安式的整风运动”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其“左”的程度比北大有过之而无不

---

及。分到上海和河北省当中学教师的同学，没听说他们之中有谁也像我们这么个“劳动实习”法。更没听说方程、概率和计算班分到科研单位的同学有劳动实习这回事。倒是听说了他们已经进入自己的专业工作，而且还听说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坐着卧铺去上海出差，更有分去保密单位的人出于保密安全的需要坐软卧包厢出差。天壤之别的境遇只能使我屡屡为自己运交华盖而叹息。

走入社会后这短短几个月，就使我对未来完全失去了信心。且不说北京如此之大竟无我立锥之地，我总感到我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报纸和电台广播的舆论导向我总觉得是错误的。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说得冠冕堂皇，一到实际中就变成了谁“宁左勿右”谁就占了先机。各行各业全国各地天天叫嚷着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什么是无产阶级政治？怎么个突出法？根本就谁也说不清……。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思前想后翻来覆去得不出一个自信的结论，但它却充斥着我的整个精神世界。

在北大时，虽被打入另册列为“重点”，但还没有被当作阶级敌人对待。如今进入社会，我的言行已有很大收敛，反而似乎沦为阶级敌人而倍受“敌视”。我意识到中国的大形势若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我的前景只会每况愈下，毫无前途可言。而当时中国的形势明显往“左”越走越急，丝毫没有“刹车”或“右转”的征兆。

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觉得这样活下去已毫无意义，也毫无必要！大约在 1965 年的八、九月份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结束人生，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必须要完成几件事。那就是要完成四五篇论文，我要把我的全部思想观点清楚地表达在这几篇文章里。在文章中我不仅不回避与现实意识形态的冲突，反而要严密论证现行的政治倾向完全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种形而上学。现在想来，我那时有多么的愚蠢！

利用每个月 4 天的工休假，在北图或电报大楼我努力地撰写着这几篇文章。我完成的第一篇是“论‘少而精’与辩证法”，约两万余字。“少而精”是林彪在六十年代初对部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很快传遍全国，成为指导各项工作的一个方针。我当时非常欣赏，有一定的思想基础，所以先完成了这一篇。第二篇的题目是“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此文已完成大半，约一万多字，后来中断是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我下面就要说到。我计划中的第三篇是“形而上学思想方法论为什么会在我国得以盛行？”第四篇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统一与相悖”。后两篇的腹稿提纲也都完成，各写了两、三页。

现在回想，那一阶段我的心态其实是很平静的，写作时也很专注。对死亡一点儿恐惧感也没有，人活多大终有一死，我感到这个世界实在没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至于死的方式我多么希望天上掉下来一架直升飞机或者一块外星陨石正好砸在我的头上，或者在“拼命劳动”中来个重大事故突然死亡。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机会，自行了断也无所谓。

---

## 八、一个全新的环境

大约从 1965 年 11 月 10 日起，一个新的环境开启了。

我们 13 人与刚从外地分到北京来两、三个月的一伙人合并，继续劳动实习。地点不动，还是这个卢沟桥农场。物是人非，这拨“新人”谈吐行为与上一拨老师们完全不一样，不仅不“油”，反而显得稚气十足，尤其很多女生对政治好像完全没有兴趣，有时显得幼稚可笑，这让我感到非常奇怪。再加上不再搞“军事化”，不再搞“延安式整风运动”，气氛一下变得和谐宽松多了。

这个新集体除了一两个前边说过的“带队领导”之外，还新增加了一位刚从杭州大学俄语系毕业分配来的党员，他是个调干生，年纪比大家大几岁。他有一次在一个普通的座谈会上主动暴露自己的“活思想”：“我在上大学以前就是个中学教师，后来不想干了，就上了大学想毕业后能换个工作，结果大学毕业后还是当老师，我心里就很不高兴”。听了他毫无掩饰的、语气极其平淡的表白，我很吃惊。首先，现在没有搞整风运动，也没有人要求你非暴露自己的“活思想”不可；其次，你作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不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反而先把自己的“心里话”给吐露了出来。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党员！至少在北大和北京市教育局没见过。

在文革以前的年代里，在普通百姓的眼中，党员就是高人一头的。党中央的一位主要领导人曾公开讲过：“过去是考秀才，现在就是考党员”。那么“考”上了党员，能不高人一头嘛！党员在人们意识中的形象就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高高在上，一贯正确。现在眼前的这个党员完全不是这个形象，对谁都是和和气气，群众关系极好。他喜欢看小说，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在以后多年的接触往来中，更体会到他和他的夫人（与他一同分配来的同班同学）都是人品朴实正派的人。

与这伙“新人”的接触中，还有一件事使我很吃惊。从上海外院来的人中有好几名女生，表面上看过去就娇滴滴的，什么活儿也不会干，更谈不上“政治警觉性”。一次闲聊中谈起她们的大学生活，一个女生说起她在她的校外租的房子里搞过一次生日聚会如何如何好玩儿。我一听大为吃惊，在我看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要为我的“吃惊”而吃惊了！这是很正常的事嘛！

然而这在当年的北大，绝对是不可想象的事。第一，当年的大学生都是住集体宿舍过集体生活。即使你的家近，住在家里走校大概也许会被允许，（但在北大绝对不行！）哪有可能允许你在校外租房子住的道理！第二，生日聚会在那个年代是严重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敢说在北大谁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搞一次这样的生日聚会，可以断定他（她）的政治生命将从此结束。

---

这伙女生不关心政治的程度也是够让人惊讶的。还是上海外院来的另一名女生 1967 年与我住在同一个楼里。有一次我们北大几个同学在一起聊起北大聂元梓的事，她在一旁听着突然插话：“聂元梓是谁？”我吃惊地反问她：“聂元梓是谁你都不知道？”她居然回答我：“没人告诉我，我怎么能知道”。

这伙人多来自上海、杭州、四川等南方地区。和他们接触使我产生了一种好的印象：看来外地尤其南方的政治气候不像北京这么恶劣。生活在他们的圈子里使我有了一种久违的松弛感。

在新的集体里，各方面的环境都有很大的改观。谈得来的人也多了，工休也有住处了。1966 年春节，大家在一起包饺子吃，说说笑笑也有过年的气氛了。记得杭大俄语系来的一名女生是北方人，她可以同时擀两张饺子皮，而且质量很高，可以同时供好几个人包，使我大开眼界。

这时，在工休期间我的写作速度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但我还是在继续写。

## 九、莲花池挖河泥

大约 1966 年 2 月底或 3 月初，寒假已过（我们当然没有享受寒假的权利）。我们 13 人劳动实习已超过 9 个月，按说应该给我们分配到具体的中学去工作，使我们能有一个具体的工作单位，结束这种“漂浮着”的状态。但是，劳动实习办公室的领导发话了：北大的学制太长，中修正主义毒太深，所以应该比普通大学毕业生劳动实习的时间更长才行。在那个年代，一个科级党员领导的话，甚至一个普通党员的话就可以代表党的政策，任何不同意见都会有“反党”嫌疑。我们岂敢有反对意见，心里不高兴也只能默默服从。

我们这七、八十人的新集体又被“下放”到卢沟桥农场管辖的莲花池鸭场挖河泥。

莲花池鸭场主要繁殖饲养“北京填鸭”，驰名海内外的前门全聚德烤鸭店所用的“北京填鸭”，就是由这里提供的。另外还兼养鹌鹑。我亲眼目睹了“北京填鸭”是怎么“填”出来的，真让人有点想不到。

饲养员坐在一个矮的小板凳上，左手抓住鸭头并捏开鸭嘴使其张大，右手拿着一个透明的塑料软管插入鸭子的嗓子眼。该软管联接着一个密闭的饲料容器，容器里装着事先配置好的稠糊状饲料，该容器还与一个脚踩气泵相连。然后饲养员右脚一踩泵，半斤稠乎乎的饲料一股脑被推入鸭子嗓子里，眼见一个大鼓包从鸭脖子的上端缓缓地往下滑。没等滑到胃，饲养员的左手把鸭子往旁边一甩，鸭子边煽动着翅膀边使劲向上伸几下头，那个“大鼓包”才慢慢滑入胃里，看不见了。我当时马上就联想到动物和人真不一样，要给人来这么一下，肯定要得食管炎或胃炎。

---

卢沟桥农场只派了一个技术员跟我们这伙人来到了莲花池，和我们住在一起。这个李技术员人缘随和，但吊儿郎当。偶尔也随大伙儿一块干一会儿，找个理由就走了。领导可能觉得我干活还行，居然让我这个“不可靠分子”当劳动委员安排指挥劳动。其实也没多少事情，无非事前派派活儿，事后清点一下工具，再找人抬回去。

挖河泥的目的好像不是为了冬季积肥，而是为河道清理淤泥。淤泥很厚，二、三月份还很冷，冻层足有 10 多公分厚。一铁锹下去，根本扎不透。必须先使劲扎两下，扎出一寸多深的口子后，人再从铁锹上往下猛踩，利用冲劲儿产生出大于体重的向下的力，才能使铁锹穿透冻层全部进入淤泥中。这样每挖一锹都很费力，这就使得用铁锹装大筐的人体力消耗很大，不一会儿就一身汗。抬大筐的人也不容易，从河底爬又长又陡的坡到岸上，就得一鼓作气上去，中间不宜停顿。否则一旦停下来喘气，容易倒退。就算你憋住不退，再启动时更要劲儿。上去以后还得再走几十米高低不平的干枯了的烂泥塘路才到地方。南方来的男生显得有点软，我们这十几个北大同学就成了绝对的主力军。

女生用铁锹根本踩不下去，只能抬筐，给她们装筐的时候也只给装半筐。但还有女生撅着嘴，低声埋怨路不平不好走，看着让人好笑。我知道她们不好“伺候”，我就让王汝楫去给她们修一下路，因为王汝楫一向做事认真严谨且善于动脑筋。王汝楫修完路回来笑着说：“抬筐走的路还要修多平？要跟西长安街那么平，那可不好办！”我们几个同学也跟着笑了起来。我是笑王汝楫的比喻，他没用“长安街”来比喻，更没用“东长安街”，而是用“西长安街”，看来他家离西长安街不远。

挖到后来，越来越深，水没过脚面，人得穿长筒雨靴。而且铁锹进入泥里被卡住，挖一锹出来很费劲，抬筐爬的坡也更长更陡了，劳动强度也就更大了。

劳动强度大，饭量猛增。男生的粮食定量是 48 斤，女生的不记得了。早晚多是粗粮，中午一般是米饭或馒头。男生每人 4 个馒头根本不够吃，女生每人几个不记得了，但她们一般都吃不了，主动分给男生。我记得每次吃馒头我都可以吃到 7、8 个，肚子吃得鼓鼓的还觉得香。但是下午干上一个钟头的活儿肚子就瘪了，吃下去的那 7、8 个馒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多年来我的肠胃一直不好，现在我晚饭只敢喝一碗稀粥，不敢吃别的，大概就是年轻的时候自不量力暴饮暴食造成的。

每天干活儿从始至终大汗淋漓，没地方洗澡，只能晚上收工后，打一盆水自己擦擦身子。有一次我正在擦身体，眼睛余光使我感到有人一动不动地在看着我，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同宿舍的李技术员。他见我回过头来看他，就说：“哎？老王啊！你的胳膊不粗呀！”我一听，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看我干活儿的样子还以为我一定是个胳膊粗壮、肌肉发达、浑身是劲的小伙子。可眼前的我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样子，出乎他的意料，所以他才感到非常惊讶。

---

说到这儿，我想详细说说我身体的真实情况。

我确实不是一个肌肉发达、体魄强壮有力的人。举例来说，在大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班有个南方女生，她是左撇子，比较单纯朴实特别爱笑，好像还听说她练过体操。有几次我与她比掰腕子，旁边还有几个同学给当裁判。比右手她当然输给我，可比左手我常常输给她。我不服气输给一个女生，要求重来一次，那也只有在掰的过程中她一发笑我才能赢她。就说她是一个左撇子，左手比右手有劲，可我是一个正当年的小伙子啊！再如我班一个男生，他练过举重臂力过人，我用两只手甚至采用犯规动作也翻不过来他一只手。那么，问题就在于体力劳动中，挥动铁锹等劳动工具时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胳膊与手腕在用力，其实 90%用的是腰和腿的力。一个强壮人的臂力再好、胳膊再粗也粗不过我的大腿和腰。

我六岁以前生长在陕北穷山沟里。1947 年陕北大灾，胡宗南进攻陕北并占领了延安，毛泽东所在的中央直属部队（番号“亚洲部”）就躲在我村一带。老百姓快要饿死了，树皮和野菜都吃光了，拿什么交“公粮”来养活部队？我家和部分老百姓家，已经半年多没见到一粒粮食了，但部队的马吃的马料里还混拌着煮得半熟的黑豆，晚上我和弟弟常常钻到马圈里偷吃马料中煮得半熟的黑豆。再熬下去到冬天，全家都得饿死，我母亲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可是“亚洲部”为了不走漏消息，规定我们村“只进不出”。凡是误入我们村的外乡生意人，一律“禁闭”起来，直到“亚洲部”最后离开我们村一带才放人。秋后天凉了，聪明的母亲假借去“上坟烧纸”才“出”了村，这才得以逃难到黄河对岸的山西柳林镇投奔到父亲所在的部队，从此我再也没有挨饿（除了三年困难时期）。所以我从小发育极度不良。

1953 年“党关怀年轻一代的成长”给中学生进行体检，当时我刚上初一，身高 134 厘米，体重只有 48 斤（24 公斤）。1956 年 15 岁初三毕业考高中又体检，身高 146 厘米，体重也只有 64 斤。直到高二的第二学期，我才明显地意识到我开始“发育”了，高考前体检身高 162 厘米，体重已达 98 斤。进入北大后，第一次吃到了肉呈蒜瓣儿状又没什么刺的炸黄花鱼，只要食堂有我就来它一条。优质的动物蛋白猛助我的发育，一年多以后我就长到了 168 厘米。如果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晚发作一两年，困难时期自然也就会晚到一两年，我估计我可以长到 170 厘米。因为我始终比我父亲矮一截，他应该有 172 厘米。现如今哪一个儿子不比父亲高，又哪一个女儿比母亲矮？

## 十、我的初恋

就是在这次莲花池挖河泥的劳动中，发生了一件对我一生来说都极具影响力的“重大事件”，可以说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我有生以来形成的“固执”的思想方法，突然使我感到眼前的这个世界除了让人厌恶的、恶劣的政治环境之外，原来还有别的一些值得人们向往、

---

追求的美好的东西。这个“重大事件”的发生，最终使我彻底放弃了去死的念头。

这个“重大事件”发生在一天晚上集体看电影的过程中，那天晚上放的电影是《羊城暗哨》。放电影的方法与电影院不一样，每放完一盘胶片后，放映员要停下来，打开一盏很亮的大灯泡来照明，然后取下刚放完了的胶片，再装上接下来应该放映的那一盘。在这段不算太短的换片过程中，大部分观众多把目光投聚在放映员及其周围的一块地方，因为整个放映场地只有这块地方非常明亮。我就站在离放映员三四米远的地方，在我的左后方站着三、四个女生，她们比我离放映员更近。

就在一次换片的过程中，这三、四个女生要去上厕所，每人都把自己穿的厚重大衣脱下交给周围站着的其他女生代管。唯独其中一个脱下她的大衣后，没有交给其他女生，而是走到我的跟前，一把塞给我：“给我拿着！”转身就走。对于她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我完全没有一丁点儿的思想准备，当她说“给我拿着”这四个字的时候，我竟然下意识地、自然而然地伸手就接了过来。

当接过来之后，方才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只觉得心跳不断加速却茫然不知所措！她在所有女生中个子最高，所以大衣显得特别大。我双手抱着这一大捧“香喷喷”的大衣，完全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因为我站在最亮处，只觉得电影场里所有的男女生好像都在看着我。当时要是能看见一个耗子窟窿，我说什么也得钻进去。后半场电影演了些什么，全都模模糊糊了。

回来躺在床上我慢慢地也想起了一些事，她给我来的这次“大地震”，其实“震前”还是有“征兆”的，只不过我没有在意罢了。有好几次出工干活前，她就站在我旁边看我挑选铁锹，当我挑了一把我觉得好使的铁锹正准备离开时，她一把“夺”过去，什么话也不说扭头就走。我心里暗笑她：我觉得好使的铁锹，你未必能体会它好使。仅此而已，我没想过更多的。

这件事发生之后，我的精神世界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开始发生变化了，不再是全身心地琢磨政治环境的发展趋势以及自己的应对策略。其实生活中每天面对的事有很多不完全都是政治性的，或者是令人厌恶的。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值得去追求，你若不去向往和追求那些美好的东西，剩下的可不就都是坏的和丑陋的了么！我意识到她肯定对我有一定的好感，而女生的面子一般都比较薄，当她把她对你的好感用某种方式透露给你以后，剩下所希望的就该是你的“主动”了。我还没有笨到连这一点都意识不到的程度。此后在她与我之间发生过很多事就不细说了，只说一件可以由小见大的小事情。

我第一次正式约会她是1966年6月底的一天，地点是我最熟悉的西单电报大楼门口的台阶上。那时文化大革命已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我们已经停止“劳动实习”正在等待上级的安排，没有人再穿劳动时穿的破旧衣服了。但是她却穿了一件后背上补着一大块补丁的短袖

---

衫来和我约会，我当时以为刚劳动完不久，来不及换新一点的衣服，也在情理之中。后来她告诉我她是有意这么穿着的，以显示自己也是无产阶级劳苦大众中的一员，而且她穿的短袖衫上的那块大补丁是用一块手绢专门缝在那件本来是新的短袖衫的后背上，因为她家里实在没有带有补丁的衣服。

后来去她家次数多了，我知道了她和她的家人的出门儿规律。出门前先换上最“旧”最普通的衣服，回家后关上门就全脱掉，换上质地非常好的、漂亮舒适的好衣服。她家的经济条件不是一般的好。

她的父母亲都是非常厚道的老实人，就是因为经济条件太好，怕别人说“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文革开始后便把十分考究的真皮沙发摞起来掩藏在后屋不敢用。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会怀疑我在编瞎话，那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无法理解和想象在那个“反人类”罪行愈演愈烈的年代里，人性是如何被践踏和扭曲的。我相信与我同时代的人不仅不怀疑甚至可能会深有同感。

五年后我们分手了，表面上看是她要分手的，实际上造成分手的深层原因 80% 应该由我来承担。正因为如此，多数同事和熟悉我俩的人因不知晓深层原因而多指责她。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时，我都为她开脱：她是一个有缺点、有毛病、单纯善良的好人，此事不应全责怪她。从她离开顺义调到北京市内工作距今已 36 年了，我们从未再见过面，我也从未刻意打听过她。一直以来我不仅没有“恨”过她，反而有点感激她，因为若没有与她的这层关系，我可能早在文革前就已不在人世了。

在大学同学中，除了一起分在北京的十几个同学外，只有麦结华一个人见过她，因为只有麦结华一个人在我一生最低谷时去顺义农村看过我。她和我分手后，我写信告诉了老麦，老麦给我回信的第一句话至今我还记得“接到你的信后，我愣了半晌！”

我也想过我的初恋为什么会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大学阶段。其实在大学读书阶段谈恋爱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大学同学之间在文化底蕴、情趣爱好、认知能力等方面比较接近容易沟通，可以做到相互之间的深入了解。我在大学阶段确实没有过谈恋爱的想法，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在大学中后期极度不良的处境和心理状态使我不可能产生谈恋爱的情趣；另一个是觉得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不是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但这绝不是说我对异性没有过好奇或遐想。当然客观上我们年级的女生实在太少，“分”不过来是一个实际情况，若真想恋爱可以向女生多的其它专业或者外系发展，在管弦乐队认识不少别的系男女生就是一个有利条件。可以设想如果我在大学阶段谈成了女朋友，那么我的思想精神境界以及后来的经历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

## 十一、到山区接受“四清”考验

大约是1966年4月中旬，我们这伙劳动实习生又被安排去接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中阶级斗争的考验，地点是密云最贫困的山区。北大十来个同学被分在离古北口长城不太远的、连土路都没有的一个山坳小村，叫西驼古（一个生产大队，五个生产小队）。这里已有“四清”工作队进驻一段时间了，听一名工作队队员说，他们刚进村时，有社员还问过他们：“东三省那边还打不打了？”不知此话是真还是假，但已足以形容这个山沟沟的闭塞。

由于我们是来接受阶级斗争教育的，身份还是劳动实习生，并不是新加入“四清”工作队的队员，所以经常聚起来开会，接受工作队队长进行的有关农村阶级斗争的教育。这个队长文化水平不高，实际工作经验特别丰富，口才极好。开会经常就他一个人说，一说就是一上午，不带休息的，而且决不是车轱辘话来回转，内容丰富多彩，还很幽默。

我听来听去也没听出来当前的阶级斗争有多么复杂、严峻，更没有听出来“三分之一的农村基层已经资本主义复辟，政权掌握在阶级敌人手里”有什么过硬的证据。听得最多的无非是男女作风方面的问题，比如某队长和会计合伙算计某社员的漂亮老婆，把该社员派出山外去干某件事，一去就是二十来天甚至个把月回不来，他们俩利用山里人住家之间相距较远的特点晚上摸到人家里轮流干坏事，一个还在外面放哨。队长很能干，在生产队里的威信很高，受了侮辱的女人不敢声张。工作队说这种事在农村太多了，把这个队长和会计严厉批评一顿之后，并没有撤他们的职，按下此事不许外传了事。

在这个山沟沟里大约只待了两个月的时间，也经历了不少事。除了接受工作队长的教育外，晚上还去贫下中农家里做过“访贫问苦”，听过讲述土改时阶级斗争如何严酷以及当时“拉死”地主的报告（用绳子的一头系住地主的双脚，另一头几个人拉着，沿着满是鹅卵石的沟底跑，不出一里地就把地主拉死了），紧跟形势学习讨论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及批判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也帮助工作队整理一些资料，书面汇报自己的收获体会等等，主要任务还是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我在这里只说几件小事以反映在山里生活与劳动的情况，再说一件对我产生较大心理影响的“大”事。

首先生活上你得适应当地农民吃“馊粥”的习惯。每天晚上把熬好的棒子渣粥（即玉米渣粥）或小米粥放在陶瓷盆里，然后再焐在热炕头上，第二天必定变酸，其实就是馊了，然后再重新煮开吃。开始真不敢吃，可是只吃窝头贴饼子实在太干，后来壮着胆子吃后居然真没闹肚子。

山里的劳动与平原地区有很大不同，那是由地质的区别造成的。这里山的内部好像全是由石头，只有地表面一层是土，还混杂着小碎石头子，又缺水浇灌，种庄稼很不容易。修一点

---

简单的水利工程，动不动就得“打眼放炮”（一种爆破手段）。在山腰上种红薯和玉米的地只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小“梯田”，有的一小块“梯田”也就只能种四、五颗玉米。

有一次挑水种红薯，从山坡下的水井到要栽种红薯的地方路很远，足有四、五里地，但若翻过一座没有路的小山可抄近一半路程。队长劝大伙不要抄近路，免得把辛辛苦苦挑的一担水洒在半路上。有一个工作队员倚仗自己健硕的身体逞能，非要爬山抄近路不可，并轻蔑地对着我们几个实习生说：“你们就别跟着我了，你们走不了这条路！回头到了地方，水全洒光了，那不是白挑了吗？”我本来不想跟着他费那个劲，听了他这么一说，我还就非要跟他较这个劲不可。我说：“我跟着你走，保证到了地方我挑的水不比你的少！”

一路上我紧跟着他，看得出他有意考验我，专挑不好走的陡坡走，不时还回头看看我。他确实行，不能说他挑一担水走山路如履平地，那也能看得出他轻松自如不显得费力。为了保证水不洒出来，有时我干脆两只手提着水桶让扁担虚搁在肩上。最终到了地方一看，我水桶里的水比他的还满。原因是我早有准备，我在挑水前就找好了几条木头片儿，水桶装满水后放入两个桶内，这样在走的过程中，轻微的晃动不至于把水晃动出来。

西驼古村在密云山区的各公社中也恐怕是最偏僻闭塞的小山村了，可是“阶级成分”的高低给那些纯朴善良的老百姓带来的精神压力一点也不比其它地方小。有一次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有一个小孩不慎掉进村里的一个小水库里淹死了，当大伙赶到时，只见小孩的父亲双手抱着已经淹死的儿子在发傻，嘴唇颤动眼角微带一丝眼泪却不敢失声痛哭，而围观的社员也居然没有一个人对眼前这个不幸的父亲说一句安慰的话，其原因只是因为这位父亲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为什么会在一个民风淳朴的小山沟都会出现这种毫无人性可言的情景呢？恐怕只能归咎于多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反人类、反人性的政治纲领已经深深地渗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中了。

在山里总共待了也就两个月，大大小小的接受教育的会没少开。从西驼古下山到半城子公社机关开会要步行30多里的河滩路，晚上摸黑才能回来，有一次实在太晚了，就在香水峪劳动实习的同伴们的住处挤了一宿，第二天继续接受阶级斗争教育。这种教育当然要联系实际，联系农村的实际又不能总停留在男女作风或者多吃多占这些小问题上，最后就联系到工作队员和我们实习生当中的修正主义思想意识问题。

教育者当然是公社一级的四清工作团的领导们，其中一个主要负责人据说是北京市委专门培养的未来海淀区党委书记“接班人”。此人看上去很年轻，也就三十五、六岁，浓眉大眼却满脸傲气，官运亨通尽显春风得意，总摆出一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姿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讲话时下巴总是扬起来的，从未见他有过一丝微笑。我对这种外在形象的领导，不管他的官有多大从来都是极为反感的！现在的领导人无论地位有多高，不管他内心多么无视民众的存在，至少表面上都还要显示出一种能体恤下情、礼贤下士的“亲民”形象。而文革

---

以前的情况完全相反，即使是一个芝麻大的官儿，在他们看来，若不摆出点儿“架子”来岂不混同于普通群众？

这位官运如日中天的领导怎么大讲修正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中的严重性和危险性，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但他讲话时那种不可一世的神态以及时不时死盯着我的那种强劲的目光，我是铭刻在心永世不会忘记的。他有一次去我们所在的西驼古村视察，自然是前呼后拥威风八面。见到实习生尤其是女生时，偶尔也微微点头示意，但对准我的目光我觉得比在卢沟桥农场时感受到的那种“敌视目光”还要敌视。

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是多疑，不管怎么说，那时的我对现实的仇恨与日俱增，整日强压着淤积在内心深处的愤懑度日，企盼着有天亮的一天，尽管我也知道这种企盼似乎越来越渺茫，但是由于此时的我已经强烈地意识到生活中还是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值得追求，宁可自欺欺人地再加重一些这种企盼的愿望来安慰自己。

## 十二、参加文革“工作队”

1966年6月1日，广播中播出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使人大感意外。怎么可以把矛头直指党的领导呢？这不是比右派还右派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怎么可以广播向党进攻的言论呢？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大家纷纷议论说城里一定出了什么事。果然几天以后，接到上级指示，结束劳动实习，返城听候安排。

这种政治风向的突然大逆转实在让人难以想象，可以想象的是只有像北大这样个别单位的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心里产生了一丝从未有过的要被“解放”的欣喜感觉，长期憋在心中的闷气总算可以吐出来了，觉也不想睡了，几个同学连夜书写大字报底稿，写好后马上就跑到北大，直接要求面见党中央派到北大的工作队长张承先。结果张承先不在，让一个工作队的队员在哲学楼接见了我们。

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坚决要求返回北大参加文化大革命。理由是一方面我们没有具体工作单位，无法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来；更重要的理由是我们这一届学生最了解北大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最了解修正主义路线在北大是如何被贯彻执行的，我们也是北大一贯执行“形左实右”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最大受害者。现在想来当时我们的“要求”和“理由”是多么的幼稚和多么的无知啊！

工作队婉拒的理由也简单，如果北大的毕业生都回来，北大也装不下这么多人，我们“磨”了半天也没顶用。最后人家“诚恳地”表示：你们了解的情况多，非常欢迎你们以后多写揭发批判的大字报给我们送来。我们没办法只得悻悻而归，以后也没再写大字报。

与我们一样属于北京市教育局的“实习生”有七、八百人之多，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

而没有来得及分配到下属各中小学去。此时北京市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多数学校已经开始形成对立的两派，市委急需派工作队到各学校去控制局面，这一大批人就派上了用场。像我这样有“问题”的人，也在一名党员的带领下作为工作队队员进驻了宣武区天宁寺小学，没“问题”的人一般是一个人单独被派到一所小学去。

宣武区小学工作队的队长是从南海舰队抽调来的一位团政委，此人姓杜；副队长姓曹，是教育部的一位处长。由于此时的中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做法完全“不理解”、“不得力”，尽管中央文件强调文化革命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大多数人对运动依然采取五七年反右时的逻辑，心里才觉得踏实。工作队员们对杜、曹二队长绝对信赖、言听计从，那是因为他们是北京市党委派遣来领导文化革命运动的，对抗他们那就是反党，这是不言而喻的。对待自己进驻的学校的当权派以及两派群众组织的表态，不同的人在做法上就有很大的差异了。

凡是把矛头对准校长、教导主任的，大方向肯定是对的。小学教师中也有不少有“历史问题”的人，持五七年反右逻辑的工作队员进驻后按历史惯例的做法就把矛头对准了这部分人，结果就惹出了大麻烦。我所在小学的校长因有一点生活作风问题，我就竭力鼓动领导我的那个党员和我一起支持两派群众组织中把矛头对准校领导的“造反派”，劝她千万不要把矛头对准一位做过傅作义的少将参谋长的老教师。她最终听了我的话，又分化瓦解了“保皇派”，得到了教职工和学生的一致拥护。一个多月后，全国的工作队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被迫撤离时，全校教职工不仅不“炮轰”作为工作队队员的我们两人，反而还开大会欢送并赠送礼品（带有毛主席像的笔记本），欢送会上有几名女老师早已泣不成声，挥泪惜别场面十分感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了如此的“恭维”和“厚待”。

反之，与我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少数几个小学的革命师生揪住工作队员不让走，以至于他们多次检查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也不能得到革命师生的谅解，总不能过关。后来把杜队长拉去“陪斗”，一个姓邵的工作队员还挨了革命师生的打，最后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在这短短一个多月左右时间的以工作队队员身份投入到文化大革命洪流中的经历中，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

第一件是两位工作队长做人做事的态度在这一个多月时间的前与后简直判若两人。一个月前从南海舰队抽调到首都北京，受党的信任委派为文化大革命工作队队长那是何等的荣耀！从头到脚弥漫出十足的官气。在第一次与全体工作队员的见面会上，他右手快速地摇着扇子，操着标准的山东口音意满志得地宣称：“17年前我南下，17年后我又北上啦！这个……这个……这个……”大概是由于文化水平有限，或许是为了思考下一句话该说什么，他的讲话中口头语“这个……”非常多而且非常长，最长时可延续一分钟是毫不夸张的。他的这一

---

习惯常常惹得大伙低头窃笑，此时他却似乎更加得意。无论在听取工作队员的汇报会上还是到各学校蹲点视察，他的秘书（也是一位工作队员）总是埋头记录或提着公文包紧随其后。曹队长的风格也大同小异，对一般工作队员不屑一顾，对我这样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

只可惜如此风光的时间太短，仅仅一个多月之后，风云突变，他俩首当其冲成了被革命师生揪斗的对象。而且工作队内部也造反了，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矛头直指两名队长，批斗不断。这种来自两个方面的揪斗持续了半年多，直到1967年的一、二月份。短短一个月“人上人”的发号施令转瞬之间就变成了长长六个月“人下人”的低头认罪。这个无人能预料到的“切换点”我记得是发生在1966年7月31日（不一定准）。

那天晚上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庄严宣布进驻所有单位的工作队全部撤出，所有工作队员集体收听实况广播，我亲耳听见刘少奇讲过这样的话：“文化革命究竟应该怎么搞呢？我老实告诉大家，我也不知道！……这就叫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后来我又在别的地方看到过有关刘少奇这个晚上讲话的回忆，说刘少奇在主席台前讲话时，毛泽东在台旁的幕帐旁边听着，当听到这句话时，毛泽东自言自语狠狠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再联想到刘少奇被整死前最后一次被毛泽东接见时，毛还送给了刘几本书让刘好好学习并“关切”地表示要刘保重身体；又联想到林彪的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工作队一撤，这一帮人就全借住在宣武区党校，天天都有革命师生来揪斗工作队员。面对气势汹汹的革命师生，有的人就把责任往两个队长身上推。两个队长整日如坐针毡，一会儿这个学校拉去“陪斗”，一会儿那个学校拉去交代罪行。昔日盛气凌人的队长，如今见到谁都主动点头哈腰打招呼，就连上厕所都先开门探头窥测是否“安全”，看着他们那种胆小如鼠、惶惶不可终日的狼狈样子十分好笑。我则因从未被揪斗（甚至还有几个革命师生提着水果来看我）整日无所事事。有一天突发奇想，应该去队长宿舍串个门，我一进门，队长立刻起身迎上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感慨万分地说：“这文化大革命真是触及人的灵魂深处啊！”依他前后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待像我这样有“问题”的人的态度来看，这话应该是他的肺腑之言。

另一件对我刺激极大让我终身难忘的事发生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地点就在北京小学院内的一块空地上。那天的批斗会批什么、批了谁，我早就全然不记得了，统统都被批判会会场后面发生的一件引发了我强刺激记忆的事件给冲刷掉了。

当时我站在会场的最后面，与会的小学老师都整齐地坐在地上。当站在会场前边的发言者声嘶力竭地喊道：“地主、资本家出身的狗崽子们，你们听着……”此话一出，坐在最后面的一个年纪很轻的男老师突然身子一歪摔倒在地，头重重地砸在地上发出“咚”的一声晕厥了过去。前边的人听见了响动，几乎同时都回头往后看，我正准备走过去看是怎么回事，突然一个年轻女老师跑过去冲着那个晕厥在地上的年轻男老师的头部使劲踢了一脚还恶狠

---

狠地说：“狗崽子你装什么死！”头上挨了一脚的小伙子突然醒了过来，立刻强打精神坐了起来还使劲摇了摇自己沾满了泥土的头，强作镇静，脸上略带一丝不好意思的表情，还好像是在责怪自己：“我这是干吗呢？至于吗！”没过一分钟，那个发言者又说了一句类似的刺激了他神经的话，他又一次晕厥瘫倒在地。还是那个年轻女教师又跑过来要踢他的头，在她的脚就要踢到头的一刹那，我立刻上去拦住了她，我只是低声细语但不失严厉地对她说：“你不要管他，你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我知道我不能批评指责她那种毫无人性的野蛮行为，因为在当时那种极左就是最革命的政治环境下，踢打一个“狗崽子”那是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坚定的一种表现，我要是和她对立起来，只能说明我的立场有问题，我已经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了，不可再授人以柄。

这个小伙子最多二十一、二岁，留着当时最革命的发型——北京人叫“寸头”，即头的上边最多一寸长的小平头。他一共晕倒三次，都是自己醒过来后自己再坐起来。由于过度紧张再加上天热，他大汗淋漓，每次倒下起来后必然要沾上很多土，最后一次起来后，他的半个身子和半个头全是泥。

显然这个年轻的男老师出身一定很“不好”，他的三次晕厥倒地给我上了深深的一课，使我亲眼目睹了“出身不好”给他造成的精神压力有多么的可怕！大学同学中，背着“出身不好”或家庭有“历史问题”包袱的人居多，我也知道他们都有程度不同的精神压力，但是由于我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从来也没有设身处地去体会他们心灵深处的真实感受。眼前突然出现的这一幕一下子使我体会到了这种无形的压力有多么巨大。也使我意识到一个人不管你主观上多么想深刻地认识清楚外在世界，因为人总是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实际上你所认识到的还只能是十分的有限而肤浅。

### 十三、文革“解放”了我

文革爆发前，我的精神世界已经不能用极度低落几个字来描述了，那是因为我实在感到自己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我又坚信问题不是出在我身上，而是出在具体执行政策的各级领导干部身上。从小接受的教育使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毛泽东和党的领导会有原则性错误，尤其对毛泽东不仅不怀疑反而非常崇拜。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毛泽东的绝对信赖是我思想中的两个基本支撑点，这就使得我苦苦探索不得其解，以至于对生活、对前途完全失去了信心。

文革一爆发，我感觉头顶上压了多少年的层层乌云突然之间消散了，终于见到了太阳。特别是学习了“5·16通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总动员令）后，我异常兴奋，我的政治观点与党中央、毛主席完全一致！中国的问题就是出在各级领导中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身上。

---

建国 17 年以来，历次运动都是“自上而下”整群众，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的人总是挨整受气，迎奉拍马、“宁左勿右”者总是一路顺风事事得逞。记得 1964 年毛主席与王海蓉的谈话是在全国范围内传达的，毛主席一再动员王海蓉回学校去造校领导的反，这说明毛主席早就看清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分子逐步控制了党的各级领导，把紧跟毛主席路线的人反而打成修正主义分子，这种危险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已经很普遍了。现在毛主席终于忍无可忍了，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气派，一反常规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整走资派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解决这一突出的社会矛盾。

毛主席拿北大开刀我非常能理解！我对北大太了解了！北大就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黑白颠倒的地方。1966 年 7 月中下旬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次全市性的批判“陆平黑帮”大会，那天下着小雨，陆平被红卫兵押上露天会场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亲耳听到陆平“诚恳地”、一字一句地、大声坦言：“我自觉地、忠实地执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我听了很受震动，原来陆平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是自觉的、有意识的！而不是盲目的！这我真没想到，这就更加“证实”了我对北大的看法和对文革的理解，更加“理解”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真没想到我还能等到这一天啊！，我全身热血沸腾，是毛主席再次解放了我，毛主席真是太伟大了！我举双手赞成，我一定冲锋在前与走资派战斗到底，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就是文革初期我的真实思想。也许有人会说你当时怎么会那么愚蠢，是的，我当时就是这么愚蠢！而且我相信和我一样想法的人决不在少数，这种冲动的意识潮流是多年造势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与现实的“极左”社会背景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意识潮流的支配下，两派群众组织之间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对立状态，以及打派仗时表现出的那种不怕死的精神岂能用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就可以解释得了？（又是这位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先生，在他的“研究成果”中就这么解释的，见《文史参考》杂志主办的“文史大讲堂”系列讲座第六期。我在我的拙文《难忘的大学时代》中，曾毫不客气地论证了金先生的大作《如何看待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的主要观点是荒谬的。我总有一种担心，像金先生这样位高权重的文人，其研究观点却是如此教条而肤浅，他们的“研究成果”只能是对历史的不同程度的有意无意的歪曲，后人将如何能够看到历史的真相呢？）。

## 十四、文革中我的表现

我的这种不明真相的冲动意识使我在文革初、中期表现出强烈的“派性”。前述我在文革初期工作队时支持造反派把矛头对准校领导的做法，虽然符合了当时的“大方向”，其实

---

也是这种“派性”的表现之一，只是尚不严重而已。

从撤出工作队之后直到1967年底我被分配到农村中学之前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实际上我一直是游荡在文革之外的“逍遥派”。市教育局把我们这一大批人安排在其所属的教育行政干校、教师进修学校等几个地方闲住着，不再管理（也不安排我们参加市教育局的文化革命，我估计怕引火烧身）。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是真心想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尤其愿意回北大参加文化革命，可惜人家不要。但对市教育局我是不屑一顾的，它的大门我都没迈进过去一步。

从1966年8月18日起，毛泽东连续8次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串联”到北京的红卫兵。我因没有遭到革命师生揪斗，从第一次开始连续好几次让我参与维持秩序的工作，工作十分辛苦，天不亮就起床往天安门跑，去做准备工作。我亲眼目睹了天安门城楼前几百万红卫兵近乎疯狂的拥毛、崇毛的浪潮，任何人也挡不住这种“浪潮”，秩序根本无法维持。

说老实话，我当时虽然很崇拜毛泽东，但对这种疯狂的场面并不太感兴趣，我的兴趣在于投身到文革的洪流中与对立派对着干。

机会还是来了，我弟弟是兰州大学物理系1966届毕业生，文革爆发后，造反派抄了档案，其中揭示出原来他是物理系在文革前的两名“内定右派学生”之一，自然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他和一个同学一起又找上宁夏大学化学系一个朋友三个人一块到北京“串联”。这时已是1966年12月份了，中央已发出停止“串联”的通知，可“串联”还在进行。我入伙与他们三人一起往东北出发，先哈尔滨，继长春，后大连。每到一处都是直奔大专院校和省市委机关看大字报、了解动态，毫不迟疑地支持把矛头对准党委的造反派。当造反派又分成几个派别，一时也搞不清真实内幕，无法辨别谁是真正的造反派的情况出现时，才不表态。

有一次看见都自称是造反派的两派论战，开始时相互指责打口水战，不一会儿动起手来了，但我们不知道该帮谁。只见有一个操东北口音、个儿不算太高的小伙子干脆脱掉棉衣赤裸上身，冒着零下十几度的寒冷，赤手空拳一个人打跑了好多人，然后双手叉腰站在院子中间还在叫板。我当时挺佩服他的，觉得他一定是长期受压的真正的造反派，否则他不可能有那么无畏的勇气。反观有几个可能是从上海一带来的“串联”学生，操着标准的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辩论起来争先恐后很积极，等一打起来全溜走了。我们几个还议论：上海人是比较文明，只动口不动手，北方人就不一样了，几句话不对付就想动手。

在“串联”中，我们还真没有游山玩水。只去过一次大连的老虎滩公园，那是因为我们没见过大海，听说在老虎滩公园可以看到海。有一天傍晚专门去看海了。那天的天空乌云密布而且很低，再加上天色有点晚，往远处一看，好像远方天空黑压压一片不知是什么东西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朝我压过来，真有点恐怖！从来也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冷静下来一想不可能有天灾会突然降临。大海原来是这样的啊！这大概就是心旷神怡了吧！难怪古今中外的

---

文人墨客都对大海的描述格外钟情。

有了这次观海的经历，我们立刻决定乘轮船从大连去上海（觉得去青岛路途太短），这样可以好好看看大海。

谁知上船不久，就开始呕吐，胃里的东西全吐空了还想吐，后来吐出来的是黄绿色的苦水，哪还有力气和心情看大海。而那些操一口上海话、体魄健硕的船员随着船身的晃荡不断摇晃着身体在船里走来走去却若无其事。就这样在船上半睡半死的颠簸了48小时才到了上海。说来也真是奇怪，双脚一踏上陆地，立刻什么事都没有了，完全恢复了常态。

在上海的几天里，除了去复旦、同济等几所大学和市委看大字报之外，就是找大学同学，想好好聊聊文革前的北大与当下文化革命的关系等问题。由于走得急，没来得及打听上海同学的地址，只能凭记忆到所在学校去找，结果只找到两个同学。

这两个同学在北大读书期间可以说与我是难兄难弟，对于国内国际许多问题的想法差不多了多少，没少挨整受气，再加上“出身不好”思想压力特重，也是怀着一肚子的委屈离开北大的。我原本以为现在毛主席为我们撑腰了，要我们这些挨整受压的革命群众起来造反，打倒那些骑在人民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走资派，我们这些人应该首先挺身而出，拿出革命热情积极响应才对。没想到他们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一如既往还像过去一样消极冷漠泰然处之，在他们看来，好像文化大革命与以往的群众运动并无实质区别，这使我大感意外。当然现在来看这个“意外”并不应该意外，这只能说明他们比我冷静，比我看的更准确一些，而我则是完全错估了形势。

在上海短短几天里，另外一件事情让我大开眼界。记不清是在哪个地方看到的一张大字报上说，红卫兵从某个大资本家的家里抄出多少多少吨黄金，直到现在我都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过当时我确实吃了一惊，黄金的计量只听说过论钱论两，还没听说过论吨计量。看来这个大上海真是深不可测呀！

“串联”虽有接待站管吃管住，那也是很累的，尤其在轮船上颠簸的那48小时吃不下东西，体力消耗很大。我们决定不再去南方了，打道回府吧，乘陇海线在兰州换车回到了银川。

回家后才知道父亲早已经被关进了“专政班”，胳膊上带一个写着“老反革命、老右派”的白袖箍，每天有专人监督扫大街、写交代材料等。对父亲的这个情况我并不太着急，反而相信他将来一定会重新获得自由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原因是第一，解放前他从来没有被捕过，跟叛徒挂不上钩。一度造反派曾给父亲戴了叛徒“帽子”，理由是在“袁大滩战役”中被捕叛变自首，根据是从一份旧报纸上找到的。事实上父亲没参加过这次战役，有人可以证明他当时根本就不在那里，最后查明原来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第二，他不是省、厅级众目睽睽的干部不说，他在同事的眼里一向是个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只知道埋头干事的“大好人”。

---

宁夏当地人把陕北干部通称为“陕北毛驴派”，也能说明从陕北过来的干部差不多都是些没有多少“政治觉悟”老实巴交的人。现在文化革命爆发了，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应该接受革命群众的检验考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自己是什么人自己最清楚，有什么可想而知的。由于我深信文化革命要打倒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我一点也不为父亲的事情发愁。

我想积极投身于文化革命的狂热情绪促使我在宁夏干了两件现在看来纯属胡闹的事情。

第一件是“保”两名陕北干部。有一次我和弟弟路过自治区党委临街的小院子时，看见一群人正在围攻一个满口西安话的党委干部（后来知道他是党委秘书长），当时这个人脸色煞白被群众推来推去，围得水泄不通，我俩当时认定他不可能是走资派，我俩冲进人群为他解围，怒斥攻击他的一群人不把矛头对准党委的两个主要书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一番辩论之后，人群渐渐散去，这个人才得以脱身。

此外我弟弟还全力“保”了自治区党委五个书记中一个陕北人，对他帮助很大，他是五个书记中受冲击最小的一个，他后来被“解放”、被“结合”后，到处打听我弟弟的下落以示谢意。

第二件荒唐事是动武搅了一场辩论大会。有一次在体育馆内召开一个什么大会，两派群众对立情绪很大，台上发言的人声音很大也难以压倒台下的反对声，过道中的人跑来跑去互通信息，秩序混乱。过一会儿，许多人拥挤到会场前边，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在台下就展开了面对面的辩论，情绪异常激动。我与弟弟两人也挤到前边听了一会儿，发现一个身高足有一米八以上块头很大的一个人好像是一个主要的头头，他声音大号召力很强，我一听他的观点就知道他肯定是“保皇派”。我怒火中烧直奔到他的面前，用手指着他的鼻子尖与他辩论，几句话过后，我俩就有推推搡搡的动作了。他一看我俩气势汹汹的样子连忙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看到了他那恐惧的眼神但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我俩的火气就更大了，连推带搡把他赶出体育馆的旁门，边推搡还边说：“我们武斗了吗？”到了会场外边又辩论了一会儿，等我们再次返回馆内时，会场已经乱作一团，很多人已经开始退场了。

第二天，宁夏日报报导说这个会“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给搅了。我看了后很“得意”。

以上所说的这些只是想说明我当时完全不明白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真相，在受蒙蔽的状态下长期执迷不悟，做了许多荒唐事。

事实上，从1967年2月份以后，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武斗就开始了，我早已返回了北京闲住在甘家口以西的教育行政干校无所事事。为自己无法参与到文化革命中介入日渐激化的两派斗争深感惋惜。不甘寂寞的我约了几个北大同学也组织了一个造反派组织，起名为“首都革命造反军”并印制了红袖箍戴在胳膊上。去造谁的反呢？找不着对象，这时我们就想到应该到高教部去造反，质问他们凭什么把我们分到中学当教师，这自然得到所有北大同学的一致拥护。

---

于是我们几个人骑车直奔位于西单附近的高教部。那个时候的干部见了带着红袖箍的革命造反群众不仅谈不上摆架子，恨不得像对待“祖宗”一样热情接待，有问必答。我们首先找到了大学毕业生分配处的处长郭厚登和一个女干部王家婉，在我们态度严厉地盘问下，他们详细介绍了每年全国各地大学毕业生分配方案是如何制定的全过程，又把北大数力系数学专业 1959 级的特殊情况做了详细说明。我们怕他们没有老实交代实情，又第二次去高教部找了他们的对立派“延安战斗队”的一个年轻人叫马金科的带我们去档案资料室查了我们年级的原始分配档案，才弄清了真相。

首先要更正一个习惯性的不正确说法。当别人问起我们是哪一年毕业的时候，我们总是自然地回答是 1965 届寒假毕业生，其实这是不对的。在高教部的备案中，我们应是“1964 年度寒假毕业生”，也就是说凡是寒假期间毕业的学生（若入学时间是正规的秋季入学，则学制必然不是整数年）都应该算作前一年度的毕业生。同一年度的两届毕业生（即暑假毕业和半年之后的寒假毕业）的毕业分配方案是同时一起制定出来并在在暑假分配前的某个时候一起送到学校的。

高教部的这个规定或者叫做法，据郭厚登处长说各学校负责学生工作的机构及相关领导应该是清楚的。每一年秋季开学后，各学校就开始陆续向高教部呈报该学校下一年度的两届毕业生的人数、专业特长等等详细情况的报表。与此同时高教部也要与国家计委相关部门联系，以便取得要人单位所需人才的专业要求、政治条件要求等需求条件，然后高教部像“中介人”一样，尽量满足双方要求把二者结合起来制定出分配方案。在制定的过程中，各大学的档次排队是一个重要因素，高教部直属的 16 所重点大学优先考虑，而北大清华则是优先中的优先。

就算我们年级改学制太晚，也应该及时给高教部补交呈文，而不应该等到 1965 年年初才向高教部呈报情况。郭处长说他们得知北大的呈报后，来不及做任何事情，只好把“1964 年度分配方案的剩余方案”（郭厚登语）给了北大了事。可以想像各大学分配完毕后剩余下的“剩余方案”能剩下结合专业的好单位吗？这时我们才明白毕业分配前夕系领导明确说过：代数、拓扑、实变、复变四个纯数学专门化按“普通数学专业”分配，而不是按本专门化分配，原来是为了把我们分配到中学而做的铺垫。方程、概率专门化按专业分配应该都可以分配到科研单位，但是把这两个班中政治条件“不合格”的同学与实变、复变函数班中的部分人做了对换则是系领导内部的“暗箱操作”，与高教部无关。

后来我们也走访过关肇直先生，关先生说：我们科学院数学所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北大数力系 1965 年初还有毕业生，如果知道，有多少我们要多少。

2013 年将是北大数学系建系 100 周年，在这 100 年里除了文革十年特殊情况不说，1959 级数学专业“毕业分配冤案”是空前绝后的，完全是由极左思潮控制着的北大校、系两级领

---

导一手制造的。他们整天空喊革命口号，人为制造各种冤案，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根本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至于学生的专业前途更是不值一提。

问题搞清了，却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谭嗣同语）。我们还去找过北京市委当时的主要负责人王笑一，他也非常谦恭地接待了我们，并满口答应：我坚决支持你们离开教育口专业归队的要求，你们回去让你们单位打报告给市委，我一定签字同意。我们知道这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市教育局直接管这 800 多名实习生的几个王八蛋不可能也不敢打这个报告。

再说两件我想介入武斗而没能如愿的事情。

闲来无事时，偶尔也到马路对面的轻工业学院和商学院看看大字报，了解一下两派斗争的情况。有一天半夜，马路对面的高音喇叭大声呼叫吵醒了我：“红鹰战斗队的革命师生请注意！保皇派的人马上就要过来砸我们的广播室了，请大家赶快起床……”我听到后马上也起床穿好衣服直奔轻工业学院而去。围墙太高我翻不过去，只能绕道到学院的前门进去，费了一些时间。进大门不远处，隐隐约约只见一些人从一个楼的旁门拼命往外跑，手里还抱着什么东西，我跑过去想问一下情况，那些人只顾跑顾不上回答我的问题。我故作镇静若无其事地进到楼里，发现一楼和二楼楼道地上一片狼藉，借着楼道昏暗的灯光，二楼对着楼梯的一间较大的屋子的门大开着，往里面一看就是刚打砸抢完后的样子，没看见一个人，我只好返回住处，既没参加上也没能看见这场武斗。

文革前北京“四清”工作队的规模是相当大的，文革开始后全部撤回住在市委党校。市教育局的这七八百实习生由于多数参加了“四清”，所以常有人说起来市委党校里文革开展的情况，比如说他们也分成了两大派——“陈”派和“梁”派，大约相当于大学红卫兵中的“天”派和“地”派，中学红卫兵中的“四三”和“四四”派等。我对他们文革进行的情况一点兴趣都没有，就像对市教育局内部文革的情况完全没有兴趣一样。有一天他们又在谈论“四清”工作队在党校的情况时，说那里武斗打人的情况很厉害，我依然没有在意。突然一个人随意地说了一句：“听说海淀区的一个接班人被打得够呛”我一下就来了精神，赶忙凑过去，想了解更多一点的情况，结果连这个接班人的名字都没问出来。

此时在密云山区参与“四清”时的一些难忘的情景立刻浮现出来：一个浓眉大眼却总板着面孔的家伙，说话时总是扬起下巴满脸傲气显露出不可一世的神态，批判知识分子修正主义思潮时死盯着我的强劲目光……。莫非“被打得够呛”的家伙就是他？这可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不行，我得会会他去！

骑着自行车我就直奔位于车公庄的市委党校去了，半路上我琢磨见到他后应该对他说什么，要是说“请问咱俩谁是修正主义苗子？”未免对他太客气了！北京市委已被板上钉钉儿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你是北京市委培养的一个接班人，自然就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这样问他不解气。干脆开门见山：“你狗日的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吧？”

---

“你在密云‘四清’工作团时的神气劲儿都哪儿去了？”他要敢跟我顶嘴，我立刻就揍他。越想越兴奋，越骑越快，不一会儿就到了市委党校。

市委党校的校园不算很大，我见人就打听，见开着门的房子就进，就是没打听到，反而反问我“你怎么连你要找的人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不甘心，每一个楼串了一遍，楼内外的大字报也看几眼，最后还是没打听到，非常沮丧。

## 十五、我对文革认识的过程

文化革命爆发的起始点究竟应该是哪一天，依可见到的书和文章上的说法，一般多认为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用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5·16通知”正式公布的这一天，即1966年5月16日。但是这一石破天惊的“通知”发布后的半个月内，全国上下并无太大的动静，难道如日中天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热浪突然停止了吗？不是！也不可能！而是1957年反右运动给人们的教训实在太深了，谁还敢轻举妄动。倒是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就像在中华大地上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一样产生了威力巨大的冲击波，从此各学校各单位迅速开始挖“黑线”、揪斗“黑帮”，文化革命才开始轰轰烈烈起来，所以也有人把文革的起始点定位在1966年6月1日。然而，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究竟想要干什么，老百姓自然就更不知道了，每个人只能从个人的角度用自己有限的过往阅历小心地去揣摩、领会再紧跟。这是建国17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不曾出现过的诡异现象，从而在普通群众中也就出现了不同于以往运动中一边倒情况的两种极端思潮。

一种思潮是基于反右运动中那历历在目的沉痛教训：谁反对党的领导干部、谁反对党派来的工作队就一定要与他血战到底，保卫党的领导干部的权威就是捍卫党。可万万没想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毛泽东这一次放弃了1957年反右的逻辑，反其道而行，他要的是群众站出来造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的反，当然他本人除外。这一下可就坑苦了那些一向唯领导之命是从的广大党员和积极分子，他们多数押错了“宝”变成了“铁杆保皇派”，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不得不痛哭流涕、洗心革面、重新“站队”、反戈一击造走资派的反，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另一种极端思潮便是彻底造反，这可是需要豁出性命的！故只能是一小部分人而绝非多数人可以做到的。他们在极左思潮多年营造的铁幕统治下，再加上“反动血统论”愈演愈烈，不断改造思想已经成了他们人生第一要务，而且不管你怎么积极改造自己，套在你头上的“问题”帽子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伴你一生，感到的只有绝望。现在毛泽东既然号召“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反正怎么着也是毫无出路，何不以此为由干脆“反了吧！”没

---

想到这一“宝”竟意外地押对了。

文革初期相互视如仇敌的两派群众组织大体上就是围绕着这两种思潮形成的。其实两派组织的群众都是好人，而造成两派群众组织势不两立状态的真正罪魁祸首正是一直主宰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左思潮。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新的社会矛盾的剧烈冲突又快要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认真追究其深层的社会根源，仍然不是别的，还是这个臭名昭著、死而不僵、极为顽固的极左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作孽的缘故。对于六十岁以上的人，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除非他们出于某种考虑而不愿意正视，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对文革初期最早的造反派一度充满着很深的敬意，因为他们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理由如前边的分析）。比如文革中我看到过蒯大富的“绝食日记”，记述了他与党中央派到清华的工作队对抗的过程。在他绝食抗争的最后阶段，估计自己的生命只剩下两三天的时候，仍然写下绝命书给工作队长，表示坚持自己立场决不屈服。当时我觉得他是真正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无畏勇士，令我非常钦佩。文革后审判四人帮时，说他在文革中的许多表现都是受四人帮指使的，如果他绝食抗争工作队也是曾受某上层要人指使而为，虽也精神可嘉，那就不值得佩服了。

文革爆发一两个月后，初期的“保守派”基本瓦解，有的改投“造反派”，有的另起炉灶成立了新的“造反派”，你革命我比你更革命，你左我比你更左，从而全国上下掀起了一潮高过一潮的“红色恐怖”：抄家风大肆盛行，“出身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很多人被遣赶回原籍农村，诸多令人发指的兽行屡见不鲜，我的内心感到非常失望。我用毛泽东的话来安抚自己的情绪：“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为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畅行，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眼下的过激行为肯定只是暂时的。

但对全国性的武斗打派仗，虽然残酷我却是支持的，因为毛主席说了：“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我的一个高我一届的中学同学是全宁夏非常著名的篮球运动员，是自治区队的主力队员，从五十年代初就一直活跃在银川市唯一的灯光球场（东方红广场）上，银川市的年轻人应该都认识他。我与他虽不同级却很熟悉，1959年9月1日我们同坐一趟火车去北京，都是第一次去北京，很兴奋，聊了一路天，他们区篮球队到北京是参加全国第一届运动会，我是到北大去报到入学。他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浑身腱子肉，篮下的统治力有点像NBA球星奥尼尔。在一次武斗中被打死，在一条水渠里找到他的尸体时发现他全身被人用茅戳了好几个窟窿。我推测用茅戳死他的人一定是一群年轻人围住他同时出手才置他于死地，因为一两个或三个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这些人不可能不认识他，居然还能下得了手，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对立派之间的“仇恨”有多么深，岂能像金冲及先生那样用人与人之间在文革前形成的“恩恩怨怨”可以解释得了。由于我太熟悉他了，这个悲惨的印象在我脑子里

---

转了好几年。

真正让我对文化革命开始产生了一些怀疑，继而产生某种反感情绪的是来自两方面的现实状况，这时我已经在北京远郊一个农村初中工作了。

第一个方面，我发现原来在文革前大搞极左、热衷形式主义、文革初期站错了“队”又拒不认错的一些人（这些人多是贫农出身共产党员）逐渐又成了“香饽饽”；而当初冒着极大风险最早起来造反的人，多因本人或家庭有一些“问题”，在红色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的“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清查5·16分子”等运动中又成了革命的对象，为此我感到愤愤不平。从某种角度来看在某些方面差不多又等于回到文革前的状态了，文革岂不白搞了吗？

第二个方面的现实状况是极左的形式主义比文革前有增无减，真让人感到丧气。比如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先集体“早请示”：手捧“红宝书”在毛主席像前恭恭敬敬地行礼后，由领导带领大伙一起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后集体朗读几段毛主席语录，最后再高歌一曲《东方红》。做完这套“早请示”后，才返回宿舍洗漱。有的还搞“晚汇报”，过程和“早请示”差不多，天天如此，能不烦吗？再如，无论是两三个人的小组讨论会还是几万人的各种大会，在会上只要是发言或讲话，在开说前，都要先一边单手有节奏地晃动高举着的“红宝书”，一边口中振振有词地祝福“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谁也不敢例外。从整个社会上看，工人不工，农民不农，学生不学，整天搞纯粹形式主义的东西，诸如跳“忠”字舞“向毛主席表忠心”，到农村教社员演唱“样板戏”等等。一天到晚做的全都是毫无意义的空头革命的事情不说，还得格外小心谨慎，一不留神就可能沦为“反革命”。我校一个老师有一天晚上出于临时需要把一本《毛泽东选集》垫在床板下以增加床板高度，后被人发现，立刻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专政了起来。还听说有人用报纸包东西，没注意报纸上有主席像，结果报纸弄破了的地方正好是毛泽东头像的地方，立刻被抓了起来。类似的事情全国各地到处都发生过。

文革初期我的狂热逐渐被怀疑和反感一点点取代，进而对毛泽东本人的崇拜也逐渐产生了怀疑。全国人民一天到晚不干正事空喊口号，只要毛泽东说了一句话，那便是“最高指示”，只要广播里广播了一条新的“最高指示”，哪怕是晚上已经睡觉了，也必须马上起来敲锣打鼓上街游行，热烈庆贺“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毛泽东已经完全被神化了，就连偏远落后的农村都可以见到为敬奉毛泽东而设的佛龛和香炉，这个佛龛里摆放的不是佛而是毛泽东的塑像。个人崇拜发展到如此无以复加的极致程度，难道毛本人有可能不知晓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另一个使我对文革产生反思的原因是通过批斗彭德怀再次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来肯定“三面红旗”。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我们是看不到彭德怀的“万言书”的，文革乱起来以

---

后，我终于从小报上看到了这份著名的“万言书”，这也是文革带来的一点好处。纵观全文，实在让人诧异，除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一句话略带一点“刺”外，其它处处都是充分肯定党的领导、群众积极性之后才批评干部的官僚主义、“共产风”、不关心群众疾苦等不实事求是之风，难道这就叫反党？看来，这文化革命只是形式上与以往运动不同，实质上还是一样，这实在让我大失所望。

此外，江青在文革中的嚣张作派以及张春桥阴沉的极左言论越来越引起广大知识分子的反感，我也有同样的共鸣，这也有助于澄清我对文革的认识。但是总的说来，我对文革的认识确实应该说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最终使我对文化革命和毛泽东本人彻底改变观念的是“9·13”林彪事件。“9·13”是中国政坛上一次史无前例的9级强烈地震，它彻底震垮了在中华大地上多年苦心营造的政治神话，老百姓从此开始慢慢地觉醒了，不再甘心于做政治奴隶的地位；而毛本人也无法避开这场“9级强烈地震”带给他的巨大损伤，大大加速了他走向死亡的速率。“9·13”的五年前，73岁高龄的他居然有横渡长江的超常体力，“9·13”之后仅过了五年就被阎王爷招去这就是明证。

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9·13”事前根本毫无征兆，做梦也不会想到天天宣传的毛、林之间几十年如一日的“亲密战友”关系、党章白纸黑字刚刚规定了的接班人关系，在转眼之间就发展到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地步！现在既然“9·13”是事实了，事实胜于雄辩，只能说明原来的一切全都是假的，文化革命原来是一场欺骗全国人民的政治博弈。我如梦方醒，原来我一直崇拜的“伟大领袖”讲过的话竟然是骗人的谎言，我却一直深信不疑并且千方百计为它寻找合乎逻辑的理论根据和符合客观规律的现实依据。倍受愚弄后的那种羞辱感强烈地刺痛着我的自尊心，至今耿耿于怀不能释然。

## 十六、尾声——分配到农村

大约1967年10月份左右，逍遥派的日子告了一个段落，这800多名实习生集中在位于动物园对面的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分院，要进行工作分配了。此时的市教育局已被军管，支左的军人说了算，具体工作人员还是原市教育局的原班人马。

800多人领着工资没人管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了，也是一个包袱，怎么分配这批人呢？当时全国正处在极度混乱的状态，极左思潮还是占主导地位的，“面向农村”的口号没人敢持异议。规定分配到城区（4个）、近郊区（4个）、远郊区县（10个）的比例是1:3:6。我们13个北大同学中有4个人在1966年4月被抽调去筹备一个半农半读师范学院，两个月后文革开始了便“泡汤”了，闲住在另一个地方离开了我们这个集体（后来听说我们分配后，

---

接着就分配他们）。这样我们这个小集体就只剩下 9 个人了。教育局派了一个人来召集我们 9 人开讨论会，要求各自提出自己的困难和要求，当时分配的原则就是结了婚的、身体有病的、家庭有困难的优先考虑。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分配方案，我们 9 个人中能留在城区、近郊区的最多只有 4 个人，至少有 5 个人要去偏僻落后的远郊区，若去了远郊区县，“山高皇帝远”根本不可能再跳槽。我的本意是最好大家能团结一致对抗到底，强调专业不对口，拿出市委主要负责人王笑一支持我们跳槽为“大旗”要他们打报告给市委放我们走，我知道我的意见不可能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同，但是我在会上还是郑重地提出了这个要求并要求转达上去。另一方面，我们之中的多数人又不愿意为自己争取这 4 个名额中的一个而“自相残杀”，多数人的风格还是比较高的。9 个人都没有结婚，其它情况都差不多，我们中只有一个女生，大家都表示过那一个城区名额就让给她吧。王长沛同学的态度是我身体好可以去任何地方，何怡生同学第一志愿也是远郊区县，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准备一个人对抗到底了。

枪打出头鸟，第二天军管会就约我谈话，一个满口东北话、穿着一身空军军服的支左军人在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当着很多人的面，没说两句话就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你还要跳出教育口，还要我们打报告给市委，你知道不知道就凭你那满脑子系统的修正主义思想，你根本就不配当人民教师，现在分配你等于给你出路……”我一听立刻站了起来，本想和他对着干，不知怎么突然一转念，我冷静地回答他：“我不要你给我出路，你打算把我怎么办？”他以为我被他镇住了，气势汹汹地指着我的鼻子说：“我送你去劳改！”我再也控制不住了：“老子等着你送我去劳改！你要不送我去劳改，你就不是人操的！”我转身甩门出去了。

返回住地后，我打听到市教育局在南口有个劳动基地，文革前专门集中该系统有“问题”的人常年在那里劳动，我就准备去那里了，正好从北大物理系 59 级分来的一个同学被分在远郊区，他也不想去，我们俩约定一块儿去南口劳动。

过了两天又找我谈话，这回是另一个军代表，我一听他的口音就听出来他也是陕北米脂人，老乡之间的谈话自然和气亲切多了，但我仍然坚持我还是去劳动吧！

最后一次找我谈话的是市教育局一个叫贾志先的处长，听说她虽年纪不大却是从延安过来的“老”干部，是市教育局第一个被解放结合的干部。她对我说她也被批判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因为她烫过头发、涂过口红，还告诉我她的女儿在石景山九中（还是三中我记不准了）在文革前也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苗子，所以她根本不相信我有什么修正主义思想。她说这些时我只是一听而已。接着她说：听说你有一个女朋友叫 xxx，她们系的同学一致通过把她分去偏远的密云山区锻炼锻炼她，说她资产阶级小姐气太重，她的身体和家庭情况确实也不可能留在城、近郊区，你们两个总不能分开吧。她说这番话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因北大同学中也有人给我说过“不能分开”之类的话），我明确表示完全可以分开，分开还更可以考验两

---

人“关系”的可靠性。

最后，她还给我说了一番话，至今我也无法完全核实她的话的真实性，当听她说完后，我立刻明白大局已定，剩下的就只能是我自己的选择了。她说：根据你的家庭等各方面的情况，我们本打算把你分配在朝阳区，后来有人反映了你女朋友的情况并建议不应该把你们俩分开，人家这也是好心，可你女朋友那边的同学们强烈要求把她分去密云山区。我们考虑再三后，决定这样你看行不行：你和你的女朋友还是不分开为好，我们通过做她的同学们的工作，就不要她去密云了，你呢，也不要留在朝阳区了，你们俩一块儿去不远不近的顺义，而且我们给顺义县打好招呼，让他们把你们俩留在县城，不再分到下面的公社去了，你看怎么样。我再一次表示了不需要照顾女朋友关系的意愿，可我心里明白我这个时候的表态已经苍白无力了，而且留给我的选择余地也不多了。

整理一下当时的态势：1. 我要求市教育局放我们跳出教育口，看来他们注定不会答应了，他们可能怕开了这个口产生多米诺骨效应。比如，和我们一起分配的还有 13 个北师大心理学系毕业的也蠢蠢欲动要跳槽。还有人数不多的一些从武大、川大等综合性大学来的人未必没有跳槽的想法。2. 若我坚持去劳动，女朋友必定被分去密云山区，她死活不干，她在她的同学中很孤立，整日不去她们系的集体参加讨论等活动，泡在我们 9 个人这里，说她也不听。3. 就算我放弃继续劳动的立场，若继续坚持不与她分在一起，等于我自己有想留在城、近郊区而把我们 9 个人中的某个人挤到远郊区去的意思，因为虽然北大同学们不十分清楚贾志先与我谈话的内容，但谁都明白我和女朋友分在一起就意味着我俩绝无同时留在城、近郊区的可能。4. 她的父亲在首都机场工作，支持我俩一块去顺义，他说顺义不远就在机场的旁边。5. 我的北大同学中有两三个人还到我姐姐家动员我服从分配，他们担心我真被送去南口劳改，后果更为严重，我理解他们是一片好心。

胳膊扭不过大腿，我们 9 个人终于被分而治之了。唯一的女生刘吉尊留在城区崇文，谭良在丰台（可能结婚？），童武、唐云在朝阳（童武在不久前海淀区东北旺的一次麦收劳动后，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醒后第一句话：“人有旦夕祸福啊！”唐云多年慢性气管炎）他们四人分在城、近郊区。其他五人：何怡生分在与河北省交界的通县西集镇，离通县县城还有 55 里地；王长沛分到门头沟山里的清水镇，离开市区足有 100 多里不说且交通极为不便，一下大雪便交通断绝；杨燕昌在密云水库北边的高岭镇，离密云县城还有 90 里地，离开东直门 240 里地；李新本来分到平谷，他弟弟当时是河南掌了权的著名造反派“河造总”的总负责人之一，把他调回了河南；我去了顺义。

和我一起分到顺义的实习生共 53 人，一辆大轿车拉到顺义县委的大礼堂后，一分钟都没有停立刻宣布进一步分配到各公社的方案。分去最远的焦庄户公社离开顺义县城 60 多里，分到离县城较近的公社也有 20 多里，留在顺义县城城关中学的只有 4 人：北大的我，北师

---

大心理系的一个福建人，北京师院的一个回民和北京师专的我女朋友。看来贾志先没有失言，而我的心里却增添了一份从未有过的感觉，平生第一次感到“有时候女人是个负担！”。我去城关中学安顿好了“她”，当天就立即返回原地，观察动向以寻求不去顺义而接受继续劳动改造的可能性。

我返回教师进修学院分院又“对抗”了十几天，等着他们把我送去劳改，可是再也没有人搭理我了，我又去了一趟市教育局找那个要把我送去劳改的军代表，没有找到他（也许是无意不想见我），其他工作人员只说你不是已经去了顺义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大家各奔东西了，我感到一种空前的孤立无援感，离开北大两年又八个月了，我总感到自己在孤军奋战，而且屡战屡败，想做的事一件也做不成，看来这耗时近三年的“离开北大第一站”只能这样无奈地结束了。

1967年12月11日，我独自一人雇了一辆平板三轮拉上我的全部行李，到北京火车站办了托运到顺义的手续。当我踏上火车的一瞬间，暗下决心：“老子在顺义最多只待三年！”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八年，更没想到的是我一生中最苦难的岁月不是已经过去，而是才刚刚开始，以至于差一点把自己的小命也丢在了顺义。

后来，在我正式去了顺义几天之后又一次返回原地，投宿在还未走的两个毕业于北京师专的人的房间里。晚上睡觉前，其中的一个知道我被分在顺义后就问我：“听说某某某被分在顺义县城的一个中学了，是吗？”他问的这个人就是我女朋友，我给了他肯定的回答，他接着说：“这人是我们师专有名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小姐，本来大家都同意把她分去艰苦的密云山区好好改造改造她，怎么会给她留在顺义县城了呢？”这个人的话又一次验证了贾志先说了真话。

后来才听说了早先离开我们的4个北大同学的分配情况：卢才辉去了门头沟山区，李世新分到大灰厂农村初中，王汝楫去海淀育英中学是最好的一个，而张怡慈则因“重大家庭历史问题”未予分配，在平谷插队劳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仅过了4年，到1972年张怡慈没有费任何周折就被直接分配到北京师院，他成了所有分配到北京市教育局的16个大学同学中第一个离开中学教育口的同学。而我则是通过“非常规”手段，历尽艰辛耗时1年半，才于1976年1月调到北京工业大学的。其他同学差不多都是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以后才陆续到了不同的大学工作或学习的。

## 致谢

本文在成文过程中，得到北大同学张存桂、何怡生、徐明曜、于清甫、唐云等的大力帮助，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内容上做了很多指正，在此表示我由衷的感谢！

（写于2011年4月—7月）

---

# 感恩与怀念

——纪念北大 5901 入学 50 周年

数学一班 王树禾

人类社会与人生具有混沌性质，即人  
生与社会变迁对初值敏感依赖，具有拓扑  
传递性和处处稠密的周期点。

——王树禾，《人生与社会的混沌模  
型》 □

他没有做过多少善事，但他的的确  
确是个好人。

——普希金，《墓志铭》

## 一、老师恩，同学情

北京大学数学系是数学家的摇篮。59 级同学有幸聆听闵嗣鹤先生、丁石孙先生、丁同仁先生、程庆民先生、田畴先生等许多著名数学家讲授的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微分方程、解析几何和微分几何等课程，老师们精邃的数学思想和做人做学问的不凡风骨永远是我们人生的罗盘。后来我到中科大微分方程教研室做教员，备课时首先回忆当年我的老师讲课的模式，他们如何引入概念，如何分析定理的几何意义，如何明确定理证明的思路，如何巧作证明的细节，给我的学生讲课则尽量遵循这些教学方法，甚至连板书和手势都刻意模仿。我主讲的方程基础课多年采用丁同仁先生与李承治老师所著《常微分方程教程》做教材，研究生课则采用张芷芬、丁同仁、黄文灶和董镇喜老师所著《微分方程定性理论》和叶其孝、李正元老师所著《反应扩散方程引论》做教材。叶先生是我毕业论文导师，当时克服了各种困难，精细批改我的文章，终于使我通过毕业答辩，该论文已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1985)发表。王树禾在此向所有教导过我的诸位老师三鞠躬，一拜老师的学问，二拜老师的师德，三拜老师的恩惠。

人生与社会并非线性系统，这种系统中有可能因混沌（Chaos）而紊乱，例如当年把名师从讲台上撤下去，极具数学才能的一些同学遭受批判甚至开除学籍以及诸如招生、论文答辩与毕业分配等一些行政与教学管理当中的异常现象，对那些历史故事，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共同祈祷为人之初本善的良知和灵魂了。历史和人性比我们的数学复杂得多！

---

王树禾特别思念数一班和方程班的同学们。首先向温秉钧、方肇满、马汉卿、刘伟业和罗启成五位英年早逝的好同学默哀！永远缅怀你们的美德和善行。

同学们对我的援助将永志不忘。例如李世新、颜锦纯、祝长忠、苗振国等同学组成的班委会把我的助学金调高，多次发放冬衣补助和书本费等等，使我衣食无忧，集中精力把书念好。1978年徐明曜送我J.A.Bondy and U.S.R.Murty的名著Graph Theory with Applications，建议我搞图论，当时我对Graph一窍不通。不负老同学的勖勉，于是苦读，于是写出全书的习题答案，于是对图论着迷，还写过几篇有关图论及其算法的文章在学报发表。徐明曜和麦结华是代数与拓扑等方面知名学者，他们在图论与方程等业务方向上对我帮助很多很大。

1976年以前，我基本上无权进行教学与科研。从1977年开始，老同学们多方为我联系用人单位，同意调入的依次为：(1)陈明一建议请我中学一位在高能所的同学（明一的同事）联系中科大四系（近代物理）；(2)马汉卿帮我联系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3)颜锦纯帮我联系安徽省科委；(4)徐明曜帮我联系武汉大学数学系；(5)徐明曜向中科大数学系强力推荐。我选择了(5)。十分感激同学们对我的“上岗大营救”。1980年5月，突发心肌梗死，在山海关一个小医院好歹抢救了一下，8月份赴中科大上任。全家四口吃住在徐明曜武定侯胡同故居，转车南下安徽，王理、杨燕昌、徐明曜三君子到站台相送，车窗外，四位老同学泪眼相对，无语而别。

## 二、文革、婚姻与子孙

文革“横扫”、“清队”和“打反”等运动，本人皆为打击对象，长期关押批斗，挨不完的打骂请不完的罪，1970年清除出教师队伍，遣送农村劳改。大学时代强壮到那个样子的一匹骡子，折磨得心血管硬化，已经奄奄一息了。

人们如何选择配偶是社会人性善恶的标志性世态之一。1971年与插队知青苏仲华同学相识，小苏不顾革委会的干涉，执意对一个无人权者无限同情与关爱，以身相许，相濡以沫，于是结婚，于是生子，于是生女，子又生孙。孩子们个个机敏厚道。但愿后继们不至于再如我那般命途多舛。

女儿考取赴美研究生，获激光化学博士学位，现在硅谷搞光化学研发；儿子学的经济管理专业，在京某公司做副总。感谢妻子教子有方，如果从科大教授夫人当中选一名贤妻良母，大家一定会投我家小苏的票。

---

### 三、教学科研双歉收

从 1980 年 9 月 1 日起，在中科大教学 48 个学期，主讲课程有数学系的常微分方程、常微分方程定性理论、混沌及其应用、反应扩散方程、算法图论、离散数学、数学模型、数学实验和数学思想史，以及计算机系的线性代数、代数结构和图论等，曾获校级“精品课程奖”、“中国科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和“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等虚荣。出版教材《微分方程与混沌》、《图论》、《离散数学引论》、《数学模型选讲》和《数学思想史》等书，其中有的是教育部审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国家级教材”。囿于心脑疾患，有些教学任务只能割爱放弃了。

科研方面无满意成果，发表微分方程与离散数学方面的论文 30 余篇。例如在图论方面，提出 kPCP ( $k \geq 2$ ) 问题（多邮递员中国邮路问题），设计了 kPCP 的近似算法，且证明  $k\text{PCP} \in \text{NPC}$ ；在非线性方程方面，用 ODE 几何理论研究综合国力，把社会相平面划分成“发展区域”、“动荡区域”和“崩溃区域”以及如何把轨线初始点纳入“发展区域”的途径。该成果已被一些高校收入研究生教材和未来学专著引用。

2009 年获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已年逾七旬，孤陋寡闻，无所作为，今生工作歉收已成定局。

衷心祝愿北京大学 5901 的全体老师和同学们平安长寿！

---

# 大学生活片忆

数学二班 王则柯

经济一困难，“运动”就收缩，停课劳动也就比较少了。1959年上半年广东经济生活明显困难的时候，正是我们高三年级迎接高考的时候。静下心来读了几个月书，不少同学就已经感觉功课掌握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广州六中，同学们有这样的传统：只要天气合适，就会每天下午到江边的学校游泳场游泳。所以我们几个觉得功课已经很有把握的同学，在那个阶段可以说在游泳场度过的时间更长。就是这样，我们每天都泡游泳场，迎来1959年的高考。

## 入学北大

高考前报志愿的时候，高三大约有一半同学被召集到实验室去，学校跟他们说，“祖国需要你们，党信任你们”，动员他们报考国家急需的专业和机密专业如军工、航空、造船等。物理方面凡是中学生能够想到的，包括无线电、半导体、光学、地球物理、原子能等，都属于鼓励他们报考之列。

我虽然一直是班级学习委员，还是在勤工俭学展览会上挂大照片的全校二级劳动积极分子，却没有被召集去接受动员。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被列入另册。但是我们那时候的教育真是非常成功，我对于没有被动员报考国家急需专业和机密专业毫无怨言。记得“党叫干啥就干啥”和“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两个口号，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中才唱响的，但是远在这个时候以前，多年的教育在我这样自觉接受教育的学生身上，已经形成了听从安排做螺丝钉的人生理念。

我从小热衷于无线电。可是现在，“党和国家”没有动员我报考无线电这样的专业，我就选择了最不机密的数学和民用建筑，当时这些专业似乎也没有急需的意思。虽然自己不那么被信任，但我还是相信只要我不冲撞不叫我冲撞的专业，别的专业还是可能考虑我这样的考生。当时功课好一些的同学，都有上北京念书的愿望。最理想的，自然是北大清华了。我就斗胆以第一志愿报考北大的数学，第二志愿则是另外一所名牌大学的民用建筑。说实在，在那次学校动员近半数同学报考机密专业和急需专业的会议以前，我压根儿没想过会把数学或者民用建筑作为自己将来的事业。

高考以后经过仿佛两个月的等待，我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我要好的同学朱蔚文一起，到北大数学力学系读书，他在力学专业，我在数学专业。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

中，曾经有人揭发，北大的招生“不能坚持党的阶级路线”，1958年强调了一下，1959年又放松了，1960年还是1961年强调了一下，1962年又放松了。具体是不是这样，待考。

不过，至少对于“机密专业”和“急需专业”，“政治”好不好却一直是决定性的因素。记得入学北京大学以后，我们班上有一位女同学，原来是被录取到无线电系的，按照学系排列的学号都和我们不一样。但是因为家庭关系或者亲戚关系不是那么“根红苗正”，她在北大报到以后，马上就被调整到我们数学专业来。这样看来，高中毕业前夕学校领导让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被列入另册，未必不是爱护的举措，至少可以让我们少碰一些钉子。

我和朱蔚文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到达北京前门车站的时候，我的在清华大学读书即将毕业的姐姐到车站来接我们。当我们从西门进入北大的时候，看到在迎面的小桥两旁眼镜湖的两片水面，各有一支竖立的大水管，纯净的地下水不断地从管子里涌出来，形成两个小型的圆环瀑布。西门一带燕园的景色美轮美奂，很有积淀。学生宿舍所在的新区，房子却像是火柴盒一样。

我们到北京读书的时候，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的時候。当时虽然因为“大跃进”的缘故国家已经相当困难，但是因为全国支援北京庆祝国庆十周年，北京的气象真还是可以用“兴高采烈”四个字来形容。天安门自不用说了，只说北京郊区护道的杨树，绿叶婆娑，已经叫我们这些南方少年不胜赞叹。国庆假日，我们这一届广州六中上北京读书的二十多位同学，相约一聚，集合地点选在北海公园的九龙壁，大家还在九龙壁前面合影。

## 课代表任免

高中毕业前夕，团支部通知我，学校团委已经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即日起参加组织生活。但是一周以后，团支部书记又告诉我，鉴于我家庭的情况，学校团委无权审批我的团籍，要等待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的意见。结果，我仍然不是共青团员。

进了大学，我向新集体的团组织重申争取加入共青团的愿望，并且表示愿意为集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过了几天，团组织通知我，班委会将决定我担任数学分析课的课代表。按照我当时和现在的理解，对于数学专业新生来说，数学分析是他们的主课。我感激组织对我的信任。

不久，庐山会议开始的“反右倾”斗争，在学生当中深入地开展起来。我勉励自己一定要以党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逐步做到真正脱胎换骨。我以高中时候我们响应大炼钢铁的号召，先是照着化学书上的原理图用小铁罐“炼焦”，后来真的用土法炼出质量比较高的焦炭，甚至连广州钢铁厂也曾经到我们学校来取焦的例子，谈革命者一定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和新生事物的体会。我是诚恳的，同学们似乎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那时候，我哪里知道即

---

使那样炼出来的焦可以用，也是非常浪费。

后来深入到大跃进有没有浮夸的问题。我说虽然有过浮夸，但那是前进中的并且现在已经克服了的问题。想不到这就闯祸了，因为我说有过浮夸。第二天，团支部组织全班同学开会，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批评我污蔑大跃进里面有浮夸。后来看觉得“还好”的是，这只不过是在一个很大的教室里围坐的主题批判，没有让我站起来认罪。

原来，1959年的春天广东的饥荒很厉害，我们在学校已经喝了两个月的粥。曾经在1958年头脑也挺热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出来向全省人民发表广播讲话，说去年凡是每亩二、三千斤以上的产量，都是假的，问题是要振作起来度过困难。

我引了亲耳听到的陶铸的广播讲话，但是团支部组织委员说，陶铸是党的中央委员，他不可能讲这样的污蔑群众运动的话。天哪，我的本意是虽有浮夸，要正确对待，现在却变成了污蔑群众运动。当天晚上，这位委员通知我，鉴于我的情况，已经不适用于做课代表的工作，让我向一位同学交接。我恨自己为什么觉悟总是不高，勉励自己积极跟上。只要能够维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维护党的威信，个人受委屈没什么关系，千万不能有抵触情绪。我主动找到那位同学交接课代表的事务，他平常不大讲话，嗫嚅地对我说：“哎，弄不清楚怎么回事。”

“政治好就是出身好”，出自大学高年级期间自愿“下连当兵”经受锻炼时教导员的教导。虽然“身体好”作为第一“好”的“三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但是那时候已经很少这样说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好，思想好，表现好”的新“三好”，其中“政治好”就是“出身好”。我天生“政治”就不好，现在“表现”也不好，自然“思想”也就不会好了。

## 马校长下台

党中央在1958年初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后，一方面很快在全国掀起以“大炼钢铁”为标志的“大跃进”，另一方面全国农村很快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从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称为党的“三面红旗”。教育方面，则明确了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许多学校都把党的这个教育方针写成大字悬挂在最醒目的位置。

刚刚进入北大的时候，穿吊带裤的马寅初校长携夫人和我们一起参加放焰火的迎新游园晚会。以后我们看到，每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陆平做报告的时候，马校长都要搬一张椅子横坐在讲台旁听讲，据说是因校长有点耳背。很快，党委领导的批判马校长“新人口论”的运动铺天盖地，连小秘书也被鼓动上台言不由衷地揭发校长作为人大代表外出视察时“点了

---

鸡汤不肯付钱”。1960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还是副校长的陆平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上台发表演说，学校宣传队高呼“陆平校长作报告！”不久，马寅初校长被免职，陆平兼了北大的校长。

那时候北大读书的一个特点，是劳动忒多。先是九月的入学劳动，后来是入冬开拔到北京东郊不记得为什么事情挖土方。1960年春天，哪怕仍然是全国支援北京，我们在北京的日子也已经很不好过了，但是“群众运动”的狂热却愈演愈烈。记得这个春天只是通过系团委或者年级党支部自上而下发动起来参加的“技术革命”热潮，就有三次。一次是“超声波”狂热，据说把水管锯断敲扁夹住一个簧片，就能够在水流或者气流的冲击下发出超声波，解决许多问题。结果徒然制造大量金属垃圾。另外一次是“电子化”狂热，物理系实验室的仓库，被迫偏偏要向我们这些不懂得电子的数学系新生开放，随便取件，随便安装，实际上是一片糟蹋。实验员抵触得很，但是政治压力之下，却无力对抗。还有一次是拉队到北京市内著名的“二龙路人民公社”，充当“技术革命”的“生力军”。记得这个人民公社不知道具体哪一级的一位党的女干部，半夜把公社小工厂的车工叫来，让他把机床交给我们使用。车工喃喃咕咕，满脸不高兴，但也只能把开关盒的钥匙交出来。

自发的狂热也不少。常常一点什么风声，只要看起来符合“无产阶级政治”的大方向，就会“物化”为一些同学的高度自觉的行动。现在大家记得的，是传来蓖麻可以提供“战略物资”的消息，于是大家都抓紧时间找地方种蓖麻。还有一次，风声说学校附近工地就有许多不识字的民工，我们大学生应该去扫盲，于是包括我在内一些同学又每天晚上赶去扫盲，其实那时候刚刚干完一天活的民工正是最需要休息的时候。

更加离谱的是，仿佛是政工系统召集数学专业各个年级的同学在一起，采取“打擂台”的方式，在“打倒牛家店”的口号下，辩论如何写出“无产阶级的数学分析教程”。所谓“牛家店”，就是牛顿—莱伯尼兹体系的意思。大轰大嗡，挑灯夜战，以至于我们不停地打瞌睡，政工干部却一再表扬一年级同学最有水平，“中毒”最少，思想最解放。

夏天，我们到京郊大兴县荒芜的农田上急工粗活地替人民公社社员抢种大白菜。我看到一位社员在夜色中徘徊在屋顶上面，摇头叹息。秋天，我们已经二年级了，解放军的受检部队已经坐着轮子漆了白圈的大卡车演练了好几遍，却在国庆的前夕接到“平常国庆节不再搞阅兵”的命令。这在我们共和国还是第一次。入冬，我们开拔到十三陵地区，住在牛棚里，为拟建计划外的北大新校区修铁路。我们做的是土方工程，力气活。因为夜间到达，然后每天清晨顶着星星步行好几公里去工地，晚上在夜色中摸索回来休息，所以只在高强度劳动半个月以后那唯一休息的半天，才看清楚我们下榻的牛棚，座落在长着零星几棵柿子树的山坡上。一个月下来，大半同学得了浮肿病。期间，陆平校长来工地视察，政工干部要求我们齐声欢呼“陆平校长好！”

---

那个冬天真冷，在寒风中传来了党中央要求贯彻“劳逸结合”的声音。

## 大师本色

我妻子经常和我谈起他们在北京另外一所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回忆老师、系主任和校长怎样处处为同学着想，珍贵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面狂欢的经历。我在北京念书期间，也参加过两次国庆节天安门广场的“狂欢”，和一次国庆节游行。两次“狂欢”也都是在金水桥前面的地方。一次是国庆十周年的夜晚，另外一次好像是国庆十五周年。狂欢的时候，我们的确都很高兴，跟着音乐跳集体舞，同学之间玩猜谜语游戏。但是总的来说，我自己经验的北大的生活，却没有我妻子他们的大学生活那么富有人情味。当时不知道出于什么好大喜功的原因，北京许多大学的学制，都从原来的四年改为五年，而北大的理科和整个清华，则进一步延长到六年。除了由于经济困难等各种原因政治运动稍许放松的那些时候以外，我们在北大基本上就是一个没完没了的不断接受“思想改造”的过程。

可是在那些政治运动有所放松的时候，老北大重视学生基础训练的传统还会发生作用，北大的大师级老师给我们低年级学生上课，还是很让我们受益。

我们在一年级除了必不可少的政治课、政治学习和俄语、体育之外，实质的主课是数学分析、解析几何和高等代数这三门。数学分析由闵嗣鹤教授主讲，数学、计算数学和力学共六个班一起上大课，习题课分小班上，我们的习题课老师兼级主任，是优秀的年轻助教周巢尘。主讲解析几何的是姜伯驹，主讲高等代数的是丁石孙。

丁先生后来出任北京大学，是著名的数学家和教育家，还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先生讲代数，一板一眼，言简意赅，句句珠玑，记录下来就可以成文。他是最富课堂艺术的老师，精妙全在语言，绝无夸张的表情或动作。听他讲课，真是一种享受。姜先生当年只有20多岁，在科研上已经做出世界同行瞩目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院头一次增补学部委员（后来称为院士），他就当选。周巢尘老师在十多年前也荣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至于闵嗣鹤教授，值得特别多写几句。数学那么多学科，中国的数学，曾经最接近世界水平的，应该是数论。30多年前陈景润的论文“1+2”之所以能够宣传得家喻户晓，背景是他在尝试攻克以“1+1”为符号的“歌德巴赫猜想”这个迄今认为难以解决的数论问题的路途上，走到了最前沿。在我国，数论的首席大师是大名鼎鼎的华罗庚，第二号人物，就是闵嗣鹤教授。据说陈景润的论文写好以后，需要一位足够权威的专家审阅确认，闵嗣鹤教授就是最后拍板的人物。

我常常说，我们现在能够为国家做一些事情，很得益于这些大师级老师的教益。

大牌教授上基础课，不仅是当年北京大学的传统，也是其他一流大学的制度。中国科学

---

院 1958 年在北京开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短短的几年里面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出色的人才，其成功经验，就是由科学院的大牌科学家为一年级新生上基础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专业的头三届学生，分别由华罗庚、吴文俊和关肇直三位教授亲自在课堂上调教，他们三位当时不仅已经是科学院学部委员，而且是中国数学的领军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头三个一等奖，分别由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获得，他们都耕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学的第一线。

现在一些人认为，高水平的教师应该集注于研究工作，次一等的、研究做不上去的，才去上课，特别是基础课。这种错误观点和错误做法，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危害很大。其实，不仅当年的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当今世界许多著名大学，比如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都规定每个学期所有现职教授都要同时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各开一门课。

## 毕业教育

1962 和 1963 两年，是我们大学生活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两年，饭也能够吃个半饱。也是在这个时候，团支部决定我担任班委会的学习委员。可是不久以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主调就逐渐奏响，最终震荡神州大地。

高年级的时候，我在数学专业的拓扑学专门化组学习，毕业论文的正式导师是江泽涵教授，姜伯驹老师具体指导的时间则更多。除了具体的论文指导以外，江泽涵教授关于做学问不要“得意忘形”的箴言，对我影响至深。“意”指数式推导，“形”指几何形象。

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微分流形上的一个同伦问题》。吴文俊教授等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老师，也是答辩委员会的委员。老师们很鼓励地给了我比较好的评价，姜伯驹老师还特别指出我的论文宣读时间掌握得很好。

1965 年春天，我们进入毕业教育。这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实际上已经在北京大学这种非常敏感的单位奏响。派驻北京大学的“四清”工作组和北京大学党委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在“院系调整”以后的北京大学的历史上，如果毕业生一时没有大致对口的工作分配，一般会把他们养在学校一段时间，而且待遇还不错，直至对口分配出去。但是在我进入毕业教育的时候，正是北京大学党委拉出去在计划外建设的十三陵校区召开著名的“十三陵会议”准备反攻派驻北大的“四清”工作组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分配对口不对口，自然完全抛诸脑后。我们数学专业几个班毕业的同学，后来多半只按生源地域分配到南北中三个地方的教育部门，基本上都在中学任教。

背景既然是这样，我们的毕业教育左上加左，也就可想而知。但是我却因为心灵已经被五年多的“无产阶级教育”净化，很没有出息地表现出苦行僧无所谓愿意糟蹋自己的轻巧态

---

度。虽然直到那个时候，还是不让我入团，我却仍然没有半点醒悟，陷入越是未能入团越要苛刻改造自己的境地。可能正是因为我不像其他一些有思想的同学那么抵触，在接近六年的大学生活中，我这个政治上一直被列入另册的功课尖子，头一次被安排到全年级的大会上讲话，讲怎样无条件地让“党和人民”“挑选”。我的许多同学后来已经不记得这一幕，这仅仅是因为我只是糟蹋自己，从不直接伤害别人。这里我也只能够说没有直接伤害同学，因为我这样的自我作践的苦行僧多了，有思想的同学会处于更加孤立无援的位置。

毕业教育以前的寒假，虽然我也报考研究生，却和极少数大概像我一样拼命刻苦改造自己的同学一起，自愿报名，每天去生产队挑粪。毕业教育的时候，我还一再写申请书，要求毕业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这些都可以作为我被“去势”的例证。

1961年人民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曾经到人民大会堂参观。刚刚进入前厅，一位穿得像叫化子的同学，就坐到地上，还要打滚，以此表示赞叹大会堂。他曾经当过我们的班主任，现在的这一举动让我觉得恶心。可是经过几年的自觉改造，我自己也染上了穿大补丁衣服的嗜好。压抑的大学生活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代数拓扑班同学相约一起在学校正门合影。我竟然穿了大补丁的衣服出场，让同学们非常扫兴。这时候，我的一些毛病已经到了一意孤行的地步，真是离谱得很。

毕业前夕我终于成为共青团员。现在记得的，只是这些不堪回首的过分自找的浴火改造。当时批评我很多的一点，是说我还是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缺乏无产阶级需要的坚强。我也感叹，为什么不能像别的一些同学那样，似乎没有多少心理活动。为此，我甚至曾经跟最要好的同学说过，也许我应该抓一只小猫来，把它钉在板上，一刀一刀把它剐死，锻炼出无产阶级需要的铁血无情。

四十多年以后，我国社会已经进步到讲究人们的心理健康的时代。虽然剐小猫的说法只是多年以前我内心的一闪念，并且也不会诉诸行动，但是当年在脑海中曾经想象过这样血淋淋的图景的事实，仍然叫我惭愧，催我反省：怎么想得出来？在那个扭曲的年代！

## 同学被开除

六年级开学不久，我们拓扑学专门组最有才华的一位同学，突然遭到被开除学籍的厄运。

这位来自广西的同学，身体很好，功课更好。在我们这些一心向党努力改造自己的“红领巾”同学看来，他在政治上“不够开展”。不过我们也清楚，至少他对其他同学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在那个颠倒的年代，我们看来只是政治上不够开展的这种状况，已经足以让一个同学遭受厄运了。当时整个年级只有极少数几位党员，多半功课都非常不好，特别是资格更老一点的党员。其中一位根本就是留级下来的，却经常是我们参加又一轮政治运动之前在

---

阶梯大教室给我们做动员的人物。系团总支的一两个干部加上在我们年级的这么几个党员，他们领导的团组织，掌握着整个局面。大多数同学，都紧紧围绕在团组织周围，不要说“党叫干啥就干啥”了，就是说“团叫干啥就干啥”，也不过分。大局是这样，却竟然有人游离于这种政治生态之外，岂非大逆不道？

开除的通知来得非常突然，让他和我们都措手不及。

据说开除的直接原因，是他和一位比较要求进步的同学发生口角，最后有肢体动作。和他发生口角的那位同学，一直以来也是苦恼人，记得就像我一样，老是在争取入团，老是在接受考验，似乎从来没有得意过。

后来传说，之所以被开除，还有对现实政治不满的因素，其中一个情节，说是画过一幅画，画面上一个瘦骨嶙峋的人要举一付很重的杠铃。这足以成为“诬蔑大跃进”的罪证。

低年级的时候，他在一班，我在二班，我和他没有什么来往。高年级虽然我们都在拓扑学专门组的同一个小组，而且宿舍房间还是紧挨着，但是由于政治热情距离很大，来往仍然很少，反而是从别的同学那里听说他的一些“传奇”，比如自己证明了象棋先走的一方一定可以获胜等等。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却颇为关注，洞察我的心思。一天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不经意在黑板上写下“纳西”两个字，只有他，注视着我，并且轻轻地念出“纳西姑娘真美丽”这么个句子，脸上露出替我腼腆的微笑。原来，当时我们每个宿舍容易看到的就是《人民日报》，前一天报纸上的一幅照片，题目就是“纳西姑娘真美丽”。

通知被开除的那天晚上，他走到我宿舍来约我散步告别。说实在，我心里有压力，只是想到难得同学一场，而且内心感觉他一直善意地注视着我，所以还是跟他出去了。我们两个从住宿的二十八斋，走到燕园的未名湖，沿湖绕了整整一圈。当时说了些什么，绝大部分已经记不起来了，只有他拿出一双新买的棉鞋，说以后再也用不着了，要送给我，这个情节我却永远也忘记不了。

其实在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同学在“反右倾”运动中因为说了家乡一些真实的情况又不知道怎么认错就被开除学籍。不过那时候大家都刚刚进校，相互还比较生疏。

## 生活散记

学校生活正常一点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安排一点时间锻炼身体。政治运动不那么紧张的时候，也会去颐和园游玩，通常是步行来回，前后半天时间。严冬过去，比如说有人报告在颐和园划船已经可以把脚浸在水里，许多同学就会张罗一起去划船。

除了朱蔚文以外，从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读书的还有比我们低一届

---

的邹启苏，他学的也是力学。邹启苏很有才华，个子精瘦，但是足球踢得很好。他的手风琴更是叫人听得如痴如醉。1962年暑假，我们都回了广州。期间，邹启苏还教我拉手风琴，只是因为我的手实在太笨，结果毫无长进。1963年暑假，我们三人都没有返乡，而是坐火车到天津，在我们班一位后来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难的同学家里打地铺，次日转轮船去大连，在大连海运学院度假。主人是在六中时和邹启苏同班的诸绍忠同学。我们住在大连海运学院的学生宿舍，吃在学生饭堂，每天到附近的海滩游泳，还潜水拔海带吃。那时候困难时期刚过，街上能够买到的只是两毛多钱一斤的小苹果，但是一次从城里回来的路上看到有渔民在卖鲍鱼，朱蔚文当机立断，买下两斤九毛多钱一斤的新鲜鲍鱼，做出来的鲍鱼土豆汤，极其鲜美。诸绍忠是游泳高手，指点之下，我的蛙泳也很有起色，以至于回校以后北大游泳代表队的教练想吸收我为队员，只是因为了解到我已经高年级了，才作罢。后来诸绍忠和他在大连海运学院的女同学“回访”北大，我也略尽地主之宜。

在那个年代，比方说蒙古元首来访，北京市会安排“首都50万群众夹道欢迎”，至于毛主席发表反帝声明什么的，通常就有“百万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示威”。我们偶尔也被征召参加这些活动。1964年的一次示威游行，绕行东郊使馆区，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飘扬的法国红白兰三色国旗，当时法兰西共和国刚刚和我国建交。

出动最多的应该是在1960年。五一节的时候，每个班级都要在校园“载歌载舞”，歌颂比方说“二龙路人民公社”幼儿园小朋友的脸色“红得好像红苹果”。那年，全国抢救山西省平陆县中毒的“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是一曲“响彻云霄的共产主义凯歌”，王府井大街的北京特种药品商店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次不记得什么示威游行我们经过王府井大街的这家商店，大家就高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亿万人民，是一个整体。同甘苦，共呼吸，团结友爱最亲密……”当时，经济生活已经相当困难，但是大家还是这样“意气风发”。我们下乡抢种大白菜回来，留校的同学敲锣打鼓到现场乱糟糟的火车站迎接我们，唱的也是这首歌。

1962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我们摸黑起床，乘火车从居庸关下来，游览长城。离开长城的时候，恰遇一帮苏联人。原来是苏联共青团的一个代表团，大家自然就围了上去，用俄语和他们交谈。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不过十几年向苏联“一边倒”的教育潜移默化的结果，还没有清理干净。苏联代表团的团长非常聪明，马上带领双方高唱苏联的《祖国进行曲》，场面还是十分热烈。

1962年中秋节的晚上，我们同班几位同学从颐和园出来，夜色中迎面看到披着军大衣的彭德怀元帅向颐和园走去，军服上没有领章和徽饰。元帅背着双手，真正是忧国忧民的样子。后面几步远的地方，跟着两位警卫模样的战士。那一刻，颐和园门前没有几个人。我们在元帅的旁边走过，同学之间，默默无语。但是这幅图景，一直刻在我的心里。

---

这年十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在香山游玩，爬到半山，不意间发现朱德委员长从一辆苏制的吉姆牌大轿车上下来。他到香山散步，前后大约有四五位随从。偌大一个香山，在吉姆车停下来的那个地方，只有委员长一行和我们几个同学。随从示意我们不要打扰老人散步，说“你们知道就行了。”晚上回到学校，我们知道中印边界自卫反击在这天打响。老人已经不在战斗岗位上，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忘记了是1963年还是1964年，埃塞俄比亚的塞拉西皇帝来访。那天上午我们一些没有课的同学，被紧急调往颐和园，在雕廊等待夹道欢迎皇帝。大家感到幸运的，是非常近距离地看到了陪同国王行走的周恩来总理，大概只有两三步那么远吧。总理似乎比平常新闻电影上看到的要消瘦和精干一些。我还觉得比较惊奇的是，总理的胡子刮得铁青铁青。

1964年夏天，北京预期1965年暑假以前毕业的大学生都收到一张请帖，去工人体育场听报告，请帖上写着：“报告人：周恩来同志”。大家对周总理都非常崇敬。我印象很深的是，周总理说：“我们作为毛主席的战友和学生，……”

周总理讲完，因为要赶去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就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先行离去。接着彭真又讲了个把钟头。印象最深的，是他批评一些人“读了小学，看不起农民，读了中学，看不起工人，读了大学，看不起我们这样的人。”讲话以后，他还下到田径跑道，慢慢绕场一周，挥手向听众致意，场面颇为拖沓。

毕业以前，在北京铁道学院的礼堂开过一个北京市大学毕业生代表会。我因为被改造得自觉无条件地让“党和人民”“挑选”，空前绝后地当了半天听会的代表。会议的内容，一点记忆也没有，只记得会前大学之间拉歌，清华自然很出风头，八大学院也情绪饱满。只有我们北京大学，怎么也调动不起来。在苦苦改造的北大学生，显得相当压抑。

前面说过，那年我们数学专业毕业的同学，多半只按生源地域分配到三个地方的教育系统。我们这些南方来的同学，被分配到上海市教育局。在静安区一所师范学校住了几天以后，我们被分配到上海的一些中学。就这样，我到了上海市第五十二中学，教初中三年级的学生。

差不多六年的北大生活，既有美好的回忆，也有不堪回首的经历。同学都是真挚的，那份同学少年的友情，是我们永远的财富。老师都是可敬的，他们的榜样和教诲，让我们终身受用。但是政工系统干部的所作所为，实在太差劲太可恶。个别功课读不下去，“提前毕业”担任学生工作的党员，动辄指挥整个年级甚至整个系的学生，老师们也无可奈何。困难时期，我们这些总是觉得自己还没有改造好的同学，自愿捐出极其宝贵的粮票布票，却成为这种党员贪污的目标。

在我的片断回忆里面，个人自然有不少委曲。但是比起一些同学被大张旗鼓地批判，一些很有才华的同学甚至被开除学籍以至于后来多年生活无着，我的这点事情实在算不得什

---

么。前面谈到参观人民大会堂和“夹道欢迎”塞拉西皇帝，我的一些同学却在事前被告知，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政治活动。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很难想像会有这样的处理。可惜，那个时候我们政治环境的常态，就是如此。

---

# 同学五十周年聚会札记

数学二班 王则柯

北京大学原数学力学系 1959 年入学的同学相约在今年五月聚会，提前纪念入学五十周年。我们数学二班的同学，除了一位联络不上的以外，凡还能走动的，好像只有一位缺席。班级的亲和力由此可见。

## 认不出曾经最密切的同学

许多同学几十年没见了，所以头天上午会议之外的一个主要“节目”，自然就是测验是否能够认出多年未见的同学。同班十几位多年未见的同学当中，我只有张立昂一人没有认出来。

这就太不应该了。回想当年在学，低年级的时候，耿素云作为很有人情味的班级领导，一直像大姐姐那样爱护我们；高年级的时候，张立昂不仅和我同在拓扑学专门组，而且住在同一个宿舍房间，而且还是我争取入团的联系人！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别的一些同学，虽然毕业以后就没有见过面，可是 44 年以后相聚，还是一下子就认出来，偏偏张立昂、耿素云，1980 年还在北大的筒子楼（29 斋？）单独请我吃饭！从那时候到现在，不过才 29 年，我怎么就认不出来了呢？

想来想去，恐怕张立昂同学变化比较大也是一个因素。他长得比我高，当年比我魁梧很多，现在则显得斯文，清秀，典型的书生样子。聚会期间，他好像只是微笑着倾听别的同学的声音，自己没有说多少话。他一定时时刻刻牵挂着卧床的耿素云同学，难得的还是那么和颜悦色。

我们崇尚高贵。这就是高贵的一种。

## 同学少年，相互倾慕

头天的校园活动行将结束、我们绕着未名湖走向校门的时候，吴启光同学悄悄对我说，当年他是听了我的意见，才选择了概率统计专业。他觉得自己选择对了。

---

这让我非常吃惊。

回想在学的时候，我在班上不仅年龄小，而且是一个一直刻苦改造自己却老是赶不上其他同学的角色。吴启光同学在休学之前，好歹做过班上的干部，或者至少是小组长。我实在想不起什么时候给他说过那样的意见，更加想不到我的意见对他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后来看到李辛同学，想起我和他交往的两件小事，才觉得吴启光同学的回忆一定真实。

原来在学期间我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有一天我和李辛同学在校园散步。言谈之间，他对我说，世界上农业可以说过关的国家，除了瑞士，就只有美国。我听了以后，非常佩服他对于世界大势的把握。这比当时学校每个星期都有的形势教育强多了。还有一次散步，他跟我说，在设计穿甲弹的时候，坦克车钢板的钢材，在穿甲弹面前，也要看成流体。我自己就从来没有形成这样的概念，所以对他的见解十分欣赏。

我想，这大概是同学少年精英荟萃，不由得会相互欣赏甚至倾慕吧。

## 自觉改造，心心相印

听说徐明曜同学后来累倒了，祝愿他早日康复，好好休息。聚会期间，因为他太忙，我没有什么机会和他说话，不过却两次提醒他不要太累。第二次提醒的时候，他微笑着回答说：“王则柯，怎么老是讲我好话。”其实我不是讲好话，只是提醒而已，毕竟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

还有唐云，王理，何怡生，以及几位不曾同班的其他同学。张存桂同学嗓子都哑了，不过他“辩护”说是头天同学见面开怀畅谈的结果，这倒让我羡慕。

何怡生同学负责聚会的财务，和其他几位负责聚会的同学一样，非常繁忙。第二天游览，趁忙碌的空隙，他跟我回忆起五年级暑假一起到十三陵地区“下连当兵”的事情，当时同去的还有傅立福和罗启成等同学。

那次“下连当兵”期间，我们因为面临毕业被召回到工人体育场听周总理的报告。次日回去的时候，我们冒着倾盆大雨，从下车的那个陵，步行走到驻扎的那个陵，一路雄纠纠气昂昂，高唱革命歌曲。

记得那次是自愿下连当兵接受锻炼，我们年级去了不到十个同学。奇怪的是，当时我和何怡生、傅立福和罗启成，已经不在一个班级，平常联络也很少。可是我们就因为珍惜刻苦锻炼的机会，走到一起来了。这不能不说是有点心心相印吧。

于清甫同学还忆起有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和他相约“行军”锻炼，从北大经过人大、白石桥、北京动物园、西直门，直到新街口，胡乱买了面条还是烧饼充饥，又原路返回。

---

关于那次下连当兵接受锻炼，何怡生还补充说，他之所以记得清楚，其中一个情节是我被评为“五好兵”。我也记得这个情节，因为这是我在大学期间唯一的一次受到褒奖，虽然还只是校外的业余的项目。

我跟何怡生、傅立福说，那次下连当兵李沐兴也去了。现在回想，应该是我记错了。原来，这次锻炼期间，组织了一次联欢。和我们同一个排的，是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同学。联欢的时候，北二医一位长得与李沐兴同学非常相像的同学，拿树叶吹出好听的曲子。

---

#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59 级

## 入学五十周年聚会感言

计算班 吴广茂

尊敬的丁石孙先生和各位恩师，各位同学：早晨好！

今天，我只讲四句话，八个字，代表今天到会的计算班。

第一句话的两个字是“感谢”。

首先，感谢到会和未到会的所有恩师。同时，感谢筹备组的所有成员，

他们为这次聚会，从构思到操办，花费了多少个时日，已无法计算。

那些深入、细致的工作，遇到过太多的麻烦，

光 E-mail，就发送了成百上千。

我代表计算班同学深鞠一躬，以示向恩师和筹备组的谢意是真情实感。

要说的第二句话的两个字是“回顾”。

当年同窗，倏越五十年，

一群古稀人，重聚燕园。

上下打量，似曾相见，

左右端详，容颜已大变。

待互报姓名，方知曾是同年级甚至是同班。

不用详说，人人风雨透全身；

何必细看，个个坎坷布满脸。

遥想 50 年前，我们是那些踌躇满志的热血青年，

当年的一幕幕场景，历历再现：

全国一流教师对我们的哺育、身教和言传，

老校长马寅初的傲骨风范，我们都深埋心田；

教室里是渴盼知识的双双目光；操场上锻炼的身影个个矫健；

树林中回荡着朗朗书声；用书包抢占座位在第四图书馆；

---

偶尔傍晚散步，留影未名湖畔；  
端着从大饭厅打的一盒饭，  
不是边吃边看三角地的大字报，就是边吃边走在校园；  
好像是生怕浪费了学习的时间。  
向工农学习是我们的志愿，  
在北京锅炉厂和工人师傅同住一个大房间，  
向农民学习，从东北旺的苗圃到通县的农田，  
最难忘的是大兴县稻田的蚂蝗和十三陵奶牛场牛粪的臊酸。  
当然，也出了一些幼稚可笑乃至愚蠢的事件，  
在所谓的教改中，硬要我们编写尚未学过的教材，  
还扬言，打倒牛家店、哥家店。（注，指牛顿和哥西）  
十三陵修铁路，挖土苦战似在昨天。

遥想 40 年前，在那疯狂的年代，  
我们中有的人被戴高帽，蹲牛棚，或列为“白专”典型横遭批判。  
还有一批人，被发配到“三线”，  
日见狡兔满山跑，夜闻狼嚎绕屋前。  
世上多少人，争当什么批判“先锋”和“模范”，  
就是我们这些人，苦苦钻研愤愤然。  
浮云总有散尽时，阴霾哪能年复年。

说到三十年前，终于盼来了令人难忘的春天，  
我们中有的人，或负笈国外受业，或在单位成骨干。  
从那时起，才算有了稍好的条件，拼命干了 20 年，可惜时间太短。  
多少人壮志未酬，鸿图未展，终生抱憾。  
我们计算班，没人攀上科技的顶端，也没出大家、大师和大贤，  
只是一群为国尽力的孺子牛，平平凡凡。  
有的人，在大学、中学任教，植德立言，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桃李岂止数千数万；  
有的人，为两弹一星，置安危于度外，日夜鏖战；  
有的人，呕心沥血，报效祖国的航空和航天；  
有的人，在科研单位，潜心科研，成绩斐然；

---

有的人，在 IT 企业，为我国信息化做出新的贡献；  
有的人，从事地质石油工作，为国探宝独具慧眼；  
有的人，在军政机关或金融部门，两袖清风，陋习不染。

近看十年前，  
我们就开始陆续退居“二线”，或干脆“解甲归田”。  
一生的艰难，使有些人倍受摧残，  
或在五十来岁就得了多种病患，  
或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我们算是一批幸运者，熬过了坎坷的五十年。

五十年，算一算，就是一万八千三百天。  
从考入北大那一年，心里就承受着过大的压力，  
从走出北大那一天，身上就有着无形的负担。  
今天，就像一群在外面闯业多年的孩子，团聚在母亲膝前。  
或笑谈自己的小小成绩，使母亲开颜；  
或慷慨泣述在风风雨雨中，如何彰显出条条硬汉。

五十年来，从未忘记“北大毕业”四个字，  
五十年来，恩师们的教诲萦绕耳边。  
五十年来，未曾给北大抹黑，  
五十年来，不敢给北大丢脸。  
五十年来，尽管负担重，生活累，工作艰难，  
但一想到“北大”二字，再苦也心甘。  
不用关上门悄悄细语，可以敞开门高声大喊，  
五十年来，我们经受过无数次的考验，  
只要不是瞎折腾的岁月，我们就能才华竞展，  
为民鞠躬尽瘁，为国全身心奉献。  
五十年了，这就是我们上交给母校的一份最好的答卷。

要说的第三句话的两个字是“祝福”。

祝福所有同学，家庭幸福，身体康健，

---

祝福我们的恩师寿比南山，

祝福我们的母校昌盛万年。

最后，第四句话的两个字是“祈盼”。

祈是祈祷的祈，盼是盼望的盼。

我们在接近古稀之年，举办了入校五十周年纪念。

往近处看，祈盼近年内我们再聚首，再言欢。

往远处想，再过五十年，即 2059 年，祈盼举办入学百年纪念，

或许有人能活到一百二十岁，能参加那年的纪念，

可大多数人只能活到一百岁，那时已转世为下一辈子的十八九岁的青年，

我们祈盼的是，下辈子，让我们再上北大，再同年级，再同班。

(在聚会上发言时略有增删)

---

# 忝列北大学子

计算班 吴广茂

## 一、被逼上北大

我是被逼上北大的。

读高中时的一次体检中,我只能认出色盲检查书上前十几页的彩色数字,被定为“色弱”,这一下子使我做一名中医大夫的理想完全破灭了。虽然忍受痛苦,任由一名医生对我进行针灸实验治疗,但多次均无效果,只得作罢。1959年夏季报考大学时,不能考医学、物理和化学等许多专业,在高考志愿中,被迫报考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参加完高考,一身轻松,像往年一样,就去“打小工”了。没有技艺,只能做体力劳动,那年找的工作是在天津市道路的修建中拉压路机。十来个人拉着一个大铁碾子在路上来回走动,以压实路面。每天工作八小时,可挣六角钱。四十天可挣二十四元钱,也算是对上大学的一项补贴。

8月上旬的一天傍晚,拖着疲惫的身子下工回到家,伯母交给我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令我兴奋不已,居然被北大录取了。

## 二、初入北大的感觉——北大真大

8月底,从前门火车站出站后,被北大的校车接到学校,我办完报到手续,分到宿舍28斋114房间。报到时,每人发一个小方凳,并告知我们,这个凳子很有用,在宿舍读书以它作为椅子,到大饭厅开会或看电影也得携带着,当凳子用。直到办毕业手续时交回。可以说这是我们大学期间的一个“伴侣”。把小方凳和行李往宿舍一放,就迫不及待地逛校园去了,已忘记了那是提前几天来到的学校,好像就是一两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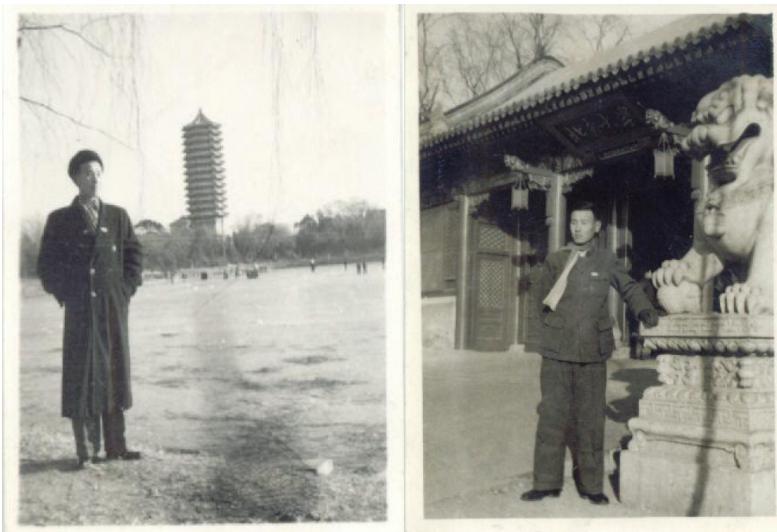
我被分到计算数学班,有四十多名同学,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其中仅有五名女同学。

我住的学生宿舍有六个人,按年龄排序,“老大”蔡仁泰来自海南岛文昌县,“老二”黄绍和来自四川峨嵋,“老三”董维申来自山东平原县,“老四”贾作皆来自山东泰山脚下,我排行“老五”,来自天津,“小六”戚志峰来自北京。谁知我起的这些绰号从“老大”到“小

六”一直沿用了整个大学期间。五十年后，2009年5月份举办入学五十周年聚会时，全班人见面依然用这个亲切的称呼，加倍彰显当年的友情。

刚入大学的第一个印象是，北大北大，真是太伟大了。9月1日晚上，北大举办建校六十一年来最隆重的一次迎新晚会，有舞会，有焰火，有各种游艺项目，大多设在未名湖北岸的几处小广场处。我们同宿舍的六个人，逛到均斋楼前，看到有不少人在跳交际舞，把从山东来的董维申看傻了，不用问，他是第一次看到男女相互勾肩搭背地搂着这种跳法。交际舞在刚解放那几年，城市中很盛行，可是，从1957年以后，大学里是不准跳的，北大特殊，可以跳，理由是有外国留学生。别看董维申1959年时看傻了，没想到，三十多年后，他到西安出差时，我们相见，他告诉我，他那时几乎每天晚上都参加核工业九院举办的舞会。2009年，我们在北大参加入学五十周年聚会时，他依然说，他的健身方法是跳交际舞，也许他已经忘记了1959年北大迎新晚会上像看“西洋景”那样的表情了。

我们六个人，看了跳舞，又看放焰火，走马观花似地观看了几种游艺节目。不知为什么，谁也没有亲自去玩个什么项目，我们好像是旁观者，不是参加者。六个人一直走在一起，不敢分离。晚上九点半多，有人说要回宿舍，都是初到一起的同学，谁也不愿意提反面意见，可是走哪条路回去呢？撞了几条路都不像，不得不问看起来年龄大一些的学生，就这样，问了三次才算回到宿舍。自那之后，我们才信服了报到那天一位学长说的话：绝大多数学生在北大读五、六年书，不会把北大走遍。



在北大未名湖畔留影

在北大西校门前留影

### 三、批判马寅初 受到的教育受益终生

1959年9月我入北大的时候，校长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

---

入北大之前，我曾经从一些书上了解到马寅初先生的一些事迹，他是我最敬仰的几名大家之一。

马寅初先生 1882 年 6 月 24 日生于浙江绍兴一个酿酒的家庭。1901 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专业。1906 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 年回国，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919 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

1938 年初，任重庆商学院院长兼教授时，揭露国民党四大家族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的行径，这下子激怒了蒋介石集团，于 1940 年 12 月 6 日被捕入狱。1941 年是马寅初先生 60（虚岁）寿辰之年，为了扩大影响，重庆大学的师生决定为马先生祝寿。会上筹委会主席赵国恩提议集资修建“寅初亭”。祝寿大会后不久，“寅初亭”便建成在重庆大学的松林坡前梅岭山上。

马寅初先生 1949 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1951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我忝列北大学子，能在以这样一位大家、大贤和大哲为校长的大学读书，当时十分自豪。

一个学期尚未结束，也就是在 1959 年的冬天，在北大就掀起了批判马寅初的“运动”，大字报铺天盖地，大饭厅内外、小饭厅内外和三角地周围的各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漫画，张张都是指名道姓地批判马寅初，我是一名刚入校的学生，如堕五里雾中，不知缘由。只知道他在什么杂志或报纸上发表了“新人口论”，被批判为马尔萨斯新人口论。

北大当时有一万多名学生，可是只有三个饭厅：大饭厅、与之毗邻的小饭厅以及学生宿舍区西边的新饭厅。为减少饭厅里的拥挤，饭厅里不设吃饭的桌椅，只有若干个打饭的窗口，学生买完饭菜，即端着走出饭厅，在当时养成了一个很怪的习惯，端着饭碗或边吃边看三角地的各种大字报，或边吃边走向教学区的教室或图书馆，以早点儿抢占座位。。

至今印象最深的一张大字报，那是一幅漫画，画的是“驴拉磨”，讥讽马寅初的经济学说就像是“驴拉磨”那样团团转。

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文章中详细回忆了在大饭厅召开的那次全校性的批判大会。文章讲的大概情况是，记不起当时有几位在大会上读批判文章了，最后是马寅初的表态，面对全国报刊杂志对他的批判文章，面对全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漫画的批判，马寅初在批判会上毫不示弱。他说，他写的反驳文章没有报刊给他登载，他的办公室的墙上已经被那些批判他的大字报贴满了，于是，他就把写成的反驳文章贴在他宿舍的墙上。

面对全校师生，他说：“我以八十高龄，单枪匹马迎战”；“说我老糊涂了，实际上，我一天洗两次冷水澡”；“说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实际上，我心广体胖”；“我号召北大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向我学习”。这是一种何等的勇气，何等的胸怀，学者坚持真理何等的气概。没有御用文人的颜和骨，多么高大的一位学者。

---

马校长实际上是一位个子不高的胖老头，讲方言很重的绍兴话，我记不清我当时是否在场，在场可能也只是似懂非懂，不知就里地坐着听。事后才知道，当时批判马寅初实际上已经不是学术争论，而演变成政治问题了。马寅初在人口问题上的观点和毛泽东有根本性的分歧。于是，整人老手康生就出任了批判马寅初急先锋，连周恩来也出面奉劝马寅初承认错误。面对当时的“万岁”和这么多大官，马寅初对学术问题做了更深入的研究，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坚持自己的理论和观点。他这么说，也就这么做了。他不畏官，一而贯之。国民党时，和蒋介石对着干；共产党时，又和毛泽东观点对立。

那次批判大会之后不久，1960年1月4日，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接任校长的是当时的党委书记陆平，恐怕这是北大历史上第一位纯政界人士出任校长。

四十年的实践证明，错批一人，人口误增四亿。

## 四、几位恩师

给我们年级240名学生上基础课的都是著名的教授。如讲《数学分析》大课的先是闵嗣鹤先生，后来是冷生明先生。讲《解析几何》大课的是姜伯驹先生。上《数学分析》和《解析几何》习题课的分别是1959年刚刚由北大毕业的张恭庆先生和马希文先生，承担年级主任的是周巢尘先生，他们当年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比我们大四、五岁而已，可是，这几位当年的年轻教师，后来都是中科院院士，在数学界和软件界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给我们计算班讲专业课的老师都是当时计算数学界的泰斗级大家，讲《计算机原理》的是计算数学教研室主任徐献瑜先生，他将计算机的单元比作旅馆的房间，以张旅客来住两天，走了之后，李旅客才能入住，形象比喻单元的存取，我至今记忆犹新。胡祖炽先生出版了当时国内第一本讲计算方法的书，但是他给我们上线性代数计算方法和流体力学计算方法时，没有选用那本书为教材，而是以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为背景写成的教案。

教我们计算班《偏微分方程计算方法》的是数力系以严谨著称的陈永和先生，那是我们大家很佩服的一位中年教师，上他的课我所记录的笔记至今犹存，算是永久的纪念。不知为什么这位很有才华的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然想不通而自尽了。呜呼，至今提起此事令人产生一种无名的悲哀。是他自己的悲哀，是北大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教我们流体力学的是吴望一先生，教常微分方程的是吴兰成先生（女），教计算方法习题课的是靳云慧（女）先生。在北大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不管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一律称呼为“先生”，我觉得这一称呼甚为妥切。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先生”只用于男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中国的文化中，对于有学问的女性，同样称之为“先生”，如冰心先生、许广平先生等等。我基本上是在天津读的小学和中学，从未称呼过“老师”。自小学起，对

---

男女老师一律以先生称之。所以，到北大以后，对男女老师均称先生，我是非常习惯的。

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流体力学的计算方法的，题目是《用Д о р о д н и ц ы н 积分关系法二级近似解超音速轴对称体的绕流问题》，同桂芝一起做这个题目。指导教师是李文绚（女）先生。李先生长我们十来岁，曾留学苏联。丈夫是当时航空工业 612 所（位于洛阳）的一位专家，也是留学苏联的。两人的女儿当时不过三、四岁。有一次，我在中关村去科学院的路口上，遇到他们一家三口，据说那是她丈夫回北京来休假。不幸的是，我的那位恩师李先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癌症病故。

## 五、听王力、侯仁之等大师们讲座

北大有许多大家，经常请这些大学问家举办讲座会，这是多年来形成的校风。对这种讲座，我几乎是一场不拉。当时这种讲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北大的讲座，不似现在的百家讲坛，胜似现在的百家讲坛。现在的“百家讲坛”已经没有“百家”的味道了，只剩下“教授说评书”一家了，而且这一家也局限于重复大家所熟悉的那些内容。没有新领域，更没有自然科学各家的新颖内容。

北大的讲座，不仅请校内的学问家，也请校外的著名专家来讲座，如来校讲座过的有许广平、华罗庚、吴文俊等人。

王力先生是中国最为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在某一次讲座中提到，要求入北大的学生，不论是学文科的还是学理科的一律要会背诵《三字经》。在另一次讲座中，他批评有些人的错误观点——认为学中国古文比学外语都难。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天”字，他说，这个字古文和现代文基本上都是这个形状，只是发音上有些区别，现代文发音为“tian”，古文发音为“ting”（不知我记得对否？），基本上一致，怎么难学呢？你看，外文对这个字就完全不一样了，一边说，一边往黑板上写字，先写了英文的“sky”，又写了俄文的“Небо”，又写了德文的“Himmel”，又写了“空”字，在边上用日文的假名注上“そら”，王力先生还写了一个法语词，因我至今不懂法语，自然也回忆不起那是个什么词了。先生写完了这些外文词之后，紧接着说，你们比一比，古文还是比外文好学吧。

多年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么博学的学者了。我一直在想，现在许多从事汉语或文学工作的学者，往往诘问一个问题，“我是搞中国文字的，学外文有什么用？”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还是一个挡箭牌或遮羞布，这些人不妨了解一下王力先生的学问，再读一读林语堂先生用英文写的《苏东坡传》，看一看，想一想，或许就会省悟外语对研究中文的人有多么大的用处。

侯仁之先生当时是地质地理系的系主任，他发表在校刊上的“校园史话”，我是每期必

---

读的。至今还能向一起游北大的友人们卖弄我从侯先生文章中学来的那些知识。侯先生讲北京的水系，颐和园的历史典故，圆明园的历史与现状，海淀与海淀镇的渊源等等故事，我至今还能说出一二。

耳濡目染，使我这个本来从中学就爱阅读各类书籍的人，好像是得到了无言的鼓励。

## 六、苦读之乐

北大读书的那六年，是我最长学识的六年，也是我终生引以为自豪的六年，最难忘的六年。同时，那六年是纵贯全国经济困难时期的六年，这六年中有太多的故事。

1959年，全国不少地方的经济困难形势已很严重了，而北大尚未见苗头。不少学生依然吃包伙，每月交12.50元，吃饭不定量，随便吃。我当时是校手球代表队队员，每星期三和星期六的下午有三个小时的大运动量训练。我吃饭用的是一个像小面盆一样的搪瓷饭盆，叫人看了都有点害怕。校队队员每天晚上可以免费打到两个补助菜（一荤一素），我再买上12两饭（16两为一斤），那已经是冒尖的一饭盆了。

在北大读书时，我有一辆破自行车，从中得益不少。国庆节放假，可以骑车回天津。在学校上课，两节课的上课教室相距甚远，上一节在五四广场附近的第二教学楼，下一节可能在未名湖北岸的均斋附近，这个破自行车，使为我快速赶到教室抢占座位方便多了。

1960年到1964年这一段时间，老百姓统称为困难时期。那几年的困难情况，已有许多作家在书中作了详细刻画。我读大学的年代恰恰是这几年。

1960年秋天，经济形势骤然恶化，我们必须严格控制粮食定量，使用饭卡，每天严格控制在1斤以内，控制不好，到月底就得挨饿。北大对学校的校队队员，有点特殊照顾，每月定量35斤。现在人们会说，少吃粮食，多买肉吃，多买糕点吃不一样吗。那时，国家算计得很周到，买肉要肉票，买糕点要糕点票，每人每月3两油，半斤肉，半斤糕点。

大学的六年，是我一生读书最刻苦的时期。吃不饱，硬扛着。晚上从图书馆出来往宿舍走的路上，已是筋疲力尽，经常是严重眩晕，浑身出虚汗，几乎摔倒。十年后，身体检查时才知道，我多年来竟一直是低血压、低血糖。六年的发愤，是长志气的实践，换来的是终生受用的学习方法和哲理，当然也包括满意的学习成绩，藉此权作一种慰藉。

## 七、农村锻炼 十三陵修铁路

1960年的秋天，是我们大学二年级的上学期，开学不久，我们被分到北京南郊的大兴县的农村劳动两周。一天下午，任务是在稻田里拔草。本来拔草这种活很好干，可是，大兴

---

县稻田里的蚂蟥特别多，不时地向腿上爬，吓得不少人不知所措。一边弯着腰拔草，一边低着头注视腿上有无蚂蟥的踪迹，谁都顾不得看看天色的变化。突然间，西边的半边天黑了下来，一片乌云滚来，我们还正在犹豫怎么办的时候，暴风夹着冰雹已经打到头上了，人们撒腿就跑，班里的四个女同学齐声尖叫。我们已同学一年，同班同学之间已经有些熟悉。我马上跑到班里的两个女同学跟前，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手拉着一个飞也似地往回跑，田间没有路，斜叉着跑，直奔那个田间的小屋。等我们跑到小屋后，我们三人才感觉到我抓她们太紧了，把手松开，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两个女同学，一个是北京姑娘田多如，一个是郑州姑娘李桂芝。李桂芝后来成了我的终生夫人，不过那时，可是连想也没往这上边想。

1960年，冬天来得特别早，也格外的冷，真是我们接受生死考验的第一个冬天。校长陆平，据说原来是铁道部的一位副部长，自不必说，与铁路部门有特殊关系，所以，在北大与设在十三陵的新校之间铺一条专线铁路的申请能被批准。修铁路的民工从何而来？北大的学生就是最好用的民工，工地就是学生进行思想改造的最好战场。于是，把北大的不少学生弄到十三陵新校去修铁路。粮食还是那些定量，干的是土方活，住的是农村透风的“礼堂”，住处距食堂十里地，食堂距工地又是十里地。中午在工地迎着北风就着雪花吃冰冷的窝窝头。吃过之后，班干部还要读《毛选》让大家听。我那个年级的一位同学，在这种环境下，肚子饿得不行，偷偷地在老乡家里买了一斤柿子，又怕同学知道，狼吞虎咽地吃了，结果得了肠梗阻。那里没有医疗条件，治疗不及时，硬是死在从十三陵往北大送的卡车上。一个年轻的北大学子就这样命丧黄泉，他的家长将是多么悲痛呀。几十年来，我一直怀念着这位忘记了姓名的同学。

1961年夏天，我们班被分配到十三陵的一个奶牛场劳动锻炼，主要劳动是清扫奶牛圈，将腥臊熏鼻的牛粪一车一车地推出牛圈。奶牛场里安装有大喇叭，据说是，奶牛听了轻音乐会增加产奶量，可是，我们从未听到过播放轻音乐，听到的多半是锣鼓声特大的京剧。

在奶牛场劳动的这张照片上，后排自左至右是（？）、张忠旭、陈礼武、宋宝忠、丁为照；前排自左至右的是我、两位工人师傅、赵同乐、周兴元。



1961年6月在北京北郊十三陵的一个奶牛场劳动

---

## 八、同窗好友 终生夫人

全班的五名女同学中，老大姐王琨已经结婚，其余四位都是1940年生人，长我一岁。看来无缘在同学中找老婆了。

大学三年级起，因为学习的关系，同桂芝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情结，就这样慢慢地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那个年代，大学里明文规定是不准谈恋爱的。我们只得是“地下活动”。在全班仅有的四名女同学中我能“抢”到一个，也算是我终生的幸福。

现在总想回忆一下我们当时是怎样由朋友变为恋人的，但是已经说不清了。即便是能说清，我和桂芝的观点也迥然而异。所异者，无非是当初谁追谁的问题。现在澄清没有必要，也无法澄清。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

北大的学生多，教室少，每个班没有固定的教室。上课是轮着教室上；学生上自习，也是自己到处找教室。北大学生的风格是背着书包自己找自己自习的地方，“各自为战”。大学一、二年级时，我多是骑自行车到位于学校西门附近的大图书馆去上自习。大图书馆离我的宿舍很远。尤其是晚上回宿舍时，校园里总是黑乎乎的，路灯似有若无，所以我班没有人到那里去上自习。

大学期间，我有记日记的习惯。我与桂芝表白关系的那一天，以及日后我们所有的约会，我都记录在我那个红皮的大日记本上。也许是因为几次搬家，也许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反正这些年我一直在苦心寻找的那个日记本，至今没有找到。

夫人自从嫁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家，持家生子，失去了年轻的大好时光；在外，工作上从不做弱者。生活上艰难度日，从不叫苦，挂在嘴边的话是“知足常乐”。心胸大度，性格开朗，好像再大的事，也视之淡然。

女人再要强，毕竟还是一位文弱女子。内外怎能兼得，家务事必须多付出，业务上不得不让我占先。到外出差，国外学习，无不以我为中心，使我终生感激，心存歉疚。

按中国的说法，六十年是一个花甲子，六十一之数是一个更新之年，是人生第二个春天的开始。2001年的4月28日，按农历是四月初六，恰是夫人的61岁生日。我也附庸风雅，学步效颦，仿赵元任先生的诗作，乱诌一首赠夫人：

夫妻百年恨日短，约定来世仍团圆。

偿还欠你今生业，我作夫人你为男。

桂芝听罢，甚喜，来世可为男。我立即笑着补了一句，曾记否，上辈子我也是这个诺言。她一听此话，愕然，不知如何作答。

---

(注：语言大师赵元任与夫人杨步伟在庆祝他们金婚时，夫人写了一首小诗：“吵吵争  
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因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赵元任回赠一首：“阴  
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诗的最后，赵元任  
还风趣地签上了两个女字旁的元任二字为名字。)

## 九、学习成绩不算拔尖，但算较好

那个年代，国家不公布每人的高考成绩，但不言而喻的是，学生多是来自各地的尖子生。马希文先生给我们上一年级的解析几何习题课，在学生名单的侧边上注上了高考中每人的数学成绩，一次，被同学们发现，有人数了一下，数学高考成绩得 100 分的，我班有 7 人，我是其中之一。

我在大学的学习成绩不算拔尖，但在班里能排在前十名。尤其是一年级时，几乎所有的课程都是 5 分。

第一学年学的数学分析对我来说是个难题。学了半年，我都没弄明白到底这门课是研究什么的，也不知道所学的内容有什么用。一个“ $\epsilon$ ”，一个“ $\delta$ ”，就把我完全搞糊涂了。奇怪的是，尽管我自己觉得我没有真正掌握这门课的精髓，也没有完全把这门课的内容变为自己的思想，但是，考试成绩还是满分。直到第二学期，才真正掌握了这门课的精髓。可见，从中学所学的直观内容，转到大学学习抽象思维的内容，需要一个过渡期。有的人适应能力强，很快就习惯。有的人适应能力弱一些，需要的过渡期长一些。

在大学的六年中，专业课学得较好的当是数学分析、计算方法、物理等课程，几乎是全 5 分，只有《程序设计》一门课的试卷，因为看错了一道题，结果得了个唯一的 3 分。在基础课的课程中，我最擅长的是哲学之类的科目。在大学里我才发现，我的背书工夫还是不错的，比如可以背诵《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些节和段。

## 十、英语启蒙老师

在大学共学了两门外语。第一门是俄语，第二门是英语。说起学外语，倒有一点自豪。我自幼喜欢学外语。初中一年级开始学俄语，学了两年，不知什么原因，在初三时停了一年课。到了高中时，又继续学了三年。不管初中高中，凡是俄语课本上的内容，我一律熟练背诵。所以在初中时，我有“小洋人”之称的美誉，可见对俄语学得是不错的。

在北大的前三年依然学俄语，学校为了紧跟形势，搞教改，把俄语课改为学习政治性文章的课堂，我记得有一年竟然学起了俄文版的《列宁主义万岁》中的三篇文章。那种政论文

---

章长得很，我不得不改变一下背诵全书课文的“习俗”，而只背诵重要章句。其它两年，俄语课学的是数学专业的俄语，当然也不能全篇背诵了，但是，全课的单词，那是必须背会的。三年中，我一直是俄语课代表。四年级时，开始学英语。要把同学分成“快班”和“慢班”。“快班”由两部分同学组成的，一部分是在中学学过三年英语的同学；另一部分是尽管没有学过英语但俄语成绩较好的同学。我理所当然地分到“快班”，而且依然是课代表。在这个班里，我还是班里学英语成绩较好的学生。这有一半要归功于我的英语老师。那位女老师姓陈，叫陈瑞兰，三十几岁，原燕京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好像是一位名门闺秀。我到她家去交全班同学的作业本，看到她母亲在看英文的小说。她留我在她家坐了一阵，于是她就打开话匣子，聊起了家常，而且聊得很深，好像她憋了多年没有地方倾诉，现在要一下子吐诉出来一样。她丈夫姓杨，在北大教政治。她有两个相差两三岁的儿子，大的有十来岁。就这两个儿子的名字，陈先生告诉我一个笑话。她用极标准的北京话说，“我们两个儿子的名字多好，一个叫杨松，一个叫杨柳。这是取自毛主席的文章，既要有松树的原则性，也要有柳树的灵活性。可是这些小同学把我们这么好的名字叫成‘洋葱’和‘羊油’”。

每个星期三晚上，在大饭厅放映外文电影，是为了外语教学用的，不用买票，随意进出。有时放映俄语片，有时放映法语片，有时放映其它语种的片子，在放映英语电影时，陈先生会约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看电影，我们当时刚刚学了不长时间的英语，哪能听得懂，她就坐在我们中间，为我们翻译那些关键的句子。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放映的是深海沉船的故事，其情节就如同近年来放映的《泰坦尼克号》。

可以这么说，陈先生是我学习英语的启蒙恩师。

后来听在北大当老师的当年我的同班同学雷功炎说，陈先生在文革后专门开设了一门外国留学生学中文的课程，而且还出版了成套的教材，很有些成就。

## 十一、我所喜爱的文艺——相声和快板

不知为什么，从中学开始，就特别喜爱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大学期间，这种爱好依然不辍。特别喜爱侯宝林、朱寿臣等人的相声语言（后来听说北大聘侯宝林为兼职教授），幽默而不庸俗，文哏有嚼头。我把当时能买到的相声书籍几乎都买了。而且还喜欢说几个段子，记得当年我们年级举办什么联欢会或演出会，我就同雷功炎两个人给全年级的同学说上一段，权作凑个热闹。

有一次，学校在办公楼二楼的礼堂里搞一个什么汇演，我们班的六个人就以参观北京二龙路人民公社为题写了一个快板书，这六个人是雷功炎、宋宝忠、张从金、丁为照、戚志峰和我。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快板书的只言片语。快板书的开头是“二龙路，在北京，城市公

---

社打先锋。……飞彩凤，舞金龙，跃进鼓催动春城。”写公社办的生产车间中的女师傅“摇摇把，上卡盘，简直赛过男子汉”；写公社厨房里机器包饺子的情景是“又放姜，又放葱，整块猪肉往里扔，叽叽叽，噌噌噌，饺子飞出赛流星”。宋宝忠发挥特长，为我们参加学校的汇演，特别设计了民族式的“服装”。那个年代，哪里有钱专门买服装，只是用光亮纸剪出民族服装的花边，用浆糊贴在白衬衣上，远处一看，还是挺能蒙人的。记得那次的快板书节目还在学校里得了奖。

## 十二、我喜爱的运动——手球、足球、游泳、滑冰和“铁环”

我与同班的赵同乐被挑选为学校手球队队员，按照校队的规定，每星期三、六下午，大运动量锻炼三个小时。但是，这种活动伴随着 1961 年以后困难时期的到来，也就逐渐停止了，直到 1964 年以后，再陆续恢复。那时，我已经临近毕业了，就不再参加校队活动了。

下面这张照片是当时手球队的部分队员在北大西校门前的留影，我是前排最左边的蹲者，赵同乐是后排站立者中左起第三人。



1960 年北大手球队员在北大校园门前留影

偶尔也在操场踢踢足球。我的小学和中学位于天津河东区，那是一个有“足球窝”之称的地区。我的多位同学体育素质很好，我们自幼在一起或踢球、或练习体操，体操项目中以单双杠为主，兼有垫上运动，如翻跟斗等活动。他们中有些人后来成了体育界的人士。如长我五六岁的王景元，1956 年获得全国青年体操比赛的前三名，1958 年留学莫斯科体育学院，六十年代初回国后任国家男子体操队教练，其夫人任国家女子体操队的教练。又如田桂义与我是隔门的邻居，自小一起长大，高中二年级时，他被选入天津青年足球队，继之，做过八一足球队的守门员，后来，做天津少年足球队的教练多年。其余的那些“发小”，不管在什么单位工作，肯定是那个单位的足球明星。比如，自小学至高中一直是同学的吕桂良，大连

海运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船舶工业 707 研究所工作，在 50 多岁的年纪时，还以踢足球为健身项目。在这个群体中，我是一个“另类”，体育素质最差。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耳濡目染中，我也会一点点“小技”而已。比如，他们可以连续翻几个前空翻和后空翻，我只能翻几个前手翻而已；他们在足球场上，可以叱咤风云，而我在场上最多是个陪衬，是比一柱木桩也强不了多少的人物。即便在我们那个群队里我是如此的无能，可是在北大这个新的群队里，我的体育素质竟然算是不错的。我组织了我班的几个人，与别的班进行足球比赛，还从数学班找来张存桂，冒称我班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叫引进“外援”，不料，张存桂一个相当漂亮的“乌龙球”踢进了我们自己的球门。2009 年 5 月在入校 50 周年聚会时，张存桂还提起 47 年前的这段趣事。下面这张照片就是在比赛前我班几个人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后排站立的自左至右是段致和、我、赵同乐，前排自左至右是丁为照、雷功炎、张学洪。



照片 5 1962 年班级足球比赛前

在北大的西北角上，有一个红湖，夏天是一个游泳场。一般同学需要花 2 分钱买一张票才能进场游泳。对于我们校代表队，有一项照顾，可以免费游泳。所以，在不是校队训练的时间里，我偶尔去红湖游泳。一次，我班的许惠芳、徐珍芳和李桂芝等女同学，穿着游泳衣，光着脚走在游泳池的边沿上，与我不期而遇。她们好像是第一次穿游泳衣，也许是第一次进游泳池，见到我时，他们脸色绯红，脚都不知道如何遮盖，尴尬得让我难堪至极，好像她们在说“怎么这么倒霉，在这里遇到同班同学。”过了好多年，桂芝告诉我，自从那次在游泳池见到我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去过游泳池，那件新买的游泳衣，也就是穿了那么一次。真没想到，那个年月的女学生还这么“保守”。

未名湖，冬天是一个滑冰场。我在天津读中学时，有一双装有加拿大冰球刀的滑冰鞋。在北大的那几个冬天，这副冰鞋还是大有用场的。

春秋季节，不能游泳也不能滑冰，凡不是校队集训的那些下午，一般是四点多钟以后，我便在五四操场上，或玩单杠的引体向上，或玩双杠的推杠动作，以健身为主。也花一些时

---

间玩一种叫“铁环”（有人称之为“辐琥”）的器械，这种器械，近年来几乎见不到了。“铁环”由两个大小相同的铁环并列构成，两个铁环之间的间距约有 20-30 公分，两个铁环的直径 1.6 米左右，人站在环内，双手成八字上扬，抓住环之间的横梁，双腿下分，成八字形，双脚钩住环之间的空缺，铁环旋转，人体在其中也就天旋地转地跟着转动。

### 十三、抬重机枪过天安门参加建国 10 周年大庆游行活动

1959 年 10 月 1 日是建国 10 周年的盛大纪念日。中国政府除了在北京花巨资矗立了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十大建筑之外，还要举行武装游行，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军力。

我们入校不久，就为参加十年大庆的游行活动做准备，一方面花不少时间在五四运动场上排练游行队列。因为我的个子比较高，被分配到民兵队伍抬重机枪。另一方面，利用课余时间，派人专门教我们学习交谊舞，旨在参加 10 月 1 日晚上在天安门广场的联欢活动。

9 月 30 日晚上，我提前进城，住在前门外南河沿的一位父辈的朋友家里。10 月 1 日凌晨，赶在戒严之前，就来到北大学生的集合地点（好像是在东单一带的马路上）。北大的民兵游行队伍中，我们抬重机枪的最显眼，一是因为重机枪本身就高，二是由四个高个子的学生抬着，高上加高。过天安门时，北大的队伍走在最北侧，我们能看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那个年代，能亲眼看到毛主席，也是一种骄傲，也让人激动一阵子。

队伍走过天安门之后，好像是在民族文化宫之西的某一个地方，才把这些武器装到汽车上，我们也乘车回的学校。

10 月 1 日下午，带上干粮和水，乘车回到天安门广场上，“驻扎”在给北大划定的区域内。对北大好像是特别照顾，划定的区域是在最靠近天安门的金水桥前，为参加晚上的联欢，我们在那个区域内，或坐或站，一分一秒地候着时间。天黑下来以后，放焰火前，天安门城楼上站满了国家领导人。

焰火过后是跳舞，那个时候，我最寒碜。虽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临阵训练，但是，依然不会跳，我只得站在舞场的外圈当观众，换成集体舞时，我才有参加的份。

联欢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我们才随着大队伍返校。我在想，那项活动若是搁到现在，肯定人们会称之为“狂欢之夜”。

### 十四、骑自行车旅游与往返于京津之间

我十六岁在天津读高中时，就曾与十几名同学一起骑自行车到北京旅游一周。一次，还约二、三名同学骑自行车到离天津 97 华里的塘沽去看大海。天津附近的那些地方，包括东

---

郊的一些农村，我骑自行车到过多处。可以这么说，骑自行车游玩是我自中学开始的一项爱好。

到北大后，我骑着那个破旧的自行车转了北京的许多地方，单人独骑，曾到卢沟桥上数过狮子的数目（北京谚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到宛平镇寻找过七七事变中留下的枪眼；到香山碧云寺与一位四十多岁的和尚有长时间的交谈；在戒台寺和潭柘寺都有较长时间的逗留。与宋宝忠几位同学也结伴骑自行车游过鸿峰。现在的北京，自驾车或乘公交车到这些地方已经不算什么远距离了，可是，五十年前，那是一段很长很难走的路呀。

我独自一人骑自行车往返于北大与天津之间，不知现在的北大学生有人甘愿吃这种苦吗？

从铁路局公布的里程上得知，从北京前门火车站到天津东站的铁路线距离是 127 公里，京津公路就不像铁路那么走直线了，有一个向北的大弯，其距离应该大于这个数目不止 20-30 公里，北大到前门这段的距离还有 15 公里吧，如此一算细账，北大到天津我家的距离，应该不会少于 150 公里。

1959 年的国庆节，是 10 年大庆，放假四天。10 月 1 日白天参加游行，晚上参加完联欢会，回到宿舍已经是后半夜了。也许是心情激动，也许是精力过于充沛，心想，假期还有三天，何不回天津一趟？没有睡几个小时，2 日的清晨，从饭厅买两个馒头，再买二分钱咸菜往馒头里一夹（形式上有点像西安的“肉夹馍”），往书包里一放，往肩上一背，跨上车，就这样上路了。出了建国门就是一条奔通县的柏油路，路上车很少，清晨凉爽，又刚上路，尚有劲，车子像飞一样，很快就从通县的边上擦过。公路上有些上上下下的坡路段，较陡的路段我不得不推着上，下坡时自动滑行一段算是“报答”。中午时分到达河西务。找一个卖茶水的小摊，一碗茶水二分钱，我花四分钱买两碗，就着两个“咸菜夹馍”，算是一顿午餐，再“方便”一下，就继续前行，下午五六点钟安然轻松地到家，洗一把脸，休息一下，正好赶上吃晚饭。

第二天，在天津，骑自行车访问几个同学。

第三天，骑上自行车原路返回北大。

## 十五、北大的电影

北大的电影放映有几个特点。

大饭厅是唯一放映电影的地方。别看放映的场地少，可放映的场次不少。经济困难时期的那几年，除星期三晚上放映外语片，供教学用之外，几乎每个晚上放映电影。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要放映几场。

---

放映的新片多。只要是社会上新上市的电影，北大要连续放映好多场。

放映被批判的影片多。放映的理由是，供学生批判用。比如，社会上已经停映了被批判的《早春二月》，可是北大又连续放映了好多场。

别看我以“北大的电影”这个标题说事，可是我一个学期也看不了一两场电影。我总觉得在学生期间看电影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等工作以后，有的是时间看电影，到那时候再补看也不迟。

## 十六、一直是“长翅膀”的青年

在中学，忘记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了一个怪想法——像当时的郭沫若一样，做一个无党派人士，当然，在青年时期就不想入团了。进入北大之后，一看周围的人绝大多数是团员，“长翅膀”的非（飞）团员，只有六、七个人。表面上给别人的印象是，吴广茂只知道念书、锻炼两件事，我行我素，心无旁骛一样，可是我心理还是有一种莫名的压力。

当时，也曾试着努力过。比如，学着别人的样子，写个入团申请书，找团支部书记“汇报”一下思想，以示也是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但是，可能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人，不够条件，一直到毕业也没有混上个团员的称号。

到了工作单位，已经是 24 岁的人了，年龄大了，也就死了这条心了，索性也不写什么申请书了。当时，也曾想跨过青年团这个阶梯，直接入党吧。没想到，刚工作了一年，就进入了文化大革命阶段，那就不要妄想什么入党的事了。

直到八十年代初，我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进修的两年半里，才入党并转正。后来，经常对人以开玩笑的自豪口吻说，我是在马克思家乡入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共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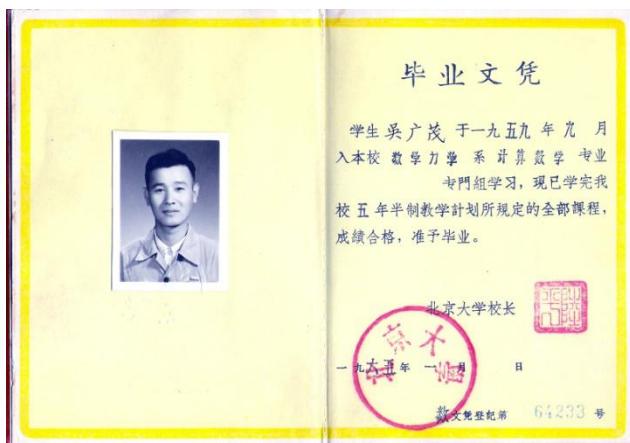
## 十七、奇特的学制——五年半

学制很奇特。刚入学时，说学制是五年，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是 1964 年毕业。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从 1962 年的毕业生开始，就改为六年制毕业。按照这么一算，我们就应该是 1965 年夏天毕业。那个年月，多数人认为多学一年也不算是坏事，也就没有多大的反感。因为当时只有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实行六年制，也就认可了。可是，事情总是在变化的。据说，1964 年春节，毛主席召集蒋南翔、陆平等大学校长，举办了一次高等教育座谈会，他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现在的年轻人都以为这个口号是毛主席在 1968 年 7 月 22 日的批示中首次提出的）。当时，对我们大学生传达了这个指示，于是，北大闻风而动，雷厉风行，立即着手将学制由六年制向五年制改变。应当在 1964 年毕业的 1958 级学生已经

来不及更改了，依然是六年制毕业。1960年入学的改回五年制。唯独我们1959年入学的数学班和计算班，是由六年制向五年制过度的一档，即五年半学制，就像毕业证上写的那样，1965年1月份毕业。不知当时是什么原因，硬是扣留到4月份才让离开学校到工作单位去报到。毕业证上的那张照片好像是1964年秋天照的。总觉得照得嘴有些不对劲。1965年1月在北京又照了一张标准像，忘记了当时的用途。



1965年北大毕业前



我的毕业证

## 十八、告别北大闯关东

1965年3月，全班在北大西校门前照了毕业照（照片8）。第二排中间是学校领导，有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副校长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党委副书记张学书，著名数学家北大数学系主任段学复，计算数学著名教授徐献瑜、胡祖炽，当时是一般教员而以后成为软件工程方面的著名专家、院士杨芙青。我在第三排，站在陆平和张学书的背后，桂芝则蹲在他们二人的前面。

西校门是北大的标识性建筑。六年前，我在这里照过入学照，六年后的我还是在这个依旧的校门前，我照了分别照。这个校门不知见证了多少学子从这里走向全国和全世界。

由于桂芝在毕业分配志愿上填了一个志愿为“军队”，于是我与桂芝被分配到位于东北沈阳的“总字922部队”。当时那是一个穿军装的隶属于总参的飞机设计研究所，是一个保密单位。1965年4月底，我们收拾起那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装，乘上了呼啸北去的列车，直奔沈阳。一双青年就这样结束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学习阶段，深刻着学校的烙印，融入到一般人不知就里的航空事业大军中，消失在匆匆来去的人群里。

临行前，家在北京的戚志峰（小六）赶来车站送行，还赠我几本书。那几本书，我保存了好多年，由于搬家次数太多，后来才丢失了。



1965年3月，毕业前夕，全班同学在西校门前合影留念

说明：

第一排自左至右：余森华、万举才、王琨、田多如、徐珍芳、李桂芝、单亦平、许惠芳、张忠旭、李勇清

第二排自左至右：邹景侯、丁为照、何春发、李智义、徐献瑜、周培源、陆平、张学书、段学复、胡祖炽、杨芙青、雷广玉

第三排自左至右：段致和、罗杰敏、杨质、戚志峰、赵长林、徐之江、张启州、张国彬、吴广茂、赵同乐、倪伯林、张从金、林伯森、谢呈琪、蔡仁泰

第四排自左至右：刘仁康、宋宝忠、董维申、张学洪、黄绍和、周兴元、王镇江、谈兴、邹铁坚、贾作皆、陈礼武、黄志盛、雷功炎、刘志峰、刘才荣、王宗惠

---

# 功炎“满七”祭

计算班 吴广茂

师兄雷功炎于 2010 年 1 月 26 日病逝，3 月 15 日为满七（又称断七）四十九天，是为祭。

功炎师兄，千呼不应，驾鹤西去，何处寻踪？

满七始信，永别成真，捶胸顿足，难解痛心。

遥想当年，宛如昨天。北大读书，热血青年。

家境殷实，已却克俭。风华正茂，事事恭谦。

掏心置腹，着人温暖，正直为人，止于至善。

苦学五年半<sup>[1]</sup>，不辍一天。全科皆 5 分，无人比肩。

毕业分配，难解其昧。背囊探宝，南至云贵。

被圈受审，著文所累。矿床无知，山水代愧<sup>[2]</sup>。

恢复考研，再回燕园<sup>[3]</sup>。美英留学<sup>[4]</sup>，负笈拳拳。

北大课堂，明德弘扬。名誉地位，一生淡忘。

数学模型，哲理八讲<sup>[5]</sup>。古今文化，融会贯通。

植德立言，炳曜八方。千百高足，悉数栋梁。

师道楷模，生众赞扬<sup>[6]</sup>。高山仰止，世代榜样。

临终掷函<sup>[7]</sup>，遗言政见，天地作证，日月可鉴。

功炎有灵，可解我心。从此天下，难有知音。

没齿不忘，敬缀兄言：“如果有缘，来生再见”<sup>[8]</sup>。

我祈苍天，来世同班。呜呼痛哉，伏惟尚飨。

注：

[1] 当年我们的学制是五年半。

- 
- [2] 毕业分配时，功炎被分配到地质科学院矿床所。
- [3] 1978 年，以研究生考入北大。
- [4] 1984. 11—1986. 8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劳伦斯实验室访问学者。1989. 8—1989. 11 英国 Leeds 大学访问学者。
- [5] 功炎著有《数学模型八讲》一书。
- [6] 网上赞扬功炎之语“师道之楷模”。见 [www.pinglaoshi.com/teacherId32025](http://www.pinglaoshi.com/teacherId32025) (2009-03-10)
- [7] 雷功炎于 2010 年 1 月 26 日病逝，此前三个月内，令其子雷凯代笔发 email 三封，时间依次是 2009 年 11 月 20 日、11 月 29 日和 12 月 5 日。在最后一封信中，郑重申明了两点政见。三封信的内容见附件。功炎长我一岁。信中称我为兄，实为谦语。
- [8] 功炎在 11 月 29 日的信中说“如果有缘，来生再见”。

#### 附录 1 功炎临终前的三封信

第一封信 2009-11-20

广茂兄：

感谢你几十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支持。现在我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不能再与你们联系了。向你和桂芝姐告别！这是最后的 email，是由我的儿子雷凯代发的。

望你们多多保重！永别了！

雷功炎

第二封信 2009-11-29

广茂兄：

十分感谢你的来信！

我现在已经心力交瘁，无法承受巨大的感情冲击。一旦见面，必然流泪，对身体不利，所以还是不见为宜。

我可能不会在短期内走完人生道路，因为我的心肺功能由于年轻时的锻炼而过于强大，而神经系统已陷于崩溃。身上难受的地方不止一处，受尽一切折磨。唯一的安慰是平生无愧。今生我努力过，但是能力有限，命运如此也只能随遇而安——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随着自然的变化，走到生命的尽头。

有你们这样的朋友，是我最大的安慰。希望你们自己珍重。如果有缘，来生再见。

另外，请向除二位之外的王琨、广玉、志峰、珍芳，及各位同学转达我最后的致意。

怠天数，非人力；天将灭之，谁能兴之？

雷功炎（雷凯代笔）

---

第三封信 2009-12-05

广茂：

请转告关心我的同学和朋友们：

最近，收到很多人的来信来电，关心询问我的情况，在此衷心表示感谢！并转告他们：

1. 雷功炎从未轻易放弃，只不过现代医学不能挽救所有生命。我请的专家已经是北医三院的副院长，权威之一。而我每天吃四分之三片美多巴的时候，情况有所好转；但增至每天一片后，情况却急转直下。
2. 我反对极左路线，但是毛泽东即使有一千条错误，有一条是正确的——他代表了中国绝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我至死拥护毛泽东思想。
3. 我拥护改革开放，但任何一次革命都是改革。改革不能忘记传统。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不能被西方文化取代，也不能由孔夫子来代表。

——这就是我临终时的政治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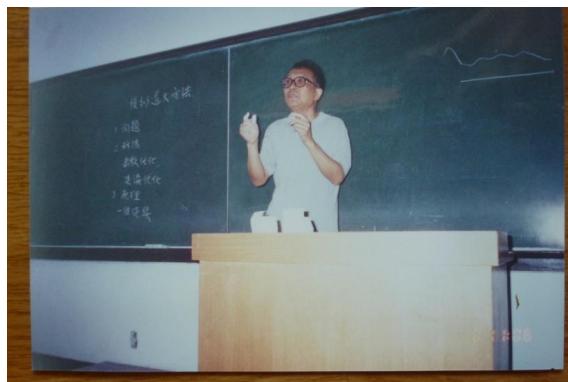
雷功炎

雷凯代笔 2009-12-05

附录2 功炎的几幅照片



与加州大学 Berkeley 的导师 Chorin 在未名湖畔



在北大讲课

[返回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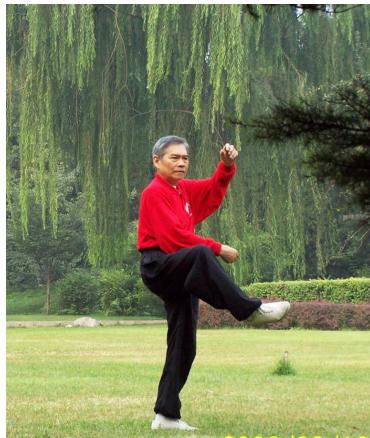
# 身练太极，生命闪耀

力学班 许国安

在二十来年太极拳锻炼中，我尝到坚持锻炼身体的甜头，既体会到健康的快乐，更感到一种死里逃生获得的心灵触动。

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对于从事水利水电科学的研究的我，正是大展拳脚进行科学的研究的好时光。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84年8月6日一件不幸的车祸事故发生了。当时，我正准备去内蒙出差，经过正在施工的我院综合楼前面的道路，当时，由于天气很热，施工工地的一位工人正站在道路中间喷水，以此来降低路面的高温和灰尘。我沿着路边走着，突然开过来一辆北京130汽车，车开得很快，拐弯时仍未减速，以超过规定的速度转向综合楼前面的道路开来，司机为了避开喷水的工人，把车子急拐向路旁，汽车一下子撞向我的背部和腰部，我的身体随着车子往前冲，我的头部撞到路边的砖墙上，身体又弹回来。由于冲劲太大，我的头把墙上的红砖撞酥了，我的头皮和头发都沾在墙上。当时，

司机慌乱了，他想刹车却误踩了油门，车子又继续往前冲，汽车又从我的身体碾压过去，我的身体躺在前轱辘和后轱辘之间，人已休克不省人事了……很快地，我被送到附近的医院进行抢救。进入手术室的我已遍体鳞伤、全身麻木。我的头部缝了二十一针，身体到处是血淋淋的，左胳膊已挤成肉浆，表面渗出黄粘粘的组织液。



经过医生详细的检查诊断，发现身体多处骨折，颈椎枢骨折，腰椎骨折，肩胛骨骨折，头部撞成严重的脑震荡。当时，我认为自己这一辈子完了，我躺在病床上对着天花板发呆，不知如何是好，当时两个小孩尚在初中读书，我的老母亲年老多病需要照顾，而妻子又是长年有病，仿佛这个家就要崩溃，就要塌下来。但我只能忍着病痛，强装笑脸来安慰她们。由于颈椎骨折是很要害的伤，一不小心就会发生错位，即使是一点点轻微的错动就有可能导致高位截瘫。这是因为颈椎是神经中枢和通往大脑血管的必经之道。脖子因此不能活动，以免颈椎骨折处出现错动。我只能仰躺在病床上不敢翻身，脖子要用颈椎套固定着，以防止颈椎错动，大小便也只能躺在病床上便溺。吃饭喝水要靠护理人员来喂。就这样经过两个多月

的精心治疗护理，我身上的伤口才逐渐愈合。但是身体还是不能活动，就这样我被抬出了医院回家养伤。

为了能够重新站起来，我开始进行一些简单的功能康复锻炼。但是，这种功能锻炼对我来说也是非常艰难的。那时要坐起来也是非常难的呀！一坐起来就两眼冒金花，天旋地转，头昏恶心。经过一段艰难地锻炼才慢慢适应，后来又开始下地练习走路，刚下地时就像刚学走路的小孩一样，站也站不稳，脚都不敢往前迈步，一迈步就怕跌倒，要有人搀扶着，扶着墙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等于重新学习走路。

为了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地生活，我坚持每天下地练习走路，活动腰腿来锻炼身体。由于脑震荡后遗症，医生一再嘱咐不要做用脑的事情，看书是不可能的事了，只能做些身体力所能及的事情如养花，集邮票来打发时光，充实生活。在家人的帮助下，我把屋后的一块空地用来培育月季苗，我在空地里插了不少月季的剪枝条，经过精耕细作，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春天，这片月季枝条发了新芽，长出了新根，成活了。我又把这些成活的月季苗移栽到房前屋后，到了秋天这片月季鲜花盛开，满园春色散发出怡人的芬芳，我欣赏了撞车后自己的劳动果实。在月季地里干活累了，我就回到屋里摆弄邮票和相册，通过集邮来陶冶情操，充实生活。

经过一段时间养伤和功能锻炼，我的身体稍微好转，腰腿能够较正常地活动了，但是脑震荡的后遗症仍然困扰着我，经常头昏、耳鸣，有时还做恶梦，一看书耳鸣眼花就更厉害。当时，单位的领导来看我，我激动地说：“我宁可断掉一条胳膊，也不愿意出现脑震荡后遗症，现在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由于撞车前我就练过太极拳，因此太极拳自然而然成了我的主要锻炼方式，我认为练太极拳很适合我的情况。我的身体多处骨折，又有脑震荡后遗症，而治疗脑震荡后遗症的最好锻炼方式就是练太极拳。太极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是一种静中求动，动中求静，动静相兼的柔和的全身运动。太极拳要求动作安稳舒展，轻松柔和，均匀连贯，行如流水，连绵不断，圆活自然，以腰为轴，上下相随，节节贯通，协调完整，使肢体关节肌肉有节奏地轮换运动，又使周身内外各个器官获得良好的休整和锻炼。这很适合伤后养病的锻炼。太极拳又讲究练精气神，要求思想集中，精神蕴蓄，心静神宁，全神贯注于



阴阳开合、天机自然运行之中。这样使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使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很好的调节，这对脑震荡后遗症的康复很有好处。因此，我开始从一些简单的太极拳动作做起，如起势，云手，野马分鬃，揽雀尾……等一个一个动作地学，一个一个动作地练。由于身体多处受伤，体质太弱。即使这些简单的动作练起来也是很困难的，蹲也蹲不下去。颈椎又不能动，练一会儿就很累，但我深知：只有坚持锻炼，才能使身体早日恢复身体健康，所以，我就一招一式地坚持锻炼。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的身体有了较大的好转。我在学会了简单的单式太极拳动作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学习了太极拳完整套路，努力领会太极拳的要领。为了力求使动作要领准确，我不但在公园里练，回到家里还跟着电视录像学。由于认真的苦练，我慢慢地掌握了太极拳的动作，逐步地理解太极拳的要领，因此，提高了锻炼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颈椎也比以前灵活自如了许多，腰腿也较前灵活了，同时我的脑震荡后遗症也在逐渐消失。

身体痊愈后，我很想回到科研工作岗位上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当时工作单位正在进行科研改革，打破过去的“大锅饭”，为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实行科研课题独立经济核算，对于重伤初愈的我能否胜任科研工作，家里人和周围的同事、同学、朋友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家里人认为我受伤这样厉害，就好好养病吧！还上班干嘛？况且，我是在工作中遭遇车祸，按工伤处理，所在的工作单位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给予了少照顾。而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也担心我干不了用脑的科研工作，恐怕给课题组造成负担。我思想斗争了好久：就这样靠国家照顾，过后半生吗？党和国家培养我上了大学，现在就成了废人吗？我的回答是：“不！我要靠自己的劳动有所作为。”这时，我深深地感到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多么重要，没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一切都等于零，这更坚定我锻炼身体的决心，用自己的行动和事实来证明自己的实力。经过不懈努力，坚持每天锻炼，终于自己能独立承接科研任务，我承接的第一个科研项目是“二滩水电站枢纽地基三维渗流研究”。这项研究任务急、难度大，要在短短的半年内完成，经过自己的努力，不但按合同要求圆满完成了任务，并为工程提出了优化渗控措施的合理化建议，得到委托单位的采纳和好评。此项任务还获得部级奖。在科研工作之余，我还把原来编写的讲义扩充修改成二十多万字的专著（两人合著），并正式出版成书。这些科研实践和工作成绩使我重新赢得了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接着我又主持完成了国家“七五”、“八五”科技攻关项目以及其他项目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的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多次获得国家级和部级科技进步奖。我能取得这些科研成绩是得益于锻炼身体。虽



---

然每天锻炼占用了一些时间，但换来的是一天的精力充沛，我觉得比受伤前的精力还要好，思维也比以前敏捷多了，工作效率更高了，感冒、疲乏的现象也少了。



经过这段不寻常的坎坷经历，我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更尝到了锻炼身体的甜头。现在要是一天不锻炼，我就好像缺了点什么似的。每天锻炼后，感到身体轻松，吃饭香，睡眠也好，走路轻灵，感到精力充沛，浑身有劲。这也使我体会到身体健康的含义。我认为：如果不锻炼身体老是病病歪歪的，不但自己难受，也拖累了家人，而且给国家给单位造成麻烦；自己身体健康了，自己活得质量高一些，也活得潇洒一点，这给国家、单位和家人都减少了负担。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坚持不懈地锻炼使我获得了健康，也再次闪耀着生命的光芒。退休以后我又被单位返聘继续工作，可以说锻炼身体给我带来了生命的第二个春天。



这些年来锻炼的实践，我有三点体会：

第一，锻炼身体贵在坚持，持之以恒。无论刮风下雨，冬天下雪，我锻炼身体从不间断，做到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每天早晨练太极拳、太极剑，晚饭后，很少在家看电视，而是到公园散步或练拳。

第二，锻炼身体要认真，只有认真才能掌握和理解太极拳的要领，体会到它的内涵，达到较好的锻炼效果。

第三，锻炼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不要操之过急，运动量也不要超负荷，要循序渐进，做到养练结合，这样才能达到健身的目的。

为了让大家共享锻炼身体的甜头，我还积极参加和组织我院的太极拳锻炼活动，每年为我院太极拳辅导站开办辅导班。现在我院的太极拳锻炼活动已蓬勃开展起来。每天清晨，在我院健身活动场都有不少人锻炼身体，练太极拳、太极剑，他们也尝到了锻炼身体的甜头，体会到身体健康的快乐。

2004.04

此文是2003年中央电视台采访我，并在中央电视台“中国早安”节目中播出，后来我整理成此文；

---

现在老同学面前献丑了，目的是让老同学了解锻炼身体的好处和坚持锻炼的甜头，现在我们大部分老同学都已年老退休了，别无它求，唯求有个好身体。

---

# 追忆激情岁月

——苦亦无悔

力学班 许国复

【编者按】本文是记者何新城 2005 年采访许国复时所写的报道，发表于 2005 年 10 月 12 日的《新疆石油报》。

许国复 196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研究院担任过技术员，工程师，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院计算机中心主任，管理局电子信息办主任，管理局信息中心主任，自治区第一、二届电子信息技术推广专家组成员。克拉玛依市第三届科协副主席，现为市局专家委员会委员，1999 年退休。追忆往事，他说——

## 北大毕业来油田

1965 年，我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流体专业毕业，分配到克拉玛依。这年 9 月我踏上了西行的列车，向着神秘的新疆进发。

我学的是空气动力学，来到新疆后被分配到管理局油田研究所，它是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的前身。我是随着石油工业的大发展，响应党的号召来到克拉玛依油田的。

领导把我安排在综合研究室编制油田开发方案。初来乍到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井上跟班参加劳动，与工人相结合，接受他们的再教育，了解和熟悉油田的生产过程。我每天都要跑井、摇清蜡绞车，管线冻了还要挖管沟。上班后我第一次见到油井，原来以为油井就是和水井差不多，结果到井上一看，油井在地底下根本就看不到，真正出油的地方居然只有锥眼那么大。

## 采油厂里去实习

当时我在采油一厂 14 号计量站跟班实习，我的师傅叫王祖连，还有一位师傅叫曾祖安。我每天都要三班倒。每逢上班就跟着师傅边跑井边学习，学习主要是在计量站中进行，在井场上只能见到计量表、套压表、回压表、一个取样开关和四个大闸门，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掌握基本操作。

---

我的师傅王祖连不到三十岁，却有五个小孩，孩子多还常生病，因此常常是我一个人上班。我在现场中不懂就学，不懂就问，加上井上的操作学起来也并不复杂，一周的时间我就能独立顶班了，倒管汇、分井计量、使用分离器、计算气量和油气比，我都能运用自如。

## 孤独之时盼查岗

一个人坐在值班房里，也时常感到孤独寂寞，那时让人开心的事就是听到查岗的电话，盼着有个人可说上两句话。计量站的电话只能打到队上值班室汇报工作，无法与外界联系。

值班室烧的是天然气，倒是挺暖和，但是很容易使人困乏。有时实在困了，就提着管钳和手电筒到井上转一转，吹着凉风就不太困了。

## 三件宝贝成朋友

夜晚走在戈壁滩上去巡井，什么都不怕，就怕遇到狼，因而总是提心吊胆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狼，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那时管钳既是生产工具也是最好的防身武器。

在计量站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采油工三件宝，扫把、管钳、压力表”。没想到这三件宝成了我初到油田最好的朋友。

我在大学学习了六年，我的理想曾经是导弹高速飞行器的设计和制造。来到油田最初的三个月中，我学会了改接管线，用丝攻和扳牙给管线套扣，换闸门和闸板这些采油工的基本技能。我每天干的是量油测气，打扫井场这样的工作。那时我单纯的政治思想压倒了所有的理想。

## 青春无悔献油田

那年的冬天异常寒冷，我出生在四川，没有经历过寒冬的考验。我实习的计量站二中区在炼油厂附近，上班坐的是嘎斯车，上了车就躺在车厢板上躲避寒风的侵袭。到了站司机就提醒我们下车，我经常是很被动地被叫起来下车。

当时流行的歌曲是《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听着这首歌，我的心总是热乎乎的。

那个年代批评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我不愿当被人们批评的那种知识分子。

那年我二十五岁，正值青春年华。在那个年代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随遇而安、脚踏实地、吃苦耐劳、一丝不苟的品质不断地注入我的血液。如今，当两鬓斑白回首往事时，我无怨无悔，因为我服从着我热爱的祖国。

---

# 纪念入学北大五十周年有感

力学班 许国复

五十年前入燕园，寒窗苦读未明畔。

四十四年人生路，上天入地都精彩。

博雅塔下重相聚，返老还童笑开颜。

晚霞夕阳无限好，健康长寿过百年。

---

# 走出北大校门以后

数学一班 徐明曜

上大学距今 50 年了。老同学们又酝酿聚会，一起来回忆 50 年前的青春岁月。这使我感到十分高兴，盼望着和老同学见面。

为了聚会，先要更新通讯录，以便联系大家。因为我还在母校，自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重任”。在和大家电话串联时，有同学问我：大型聚会两次了，你怎么不说说你离开北大后的情况？大家都很关心呀！又说：在大学时你挨的批判最厉害，文革会平安无事吗？一谈起文革，我倒真是有话想说。我一直感到对文革这段历史我们都总结得不够，应该谈谈彼此的经历和看法，总结经验教训，不应把它忘掉。这决不是为纠缠旧帐，而是为总结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坚信一个忘掉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而文革又是那么重要的一段历史。

因为工作一直很忙，加之脑血管疾病的困扰，近年来我的记忆力变得很差。再加上时间过去得太久，我真不知还能想起多少关于文革的往事。可是，当我仔细想了几天后，还真想起不少事来，说不定我经历过的有些事别人还真不一定经历过。于是，我把这些残破的回忆一点一点记下来，想趁这次聚会的机会给大家讲讲。即使没时间讲，至少可把记录下来的东西给同学们看看。

既然要讲，我就把毕业后到文革前的那段经历也一并谈谈，这样脉络会更清晰。

和大家一样，我是 1965 年 4 月离校的，于 1978 年 10 月又回到北大当学生。这之间共有 13 年半。在这期间，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整个国家经历过的事情实在太多。我只想把我亲历的一些我认为有意思的平凡琐事。也许还有奇闻异事择其要者给大家说说，提供给大家做茶余饭后的谈资。

要谈过去，最重要在一个真字，即一定要说真话。哪怕因为时代久远记忆会有偏差或不准确的地方，但只要如实回忆，不隐瞒自己的坏事、丑事，这个回忆就会有价值，大家也才会愿意听，愿意看。况且我们都已经年近古稀，“行将就火”（似乎已没有“就木”的福气），又有什么坏事、丑事不能说的呢？话说至此，那就向大家如实“坦白交代”吧。

## 一、由北京到唐山

说句心里话，当时我真没想到会毕业，并和大家一起分配工作。我当时想，就是不去北

---

山搬石头（唐山土话，即当反革命劳改的意思），也得去农村劳动改造。但是我居然毕业了，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记得在照毕业照时，我躲在一旁，班长李生训拉我去照像。我推托不成，十分勉强地站在后面，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毕业呢。出人意料，照完像的当天晚上学校就宣布了我和另外十二名同学被分配到河北省教育厅。

当时的河北省省会设在天津。分配的第二天，我们一行十三人到省教育厅报到，住在教育厅的招待所。规定两个人住一个房间，我猜没人愿意和我同室，在分配房间时一声不吭。又是一个意外，一位王姓同学竟主动要求和我住一个房间。记得住进去的当天晚上他悄悄对我说，从今以后，你的问题就装到档案袋里了。只要你说，没有人知道。到了新单位，你好好表现，还是有前途的。又说，批判归批判，你也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你去中学就会知道，比你问题严重的多了去了。可惜我当时没有理解他的好意，后来也没有照他的话去做，直到今天还为此而后悔，并对他心存感激。

在天津没呆几天，我和另外三名同学就被分到唐山地区人事局。那位王姓同学家在秦皇岛，没几天他就走了，据说到秦皇岛某中学教书去了。剩下我们三个人——张存淮、罗启成和我，开始了漫长的等分配过程。我们都想能早点分配，至少是因为想早点挣钱。等分配阶段只给 18 元生活费，而分配后就可以拿 45 元钱的工资了。

## 二、等分配

等分配时无事可做，每天还在想在北大挨批和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事。我买了个新日记本，扉页上写着“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人民的罪人”的字样，开始记思想改造日记，继续对大学时的问题逐条进行自我批判。尽管今天觉得这有些可笑，但当时真的是这样做的。可过了不几天，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过去被批的问题太多，对于不少问题我还没能认识到自己不对；对于有些问题，我认为是强加给我的，感到冤枉。于是烦躁感油然而生。再加上已离开了北大的环境，没有人强迫我这样做，动力就不足。渐渐的，这本思想改造的日记也就记不下去了。

当时我年轻，无所事事的生活是无法忍耐的，总得想点事情做。我想到，毛主席教导我们，与工农结合是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说，即使不去检查批判过去，通过劳动也是可以改造思想的。于是我决定去参加义务劳动，在劳动中锻炼改造自己。究竟能干什么呢？考虑过后，我先是选择了帮助招待所服务员打扫卫生。

我每天和服务员们一起工作，并拣最脏的活干。什么活最脏？就是打扫厕所和刷痰盂。那时人们不太讲究卫生，随地吐痰者比比皆是。即使有痰盂，也不是吐痰入盂，使得痰盂的里里外外满是痰迹。我先用水泡，再用手一点一点地抠掉痰盂内外的痰迹，再用水冲。用的

---

时间还不能过长，因为一个房间只有一个痰盂。我干着这些连服务员都不愿意干的事，心中感到满足，好像“改造”又前进了一步。

今天想起来，这多像唐吉柯德大战风车。其实这种做法与改造思想并不相干，不过就是帮助服务员做点事而已。

大约干了半个月，问题来了。你想想，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整天和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大姑娘混在一起，免不了说笑打闹。服务员又不知道我是犯过错误的，有一个还明显地表示出对我的好感，说不定正想和我搞对象呢。当我慢慢觉察到这点时，我可是害了怕。我心想，这政治问题还没解决，若再加个作风问题，那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真得上北山搬石头了。在北大犯下的错误，好不容易弄了个“敌我矛盾内部处理”，要是在这儿再弄成个敌我矛盾那就一切都完了。怎么办呢？我必须从姑娘们中抽身出来。但若马上停下来，又怕人家说你的劳动是做做样子，改造思想是假的。这可使我犯了难。我想了一夜，终于想出个借口。我说，你们的活儿太轻，我是个男的，要干重活，只有干重活才能改造思想。于是我找到了地区人事局，表示要在等分配期间参加劳动锻炼。人事局负责人表现得很为难，又不能不支持，毕竟人家主动要求劳动锻炼来了。我看到他皱着眉头打了个电话，说得很长。打完电话后，他说：你去园林处吧，找王主席（工会主席）。他还笑着说：地点在凤凰山公园，你天天逛公园，也不用门票。最后又严肃地说：好好改造，表现得好分配得早。他开了封介绍信，给了我。

就这样，我又去了园林处，在那里干了三个多月，于8月中旬被分配到唐山五中。

这三个月里，我先在凤凰山公园参加修建唐山市第一个公共游泳池，然后被王主席抽去刻印毛主席语录。由于园林处办公室拥挤，给我找了位于公园东北角的一间快倒塌、窗户又没玻璃的房子作为工作室。那时林彪搞政治挂帅，部队里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王主席从老战友处弄到一本，觉得很好，就想翻印出来发给工人们。于是把刻印的任务交给我这个大学生。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我常常夜里也刻，晚上就不回招待所，住在那间破烂不堪的房子里。干了大约有半个月，顺利完成了任务。这之后，王主席又调我到人民公园参加修建狮子、老虎住的房子，准备迎接唐山市第一批凶猛动物供群众观赏。建好后又把我调回凤凰山公园修山顶的铁菩萨庙（因有此庙，凤凰山也叫铁菩萨山），直到分配工作。

下一段我将谈谈在园林处劳动的事。在此之前，先谈谈今天我对“思想改造”的看法。思想应该是能够改造的，或曰改变的。一个人思想出了问题，大约有三个方面。一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过去特指在政治方面的。这类错误通过教育、辩论以及个人的学习、思考，是会有所改变的。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不是经常都在改变吗。但是要想通过粗暴的压服办法来解决问题则无济于事。二是在世界观、人生观层面上的问题。一个人通常是在十多岁到二十多岁逐渐形成了对人生和对世界的看法，并逐渐形成个人的性格。它们的形成与教

---

育有很大关系。这里所说的教育包括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也包括书籍、报章杂志、广播电视等方面的影响。世界观、人生观一旦形成，生活目的、待人处世、看问题的方式方法就基本形成。这些内在的特质要想改变就更困难。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三是道德品质上出了问题，甚至由此产生危害社会的行为，甚至犯罪。这方面就更难改变，不少刑事罪犯“二进宫”、“三进宫”就是明证。这方面的改变通常是需要强迫的，严重时专政机关也应介入其中。另外，我说的这三方面的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关联的。无论哪个方面，要改变都应对症下药，付出很大的努力。不是只开个统一的药方，比如批判、劳动等就能奏效的。

### 三、和工人们在一起

在园林处劳动的3个月是我近年来最快乐的时光。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使我感到轻松愉快，无拘无束。他们朴实善良、实事求是，不知何为趋炎附势，不知何为落井下石。他们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政治挂帅”，这让我没感到任何政治上的压力。干的活对我来说是很累的，但我精神愉快。

我基本上是做“小工”，和灰、搬砖、推车、抬石头等，很少让我干“大工”干的砌墙等技术活。工人们很少开会，即使开，也很简短，有事说事。记得一次因工程质量问题我们的组长召集开会，他的开场白是：“我们来园林处上班，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也是为人民服务。无论为什么，都要保证质量。不然，扣了你们钱，你们吃什么？现在出了问题，大家一起来看看怎么补救吧。”整个会也就是一颗烟功夫。

王主席也很朴实。他五十岁上下，嘴里总叼个烟斗，但烟斗里装的不是烟斗丝而是旱烟。他是十七级干部，抗日战争时参加工作、入党。一次我拿着我的思想改造日记，向他汇报思想改造情况。他翻看着我的日记，似乎很不感兴趣。勉强看了一会，对我说：“小徐，你们大学生就是爱弄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要改造思想，就要好好劳动。我看你干活不惜力，好好干吧！”几句话就结束了和我的交谈，风格真和北大干部大相径庭。

慢慢地，我和工人们交上朋友了。感到他们都很讲“义气”，这很对我的脾气。他们从来就不把我当外人，该帮时帮，该骂时骂，也常开玩笑。我经常到他们家去，但他们从未去过我住的招待所。他们说，那是当官的住的，你们大学生也就是沾点光，我们不敢去。由于经济条件差，谁也没请谁吃过饭。

讲一件有趣的事，这件事使我们一起喝了一瓶酒。那是在修铁菩萨庙的时候，我们打了一次赌。当时我们做小工的在凤凰山底下和洋灰，再接力挑到山顶。山高有二三百米，上山有石头台阶。我们四个人换班，一人挑五十多米，再换别人。即使这样干也是人人一身汗。

---

一个工友说：“这要是一个人挑到山顶可累死了。”另一个正和灰的棒小伙子停下活，看看山顶斩钉截铁地说：“我一个人能挑上去。”大家一听都来了精神，怂恿他说：“你挑，你挑，挑上去我们请你吃饭。”小伙子说：“得有人陪，我们打赌。”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没人吭声。这时我说：“我陪你，赌什么？”他说：“我上去，你上不去，输我一瓶酒。”我说：“行！但你上不去，我上去，你输我一瓶酒。”“那当然！”他说。我又说：“干脆不管我上不上去，只要你上到顶，我就输！”他说：“你想打退堂鼓？”我说：“不是，我也上。我是肯定你上不去。”这时大家更热闹起来，喊什么的都有。两担洋灰已经给装好，就看我们的了。你们可能不知道，一挑洋灰的重量等于两挑水，大约 200 斤上下。我们这两个亡命之徒一人挑一挑，后面还跟着个小啦啦队。比赛开始了，规则是中途不许歇。我长吸了一口气，挑起洋灰，缓步登山。开始时“啦啦队”跟着喊，后来，他们也屏住气不出声了。大家都盯住我俩儿看。我们的衣服早已湿透，渐渐的，汗又从背心、裤衩上往地下流。我的腿打了几次颤，几乎就要不行了。但咬牙坚持，十几分钟后，居然我们俩都上到了山顶。大家一片欢呼。我俩累得够呛，就不干活了，一直休息到下工。按规定，我输了一瓶酒。下工时，我买了酒，大家分着喝了，也没吃任何菜。事后，工友们对我另眼看待了。可第二天，领导知道了，我俩都被王主席狠狠批了一顿。

#### 四、文革前教了一年平面几何

发生打赌事件后不久，人事局叫我去。我以为是为打赌批评我，去前想好了怎么为自己辩解。一个干部接待了我。他说：“听说你劳动表现不错，学校也快开学，人事局决定分配你到唐山市教育局，明天就去报到。”他没提打赌的事。又嘱咐我要继续改造，好好工作云云。

第二天我照样去上班，和工友们依依惜别，还干了两个钟头活。下午去教育局报到。这次更简单，只通知我被分配到唐山五中，问我有没有意见。我说没有，于是他就开了封介绍信，让我去五中报到。从此就开始了我十二年半的中学教师生活。

刚到中学，我想应该有个好的开始。我年轻，精力旺盛，教学之余天天帮食堂挑水，当时的时髦话叫“学雷锋”。其实我倒没有想学雷锋来表现自己。我只是看炊事员是位老大爷，每天要从 200 米外校门口旁的“水泵”（当地叫法，即水龙头，那时全校只有这一个水龙头）挑四、五挑水到食堂，路上还要歇几歇，想帮帮他。其实这是很平常的事，当时也不只我，别人也常帮他挑水。但这事却被当时的团委副书记看在眼里。我们都在食堂吃饭，一次她说对我说，你们新大学生就是不一样，主动学雷锋。我没吭声。她又说，你也应该要求进步、靠拢组织，你怎么不申请入团？我苦笑着说：“我条件不够。”但我内心里想，怎么你这个党支部

---

部委员兼团委副书记连我被开除团籍都不知道？

不说这些了，谈谈工作。文革前的一年分配我教初三的平面几何。当时我决心好好搞中学教育（绝对没有想到以后还会回到北大搞研究），但工作中也碰到很多困难。首先是没有教学经验，学生质量又差；其次是不少学生不好好学，有的在课上还“捣乱”。记得开课不久讲应用对顶角相等和等量替换的最简单的证明题，多数学生不会做题。我心想，你们也太笨了，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好，那我就一个一个地讲。我说，你们有问题就到宿舍找我，我给你们补课。晚上，学生来得很多。从给他们补课中我才知道，他们的问题是在于没有证明的概念。他们说，本来就是相等的么，你为什么要证明？这时我才知道，要做好中学教员还真不容易。并不是课本会了就能教，还需要很多方面的知识。我过去没有学过教育学、心理学，现在必须补上。那一年我认真读了三本书。一是梁绍鸿的《初等几何复习与研究（上）》，我做了其中绝大部分习题，二是某个苏联人写的《学生掌握几何概念的心理分析》，第三本是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很快我适应了中学教学工作，和学生也能打成一片。竟然有“嘎学生”向我保证在我的课上决不捣乱。其实保证了，自己也管不住自己，我还得不断批评他。

在这一年，我感到自己逐渐在变。北大的政治问题想得越来越少了，想问题也脚踏实地了。通过和老师的接触，我甚至产生这样的想法：中学就是一个小科学院，会什么的都有。你只要学，就能学到很多东西。真是“三人行必有我师”。我在北大读书时的“狂气”没有了，人变得越来越随和。和老师、同学的关系处得都很好。本来这样下去我的一生会在平静中度过，不料这时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 五、思想改造与“觉醒”

电台播送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学校领导号召全校师生写大字报，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在唐山五中开始了。几天里，师生们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运动的声势前所未有。同学们的大字报写什么的都有，什么老师打骂学生啦，不好好教课啦，什么某某女老师臭美，男老师偷看女厕所两眼啦，什么老师骂贫下中农子弟笨啦，等等等等。但是没看见什么有份量的，能多少涉及点政治的就不多。

这时，我又坐不住了。政治上的幼稚无知与内心深处道德自我完善的要求又使我产生了“改造思想”的冲动。我甚至想，这次运动太重要了，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进到思想文化领域了。我要乘着运动的东风好好进行思想改造，让大家帮助我。于是，自己主动写了揭发自己的大字报，并对所涉及的问题开始一个一个地批判。其实就是把北大的旧帐自己揭出来，写成大字报。刚开始时可轰动了，看大字报的人很多，一下成了五中的大新闻。听到有人说，原来他是犯错误的，要不怎么北大毕业的分到咱们五中？又有人说，

---

这个人真傻，犯病了还是想出名？想出名也别这么干哪，这回一定要划成右派了。学校党支部书记王铭中背着手看我的大字报，连声说好。第二天就找我谈对运动有什么想法。我说要趁着运动的大好时机改造思想，又简单说了我在北大挨批判的情况，尽管我猜他一定知道。他说：“对你谈的问题，我是‘只有来言，而无去语’（意思是不表态），积极投身运动对你是有好处的。”说得我一头雾水，什么叫“对我有好处”，我要什么好处？看来他对我这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唐吉柯德改造思想的真诚愿望并不感兴趣，大概也不相信。临走时他说：谈问题就要“竹筒倒豆子”，不要“盖着盒摇”，不要“挤牙膏”。你看，他认为我谈问题，自我批判是盖着盒摇！即不把问题谈清楚，捂着盖子进行批判。看来他不但不相信我改造思想的真诚，说不定还怀疑我有大问题，用写大字报来试探组织上是否掌握。这不就像在北大时党委干事杨某某的话吗！我有些生气，但又想，我不管他，我又不是为他来改造思想的。于是我继续逐条检查、批判。可没想到，第二天形势就变了。我的大字报被集中到一个教室，用大字写着“徐明曜大字报专栏”。（注：那时大字报太多了，已不能往墙上贴，只能挂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上。否则，他们也取不下我的大字报，布置不成大字报专栏了。）看到这些，我犯了嘀咕：难道他们真要整我？但转念一想，我心中无鬼，怕什么？接下来，是全校师生写大字报对我的批判。批判本是我所希望的，可惜的是，大字报中没有实事求是的说理，只是简单地说，你思想反动，要好好改造等等。学生的更简单，常常只是一句话：“徐明曜是披着人皮的狼！”“打倒反革命分子徐明曜！”看来我的思想改造、得到帮助的愿望是落空了。

那时，以前和我关系较好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理我了，同宿舍的老师也不再和我说话，校医还悄悄地拿走了我常吃的安眠药，好像怕我自杀似的。一下，我又成了准阶级敌人。

接下来，学校越来越热闹，教学楼门口贴出了“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深挖细找”的对联与横批。党支部又布置了个“台湾特嫌郑某某”的大字报专栏，我也不孤立了。据说，一个语文老师曾经说过：“过去是吃啥有啥（意指物质丰富），现在是有啥吃啥（意指物质匮乏）。”结果挨了批判。他不承认自己说过此话，想不开，自杀了。图书馆老师被说成是“中统特务”，脖领里插了个小黑旗，他想不通，自己把头插在污水沟里，也死了。“正牌”的阶级敌人有两个尚未摘帽的右派，被监督劳动。学生们胡闹，把他们绑在小屋里，蒙上眼睛，脱下裤子，用火柴烧了阴毛，有人还听到他们的惨叫。事后，其中一个右派逃跑了。后来知道跑到新疆，林彪倒台后才被抓回来。还有个面目姣好的女老师，说是“搞破鞋”，被拉到街上批斗，围观的人无数。这样一来，没有人再注意我了。大概我的自我批判大字报对于这些初中生来说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因此，我没被批斗，也没有挨打。不久，对门的四中又传来惊人的消息，说是有一个老师想暗害毛主席，被批斗后卧轨自杀了。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正常秩序被彻底破坏了。（注：文革后听了解那位卧轨自杀的老师的人告诉我，他叫赵昭

---

彦，南开大学数学系1962届毕业生，学的很好，是学概率的，当时很得王梓坤的赏识。在1958年毛主席视察南开大学时看到毛主席离他们近在咫尺，他在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想，毛主席离我们这样近，多不安全哪！万一有人有枪后果不堪设想。事后在班级讨论时说了他的顾虑，遭到了批判。毕业时被分到唐山四中。文革时党支部竟把他档案里的这段材料抛了出来，即被革命师生指称为“企图暗害毛主席”。这可是个不得了的罪名。他被打得半死，于1966年8月1日在唐山天桥附近卧轨自杀。）

这时我开始怀疑了。难道这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吗？我不理解。尽管如此，我每天照样写自我批判，看马列毛的书。你们不理我没关系，我觉得我的时间没有浪费就行了。

再以后，形势逆转，又批“资反路线”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不少同学去串联。书记王铭中成了“走资派”，也挨斗了。学校里分成两派，一曰“保皇派”，一曰“造反派”。教学楼和办公楼的玻璃窗全被打碎，我的宿舍也不能幸免，经常有石块飞进来。我的同室已恢复和我说话，他到教室把课桌的桌面拆下来几块，让我帮他把窗户钉上。结果屋内奇黑，白天也要开灯。而且，学生们（造反派）又经常拉闸断电，我们买了蜡烛。你停电我就点蜡。

我慢慢感到这不是一场革命，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我思想改造、自我批判的步伐放慢了，但还没有停止。1966年国庆节，我回北京了。当天就迫不及待地去北大看大字报，想弄个究竟。我想，北大是直通中央的，也许从那里能得到启示。当我刚走进北大校门，正巧看到我很熟悉的老师丁石孙，他胸前别着黑牌在抬筐劳动。我望了望他，他好像也望了望我，都没有讲话。等我走进校内，看到大字报铺天盖地，多是批资反路线的，也有批反动权威的，居然还有批判我的几张。我苦笑了一下：离开北大一年半了，居然他们还没有把我忘掉。从一张题为《陆平黑帮的黑蛋》的大字报上，我看到我和唐山五中的另一老师刘某某的名字赫然列在其中。噢，原来你刘某某也是个黑蛋，这倒是个新发现。（注：刘是北大地球物理系毕业生，也是1959级的。）在校内逛了大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我就回家了（我是北京人，父母在北京住）。在家呆了一天，怕人家说我逃避革命，马上又回到唐山。其实，学校已没有秩序，根本就没人知道我去了北京。

进入十月份，半数学生都出去串联了。而我还在（主动地）写检查。到十一月份，学校几乎已经空了。不仅学生，大部分老师也出去串联了。我一个人还每天去办公室，写检查批判，研读毛主席著作、马列著作。这时我发现，已经没有人看我的大字报了。

我陷入了一生中最痛苦的思想斗争。在几个不眠之夜后，我得出了极其大胆、在当时也是极不合时宜的结论：文革是错误的运动，是多年来“左”的路线发展到极端的结果。我的理由也很简单：一个否定人类文明，否定历史传统，否定知识分子的运动一定是不正确的。列宁不是还说，不掌握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文明财富是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吗？这个文革

---

运动不正是否定了除毛泽东思想之外的一切文明财富吗？我做出这样的结论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毕竟在少年时代我就信仰共产主义，并下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我在北京解放时（小学二年级）怀着极大的热情一个人去阜成门迎接解放军入城。小学成立少先队时即入队，十四岁入团，一直做团干部。十六岁时在北京四中申请入党（其时我是四中团委会的主要干部之一），党支部在研究了我的入党申请后，告诉我只是因为年龄不够而没被批准（1956年党的“八大”后对入党的年龄限制已经比较严格）。即使在北大挨批判时，我对党的信念也没动摇。当时我虽然对很多问题想不通，怀疑党的政策有左的倾向，但内心里一直不敢确信党的路线是错的。否则我就不会向组织交心了，也不会要求组织帮助我认识问题、改造思想了。

这几个不眠之夜得出的结论使我如同大病一场。我浑身发冷，精神恍惚，坐立不安。我感到没有了依靠。我想，如果党真的是犯了路线错误，那我在过去十来年的所作所为就太需要检讨了！我为什么明知会招致批判，却还要向党交心？我在对自己的很多“错误”没有认识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自我批判？我真是太幼稚、太愚蠢了。下一步我该做什么？经过认真思索，我决定立即停止这种“妖魔化”自己的自我批判，在新的认识下重读《资本论》和《毛泽东选集》（毕竟那时我还坚信马列主义和反右前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按照当时的标准，我那时真的是变“反动”了！我的真实思想也再不外露了。我也决定去串联，因为毕竟我没被限制自由。于是我带着《资本论》和《毛选》走上了串联的路。

后来，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这就是我思想上的“觉醒”。

## 六、大串联

我和三位老师、三位同学于11月中旬去串联了，我们先乘火车去大连，后由大连乘船去上海。我带着《资本论》第一卷，出发前买了个新笔记本，写下了“从今天起，我开始重读这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书”的字样，走上了串联的路。

有人问我为什么带《资本论》，我的真实想法和任何人都没说。其实我是想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找到文革是错误运动的依据。从这时起，我开始学习隐藏自己的思想。一直到“四人帮”倒台，我从不主动谈政治问题，开会时说的也都是报纸上的。这个转变对我其实很重要，这使得我在文革中少受了不少苦。

我们每到一地，先游山玩水，再象征性地抄抄大字报，毕竟是来串联嘛，晚上我就读《资本论》。我们住在接待站，吃住免费。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也不错。可惜到上海不久，党中央决定停止串联，但仍允许步行串联。同行的老师和同学都回去了，可我不想走。我在南京路上看到有组织步行长征队的海报就抄下联系方式，然后去找他们。遗憾的是没有长征队愿意

---

接受我。我找了四、五处，最后有一个长征队发起人态度友好。他说：革命生师嘛，大家都需要革命。我们队还没有老师，你就参加我们队吧。又问我的出身，我说是职员。他说，职员就相当中农，应该允许革命。我很高兴。但临近出发时，我又去找他，没想到他变了卦。他说，队友们说有老师不方便，你再找别的队吧！这给我泼了一头冷水，沮丧地回到接待站。

但我并不甘心，我想了很久。忽然灵机一动，我想我也是“革命教师”，许你们组织长征队，难道我就不能自己组织吗？想到这里，心中豁然开朗。说干就干，我马上写了“成立五湖四海百炼成钢长征队”的海报十多张，跑到南京路等热闹地方贴了出来。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人找我来报名了。在两三天的时间里，就有六十多人报名。我是来者不拒，统统接纳。我组织了筹备组，起草了《长征宣言》和《向毛主席的致敬信》。又和筹备组的同学去上海市委找陈丕显“造反”，其实是要钱做队旗袖标。我又自费买了二胡、笛子、秦琴等乐器，准备成立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定好12月3日从新港接待站出发，先到中共一大会址宣誓，再沿着铁路或公路线步行去杭州、南昌、长沙，最后到韶山“朝圣”。由于当时学生比老师更“革命”，“革命师生”都变成“革命生师”了，我和队友说，你们当领导，我当参谋，给你们出主意。学生们也当仁不让，选了他们的队长、以及各种委员（名堂我都忘了）等干部。

到了12月3日那天，只来了三十九人。但我们仍庄严地出发了。大家热情很高，打着队旗，唱着革命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征途。我们队有三位老师，另外两位都是黄岩越剧团下属的黄岩三甲中学的。他们两个什么都不管，就只管游山玩水。我可不能像他们那样，我管“断后”，即帮助那些因为脚上磨了泡走在最后的同学，毕竟长征队是我组织的嘛。

开始几天队里很团结，过了杭州矛盾就出来了，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却冠之以对方不革命的指责。闹了矛盾，他们就来找我这个“参谋”评理。我只能做双方的工作，劝他们加强团结。并强调，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不容易，更要团结。但是问题解决了一个，就又出现一个新问题、新矛盾。勉强走到上饶市，长征队出现了分裂。激进的学生说我不革命，要造我的反。我说我接受大家的批判。但大部分同学又站在我这边，和他们争吵得不可开交。我在夹缝中发现，其实他们对我并没有意见，问题还在于他们之间。我谁也说服不了。最后，十几个“革命派”组成了第一支队，自己走了。还有两个大连来的男女同学谈恋爱，他们自称是第三支队也走了。我说，咱们剩下的就叫第二支队吧，我们共有二十多人，选了个支队长，也离开了上饶市，继续往南昌方向走。

长征中，每天我第一个起床，把学生们叫起来。路上跑前跑后，又要找合适的路线，决定往那里走，又要照顾掉队的学生。晚上学生们睡下，我还要写长征日记。我感到很快活，学生们对我也很尊重。那时天黑得早，公路上又没有路灯。天上繁星闪烁，我就给学生们讲天文知识，教他们认识星座。当时群众中已经分派，到了一地，两派都找我们。我嘱咐学生

---

不要表态，说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情况，其实我那时对文革已经持反对态度。我就尽量把长征的活动往“不革命”的路上引。到了南昌，呆了很多天。因为正赶上1967年春节，我们队在南昌剧场还举办了一场“慰问工农兵”的演出。我们队有好多文艺人才，有个女学生是新疆人，极擅长新疆歌舞，又有黄岩三甲中学的两名老师和九名学生，越剧、黄梅戏是专业水准的。这时我买的乐器也派上了用场，笛子独奏、二胡独奏，再加上小合唱。两个多小时的演出排得满满的。群众对我们很友好，经常要谢幕好几次。

在南昌时，党中央决定，步行串联也停止了。我们只好乘车到长沙，乘船到湘潭，再步行去韶山“朝圣”。那时去韶山的人太多，我们找不到住处，只好连夜赶回湘潭，一天一夜走了180里。

今天我说这些，是想让世人知道，在那无政府的年代，也有像我们这样“不革命”的长征队。虽说不革命，但是经过这次长征，我们都受到了身体和意志的锻炼，增长了见识，它给我们队的队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还从天南海北聚到一起，回忆那段难忘的往事。

## 七、铁杆逍遙派

逍遙的串联结束了，我又不得不回到了唐山五中。这时群众已经分派，一个小小的百余名员工的唐山五中竟然有近十个“战斗队”。有的战斗队找我参加，都被我婉拒。我说，我是有问题的人，参加你们队影响你们组织的纯洁，至少让对立面抓住说我有问题，也对你们不利。实际上，从我内心里说，我就是不想卷入两派斗争。运动初期也被设立大字报专栏的“特嫌”郑某某却不甘寂寞，没有战斗队要她，她自己组织了“千钧棒战斗队”。千钧棒队者，内仅有一根棒子，即一个人也。

社会上的战斗队就更多了。但经过短期的分化、合并以后，大致形成“红代会”和“矿总”两个大组织。而学校的组织也形成了分别支持这两大组织的两派。他们用他们所能控制的宣传工具大打派仗，特别是用高音喇叭。每天从早喊到晚，喊的都是对方不革命，自己革命；对方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自己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方是“保皇派”，自己是“造反派”等等。但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谁也说不清。矛盾激化了就动武，也有几次大型的武斗。但总的来说，唐山的武斗不严重，因为没有动用真枪真炮。当然也死了几个人。我当时弄不懂他们为什么那么激动。若说真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吧，他们又拿不出对方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证据。到底什么是革命路线，什么是反动路线，两派谁也说不清。若说是争权夺利吧，或许各派的头头会是这样。但广大群众呢？他们究竟为什么而战？即使打败了对方，他们也是得不到权利的。也许有的人是想在打砸抢的混乱中谋取个人利益，但大多数

---

人明显不是这样。这种“革命的狂热”也许比我在运动初期像唐吉柯德一样大战自己的“反动思想”还更目的不清。因此，后来在他们觉悟的时候，产生的逆反心理非常强烈。

还是说我自己吧。既然不参加两派，那就是不革命。学校各级组织又都瘫痪了，没有事干。我那时才二十五六岁，正是精力充沛的年纪，总得找点事做吧。我想起在批判郑某某时，她说到抗日时期的青年学生中流传有句话叫“积极能够找到出路，消极能够充实自己”。我既“消极”就“充实自己”吧。开始时我选择了学习英语。我找出在上大学时买的“Essential English”的英语课本，开始了认真的学习。当学校形势紧张时，我就去北京，还拿着英语书。大约在1967年5月，突然传来使我振奋的消息，戚本禹传达毛主席指示：毒草也让看嘛，要不怎么批判（大意）。之后北京图书馆重新开放，就连文革前的禁书都让借了。我天天跑北图，常借英语、哲学这两类书。记得我那时看了罗素的很多书，还翻看了他的《数学原理》，当然是看不懂。我也看了若干英语小说，半懂不懂的，意思还能明白。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个月，就又传来了什么指示，北图又闭馆了。

回唐山后，我感到英语学得差不多了（后来知道这是个错误的判断），又抱起了《资本论》，但学了不久，形势又变了。那时，唐山市和五中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两派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所谓联合，其实是妥协，是利益的瓜分。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是中央还是老百姓，都不愿意这种混乱局面继续下去了，联合总是好事。五中成立革委会前，当时的红代会头头找我，说你也是资反路线的受害者，你能不能发言批判资反路线。我心想，我算什么受害者，我的挨整是因为自己幼稚，主动送上门去的。但我若不发言，看当时形势怕也不行。因为马上要成立的革委会是新生的革命政权，它的合法性的一个条件就在于要论证旧的政权（即原党支部）犯了不少错误，甚至罪行。我不按他们的口径发言，弄不好就成了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那可是后果很严重的。于是我做了认真准备，慷慨激昂地说了十分钟。从这时起，我开始学说假话了。一个自幼就认为诚实是做人应具有的最起码品质的人也学说假话了。悲哉！

革委会一成立，我的逍遥派生活就结束了。教师们也正常上班了。上班就是开会，无休止地开会。我也无法靠“消极”来“充实自己”了。

## 八、黑帮队里的生活

革委会和党委一样，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当然要执行毛主席的统一战略部署。1968年8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一个小小的五中，前后揪出的阶级敌人和准阶级敌人就有三十多个，占教职员总数的30%以上。我记得其中有中统特务，军统特务，美军翻译官，台湾特务嫌疑分子，国民党军官太太，历史反革命，走资派，右派等。

---

我是8月下旬进的黑帮队，黑帮队是关阶级敌人的，我就成了阶级敌人。那时黑帮队设在一个大教室和一个小教室里，铺上地铺，垫上稻草，每人有三尺宽的铺位。大教室住男黑帮，小的则住女的。由于教室窗户的玻璃都已被打碎，蚊子奇多。看守的革命小将开恩，允许挂蚊帐。我进去时黑帮队里已经关了近二十人。当时的革委会主任是我曾经教过的原初三八班学生王跃中，他简单地对我说：晚饭后你搬到那边去。手指了指黑帮队所在的教室。我立刻就明白我是黑帮了。

吃完晚饭后，我把简单的行李、蚊帐和毛选（资本论是不许带的）整理了一下，在革命小将的监视中搬了过去。

其实进黑帮队早在我意料之中，我内心很平静。整完走资派，不就该整我们有问题的人了吗？虽然毛主席也说：水至清则无鱼。但造反了几年，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水已经很浑，不整整哪行？当然，清队后期，水已经变清，还要深挖细找阶级敌人，我就不太理解了。

黑帮队里故事太多，我择其有趣者简单介绍一下。

### 1. 一百杀威棒

刚入队的晚上，每人要挨一顿打，黑帮们戏称打“一百杀威棒”。我进黑帮队那天，新入队的有三人。除我之外，还有两位刘姓教员。一是在北大不同系但同年级的同学，前面提到的“黑蛋”；一是比我们大十岁教历史的刘老师。整理好床铺，挂好了蚊帐，我们都在蚊帐里躺着。约晚十时许，突然熄灯了。本来黑帮队里是不准熄灯的，为的是要随时监视黑帮的动向。老黑帮小声说：“该打人了。”我们顿时害起怕来。不到一分钟，屋外大叫：“刘某某出来！”历史老师应声而出。好像把他带到另一教室，不久传来惨叫声，很快又安静了。突然灯又亮了，刘老师耷拉着脑袋灰头土脸地回来了，脸上有被打的血印。他立即就钻进蚊帐里一言不发。突然灯又熄了，这次被厉声叫出的是北大同学刘某某。他被打得更厉害，时间也长得多。还不时听到他那河南口音的辩解声。灯又亮了，他被送回。还听到外面革命小将喊：“你还不老实！”他进门后口中还念念有词，好像继续辩解似的。他被打得鼻青脸肿，比那位刘老师严重多了。他进来后，我想，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可奇怪的是，灯不熄了，外面也渐渐平静。我被免打了。等了五分钟，还没任何动静。队友们开始窃窃私语，他们说，每人都有一次呀，不打恐怕不是好兆头。我心里越来越害怕，想到武松被发配孟州，不打杀威棒，囚徒们说，如果不是有“人情”，恐怕会遭受“盆吊”、“土布袋”等非人刑罚被处死。我想我大概不会被处死，但也不知他们葫芦里装的什么药？难道我会有所谓“人情”？这似乎不可能。后来我得知，我还是真的因为有“人情”而被免打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和学生关系好，不但杀威棒没打，以后也没怎么挨打。看守黑帮的学生（革命小将）换了一拨又一拨，他们“代代相传”的话是“别打徐明曜，他能教你们举礅子（即举重的唐山俗称）”。

### 2. “脚丫子都那么黑！”

---

黑帮的生活是有规律的。每天早5点起床，打扫楼道和厕所。之后洗漱，“早请示”，吃早餐，之后学毛著。八点开始和其他老师们同时上班（老师们上班是开会，我们上班是劳动），午餐，午睡，下午两点再上班，六点下班，“晚汇报”，晚餐。晚上七至九点在黑帮队内学习，即“黑帮斗黑帮”，然后睡觉。当然我说的是正常情况，如果有人被拉出去批斗，或开大会，或来人外调，自然就不那么规律了。

黑帮的生活实行军事化。任何小事都统一行动。比如洗漱，先要排队、报数，然后逐一在口令下完成“端盆”、“接水”、“洗脸”、“倒水”等程序，也颇为有趣。就连上厕所也要排队一起去，不管你有没有去的必要。这样做可难坏了一位老年黑帮李老师。他大概有前列腺问题，不能在“撒尿”、“穿裤”等规定动作下完成生理要求的释放，特别是不能在规定的三分钟里完成排解大便的动作。于是总是喊要去厕所。好在革命小将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允许他一个人在监督谩骂中去厕所，但规定每天不得超过的次数。结果还是不能满足他的生理要求，他不得不几次去市人民医院灌肠排便。

中午的午睡是必须睡的，我猜这是因为看守我们的革命小将图省事，减少看守的工作量。我因常年失眠，中午睡不着。一天，听到一名革命小将在女黑帮屋门口大声喊叫：“脚丫子都那么黑！都给我起来洗脚去！”睡眼惺忪的女黑帮呼啦一下坐了起来，穿上塑料凉鞋，赶紧往校门口的“水泵”处跑，连队都没排。那位下命令的小将喊完就走了。女黑帮还没跑到水泵，又一位革命小将气汹汹地来了，大喊：“怎么不睡午觉，都给我回去睡觉去！”女黑帮们又匆匆跑回黑帮屋睡下，脚也没洗，脚丫子还是那么黑。

### 3. “我会蹬三轮”

黑帮队里呆了几个月，天凉了。我年轻，总憋在学校里不许出门，有点耐不住了。“工宣队”进校后，每天的劳动由工宣队员老刘同志分配。一天，他在分派活前问：“谁会蹬三轮？”没人回答。他又说：“会蹬三轮的到西北井（在唐山西北郊，我校在唐山东南角）拉六袋洋灰。”我知道，会骑自行车的人学三轮很难，不会骑的反容易学。大家都会骑车，因此确实没人会蹬三轮。但我又想，学蹬三轮又会有多难？反正我不像骑自行车那样掌握平衡，先坐稳，扶正把，用力蹬，大概不会有太大问题。于是我说：“我蹬过”。老刘说：“那你去西北井吧。”他丝毫没有怀疑我是不会装会，只是想出去散散心。

我拿了提货单，推着三轮出了校门。到校外，按我想的办法去试，结果车把晃来晃去，差点拐到水沟里。我又调整了姿势，吸了口气，不管车往哪边歪，车把总保持正直。慢慢地，我居然能驾驭它了。走出胡同口，到大马路上，我已经能控制三轮车了。但这时我发现很多人在看我，我看胸前，由于太专心了，黑帮牌忘了摘掉。于是我乘人不备，赶紧摘掉黑帮牌。等我到了西北井，已经能熟练地蹬三轮了。把六袋洋灰装好，找饭馆吃了午饭，就蹬着装有六百斤洋灰的三轮车回校了。我感到很兴奋，既离校自由地劳动了一天，又学会了蹬三

---

轮。后来，我和朋友讲起这事，他们说，你也太胆大了。要是出了事，无论是自己摔坏了，还是三轮车坏了，都够你呛的。

#### 4. “你犯了什么错误？”

刚进黑帮队时，打人的事经常发生。大约是在10月份工宣队进驻学校后，打人的事基本上没有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相比之下，我比别的黑帮挨打少。前面说过，这是因为和学生关系好的原因。但我也不是从来没挨过打。讲一件我挨打的事，这是发生在工宣队进校之后。一天午饭后，革命小将把我叫去，喝道：“背过脸去，眼镜摘了！”我照做了。一个学生抽下皮带，抽打我的后背。他边抽边问：“你今天犯什么错误了？”我说没犯什么错误。另一个学生又拿一根树枝打我，说：“不老实。”我说我真不知道犯什么错误了。打了几下后，学生憋不住了（毕竟是孩子），说：“你吃午饭坐椅子了吗？”我这时才恍然大悟，也知道没什么大事。我的确坐椅子吃饭了，这是犯忌的，因为规定黑帮不许坐椅子吃饭。但我仍不承认，说：“我没坐椅子吃饭呀。”学生又打了我几下，说：“你真不老实，王铭中都看见了，你还不承认！”啊，原来是王铭中告的密，这真出我意料之外。但我还坚持说没坐椅子，是王铭中诬陷的。学生觉得也没法对证，又打了几下就厉声说：“以后吃饭不许坐椅子。”我说是。说完就让我回去午睡了。这时我心里说：王铭中啊王铭中，亏你还是五中书记，抗日战争时的“红小鬼”，怎么就这么没水平。你是走资派当了黑帮，想立功受奖早点出去，这我理解，可也别告这种密呀？难道你不知道孩子们是胡闹嘛！

#### 5. 阶级斗争新动向

当了黑帮以后，就算阶级敌人，与没进黑帮队的革命群众就像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革命群众自然也不会再理你。可是我的朋友却不然。有个教语文的老师，叫鲁荣寰，南京人，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比我小三岁（他全家都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罹难，包括他本人、他妻子和女儿）。他1968年初分到五中。在我没进黑帮队之前，我们经常一起聊天，谈得很投机。我进黑帮队后，他常常借故去看我，大声喝令我要好好改造，但乘人不注意时，又常常塞给我一张纸条，告诉我另一个世界里的情况。特别是在我要被全校批斗之前来通风报信，让我作好准备。他在上大学时就是红卫兵，来五中后很受重用。每次革委会召开的积极分子会都有他参加，因此知道很多内幕。由于他的泄密，对黑帮的监管就受到影响。一次，革委会主任王跃中想了个办法，在开全体师生大会时让黑帮们列席。他大讲阶级斗争新动向，说：“现在有个怪现象，革委会刚决定的事，群众还不知道，黑帮就知道了。这说明阶级斗争是多么复杂，多么尖锐。”又说：“一定要把打进革命队伍内部的敌人揪出来。”说完，看看老师们，又看看黑帮。大家都不动声色。他又说：“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希望心中有鬼的人早日醒悟，向革委会交代。”有人喊口号：“把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揪出来！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大家也都跟着喊，连黑帮也喊。这时有个革命左派忽然站起来，大声喊：

---

“不许你们黑帮喊！这是革命群众喊的口号。”结果会场乱了起来。王跃中很着急，已经表现出烦躁。因为这个拍马屁的革命左派打乱了革委会主任的战略部署，他无法察言观色寻找阶级敌人了。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 6. 当黑帮使我身体越来越好

坦白地说，由于 1966 年 11 月思想的转变（或曰飞跃），我把黑帮队里的事只看成是闹剧。我一点也不害怕，想这场闹剧迟早要收场。因此思想上没有压力，倒把它看成是观察世界、观察人的大好机会。我看到在这个特殊条件下人性的扭曲，也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我看到有人为了自己可以出卖别人，也有人为了别人可以牺牲自己。平常道貌岸然的人在这里变得低三下四，平常不起眼的人倒显得善良而刚强。这真是千载难逢的研究人性的机会。

另外，由于没有了自由，我也不能再“充实自己”，就更多地思索，更多地反省。我越来越感到过去的幼稚，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越来越感到肩上有一种责任，决心在恢复自由后好好研究这个社会，做些真正对人民有利的事。

另外，也是因为没有了自由，我的生活有了规律。再加上参加体力劳动，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不只是我这样，其他呆过黑帮队的人很多都有同感。现在年近古稀，回头想想，从上高中以后，身体最好的时候就是当黑帮的时候。

## 九、党给了我新的政治生命

在黑帮队呆了近一年，我终于获得了“解放”。1969 年 7 月 1 日是党的 48 岁生日。那天我结束了被监管的生活，回到群众之中。五中革委会对我做的结论里写道，徐明曜的问题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劳动锻炼一段时间后安排适当工作。齿轮厂工宣队的结论是：徐的问题在北大时已作过处理，因未发现新问题，不再另作处理。这样，我就由阶级敌人变成革命群众了。正如工宣队负责人说的，“党给了你新的政治生命”。是啊，敌人和群众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就像奴隶主和奴隶，战争中对峙的双方，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然而在文革中这种关系又是那样任意地互相转变。由敌人变成了群众，你若还敢不听我的，再叫你变成敌人。我终于理解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深奥道理。

获得解放的第二天，我就踏上了去农村劳动锻炼的路。这次是和下乡劳动的师生一起去的。同行的学生没有对我表示歧视，但也不同我说话。同行的老师倒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但明显看出还对我存有戒心。这些我都理解，因此也不和他们主动搭讪。

由于是 7 月初，农活不多。无非是给秋庄稼除草，有时还检点麦穗。晚上睡觉我不和学生在一起，大概是怕我和学生闹矛盾。其实怎么会呢，难道我还想再进黑帮队？

一个多月的劳动很快就结束了，除了一件小事外没有什么值得记的。这件小事倒深深地

---

刺激了我，使我至今不忘。大约是在7月下旬的一天，快收工了。我们在地里拔草。我拔得慢，落在了后面。“该收工了！”领队的老师找不到我，大声喊我的名字。我应声跑到地头，去找那位老师。在地上我看到一张报纸，好像是《参考消息》。大概是休息时哪个老师垫屁股的。我多日未看参考消息了，就顺手捡了起来，放在兜里。晚上，我打开报纸看，一条排在角落位置的消息标题是：美国阿波罗号宇航员登上月球。我仔细看着这条消息，读了不知道有多少遍。我的眼睛潮湿了，内心中激荡着十分复杂的情感。宇宙航行，这是我少年时的梦。记得在读高中时，我在厂桥小学当少先队校外辅导员。那时，我给少先队员们组织了一个“星空晚会”，当时正值前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时候。我对少先队员们说，苏联成功发射卫星，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相信，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会第一个发射载人飞船，第一个把人送上月球，第一个把人送上火星，第一个把人送出太阳系。我愿意看到，你们中的同学会有人第一个登上月球。这段话博得了同学们长时间的掌声。可是，今天我看到，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却是万恶的美帝国主义！而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还在搞文革，难道这是一种讽刺吗？

## 十、“一打三反”运动

劳动锻炼结束后，回到学校。我先被分配到校办工厂工作。具体的是压纸盆，做陶瓷喇叭。那时唐山某瓷厂试制成了压电陶瓷片，两边接上音频电流，就能发出声音。再加上个纸盆，就是扬声器，虽然声音很难听。据说当时要在农村家家户户按扬声器，以便能及时听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这种陶瓷喇叭的成本较低，适宜在农村普及。

我在校办工厂干的时间很短，1970年初就调去从事教学工作了。我记得当时我教十个班的英语课，每周二十节。后来，领导又让我兼做木工，修理被学生损坏的桌椅板凳；因为我会蹬三轮，又兼做食堂采买。一人身兼三职，干了一年。

那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刚过去，凡是文革前入学的中学生大部都已动员下去，在校生学习没有动力。另外，当时政治运动多，因为政治压倒一切，也经常停课去参加政治集会。特别是“一打三反”运动中的所谓“宽严大会”。“一打三反”究竟是打什么，反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宽严大会”的场面是终身难忘的。大概的程式如下：经常是全市或全区或全系统（比如全教育系统）开会批判某走资派或某反革命，一个人慷慨激昂地发言，突然，发言者大喊：把某某某揪出来！早已准备好的隐藏在他身边的民兵立即把他押上台，宣布逮捕。而把已经逮捕的表现好的犯人当场宣布释放，或对表现不好的犯人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就体现了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以震慑敌人。如有当场逮捕的，回校后还要“讨论案例”，即大家表示态度对他应判什么刑，以教育群众。

---

讲一个同事对我落井下石的故事。一次老师们开会“讨论案例”，案犯叫门庆荣，罪行是“偷听敌台，散布反动言论”。大约有二十多名老师，加上工宣队、军宣队三十余人在一个大会议室里参加会议，会场气氛很严肃。念完市委发的文件后，发言者稀稀拉拉。因文件上有“应从重处理”的字样，发言者都说对此人应判死刑，但也没有人表示义愤填膺。文件仍在传阅，多数老师仍作思考状。突然，化学老师刘某某大声说：“徐明曜的问题比他还严重。”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忽的都望着我。有人在窃窃私语，似乎在考虑是否应对他的话表态。主持会的军宣队负责人也望了我一会。我故作镇静，面无表情。心里想，难道是要把我当宽严典型？可又想，自从1966年11月后，我说话非常谨慎，他们也抓不住我什么呀。过了一会（也许只有一分钟，但我觉得很长很长），军宣队负责人说：“今天我们讨论门庆荣事件，其他的事下面再和组织谈。”一场危机终于过去。事后我才知道，这完全是刘某某想表现自己进步的独出心裁的闹剧。刘的父亲是中山大学著名历史教授，文革前就被批判。刘本来是中国科技大学核物理系的助教，因父亲问题不能继续从事敏感专业的工作而于1965年被调到唐山五中。“一打三反”时他父亲仍在挨整。他为了表示进步，又觉得我是死老虎，打打没关系，才出此下策。结局是，军宣队工宣队领导想，徐的问题刚作结论，我们没发现他有什么新问题呀？怎么你刘某某认为他比应判死刑的案犯问题还严重呢？莫非你知道什么新的情况？于是决定成立刘某某专案组，调查他与徐的关系以及他本人的问题。结果刘是弄巧成拙，“鱼儿没捉住，惹得一身腥”。如果对比一下我等分配时接触过的工人们，他们绝对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中国的知识分子啊，你们中间固然有许多优秀分子，可是也不能不说，在你们中间，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也大有人在。没有你们这些人的推波助澜，那些像文革这样的错误运动怕也搞不起来。（注：门庆荣后来真的被枪毙了。因为唐山市委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执行的政策过左，市委书记许家信在文革后被降职调走。）

“一打三反”运动我平平安安地度过了。1971年，开始把我分到英语教研组，和老师们一样教课了。我还当了个副班主任。这说明，我的问题领导认为已经解决，正式使用了。我也离开了木工组，辞掉了食堂采买，一心教书了。

同年9月，发生了林彪事件。我虽感到意外，但觉得也在情理之中。这说明对于文革，中央高层也有不同的意见。他们知道内幕，难道会看不出文革有问题吗？用毛主席本人的话说，对他搞的文革，也是“支持者不多，反对者不少。”难道林彪就真的是三忠于四无限？但在当时，我总算是觉悟早的人。大多数人，比如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通过林彪事件才对文革发生怀疑的。从这件事以后，狂热的人几乎没有了，群众热衷于传播小道消息，开会也很被动。被当成走资派整得半死的干部又被结合使用了。他们吃够了苦，革命的理想也逐渐消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说法盛行，走后门之风越来越严重。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什么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等在正常社会里的正常行为渐渐没人相信了。社会道德水准下降。文

---

革造成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知识青年要返城，“炸药包手榴弹”（指送点心和酒）是不够的了，有的女知青甚至不惜向公社领导奉献肉体。工人们工资长期不涨，也怨声载道。我常常去看望在凤凰山劳动时的工友，他们说，快二十年了，工资总是三九七八，意指三十九块七毛八分，二级工的标准工资。现在儿子大了，也当工人了，出徒后两年，也挣三九七八，和当父亲的一样。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把邓小平又请了出来，让他做了决不翻案的保证。在周、邓的领导下，形势开始好转。但这时又发生了下面的事。

## 十一、回潮和反回潮

1973年初，芮校长找我谈话。那时，邓小平有意试行在高中毕业生中招大学生，改变单一的只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方式。芮校长告诉了我这件事，问我：“咱们五中也算是不错的学校，如果别的学校有很多学生考上大学，而五中一个没有怎么办？”我一听就知道他是想让我辅导高考。我说：“您有话就直说吧，您想让我干什么？”他说：“调你去教高中数学，这是你的本行吧。”我说是。他说：“那我就把数学这个担子交给你了，别让我失望。”我说你放心吧。这样，我又开始教高中毕业班数学。我编写了复习提纲，每天和学生摸爬滚打在一起。学生们积极性也很高，毕竟考上大学可以不下乡，这在当时很吸引人。芮校长常去听课，他也很满意。就这样教了半年多。

但好景不长，忽然风向又逆转了。江青等文革派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回潮，要借此整邓小平。于是又在全国开展了“反回潮”运动，竖了个张铁生交白卷的典型。党支部（这时已经恢复）号召全校师生贴大字报。于是又一个运动开始了。尽管已没有文革初期的狂热，但运动毕竟是运动，学生们很认真地写大字报，矛头都指向我。他们说我是资本主义回潮的急先锋，修正主义的马前卒等等。但老师们的大字报不多。我心想，又不是我要教高中，是你芮校长让我干的。怎么我是“急先锋、马前卒”而你老芮却不是？芮校长说，别怕，党支部了解你。我说我不怕，大不了再进黑帮队。芮校长连声说：“不可能，不可能！你要进，我陪你进。现在不是那形势。”看来，他并不推卸责任。其实，这阵风也就吹了不到一个月，我照样教我的书，只是学生不好好学了，他们的希望破灭了。

毕业时，他们仍被动员下乡，没有人上大学。

## 十二、半导体风波

1974年，我又接了两个高中班，仍教数学。这拨学生于1976年暑假毕业。

这两年，由于反了“回潮”，提倡“开门办学”，即更多地让学生到工厂农村去，不仅劳

---

动锻炼，还要学习文化知识。那时的口号是，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真知的，只有到生产实践当中，到工人农民当中才能学到有用的知识。我们年级主要去的是唐山钢厂，学修理电动机。偶尔也去开滦煤矿。我是副班主任，管理学生的任务主要是给班主任。因此，我到了工厂，就“顶班劳动”，即和工人们一样分配活儿，完成自己的工作量，学生基本不管。加之我有刚来唐山等分配时与工人相处的经验，很快和工人打成一片，交成朋友。我常常独来独往，不与学生在一起。那时我最爱干的是电工，也交了几个电工朋友。在我看来，所谓开门办学，其实就是劳动，没有教学。回到学校，上点不咸不淡的课，还是课本上的一套。现在想来，这段生活也没有什么好讲的。但由于我业余爱好无线电，却出了点问题。

学校里的老师都知道我会修半导体，他们收音机坏了，就都往我宿舍送，弄得我宿舍就和修理部一样。在修超外差式收音机时，为校准中频，我自制了信号发生器。一个老师很好奇，问我它的原理。我说，其实它的原理就和广播电台一样，能产生音频和射频，把用音频调幅的射频信号发出去，在收音机上就能听到声音，这样我就能用这个声音校准收音机上的小“中周”了。他说，你说它就像广播电台，你能不能给我演示一下？我说把射频信号的频率改到收音机能接收到的频段就可以了。他的兴趣更大了。一定要我演示一下。我说好，但它的功率非常小，你拿个收音机出去，在600千赫左右找台，我在屋里拉二胡，看能不能听到我的二胡声。不巧，就在我们做试验时，被芮校长看见了。他很奇怪，和那个老师一起在屋外听我拉二胡。直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个老师解释了，他又找我。我又解释多次，他还是问个不停。问我能不能做一个发射距离远的，比如，几百里。我说，要发射这么远，功率要非常大，只有广播电台的设备才行。我当时内心已经非常明白他的疑虑。他是怀疑我试制电台，搞反革命宣传。这不是要搞特务活动吗？但这话他终于没说出口。

文革结束后我听说，从那以后，领导对我又提高了警惕，连我上街都派人跟踪。

### 十三、多灾多难的一年

1976年，真是多灾多难。1月，周总理去世。大家都很悲痛，我也很悲痛。因为大家都把总理看成是走出文革困局的希望。现在，总理没了，江青等将更肆无忌惮，人民将遭更大的殃。那时，至少在我周围，已经没有什么赞成文革的人了。小道消息满天飞，都是说江青等人坏话的。对毛主席，还不敢公开议论，可对江青，已经十分公开了。总理一走，很多人公开说：中国没希望了。

这年清明节，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一次下台了。人民的心冷到极点。没想到，到了7月，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整个城市在瞬间就毁掉，死了几十万人，侥幸活下来的大多也受了伤，在无医少药的情况下挣扎。

---

我因为暑假回了北京，幸免于难。当地震发生时，北京有强烈震感。但在近一天的时间里，居然连政府都不知道地震的地点。直到开滦煤矿的工人冒死跑到中南海，中央才知道地震发生在唐山（至少人们是这样传说的）。可见文革对我们的正常生活破坏有多大。

我听说唐山发生地震后，决定立即返回唐山。但当时还没有通车，我到处打听北京有什么单位要去支援唐山，想搭他们的车走。听到一个单位，就去和他们联系。最后，终于找到了车。这样我在震后的第八天就搭乘北京机械施工公司的车回到了唐山参加抗震救灾。

我搭乘的是特种车辆，是专门为建筑施工设计的。当车过了三河县（现在的三河市），路面已经被地震破坏得十分严重。快到玉田时，路已经很难走，到处是震裂的缝隙，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一般汽车已无法行驶。而且房屋倒塌得很多，但路上看不到人。车到丰润县，似乎比玉田还好一些。说来奇怪，玉田离唐山一百多里，而丰润只有五十里，怎么反而被损坏得更轻呢？车终于开到了唐山，花了大约八个小时（平常只需三、四个小时），停在开滦唐山矿内。

之后我就要自己走回五中去了，这时我发现我已经完全不认识路了。愣了一会，渐渐我悟道，平时能认识路，是因为有很多的“参照物”。但现在房子全倒了，到处都是废墟和瓦砾。参照物没有了，自然就不好找路了。我向远处望去，看到唐山供电局的铁塔没倒，就踏着碎砖烂瓦，向铁塔处走去。放眼望去，是一片瓦砾，瓦砾中见到一些塑料帐篷，就是幸存者的住处，真是惨不忍睹。由于房子倒了，原来的路本来不宽，塞满了瓦砾，就已经没有路了。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向着供电局的铁塔前进。顺便说一句，从电视画面上看，最近的汶川大地震中房屋受损的程度远没有唐山地震时严重，至少30%的房子还没完全倒。可在唐山，没倒的房子是凤毛麟角，连1%也没有。走着走着，我忽然看到在五中我教过的一个学生，她看到我时很激动，边说边哭，讲地震时她的经历。还告诉我，哪个同学死了，哪个同学受伤了等等情况。我问她家的情况，她说还好，没有人遇难。她一直领我走到了唐山五中。

到了五中，看到仅有的两座楼都倒了。学校里搭了不少帐篷，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和新的办公地点。由于操场很大，中间还有一大块没有碎砖烂瓦的空地，那里搭着好几个军用帐篷，这是38军的抗震救灾指挥部。

回到学校以后，就马上投入了抗震救灾的工作。当时尸体已经全部掩埋，我们主要是清理废墟，搭建帐篷，恢复主要的道路。那时实行供给制，货币停止流通。一日三餐，由食堂供应大饼。劳动时间也较长，早六点上班，晚六点下班。到了晚上，我们住校的还要组织学习、批邓。

我由于常年吃安眠药，已经有了药物依赖。此时没有了安眠药，身体出现不适应的状况。最要命的是吃不下饭。虽然肚子很饿，但光想喝水，不想吃饭。一周以后，体重减轻了二十

---

斤。学校的卫生室早倒了，药物被埋在瓦砾之中。校医让人去刨，也找不到安眠药。后来在路南区医院的药房刨出一瓶 1000 片的安定，吃了几天，身体就正常了。

吃住安顿好后，要去找寻自己原来的生活用品，看看什么还能使用。这时我们发现，在办公楼的废墟里，散落着不少俄文书，都是关于地震方面的。原来我的北大同学刘某某是学地震的。后来他回到学校，同事们和他开玩笑说：你是学地震了，地震来前你就跑了，为什么不给大家报个信？当然这是玩笑。但后来我听说，唐山十中的地震预报小组（系学生的课外活动组织）真的在震前看出了一些端倪，但不敢说，怕被戴上谣言惑众、蛊惑人心的帽子。

记得是在 9 月 1 号，货币才恢复流通，生活比较正常些了。这时我们开始了修建简易房的工作，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准备。简易房只有半截砖墙，上半截墙和屋顶都用苇簾。为防雨，再在屋顶上铺油毡。建简易房用了大约一个月。在那时，全国人民也都来支援，但从物资供应上说，比最近的汶川地震差得太多了。

## 十四、毛主席去世那天我差点挨了一枪

唐山地震时在政治上还很左。邓小平又一次下台，全国上下都在“批邓”。那时还有个口号叫“先生产后生活”，即恢复生产事大，要优先考虑，而恢复生活事小，要在生产恢复后慢慢考虑。唐山是全国重要的煤炭基地，恢复开滦煤矿的生产就是非常紧迫的任务。地震后不久，江青到了唐山。她去唐山开滦煤矿找当时的党委书记肖寒，即后来的煤炭工业部部长。问肖寒：“你看恢复煤炭生产最主要问题是什么？”肖寒不假思索，答：“最主要是排水。”

（因为矿井里满是积水是无法恢复采矿的。）江青听罢，立即跳了起来，指着肖寒的鼻子说：“你还是老走资派的腔调，最主要是批邓嘛！”据说肖寒听罢，第二天就病了。刚进“三结合”班子，这不又要挨批斗了嘛！由此可见当时的政治环境。

我们五中抗震救灾是在 38 军领导下，也左得很。经常放下救灾的工作而开批邓会。我们当时的书记耿树林对此很不满意。

9 月 9 日，毛主席去世了。我们集中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后，分组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我们高中组老师在最大的棚子里讨论（别忘了当时还没有房子），讨论了不到一个小时，耿书记说：“我们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用实际行动缅怀毛主席。今天晚饭前把传达室西边那排简易房的房顶都上上！”我觉得耿书记很讲实际，就第一个走出防震棚，向工地走去。外面只有值班的苏老师一人。他平常经常和我开玩笑。因为当时值班都带枪，他用枪对着我，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了一句，对着我就打了一枪。没想到枪里真有子弹！由于他打我时枪口一偏，子弹从我胸前一寸处飞过，并没有打到我。他马上脸色煞白，连说：“千万别说是开玩笑，就说是走火。”这时老师们也都出来了，大家都往我们这里跑。38 军的一

---

名干部跑在前面，问苏是怎么回事。苏说是晚间值班的忘了卸子弹，不小心走了火。问我，我也说是。这场风波就算过去。读者或许不了解，地震后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规定必须带枪值班。如有阶级敌人破坏，可当场开枪。进入9月，社会已经安定，又规定只有晚上才在枪里上子弹，白天不许上子弹。可夜间值班的人竟然忘了卸掉子弹，而苏老师接班时又没有检查，结果才发生了这惊险的一幕。事后，两个值班的人都写了检讨，而我则拣了一条命。

我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想不到他会开枪，倒一点没觉得害怕。完事后我迅速到了工地，爬上了房顶。当天真完成了书记交给我们的劳动任务。

事后有朋友对我说，你可真善良。你不知道苏某某是大左派，品质也不好。你若真被打死了，他会说你反对毛主席，他就成了英雄，而你就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可你还替他打掩护。大家知道，持枪者在任何情况下是决不允许拿枪开玩笑的，如果如实说他开玩笑，他会受严厉的处分。

## 十五、揪出“四人帮”和我的第一篇数学论文

又过了一个月，四人帮被逮捕了，人心大快。我听到消息后，跑步去告诉我的朋友们，足见当时我是多么激动与兴奋。之后又开始了批判四人帮的学习，大家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这以后的事大家都经历了，不需我在这里赘述。

1976年年底，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数学论文。这里倒还有点故事。

从大学毕业到粉碎四人帮的十一年里，大学同学中间只有一人给我写过信，而且一直保持着联系，那就是代数班的杨燕昌。杨的哥哥是某出版社的领导，因此，杨常有“内部消息”。1973年初，他来信说：“你注意今年第二期的《中国科学》，将有陈景润和洪家威的论文发表，这是个信号，说明我们国家又允许数学理论研究了。”又说：“你的毕业论文也做了不少东西，希望你整理整理发表。”我想，杨燕昌当然是好意，但《中国科学》岂是我发表论文的地方。我并没有整理论文。又过了几个月，到了该年的秋天，我看到了《数学学报》将于1974年复刊的消息，于是我动心了。我和杨燕昌一起整理了两篇论文，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投了出去。还好，第一篇很快就被接受了。第二篇的结果因为国外已经发表，我们主动撤回了。说也奇怪，论文虽被接受，但迟迟不出来。原来批邓后形势变化，论文又被搁浅了。直到四人帮倒台，我收到《数学学报》编辑部的一封信，称：“你们的稿件已被接受发表，请寄一封单位介绍信来，表示同意发表你们的文章。”乖乖，发表数学论文也要单位介绍信！我以前真不知还有这回事，知道的话我就不找麻烦了。我硬着头皮找到党支部书记，给他看编辑部的信。没想到他说：“这是好事，我给你写介绍信。”这样，在寄去党支部介绍信之后，论文在1976年12月出的最后一期上发表了。后来，我和别人提起此事，他们都不相信还有

---

这种咄咄怪事。在我的记忆中，1980年以后，发表数学论文就不再需要单位介绍信了。

## 十六、恢复校办工厂

唐山地震后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这在揪出四人帮后也没有改变。对于学校来说，与修建简易房同时的重要工作就是恢复被地震严重损毁的校办工厂。领导派我去协助苏克勇同志（不是打我一抢的那个苏老师）做这件工作，后来人们称他为政治厂长，而称我为技术厂长。

地震前我们有机床加工厂、草绳厂和扬声器厂，但在地震中都已经严重损毁。只刨出几台机床修理后还能使用，比如车床、刨床、铣床等。因此恢复机床加工困难不大。但是，草绳厂和扬声器厂因为设备全部损坏，已无法恢复。我和老苏商量想新建无线电厂和电镀厂。无线电方面我比较熟悉，很快就建立了变压器、稳压电源和印刷电路板三个车间，投入了生产。电镀厂则比较复杂，虽然制作设备并不难，主要是个大功率的低压直流电源。我从齿轮厂要了点废铜线，用它们换购了漆包线（没有废铜是不卖你漆包线的），又买了些矽钢片，领着学生用了大约一周就制成了直流电源所需要的约10千瓦的变压器。又从北京变压器厂要了当时北京无轨电车用的可控硅整流器的次品，只要能耐受100伏以上电压的就可以。这样的整流管根本无法在无轨电车上使用，所以他们也不要钱，无偿支援我们了。但是我对化学和电镀却是一窍不通，怎样配电镀液，怎样设计电镀槽，以及具体怎样电镀我都一无所知。我借了不少电镀的专业书籍去钻研，又去自行车厂电镀车间学习，没日没夜地干。大约用了一个月，我掌握了镀锌和镀铬的技术，领着工人和学生开始了生产。其中还有个故事，配镀铬电镀液需要氰化钾等剧毒药品，由两个持枪民兵陪我一起去买。买回氰化钾后，由这两个民兵持枪同行，坐着敞篷卡车，犹如“宽严大会”后押送犯人去刑场枪毙的架势，街上不少群众都看着我，不知我犯了什么罪。一笑。

我们的镀锌车间是为本校无线电厂服务的，而镀铬是为唐山自行车厂加工车把。另外，还开展了“硬镀铬”业务，即给磨损的车轴表皮镀上一层铬，使它可以起死回生，继续使用。由于电镀厂的效益最好，领导们都很高兴。老苏还在电镀厂开工后的一个星期天请我到他家吃饭，先倒了一大杯酒说要敬我一杯。文革以后我还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礼遇。我也不客气，反正我本来就是个酒鬼，把他的酒喝了多半瓶。

老苏是何许人也？我离开五中后才听说，在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当湘潭县委书记时，老苏是他的搭档，即县委副书记。只是因为没有文化，能力不强，一直升不上去。但他没犯过错误，也相信党做的一切。我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他真的认为对我应该提高警惕。但看到我那样努力地工作，建设电镀车间，他感到意外，也很受感动，于是才有了请我吃饭

---

的那一幕。当我离开五中时，他也被调到湖南某师范专科学校当党委书记去了。不知是不是沾了华国锋的光，这是后话。

还有一点值得提出，当时我已经看到物质刺激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我曾建议在工人中间实行计件工资，相信这样做产量会大大提高。因为那时我们是最早恢复生产的电镀厂，活多人少。但是党支部无论如何也不敢同意这样做，怕犯错误。这个建议也就不了了之，好在没有给我戴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

## 十七、重回北大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渐趋实际，不那么左了。我也逐渐听到一些赞扬我的声音。什么“徐明曜进步了”，“工作努力、成绩突出”啦等等。我在1977年初作为“抗震救灾积极分子”而得到全校表扬，在年底评先进时又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地被评为唐山五中的“先进工作者”，接着又报到市里被评为“唐山市先进个人”，出席了唐山市科学大会。1977年，又涨了一级工资。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时来运转了。

接着，邓小平又出来工作，他主动要求抓科学教育。高考正式恢复了，各地都是人才紧缺。据说北大要调我回去，向唐山五中寄去了商调函。唐山市教育局先下手为强，立即把我调到唐山教师进修学院，即现在的唐山师范学院，称：“你们北大缺人，我们更缺人，我们不放。”段学复先生给我写信，问我能不能通过考研究生回来。我说年龄已经超了（当时要求考生一定是在1942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而我是1941年出生）。他说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于是继续在唐山教育学院工作，教1976级“工农兵学员”的微积分和中学数学教材教法研究两门课，还带学生去中学实习。不久以后，报考研究生的考生年龄放宽到1938年以后出生的，我有了参加考试的机会。可教育学院不想让我走，给我压的工作量越来越重，使我没时间复习。由于时间又短，考前连看一遍数学分析都不可能，结果分析考了个56分。但是从总成绩看，我还是排在前几名（记得我高代是100分，英语是96分，政治也近80分），被选中参加复试。复试时只问代数和群论知识，因此我不着急。其时正值我带领学生在中学实习，我每天都要跑近十所中学，指导学生备课、讲课，忙得不可开交。

唐山市共有两人报考北大数学力学系的研究生，另一位是齿轮厂的王庆人。王其实是北大数力系1962级学生，文革中毕业被分配到唐山齿轮厂工作。他考得很好，估计也会被录取。到了7月初，他的录取通知书来了，可我的却没来。我心中开始忐忑不安。心想我的总分比他高不少，怎么我的通知书不来呢？都是由北京寄到唐山，应该同日到达才对。又等了一周多，还是不来。我开始着急了。这时我教的学生已经毕业，每天无事可做。一天，我又去唐山五中，见到书记吴某某（其时耿书记已经调走）。他拿着一封信说：“北大来了封函调

---

信，问你对过去错误的认识态度和改正情况，你看我怎么写？”我一听一切就都明白了，原来是因为政治原因还要审查。而且我也相信，吴书记既对我说，就不会给我写坏话。我于是说，这是组织上的事，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又过了些天，我在八月初接到录取通知，编号第 064 号。北大数力系当年一共录取了六十四名研究生。

就这样，我于 1978 年 10 月回到北大当研究生。1979 年暑假后，我就交上了毕业论文，其实只是大学毕业论文的补充。办毕业手续拖了一年，于 1980 年提前一年毕业，开始了在北大的教书生涯。

## 十八、结束语

上面讲述的十三年半的经历以及五年半的大学生活，是我最留恋的时光。尽管在别人看来，我一直处于挨整之中。但那里毕竟有我的青春，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其实挨整也是难得的人生经历，我觉得比我的前辈和后辈都更幸运，经历了这样巨大变革的时代。这些经历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它使我思索、使我不断地“改造”着思想。学习中国和世界五、六千年的文明史，我渐渐形成了对世界、对人生、对历史的较为实际的看法，也渐渐坚定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坚定了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信仰。我对中国的未来是乐观的，相信这个世界会越变越好。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其实还很忙，忙着总结这一生在教书、研究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当我一旦有时间，我会把我的思想详细写出来，请老同学们指教。总之，在我生命到达终点之前，总应该给自己再留一点时间，做点数学之外自己想做的事。

还有些事应该向同学们交代。我在北大问题的“平反”颇费周折。从 1978 年回北大读研究生起，我曾多次向组织提出平反问题，但因当时重点是解决反右和文革中的冤假错案，顾不上我的问题。一年以后我再次提出，答复是中央没有处理反右与文革之间那十年中问题的文件。又过了一年，则答复我不需要平反，因为当时（1965 年）没有给我戴反革命帽子。我问对我的问题到底应该怎样处理，答复是应由团委对我被开除团籍一事予以改正。又过了很长时间，团委的“改正决定”由系人事干部交给了我，让我签字。“决定”称当年对我的批判和给予开除团籍处分都是错误的（大意，原件未找到），仅有一两句话。虽然没留尾巴，可也没具体说明批判我什么问题是错误的。我虽然签了字，但我仍书面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我写的检查、日记、私人信件应予退还，一些不便我看的与批判和处分有关的材料应予销毁，毕业鉴定应做技术处理，譬如覆盖一些不属实的结论（我还记得毕业鉴定的第一句话是“该生有系统的反动思想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等等。当时得到的答复是要按中央文件精神办理，文件上没做规定的不能办。后来我又问过几次，答复又变成“你的档案里没有你说的材料”。就这样不了了之。

---

到北大当老师以后，我的生活渐趋平静。无非是教学、科研、带学生等业务工作。我于1983年提为讲师，1985年破格提升为副教授，1988年又破格提升为教授。记得当时北大校刊上还有一篇报道，称我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其时我已经47岁）。我牢记丁石孙先生的教诲：“你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就是承前启后”，我对教学工作和培养研究生十分重视。因为没有群论方面的合适教材，我在1980年刚工作时就写了《有限群导引》，先印讲义，于1987年修改多次后出书。目前全国大多数院校都把它作为有限群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教材，反映很好。这本书尽管很专门，读者不会太多，但也重印了多次，并已经印了一万册。就连台湾、新加坡、日本等国的学者都来信向我索要。1985年起我又在国内建立了群与图的研究方向，在国外很有影响。有好几个问题都是我首先提出，国外学者跟着我们做。在北大我一共培养了13名博士生，到目前为止已有10人被提为正教授，3人被评为博士生导师。科研方面我虽然没有刻意去做，只是在带研究生时提问题、提想法，主要让学生去做。但这些年我也发表了近90篇学术论文，都被《美国数学评论》收录。据该《评论》统计，至今年初为止，我的文章曾被各国同行100多人引用360多次。我觉得，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因此，我拒绝了北大科技部（自然科学处）多次让我报科技进步奖的建议，也拒绝了教务部让我报教材奖的建议。我看不惯那些到处吹嘘自己的数学家，并为目前的学术腐败感到痛心。有人的论文被别人引用了几次，就要报奖；引用了几十次，就说自己是世界级数学家。我不赞成这样的浮躁作风，但对这种现象我也没有办法，只能“独善其身”而已。还有人只重视科研，而在教学上马马虎虎，这也是我特别反对的。其实，北大的优势就在于基础打得好，如不好好教课，北大的优良传统也就逐渐丧失了。可对这种现象我同样是无能为力。也许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管得少些，“无为而治”，情况会更好。如果总是评奖，总是评估，而且一切都要量化，大概是永远不能把北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恐怕二流三流都困难。我的这些议论并不是牢骚，我认为是真理。上述现象的产生就是不懂教育的人管教育的结果。

回到我自己，我最不愿意别人称我是专家。因为我觉得“专家”并不是个褒义词。这等于说我在专业之外一无所知、一无所长，不是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对人民没有多大贡献。可不幸的是我还只能是这类所谓专家。你想想，整天只做纯理论研究，教出的学生还是做纯理论研究，能对社会发展有什么直接的好处呢？说老实话，我的所谓学问，全世界能有几百人关心就不错了。这样的生活，使我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这也是我留恋过去生活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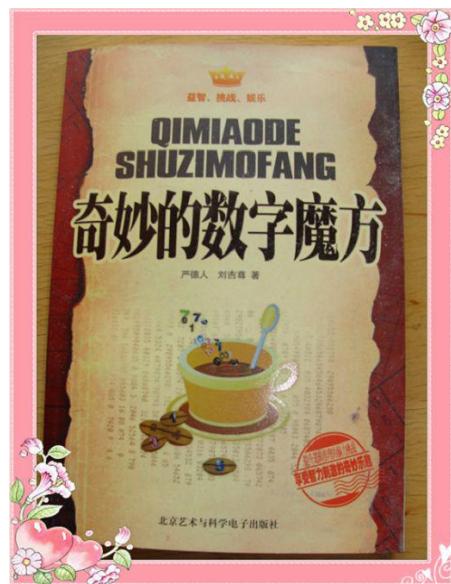
该说再见了，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能再次与老同学聚会，再次欢聚畅谈。

# 我的人生经历

数学二班 严德人

1965 年四月从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原子能所从事核工程和科学领域的计算工作。在原子能所工作了十三年，完成了大大小小近二十个项目的计算任务。到 1978 年夏天，被调到中国银行总行，随后被派往中国银行香港中银集团电脑部工作，主要从事银行应用系统的设计和开发工作，做过客户信息系统，储蓄存款系统，支票系统和贷款系统的开发，做过层次数据库的设计和管理。1985 年调回北京中国银行总行电脑部工作，仍然从事应用系统的设计与开发，参加和领导开发过国际贸易结算系统的开发，后期主要参加应用系统的开发管理。先后在 IBM 的主机和 AS/400 上工作，1995 年到 1998 年外派中国银行东京分行工作，1998 年底回国退休。退休后，我学习了新的电脑编程语言 JAVA，并且学习和运用 PC 机，通过 JBuilder 开发平台，在 PC 机上开发应用程序。2005 年，初次接触数独，不久，数独在中国流行，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数独的研究中去，并采用 JAVA 语言在 PC 机上开始开发数独解题程序，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我先后完成了《奇妙的数字魔方》（约 10 万字）和《竞技数独》（约 18 万字）两本书的写作（已出版）。还有《第二届世界数独锦标赛赛题题解》和《少儿益智数独》也已脱稿。并且完成了 25 套不同类型的数独题库生成和数独解题软件，完成了数字魔方生成软件、数独和数字魔方衍生软件、计算不同数字魔方个数的软件。

附：《竞技数独》与《奇妙的数字魔方》的封面照片



---

## 聚会小诗

数学二班 严华翔

五十年前北大上，三百学子数力场。  
科学民主承传统，蔡马先师大旗扬。  
路线阶级坏学纲，道旁草闹乱人常。  
北大性格定尘埃，明读暗思汹涌浪。  
笃学励志创辉煌，心性皈真自芬芳。  
六年共读情深切，五十年后更绵长！

---

# 怀念鲁梓成同学

力学班 杨庆曾

最近几天在整理旧相册时，看到一张 1965 年毕业前夕与同学们合影的老照片，猛然间看到，那不是鲁梓成吗？清瘦的脸庞上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笑得那样开心，那样天真，完全想不到这样孩童般的同学竟然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了。

鲁梓成是 1959 年从江苏考进北大数力系的。我与他在力一班同窗四年，后来他分到流体专业，我在固体专业。但毕业后，我与他、还有刘志富等三人，又一起分到当时的甘肃 8120 部队。鲁梓成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像他这样身体完全可以不分到边疆去工作，为什么最后还是去了，我不明白，但这至少说明，为了祖国国防现代化事业，小鲁并没有顾及自己的健康，他是实实在在做出了极大的牺牲。我后来才知道，小鲁在江苏还有一位只身在家的年迈的老父亲，小鲁没有为此要求组织上照顾，而是毅然决然走上了艰苦的从军道路。

在甘肃酒泉，我曾经与他共事近两年，我见他脸上老是红扑扑的，实际上这就是他心脏供血不足的表征。他那时也已经感觉到身体的不适了。1967 年，我调到山西工作，小鲁也从技术处调到团站从事雷达数据处理和安全控制工作。他所在的团站，地处茫茫戈壁滩上新建的小点号，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十分恶劣，白天热浪滚滚，夜晚却冷如寒冬，不时风沙怒号，遮天蔽日，连吃水都很困难。尽管后来条件有所改善，但是在高原、沙漠和远离大城市的大环境下，小鲁连续工作了二十多年，实在极不容易。我们在北大学的是理科，工程与应用是我们的短板。小鲁凭着雄厚的理论基础，通过自学，很快就成长为单位的技术骨干。上世纪 80 年代国家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里面有小鲁写下的词条。

小鲁的性格率真、耿直，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粉碎“四人帮”后，开始评定技术职称。很长一段时间，小鲁总是没评上高级职称，我们都深感不平。我曾经当面问起小鲁的同事，为什么小鲁不能评高级职称？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理由。直到小鲁转业回地方工作前才得以解决。我想，这件事一定会深深刺痛小鲁的心。

小鲁的妻子是他的老乡，但很长一段时间远在海南岛工作。那时候，他每次探亲都需要从中国的大西北跑到最南端的海南岛，来回在路上就得花近一个月时间，旅途的劳顿自不待言，拥挤的列车、好几次换乘加上难买的车船票，都折磨着小鲁的身体，但小鲁毫无怨言。这种与祖国同甘共苦的情怀是多么高尚啊！好几年后，他的妻子才调到部队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出差到西北，小鲁请我到他家吃饭。他给我特意泡上一壶海南岛的“功夫茶”，十分感叹地说：“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了！”

---

特别难以忘怀的是，在我最倒霉的时候，小鲁给我的关心和鼓励。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清理阶级队伍”时，我无端受到批判，接着就是无止境地下放，脱离原来工作，到基层劳动、锻炼、教课近七年。当时不少人对我都另眼相看，不屑一顾。但我清楚记得，在结婚那年，是小鲁从大西北给我捎来那个年代十分难得的两床真丝被面，还捎话让我“要挺住！千万不能自暴自弃！”这使我从心底里感觉到老同学友谊的珍贵！真是“礼重情义更重”啊！

小鲁于1987年转业到江苏无锡公安局工作。局里安排他领导无锡市公安系统的信息化工作，他又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他虽然只被定职为三级警督，工资也不高，但对事业十分投入。由于工作成绩优异，很快就被江苏省吸收为信息化办公室的成员，经常到全国各地出差、授课，还被推选为江苏省人大代表。据他妻子说，小鲁之所以过早地去世，与他工作太认真、弦绷得太紧大有关系。我最后一次见到小鲁是在2002年的春天，那一次他到北京公安部出差，已经明显看出背驼得厉害，苍老了好多。他兴奋地告诉我，部里已经批了一笔经费，很快就可以启动一个项目。我们都劝他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但不久就传来小鲁因病去世的噩耗。

“斯人虽已故，魂牵后人心”。想起小鲁孩童般的笑脸、自然纯真的性格和那对事业火一般的热情，我的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小鲁，愿你在天国那一边安息，我们将永远怀念你！

---

# 入学五十周年聚会发言

力学班 杨庆曾

尊敬的丁石孙校长，敬爱的老师，同学们：

今天，我们数力系 59 级的老校友们，有幸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与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相聚一起，重温五十年前北大给我们留下的刻骨铭心的美好记忆，追述半个世纪以来北大发生的深刻的变化，感到十分欣慰和亲切。在这里，我首先代表数力系力学专业 59 级的老校友们，向辛勤培养我们的学校和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与我们同窗走过多年大学生活的数学专业与计算数学专业的老同学们，致以亲切的问候。你们好！

五十年岁月如歌，五十年弹指一挥。我们清楚记得，五十年前，当我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提着行李，背着背包，走进北大的校门时，校园里张灯结彩欢迎新同学的盛况；我们清楚记得，白发苍苍的周培源先生在百忙之中，与同学们促膝交谈，勉励我们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勤奋学习的情景；我们清楚记得，丁石孙老师授课时，清晰的思路、幽默的谈吐，引来满堂笑声的愉快；我们还清楚记得，闵嗣鹤、冷生明、张恭庆、吴兰成、汪承义、章学诚、吴林襄、孙天凤、周光炯、陈耀松、吴江航、吴鸿庆、吴望一、杜珣、是勋刚、王仁、武际可、沈力、王大钧、曲圣年、邓成光、丁中一以及许许多多年老和年轻的老师，为我们授课所付出的艰辛，以及做学问乃至做人的那种求真、求实、严格、严谨的作风。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终身难忘、终身受益的宝贵财富。尽管我们 59 级的同学们也已经步入了人生的晚年，但我们仍然要说，北大就像是一本厚重的书，足以让我们终身攻读，我们依然是北大的学子，我们依然是光荣的北大人。

想当年，尽管政治运动较多，正常教学秩序有时受到干扰，但是绝大多数同学在那个年代都十分珍惜在北大的学习机会，怀着为祖国学习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发奋努力，刻苦自励，学校里形成了极其良好的学习氛围。参加工作后的几十年，我们深感，作为国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北大的教学尽管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从北大获取的知识并形成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确实为我们做各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我们在工作中能取得一定成绩的不竭的源泉。毕业之后，我们力学专业的同学们长期工作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不论在科研、教育、国民经济以及国防建设的各条战线上，都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技术骨干、学术带头人，有的同学已经成为力学以及其它学科的专家学者。远在国外的同学们，始终心系祖国，为祖国的发展与强大，欢欣鼓舞。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们没有辜负北大对我们的培养，我们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向培养我们的北京大学学校以及老师们，表示深切地感谢和崇高的敬

---

意！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喜庆日子，又是我国现代第一个大学数学系——北大数学系成立九十六周年的日子，也是中国第一个力学专业——北大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创建五十七周年的日子。我们能在这里欢聚一堂，很不容易，很有意义。我想用以下几句话来结束我的讲话：

五十年来，我们和祖国一起经历了浩劫，又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

五十年来，我们目睹了北大发生的巨大变化，愈加感到作为一个北大学子的骄傲与自豪；

五十年来，我们的足迹留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辛劳的汗水，结出了累累的果实；

尽管今天同学们青丝变成白发，我们的心底依然年青；

尽管走过的道路曲折坎坷，我们依然乐观向上；

我们都还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祝愿我们的师长健康长寿，学术造诣世人传颂；

祝愿学友们永葆青春，幸福安康；

祝愿我们的母校继承并发扬“科学、民主、爱国、进步”的北大精神；

祝愿北京大学永远是世界东方的一颗璀璨明珠；

祝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

# 小诗一束

数学一班 杨燕昌

## (一) 咏同学

### 施家荣

夜色朦胧中，常忆施家荣。	典型上海人，脸上挂笑容。
嘴唇厚且润，眉毛黑又浓。	面白如玉盘，神情特庄重。
年青很单纯，聪明有才能。	社会经验浅，心地实光明。
爱好轻音乐，琵琶尤其精。	经常去演出，普遍受欢迎。
毕业回上海，工作卢湾中。	教书几十年，岗位不曾动。
积极甚努力，教法显高明。	升为高级师，获奖更光荣。
培养人才多，成绩甚出众。	直到临退休，丝毫不放松。
教书自有乐，享受在心中。	弟子皆尊重，满面笑春风。

### 于清甫

大雪狂风寒，清甫在那边。	一晃几十年，吃苦受锻炼。
少年于清甫，微黑身体健。	唇厚脑门宽，浓眉且大眼，
诚实而善良，做事口不言。	学习肯努力，成绩常靠前。
热心帮助人，出力不偷懒。	毕业进中学，一干几十年。
辛苦与劳碌，尽力才心安。	师生关系好，讲授不厌烦。
举家去新疆，开发我边关。	跟随大部队，驻地要辗转。
落户石河子，这才把家安。	忠诚教育业，要把知识传。
荣升校长后，工作更勤勉。	辛勤育桃李，枝头硕果繁。
直到退休后，才享人间欢。	平生很知足，整天展笑颜。

### 童 武

躺在病床上，时常想童武。	身体非常棒，肩背肌肉鼓。
脑门宽又亮，聪明实外露。	鼻直牙齿白，才智似明珠。
衣服总笔挺，象个大人物。	文革遭灾祸，抄家带焚书。

---

多年得积累，霹雳掩得住。  
声高气力足，水平很显著。  
热心领朋友，看戏赏艺术。  
京城传名师，载誉在首都。

喜欢唱京剧，会戏有多出。  
声音赛宏钟，常把郁气舒。  
工作在师范，讲课真清楚。  
老来身体健，晚年真幸福。

### 陈华贤

手捧一本书，社会契约论。  
英文实在好，令人好羡慕。  
交友不太多，晚上喜散步。  
肩背肌肉鼓，漂亮神气足。  
待到再见时，文革已结束。  
说话稳且准，办事讲牢固。

全都是英文，神情挺专注。  
平时不多说，眼睛有些木。  
偶看少年像，双目神气足。  
一晃十几年，人间多岐路。  
都是成年人，成熟有风度。  
幽幽青年人，成长为大树。

### 王 理

初见王理面，尚有孩子气。  
典型美少年，活泼有风趣。  
擅长吹小号，乐队是主力。  
王理性直爽，说话无遮挡。  
提起彭德怀，不会他反党。  
从此不得意，被贬为三挡。  
远郊到顺义，心里不欢畅。  
一喜加二喜，迎娶美娇娘。  
远赴去美国，六年有些长。  
归来小环境，不是太理想。  
中年失至爱，夫人上天堂。  
爱好思国事，正义作主张。  
老来勤锻炼，身似少年郎。  
喜迎黄昏恋，未来多欢畅。

双颊红扑扑，白牙如排玉。  
喜打乒乓球，水平可不低。  
每逢节假日，结伴演出去。  
依仗出身好，直言不提防。  
有人抓住了，抓紧就不放。  
精神受打击，分配受影响。  
一心去高校，终于梦得偿。  
改革开放后，出国掀巨浪。  
学位是博士，学术有专长。  
有时不满意，牢骚防断肠。  
多年单身汉，独自对寒窗。  
遇到不平事，敢于论短长。  
关心老同学，聚会多奔忙。  
祝你下半生，福寿皆绵长。

### 唐 云

忆昔大学时，有幸识唐云。  
眼睛有些凸，嘴唇薄而润。

像貌挺普通，是个大好人。  
穿衣很朴素，生活低标准。

---

真诚而忠厚，实在且谨慎。 英语特别好，能够读原文。  
改革开放始，出国热来临。 凭借英语好，赴美梦成真。  
五年苦学习，博士高标准。 学成回祖国，展开新理论。  
投身学术界，努力朝前奔。 进入清华园，实力增几分。  
老来尤努力，可胜少年人。 关心国家事，思考特认真。  
为年级聚会，费力又劳神。 愿你老来健，永久葆青春。

### 王树禾

提起王树禾，典型河北郎。 年龄比较大，成熟又刚强。  
眼睛明又亮，胡子粗且长。 热情而实在，真诚又善良。  
声音很宏亮，说话挺直爽。 喜欢多辩论，脸红脖子涨。  
不知因何故，总是被中伤。 白专头上戴，落后圈里藏。  
毕业到中学，正好回家乡。 学生不好管，有劲使不上。  
劳累与辛苦，心梗把身伤。 时势有变化，打倒四人帮。  
全家赴科大，如鱼得水样。 从此得正果，混身是力量。  
教书和科研，两面都擅长。 几本好著作，一些妙文章。  
才智得展现，心中满阳光。 生平能如此，就是很辉煌。

### 麦结华

提起麦结华，听我把他夸。 身高是中等，肌肉很发达。  
喜欢水里游，胜赛水中蛙。 能游几千米，水性实在佳。  
数学学得好，公认有才华。 理解能深入，解难有办法。  
头脑似明珠，时时闪光华。 心气有些傲，偶把脾气发。  
临近毕业时，怒把同学打。 学校给处分，开除遣回家。  
可惜六年学，一旦全抛下。 文革结束后，从新重文化。  
再次进大学，机会要紧抓。 此时的老麦，完全成熟啦。  
诚实而稳重，率真不油滑。 埋头搞研究，成果不断发。  
坚持数十年，珍珠放光华。 早就升教授，大奖也能拿。  
最后博士导，是位数学家。 成绩多丰厚，振兴我中华。

### 卢才辉

华侨卢才辉，他来自印尼。 生得高而瘦，微微有驼背。

---

肋骨看得清，细长两胳膊。 头小颧骨凸，眼睛深陷内。  
身体甚单薄，大风能吹起。 嗓音很宏亮，颇有音乐美。  
为人很慷慨，大度不拘泥。 自己求进步，不言别人低。  
待人很诚恳，心与口如一。 劳动肯卖力，不怕苦和累。  
选入区人大，工作真积极。 分配到中学，门头沟服役。  
打倒四人帮，中国有活力。 调入首师大，积极又努力。  
才智得发挥，事业创佳绩。 多次受表彰，时时传惊喜。  
做到系主任，教学兼管理。 全身心投入，劳碌伤身体。  
晚来身多病，令人真惋惜。 多年的奉献，于国有意义。

### 王则柯

青年王则柯，美公子模样。 眉清目又秀，鼻直口正方。  
面白如玉润，神情很清朗。 戴上白眼镜，威武又端庄。  
思想很单纯，聪明有主张。 才智很出众，会写好文章。  
功课理解深，明显能力强。 毕业进中学，辗转回家乡。  
落户中山大，优势得发扬。 深造肯努力，知识面拓广。  
工作几十年，成绩很辉煌。 社会活动家，日夜苦奔忙。  
著作甚丰富，思想闪火光。 为社会进步，贡献己力量。

### 后记

抱病写了我对十位老同学的思念和理解。当然了，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老同学值得回忆，但是鉴于体力不够，也就不写了。这十位同学，有的当年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被认为是落后的，有问题的，甚至是反动的。几十年过去了，历史恢复了他们的真面目，这些同学都是优秀的人才，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当年他们只不过是要努力思考罢了。当年他们是不偷不抢不犯法，忧国忧民忧大家，只是要独立思考。青年人都是要独立思考的。

## (二) 杂感

1

家家电脑，人人手机。  
做饭煤气，上下电梯。  
铁路高速，汽车遍地。

---

国内走遍，世界旅游。

共产主义，不过如此。

2

一夜北风呼呼刮，清晨天空瓦瓦蓝。  
空气新鲜精神爽，阳光明媚心智宽。  
青山绿树颜色鲜，黄瓦红墙亮光闪。  
如此景色美如画，画中农夫耕好田。

3

地球天天转，时光滚滚流。  
世上多欺诈，人间重权谋。  
才华尽管展，好处竭力收。  
试看百年后，一堆烂骨头。

4

我的病很重，名叫帕金森。  
身体很僵硬，几乎不能动。  
有手不能拿，有脚不能走。  
有口难说话，有屎不会拉。  
一天廿四时，全身皆疼痛。  
不能出屋门，只能呆家中。  
喘气上不来，粘痰堵嗓子。  
大汗出不尽，难过热泪流。  
痛苦存心中，勉强露笑容。  
生存要乐观，努力向前挣。

---

# 我眼中的徐明曜

数学一班 杨燕昌

徐明曜是我在大学中结交到的好朋友，几十年来，相互之间来往不断，只是我在1998年得了帕金森病，不能外出了，徐明曜又特别忙，两人的来往才变得少了。

我是在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心里自然是高兴的。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大学里好好学习，不辜负大学的美好时光。我到了北大以后就和徐明曜住在同一宿舍。当时我们的宿舍里还有田自贤，曹师儒，刘永才和李欣。一进北大，徐明曜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徐明曜的热情和大度深深感动了我。我们宿舍六个人中，徐明曜和田自贤是北京的，在北京有家，一到星期天可以回家。恰巧在我到北京上大学时，我母亲也把户口迁入北京了，到了星期天我也可以回家了。这令家在外地的同学好生羡慕。徐明曜看在眼里，他分别把家在外地的同学请到家里，让他们享受在家里的温暖，用于缓解他们的思乡情结。这个我就想不到。徐明曜也把我请到家里，我只去过几次。

徐明曜的家住有三间正房，我第一次去，在他家正房里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后来为了供养徐明曜读大学，他们家把正房卖了，自己一家老小搬到厢房去住，我第二次去徐明曜家，他们已经搬到厢房去了。

在谈到我们的交往之前，先谈一下我的背景。我从小就不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而是一个胆小怕羞的孩子。在一群孩子之中，我一定是躲在一边的、不言不语的、很不起眼的那一个。我从小就不爱说话，也不善于表达。我是一个有缺陷的人，身体单薄，力气小，又不爱运动，反应特别迟缓，文娱、体育皆不行。在小学和中学我都是一个极普通的学生，只是在高中阶段比较用功，书本知识比较好而已。我从小家境贫苦，小学三年级时，父亲就去世了，我是由两位哥哥养大的。大哥在北京读书，二哥在1948年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自从二哥有了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这才改变吃了上顿就愁下顿的悲惨命运，不再为吃饭发愁了。我大哥比我大十三岁，一直在北京工作，平时极少回家。我二哥比我大十二岁，在1956年结婚，结婚以后到岳父家去住，也不大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家通常是我母亲、四哥、妹妹和我生活在一起。由于没有父亲，我家的亲戚很少，朋友很少，平时家里很少来客人，因此我在待人接物方面也很差，许多人情世故都不懂。总之，我是一个不善于交际、朋友很少的人。不过我也渴望有好朋友。

由于没有父亲，所以我小时候家境十分清苦，每天上学从来不吃早饭。有一天老师在课堂上讲吃早饭的必要性时，一向不言不语的我突然说，不吃早饭也没关系，我就从不吃早饭，

---

感觉也挺好。老师马上说，你不吃早饭还美哪，你看你瘦的那个样儿，象个小老头。当时羞得我恨不得有个地缝好钻进去。我回家后也就闹着要吃早饭，家里才给我预备一些早饭，无非是窝头等剩饭。我平时穿的衣服也是旧衣服，学习用具也是最简单的。到了 1956 年，大哥和二哥都涨了工资，给家里的钱也多了些，我们家的生活才有了真正的好转。

鉴于我以前的基本情况，在刚一进北京大学时，我的基本想法是：北大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这里有闻名全国、学有所长的教授，还有才华横溢、热情高涨、奋发有为的优秀青年。一想到能与这样的青年人共同学习和生活，我就兴奋不已。到了北大后我就发现徐明曜与众不同。首先是他极爱说话，他能与不太熟悉的同学很快地聊起来。又如在开学后，班上开的向党交心会上，他的发言能饶有风趣地讲述 1958 年他所接触到的北京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当然这些发言，因为涉及负面现象多，而被认为思想复杂，因而受到批判。我倒是认为，他能把自己所想的都讲出来，就是对党的信任，也就是把自己的真心都交给党了，这本应得到大力表扬的，实际上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徐明曜还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会拉小提琴和二胡，他的二胡拉得还是很不错的。游泳、滑冰和举重等都是他的爱好，中学时的课外知识还有天文学等。至于数学系的主课学的更是惊人了。一般来说他做作业的时间大约是别人的一半。有一次考数学分析，考题比较难，大多数同学甚至做到了中午还没做完，他却早早地交了卷。这就说明徐明曜掌握知识的扎实和思维的敏捷。徐明曜的才能使我由衷地钦佩。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徐明曜就能成为朋友了吗？这个还不够。北大数学系 59 级还有许多优秀学生，怎么没有都成为我的好朋友呢？这是因为徐明曜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他的随和、大度和宽容。徐明曜有一把小提琴和一把二胡，班上的同学无论是谁，都可以随便拿来使用学习。我也用过他的乐器练习过，只是由于太笨，什么也没有学会。徐明曜生活朴素，不拘小节，他和班里的大多数同学的关系都很好。1961 年和 1962 年，学校贯彻党中央八字方针，在大学里为一些过去受到过过头批判的人平了反，同时也提倡独立思考，学校里政治思想工作也相对宽了一些。这时徐明曜的思想也开始活动，他想为了活跃同学们的思想，就要自办一个班内的板报，用以讨论一些社会现实的问题，并写了发刊词。他说不想让团支部领导，这一下可犯了大忌，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渐渐地与他交好的几位同学离开了他，徐明曜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了。

徐明曜对我开始像对其他的人一样。徐明曜拿给我看他的发刊词比较晚，我听了他讲完他的想法以后，感到鼓励青年人去独立思考没有什么问题，也就同意了。徐明曜的发刊词写好之后立即引起了团支部和政治辅导员的注意，他们认为要独立思考就是要摆脱共产党的领导，进而也就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此后就是不断有人找徐明曜谈话，认为他思想复杂，思想反动，属于阶级立场问题。从此之后，徐明曜就陷入不断的检查、不断的思想改造之中

---

了。而且仿佛问题越检查越多，思想越改造问题越大，最后成了阶级立场问题。其实独立思考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差着十万八千里哪！

由于我和徐明曜住在一个宿舍，我们常常在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也就闲聊各种问题，渐渐地在思想上有了更多的了解，彼此更为熟悉了。徐明曜喜欢举重，他的成绩也不错，够得上运动员的级别。他经常叫我一起去北大第一体育馆去练习举重，到了那里以后，他去举较重的杠铃，我去举较轻的，彼此都能得到锻炼，他把我这个不爱锻炼的人也带动起来了。徐明曜还经常邀我在晚上散步，他给我讲解天文学知识，教我认识星斗，当然散步时也聊天，聊的内容无非是理想、学校等，漫无边际。在一起时间久了，也就成为了朋友。我们在一起时也是他讲的多，我讲的少。记得晚上有一次他大哥到学校来看他，他还邀请我同行，于是他大哥和我以及徐明曜三人一同围绕着未名湖转了一圈，尽兴而归。

在大学期间，我和徐明曜之间的关系虽然比较好，但是徐明曜还有其他许多好朋友，当徐明曜被怀疑有政治问题以后，由于害怕和徐明曜做朋友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前途，他们就渐渐远离了徐明曜。我却始终认为徐明曜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有数学才能的优秀学生，有热情和好交朋友的诚实的人，我不愿意离他而去。在大学期间我们除了比较好之外，并没有做其他的事，我也就去过他家很少几次。他的父母待人十分和蔼可亲。

大学毕业前夕，北京大学开展了四清运动，四清工作队进驻了北京大学。当时左倾得很，把北京大学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盘踞的堡垒，对学生的思想状况做了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学生们的问题多多。为了抓典型，徐明曜便成了工作队所抓的重点对象。工作队受当时极左思潮的大环境影响，主观地认为徐明曜的问题属于立场问题，属于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我们在毕业前夕，经过四十多天的毕业教育，逼迫徐明曜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是属于立场问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徐明曜受到了全年级范围内的批判，批判中称他有系统的反动思想。最后对他的处分是开除团籍，定为反动学生，不戴帽子，参加分配。他被分配到唐山五中任教，从此之后他就来到了唐山，开始在唐山的生活。

大学毕业了，大家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徐明曜去了唐山，我也分配到北京市教育局参加劳动实习。在毕业以后，我仍然与徐明曜保持了通信联系。徐明曜家在北京，到了每年的寒暑假，徐明曜就回到北京家里。我在劳动实习结束以后，被分配到了北京密云县高岭中学任教，在农村中学通常放的是秋假和寒假，放假时我也回到北京市里，这时如果时间合适，我就到徐明曜家去与他见面，相互谈一谈各自的工作和经历。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我母亲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哥也去了五七干校，家里只剩下大嫂带了一儿一女苦度时光，我每次回到北京都觉得很不方便，我也无处可去，就去徐明曜家坐坐。徐明曜的母亲于1967年去世，我去徐明曜家主要是由徐明曜的父亲接待，徐明曜的父亲也是一位热情好客的老人，我去了

---

以后，有时他叫我在他那里吃饭，我也就不客气了，而我去的时候也从不带任何礼物，因为那时我没有这方面的概念。记得有几次到徐明曜家比较重要，需要记述一下。

首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1966年深秋的一天，我闲暇无事，心血来潮，就跑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到了北大，感到校园里到处是冷冷清清，只剩下大字报的残迹了。另外只有28斋倒还热闹，围绕28斋都是关于徐明曜是如何反动的大字报，贴大字报的单位都是不了解徐明曜的外单位的人，他们所写的都是一些档案里的东西，而毫无自身的实在感受。反而是了解他的数学系59级的大字报一张也没有，我内心突然感到一阵阵的悲凉，深深地感到别人的误会之深。我想徐明曜到了唐山五中之后，五中的师生会怎样地误会他呢？我担心他在新单位受委屈，心里惶惶不安，直到见了徐明曜，听他讲了他的基本情况，才放了心。后来又听说他参加了步行串连，他是一个有闯劲的人。1967年，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徐明曜告诉我，他结婚了，女方是我们同一年级的女同学杨晚兰，我听了以后很觉惊异，因为徐明曜是外向型的人，杨晚兰是内向型的人，彼此之间有些差距，徐明曜解释说，当时他母亲得了重病，希望尽早的见到儿媳妇。我也理解了他。

自从1970年起，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是平稳发展的阶段，全国各地的革命委员会陆陆续续地成立了，并且逐步地掌握了应有的权力，社会的稳定性大大地加强了。国际上中美建交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元首纷纷来中国访问，国内五七干校的干部也有的回京了，大学也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了，出版界也出了两本书，一本是郭沫若写的《李白与杜甫》，一本是章士钊编的《逻辑学》，科技杂志也在恢复之中。看到这种形势，感觉到中国要发展科技了。于是我们讨论了徐明曜在大学毕业论文中得到的一些结果可否拿出发表的问题。因为当时无论办什么事都要政审，徐明曜因害怕政审通不过而犹疑不决，我说同编辑部联系的事由我来做，署我们两人的名字，经过了两年的漫长等待，终于在1976年得以发表。再有就是在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时，因为不知道在唐山的徐明曜处境如何，当时通讯全中断了，所以我很着急，急于知道他的消息。那年放秋假时，我一回到北京就急急忙忙跑到了他们家，我看不见徐明曜好端端地坐在家里，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下地。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徐明曜早在地震前，在放暑假时就回到了北京，他躲过了一次大灾难，我们都高兴极了。

不久，打倒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人们都松了一口气。1978年全国开始招考研究生，徐明曜当然要考回北大，但是徐明曜的所谓“政治问题”会不会对他的录取有影响呢，我们也吃不准。当然啦，文化大革命以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也不知道北大数学系的师生怎么看。为此我特地找了段学复教授和历史系的教师李志义（他是当年负责我们政治工作的主要教师）。段学复教授表示，徐明曜可以报名，考试后再讨论；李志义表示，当年对徐明曜的做法有些过头。这样我们才稍微放了心，后来徐明曜果然以优异

---

成绩考回了北大。从此徐明曜又回到了北大，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徐明曜终于走出了由于极左思潮强加给他头上的种种罪名，摆脱了由所谓“政治问题”带给他的负面影响，又恢复了本来面目。此后几十年中，徐明曜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终于成了一位学有专长的优秀学者，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回顾我和徐明曜交往的几十年，虽然我比他大几个月，但是徐明曜处处以老大哥的姿态待我，几十年来他对我的帮助多多，我却难以回报。在我的眼里，徐明曜是一位有热情，有才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人，时至今日他仍然为老同学的事不辞劳苦地奔忙。我现在已是重病缠身，几次都以为活不下去了，这次是因为大病发作，几乎死去，好容易才缓了过来。这使我意识到，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是应该总结我的一生的时候了，这才促使我决心写成此文，用以表示我对我们之间友谊的总结。

写于 2012 年 1—2 月

---

# 歌声中的记忆

——北大生活点滴

数学二班 杨振明

我从小爱唱歌。尽管变声期之后嗓子坏了，但是对音乐的喜爱及敏感度依旧。许多过去的事情留下的记忆很浅了，一些与歌声相联系的情景却清晰得多。

## 《提前跨进一九六零》

这是刚入学的半年里，我们大饭厅的喇叭里经常放的一首歌，其中的一段是：

哒哒哒我们跑、我们飞、我们大跃进，  
踩得地球噔噔噔。  
哈哈哈老黄历你慢吞吞你不中用，  
你是典型的右倾，你是典型的右倾。

多么豪迈的“踩得地球噔噔噔”！但是与那个时代的“踢翻地球”之类的革命浪漫主义壮语相比，它还是更富于现实主义精神。因为只要人们用力踩下去，地球表面总会噔噔响的。后来才知道，那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那年冬天，这一运动也来到我们身边。既然被打倒的彭大将军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罪魁，大学生身边的“粉红色道路”自然成为批判重点之一。

## 《劳动号子》

大学时期，一人领唱大家和的号子比较盛行。诸如歌剧《刘三姐》中的对歌等民间曲调被重新填词用于宣传鼓动。

别看宣委是个女将  
(一个莲花，莲花落呀嗨)，  
干起活来真叫棒  
(莲花花花莲，莲花落呀嗨)。

这是我们数二班在通州劳动时的劳动号子，是同学们为表扬自己的“宣委大姐”自编的。

---

大学几年，像她这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全班前进的同学，确实起到了榜样作用，令人难以忘怀。

嘿，同志们加油干  
(吆吆嗨吆吆嗨吆吆嗨呼嗨呼呀呼嗨)，  
三天的任务两天完  
(嗨呀呀呼嗨呀呼嗨——)。

这却不是劳动号子，而是我年级在第二教学楼召开的编写教材誓师会上，一班的一位女同学带领大家表决心。当时提出了“砸烂牛家店，火烧哥西楼”等革命口号，全系学生自己动手编教材。我记得自己被分到“复变函数”组，没有人发言时，高年级的同学还说“小同学框框少，多发表意见。”编书时安排得十分紧张，从早到晚开讨论，周末和寒假都不休息。为了帮助同学们克服怕紧张的情绪，记得有同学曾经在会上多次大声疾呼：“怎么能怕紧张，帝修反已经把钢刀架在你脖子上了，难道你不紧张吗？”但是我一直没有看到我们自编的教材。到南开大学之后，我特地到图书馆书库里找到这本《复变函数》。因为它是在“困难时期”出版的，纸质又黑又薄，封皮是灰紫色的。但是我对它还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在家里书架上摆了半年才还给图书馆。

## 《人民公社万岁》

这是由人民大学编演的一部大型合唱组曲，当时在北大流传甚广。因为旋律优美，歌词富有诗意，我非常喜爱，哼唱了几十年。下面摘录其中的几段：

毛主席描花人民绣，  
河欢人笑山点头，  
公社的明天美如画，  
携手同来画中游。

南山稻麦云里栽，  
北岭棉花四季开，  
金果累累盖山头，  
绿树中飞出彩凤来。

南北大渠两条龙，  
摇头摆尾出龙宫，

---

山腰水库银光闪，

电机扬水梯田中。

大学六年，我们与人民公社有频繁的联系。特别难忘的是在昌平涧头村的劳动生活，无论同学与社员间还是同学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亲密的。记得当时困难时期刚刚过去（1962年），我们自办伙食。由于孙建国、张饴慈等同学不辞辛苦、精打细算，劳动结束时结余不少。于是最后一天中午请大家吃牛肉馅包子，每人11个，我记得大多数男生一顿全吃了。当时我们的行装已经打好，与社员们也告别过了。可是没过多久同学们肚子里的牛肉膨胀起来。我们感觉事情不妙，生怕出现胃穿孔之类的病症，赶紧与生产队商量，又拿来些扫把在场院打扫了一阵子，让大家活动活动，放松些心情。那一次总算幸运，没出乱子。

## 《土法攻尖端》

用上述人民公社万岁的曲谱，我们二班同学自己填词了如下歌曲：

土法攻尖端白手把家建，

土电容坐上了宇宙飞船。

只要听懂了党的话，

苦干巧干啥不怕，

丰收硕果向党献。

1960年，以硅半导体的广泛应用为一个特点的“第三次浪潮”正开始风靡世界。可是在号称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却上演了一出最愚蠢的“双革四化”闹剧。我们这些“听懂了党的话”的数力系一年级大学生，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手里拿着电表，嬉笑着满世界找半导体。不管遇到什么，两个方向倒过来量量，如果电阻不同，就是半导体。记得我们实在找不到了，从实验室外拿了一小节细玻璃管，里面塞满橘子皮等等杂物，再倒些盐酸。啊，土法攻克尖端！一个新诞生的半导体终于可以献礼了。

正是此后狂热的十多年，聪明勤劳的中国人民在世界性的技术革命中逐渐落伍了。

那次双革四化运动，唯一的收获是超声波（当时被誉为“超神波”）喷头，这种把铁管砸扁后做成的蒸汽喷头，据说可以产生巨大无比的能量。后来它被学生食堂用在增量法熬粥上，熬出的稀饭都看不清米粒形状了。正是这种粥，在以后很长的困难时期内，慰藉着我们这些男同学空旷的胃脏。

## 《社员都是向阳花》

---

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  
藤儿越肥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儿越大。

这首流传甚广的歌曲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那是 1960 年冬天，困难时期已经开始了，可是我们尚没有发觉，仍然被派到十三陵新校区修铁路。任务是在山里修一条向上或者向下均为 45 度斜坡的路基。那时我们每月 34 斤粮食定量，许多男生是每天三顿共喝 11 碗粥，撑着肚皮干活。晚上住在最靠北面的一个鸡舍里，而吃饭是在最南面的村子里，干活的地方差不多位于吃住处的中点。每天八小时劳动，八小时睡眠，其余八小时正好用在三点间的路上往返行走。早晨天蒙蒙亮我们就起来排队去吃早饭，正好大喇叭里电台的农村节目播放这个歌。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开会在什么时间安排？是没有时间了，于是提出了“走路革命化”的口号。就是班干部安排好做思想工作的对象，利用来回路上时间谈心。这次劳动中，因为会编写顺口溜之类的宣传节目，我少干了些活。不过搞节目也不轻松，记得准备欢迎陆平校长视察那一次，因为领导要求把群众欢呼场面（“群众欢呼”是当时领导的原话）搞得非常热烈，我们很是紧张了一阵子。

## 《恋人曲》

“困难时期”毫不留情地来临了！我们实行了“劳逸结合”，读书的时间多了，劳动与政治活动明显减少，政治环境也宽松了起来（后来被称作“回潮”）。一些外国的爱情歌曲（主要是前苏联和印尼的）在北大校园也流行开来。记得有某中央首长女儿参加的中文系的一个女生小合唱组，多次演出抒情歌曲《西伯涅》。其中唱道：

西伯涅，树林日日夜夜都在悄悄谈着你，  
西伯涅，没有你的爱情我会死去。  
西伯涅，你像树林像海洋你像朝霞一样，  
西伯涅，天下有谁能比你更美丽。

后来我们在东操场看露天电影，是前苏联的《恋人曲》。影片讲述一对少年男女相恋故事。它的主题歌非常动听。记得我费了很大劲才找到这首《恋人曲》的词谱，其中最后两句是：

В этот вечер, ты прекласна.  
Мой товарищ дорогой.

我把它译成中文：

在这个晚上，你多么漂亮，

---

我亲爱的好姑娘。

虽然有些直白，但是自己觉得十分贴切，唱起来也比较上口。这首歌我也是时常吟唱，特别是一次在回家的火车上，我不觉地遇上了一个知音。这是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青年，跟着我一起小声唱起来。那天我们聊了很多，从音乐到生活到爱情。可惜只是萍水相逢，我连他的姓名都没有记下。类似的还有前苏联影片“心儿在歌唱”主题曲。这首歌是卢才辉同学送给我的《外国名歌 200 首续篇》上学到的。他送我这个歌本记录了大学几年间我们齐声高歌的珍贵友谊，记录着他给与我们的兄长般的关爱。扉页上的题词是：

振明同志留念：热爱歌曲吧，这会给你带来战斗的力量！ 才辉 赠 63.1.6.

这份珍贵的礼物至今仍然珍藏在我身边，珍藏在我心上，是我们同窗友情的见证。

## 《动人的舞曲》

05 13 | 54 56 | 3 - | 05 13 | 45 34 | 2 - | 05 34 | 23 72 | 1 - |  
01 45 | 6. 7 | 11 76 | 5 - | 01 53 | 25 72 | 54 27 | 1 - |

这是才辉教我们的一首印尼乐曲，2/4 拍。因为我手边没有写简谱的软件，还需要解释一句：第 12 小节的两个 1 与第 14 小节的 1 都是高音。

三、四年级时我在系学生会文化部当了两年部长，做了些跑腿工作为大家服务，其中的一项是举办舞会。舞会大多是周末在小饭厅办的，定场地、请乐队等等都有专人负责。可是有一次乐队出了问题，不能来了。当时面向全校的通知已经发出了，情急之中我把我们班罗启成拉去伴奏。因为是客串，我必须一块到场。这是我唯一一次到舞场，但是没有下舞池，而是在听音乐。罗启成的曼陀林演奏这首印尼民歌，加上电声设备的润色，实在太美了！直到现在仍然不忘当时的美妙场景，真可谓“故人已去，余韵犹存”！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系会文化部，花力气最大的活动是举办了全系文艺汇演。组织这活动那些日子，我在 28 斋楼上楼下跑了无数次。现在只记得陪系领导审查节目时他说过的一句话，“咱们的节目，无论是合唱、朗诵还是舞蹈，都有忆苦思甜。”我当时把这理解为领导对这次汇演大方向的肯定。晚会在老图书馆二楼的礼堂举行。最后一项是全系师生大合唱，由我站在台上指挥：

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海靠着山，山靠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当时自己是十分激动的，完成了一项任务，也实现了一个目标。我自幼喜欢歌唱，上初中时学会打拍子（指挥）。记得那时在上下学的路上，我时常不自觉地打起拍子来。我嘴在哼唱、脚在走路、手臂在比划，可以想像那样子一定十分可笑。直到有一次我听到路旁的一位大娘说“看哪，跳舞的小孩又来了。”我才注意收敛一些。

## 《东方红》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

无论我们站在什么岗位上，身上总闪耀着你的光芒。

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总是觉得近在你的身旁。

这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优美动听歌曲，那时在北大校园里十分流行。后来我才得知，这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一首备用歌曲，而且我们系的许多同学已经多次去参加排练了。作为在任的系会文化部长，我可以称得上是我们系最大的文娱积极分子了吧，可是连同学们参加《东方红》的排练都不知道，当然更没有参加排练演出的权利了……

后来，1966年8月17日，我作为“革命师生”到北大串连。记得当时在哲学楼教室里看到一则通知：“外地师生不要走，明天天安门广场有活动”。第二天我们参加了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幸运的是，我认出了第一次着军装的毛主席（许多人都认错了），这也算是在北大多次参加天安门国庆晚会的收获。就是这次回北大，我的一位60级同学偷偷告诉我，“你还不躲远些，大字报说，数力系文化部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其实，应当是“地主资产阶级子女当政”，因为我和系会文化部两届的副部长都符合条件。

## 休止符

看得出，我留在北大的足迹是曲曲弯弯、磕磕碰碰的。许多发生的事情在当时是大势所趋，作为普通学生是无能为力的。当然有些事也和个人的能力、性格有关系。无论如何，我毕竟走过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段路，是怀着诚实、向上的心走过来的，至今心里很坦然。

值得强调的是，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我在北大接受了中国最优秀教授团队的教导，较好地完成了学习任务，学到了为祖国、为人民工作的本领，这使自己终身受益。所以，现在我应当纵情地——

“赞美多彩青春，感谢母校北大！”

---

# 沉甸甸的校徽

计算班 杨 质

2009年5月进京参加了北大数学力学系59级入学纪念活动。许多几十年没见的老同学重新相见，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旧。此情此景不是用几句话所能表达的。回来后，总感到要说点什么，重新翻出几年前写的回忆录，择出两段发出。由于长期不写文章，词汇贫乏，加上年龄也大，思维迟钝，实在不成样子，让学兄学弟见笑。好在是当年的事情，不加修饰。

## 沉甸甸的校徽

年龄大了，记忆力也大不如从前。有时为找一样东西往往都要翻箱倒柜。

最近为找点东西，却意外地发现一个包得很好的纸包，打开一看，一枚校徽呈现在我面前。它宽不过1.5厘米、长不过3.5厘米。别针已经生锈，然而，白底上仍显示出四个闪闪发光的红字——北京大学。这四个字是毛泽东主席于1950年专门为北大题写的校名。当时，为了纪念由北京大学的革命先驱者发动的“五四运动”31周年活动，他还专门题词：“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今天，看到这枚已近五十年的校徽，一些往事又历历在目。

那是1959年秋天，我考入北大，戴上了这枚白底红字的校徽。那阵子，我飘飘欲仙，视若宝贝，一时一刻也不肯从胸前取下来。上街、进城把胸脯挺的高高的，生怕别人看不见。那种自豪和美意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校徽是一个标志。它无声地证明着佩戴者是属于哪个学校的。因此，它便成了进北大校门的凭证。一天中午，由于天气较热，我就把外套脱掉放在宿舍，也没注意校徽还在上面，便穿着衬衣到海淀去逛街。回来时，看门的大爷说什么都不让进门，登记都不行。那时，根本没有电话，就是有电话，往哪儿打呀！真急死人。所幸天无绝人之路。一会儿，过来一个我们班的同学，证明我是北大学生，是他同班同学，这才把我带进来。

校徽也是一种骄傲和荣耀。由于北大是全国最老的大学，也号称最高学府。一个山沟里的放牛娃能跨进全国最高学府，那阵子真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感觉。总觉着似乎在做梦。一种骄傲感油然而生。我是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是我们村的第一个本科生，也是我们县第一个北大生。这似乎就真的“光宗耀祖”了，似乎真的为家乡争了光。面对一些羡慕的眼光、窃窃私语及父老乡亲们的赞赏和夸奖，感觉真的有无尚的荣光。似乎真的不知自己姓什么叫什么，能吃几碗干饭。放假回家坐在火车上，走在县城的街道上，把胸膛挺

---

得老高，总觉得有无数只眼睛盯着我胸前那闪闪发亮的校徽，心里美滋滋的。

校徽更是一种责任和约束。戴上校徽外出，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要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能给学校抹黑。例如，注意社会公德，公共汽车上要让座，不能随地吐痰，不能随意乱扔东西。要时时刻刻都有维护学校声誉的责任感。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初，在学雷锋的活动中，我更是会以雷锋为榜样。例如，在放假回家的火车上，不顾旅途劳累，主动当旅客代表，为旅客倒水，打扫卫生，为旅客服务。在待人接物中，也要对得起这份荣耀和骄傲，绝不能让人说闲话。说真的，戴着它很辛苦，很累，总觉得沉甸甸的。可正是这种有了责任和约束的沉甸甸，才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了多少北大人的那种知书达礼的作风。

毕业时，学校要求交回校徽。我真的舍不得，于是，就报失，交了五角钱把校徽留了下来。这枚宝贝的校徽，我已经保存了近五十年。五十年来，我时刻不敢忘记自己是一个北大人。为了这个荣誉，不管是在原子能工业战线还是在航空火控领域，从来不敢怠慢丝毫，总是兢兢业业，刻苦奉献。虽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贡献，也算对得起这枚校徽，没给它丢过脸，没给母校抹过黑。

## 颐和园落水记

北大距颐和园比较近，这和其它学校相比是得天独厚的。

1960年，颐和园的门票还只有五分钱，可当时，这对于靠助学金生活的穷学生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于是，我们班就经常组织大家集体游颐和园。这样每张门票三分钱，就可以节省二分。每学期我们班总要去颐和园两三次。颐和园的大戏楼、谐趣园、佛香阁、长廊、石舫、铜牛、龙王庙等都是我们的常到之地。连苏州街、罗锅桥、西堤也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可以这么说，颐和园的沟沟岔岔、旮旮旯旯我们几乎全都光顾过。我到颐和园，从来没有在里面吃过东西，都是在学校带两个馒头、咸菜和开水就过一餐中午饭。夏天，颐和园游泳池开放，办游泳证就可以免门票。我们差不多每星期天都要到颐和园游泳、玩耍。

有一年五一节，大家到颐和园昆明湖划船。在那广阔的水面上，我们几个船比赛，从石舫划到龙王庙，再从龙王庙划到罗锅桥。由于天气比较暖和，同学们都划热了，把棉衣脱掉。几个男同学的船就在水上打斗、玩耍，彼此夺取船上的衣物。我们船夺得邻船的一件棉衣作为战利品。船划到龙王庙附近的栏杆旁，我们船上的四个人别出心裁，想把战利品挂在栏杆上。于是，就把船划的靠近栏杆，由其它三人稳住船，我起身把棉衣搭在栏杆上。由于栏杆太高，我用力向上一甩，棉衣倒是搭在栏杆上，但是，我却扑了个空，手按在墙上。这样，就给船一个反向作用力，小船离开了栏杆，我就“扑通”一下掉在了水里。

当时，龙王庙附近还是北京市航海俱乐部的活动基地，水比较深，大约有三米左右。我

---

落水后，一下没入水中，这可把船上的同学吓坏了，好在我还多少会点游泳，一个反力升到水面。同学们帮助着把我拉上了船。绒衣、绒裤全都湿透了。只好请女同学的船回避一下，我急匆匆地把绒衣、绒裤脱下拧拧水，还好棉衣在船上放着没湿，但裤子没有办法，只好把湿的又穿上。这一下，大家玩兴全无，就赶紧打道回校。

“落汤鸡”一般地进了宿舍。那时哪有多余的衣服，我的绒衣、绒裤还是进北大后发的冬季补助买的。我只好赶紧钻在被窝里，同宿舍的同学和班干部把我的绒衣、绒裤拿到锅炉房去烤。由于穿湿衣服受了凉，我发了两天烧，你说这是活该吧？

人生就是这么奇妙。近 50 年前的一件糗事，当时提起来都觉得不好意思。而今，想来却这么有趣。

## 宝贵的“一厘钱”精神

这次北京聚会，得知徐献瑜先生已经九十九岁高龄，身体健康，思维清晰。本想去拜见，又怕打搅先生。回来后总有点什么在心里窝着，重翻回忆录时，发现当时写的这个小段，现补充发出，以慰其心。

北大的学制，理科各系是六年制，文科各系是五年制。一九六四年春节，毛泽东和王海容（毛的表哥的孙女）有一个讲话。说：学制太长害死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指示传到学校，要马上贯彻执行。我们的前一届（58 届）只剩半年时间，没法缩短，仍旧六年毕业。我们这一届（59 届）提前半年改为五年半毕业。下一届（60 届）以后就正式改为五年制。所以，我们要压缩半年课程，把一年的课程压在半年内授完，于 1964 年寒假毕业。

我们班在五年级又分成计算方法和程序设计两个专门组。我选了计算方法，由于时间的压缩，在 1964 年上半年就要把常微分方程计算方法和偏微分方程计算方法同时开设。而且，还停开了概率与统计计算方法等。微分方程计算方法是我们计算方法专业的重头课。要在半年时间学习微分方程方面国内外主要的成熟的计算方法及其目前研究进展情况，其学习任务之重是可以想象的。我们除了吃饭和睡觉时间外几乎所有时间都泡在教室和图书馆。

最后一学期是作毕业论文。我们的毕业论文几乎都由教授和副教授来指导。我和周口的老乡是一个题目，由我国计算技术的权威徐献瑜先生指导。题目是“贝鲁利方法在运输问题上的运用”。这是一个运筹学问题，就是最优运输问题。而运筹学计算方法我们又没有学，所以，作这个题目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徐先生既是我们计算数学教研室主任，同时也兼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三室主任。他每周在教研室上三天班，到计算所上三天班。他很忙，每周只能见到他一次。汇报进展情况，对一些问题进行答疑。开始，他给我们看了一篇苏联科

---

学家在召开的国际计算方法研讨会上宣读的“贝鲁利方法”介绍(俄文)，而且尚未公开发表。我们既要学习运筹学计算方法，又要仅仅靠这篇简介认真研究弄懂“贝鲁利方法”的实质。我们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查阅、翻译了大量的俄文和英文资料，基本上了解当前国际上有关运输问题计算方法的进展情况，同时，对“贝鲁利方法”进行研究和分析，确定其在最优运输问题上的应用。然后，编制程序到中科院计算所的 104 计算机上去解算。最后，撰写毕业论文，进行答辩。

徐先生是五十年代从美国回来的计算技术权威。他不仅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而且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在给我们授课时就反复强调“一厘钱”精神。现在，给我们指导毕业论文仍反复强调“一厘钱”精神。对于我们计算工作者来说，节约、节省是我们的天职。我们的责任就是尽可能精确地设计计算，如果我们能节约一厘钱，那么，对一个大的工程项目将会节省成千上万，对一个国家那又要节省多少钱。所谓最优运输问题就是采用最优方案组织运输，使得运输里程最短和费用最低。在实际的运输中，重复运输和空车行驶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无形中就增加了费用。“贝鲁利方法”就是一个实现最优运输的算法。

在徐先生指导我们的过程中，曾发生过一件至今难以忘怀的事情。一天下午，我俩在燕东园徐先生家的书房里。先生正在给我们讲解时，可能由于先生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也引起耗子的兴趣。这时，突然发现一只大耗子也在瞪大眼睛，聚精会神的在听讲。它可能也被先生的“一厘钱”精神所感动，要在鼠界开展“一厘钱”运动。这是先生的“知识产权”，怎能让鼠类盗去。“抓住它！”先生一声令下，师生三人一场围攻耗子的战斗打响了。首先关闭门窗，采用围、截、堵、打的战术，务求大获全胜。于是，沙发下、小床下、书架后、书桌后，三个人围攻堵截。先生也不顾年近六十的高龄，也爬在床下用拖把去戳耗子。耗子的战略思想很实用，它一会儿钻在小床下，一会儿躲在书架后，同我们打游击战，它到一个地方后，就抓紧时间休整，而我们则全力围攻。当我们重新发现它时，它又马上转移阵地。它是以逸待劳，我们则穷于奔波，顿时筋疲力尽。最后，我们只好暂时休战、整顿，研究新的战略。它则利用这个机会，从容的从一个很小的出水地漏管道突出重围，逃往室外。这次战斗以我们的失败、耗子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理论问题解决后，就要在计算机上实现。利用徐先生兼计算所三室主任的有利条件，我们使用了当时国内最好的计算机 104 机。104 是我国第二台计算机，是仿苏联的 Б С М4。第一台是 103，仿苏联的 Б С М3。我们班其它同学的论文都在 103 上实现。当时的计算机都是裸机，所有的程序都用机器语言来编写。从内存分配、程序输入、10 到 2 的翻译和 2 到 10 的翻译及程序运行、计算、数据存储记鼓、输出打印等都是由编程者自己完成的。徐先生指定三室两个同志作为我们编程辅导。我们能比较快的完成上机计算任务，也确实应该感谢关娴先生（著名数学家关肇直先生的妹妹）等两位老师大力帮助。

---

# 县长、警官和记者帮我们

## 找到了同窗好友张忠旭

计算班 杨 质

我和张忠旭是 1959 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的同班同学，又是河南老乡，而且做毕业论文时我们两人还是同一个题目，师从我国计算技术权威徐献瑜先生。从 1965 年 4 月离开学校后，我被分到位于北京远郊的二机部第 401 研究所，他被分到位于北京市内的二机部第九研究院。虽然同在北京，但是南北相距甚远，交通又不便，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文革”后，有一次从第九研究院的一位老同学那里获悉，张忠旭已离开九院调回河南老家了。后来，我也由于家属问题，从北京调回河南，到位于洛阳的三机部第 613 研究所工作。

我们二人虽然同处河南，然而，一是由于各自工作忙碌，二是由于当时通讯落后，彼此仍然无法联系上。其间，虽然曾拜托同事到周口出差的机会，代为打听，但是，茫茫人海中，何处寻觅？屡经努力，仍音讯皆无。

退休后，闲暇时间多了，加之年龄越大，对过去的人和事思念越多。尤其是晚上，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从眼前闪过。1998 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见到了几十年没见过的许多老同学。相互间思情、叙旧，有说不完的话语。可是，仍然没见到我的老乡同学张忠旭，甚感失落。今年，我们年级的老同学，举办了一次很有意义的入北大 50 周年纪念聚会，聚会上又没见到他，实在是深为遗憾。当时我们班的许多老同学，向我问询忠旭的情况，我又从何而知？于是，我向老同学们表示，寻找张忠旭同学的任务，当然落实到我的头上，我责无旁贷。自 5 月份从北京回来后，就千方百计努力寻找他。

6 月中旬，我更新了计算机，与同学们的联络就更方便了。受到外地孤儿到洛阳寻亲及最近网上炒得火热的“人肉搜索”的启发，我突然萌发在网上寻找的想法。但如何找，把帖子发给谁呢？我就在网上搜索了周口市和商水县的有关网站。发现商水县设了一个县长信箱。但那是方便全县人民对县上建设和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及反映问题的，明确说明对纯属个人问题、与党和政府职责无关的问题不予处理。我思忖，寻找老同学算不算纯属个人问题？说实在的，确实与党和政府的职责关系不大。不管如何，我已无他法，只好硬着头皮试一试了。于是，7 月 25 日向商水县县长信箱发了如下电子邮件：

尊敬的县领导：你们好！

---

我是航空工业洛阳 613 研究所的一名退休职工。本不该为这点小事打搅日理万机的领导，然而，我虽通过各种渠道都没能解决问题，故只好麻烦领导帮忙。

我想寻找家在商水的一位近五十年未见面的老同学，他叫张忠旭，1959 年我们一起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1965 年 1 月毕业，他分到二机部第九研究院，我分到二机部北京 401 所，从此没再见面，据说，他在 1971 年前后调回商水。现在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人到老年，倍想老友。再次感谢领导。

杨质

2009. 07. 25

邮件上还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函件发出后，我就天天查看邮箱，企盼回函。8 月中旬，就在我几乎失去信心那几天，突然，于 8 月 18 日下午收到了商水县公安民警的一封简单的电子回函：“杨老：看到信后与民警郭警官联系！”并附有联系电话。我喜出望外——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我当即与周口市的郭警官电话联系，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我所知道的张忠旭的情况及我的迫切愿望。并对郭警官表示感谢。郭警官要我把张忠旭的照片发给他。我就把我保存的张忠旭的单人照和我们同宿舍的四人照翻拍了发给他。郭警官来电话说，照片不够清晰，因为他想把照片登报或者上电视。我几经周转又想法找人把照片重新翻拍，将高质量的照片发给郭警官。

照片是 8 月 23 日下午发出的。24 日上午十点左右，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端问：“你是杨质吗？”我回答“是呀！”没等我问，那端就说：“我是张忠旭。”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就是张忠旭，就是我多年要找到老乡、老同学。我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地跳起来。我眼睛湿润了，声音呜咽了。我们聊呀，聊呀，竟忘记这是长途电话。我们一直聊了近半个小时。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今天一早就有几个朋友给他打电话，说今天《周口晚报》上登了有位五十年没见的老同学找他。不久，记者、郭警官等许多人都到他家来了，他说已经轰动了周口市。

下面是周口晚报在社会版刊登的记者报道：



张忠旭（右一）杨质（右二）

分别 50 年，张忠旭你在哪里

洛阳七旬老人急寻北大同窗

周口晚报 2009-08-24 周口/社会

□晚报记者 李伟

**本报讯** 日前，洛阳一位名叫杨质的七旬老人，发电子邮件至商水县人民政府县长信箱，请求帮忙寻找 50 年前分别的北大同学张忠旭。县长杨珺当即安排县人事、劳动、档案、公安等有关部门查找，但因年代久远，线索含

糊不清，均未发现张忠旭个人档案资料。为帮助杨质老人达成心愿，商水县公安局郭警官昨日向本报求助。

杨质，航空工业洛阳 613 研究所退休职工，1959 年与张忠旭一同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1965 年毕业时，张忠旭被分到二机部第九研究院，杨质被分到二机部北京 401 所，从此两人没再见面。后来杨质听人说，张忠旭在 1971 年前后调回河南商水县。据杨质老人回忆，那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的河南考生有杨质、张忠旭等三人，他们同寝室的四人（图二）有雷功炎（北京人）、周铁坚（沈阳人）、张忠旭（右一）、杨质（右二）。在校期间四人情同手足，无话不谈。毕业论文答辩时，杨质与张忠旭的论文题目不谋而合，都是《贝鲁利方法在运输中的运用》。1999 年学校百年校庆时，同学们纷纷回到学校，却没有见到张忠旭。今年他们入学 50 周年纪念日，杨质老人又一次赶到学校，直到庆典结束也没有见到张忠旭的身影，老人深感失落。

人到老年，思友日甚。明年就是他们的恩师徐献瑜教授 100 岁寿辰。杨质希望能联系上张忠旭，一起赴京为恩师祝寿。

张忠旭（图一 1964 年照片），你在哪里？你还好吗？老同学想你啊！望知情读者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8289999 或与商水县公安局郭警官联系，电话：13938075958。

线索提供 郭利军

在 2009 年 8 月 25 日的《周口晚报》上又刊登了找到张忠旭的报道如下：

### 张忠旭找到了

周口晚报 2009-08-25 周口 / 社会

晚报记者 李伟 / 文 晚报记者 朱海龙 / 图

**本报讯** 68 岁的张忠旭老人怎么也没想到 50 年前的北大同窗会这么“兴师动众”地找他。昨天，在周口市区黄河路边一个小小的独院里，面对记者和带记者前往的老同事，张老难掩激动心情，拿着报纸一遍遍读着那些熟悉的同学名字，眼眶悄悄地红了。



其实早在张老看到报纸之前，就有不少看到报纸的同事、朋友和家人给他打电话了，一个上午，平时颇为安静的家里的那部座机突然就成了“热线”。

“从毕业到现在，我的确没和我的（北大）同学们见过面，也没有联系过。”

张老黯然道。和同学们失去联系是有原因的：张忠旭 1965 年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工作，

单位有严格的保密纪律，基本不允许工作人员与外界联系，等到1969年调回老家周口（当时是商水县周口镇，这就是杨质求助商水县找张忠旭的原因），张忠旭的同学们已各奔东西，很难联系到了。

张忠旭申请从北京调回的原因是父母疾病缠身，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他要尽心照顾二老。回到周口后，他先在原周口镇人民银行工作，为了不让自己所学专业荒废，1978年他申请调往原周口一中（现周口市职业中专）任高中数学教师。6年后，作为周口少有的北大毕业生，他被任命为原周口市机械电子工业局副局长。可是，对专业念念不忘的张忠旭终究没有在这个位置上干到退休。1995年，他又申请调往市职业中专，再次当起了数学教师，在这里，张老走完了人生的工作历程。张老说他一辈子没做出什么大的成绩，这也是他不愿意和同学们联系的一个原因。

昨天，牵线人、商水县公安局的郭警官告诉张忠旭其老同学杨质的手机号后，张忠旭当即拨了过去。带着激动心情，两位老人聊了27分钟，说同学、谈老师、讲以前的同窗趣事，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因杨质刚动了手术，正在家休养，两人约定，等杨质身体康复了就见面，好好叙叙。明年恩师徐献瑜的百岁寿辰，他们一定携手前往。

张忠旭告诉记者，他有三个女儿、两个外孙，家庭幸福美满。现在，他和老伴祖秀英两人独住，他天天坚持锻炼身体，身体很硬朗，除了眼花什么毛病也没有。张老很自豪地说，每天早上出去散步，他都能走四公里以上。

从记者的这篇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忠旭离开北京后的大概情况。

张忠旭的有关信息如下：

张忠旭当年在北大的学号：5901030 现在的电话：0394-8390990 15936934113

Email：Zhangmengonline@yahoo.com.cn

住址：河南周口市黄河路城市信用社家属院 邮编：466000

原单位：河南周口市职业中专

至此，我寻找张忠旭的任务宣告完成。从记者的报道中我也知道了商水县县长的名讳杨珺和公安局民警的名讳郭利军及《周口晚报》记者的名讳李伟、朱海龙。还有许许多多不知道名讳的好心人。我们要感谢他们，若不是他们的大力帮助，不知道我们老同学还要相隔多长时间，甚至可能成为终生遗憾。感谢，至诚的感谢。除此，我找不出其他可以表示我的心情的词汇。

目前由于一些原因，尚不便外出，一旦方便就将亲赴周口，一来与老同学见面，畅谈五十年的离别之亲；二来亲自去拜访、感谢帮助我们的郭警官和李记者等好心人，并当面致谢。

---

# 文理双全的杜珣老师

力学班 姚玉霞

在北大读书时杜珣就是我崇拜的老师之一。2009年的同学聚会我有幸得到了他精心编写的书《中国历代妇女文学作品精选》。在几次通话和面谈中，感到他太了不起了。除了在数学力学领域有极高的水平外，令我惊喜的是他在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如果说在1996年他出版了《现代数学引论》是水到渠成之事，那么他从1994年开始在北大开讲了全校公共选修课《中国妇女文学史》真是不可思议。更令人吃惊的是在2000年他出版了《中国历代妇女文学作品精选》一书（900多页），这是他十多年收集、研究、辛勤工作的结晶。他几乎查阅了北大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所有的有关资料，从先秦到民初各代的8000多位才女中精选了1000位女作家的2230篇文学佳品。为帮助读者欣赏和研究，书中对录入作品做了注释，满怀激情地对作品做了精彩的评说。杜教授在该书后记中写道：“经过了多少年的日日夜夜，书稿终于写成。每当心力交瘁，神志迷惘之际，冥冥中似有许多熟悉的才女在呼唤，催促我快把书编出来。因为我深知，发掘和展现历代优秀妇女文学精品，为埋没、受屈的才女们扬名吐气，弘扬中国妇女文学，实在是刻不容缓之事。而我自己才疏学浅，年老体弱，只凭一片痴心和责任感编写此书，只能起点摇旗呐喊，抛砖引玉的作用。”我以为，一个人能对文学有研究，编写出文学方面的书，或者能编写出理工科方面的书已非易事，而我们敬爱的杜教授能文能理，在文理方面都能著书立说，并且达到很高的水平，表明杜教授有过人的聪明才华，超人的刻苦钻研的高贵品格。我感到他没有学不会的学科。他学一门，专研一门，爱一门，同时都会有与众不同的新发现、新见解。只有像杜教授这样有才又有德的人才能满怀激情地读书、写书，生活在他读书的美好世界里。

我以有这样文理双全的优秀老师而感到无比自豪，也以此文表示对杜教授的崇高敬意和致谢。敬仰他不为金钱，只为尽一份责任、满腔热情地、数十年如一日地艰辛工作，感谢他为抢救、弘扬、发展中国古、近代妇女文学这部分文化遗产所做出的贡献。

如有在天之灵，古、近代的各位妇女作者（无论其作品录入还是没被录入）都会以有这样的后辈知音而感到欣慰，终有这样的慧眼为她们说公道话，为她们传诗扬名。在天堂的各位女作者一定会感谢为此付出二十多年艰辛的杜教授，会护佑他平安，健康！

至今杜教授仍不分日夜地在收集，研究，整理中国古、近代妇女的文学作品，准备在原作的基础上增加几百位才女的佳作再版，想用自己仅有的积蓄出书，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学友能助他一臂之力，使他几十年的心血不白费，使他为弘扬中国妇女文学的高尚理想得以实现。

---

# 回忆与感悟

力学班 于晏悦

1959年8月21日，收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北京大学学生会在给新生的欢迎信中写道“热烈地欢迎你，欢迎你成为我们大家庭的一员”，“当秋风送爽的时候，北大校园将沸腾着我们相会的欢笑声。”

1959年，中国沿海北端的大鹿岛，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三人考取了大学。我就读的安东孤山中学（后来由郭沫若先生题写了校名）的校长决定，专程带领考取大学的毕业生到沈阳，再分赴各自学校。我带着64元钱（生产队借支40元，打工挣得24元），于8月29日离家，跟随校长于8月31日到达沈阳，9月1日只身到达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坐在迎新的校车上，亲眼目睹天安门、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等，兴奋不已、激动不已、幸福不已。下午一点多进入学校，在大饭厅前接待站报到，正式成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去宿舍楼28斋的路上，在三角地邮局前的一张方桌上堆积如山的信件之中，意外见到小学、中学同学（高中时转学北京）的祝贺信。走进宿舍楼，见到迎新的谈兴同学，他个子高高，一表人材。他热情地送我到159室。

入学五十周年聚会时，雷广玉对我讲述谈兴、何春发等同学英年早逝的情况，非常惋惜、非常遗憾。数学力学系59级入学时有二百多人，加之如北京大学生物系、北京铁道师范学院、扬州师范学院、东北林学院、辽宁大学等学校的代培生以及高年级复读生，先后在59级学习过的同学多达二百五十多人。据50周年聚会筹备小组统计，已有十九人告别了人世。我们期盼活着的同学，活得更长些、更好些；期望有更多同学的信息；期望有同学更多的信息；期望毕业五十周年能再相聚母校；期望我们的老师更健康长寿；期望我们的母校更加辉煌！

进入北京大学，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晚饭后，一个人信步在校园内，目不暇接，走走瞧瞧，瞧瞧走走，被美丽、迷人的校园景色迷住了。坐在未名湖畔，湖光塔影，令人陶醉。当时塔称之为水塔，至于未名湖，不知道是湖名，还是湖尚未命名。但联想到《白蛇传》中提到的西湖断桥，不是断了的桥，实为好桥却名为断桥，断定湖名为未名湖。断桥、未名湖这类奇特的名字，不知是什么高人所为，更不知为什么如此命名。坐着、想着，竟将当晚举行学生干部会议之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待想起后又一时找不到宿舍楼。我忐忑不安地敲开辅导员周巢尘老师宿舍的门，准备接受一次狠狠的批评，准备做一次深刻的检讨。令人意外，第一次见到的周老师竟然笑了，只将会议内容说了说，对我未参加会议事却只字未提。

---

我很内疚，心想北大的老师竟这样特别，暗下决心，今后要倍加小心。周老师还给我批改过几次数学分析作业，受益匪浅，终生难以忘怀。遗憾的是，分别后再也没有见面。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格外高兴。

1959年10月1日，国庆十周年游行，我们几十个人举着关于总路线的木制宣传架。当我们经过天安门时，正值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家都停下了脚步，高呼毛主席万岁，完全忘记了游行中不得停留的规定。

三年困难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吃不饱。学校为使同学们能计划用粮，开始用饭票，后改用饭卡。到月底总是有个别同学没饭吃，涂改饭卡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时任二、三年级辅导员的焦中林老师，要求学生干部每月能节省一、二斤粮食，以备个别同学月底没饭吃时，予以支持。他每月却节余三、四斤，大家劝他要注意身体。他总是笑着说，他人瘦饭量小，吃不了那么多。由于绝大多数同学都不肯接受他人的接济，我们的备用粮食基本上还是属于自己。每到月底，都特别留意同学们的吃饭问题。记得有一次月底晚餐时间，我到宿舍转转，发现一位同学躺在床上，原来是已没有饭票了，我坚持要他一起去学生三食堂吃饭。记得那时我还有2斤多饭票，原想晚餐吃个饱，但他只肯吃2两，害得我也只好跟着吃2两。次日早餐时，我刚进食堂，他竟把一个馒头塞进我的饭碗里。

四年级时我任党支部书记，似未设辅导员。1964年7月力学专业高年级学生迁到昌平分校，其后两年辅导员是雎行严老师。他为人厚道、实在，同学们视他为兄长，称之为“大雎”。记得有一次，张重珠弟弟来分校，借住我的床。我准备住在雎老师宿舍，可是晚十时多，已熄灯了，大雎仍未归，情急之下、无意之中，我用我宿舍的钥匙竟打开他宿舍的门，违背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定论。进屋上床就很快入睡了，次日清晨醒来，两人相视而笑。他问我怎么进来的？我问他何时回来的？那时大家都年轻，如果是现在，会鼾声不断，不可能一夜相安无事。他是老师，也是兄长，如果不是兄长式的老师，学生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私自进入老师的宿舍的。分别后虽有三次见面，每次均是匆匆而过。1965年7月毕业前夕，雎老师、许国复和我曾有过一次合影。入学五十周年聚会时原想再合个影，以做比较，但未如愿。

1965年8月23日11:58，在送走同学们之后，和林德生一起乘坐167次火车离开北京，结束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六年大学时光。1965年9月与吕洪生先后到位于哈尔滨的军事工程学院报到，10月14日到齐齐哈尔榆树屯某部锻炼。1966年4月，学校集体转业。1970年学校南迁到长沙，1978年学校更名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我于2007年1月，定居广州。

## 师长的风采

大学期间，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大约有三十多位，他们为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

---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开学了，著名数学家闵嗣鹤先生任数学分析大课主讲教员，同学们都非常激动和振奋。张恭庆、马希文老师分别是数学分析、解析几何习题课的任课教员，这两位年轻教员的精彩讲授，受到同学们的交口称赞。特别是在清华大学参观教育成果展览时，看到他们的毕业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时，更是兴奋。北京大学把大师和优秀青年老师安排到本科教学岗位上，特别是给新生讲课，实是高明之举。

1960年春天，在大饭厅召开大会，批判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马老坐在台上。其实当时大家也不知道对错，只是感到批判会有些人身攻击的味道。其后，据说朱德委员长要来北大视察，为的是使中央首长了解所谓“民意”，大、小饭厅外面树木之间的绳子上挂了许多要求人大罢免马寅初校长职务的大字报，同学们对此颇为反感。不久马老被迫辞去校长之职。后来从有关资料得知，在1957年人大四次会议上，“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正式提交大会。1958年5月起，大规模讨伐“新人口论”。但马老在《重申我的请求》中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二十多年的冤案，终于在1979年平反，马老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在北京大学庆祝百岁诞辰。马寅初校长是捍卫真理的楷模，同学们以校长为骄傲。

大学期间，因为担任一些学生工作，与系领导有些接触，受到很大教育。1963年1月，学校第五次党代会期间，与系主任段学复先生、副主任程民德、张芷芬先生等分在一个小组，我做记录。多次有幸聆听先生们的发言，非常受启发和教育。有时听到精彩处，竟忘了记录，坐在我旁边的张芷芬先生经常提醒我。第一次小组会，段学复先生慢慢地拿出一个小包，对我说，我胃不好，要吃块饼干，你不要介意。程先生笑着说，你边吃边发言。当时心想，有学问的人就是与众不同。毕业后，在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见过程先生一次，当时丁石孙先生也在。当我说程先生时任系副主任、丁先生教代数时，丁先生说老师最高兴的事是若干年以后他教的学生还记得他。这次见到张芷芬先生，她已八十二岁高龄了，还在做学问，每周还坚持游泳，令人惊讶、令人羡慕、令人高兴。她说，那时段先生、程先生年龄较长，段先生有病，系里的一些杂事，诸如劳动、分专业等事都由她出面，和你们接触多一些。见到你们很高兴。张先生布置安排劳动时，总是告诫我们要实事求是、劳逸结合、注意安全。

1963年6月，系进行分专门化动员，张芷芬先生做简单动员，然后由各专业老师介绍情况。记得有一位微分方程的老先生在黑板上划了一个大圆圈，说微分方程就像这个大牧场，其它数学分支都只不过是从其中猎获一个不同的动物罢了。他的发言使我想起1959年新生入学介绍专业时，董铁宝先生举例讲，用嘴抽面条，面条之运动就是一个力学问题。他们的话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会后张芷芬先生嘱我一定送这位老先生到家。一路上他侃侃而谈，

---

其中谈到力学就是数学的具体应用，一定要把数学学好等等。他家是一处平房，屋内灯光很暗，当他家人问我能否找到宿舍时，老先生说，最简单的办法是沿原路返回。

1964年8月31日—10月26日，殷有泉老师带领刘金风、林德生和我，到上海908部队实习，先头去上海安排实习的是王仁先生的研究生陈裕泽。殷老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又将一切事务都承担起来。他在上海南洋中学华侨学生宿舍中借了一间房，师生四人同住。其间大约有半个多月，我咳嗽得很厉害，晚间更严重些，严重地影响了老师和同学睡眠，我甚感不安。我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看中医，得知其女儿是北大中文系学生时，与医生竟没有了陌生感。他告知咳嗽期间不吃鱼，会好得快些。实习单位食堂经常有海鱼吃，对于海边长大的人而言，实是令人高兴，不能吃鱼是很大的遗憾。为了治病，为了不影响大家的睡眠，只好不吃鱼了。殷老师和同学都安慰我，并戏称：我们会习惯的，如果你不咳嗽了，可能我们还会睡不好呢。对老师和同学们的体谅和宽容，永志不忘。

当时实习单位保密非常严格，下班后，一切有关资料都须交回保密室，实习结束离开时连有关的一张纸都不许带。殷老师要求我们晚间必须到办公室学习、看资料。9月初，上海秋老虎，对我们北方人而言，有点闷热难当。10月下旬，每逢下雨，夜间又有点寒意。晚间徒步返回途中，到一位卖汤圆大嫂的小车前吃两三个汤圆，算是夜宵。有一次周日，殷老师和我们一起去欣赏黄浦江，并合影留念。正兴致勃勃之时，却有一位少妇滑进黄浦江，几位警察下到江边将她救了上来。当晚没到办公室，也未去吃汤圆，次日这位大嫂说昨晚她等了我们许久。其后我们每天晚必定去吃她的汤圆，边吃边唠嗑。由于预估的破坏（失稳）载荷偏高，做试验那天双方的指导老师刚离开去食堂吃中午饭，试验件就失稳了，幸好我们还抓住了一些应变数据。试验做完了，但报告难写，因为理论与试验结果相差太远。殷老师推荐一个半经验公式，与这次试验结果相当符合。我们很高兴，但殷老师说，一个试验结果比较符合，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必须有一些试验结果作对比。对方破例将以前其他大学实习队的试验数据交给我们，其试验结果与该公式均较符合。部队方的指导老师非常高兴，希望我们毕业后能报名来上海她们单位工作。

1966年10月，我们几个年轻人，好不容易到北京串联，被安排在北京小学吃住。次日我们到北大，住在读研究生的张中驥、章本照、周南等同学的宿舍。在北大期间，看见学生押着王仁先生上楼，我上前与先生打个招呼；看见张恭庆先生扫马路归来，上前问好，并请保重。见到沈立先生，想起一年级寒假期间，要新生参加编写教材，我很感奇怪。沈先生对我说，有机会和老师多接触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开会老师讲些什么，现在已没有印象了，只记得每晚吃一顿夜餐。五年级教结构力学，他与同学关系密切，经常与大家一起参加体育锻炼。他请我去勺园吃饭时，嘱咐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小心。当得知他中毒牺牲，同学们都非常惋惜和悲痛。

---

1977年5月，在北京给航天部办冲击和振动随机数据处理讲习班期间，一天我十分冒昧到了王仁先生家。他放下笔，不让我自我介绍，很快说出了我的姓名。王仁先生给我们讲授过弹性力学，是陈敏媛和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接触多一些。但十多年后还能认出，令人惊讶。我怕打扰他，坐了一会，准备告辞。他要我多坐一会，陪他聊聊天。他讲了对贺大拙和李永池的印象，并回忆两次去中科院要贺大拙来北大工作，但均未如愿的情况。又拿出杨升田写的书，询问了杨的一些情况，并让我有机会转告杨，他一定会好好看的。做毕业论文期间，他和他的研究生和我们一起作试验，随和得很，平易近人。当理论结果和试验结果相差很大时，他安慰大家，不要急躁，多想办法。最后采用一个与试验结果比较接近的理论公式。王仁先生还针对我担心论文水平不高的问题，讲了他的意见。1994年4月2—9日，他应邀参加国防科大的“211工程”初审，任专家组副组长。10日，送先生上飞机时，他把不能带上飞机的一个蓝色的小刀交给我，嘱我有机会亲手还给他，并期望北大百年时能再见面。遗憾的是，百年校庆时，他正在国外，不能归还他的小刀。直到他去世，再也没有机会相见，小刀竟成为怀念先生的珍贵之物。

1996年7月20日，这是59级毕业后力学专业同学第一次较大规模聚会。在集会前，见到是勋刚老师、邓成光老师。是勋刚老师时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力学组成员，我借此介绍了我系申报博士生导师的情况，他听了后并表示会认真地对待。记得李永池插话请求对中国科技大学的申报人选也予以注意，是勋刚老师笑了，风趣地说，凡是科技大学的申报人选，我都会认真考虑，你们可以放心，不过标准不能降低。邓成光老师见面第一句话是“你们专业办事的，你还认得我吗？”我心里想，你平时是很和蔼的，但却是我在北大学习期间遇见的最严厉的先生。1965年毕业前夕，组成临时党支部，主管毕业教育、毕业鉴定和毕业分配等工作。当得知邓老师任支部书记，我和许国复任党支部委员时，很感不安。担心邓老师会太“左”，但事实与我们想的完全相反。第一次支委会，邓老师说，要在完成派遣计划的前提下，尽力将分配方案做得合情、合理，使多数人认可。在毕业工作中，邓老师十分注意政策，十分重视了解同学们的实际情况。毕业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受到同学们的肯定。2008年春节期间，在广州得知邓老师病重的消息，感到心痛和惋惜。

除以上提到的先生外，至今仍有深刻印象的还有：冷生明先生（数学分析）、吴兰成先生（常微分方程）、黄文彬先生（塑性力学）、吴望一先生（流体力学）。

## 同学之情谊

大学六年间，同学们在学习、生活、劳动、社会活动中，相识相知，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相互鼓励，建立了一种纯洁的同学情谊。几十年过去了，大家仍然相互惦记、相互牵挂。一旦有需要，大家都会予以帮助。2005年9月，我和老伴去看望一位同学，看到他们生活

---

十分拮据，回来后对几位同学说了。2007年春节，杨柏坡建议，给他凑点钱去，以表示同学的关心。我和许国复不敢惊动太多的人，仅和几位同学说了说。令我感动的是，我给栾霖打电话时，他正在城内处理其父的丧事。他的夫人骆秀红（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表示她一定会转告栾霖，他们寄去3000元。如今，这位同学工资提高了，生活有了改善，同学们都感到很欣慰。

大学期间，我们先后在大饭厅、小饭厅用餐，开饭时间从11时到13时。没有饭桌，同学们只能站着吃饭。饭厅如同今天的超市。因我们宿舍距饭厅较近，打好饭后，边走边吃边唠嗑。有时还会专心收听感兴趣的校广播台之广播，也会认真收听播音员数学三班刘彦瑞的悦耳的声音。后来在第三食堂用餐，食堂内有一些饭桌，却没有凳子，同学们常常在食堂外面用餐，还不时能见到在北大蹲点的教育部部长杨秀峰之身影。1963年7月搬到十三陵分校后，才能够在食堂里坐着吃饭。用餐是同学们交流的好时机，食堂是交流的好地方。2009年5月18日，董玉印夫妇在学生五食堂请尚未离开的几位同学吃饺子，大家边吃边谈，回忆往事，感慨万千。

大学一、二年级，社会活动和劳动特别多。其中有1959年9月12日为期一周的校园庶务劳动；11月22日为期一周的通县猪场劳动，天寒、风大、劳动强度大，对大家是一次很大之考验，所幸的是可以吃饱饭，其后的劳动都在不能吃饱饭的情况下进行；1960年3月26日为期一周的东北旺苗圃劳动，与劳教人员一起。风大，砂土飞扬，脸上总有一层厚厚的土，就是清晨起来也不例外；1960年4月，十三陵劳动，我和一位临时辅导员分在计算班一个组，还有一张合影；大兴劳动，天不亮下地，天黑收工，住在老百姓家，但其家有什么人，长的什么样，均不知道；1960年10月17日至11月12日，在十三陵参加修铁路。劳动快结束前几天，数学一班方肇满去世了，使这次劳动留下深深的伤痛。返校后，不少同学出现浮肿，还有一些同学患了肝炎；1961年6月6日至8月15日，力学专业同学十三陵鸭场下放劳动。其它还有校园的几次劳动，几次麦收劳动。社会活动，诸如国庆节、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和狂欢，到机场欢送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持枪冒雨游行支持亚非拉反帝斗争，支持西哈努克等等。还有班上组织的如王府井百货大楼卖货。在这些活动和劳动中，同学们相互关心、相互照顾、相互帮助，表现出深深的同学情谊。

凡是由我负责的劳动，均请王继志同学负责女同学的有关事情，她从未推辞、从未有怨言。印象最深的是，在十三陵鸭场劳动时，我是临时团支部书记兼管生活，许国复是团支部副书记。场方职工对女同学穿短裤有些议论，当刘书记对我讲起此事时，我不以为然，认为城里女孩子穿短裤比比皆是，既凉快，又青春。并表示没有理由禁止。负责在十三陵地区下放劳动的校医院小王护士来检查工作时，告诉我这里女孩子没有穿短裤的习惯，应该尊重当地的风俗。一位李姓的老职工，对我说，要入乡随俗。这里是北京的远郊，是乡下，应当了

---

解老乡的习惯。你们在鸭场劳动表现很好，大家都很喜欢你们。给大家说说，大家不会有意见的。他的一席家常话，使我顿开茅塞。我只好对王继志同学说了，她说那好办，不穿就是了。从此以后，女同学都穿起长裤和裙子，一道亮丽、青春的风景消失了。

1959年冬天，批判系领导林建祥“右倾机会主义”。比如批判“共产党员要当好铺路石子，让社会主义大车奋勇向前”是机会主义，我认为此话也没什么错。开大会时我常常打瞌睡。时任党支部书记的58级周言恭同学对我讲：你没有经过政治运动，讨论会多听他人发言，自己少讲话。对有的问题一时想不通，慢慢想，不必讲出来。你是新生，不发言，别人也不会注意你。开大会要坐在我旁边，我会提醒你以免打瞌睡。他的直白，令人肃然起敬。我很庆幸遇见这样一位好人，使我懂得了许多道理。大学一、二年级，周言恭任58级、59级党支部书记。大学三年级，辅导员焦中林任党支部书记。大学四年级，我任党支部书记。大学五年级，周言恭任力学专业58级、59级和60级党支部书记。大学六年级，61级的蒋祥军任力学专业59级、60级和61级党支部书记。

1960年4月29日中午，系党总支副书记韩启成对58级李景文和我，宣布系决定我们“半脱产”二年，即在二年内除完成一年的规定学习任务外，还要专职担任一定的社会工作。1960年7月放暑假前，28斋北门外一个小黑板通知经高教部批准力学专业学制改为六年制，心里很不高兴。1960年9月2日，吃了辅导员从其老家带回的一个梨子，得了急性肠胃炎发高烧住院一周，又耽误了一些课程。生病住院期间，许多同学来医院看望。不少同学或者把他们的课堂笔记放在我的病床前，或者特意抄一份课堂记录给我。11月14日突然通知取消“半脱产”，要我们自行决定，或随班毕业，或随下年级毕业。这期间，我缓修材料力学和俄语，要随班毕业，必须通过材料力学和俄语的考试。通过俄语考试问题不大，材料力学完全没有接触过，有相当的困难。在同学们的鼓励下，决心随班学习。在自学材料力学时，贺大拙和李永池是我心中认定的老师，许多同学都给予过指点和帮助。柴振彝同学将在旧书店购买的别辽耶夫的材料力学借给我专用。毕业时，他把这套材料力学送给我纪念。我确确实实地感到这是一份珍贵的纪念品，从北京到哈尔滨，再到长沙又到广州，很多书都卖了，但至今仍保存着这套材料力学。同学的关怀和热情帮助，至今不能忘记。

1960年春天，一天中午起床后，发现我放在窗外的仅有的两双解放鞋不翼而飞，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急急忙忙试穿同学的鞋，还未穿好，杨柏坡和林德生已从宿舍对面百货店买回一双布鞋。大家立即出发赶去上课。

1960年10月17日至11月12日，四个系部分学生奔赴十三陵参加修铁路。每个系派一人出任副团长，我负责收集各系同学对伙食的意见和建议，负责发放补助粮和临时机动饭票。数学力学系59级除女同学和数学一班散住在老乡家外，其余的百余名男同学都住在一个很大的废旧仓库内。天不亮起床，天黑才回来，往返要几个小时。领队陆玉英让我负责招

---

呼大家起床和就寝，这是一个苦差。没有表，难以完成这个任务。当时只有极少的同学有表，借表是很难启齿的，心里很烦。百般无奈，决定去昌平镇买一个闹钟和手电筒。路上遇见林碧珠同学。她笑着说，我知道你去干什么，不用去了。你用我的表吧。我问她怎么知道此事，她只是笑。我非常感动，无言以对，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带表，但白天不能带，只夜间带。怕劳动时把表弄脏了、弄坏了，更怕弄丢了。因怕睡过了头误了起床时间，夜间几次醒来。就是这只夜光表，使我得以较好地完成叫醒大家起床的任务。但还是有一次，一觉醒来，已经晚叫大家近二十分钟了，但同学们没有怨言，急急忙忙赶到工地食堂用早餐，又急急忙忙赶到工地参加劳动。

1963年深秋，一个夜晚大约二时许，阵阵惨叫声把大家惊醒，同学们纷纷跑出来，原来是分校大车队发生一起凶杀案。当有人将伤者抬上卡车时，不知谁喊了一声，请几位同学随车帮忙，顿时七、八位同学跳上车，鉴于当天有考试，我并没上车。但一看全是我们59级同学，我也上了车。大家上身都只穿个背心，站在卡车上，迎风吹来，还很冷。到昌平医院后，医生大讲革命人道主义要求我们献血，我予以拒绝，怕时间过长，大家会感冒，况且当天还有考试。院方与校本部联系，希望学校决定让我们献血。值班校领导（据院方称是教务长）在电话中询问了一些情况后，让我们立即返校，准备考试。

1965年5月1日夜，参加天安门狂欢，2日清晨两点才回到分校。已是相当疲劳了。但在章本照的极力鼓动下，章本照、刘志富和我5月2日徒步去八达岭，往返一百多里。徒步过程中，在据传是当年穆桂英点将台上，用午餐，特别兴奋。又正值开往居庸关的火车缓缓驶过，与乘车的同学们招手欢呼，一派美景。在登长城过程中，还有幸欣赏到某同学留在城墙上的诗句。四十多年之后，章本照仍然保持当年的朝气。数学力学系59级入学五十周年聚会，是第一次年级聚会，是一件盛事和喜事，办的很成功。筹备小组的功劳永远铭记于同学们的心中。力学专业京外同学的聚集，在杨庆曾、许国安的领导下，章本照功不可没。他以许国复为顾问，尽宣传鼓动之能事，召集大家，又不厌其烦，精心安排食宿。毕业五十周年之聚会，章本照同学定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六年是一段不短的时光，况且这期间又不是一个和谐的年代。同学们相互之间有些摩擦、不愉快，一定在所难免。有的同学受到伤害，甚至受到严重伤害。如今我们都已步入老年，对曾伤害过的同学应该主动表示歉意，相信也一定会得到谅解，消释前嫌。

老年人要做一个喜悦的人，相信大家都会很赞成，但不容易做到。我们要尽力做一个会喜悦的人，尽力做一个使他人喜悦的人。也许只有这样，才会健康长寿！

写此文以纪念在北京大学读书的美好时光，并趁机道出心中对母校、对师长、对同学的感激之情。

---

# 我的职场二三事

数学三班 余耀伟

我于 1965 年从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邮电部第一研究所工作，由此时直到退休，都是在邮电部门从事电信通信设备研制和科技领域的研究管理工作。这期间有着许多令人难忘的事件，在此撷取其中二三事与大家共享，为的是留下一段人生美好的记忆。

## 下放劳动

文革期间、即 1969 年至 1974 年的五年间，我被下放到邮电部上海通信设备厂劳动。最初的半年是在仪表车间当一名普通工人，后来厂领导看中了我的北大数学系学历，很快就把我的提拔到厂部工艺科、计划科从事生产管理工作。我先后从事过标准化例行试验计量管理，担任过元器件车间、热处理表面镀复车间、动力车间、电传机和载波系统设备车间的计划员。一句话，工厂所有车间（除新产品开发外）工种的计划、管理、生产、调度我都做过，尤其是复杂庞大的载波系统的生产全过程，从生产准备、投料、加工的全过程直至销售、售后服务等一系列工作，我都能得心应手。其中就有机会应用我的数学基础知识，把全厂主要车间的各个工艺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管理得有条不紊，每年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在这五年中我学到了不少企业管理的理论和知识，并有一个很好的实践平台，可以放开手脚施展自己的能力。同时使我很快的实现了从数学专业到通信专业的角色转换，学到了一些通信理论知识，经受了实际工作的锻炼，为我此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参加我国卫星通信网的规划和组网建设

从 1974 年起，邮电部决定恢复邮电科研机构，我又回到了邮电部第一研究所从事通信科技研究工作。此后不久，正值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在最高层开始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为了解决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之间没有直接通信联络手段的问题，美方决定将其设在关岛美军基地上的军用卫星通信地球站搬至上海，临时安装在上海虹桥机场的一角。尼克松访华后，周恩来总理决定用 50 万美元把这个地面站买下来，交给我们作为学习研究的实验基地，通过消化吸收、从而开发研制我国的卫星通信设备和建设我国卫星通信网。我有幸成为这支科研队伍中的一员。刚起步时我们还仅仅是一个研究小组，我被任命为该小组的副组长，从此我们从无到有、白手起家，开始了艰难而又具有开创性的探索与研究工作。

---

**学习阶段。**由于这支队伍大多数科研人员都是从事短波通信技术研究和设备试制工作，而卫星通信使用的频段是微波频段，我们又缺乏微波通信基础理论知识，更缺乏卫星通信系统设备研制技术与经验，于是我们除通过书本知识学习外，还请来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原院长林为干教授到我所讲授微波基础理论，最主要的是详细讲解马克斯维尔微分方程在微波通信中的应用。

在这一阶段中，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美方卖给我方的卫星地球站系统设备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与研究，并对国际电信联盟、国际卫星通信组织所有的有关卫星通信技术规范系统指标和设备技术性能深入研究分析，所有这些都对我们下一阶段的设备研制、网络规划和地面站网络设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总体方案设计中我协助总负责人进行协调，还专门负责分工对地球站系统的电话终端设备和地球站不停电（UPS）系统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最终完成地球站这两个分系统的技术设计。

此外，我们还通过派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即派出技术代表团到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访问学习，或请有关国家国际组织的技术代表团来华，到我所讲学，进行技术交流。我参加了大部分代表团的接待陪同工作，从中学习到不少卫星通信技术知识。

**试制阶段。**我们在学习研究基础上，不断扩大卫星通信科研技术队伍，从原来的研究小组扩大到卫星通信研究室，我被任命为研究室副主任，短短几年内即完成地球站系统设备各分系统的研制，其中有关设备可以替代进口设备，为我国仅有的两个国际卫星通信标准站提供设备更新维护备件。我多次带领科研人员往返于北京上海这两个站为其提供技术服务。

**“753”工程。**卫星通信是一种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具有覆盖面广、通信质量好、稳定可靠、一次性基建成本低等优点，非常适用于洲际通信和我国偏远地区尤其是新疆、西藏、内蒙、贵州、云南等地理环境恶劣的地方与中央的通信。为建立我国的卫星通信系统，上海市科委于1975年3月成立卫星通信工程办公室，我被临时调到该办公室工作。办公室的任务是，具体负责协调全市从事卫星通信的科研、设计、制造有关科研机构、工厂和大专院校。我们一所则负责工程的总体方案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后因种种原因工程没有实施，而是转由邮电部负责。

**方案论证。**关于国内卫星通信网有两种技术方案，一种是以四机部石家庄十四所为代表的网络技术方案，主要技术规范为我国独立系统，不与国际技术规范接轨；另一种网络技术方案是以我所为代表的要与国际网络技术规范接轨互通，并完全按国际规范建网的方案。经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多次方案论证会，反复论证比较，最终一致通过了我所提出的我国卫星通信网络规范和技术指标系统。参加方案论证的有邮电部、四机部、国防科工委、七机部、总参通信兵部等部门的卫星通信科技专家和管理人员。我有幸作为邮电部的代表之一，直接参加了通信论证。

---

**租星试验。**为了验证已通过的总体技术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经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由国家科委牵头，由邮电部、四机部、通信兵部等参加的“租星试验”——“交响乐”卫星试验，即中、德、法三国有关部门共同利用由德、法联合发射的“交响乐”卫星进行实地卫星通信试验，以验证我们所设计的我国卫星通信规划总体技术方案。邮电部一所是这次试验的总体设计和协调单位，我直接参与了试验全过程的组织协调工作，来往于上海、北京、内蒙古呼和浩特等地，于短期内在呼市建立了供试验用的10米口径无限卫星通信地球站。试验过程中，先后进行了电视传输、电话终端、数据传输、标准时钟等试验，结果证明我们的设计方案是合理、可行的。最后由中、德、法三国联席电视会议一致通过试验，完满结束。这个方案成为今后我国建设卫星通信网的蓝本。

## 我国卫星通信地面站网络建设

有了一个合理的可行的卫星通信总体技术方案，下一步就是组织实施了。根据我国国情，邮电部决定先行建立卫星电视接收站，并同时先行建设新疆（乌鲁木齐）站、北京沙河站（中央站），作为国内卫星通信地球站建设的第一期工程。我所承建全国各地数十个卫星电视单收站（TVRO），这样可以在短期内解决我国边远地区在第一时间接收中央电视台各套节目。我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包括设备制造、工程安装、委派科技工程人员奔赴第一线，很快就使像西藏阿里昌等一些其他通信手段无法解决的边远地区，直接收看到了中央电视台节目。

此外，我直接负责承包石油部广东湛江西部纳田的卫星地球站的建设任务，从商业谈判、合同签订、工程实施、总体设计、设备配套到最后的竣工交接，此项工程成为了当时广东的优质工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和考验，这一直接成果至今都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记忆。

## 几件值得回忆的事

在我退休前的几年，我转任教育处长，负责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和职工在职教育工作。由于工作有了成绩，1995年被评为邮电部教育先进工作者。

被聘为地区人民政府办事处的教育委员会委员和科普工作委员会委员，为地区义务教育和科普工作出谋划策。

发现解放前国民党市党部特别办公室（现我所内第一幢红砖楼房），现已作为上海市保留的有纪念意义的建筑。

为上海电视台的一个综艺节目策划并直接参与了一个“过把瘾”的节目，将巴金的一篇散文“鸟的天堂”搬上银幕，还到上海华东医院探望病中的巴金并向他献花。

---

# 关于 59 级力学班文体活动的回忆

力学班 岳曾元

## 一、引言

大学的六年生活，除了严肃的政治运动，紧张的业务学习，频繁的劳动锻炼之外，也还有轻松活泼的一面，那便是文娱体育活动。倘若把大学六年生活比喻为一部交响乐，文体活动便是其中轻松活泼的乐章和乐段。这些文体活动也和整个社会生活相映成趣。

以下的回忆将以原一班及流体班的活动为主。

## 二、社团活动

许多同学参加过一些校级的社团活动。以下只是一部分例子：

校合唱队：岳曾元，金德圭

校舞蹈队：张彬，裴楷华

校话剧队：陈敏媛

校朗诵队：高同璧

校田径队：朱蔚文，姚玉霞

校游泳队：徐明瑜

校滑冰队：张重珠

校乒乓球女队：程怀凯

.....

此外，原一班及流体班各类球赛的主力队员是：

篮球、排球：柴振彝，康德全，朱蔚文，牟宗泽，……

乒乓球：金德圭，唐燮黎，柴振彝，许国安，岳曾元，……

## 三、每个时期的典型歌曲

1959 年刚入学时

有关十年大庆的歌曲，如“歌声震荡着万里山河，山河也唱起欢乐的歌……”等。

---

### 1959 年至 1960 年

毛主席诗词大合唱。其中《七律 长征》，《菩萨蛮 大柏地》等几首曾在全校推广。校合唱队的演唱曾参加 1960 年初在展览馆剧场举行的首都高校文艺汇演。

### 1960 年夏

配合“列宁主义万岁”的学习，校合唱队演唱两首歌颂列宁的歌曲。一首是

“当我们迎接黎明的曙光，当我们出发去远方。

当我们展望美好的未来，我们就想起伟大的列宁……”

另一首是

“我们高唱着赞歌，歌唱伟大的导师列宁……”

### 1961 年

电影《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插曲（瞿希贤作曲）：

“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亿万人民是一个整体。

同甘苦，共呼吸，团结友爱最亲密。

一人有事，万人相助，舍己为人不遗余力。

一处困难，八方支援，颗颗红心连在一起……”

歌剧《洪湖赤卫队》插曲：“洪湖水，浪打浪”等。

### 1962 年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光未然词，瞿希贤曲）：

“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海靠着山，山靠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民解放的新时代。

看旧世界，正在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

我们是山，我们是海，

我们砸碎的是脚镣手铐，我们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 1963 年

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

电影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 1964 年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许多唱段，例如

“我们这一代，豪情满胸怀。走在大路上，东方扑面来。……”

## 四、联欢会，文艺宣传及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

---

## 1959 年

十一天安门晚会。

通州劳动：原一班晚会上，同学们唱了许多歌曲。如杨庆曾唱了

“妈妈你别担心，姐姐你别担忧。光荣服兵役，不过三五秋。

门前的小桃树，转眼过墙头。桃树结了桃，归来把桃收。”

程怀凯唱了俄罗斯民歌“纺织姑娘”；王书惠唱了一首湖南民歌；岳曾元唱了一首电影《红霞》的插曲。……

在劳动结束的联欢会上，一班的节目有一首歌（配词：岳曾元，演唱：岳曾元、刘金凤等）是

“一碗白菜汤，两三个窝窝头。

炊事班的饭菜真可口，干起活来有劲头。

哎嘿哎嘿呦，干起活来有劲头。”

二班的节目有一首歌（演唱：李永池，许国复等）是

“木料重，堆成山。运输距离二百米远。……”

## 1959 年除夕联欢会

马希文老师也来参加，还买了水果糖给大家，并在会上宣布解析几何考试百分之百得了优。杨民安振臂高呼：“党的教育方针胜利万岁！”大家跟着高呼。

大饭厅等待新年钟声。校舞蹈队在台上伴着民歌跳舞，张彬在其中。

新年钟声响时，一片欢呼。紧接着便响起“开门红，月月红……”的歌曲。

## 1960 年

当时，年级和各班都有宣传队。配合政治活动和劳动，常常需要即兴发挥，临时创作。

下面是一些例子：

3 月 8 日，在二教上大课前临时向女同学祝贺三八节：

“跃进声中庆三八，女同学心中笑开花。

男同学个个心头乐，向你们热烈来祝贺。……”

5 月 4 日，在小饭厅，技术革新总结会。这年春夏，大搞“城市人民公社”。年级宣传队配合宣传，念一些报上的报道等。如

“稀奇稀奇真稀奇，这不是李家他二姨……”

夏天，去大兴劳动，社里为同学们准备了许多大西瓜。宣传队即兴演出：

“咱村的大西瓜，哎咳呦，又甜个又大。

党的关怀真周到，吃了干劲大。”

10 月份去十三陵修铁路。劳动强度大。粮食开始紧张。这次劳动后期，一些同学已出

---

现浮肿。但在革命精神鼓舞下，依然斗志昂扬。每天收工前的一段时间体力最感疲劳。这时，宣传队常常会来鼓劲。杨庆曾已面带浮肿，仍以嘶哑的声音高喊：

“第五连，是猛虎连……”

还有一位外系的女生，以嘹亮的嗓音高唱：

“哎——，同志们加油干，呦呦嘿，呦呦嘿，嘿嘿呀呼呀呼嘿呼嘿。

三天的任务两天完，嘿呦呀呼嘿呀呼嘿。”

### 1960年底

开始实行劳逸结合。大饭厅经常演电影。除了一些革命传统教育的影片如《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南海潮》，《小刀会》等，还演一些外国电影如《白夜》，《奥赛罗》，《阴谋与爱情》等。

### 1961年

流行的文学作品有《创业史》，《红旗谱》，《红岩》等。

这年最流行的电影是《洪湖赤卫队》。其中插曲“洪湖水，浪打浪”家喻户晓。北大校合唱队也排练演出了歌剧《洪湖赤卫队》。

这年夏天有一件全国瞩目的大事，即第 26 届世乒赛。不但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荣国团，丘钟惠的名字家喻户晓，就连一些外国球星的名字(荻村一治郎，星野，高基安等)也耳熟能详。大家也很喜爱解说员张之的精彩解说。

这年夏天我们去十三陵鸭场劳动。刚到的第一天，一些同学参观了十三陵水库纪念碑，上面有郭沫若题的一首诗：

“……领袖带头挖土，

人民不亦乐乎。

三山五岳齐欢呼……

遑遑五字垂千古，

曰十三陵水库。”

看了这首诗的同学回到驻地给其它同学背诵。唐燮黎把“不亦乐乎”的“乎”字发音成“虎”，引来大家善意的笑声。当晚，男同学模仿解说员张之的风格，互相开玩笑。章本照的绰号“本照一治郎”由此得名。

1961 和 1962 这两年，由于经济上仍处于困难时期，政治上则处于两次大的运动之间的间歇时期，无论是文艺方面，还是人际关系方面，都显得相对地轻松。校刊上出现例如对中文系李观鼎和阎纯德友谊的报道。对 154 宿舍的报道也是在这个时候。

记得当时在 154 宿舍流行的课外书，不但有《革命烈士诗抄》，也有蒋和森写的《红楼梦论稿》和曹靖华写的散文集《花》等。

---

这一年还举行过一次面对全校的业余歌咏比赛。我班一些同学去当了听众。有一位参赛的女生，以一首“三杯美酒敬亲人”夺魁。中文系女生小合唱，演唱的是“红梅花开”和“红罗兰，紫罗兰”……

### 1961 年除夕联欢会

154 宿舍演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节目：一个来自火星的代表团访问地球。杨庆曾扮演团长，用一种奇特的“语言”致词。岳曾元任翻译，对代表团成员一一介绍：“……这位是火星绿色冶金公司总经理朱毛亮先生，这位是火星著名歌唱家兼舞蹈家徐老表女士……”

### 1962 年

文化生活继续活跃，大饭厅有时演一些有争议的电影，如《运虎记》。在三食堂中文系的墙报上，有一期专门是对这部电影的讨论。

这年五一节，力一班在香山开了一次班会。这是入学以来少有的全班一起旅游加联欢。会上同学们玩游戏。一些同学表演了节目，如张庆华，刘志富合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蔡扶时摇头晃脑地唱印尼歌曲《划船曲》：

“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姑娘啊我要和你见面，向你诉说心中思念……”。

### 1962 年除夕联欢会

在哲学楼某教室。吴望一老师也应邀参加，并演唱了一段京剧（青衣或花旦）。王能伟也唱了一段京戏（老生）。

### 1963 年

这一年一件大事是学雷锋。北大中文系创作了歌颂雷锋的长诗：

“穿过风啊穿过雨，父兄的旗帜多明丽。

穿过雨啊穿过风，父兄的脚步多坚定。……

柔波荡漾的团山湖啊请来作证，雷锋和你一样纯洁透明。

弓长岭上的不老松啊请来作证，雷锋和你一样挺拔坚贞。……”

到十三陵新区后，固体班也朗诵过这首诗，由陈敏媛和栾林领诵。

这年暑假搬到十三陵新区。同学们到附近登山。大家还参加了建操场的劳动。除了大的田径运动场外，还有一些阶梯式的球类运动场。各班之间经常举行球赛，同学们热烈围观助兴。后来，又修了游泳池和滑冰场。

为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系会开办了文艺室，并播放一些从本部借来的民歌唱片等。一些同学利用周末步行到十三陵水库去游泳。

抒情反特故事片《冰山上的来客》上映，雷振邦作曲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风靡一时。

与此同时，社会上批判风又起。电影《不夜城》，《林家铺子》遭批判。

---

### 1963年除夕联欢会

周培源，张芷芬前来看望。张彬表演电影《小刀会》里的一段“弓舞”，由程怀凯，姚玉霞伴唱。

### 1964年

流体班创作演出的快板书“理发赞”（由岳曾元创作，蔡扶时，金德圭，许国复，徐贵水，刘志富演出）曾在不同场合演出，并在校一级的业余创作评比中得到好评。开头和末尾的两段是：

“竹板一打呱哒哒地响，听我把一件好事讲一讲。

好事总有千千万，单来表表咱们班上的理发店。

理发店，虽然小，创业的历史可真不少。……

理发的事情不算大，我们听的是毛主席的话。

今天是，人人争把红心练，

看明天，我们齐接革命班，革命班！”

这一年，又开始强调阶级斗争。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上演，《舞台姐妹》，《早春二月》遭批判。

这年文艺界一件大事是排练和上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其中一些唱段得以广泛流传，如胡松华的“赞歌”，王昆的“农友歌”（“霹雳一声震乾坤……”），邓玉华的“五彩云霞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等等。

这一年在北京又搞了一次京剧现代戏的观摩演出，其中的《芦荡火种》即文革中样板戏《沙家浜》的前身。

这段时期，流体班几位同学（金德圭，唐燮黎，柴振彝，许国安）的乒乓球艺大有提高。这年冬季，在新浇的冰场上，靳志国同学从不会滑冰，硬是练会了速滑。

### 1965年

这年春夏之交，在十三陵新区开了运动会。黄敦老师还参加了赛跑。陈靖齐同学热心当裁判。……

## 五、结语

以上记叙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是粗线条地勾画出我们大学期间文化生活的一些方面。但愿能唤起大家对青年时代的美好回忆。

---

# 关于力学专业 59 级大事的回忆

力学班 岳曾元

## 第一学期 (1959 年 9 月至 1960 年 1 月)

### 课程

数学分析 (闵嗣鹤, 张恭庆)

解析几何 (张锦诚? , 马希文)

俄语 (张敬铭)

### 体育

### 大事

迎新大会 (校长马寅初讲话, 未名湖上放焰火)

校园劳动 (修草坪)

十年大庆 (参加十一晚会)

通州劳动

八中全会文件学习, 向党交心, 检查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找了几位同学作典型, 进行集体帮助 (批判)。

在级主任的鼓动和布置之下, 同学们一个晚上贴了马希文老师许多大字报, 批他的所谓“白专道路”。

## 第二学期 (1960 年 2 月至 1960 年 7 月)

### 课程

数学分析 (闵嗣鹤, 张恭庆)

解析几何 (张锦诚? , 马希文)

理论力学 (吴林襄)

俄语 (张敬铭)

### 体育

### 大事

---

先代会（杨民安当上了先代会代表）  
教育革命：数学分析课上，某年轻教师打断闵嗣鹤，由他接着讲；理论力学课，由年轻教师讲“火箭动力学”；俄语课，改学《列宁主义万岁》。  
技术革新：全校大搞超声波；找半导体材料；系办工厂。  
大搞卫生：28斋走廊画满壁画，各宿舍交换被子，书架调整……  
批马寅初“人口论”，陆平兼任校长。  
本学期劳动很多（东北旺苗圃，学校食堂……）。

## 第三学期（1960年9月至1961年1月）

### 课程

数学分析（冷生明）

理论力学（吴林襄）

专业俄语

### 大事

十三陵修铁路

困难时期开始，一些同学得了浮肿

开始实行“劳逸结合”；大饭厅常放电影；党组织直接抓生活

焦仲林当了年级主任

传达“60条”

开始“甄别”：原级主任来向八中全会文件学习期间受批判的几位同学道歉

学习毛选四卷，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 第四学期（1961年2月至1961年7月）

### 课程

数学分析（方企勤）

理论力学（吴林襄）

普通物理（章立源）

材料力学

### 大事

十三陵鸭场劳动

---

## 第五学期 (1961 年 9 月至 1962 年 1 月)

### 课程

复变函数 (汪诚义)

普通物理 (章立源)

线性代数 (王萼芳)

常微分方程 (石青云)

## 第六学期 (1962 年 2 月至 1962 年 7 月)

### 课程

复变函数 (汪诚义)

普通物理 (章立源)

振动 (王大钧, 丁中一)

普通物理实验 (秦裕容)

## 第七学期 (1962 年 9 月至 1963 年 1 月)

### 课程

流体力学 (吴望一)

弹性力学 (王仁, 张家康)

数理方程 (任朝佐, 沈国钧)

普通物理

普通物理实验

### 大事

苏共 22 大

“反修”开始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发表。

## 第八学期 (1963 年 2 月至 1963 年 7 月)

---

### 课程

流体力学（吴望一）

弹性力学（王仁，张家康）

数理方程（任朝佐，沈国钧）

哲学（刘录）

流体力学实验（风动，水动）

英语

### 大事

学雷锋

“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

陆平作搬迁十三陵新区动员报告，段学复作解释。暑假搬家

暑假期间劳动（东水峪），去部队锻炼等

## 第九学期（1963年9月至1964年1月）

### 课程

气体力学（杜珣）

水波理论（黄敦）

黏性流体力学（陈定亚）

英语（沈一鸣）

### 大事

建校劳动（修操场等）

“一评”、“二评”等陆续发表

新年晚会，周培源，张芷芬来看望大家

## 第十学期（1964年2月至1964年7月）

### 课程

气体力学（杜珣）

气体波动（黄敦）

湍流（是勋刚）

---

讨论班

英语

**大事**

第二次鸭场劳动

周末到长陵饭馆帮厨

## 第十一学期 (1964 年 9 月至 1965 年 1 月)

**课程**

生产实习：沈阳飞机厂（黄复华带队）；水利科学院（是勋刚带队）；大风动

生产实习总结

**大事**

学习“九评”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 第十二学期 (1965 年 2 月至 1965 年 7 月)

毕业论文

毕业鉴定

听领导人报告（彭真）

毕业分配

---

# 你可曾记得

——为纪念入学 50 周年老同学聚会而作

力学班 岳曾元



朋友

你可曾记得

收到录取通知书

那激动人心的一刻。

你可曾记得

迎新晚会未名湖上的焰火。

你可曾记得

为迎接十年大庆

学唱的第一首歌：

“歌声震荡着万里山河，

山河也唱起欢乐的歌。……”

你可曾记得

通州劳动的场面

和晚会上同学们唱的每一首歌。

你可曾记得

大饭厅里的新年钟声。

---

你可曾记得  
三食堂里放映的《青春之歌》  
和那句使你骄傲的台词：  
“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叫余永泽。……”

你可曾记得  
每一位老师讲课的风采  
和同学们课后的相互切磋。

你可曾记得  
十三陵修铁路时的情景：  
挥汗如雨，担土爬坡。

你可曾记得  
困难时期窝头的香甜  
和碗底那一口疙瘩汤的亲切难舍。

你可曾记得  
十三陵鸭场的姑娘小伙，  
哼着“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的小调：  
“六月里来天好热……”

你可曾记得  
十三陵新区阶梯式的运动场  
曾是我们亲手建设。

你可曾记得  
图书馆里自习时的鸦雀无声  
和运动场上球赛时的你争我夺。

你可曾记得  
毕业聚餐时的四喜丸子，

---

和分手前卖了报纸，买了沙果，  
在操场的平台上海阔天空，东聊西扯，  
就这样结束了六年的大学生活……

五十年光阴似箭，  
五十年日月如梭。  
当年的满头黑发，  
如今已银装素裹，所剩无多。  
当年的少男少女，  
如今已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莫感叹壮志未酬，雄心未果，  
你曾经奋斗，你曾经探索，  
你曾经耕耘，你曾经收获。

莫感叹人生曲折，道路坎坷，  
你曾经一次次降服困难，  
一次次驱走病魔。

莫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抬头看，却正是晚霞绚丽，夕阳似火。

让记忆的彩虹  
穿越过时空的阻隔。  
把我们重新带回到大学的生活。  
又听见未名湖畔的书声朗朗，  
又看见俄文楼前的树影婆娑，  
仿佛又回到那青春岁月，  
仿佛又回到那当年的你我……

此时此刻，  
让我发自心底的祝福

---

抵达你敞开的心窝。

祝愿你活得幸福美满，

祝愿你活得健康快乐。

祝愿你活得轻松自在，

祝愿你活得从容洒脱！

今日我们有缘万里来相会，

明天又各奔天涯海角，他乡异国。

却依旧是在地球村的不同角落，

同享着阳光灿烂，

共赏着月里嫦娥。

当我们有缘万里再相会，

希望你依然健康，

依然快乐，

依然幸福，

依然洒脱！

---

# 燕园三首

力学班 岳曾元

—

燕园柳老仍飞絮，  
塔影斜阳似旧时。  
燕子衔得未名水，  
洒入莱茵惹相思。

—

追梦依稀五十年，  
温馨往事未如烟。  
碧波曾照惊鸿影，  
芳草重温四月天。

—

昔日湖边邀明月，  
今昔他乡照无眠。  
阅尽天下风景秀，  
最难忘处是燕园。

---

# 回忆的珍珠连连串

数学二班 张葆丽

看了几位老同学的回忆文章，勾起了我沉睡了近五十年的回忆。

浏览一下自己几本日记，往事如珍珠般翻滚出来，五光十色，什么颜色都有。对于那些黑的、灰的回忆，一笑了之，因为早已释然；那些五彩缤纷的，则要珍藏于心，让它们永远温暖我的未来。

整理一下照片，发现不少可宝贵的。

现在把回忆的零星往事写一点出来、把一些照片发送出去，与同学们分享。

## 稀里糊涂进了北大数学系

1959年7月23日日记。经过几个月来的紧张学习生活，今天终于得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大家记得吗——我们的高考是这一天结束的。）

7月24日日记。要是考不上，我一定抓紧时机，到农村去。（高考的感觉应该比平时在学校里的考试要差一些，当时我不懂。）

8月17日日记。通知书来了——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我家兄弟姐妹八个，我是老六，又是女孩子的第四个，家里从来没有给我读书上任何压力、升学上任何指导，我又非常闭塞，不知天高地厚地填报了北大这个系，没想到竟然被录取了。）

8月底。我孤身一人来到北京。但是……

9月4日日记。现在我能够写下些什么呢？无线电系让我第二天去办公楼报到，说要把我转到别系，这我倒没有什么顾虑，只是希望赶快固定下来，赶快适应新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昨晚邓\*\*与李\*\*的谈话，太使我感动了。……要不是这个时代，我怎么能读大学呢？

（刚十八岁的、小地方来的一个小姑娘，到了这个全国的最高学府，第二天就被请进了办公楼，我能说什么呢？我敢问为什么呢？）

就这样，我成了学号5915\*\*\*而不是5901\*\*\*的数学力学系的学生。

## 大学日记内容多是政治教育和劳动

1995年8月，毕业三十年校友聚会座谈会上，莫国端发言说：“三十五年前我们高高兴兴地来到北大，三十年前我们灰溜溜地离开北大，今天我们又高高兴兴地回到北大，这

---

是否定之否定。”他那海南岛口音幽默的一番话引起了大家哄笑，这笑声中有多少辛酸、多少苦辣！

在我好几本大学日记里，记录了数不清的政治活动内容：小到班干部找我的谈话、大到周总理的报告，中间还有林林总总的学习、报告会记录……。政治学习可能比现在任何一个党校还多！北京民族文化宫的西藏展，被奴隶主剥下的奴隶人皮钉在墙上、奴隶的头颅骨头做成碗，触目惊心！西藏奴隶索玛在大饭厅的忆苦思甜报告，字字血泪，强烈震撼我们年轻的心。老革命何长工把亲历长征的种种艰苦娓娓道来，让我们如同身临其境。周总理报告里谈的对人的世界观改造问题更是使我受用终生。……这些政治活动的确对大多数学生起了作用。在毕业分配会议上段学复系主任讲话的要点是：1、工作岗位是无所谓高低的，主要是把工作做好，这是国家对大学毕业生的要求；2、中学数学课仅次于语文，与语文、外语构成三大主课。要注意中学生的全面成长，又要使学生打好数学基础。中学教学并不是年复一年的。3、雷锋说：“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北大同学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要谦虚谨慎，不要志大才疏。要既有志，又踏实。

回顾毕业以后的这几十年，我是老老实实按照段先生的话做的。

班干部和我谈话时那种掏心窝的态度使我感动，从耿素云那里，我得到大姐姐般的关心，她教会我怎样以心换心地去关心别人；在我学习成绩上不去急得哭了的时候，学习委员张贻慈和我聊天，他诚恳地说：“你的学习并不算坏，要有信心。”1963年12月31日，他送我一张自己制作的贺卡，虽制作简单，但是上面有我喜欢的一只小猫，更有让我至今难忘的几句话：“在个性、举止、风度和一切、一切上，最好的是朴实。不要嫌种子太小，种子总是小的。不要怀疑自己的忠诚劳动，劳动总会给你留下果实的。”拿到这张贺卡，我禁不住流下泪来。那些年，同学之间互相在新年来临时送一些自己制作的贺卡是常有的事，甚至三八妇女节，也有男生寝室给女生送贺卡的呢。这种方式的思想上互相关心，非常有效。这些贺卡我保存了几十年了。

再说到劳动，我相信我们这一级学生劳动的次数和时间总量之多是空前绝后的。入学第一次劳动时，龚楚书同学一人挑四大筐泥的样子，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在北京大兴县劳动去看北京填鸭的喂养方法，真是终生难忘；平谷县的河谷那些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好像还在脚下；涧头地里那望不到头的薅苗劳动，现在想想就觉得累得慌；那慈祥的张大妈，相信我们二班的同学都还记得她；更有那十三陵的建校筑铁路劳动，披星戴月，颇有点保尔·柯察金经历的味道；我还在学校跟过一位师傅学习划玻璃，在校园教师住宅区配窗玻璃；甚至到了毕业分配前夕的1965年2月，我、还有赵仲玉等同学一共200多人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劳

---

动了四天半！体力劳动的艰苦，大家一定都深有体会；与普通农民、普通工人的接触也不会感到陌生。请看日记：

**1961年6月8日，星期四。**在涧头……今天，我们第三组分配到第一生产队劳动。现在正是麦收的时候，我们干了很多从没干过的活：拾麦子、摊场、翻场、扫场等。社员对我们真热情，我们认识了一个女社员，姓路，我称她为路大婶。她主动教我怎么使用杈子，我们很快就谈起来了。

**1962年5月29日，星期二。**在200号工地劳动。仍是一个人烧开水，并帮刘大爷烧火。心里快乐，干起来也就利落，最后活完了就下地干活。刘大爷夸我说：全中国人民都像你这样，毛主席就省心了。又说，真是百个里选不出十个，好样的。……

## 特殊时期毕业教育的效果

众所周知，1966年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由于突发事件引起的。早在1964年，北大就已经是风声鹤唳了。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我们接受了毕业教育。从理智上，我接受了系主任的教导；但是从感情上，正如莫国端同学说的那样：灰溜溜的。

分配方案下来了：高教（留北大）2人，二机部21人，计算所2人，国防科委5人，解放军炮兵部4人，纺织工业部3人，中学教育62人：其中北京市教育局15人、上海市教育局35人、河北省教育厅13人。

1965年4月20日，在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我想：似乎毕业教育中，我得到的是一个全盘否定的结论。这倒激发了我的好胜心。到了上海，我和赵仲玉合写了一份申请书，要求分配我们到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去，因为那里任务最艰巨、责任最重大。

但是，我并没有被委以重任，我只是被分到了一所女子中学。

教中学，我倒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我高中的语文老师就是北大毕业的，他就是做了一辈子中学老师，我的语文成绩的每一点进步，都要感谢他。从小学到高中，我有幸得到很多好老师的教诲，他（她）们的名字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就算我活到一百岁，我也绝对不会忘记。做老师，是我儿童时代就喜欢玩的游戏；幼儿师范，是我初中毕业就想报考的学校，只是由于学校要我直升高中，才没有去报考。

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周，在教研组的黑板报上就登出了我要干一辈子中学教师的决心书。其后的三十二年，我就在这一所学校做了这么一件事，直到退休。退休以后又在教育岗位上发挥“余热”四年。总共从事中学教育三十六年。其中班主任工作干了十七年。按照教育要面向世界的教导，我的学生现在生活、工作的地区很广，北美、欧洲、日本、新加坡都有。很多学生与我的关系非常亲密。

北大当时领导毕业教育的老师们，我交出的这份答卷还可以吗？

---

## 六年同学友谊最难忘

在数（二）班组织过一些活动。一年级时候的班级运动会、后来的游八达岭长城、游颐和园都有照片为证。过新年时，在一个小教室开一个迎新晚会，有一个男生宿舍出了个双簧节目，两个人裹上一个大床单装成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在他们后面说台词，非常滑稽，把大伙儿肚皮都笑痛了！还记得大饭厅里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年钟声的情景吗？总是带着对新的一年美好的期盼，听广播员那富有磁性的好听的声音，报告新一年的到来，然后新年老人和春姑娘走上台，下面的同学跳起了龙舞。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年青的我们，也不乏精神生活的欢乐。

现在家家有了电视机，不大去电影院看电影了。但是在北大，每周五六晚上，大饭厅是我们常常去的地方。

**1959年10月11日，星期日日记。**昨天夜里，看了话剧《革命的一家》，今天又看了电影《青春之歌》……。

**8月30日日记。**和肖俊一起看《战上海》，教育极大。……

**1964年1月8日日记。**上周五，吴暹年把他父亲的事告诉我。原来他父亲十年前牺牲了，当时才35岁。生前为反对荷兰殖民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华侨工农和印尼工农的利益做了许多工作。吴暹年直到现在仍然非常怀念他的父亲。不知道他为什么告诉我这件事。我当晚给他写了封信，希望他不要难过，要继承父亲和其它革命烈士的遗志，把悲痛化为力量。周围的每个同志的生活都是丰富的，我应该多了解、多帮助。

现在我们怎么也找不到吴暹年，真是遗憾。他身残志坚、生活态度乐观，是我们难忘的好同学。

不知道杨振明同学是不是还记得，他曾经对耿素云说：你们女生在班上起的作用只是“以匹什农”。那天是1959年11月29日，耿素云向我和肖俊转达了你对我们女生的意见，我听了以后难过得差点哭了起来。我想，也许你是在开玩笑，但其中也不乏正确的因素。

让我们难忘的还有罗启成同学，天津人，一说话就笑，爱冰上运动，是北大冰球队的主力队员。他在冰球场上风驰电掣打冰球的样子，好像还在眼前活蹦乱跳、生气勃勃，可是一场唐山大地震把他永远留在那里了！三十多年过去了，罗启成同学，我们还在怀念您哪！

还有一位东北人王志清，说话常常是怪怪的，难免让别人对他有些看法。其实，他比我们聪明，对事物看得很透，可能是仗着出身好，讲话比较随便。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他是以怪话和牢骚话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而已。以他的活法，的确很难走过“文化大革命”这条坎坷而漫长的路程。真的好可惜，现在改革开放了，社会包容性强了，讲究一个“和”字，他却走了！

---

## 趣事种种

### 1、吃蛋糕啦！

困难时期来了，食堂做了窝窝头，第一次看到它黄灿灿的样子，一位南方同学惊喜地说：“哎呀！今天吃蛋糕！”于是阿鸣一大口吃下去，咦！不是蛋糕啊？不好吃！

### 2、葱叶那里去了？

没有荤菜，也没有什么素菜，只有葱根窝窝头。我就奇怪了：北大人口这么多，那里来这么多葱根？而且那么多葱又到哪里去了呢？直到今天我还是想不明白。

### 3、“八个大窃贼”

我们女生寝室在35斋一层最东头，住了十二个人，晚自修回来，非常热闹。熄灯以后，“卧谈会”开始了，每天都有新话题。这天晚上好几个同学看了电影《巴格达窃贼》，不免评论起来。不料突然有人说：“八个？”“不是七个，也不是九个？是讲八个贼的电影吗？”大家一听，忍不住大笑起来。

### 4、老鼠是两条腿的吗？

还是熄灯以后的“卧谈会”。一次，不知在谈论什么事情，忽然有人问道：“老鼠是几条腿？是两条还是四条呀？”听她的语气，不像是在逗大家，好像真的不知道似的，于是，大家又在一场大笑后进入了梦乡。

### 5、差点淹进昆明湖

一个星期日，与晓霞一时兴起，去颐和园玩，在昆明湖一人租一条双桨船，划呀划，好不惬意！没有想到，划到湖心，突然起了狂风，湖水起了大浪，小船猛烈地摇晃起来，把我们吓得不轻，于是拼命向岸边划去。经过一番拼搏，终于到达岸边，这时我们已经疲惫不堪，但是心情还是非常愉快。

### 6、五花八门的绰号

尽管整个大学的时期政治气氛很浓，对不少同学的压力很大，但是年轻人的活泼天性并没有完全失去，相互之间开开玩笑、取取绰号也是常有的事，善意的绰号表达的是同学之间的亲昵感情。1995年那次聚会时，三十年没有见面的老同学，一见面喊出的往往不是对方的名字，而是他的绰号。像什么“阿慢”、“大M”、“小皮球”、“小胖”、“嘎子”等等。

---

# 数学学习之外的大学生活

数学二班 张葆丽

数学学习无疑占据了大学生活的大部分时间。这里要回忆的是：数学学习以外的五年半大学生活。

因为个人生活的局限性，而且年代久远，记忆模糊，肯定漏了很多事情，也可能有些误差，所以算不上年级的“大事记”。但是，内容的真实性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

## 1959年

7月20日—23日。我们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这年高考语文作文题是“有意义的一天”，很容易的记叙文；数学题目不难，有一道题目是证明对数换底公式，特别容易，现在在高中，仅作为课堂小测验题目而已；但是物理试卷好像大家都觉得很难，一道拉车还是推车省力的题目让不少人感到很为难。考完物理，相信很多人（包括我）做了下农村的准备。

8月17日。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同时收到的还有北大团委和学生会给新同学的欢迎信。

9月。入学不久，为了国庆十周年游行仪仗队，不少同学被抽出去排练，学习正步走。六十人一排，要走成直线，还要手挥花束，反复高呼三个“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另外当然还有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等。被抽到的同学为能亲眼看到天安门上的毛主席，感到幸福，不管排练多累、花多少时间、要求多么严格，都精神饱满。

10月9日。政治学习开始了。主题是学习党的八中全会文件。要求：1、从历史发展上认识社会主义总路线和党领导的正确；2、认识马克思主义是在反右倾中发展的，认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重大意义；3、以不断革命精神要求自己，不断改造思想。

11月9日。进入“自觉革命、向党交心”阶段，然后进行一系列政治学习，如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人民公社、阶级政党和领袖等等。

在大一的第一学期，从文学作品里面我们得到很多数学以外的教育：看话剧《革命的一家》、看电影《青春之歌》、参观“全国工业展览”、11月到通县北大畜牧场劳动锻炼（7天）。

11月21日。正式进入“向党交心”，写思想小结。

---

11月23日。“火烧中游思想”，杂志上、广播喇叭里、墙上到处都是这样，“革命”的气氛浓起来了。一些同学谈了自己对三面红旗的看法，结果是受到有组织的批判。

11月28日。我们被要求制定“红专跃进规划”。

12月中旬。年级里开展“红专辩论”。

期末。要求每个人“主动”报名申请被“系统地”批判，结果有的人被选中，或者作为“白专”、或者作为“粉红色”道路，在各自的班里接受了猛烈的批判，同时对其他人产生了非常强烈的震撼。

数二班的李测章同学在这段时期受到重点批判，并被开除团籍；到了第二学期又以学习成绩不及格为理由，被退学籍处理，回到广东。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最近才听说1962年甄别时学校允许他复学，但是被他拒绝了。

## 1960年

寒假。全系发动学生搞“教学革命”，批判牛顿、莱布尼茨、柯西等数学家。最后要求一年级学生要落实到编写一套“无产阶级的”微积分教材（一年级学生还没有学完微积分哩！可是领导们说我们没有框框，适合干这个）。没有放一天假。

大学第二学期。运动和劳动不断。主要有：参加校内六公寓盖教工宿舍的劳动、去十三陵修公路铺管道、去城里的人民公社搞超声波、在电子实验室搞电器元件的技术革命、全校的大搞卫生（形式主义到了极点）。这个学期，周日都不休息，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一个学期上课时间加起来，只有一个半月。

这个学期，政治学习自始至终抓得很紧——学习了《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五段：知识分子问题；第九段：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人的阶级性》（刘少奇）、《愚公移山》、《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问题》（周恩来）、《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伟大历史意义》（人民日报）、《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谭震林）、《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等，班会的主题是“开展毛泽东著作学习的高潮”；系里开的是“庆丰收再跃进大会”（内容是总结一个月全系600多师生四路大军下厂技术革命的成绩、布置下阶段的任务）。

5月20日。全校5000名师生去天安门集会，向美帝国主义示威游行。青年学生为能亲眼看到天安门上面的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而兴高采烈。

6月26日。开始“三篇文件”的学习，主要是国际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反修问题。

7月30日。大学第一学年结束。对形势的认识是：反对修正主义形势大好，帝国主义寿

---

命不会很长了；国内大办公社，开展技术革命，促进了生产。

暑假。看电影《聂耳》、《战上海》等。还组织同学去郊县大兴农村劳动。

9月11日（周日）。在大饭厅，听中将吴先恩作关于艰苦奋斗的报告。

9月21日。参观革命军事博物馆。

10月1日。毛选四卷出版，同学们夹着被子去海淀新华书店通宵排队买书。继而兴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除了学习毛著，还有刘少奇、陆定一、林彪的文章以及《共产党宣言》等。

10月中旬。学校组织各系同学，到十三陵为建新校舍进行修铁路的大决战。做的是土方活，劳动强度极大，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吃的当然不够支付体力的消耗，又由于参加的人多，只能分散住，有的班就住得很远（往返工地需要一到三小时），条件也很差（如鸡舍）。这次劳动中，一位同学因肠梗阻，来不及抢救而去世。这次劳动，长达一个月。

11月13日。陆平校长做了关于精简人员支援农业的报告（我们听的是录音）。

11月14日。结束一个月劳动，回到学校。学习毛选：《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关于重庆谈判》、《论人民民主专政》、《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让同学们认识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斗争是复杂的，我们必须战略上藐视困难、树立信心，战术上重视困难、准备艰苦斗争，以赢得胜利（渡过困难时期）。

11月18日。在办公楼上马列主义课——“学习毛泽东著作”。

11月19日。各班分别开“跃进大会”。

11月20日晚。年级召开“跃进大会”。我们年级的战斗口号是：“主席思想挂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大干特干，做出好成绩，誓上先代会”。

12月中旬。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信》、《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从第16周到第21周，听报告4次、自学和议论13次、讨论3次）。

12月31日。传达农业部长廖鲁言同志在农大农干训练班上的讲话——关于农业十二条。

## 1961年

2月1日。地质部付部长何长工到北大作关于传统教育的报告——“重温井冈山斗争，进一步学好毛泽东思想”，要求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同月。《中国青年》的王光伟来校作“高举三面红旗，为实现1961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新任务而奋斗”的报告。陆平校长作“关于国内形势”的报告，总的要求是：鼓足干劲，以现实可能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工作学习，假期以逸为主，开学以劳为主，劳逸结合。不是为劳逸

---

结合而劳逸结合，要大鼓干劲，克服已出现的右倾情绪，同时注意劳逸结合，做好工作。

2月9日。外交部亚非司司长到北大新饭厅作“非洲目前形势”的讲座。同学们大唱《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乔羽词、时乐蒙曲）。

3月11日。布置新学期形势学习：学习党的九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紧集指示信。

4月15日。张学书传达3月份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60条工作条例（草案）。

5月21日。到200号工地（十三陵北大新教学楼附近）劳动，6月1日返校。

6月2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张妈妈来年级开讲座。这是一位小脚的花白头发的老人，但是她的报告是我们听过的革命传统教育报告中最好的一个。

## 1963年

3月5日。各报登载了毛主席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兴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

5月5日。陆平校长作报告，谈红专问题和恋爱婚姻问题。

12月7日。校党委传达了中共中央两个文件，分别是5月和9月下发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的决议，其中有毛主席这么一段话：“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三项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永不变质的可靠保证。我们的干部，如果对牛鬼蛇神的活动，不闻不问，就会出现反革命复辟，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同志们想想，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呀！”

12月14日。听吴子牧报告：“上大学的目的是什么——谈谈世界观问题”，过了几天，又分小组作了讨论。

## 1964年

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提出了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暑假。有3次劳动：在上口，高干子弟及部分同学的劳动（8月3日—7日）；8月11日，几乎全部同学的劳动；8月13日开始的在长陵老君堂的劳动。

8月28日。北大召开团代会，中心议题是“阶级斗争”。

9月。开学，开始做毕业论文。

9月下旬。学校要求我们开始考虑毕业分配问题——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

## 1965年

1月。同学们陆续完成毕业论文并进行毕业论文的答辩。

2月4日—2月14日。部分同学到石景山钢铁公司劳动，同时在石景山钢铁公司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2月15日。开始毕业教育。到3月25日，完成个人毕业鉴定。

这段期间，首先是形势教育，然后是端正对待毕业分配的态度。批判了七种态度：1、愿在大城市，不愿到小地方；2、愿在内地，不愿到边疆；3、愿在南方，不愿在北方；4、愿离家近，不愿离家乡。甚至个别人，愿在北京，而且在城内；5、向往舒适的生活，怕艰苦；6、愿到大单位，不愿到小单位；7、愿搞研究、教大学，不愿教中学。重点批判了不愿教中学的问题，说“每个人都有教中学的可能性”。

用了两周时间学习文件，包括（1）周总理报告（形势部分）；（2）二十三条第一条；（3）《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4）彭加木事迹；（5）接班人五条；（6）1964年8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要求解决几个问题：（1）正确解决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2）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关系；（3）明确知识分子的革命化劳动化的意义，坚决做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2月22日。李至义作毕业教育动员，要求每一个人进行“自我革命”，谈自己红与专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次次的大会小会之后，一般同学都感到灰溜溜的。

2月27日。在第79中学听藏族女同胞斯旺的报告，她以血泪史控诉万恶的西藏农奴制度。

2月下旬。传达毛主席和毛远新的讲话。

3月上旬。班级小会：怎样认识家庭影响（每个人都力求把来自家庭的不良影响挖出来）；讨论革命化、劳动化（四天半）。

3月8日。听红军老战士、中央西苑直属机关总务主任王裕寿同志报告，谈长征中妇女团的事迹——女同学如何树立雄心壮志。

3月9日。学习劳动化、革命化问题，李至义再次作报告。

3月10日。开始讨论形势问题，谈在困难时期（1960年—1962年）对形势有什么错误或者模糊看法。

3月11日。上午，年级大会，交流学习情况和收获，八位同学发言，李志义掌握会议并做小结。

下午，听报告“奴隶的新生”（中央政治干部学校学员索朗卓玛）。

---

3月12日。讨论：在困难时期对三面红旗怎么看？对学校里一些群众运动怎么看？要求挖根源：困难时期为什么会有那些不正确的看法。

3月13日。上午，参观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展览会。

下午，公布分配方案。

林建群付系主任说到两点：1、方向看对，根子扎深；2、半工半读是培养新的革命接班人的方向。不要给“读了五年半北大”的包袱压住。

有20多同学表了决心。

分配方案是：纺织工业部3人（北京化工纤维工学院1人、苏州丝绸工学院2人），北京教育局17人，河北教育局13人，上海教育局38人（以上共71人）；二机部第九研究所5人，401所2人，解放军炮兵部队4人，国防科委727部队2人，总直726部队南京1人，扬州1人，913部队九江1人（以上共16人）；北大2人，9研10人，401所5人（以上共17人）。

后来实际的方案有所变化：北大2人，二机部九所14人，401所7人，计算所2人，国防科委5人，炮兵部队4人，纺织工业部3人，中学教育62人（北京15人，河北13人，上海35人）。

3月15日。李志义作报告：“为什么要毕业鉴定？怎么做毕业鉴定？”

3月17日。北大附中教师陈建刚（北大校友）作报告。

3月15日—23日。写思想总结和自我鉴定，然后在小组会上汇报，再由小组同学提优点、缺点，并分析主要问题。

4月8日。由周言恭主持，开年级（数学专业）毕业教育总结大会，有五位同学发言。系主任段学复讲话的要点是：1、工作岗位是无所谓高低的，主要的是把工作做好。这是国家对大学毕业生的要求；2、中学数学仅次于语文，与语文、外语构成三大主课。要注意中学生的全面成长，又要使学生打好数学基础。中学教育不是年复一年的。3、雷锋同志说“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北大同学在任何岗位上都要谦虚谨慎，不要志大才疏。要既有志，又踏实。

在毕业教育期间，北大在党内开展“四清”。党员经常开会到很晚，回到宿舍很激动，但是对党外同学什么也不肯说。

我们数学系59级数学专业的毕业教育，就是政治理论学习和批判，每个人都要彻底地清理思想，分阶段地清理：1959年反右倾批判彭德怀时的思想和表现；1960年反修正主义时的思想和表现；三年困难时期的思想和表现；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以及“学习雷锋”的思想和表现；最后是，是否愿意服从分配。人人过关。

这期间，还开大会批斗了两位同学，给他们戴上了“反动学生”的帽子。

4月9日。在办公楼举行“北京大学1964—1965学年寒假毕业典礼”。

4月下旬。同学们陆续离开北大，走上工作岗位。

---

## 后记

我们在校的五年多，正处于中国两个大政治运动的间隙：1958年，“反右斗争”的硝烟刚刚散去，火药味依然很浓（北大可以说是大学里面反右斗争的主战场）；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战——“四清运动”1964年已经在北大党内打响，正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政治味浓厚的大学生活。所以，才会有我们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59级“空前绝后”的寒假毕业典礼。

往事如烟，我们不能总是沉浸在令人压抑的回忆之中。

同学少年，相处近六年，总有一些生活片段值得珍藏记忆。除了个别道德败坏或者政治素质的确有些问题的人，我们59级数学专业同学绝大多数都很单纯，很珍视同窗情谊。在大学生活那种特殊的年代，年少无知的同学，讲了一些伤害别人的话，被伤害的人已经用行动表示了自己的大度，不计前嫌，不仅积极组织聚会活动，而且不顾事先AA制的约定，拿出大笔赞助费，以减轻外地同学的经济负担，非常令人感动。而伤害过别人的人，可能早就意识到自己无意识的过错，要用积极参加聚会的实际行动，来弥合同学之间曾经产生的人为的鸿沟。所以，2009年5月16日聚会时出席率之高，既超乎想象，又在情理之中。

不管怎样，北京大学总是我们的母校。一个“母”字，应包涵了母子双方多少爱！在那种特殊的时期，我们的确少了好多母爱；可是毕业以后，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出了无愧于人民的成绩，希望母校能够以我们为荣。

2009年5月16日和17日的大聚会，重温了同窗友谊，建立了通信网，但愿天各一方的老同学们，经常联系，用永恒的友谊，照亮前方的路，温暖彼此的未来。

---

# 北大给了我扎实的知识基础

数学二班 张本宗

一个人能有什么成就，是与社会环境、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的。我这辈子只是一颗螺丝钉，荒废的时候有，用着的时候也不错。北大给我的科学知识基础是扎实的，功底还可以。

记得当初引进日本的初轧过程控制系统，日方技术资料中有这么一个公式

$$\text{新学习值} = \text{旧学习值} + k \cdot (\text{本次实值} - \text{旧学习值})$$

似乎叫人摸不着头脑，问问日方技术人员，也问不出所以然，更叫这个公式带点神秘色彩。我很快用简单的数学演算看穿了这个公式的实质。

其实，设第  $n$  次得到的实值为  $\alpha_n$ ，得到  $N$  个实值以后，下面第  $N$  次应该如何预测它的值  $\beta_N$  呢？那么就用前  $N$  个实值的平均值作为第  $N$  次的预测值

$$\begin{aligned}\beta_N &= \frac{1}{N} \sum_{n=1}^N \alpha_n = \frac{1}{N} \left( \sum_{n=1}^{N-1} \alpha_n + \alpha_N \right) \\ &= \frac{1}{N-1} \sum_{n=1}^{N-1} \alpha_n + \frac{1}{N} \left( \alpha_N - \frac{1}{N-1} \sum_{n=1}^{N-1} \alpha_n \right) \\ \beta_N \text{ 为新学习值, } \frac{1}{N-1} \sum_{n=1}^{N-1} \alpha_n \text{ 为旧学习值, } k &= \frac{1}{N}.\end{aligned}$$

这里也有数理统计学中简单的点估计的概念。当然，会有经验，会有技巧，但有其数学上的道理。

又记得，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阅读 C 语言教科书，书中有编魔方阵 C 程序的习题。我接触了不少技术人员，都是年龄或大或小的本科毕业生，没有看到谁能够编出来。编程不难，魔方阵难摆。我是学过矩阵代数的人，虽然用不到多难的理论，但确实是受到启发，魔方阵摆出来了，程序编出来了。

还有一桩事情。2005 年前后，偶尔看到电视中央二台的节目，大概是“过把瘾”吧？请来了一位奥地利人表演，无非是 4 行 4 列的魔方阵问题。只听主持人宣布“挑战成功！”台上花片飞舞，台下掌声雷动。其实，只需记熟从 1 开始的连续 16 个自然数摆成的魔方阵，数字可以有变化，临场同样可以快速应对。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平时也看些数学方面的书籍，总会感到我是不错的。比如，看了 1979 年科学普及出版社的《匈牙利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题解》，有这样的题目：“已知平面上有 4 点，作一正方形，

---

使其各边所在直线分别通过这 4 点。”我觉得自己提出的解答优于作者。又比如，对于北京市 1978 年中学生数学竞赛题第二试的“题五”，我看到有些书的解答感到不满意，于是自己提出更好的答案，还把原题已知条件中的  $90^\circ$  角放宽到任意角。

经常有些青年学生向我提些数学问题，我总是有信心，给予解答。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想，没有感叹的必要。北大给了我扎实的科学知识基础，凭此我可以自信。

2009. 05. 14

---

# 我从老师那里学到了什么？

数学三班 张存桂

从大学毕业就做教师直到退休，一辈子虽无辉煌业绩，却也问心无愧，因为自己一直在尽职地工作。这要感谢中学、大学老师的培养。

老师教给我的东西很多，但是由于我没有用心领悟，许多应当学到或可以学到的却没有学到，所以我只能说自己从老师那里学到了什么。

大学老师的言传身教给我的影响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感觉得愈来愈明显。

## 我见到了真正聪明的人

人们通常说的聪明是指反应快、机敏、心灵手巧等等，其实这些还只能算是小聪明；至于有些人喜欢有意显示自己与众不同，那更谈不到是聪明。我以为北大数学系老师的聪明是“大”聪明——知识广博，功底厚重；表达观点和看法时言简意赅且直指问题的本质；学风严谨，做学问一丝不苟；想象力丰富，思路极其敏捷而且往往很独特，常能出乎一般人之预料，令我佩服不已；讲课高屋建瓴，又不忽视细节，而且总会给学生留出独立思考的时间和余地。总之，他们的师德师风水平之高，足够我一辈子作为楷模；他们的聪明才智，我自认为一辈子也赶不上；他们的教学风格影响了我一辈子。

## 我懂得了什么叫敬服

对于水平明显比我高的人，我一直怀有敬重和佩服之心，这是大学期间通过与老师的接触养成的。毕业以后在外地工作总会遇到一些小有成就的人，喜欢找各种机会夸耀自己，我为他们感到遗憾——如果他们见到过真正的学者就不会如此自我满足了。懂得敬服又不迷信高水平的人，这不是自卑，恰恰相反，说明自己有欣赏能力，而且懂得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即使对于水平没有那么高、业绩没有那么突出的人，也应当有佩服、欣赏之情。谁都不服气的人未必是有水平的人，却很可能是无知且无畏的人。由于自己有这种认识，使得无论是做教师还是做管理都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并且能与学生、同事、上级领导都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

---

## 我体会到什么是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通过上学时听课和老师答疑辅导、批改作业，以及期末考试、毕业论文等教学环节，真正感受到老师们严谨学风教风和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这些都影响着我参加工作后的教学态度和工作态度。毕业后无论是教学还是管理，尽管水平不高，却从不要小聪明糊弄别人，也不会消极应付，懂得照规矩做事，不敢在原则问题上放松对自己和他人的要求。

记得做毕业论文时，每隔几周就要向指导教师姜礼尚先生汇报。姜先生坐在那里看我在黑板上写推演的数学式，一个等号后面的式子就能写满足足两大块黑板。写完后等着先生表态，如果他面无表情，这说明推演正确（真不知道他是如何这样迅速就作出判断的），然后赶紧擦掉黑板再写下一个等号后面的式子；只要那么长的式子中哪怕有一丁点失误也不会逃过他的眼睛，这时他的嘴角会往下动一下，同时毫不留情地说“错了！回去重新推导，下次再向我报告”。几十年后，等到我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时，就是学着姜先生的样子严格要求学生。后来毕业生做了教师，给我发短信说“我可能不是您最欣赏的学生，但是您的教风会影响我一生”。他不知道，那其实是我老师的对我一生的影响。

## 我学会了宽容和平等待人

能在北大当老师，绝非等闲之辈。他们中许多人以后的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这些老师对于我们始终是宽以待人，公平公正。你可以随时到他们的宿舍去问问题，他们也会经常到我们的宿舍来答疑。如果你能提出一些有点水平的问题，他们不但乐于为你解答，还会与你平等讨论；如果你提的问题与他所教课程内容无关，他不会说“这道题与考试无关，不用管它。”如果你提的问题很幼稚，他们绝不会说“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来问我？”如果你对于他的讲解总也搞不懂，他永远不会说“你怎么这么笨？”在我的老师面前，你能体会到什么是“学术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影响使我在参加工作以后的几十年里，始终能与学生平等相处，尽力为他们的学习提供良好的教学和服务，不以成绩论英雄，不歧视学习基础差的学生，不偏心成绩好的学生，不讽刺挖苦学生，不把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原因全都归咎于学生，不为了提高及格率而耍小聪明，不曾“吃拿”学生家长、从而不会“嘴软手短”。

## 我懂得如何做一个正派人

---

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之下，不仅努力学习的同学能学到真知和增长能力，就连我这样贪玩的学生也从不敢上课缺勤、课后不复习甚至抄袭作业，或者在下午 3 点半之前去操场踢球或参加社团活动，更不要说离校去外面玩了。所有这一切没有人来监督管理，全凭自觉。

当时北大期末考试题目之难是现在的学生难以想象的，不久前聚会时还有同学回忆说，当时很多课程考试只有 4 道题，居然从上午八点一直考到下午三点。考试过程中可以上厕所，可以去喝水，但是没有谁借此机会交换“信息”；阶梯教室做考场，考生二百多人，只有一名老师监考（其实就是发卷收卷），坐在后排的可以很容易看到前排学生的答卷，但是没有人偷看。尽管当时有那么多不及格的学生，但是考试过程中没有一个想到作弊的。

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熏陶”出来的，尽管水平能力一般，但是参加工作后无论监考还是组织管理大规模考试，始终以北大期间的考场氛围作为自己追求的高标准。我担任过唐山市电大和师范学院两所学校的教务处长，在退休欢送会上说“我的唯一业绩就是在这两所学校的考风建设上做了有效的工作”。

---

# 唐山这些年

数学三班 张存桂

1965年4月大学毕业，5月被分配到唐山；2008年12月14日离开唐山迁到北京“投靠子女”，历时四十三年半。俗话说“事不过三”，这些年我也有N个三：经历了三个阶段（文革，地震，改革开放）；换了三个学校（技校，电大，师院）；获得过三次高级别的荣誉称号；被动地做了三次“官”又主动地辞掉或退掉三次；破格晋级三次又被工资普调冲掉三次；参加过三次考试；评过三次职称；前后一共进过三次党支部或党委书记的办公室；搬过三次家；……。

## 想念罗启成

在方程班时我和罗启成关系就很好，因为我们两家都住在天津，原籍又都不是天津人（他是广东人，我是山东人），年龄一般大（他只比我小7天），都是职员出身，直到大学毕业也都没有入团；不同的是，他选择方程专门化是因为对数学的实际应用更有兴趣，而我则是因为学不懂抽象数学。毕业后，相同的是我俩一起被分到唐山，而且都做了教师；不同的是他极不愿教书（他口吃严重），我对此则无所谓。最后他到商业学校，我到机械技校，两校相距三华里，每逢周日必相聚。

文革期间我俩的观点分属唐山两大对立派别，见了面先一本正经地辩论一番，当然谁也不服谁，然后求同存异——我拉手风琴、他弹曼陀铃或弹大阮或敲扬琴，红色乐曲响彻光棍宿舍，双方实现革命大联合。

罗启成不善言辞但心灵手巧，不仅烧得一手好菜，还会修手表照相机，甚至还会织补毛呢衣服（当属高级技能）；然而他喜爱的却是最激烈的运动——冰球，曾是北大冰球队队长。

他学数学能运用。例如他的弹拨乐器掉了一个“品”，他可以用弦振动方程算出这个品应当粘在哪个位置，我可算不来（数理方程我只考了3分，勉强及格），我是用耳朵听，和他确认的位置丝毫不差。正所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1972年技校恢复招生，我鼓捣校长把他调到我们技校了。那时我结婚不久，家和学校相距28华里，他仍是单身，住学校宿舍。每天早上我汗流浃背地骑车冲进学校时，他正在不急不忙地刷牙，还得意洋洋地冲着我笑，令我羡慕不已。学生们都喜欢他，因为他总是笑眯眯的。上课时有学生将粉笔藏了起来，他也不着急，慢悠悠地说：“今天我就用嘴说了。”

---

于是就口述受力分析，没一会儿全班主动把藏粉笔那小子举报出来。

1973年国庆节罗启成结婚了，妻子是安徽省卫生厅的干部，是他二姐的同事。第二年他调到安徽大学数学系，同年他儿子罗琨出生。不过他还是难忘唐山，有时借回津探亲的机会来一趟住两天。1976年夏天，当时大学是“大家都来学”，数学要讲“三机一器”，安徽大学数学系也不例外，于是按照他的要求，我请唐山市柴油机厂给组装了一台可以用于教学演示的柴油机（我曾在该厂下放劳动三年，厂长又与我极熟），一切就绪，他在7月24日来到唐山。本来可以住在我家旁边的齿轮厂集体宿舍（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因为地震时这个小楼安然无恙），他说这次是公差，于是住在新华旅馆（如果继续住在这里就好了，因为那个旅馆地震时没有倒塌）；他又嫌离我家太远，我俩找到他过去的一名学生（以后成了力学专业63级一位校友的夫人）帮他换到三八旅馆；本来他应当在7月27日回天津（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因为听我说油泵油嘴厂有一台外圆磨床，上面有一个重要部件叫导轮，外形是单叶旋转双曲面，于是决定先不回津，要去看那台磨床。这真是鬼使神差啊！7月27日21点我俩分手，他回到“三八旅馆”。6个半小时以后地震，他永远留在了唐山。

2006年唐山大地震30周年，那年清明节受罗启成亲人之托，我在三八旅馆旧址和唐山抗震纪念碑前各敬献了一束鲜花、默哀，悼念他们的亲人、我的这位英年早逝的老同学。

现在罗启成的儿子罗琨在上海工作，他的夫人和他的二姐与罗琨生活在一起。他的弟弟还住在天津，与我和我弟弟一直有联系。这次入学50周年聚会《纪念册》上罗启成的彩页就是他的弟弟罗启源制作的。

## 心态的变化

面对文革逆境。我出身不好，为了表现自己也是革命的，上大学时既参加过对同学的错误批判，也傻乎乎地向组织“交心”。前者客观上伤害了别人，后者使自己档案中的评语也不好（幸亏地震时雨水渗入废墟将我档案上的字迹都泡没了，只剩下封面上3个字“张存淮”）。文革初期也跟着喊口号贴大字报，那也得不到造反派的青睐，因为过了不久天津父母家被抄、父亲月工资被扣去3/4；一年半以后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父母和祖母被遣返原籍农村，我的名字上了学校的墙还被打上红叉，交往了六年已经准备结婚的女友与我“划清界限”，挥手自兹去。直到这时我才多少明白了这场我们赌咒发誓要进行到底的革命对我意味着什么，才开始体会到那些被批判揪斗的人的感受。不过，一旦到了那个地步，开始还有些紧张害怕，后来反而不大在乎了。我的态度是：政治上和父亲划清界限可以，但我还真不知道怎样才算划清界限？何况我觉得他一个老实巴交的知识分子，哪点像反革命？经济上我肯定划不清界限，总不能我不养活父母让国家养活吧？当时就想，反正比我倒霉的人还有的

---

是，因此日子还得过。那些年就是靠一个“忍”字过来的。

不过那些年确实不大好过，不仅经济上很是拮据——每月 5 日拿出 25 元（工资 54 元）寄给父母做生活费，下旬向罗启成借钱——心情上也是极为压抑，只要看到上级有人到学校党支部来，就担心是不是自己又说错什么话或者父亲的事情更糟了。加上传达最高指示说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就要来一次，真是愁坏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万幸的是，我的学生对我不错，因为我比他们大不了几岁，以前总带着他们上场踢球、下河游泳，关系颇为融洽；下放劳动那三年工人师傅对我不错，因为我没有大学生的架子，干活卖力气；技校几位领导对我不错，因为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对有文化的、好好教书的老师很尊重；加上我能唱歌、能拉手风琴、还能给唱样板戏的敲边鼓，毛笔字写得还可以，为人又随和，所以搞个宣传、写个材料什么的，还算是个“可用之人”。尽管军宣队、工宣队对我挺冷淡，由于我在机械局系统中小有名气（几乎所有机关干部和厂长都知道技校有一位北大毕业的、挺聪明的数学老师），所以也没人把我怎么样——大致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吧。不过这些年我没有心思念书做学问，所以文革结束后可以考研究生时，尽管徐明曜报考了，应隆安老师也曾给我写信说他和姜礼尚老师、陈亚浙老师都觉得我应当报考，我也没敢报。上学就没学懂，毕业后又不钻研，爱好太多，杂而不专，还是老老实实住在唐山做我的技校老师吧！

记得 1974 年去北京出差，其间特意去北大看望姑父傅鹰先生。他在吃饭时间问我“这些年在哪里工作？”我说“在唐山教技校。”他听了很吃惊，将筷子往饭桌上重重一拍说“什么？你北大算学系毕业就教技校？”我苦笑说“没什么，没什么。您这位北大副校长如今不也得挤公交车进城吗？”

这十年经历的收获是：

(1) 对于我能想出办法解决的困难，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解决。父亲 1974 年第一次落实政策，是我一年之内跑了十二次天津后才有结果的。从那时起不仅外交能力有提高，而且胆子也大多了。1979 年最终落实政策，也是我陪着办的。

(2) 对于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一个字：忍。对于可能出现的后果呢？一个字：认。与“痞子”级别的人物打交道，你一个秀才有理也说不清啊！

(3) 倒霉时不必低三下四，得意时也没有必要忘乎所以。我没有因为自己曾经倒霉而心里不平衡，以后这些年一直努力工作，越干越好；对于文革中曾经对我不好的人也能谅解，有的还推荐他做了中层干部。唯独对于那种报复心强、仗着自己的“背景”企图压制欺负别人的人，至今不能容忍。

(4) 再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意地损害别人的利益了。

面对唐山地震。我家属于唐山地震漏网之鱼，因为我住的工房很“简易”，所以地震时不但房子不倒，震后连下雨都不漏。据说全市像我家这样房屋未倒、全家自己走出来的不超

---

过两千户，其余非死即伤，至少也是“出土文物”。地震时孩子刚五个月大，各种困难可想而知。震后不久回到学校抗震救灾，第一件事不是干活而是开会；开会不仅是汇报自家伤亡情况，还要交代“从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开始你都干了些什么”，直说吧，就是要你说拿没拿公家的东西？救没救人？于是每位老师赶紧声明自己当时帮助“扒”出了多少人，没有拿过除粮食、遮羞衣物以外的任何一样国家的或者别人的物品。以后有记者说那么大的地震、死了那么多的人，唐山竟然很少见到有人哭。他哪里知道，人们不仅被地震吓傻了，也被“阶级斗争”的气氛吓住了。那年头不承认有心理问题，全是思想政治问题，简单有效。

唐山728大地震后的救灾条件与三十二年后的汶川512特大地震相比，确实有天壤之别。别的不说，我记得我家得到的“国际援助”就是一小包压缩饼干。不过这也极大地锻炼了我们，这么多年来工作中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也不会很犯怵——当然遇到人际关系上的难题和数学难题例外。

我不敢说经历了地震能使我参透了生死（直到现在每逢有感地震还是害怕），但是至少更懂得珍惜生命，珍惜时光。

面对调资机会。只要是调整工资，学校一定热闹好多天。尽管老师们不会象某些工人那样揣着刀子或者手持装着黄土的瓶子冒充炸药去找领导，但是哭诉、叫屈、骂街、吵嚷是必不可少的。这时我的心态是：如果我在文件范围内或范围外，什么话也不说；如果属于可上可下人群，能让则让。周围比我资格老、年龄大、收入低、家庭负担重的同事太多了，而且1979年以后我还可以通过经领导批准的校外兼职授课得到收入——知足吧！这不是说大话，我确实正式表态“让”过几次，第一次是文革后第一次调资，按硬件我可上可下，按软件我在群众评议中排序第一，结果是我主动放弃。据说书记兼校长听说后高兴得笑出了声。最后一次是退休后延聘期间调资，只不过这次评委们在我表态后以5票对4票还是给我调了一级，此时我60.5岁。

面对升官机遇。面临提拔任命时我的心态是：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的水平、能力，如果预计能胜任，愉快地接受任命；如果预计自己难以胜任，正面说明理由；如果上级坚持任命，我又同意接受，那就努力地去做；如果上级坚持任命，我不同意，那就不接受任命，即使为此受到组织处理也不后悔；如果接受任命但是做得不成功或者做不下去了，及时请辞。

以上诸条绝非空话，每条我都经历过了。结论是，别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面对评职称。评讲师、副教授倒没有什么，等到要评教授时我就犯了愁。早在我申报副教授时，中学、大学同学里已经有教授了，不过我倒没有“上火”，因为我喜欢教书却不喜欢写论文，自认不够教授水平，如果大学设立“高级讲师”我肯定申报。某日与夫人谈及此事，她说“我知道你的水平够不上教授，但是你周围那些你最看不上（指那些既不聪明又不努力）的人都当了副教授，你愿意与他们平起平坐？”这才使我下决心申报。最后，一是靠

---

北大这块牌子，二是靠劳模这个光环，三是当时主管部门对文革前毕业的知识分子有一种“还债”的心理，四是所发表的论文是用现成的数学模型讨论区域经济问题，估计经济学家和数学家都看不懂，于是侥幸过关。

关于挣外快。对于挣外快，我的态度是：根据自己的能力争取增加收入，一是别为此搞垮了身体，二是别为了挣钱而忽视了老婆孩子，三是合法挣钱、依法纳税、别犯错误。

此外我不敢炒股，一是经济实力不够，二是心理上输不起，尤其是老伴血压高，更经不起折腾。我开始不想买彩票，因为概率论教导我们说：中大奖这个小概率事件在一次试验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搬到北京后每月买不超过五十元左右的福利彩票，一是经济上负担得起，二是为福利事业作些贡献，三是傻子才不乐意中大奖呢！可惜迄今为止最多中过十元的奖。

违规的事不敢做。十五年前有人来电话出价两万元买一张空白成人高校毕业证，我说你饶了我吧，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招生录取不敢收礼。我可不想被这种事闹得晚上睡不安稳。不过，有些同事为此在过年时送我两条烟、两瓶酒，我也不推辞，还“胆敢”写进中层干部每半年一次的考评表中。

学生在校期间坚决不收他们的礼品，更不必说收钱了。因为收了之后他考试不及格怎么办？违纪怎么办？毕业以后就无所谓了，可那时也没人送了。

讲课津贴一直是我这些年工资以外的主要收入。这笔钱挣得心安理得。在技校时有些老师背后告状说我兼职挣两份钱，我在全体会上说“政策允许，领导批准，我有水平，有人请我，哪条错了？你们谁有本事谁也去！”他们哪有这个能力，于是目瞪口呆。可见君子该动口时就要动口。

求人不如求己。文革前我是知识分子子女，文革中成了反革命子女；文革中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时说是“证据确凿”，材料三尺厚，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时说是“查无实据”，材料付之一炬；中学大学因为“社会关系复杂”十年不能入团，文革后写了一份申请就入了党；文革前弟弟因为被歌唱家评价为“多年未见过这么好的男中音”而为国内三家顶尖文艺团体争抢、只因为母亲与在美国的大姨有通信联系而被人事部门否决，文革后我所在的机械局却因为我有这个海外关系几次要我去党委宣传部开会，说我是侨胞（？）要通过海外关系引进外资；文革中因为我爷爷曾是两广总督而给我贴大字报说“你名字中的桂字代表广西，这是你爷爷企图复辟的明证”，文革后老家不但给他修坟还写进县志，我这里则有人因为有这个爷爷想推荐我当市政协委员——什么时候能根据我自己的水平和表现来评价和使用我？

所以文革以后我一直是靠自己的努力向前走，而且一直很知足，就算是待遇低位收入比不上其他一些人，我也没有心理不平衡。自己的梦自己圆，有时候有点阿Q精神也未尝不可。

幸福不幸福其实更多的就是个人的感觉，不必与别人比，也不必总担心别人怎么说。

---

## 我喜欢教书

我发现自己记忆能力强于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强于综合能力，模仿能力强于创新能力，对具体事物的观察能力强于抽象思维能力；加上有思维惰性，不愿意深入地思考问题，所以一直以来对抽象数学有畏惧心理。正好毕业后要我教书，又是教基础课，这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因为这只需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一点小聪明，外加认真做事和懂得尊重人，而这些我都具备，所以从上讲台第一天起就喜欢上了这个工作，而且越做越有劲。结果是距离数学前沿越来越远，教书却是越来越熟练。

先说基础扎实。这要感谢北大和我的高中母校天津市耀华中学，是它们给了我较扎实的基础知识，也教会了我如何踏踏实实做事。尽管我的学生要么是基础很差的成人学员，要么是电大专科生或者是高考“二本”的学生，我还是坚持不搞应试那一套，而且能深入浅出地讲课，还能在电大统考或自学考试中取得不错的成绩。

小聪明还是有的，否则也考不上北大了。用在教学上就是能领悟到能力培养与知识传授同样重要，学习方法有时甚至比学习知识本身还重要，而且能将能力培养和学习方法指导有意识地融入教学过程之中。这算是素质教育吧？

工作认真，对我来说就是卖力气。其中原因非外人所能知。第一，早在大学期间一位海军转业的女代干生开会时当着一群同学的面严肃地说“张存淮同学思想改造的路要比别人长很多”。我一直极不服气，所以参加工作以后一直卖力干活，而且自认为思想觉悟决不比别人低。第二，地震前在唐山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空有一腔报国志，却被文革所压抑，然后又遇地震，壮志未酬身先死。我总觉得是在替他们卖力气。什么名利地位待遇奖金，比起这些三十六岁前后就去世的人，我有什么可斤斤计较的？

再说尊重人。开始工作那几年，因为周围的人大多学历不高，所以自己“自我感觉良好”。以后经过文革地震碰了一系列钉子之后，逐渐懂得尊重人的重要。文革期间和地震之后我最困难的那些年，帮助我、鼓励我度过难关的主要是我的领导、朋友和学生；我的三个高级别模范先进不是校长推荐的，是电大学生们在市教育局组织的座谈会上无意宣扬后“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所以我一直很感谢学生，也在尽心尽力地为他们服务——为他们创设一个有利于自主学习的环境和氛围。我也一直很尊重我的那些朴实的同事们，即使做了管理工作，对老师们也是赞扬多于批评，即使是批评也是只指出问题和预期后果，决不指责抱怨，更不会将责任都推给他们，也不主观武断地替对方分析失误原因。退休时校长说“你这个教务处长管理不够严，但是服务意识一流”。服务意识和尊重人的态度换来的是学生和同事的尊重，也使人际关系更为融洽。例如退休后想给孩子和自己在北京买房，需要借一大笔钱，我找了

---

三位同事兼朋友，从提出要求到对方答应，每人不超过五分钟。

我教书最不成功的地方是学生对于我讲的知识内容从来不提出任何质疑，连个“为什么”都不问。并不是他们都明白了（除非他们都是神童）；更不是不许他们问（我承诺有人将我问倒了我请全班起立为他鼓掌）；可他们只会问“这道题怎么做？”“这类题考不考？”

还有一点不知是长处还是短处，那就是我总在检讨自己哪里做的还不好，而我的许多同事们则总是指责学生，什么基础差啦，学习不努力啦——总之没有自己的责任。我看有些老师还是不能正确地评价自己，甚至不知道真正优秀的教师该是什么样的。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些当年上过北大的老同学们不要以为退休了就没用了，把我们在北大期间受到的教育和自己的感悟告诉更多的人吧！

---

# 毕业后的工作简况

数学三班 张国斌

1965年4月，与二十余位同学一道被分配到二机部九院九所，在这儿干了十五年；1980年8月调到二机部自动化所（现核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参加该所的筹建并工作了十一年；1989年9月调到中国核工程公司，两年后，因体制调整，该公司建制取消，我被分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现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直到2005年5月退休。正式工作了四十多年，单位换了四个，但从未离开“核”，工作地点一直在北京，搬了三次家，从未离开海淀区。

四十年来，从事过理论计算和计算方法研究；目标规划法应用研究（如参加北京国棉一厂棉纱配比的优化课题等）和计划协调技术应用与推广（泰山一期核电工程建设计划网络和计算机分析程序的编制、上海核电设备制造厂应用推广等）；从事过行政工作（自动化所筹建，担任办公室主任）与技术管理工作（科技委期间）。

为适应工作需要，陆续补习了原子能工业、反应堆工程、核物理、中子物理、核化学、放射化学与化工等课程。有在学校的基础，学反应堆工程与核物理等还可以，学放射化学对我就困难得多（中学时化学就学得不好）。一路走来，技术职称相继取得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级）。曾获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一等奖各一项。参加编写的出版物有：《能源百科全书》（任核能分支副主编，撰写部分条目）、《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写部分条目）、《国防科技知识普及丛书》（任核能分册技术顾问）、中国工程院系列丛书《核与辐射恐怖事件管理》（任编委，部分章节的编写）、《公众应对恐怖事件常识》（执笔“如何应对核与辐射恐怖”部分）。

担任过的行政、技术管理职务：处长、科技委秘书长（副局）。

2005年自中核集团公司退休后，被国家原子能机构聘为核事务专家顾问组成员，从事核国际合作与防核扩散咨询工作至今，每周工作三天，名副其实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所从事的工作，多半与数学关系不大，但北大严谨求实、独立思考的学风，使我受益匪浅。匆匆四十年，碌碌无大为，但并不感羞愧，因为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努力。头顶北大数力系毕业的光环，从未敢丝毫懈怠。所到之处，得到过许多前辈、师长和朋友的帮助，成长的路相对比较平坦。

谢谢北大的培养，谢谢师长和朋友的帮助！

---

# 大学生活二三事

数学三班 张国斌

## 奇妙的巧合

基础课学完后，被分到了微分方程班、偏微分方程专门化。宿舍也由 28 斋 1 层搬到了 2 层，位置在进北门横向走廊的最东头南侧，247 室，床位在进门右手侧上铺。一次到 28 斋对面的邮局寄信，发现了当时北大的电话号码：282471，这个数字似曾见过，啊！这不就是我的宿舍号吗？如果把我的床位假定为 1 床，那么，我的楼、我的宿舍、我的床正好是北大的电话号码：28（斋）—247（室）—1（床）。多么奇妙的巧合！

这次参加数力系 59 级同学入学 50 周年聚会，有幸到北大故地重游，学校变化之大无法形容，但 28 斋依然故我，除刚粉刷过的灰色外墙外，还是老样子，正是由于这个奇妙的巧合，使我牢牢记住了我的宿舍，也牢牢记住了当时的北大电话号码。

巧合，也是一种缘分吧。

## 北大第二校徽

在北大，我们先后在大饭厅和学生第三食堂就餐，不管在哪儿，吃饭时都很拥挤。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使学生饭后有饱腹感，食堂经常做疙瘩汤，二两疙瘩汤可以盛一满碗，大家端着碗边沾满粘稠汤汁的碗，相互挤蹭着，疙瘩汤汁就披挂在彼此黑色或蓝色的厚厚棉衣的后背、袖子上，留下耀眼的白色痕迹，这痕迹像鸟的羽毛，像风吹过的白云，俨然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冬日里，每当星期天，在和煦的阳光下，当你站在海淀镇新华书店台阶上放眼望去，小巷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只要身上闪烁着白羽毛、白彩云的，不用特意看其胸前的校徽，十有八九是燕园学子。因此，当时将身上的疙瘩汤嘎巴戏称为北大第二校徽。

与唐云、王理，何怡生等同学一起，为筹办入学 50 年聚会，从 28 斋向勺园、校医院方向走着，路过当时学生第三食堂，几个同学不由得想起在校时的往事，不免大笑一阵。我说，你们还记得疙瘩汤的打油诗吗？不知是哪位才子写的，当时是这样流传的：

“床前明月光，疑是疙瘩汤，有心吃二两，没有机动粮。”

---

又是一阵笑声。

## 一张八分钱邮票的故事

我出生在北方农村，家境贫寒，读大学主要靠国家助学金，生活零用则靠哥哥、姐姐资助。每次赴校前，爸爸妈妈总是对我说，要好好读书，生活要简朴，哥哥姐姐并不富裕，不能随便向他们写信要钱，再困难也不许向别人借钱。父母的嘱咐我谨记在心，并一丝不苟地践行。1963年暑假前，姐姐如期寄来了回家的路费，在学校订好了火车票，还有些剩余，就买了一本英汉词典。期末考试结束了，拿到了车票，就分别给爸妈和姐姐写了信，告知回家的具体日期，然后，匆忙到宿舍对面的邮局去寄，等到买邮票时才发现，口袋里的钱已经不多了，扣除到永定门火车站的汽车票外，只能买一张邮票，给姐姐的信就不能寄出了。只好回家后另写一信告诉她爸妈身体都好，我已到家和去北戴河的日期。到姐姐家后，她责怪我收到钱也不回信云云，我不敢实情相告，那样她会为我操心的。

无独有偶，现在与我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付先生，曾在联合国供职8年直到退休。一次聊起大学生活，他说，大学生活值得回忆，有青春激情，有快乐，也有窘境。一次，写好了家信，竟然八分钱的邮票买不起。穷则穷矣，现在想起来，仍觉快乐！原来这八分钱的邮票不仅仅难为过我。

一张八分邮票的故事，我讲给儿子听，讲给孙女听，他们不以为然，不理会我们求学时的艰苦，并说，那个时代过去了。是啊，社会进步了，通信有电话，有e-mail，有QQ、Skype网聊，很少写信买邮票了。尽管如此，这八分钱一张的邮票，让我至今记忆深刻！

---

# 诗一首

数学二班 张立昂 耿素云

燕园六载萦心头  
古稀之年再聚首  
人生迥异多姿彩  
难忘同窗情义厚

入学五十周年同学聚会  
立昂素云共祝诸位安康  
幸福

二零零九年五月  
于北京

---

# 北大入学五十周年感想

力学班 张庆华

2000年10月我所在的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地球流体力学实验室利用一个下午和晚上时间为我举行学术报告会和生日晚会，庆祝我从事海洋科学事业三十五周年暨六十岁华诞。亲朋好友悉数到场，热情洋溢的发言，对我坚持基础科学研究锲而不舍的精神褒奖有加，他们的热情让我非常感激，也激起我的万千感慨。

毕业三十五年，我虽然没有离开过“海”，但真正到中科院海洋所工作也就是二十五年，从四十一岁到美国攻读学位，较系统地学习物理海洋科学知识至六十岁，还不到二十年。曾经的行政事务使我不能深入地进行科学研究，到1998年不再担任室主任，才真正可以集中精力深入思考一些基础问题，刚有一点想法就到了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于是我写下“六十随想”一文，发在网上。实际上直到七年之后，当我六十七岁生日时才办理退休，至今仍承担科研项目，还在从事科学研究，自己课题返聘自己。

从1986年开始我一共承担了十项国家基础科研项目。依据我的爱好和特长，我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在我的理论研究工作中，求解微分方程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已有的数学理论在实际问题面前束手无策，于是写出以下一段反映近几年来我在这方面的努力。最后再附上我以前写的“六十随想”，作为纪念。

所有数学、力学关于求解微分方程的教科书所收录的都是成功的算例，但实际问题几乎都不符合那些理想化的条件。作为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的毕业生，自认为有较强的数据基础，但是在实际问题面前却束手无策，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曾经责备自己不够努力，没能迈进抽象数学的大门，但是后来求教于北大的老师和数学所的专家，给我的回答是你这个问题的解“存在、唯一”，最好的求解办法就是数值计算。记得力学老师教导我们求解问题的方法是抓两头带中间，当然这在计算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好办法，但它能解决的问题是很有限的。

我所从事的是海洋地球流体力学，所面对的是具有复杂地形和待定开边界条件的热力-动力学系统，数值计算并非万能。对于机制性研究，经过合理简化之后获得的解析解或半解析解，仍然是力学工作者所企盼的。很多实际问题最终化简为线性微分方程的求解，但是不规则区域的线性偏微分方程没有统一的（简便）求解方法，“个别”线性奇异（极点型奇点）常微分方程的求解藉助特殊函数才能完成，而且非常复杂繁琐。

经过深入思考，得益于我文革后期花了一年时间自学了广义函数和Fourier分析初步的

---

良好基础，我构建了扩展谱方法，将不规则区域扩展到更大的矩形区域，然后利用谱方法求解，再利用不规则边界上的边条件，确定该边界上扰动源的强度，从而得到形式简洁的级数解，将它用于开边界反演比较方便。这项工作与人工边界方法不谋而合，但又不尽相同。由于后来忙于常微分方程求解，此项工作没有再进行下去。2008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就奖励给了“人工边界方法”方面的工作，可见此项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n$  阶常微分方程充其量只要求其解的“ $n$ ”阶导数存在，所以该解是有限光滑函数，已有的二阶线性（奇异）常微分方程理论将解写为奇异因子与幂级数之积，而该幂级数又是扩展到复平面上来讨论。我们知道复平面上的收敛幂级数就是解析函数，它是充分光滑函数，超出了方程所要求的有限光滑度。过度的光滑度就限制了级数的收敛性，所以就会出现非正则奇点附近的正则形式解是不收敛的、只是一个渐近解的“怪现象”！

对于这个问题，我给出了明确而彻底的解决方法。首先  $n$  阶光滑函数总可以分解为  $n$  阶良函数和  $n$  阶不良函数两部分。 $n$  阶良函数可以用 Fourier 级数（直到  $n$  阶导数）一致收敛的逼近， $n$  阶不良函数是有限个修正函数。这种含有有限项修正函数的 Fourier 级数我们称作改进（Corrected）Fourier 级数。于是，奇异因子与改进 Fourier 级数之积就成为构造线性奇异常微分方程解的完备函数族，利用它我们给出了求解二阶线性奇异常微分方程的统一方法，已有的各种作为二阶方程解的特殊函数只是我们的算例。这种方法也可推广到三阶、四阶方程，当然求解过程比较复杂，但它给出的是对任意复值系数都适用的统一求解方法。

另外，沿着改进 Fourier 级数的思路走下去，只要适当地选取修正函数，利用 Fourier 级数逼近窄谱分布就不再困难，可见引进复杂而并不完整的“小波变换”理论并非是最好的选择。

这一系列的工作只在国外发表了两篇论文，大概需要有二十篇论文才能将问题说清楚，最好能写成一本书，这是今后五年的任务。

——当你的工作与兴趣是一致的并成为一种习惯时，那就是一种享受。

2009年6月30日

## 附

## “六十”随想

六十岁是法定的退休年龄，这个规定对于背负着计划经济重担的国家是不无道理的，但对于一个由于历史变故而缺少一代科技人才的国家似乎又没有道理。当然法定之外又有各种各样的特殊对待。但是这一切对于已经以科学事业作为终生追求的科学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有些学科中确实曾有过一些绝顶聪明的人在卅岁就取得了惊世的成绩。可以肯定他一定也是具有惊人的毅力和超人的勤奋。但是对于大部分学科还是需要一大批孜孜不倦努力的、长时间默默无闻奉献的人。他

---

们在前人工作基础之上一代一代推进着科学事业向前发展。所以对于献身科学事业的人来说，保持并延长科学的青春是非常必要也是完全可能的。

现代的科学和技术已经是不可分割的，尤其对于应用基础科学更是如此。但终归科学和技术是两个问题或两个不同的方面。科学是探求自然界的基本规律，科学是技术的基础；而技术除去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之外，它又是科学研究所的重要手段。对于揭示基本规律的自然科学，重要的成果必须是原创性的，也只有原创性的才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只要世界上有一个人揭示了它，其他人的工作只能是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其科学意义是完全不能等同的。当然，由于自然界有各种层次上的基本规律，所以也有各种层次上的原创性，各种水平上的从无到有的、从不知到已知的认识过程。所以有抱负的科学家应致力于这种真正创新性的事业。

不容置疑，现代科学已经不再是只靠少数人在象牙塔中能完成的了。但是科学家个人的独立思考、锲而不舍孜孜求索的精神，仍然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灵魂，也是科学家必要的基本素质。由于社会的原因，并非科学家本人意愿，科学界也有不少人被奉为权威，他确实曾经开拓过某些领域，并且很多人追随其后，将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科学认识的局限性，任何的绝对化都将成为科学自由思维的桎梏。所以不迷信权威应是科学家基本属性。任何新的思维都必须牢固地建立在基本科学定律之上，都应经得住基本定律的检验。

科学研究离不开科学家的兴趣，只有那些甘心吃苦并且在苦中取乐的人才有可能在科学的百花园中耕耘和收获。

---

# 毕业后的经历和感悟

力学班 张汝光

## “四清”

★ “四清”时，我被分配负责一个生产小队。有次有两人找我评理，他们争了大半天，终于等到了我的裁决：很对不起，你们说的我一句没有听懂！（刚到上海，连上海话都听不懂，怎么听崇明话？）

★有一次派我回市区到提篮桥监狱提审国民党犯人。当时自己多嫩，心中很不踏实，便在渡轮上背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自己壮胆——别说，还真管用。

★崇明的玉米粥，配上房东自制的盐腌崇明小螃蟹，味道好极了！可惜后来就不再有这样的口福了。

【感悟】刚走出校门，便入农舍，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和最底层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也是一生中一次难得的经历，自己以后的生活也留下了它的烙印；一踏上社会，便卷入“四清”运动，常常还要独当一面处理事情，走过了，回过头看，又是一次人生的锻炼、积累和成长。这一年的经历——值得。

## “文革”初期

★ “文化大革命”初期，印象中有位同学（郑成元？）到上海串联，给我捎来于晏悦的一句话（晏悦说不记得了）：运动不要卷入太深。可惜为时已晚，我已是研究所的“第一把手”——夺权小组组长了。（多“神气”！）不知出于何故，老同事们把刚到研究所、“除了许守勃，谁也不熟悉”的我，给架到这个位置上——小小的历史误会。没干多久我就受“炮轰”了，因为我的“右倾思想”暴露无遗：替“走资派”和“反革命学术权威”说话，自己还是个华侨！于是便自动辞职下台——及时脱了身，算是很幸运！

★接下来的命运自然是一落千丈：成了“清理对象”。宿舍被抄，办公室贴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的标语，还开过一次全所的批斗会。不过还好，由于实在凑不出什么内容来，后来也就不再开了。当时我倒一点也不怕，对不实之词理直气壮反

---

驳，照样和印尼的姐姐通信。我还公开说：即使把我打成反革命，总有一天会给我平反——我相信我的祖国。

★其实所里大多数人都是同情我的，即便我是“清理对象”，所里的同事（包括干部）对我也都很好。姐姐来信被革委会扣了，门房老大爷偷偷告诉我，我去要了回来；我被列为“清理对象”，要抄宿舍，会有人给我“通风报信”；我就在这时因为没事干而开始谈恋爱的，“她”也是所里的，也竟然敢和我谈。

【感悟】毛主席说过：要相信大多数的群众是好的，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这是真理，即便文革期间也是如此。

## 下放劳动

★研究所解散时，我已在拖拉机厂参加科技研发工作。该所并入耀华厂，虽然把我当工人，但就是不同意拖拉机厂为了科研需要用工人来换我。拖拉机厂要我去上班，许诺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一定能把我调过去。不过我还是老老实实到耀华厂上班。现在证明这决定是对的，若到拖拉机厂，就没有后来在复合材料方面的发展——在我人生的叉道上，“上帝”启示我选择了好运。

★在耀华厂，我边劳动边帮助车间搞技术革新，与工人师傅融洽相处；生产搞上去也让领导十分高兴。我是“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班组的政治学习竟然叫我负责。有次支部书记问我：“阿光（厂里对我的昵称），你怎么不像华侨？”我说：“书记啊，华侨就该像我这样。是你的脑子歪曲了华侨的形象！”

★问周总理要房子。我1969年结婚没房子，临时住丈母娘家的朝北亭子间，六平米左右，房高最低处二米左右，屋顶一层油毛毡，没有瓦片，夏天炎热冬天冰冷。次年生女儿，1972年还没有房子。我奋斗了三年，从房管所到市政府、市委，没人理我。找到厂党委，管组织的副书记接待我，听了我的反映，她便开始教育我“要相信党的政策”等等等等。我打断她说：党的政策我从不怀疑，但是要我相信所有干部都在执行党的政策，除非我是傻瓜。而我还不是傻瓜。现在我只剩下一条路，问总理要房子。她顶我说：你要考虑考虑这样做对不对。我问她：在国外我得靠自己或靠亲友帮忙。回国后我只能靠组织。靠组织在上海不能解决，我反映到总理也是靠组织，你说有什么不对？她无言可答。给总理发信约两个多星期后，房管所来看我，不但给我分房，还说要有煤气和卫生设备的——是我在麻烦总理，还是下面的干部在麻烦他？为什么这么一点小事也非得到总理那儿才能解决？总理怎么能不忙！

★文革结束，其它下放的同事差不多都走光了，厂里还是不放我“归队”。我说：国家培养我，大学念了六年，不让我“归队”是浪费国家的培养。厂长反驳说：你在这里有八年

---

的工作经验，比六年还多二年，放你走是更大的浪费。我还想搞自己的业务，只好求助总厂党委书记，在他的干预下分厂才同意放人。

【感悟】拖拉机厂的一年劳动和耀华分厂的“八年抗战”中，厂里的工人、基层干部都很喜欢我，给我留下愉快和美好的回忆。我的华侨身份，我两位哥哥的出境，都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歧视。文革期间姐姐来探亲，分厂领导还来看望她，还在姐姐面前表扬我呢——命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上帝”的出题。是你所面对的客观现实，你只能接受，别无选择；另一是你的解题。走怎样的路，是你自己的决策，其后果不能再怪“上帝”。以平和、积极的心态去应对现实，才能选择最佳的路径，走好我们的一生。

## 回研究所

★“归队”到哪里？研究所在浦东，我想到离家不远的“建筑科学研究院”（他们要我搞高层建筑的振动问题），但研究所恢复后的第一任所长不同意。所长是原研究所领导成员之一，也很熟悉，我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大学里我可没有学过复合材料，要不你先让我自学一年。真没想到所长竟然还同意了！在后来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不用上班，所里不安排任务，整天泡在“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查阅大量国外（主要是美国 NASA）研究报告，系统吸收、积累和分析、归纳复合材料的基本力学性能机理。这为我后来的工作打下很好的基础——为此，我一直很感激那位所长的开明。

★1978 年我才开始搞真正的科研工作。此时 38 岁，有了老婆，又还多了个女儿。但又值得庆幸的是，我得到总工朱颐龄教授的很多关爱。他催我出论文、代他出去讲课、让我参加学术交流——用他的话说：“你去认识认识人家，也让人家认识认识你。”在他的指导和督促下，总算还做了一点工作，自己也感到很满足——命运总是这样在照顾着我。

★天上掉下的馅饼。1986 年 6 月底参加完北京一次国际交流会，我上国家建材局标准处汇报工作，却闯进了人才司。一位领导告诉我他们调整了办公室，接着便问：张汝光，怎么到现在还不想出国学习交流？我说：没给我机会，怎么出去？他说：你们所没人报名。今年报名截止了，你准备准备，明年要报名。当年 9 月，所里接到人才司的发文，给我所一个访问学者出国名额，还指明是给我的——叫得出我的名字的那位领导，我当时还真说不出他是什么官，叫什么名。

【感悟】所长、总工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想一定是和八、九年前我在同济大学研究所和他们相处时留给他们的印象有关；那位人才司的领导一定是在那个场合认识了我，并在无意中给他留下了好印象——人生中你走的每一步都尽力做得最好，就是在给自己安排最好的命运。

---

# 我的大学生活

数学二班 张饴慈

## 险些上不了大学

十八岁高中毕业之前，我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中学的生活成为我最美好的回忆。

高考的发榜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是我人生痛苦的开始。毕业前，班主任曾问我：你想过会考不上大学吗？我很干脆地回答说，没想过。我以为我很懂党的政策，只要自己是要求进步的，党不会把我拒之门外。

那年高考是分期发榜。先是第一类学校，如清华、北大等。当时，我们班（五十人左右）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清华有九个，中国科技大学有七个，北大有五个。其他人也大都是第一志愿，如北京工业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等。我们班上的学习委员，学习成绩在班上是很好的。我自信高考的成绩也很好，但却不见通知书的到来。我的操行评语没有问题。我知道这是家庭的原因。在那个暑假里，眼看着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录取到满意的学校，高高兴兴在玩，我却一个人躲在家里，不知自己今后的出路所在。这个打击，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太大了。在那几天里，我哭哭不出来，喊喊不出来。整晚睡不着。早上一起来就想这件事，想得难受，真受不了。这是一种要把人逼疯了的感觉。我太没有思想准备了。父母都去上班，我一个人在家，想强迫自己不想，却做不到。想找一件事做做，好暂时忘掉一会儿，也做不到。那是暑假，没事可做，没书可念。想看小说来忘掉这件事，但根本看不下去。就一个人在家里走来走去，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时为了安慰自己，会自欺欺人地胡思乱想，诸如会不会搞错了或邮局弄丢了通知书等。同学们很同情我，来看我，安慰我。但能怎么安慰呢！能说什么呢！他们也不知说什么好，只使得我更伤心。

过后，第二类学校，主要是地方院校，如北京师范学院等，也发放录取通知书了。还是没有我。终于，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念书了，要准备参加工作了。其实，那个年代，有不少人因为家庭贫寒而放弃了念书，去工作。和他们相比，我算不上什么，但大概是家庭关系，我太没思想准备了。从心态上来说，可能当时我更痛苦些。无奈，父亲托人在科学院动物所给我找了一个实验员的工作，准备去上班。

那时候，许多同学帮我打听消息。有人告诉我，本来第二次发放录取通知书时有你，但你父亲为你录取的事给上面写了封信，反而把事情弄坏了。这表明你和家庭划不清界限。后

---

来，又有同学告诉我，听说有人在北大数学力学系报道的名单里看见了我的名字。不过，所有这些都不落实，我也没有勇气去打听。何况，那时北大已经开学好几天了，新生都上课了，怎么可能呢？

9月中旬，发放最后一批录取通知书（那时不被录取的人也会收到一个通知书），我接到了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录取通知书——这是我报考的第二志愿。我的学号是5901215，59表示59年入学，01表示数学力学系，我是第215名（在我后面还有一名，他是归国华侨）。那时的排名按地区，北京的学生排在了最前面，从5901001开始，有二十人左右。我是例外。

这一个多月的等待和痛苦（现在看来时间并不长），是我一生中心情最坏的时段之一。也许是过去一切都太顺利了，也因为这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后来碰到更悲惨的事不少，但就心情而言，很难和这次比。

## 一入学就被另眼相看

在外人看来，能上北大多幸福啊！也确实如此。相比之下，当时有多少人和我有着同样的家庭原因而被拒之于大学之外啊！

不过，厄运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我这个迟到者，一入学就成了“另类”。许多活动不能参加。例如，全班同学去机场迎接外宾（记得是刘少奇在机场迎接几内亚总统杜尔），我和几个同学被留了下来；那一年人民大会堂刚建成，全班同学去参观，我们几个人还是被留了下来。不仅留下来不许去，还要开会，表态谈感想。这样的屈辱生活，和几个月前在101中的生活相比，天上地下！

入学后的政治学习。大家都照着社论说着一样的话，和中学完全不同。我十分不习惯。更可怕的是，只要我一发言，小组的学习立刻就变成了对我的批判。其实我说的和大家说的一样啊！但总有理由批我。连我的发言时间也不对，也要批。我发言晚了，不对！发言早了，也不对！在中间时间发言还不对。弄得我无所适从，每次开会都提心吊胆。

记得在中学时我们就被告知，有问题应主动找组织汇报思想。但当我很苦恼，去找辅导员时，他却说他没有时间，不和我谈。他可以和出身好的同学一起打球，一起玩，却故意地不理我。那时候，真难啊！心里真苦啊！记得这个辅导员后来只找我谈过一次话，他把我平时在宿舍里说过的话，列举了一堆，说我吹嘘家庭（指我家在北大，父亲是北大教授）等等。可有许多话我根本就不记得是否说过（那时我才知道我的一言一行都有人向上汇报）。但你能不承认吗？然后他问我怕不怕被开除团籍（当时班上刚开除了一个同学的团籍）。

当然，这一切不是专门针对我的。班里的整个形势都充满了这种肃杀之气。开学不久，班长因出身不好，被整了下来（从那以来，他成了一个萎靡不振、胆小怕事的人，直至今日

---

没有改变）。然后是批斗我们的解析几何老师程庆民。他讲课很好，但他是右派（他曾是系团总支书记）。我没看出他讲课时放了什么毒，也不记得批了些什么。但，在全年级上百人的批斗会上，我第一次看见开会时动手打人的情景。激进的学生上台去抽老师的耳光。看得我心惊肉跳，不知道自己今后将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中。

## “交心”

接着，在同学中开展“交心”活动。

在高中时，我经历过一次“交心”。那时大家什么心里话都谈，谈完以后，同学之间彼此交谈，互相帮助。我还以为这次和我们高中时是一样的呢！于是，仍像高中那样，谈了许多，而且有不少是高中时曾经谈过的。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自己谈过些什么，应该有不少该挨批判的话吧！正因为如此，领导决定让我在大会上“交心”。其目的是，以我为“榜样”，引导同学们像我那样“交心”。不过，我们这次“交心”后，得到的不是互相帮助，而是批判。

一位广州来的同学王则柯（他现在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交心”时说：他们中学校长在传达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讲话时说，陶铸讲：“广东亩产三千斤以上的报道都是假的”。这还了得！人们拿出了《人民日报》，找出亩产三千斤以上的报道，问这个同学：“你是相信你们校长，还是相信党中央的报纸？”

另一位来自广东名叫李测章的同学，犯了大忌。他居然说：他们那农民说“共产党比不上国民党”。结果李被重点批判，开除了团籍；后又以学习成绩不及格的原因，被退了学。从此，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

“交心”后期，要求每个人“主动”报名申请被“系统地”批判。谁敢不报名呢！在第一学期末，选了两个典型，在班上接受系统的批判。一个称作“白专”道路典型；另一个称作“粉红色”道路典型。其批判之猛烈，给全班极大的震撼。但是，这还没完，到第二学期开始，又找了两个“问题”更严重的同学（其中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李测章，另一个叫何怡生），进行批判，这次批判更厉害，有那种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味道。不久，李就被勒令退了学。虽然到了1962年对这些批判进行了甄别，向他们进行了道歉，但对他们已造成了终身的伤害（李测章就拒绝再回校学习）。2007年，一些北大老同学聚会，当何怡生（现为北京教育学院教授）听说打算请我们一年级的辅导员时，立刻就表示自己不能参加，说一回想当时的情景就很刺激、心情受不了。

我虽没有被选中为典型，但仍在被批判之列。不过，我也确实“应该”被批判。2005年，何怡生对我说，一年级向党交心时，我在北大地学楼113教室的“交心”大会上说过，

---

“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光荣、正确、伟大，但怎么能‘证明’它今后永远光荣、正确、伟大呢？”我竟然说过这种话？我完全忘记了！当时，这种话不被看成是反革命，真是万幸。（有人会认为，这是我学数学学傻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这只是常识啊！那时的情形是：人人都知道这个常识，但人人都不说而已？还是说，那时人们被“教育”得连常识也没有了？）

那时形成的气氛是“红色恐怖”。我们这些人在行为上没有出轨，不过是对一些问题多想了一些，有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宣扬自己的这些看法，而是以一种“待罪在身”的态度，战战兢兢向组织交待。就是这样，也不能被谅解。常常是自己都不知道为了什么，就受到批判。例如，当时已经吃不饱，有人甚至浮肿了。何怡生有一次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我们虽然现在吃不饱，但我们能克服。祖国的前途是好的、是光明的，……。话没说完，立刻就有人起来批判他说，我们现在吃得很饱，和解放前相比，根本就没有吃不饱的问题，吃不吃得饱，这是阶级感情问题，等等。那时，我们这些被划入“另类”的人，有随时被打成反动学生的危险。

我在那个学期，非常怀念 101 中的生活，怀念中学的同学。但又十分自卑，不知向他们说些什么。我总问自己，我是怎么了？我和几个月前还是一样啊！为什么处境变成了这样？

## 运动和劳动不断

进入寒假，全系开始批判牛顿、柯西等数学家，最后落实到要编写一套“无产阶级”的微积分教材。那时我们一年级的学生连微分和积分的概念都还不知道（当时只学到函数的连续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被领导认为是“最少保守思想、最没有条条框框的主力”。由于我们学的数学太少，许多东西都不懂，就要求高年级的同学只许谈观点，不许涉及具体内容。然后，在辩论会上，运用《矛盾论》、《实践论》来进行批判。就这样，虽然只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寒假中却编出了第一学期的“数学分析”教材，并向学校报喜。整个寒假一天假也没放。相反，天天开夜车，每天的辩论会都在夜里十二点以后才开始，最早也要两、三点钟才能睡觉，六点多就起床。晚上天天去食堂吃夜宵。我家就在校内，我却连春节除夕都回不去。老实说，不仅政治上我落后，就是这种没有休假、没有自己任何空闲时间的生活也使我很痛苦。

大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运动和劳动不断。我已记不住其间的先后顺序。在批判了何怡生他们后，主要的活动有：参加在校内六公寓盖教工宿舍的劳动、去十三陵修公路铺管道、去城里的人民公社搞超声波、在实验室里搞电器元件的技术革新、加上全校的搞卫生等。

就说说打扫卫生的事吧！打扫卫生要整整停课一周，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到半夜 12 点以后，不停地搞。大家趴在地上用抹布一点一点地擦地。每晚验收前不许我们进宿舍，怕踩

---

脏了。为了使宿舍显得整齐，让棉被颜色相同或近似的同学住在一个宿舍。书架上放满的是从图书馆借来的同一种书。深更半夜也会组织各系之间的观摩，回来开会、找差距。为了整齐干净，我们班提出，把六个人一屋的宿舍改为住八个人。空出一间宿舍把大家的“破烂”放进去。这样，我们住的宿舍里基本上没东西。表面看是干净了，但生活上却变得十分不方便，大家不时地要去那间空宿舍去取东西。那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

就这样，整个一个学期，周末都不休息。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只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吃饭，有时连洗澡都需要全班统一安排时间，一起去洗。101 中校庆那天，因为是离开 101 中后的第一个校庆，我多想回去看看啊！但不许我请假。北大和 101 中近在咫尺，骑车用不了十五分钟，我却回不去。由于所有活动安排得太满、太紧，人们已经吃不消，上面提出了“劳逸结合”，要求有适当的休息时间。但这根本就是一句空话。直到 1960 年年底，三年困难时期到来，人们削减粮食定量后，才有了真正的“劳逸结合”。

有许多东西，只有当你失去的时候才觉得可贵。那时候真想念书啊！在这个学期，我们上课的时间，加起来却只有一个半月。记得期末考“数学分析”，考的内容不是数学本身，而是用《矛盾论》、《实践论》来分析所学的数学。记得是按小组来考，即以小组为单位，选一道题目，集体准备，然后派一名代表当众回答。我记得我们小组的题目是：“试从泰勒公式看精确与近似的辩证关系”。其它一些题目也类似，如“用《矛盾论》来分析积分与微分的关系”等等。

暑假里，留在北京的学生被组织起来，去大兴农村劳动。在大学期间的各次劳动中，我都很狼狈。因为，就劳动来说，我确实比不上出身工农的同学。不会干活，体力也不行。我拼命地干，累得不行，但最终还是落在同学们的后面。边上很少有人关心你，帮助你，却不乏看热闹、看笑话的。其心情可想而知。

二年级开学不久，全校停课集中学俄语。当年春天中苏论战公开了，中央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的长篇文章。我们念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俄语版。是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再给每人发一本厚厚的、油印的单字表，当字典用。学习的形式是全班同学坐在教室里，外语老师坐在前面，从早到晚，每个人自己看书，一直到吃饭休息。吃饭前要汇报自己读了多少。没想到的是，这种学习是竞赛式的，学校里的大喇叭天天广播着，某某系的某某同学一小时内读了多少个印刷符号，又打破了纪录，等等。大跃进式的记录不断被打破，从一小时几千个印刷符号，到几万个，甚至十几万个印刷符号。学习两天之后，我和几个同学就成了落后分子。每天晚饭前被留了下来，谈自己的思想认识。因为当时的观点是：之所以读不了这么多印刷符号，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思想的问题，是思想不解放，落后、保守。因此被留下来提高认识。这样几个晚上下来，晚饭吃不上，洗澡也没了时间（因为每个晚上还都安排有活动）。于是我们也开始瞎说，如果说有人说，读了三万个印刷符号，我就说，读一万个或

---

两万个。不做牛头，但也不做鸡尾了。那时还有验收，当场让学生翻译他所读的内容。其实，“列宁主义万岁”的中文意思我们学习过不止一遍了，只要一看某一段的开头，不难知道这一段的意思。所以验收不难通过。一周后，开庆功总结大会。总结中提到了我们几个人，说：有些人就是不相信一小时能读几千、几万个印刷符号。可事实给他们当头一棒，最后连他们自己也读到了几万个印刷符号。当时听了真是哭笑不得，心想真是活该！

## 十三陵修铁路

到了10月中旬，学校组织各系学生到十三陵新校址进行修铁路的大会战。历时一个月。这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劳动。那是“劳逸结合”的前夕，人已经吃不饱，但劳动强度却极大。我们的任务是修路基，也就是挖土、填土，主要是两个人抬着满满的一筐土，从低处往高处运。我们班在劳动中动不动就搞“运动会”。即限定十分钟，比赛看谁运土的次数多。十分钟下来，胜似跑一个3000米的长跑。每个人都气喘吁吁，脸色苍白。但过后并不能休息，还要接着干活。过一个小时左右，再来一次“运动会”。这样几次下来，几乎人要虚脱、休克（在这次劳动中，我们年级的一位同学，因肠梗阻突发，来不及抢救而去世）。

其实，在这一个月的劳动中，仅仅走路就已经消耗了极大的体力。由于全校参加这次会战的人多，只能分散住在各处。我们班住在山上一个很大的鸡舍里（这是1958年大跃进时国家某部委建的，后被废弃，成了我们的住处）。每天从住处走到工地就要近一个小时，而且随着路越修越远，走路的时间就越长。最后，往返工地的时间近3个小时。我们每天早上4点半就起床，天还黑着，路都看不清，大家只好排着队，每个人紧跟着前面的人，沿着小路下山。由于困和累，一路上大家睡眼惺忪、跌跌撞撞。到山下，在露天中吃完饭，再奔向工地。晚上收工后，在山下吃完饭，再爬山回来。到宿舍总要8点多。每天早出晚归，看到的只是满天星斗。直到10月底，劳动中间休息了一天，才看清了我们住处周围的环境，看见了周围的柿子树和山上的小路。

开始，回到宿舍还要政治学习。但大家实在太累了，坐在地铺上一下就睡着了。无论怎么批评，也拦不住大家的睡意。于是，班干部想出了新的办法：让每个小组排队回宿舍，利用走路时间长的特点，要求每个组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政治学习。这叫做“走路革命化”。所谓学习，就是结合当天的劳动情况做总结，通常的内容是，批判我和几个落后同学的表现。还是那样，我无论说什么都要被批判。例如，别人说，修路时想起了高中读过关于保尔·柯察金筑路的课文，就以保尔的精神要求自己。我也谈到有同样的想法，但是招来的却是一通批判。

在我们住的“鸡舍”里，大家都睡在地上，很挤。天气已经很冷了，地上有厚厚的一层

---

霜。许多同学睡觉时基本不脱衣服。我们都累垮了，很虚弱。我们班有一位华侨叫卢才辉，他回国才一年多，无论生活还是劳动都很困难。但他很要强、很努力。那时，他穿着厚厚的棉裤睡觉。半夜里他总要爬起来上厕所。有好几次，他还没来得及走出我们住的工棚，就憋不住了。把尿全尿到了棉裤里。就这样穿着尿湿了的棉裤又回来睡觉。第二天还穿着它去干活。（卢才辉后来成为为我国做出突出贡献、多次获奖的代数学家。不过，他的身体在大学时就垮了。刚上大学时，他还打篮球、游泳、打羽毛球。快毕业时，却常常在起床时爬不起来，已经要别人搀扶、帮忙了。毕业后，长期在京郊门头沟的一个中学里教书。现在，疾病缠身，每天靠吸十几小时的氧气度日。）

10月31日休息一天。偏偏我把那天的粮票丢了。现在人们可能已经很难体会当时吃不饱的感觉了。好在那是月末的最后一天，又不干活。当人们都下山吃饭时，我一个人坐在被窝里休息。我只和别人说我不想吃。可是，两个和我要好的同学，王志清和罗启成，他们下山去把饭打了回来，我们3个人吃他俩的饭。

## 好友王志清

我上大学后第一个认识的同学就是王志清。他来自哈尔滨，家庭出身不错，哥哥是中学校长，党员。他为人忠厚、善良。在大学近6年的生活中，我们两个人差不多一直同宿舍，吃饭和念书都在一起，达到形影不离的地步。早上一起睡懒觉，赶到教室上200多人的大课时，总是坐在最后一排。晚上一起去自习。在劳动中，他总帮我。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会一起出去走走。刚入学时，他念书没有信心，总要和我对答案，我还批评过他。临毕业时，他念书已比我强。

也许是出身不同的关系，他比我现实得多。尽管他出身好，但他不是共青团员（三年困难时期，我还做过他的入团联系人，但他始终没能入团）。相反，他爱发牢骚说怪话（实际上是大实话。例如，他乒乓球打的不错，但他说：“我打球只是喜欢玩，我从没想过打球是为了祖国而锻炼身体”。我们班会打篮球的人不多，班级之间的比赛总输，他就和团支书说：“这是因为没有政治挂帅的结果”。有一次，团支书到我们宿舍，王志清向他说：“我这一堆脏衣服，你学雷锋，给我洗洗啊！”。这使他成为我们班上的“落后分子”，只是由于出身好，没有对他进行过批判。他比我更冷静、更现实，但也更悲观。

毕业时，他是少数的幸运儿，被分配到二机部九院。但“文革”后，他心情更悲观，那时他可能会去三线的大山里。想到会和在大连工作的妻子长期两地分居，想到这无休无止的运动，他觉得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意思。我隐约地感到他有厌世的思想。

那时，我在平谷的农村下放劳动。大概是1970年，我有几天假，从下放的农村回来看

---

他。利用他下班后的时间，两个人在北太平庄的一家小店匆匆地吃了顿晚饭。当时，工作队刚刚进驻他们单位，搞运动。他有些紧张，我却没太在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一天，我在生产大队办公室的桌上，发现有一封我给王志清的信。信已经破烂了，上面不知谁歪歪扭扭地写了“此人已逝信退回”几个字。当时我没反应过来，以为谁和我开玩笑。过了一会我才清醒过来。知道我给他的信所以会在这里出现，只能是被退回来的缘故。他肯定出事了。但我不敢去打听，也无从打听。

后来我听说，我们分手不久，院里组织对他的批判大会。开会的前一天晚上，他在办公室写检查交待；别的人写批判他的发言稿。当别人准备回去睡觉时，他说，他还没写完，待一会再走。等其他人走后，他自杀了。死时只有 28 岁，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一个不足 3 岁的女儿。我和他北太平庄的见面竟成为诀别。

王志清来自东北，喜欢滑冰。而罗启成是学校冰球队的。他们之间关系很好。罗出身不算好，被分配到唐山的一所中专教书。“文革”后期，调到他夫人工作的城市——合肥。1976 年夏有机会去唐山出差，并去看望我们年级与他同分配去的同学。在这个老同学家谈到深夜。当晚老同学留他住。他说，他出差住在宾馆，条件好。不想，当晚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他惨死于地震。如果他不到唐山出差，如果那晚他挤住在老同学的破平房里，他可以躲过这一劫。

## 我在大学的心态

那时，我的状态是，痛苦但又觉得自己落后，想拼命地改造自己，又总觉得自己跟不上形势。我常常奇怪，在像“搞卫生”、学俄语和劳动中，别人怎么能有好心情而我却不行呢？现在想来，这应该和我处的地位有关吧！如果我不是身处“另类”，而是积极份子，同样的活动，大概我的思想会很不同吧！例如，高中时，打麻雀、大炼钢铁、通过劳卫制等活动，现在想来，有些行为也很荒唐，但身处其中的我，心情却完全两样，充满着对生活、对未来的向往；不仅没有任何痛苦，相反，那段生活成为我一生中十分美好的回忆。不过，我想，最使我痛苦的是那种人整人的生活。这种整人的情景，在中学时是根本无法想象到的。而且，当时别的学校也未必如此。即使北大当时很“左”，但各系的情形，实际上还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数学系里，也不是都像我们年级这样“左”的。

不过我发现，我与工农出身的同学比，生活和感情确实不一样。有几件事至今印象很深。

刚一入学，我就发现同宿舍的一位广东农村来的同学，他几乎没有行李，他的棉被只是棉絮而已，既没有被面也没有被里。这样的差距十分显眼。使我有一种对不起他、觉得自己有愧的感觉。

---

有一次，我从动物园坐车回家，在32路公共汽车上碰见一位同学，他到黄庄就提前下车了。我原以为他有什么特别的事，后来才清楚，他提前一站下车，是为了省5分钱的车钱。这对我来说是从未想过的事。

记得第一年的新年晚会上，全班同学在一个教室里聚餐、演节目。聚会开始时，团支书对着毛主席像说，今天能吃到这样好的饭菜，不要忘了党和毛主席。当时这几句话给我触动很大。因为对我来说，我根本就没觉得这些菜有什么特别的好，也更不会为此想到党和毛主席。

更糟糕的是，和别人的差距不是指“跟得上跟不上”的问题，而是“想不想跟”的问题。比如，学雷锋，每个人都在对照雷锋找差距。但对我来说，不是找差距的问题；而是我对雷锋的许多做法根本就不想学。比如，在火车上念报纸、唱歌，搞宣传。我不但自己不想搞，而且见到那些搞的人就心烦。我讨厌“驯服工具”的提法，报纸社论却要求我们做一个“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我，一方面觉得很不舒服，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真落后。那时我还很虔诚，觉得自己真落后啊！不过，在整个大学期间，我会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和组织谈（到了二年级我们换了辅导员。二年级下学期，形势也变了）。我是幸运的。也许是我那时的态度，我没有被打成反动学生。不过，在我的一生中，在不同的单位里，多次听到领导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随时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

## 三年困难时期

1960年底，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运动停止了。虽然，也有政治理论学习，也下乡劳动，但不再整人。而且，为过去的运动搞甄别、向一些被整的人道歉。学校又开始念书了。班上原来的“积极分子”，有些人灰溜溜的。特别是，当时极左的同学中，有少数人，竟然涂改饭卡、偷东西。我们班有一个同学，极左，每次开会发言批判特别积极。一年级时，我们在校内的六公寓劳动，工地上有一个右派，这个同学就拿一根木条，动不动就会去打那个右派，让人看了很不舒服。现在一开始念书，他不行了，书念不好。更可恨的是，他在大饭厅里对看电影的女同学耍流氓，不止一次地被扭送到校卫队。最后，被勒令退了学。这些事给我震动很大。以前我总觉得他们都比我的觉悟高，各方面都比我强，自己望尘莫及，为此还十分苦恼。现在，突然发现他们中竟有这样的人，许许多多都是假的，是骗人的，有些人是在演戏，他们踩着别人往上爬。我第一次发现人心是如此地险恶。

当然，在大学的生活中，也有美好的回忆。我最痛苦的日子是刚入学的一年半和临毕业的最后一年多。中间那段时间，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在那段时间，我真正地念了一点书，算是对数学入了门。我也会和家里人一起进城看京戏（像《杨门女将》、

---

《铡判官》、《荀灌娘》等；会拉着同学去五道口剧场看话剧（像《伊索》、《伪君子》、《雷雨》、《北京人》等。这后来也成为我的一个罪状：用资产阶级文艺作品腐蚀工农同学！）有时我一个人骑车去长安街上的首都电影院看苏联电影（“反修”以后苏联电影只在很少几个电影院放映，放映的场次也很少）。记得我往往是下午进城，买了电影票后，在西单的一个吃冷饮喝咖啡的地方，一边翻译《数学——它的内容、方法和意义》一书，练习我的俄语；一边等电影开演。有一次，外面还下着小雪，至今想来还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在那段时间，看得最多的还是小说。也许是心情的关系，我不愿看悲剧情景的书，例如，英国哈代的小说；也不喜欢看屠格涅夫的小说，在他的小说中，女主人公都很光彩夺目，但男主角都很窝囊，让人很不舒服；也不喜欢狄更斯。那时候，喜欢的作家是易卜生、肖伯纳。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也给过我很大的震撼。国内的东西，喜欢的是鲁迅的杂文，是古诗词。不过，当时真正影响我情绪的还是苏联的电影和小说，像《船长与大尉》等。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小说也很一般，但当时给我影响很大。也许是因为它们贴近我的生活，小说中描写的一切，无论是友谊还是爱情，都使我十分向往。不管是虚妄也好，还是阿Q的精神也好，在当时，它们对我都是一种鼓舞，使我相信，尽管我现在有着种种不如意的遭遇，但天还是蓝蓝的，春天就在你的周围，生活还是美好的。

同时，在我这几年的生活中，还有不少真正关心我、帮助我的好朋友。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他们对我的友情，也使我能对生活没有丧失信心。尽管不同时候情绪也不同，会起起伏伏，但在最痛苦的时候我还是挺了过来。

## 小弟上北大

在 1963 年，我家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我二弟和郭世英他们一起被劳动教养。这大家都知道了，不再多说（见附件）。二是我小弟上大学。他是清华附中毕业的，书念得极好，是北京市数学竞赛的获奖者。毕业前，清华大学来人暗示他：只要他报考清华，就一定能被录取。可他和我一样，偏偏要考北大物理系。高考发榜后，他被录取到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系。但那是他的第 18 个志愿了。父亲心里不好受，觉得家里耽误了他，就去找北大校长陆平，问我小弟不被录取是否是因为家庭的关系。那时，对出身不好的人，正在宣传“重在表现”的政策。陆平一口咬定，不会是家庭的原因，一定是我小弟没有考好，并答应派人调查。后来，物理系的副系主任沈克琦还亲自去了清华附中（我小弟在中学的“操行评分”是：优。这在当时并不多）。结果，我小弟又接到了一份北大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上了北大。我们同在北大念书有 2 年。他很少和我谈他的状况，只知道他曾经是校摩托车队的，车开得很好，又会修车，是队里的主力。但不到一年，因家里原因，让他从队里退了出来。他是他们班里

---

唯一入不了共青团的人。“文革”开始，陆平被揪斗，我小弟的宿舍床头立刻被贴满了大字报，因为他的入学是陆平“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罪证之一。好在那时我已离开了北大。

##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开始了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同学中的地位有了变化。在班上当生活委员，管同学的粮票。在当时，粮票对同学来说，至关重要。我也深感同学对自己的信任。后来，原来的班长因病休学，我糊里糊涂地当上了班长。但没多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开始了。班上的许多事，就不让我知道了，一切由团支部讨论（后来我知道，班上的团支部开始给学生按政治表现排队：左、中、右）。我不仅被架空，而且又开始被批判。举个例子：当时我们是概率统计专门化班，但是大家从来没见过许宝騄先生。许先生是世界知名的概率统计学家，因身体不好，只在家里给北大和科学院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上课，不教本科生。班上的同学说，来北大六年，学的是概率统计，连许先生都没见过，会很遗憾。提议过年时全班到许先生家去拜年。于是，由学习委员组织，全班同学到许先生家。三十多人挤着，站在他家的客厅里，团支书代表全班念了一封贺信，就退了出来。这件事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因为我父亲、叔叔和许先生很熟，从小我经常看见许先生，特别是他住中关园时，天天就在我家附近散步。（大学六年，数学系、科学院认识我父亲、叔叔的教授，一个也不认识我。那时，不讲究走门路吧！）但不久，批判来了。有人质问我：过年时，为什么不组织同学给党总支拜年，为什么给资产阶级教授拜年？念贺信的团支书成为批判者，而我和学习委员成为被批判者。

又例如，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学习讨论革命接班人问题，出现了像《南京路上好八连》、《年青的一代》等文艺作品，不少内容都是讲革命干部、工农兵或他们的子女被资产阶级腐蚀的故事。当时我们班准备新年晚会时，班委里有人提出，在班上也排演一个类似的节目，反映“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情形。不想，第二天，立刻就有人质问我：你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检查你们自己的思想？为什么丑化出身好的同学？临毕业那年，这类大大小小的事不断，不必细说了。

## 长达半年的毕业教育

最后的半年赶上北大的“四清”，对我们进行了半年的毕业教育。近半年的时间，什么也不干，就是政治理论学习和批判。每个人要彻底地清理思想，分阶段地清理：1959年反右倾批判彭德怀的思想和表现；1960年反修时的思想和表现；三年困难时期的思想和表现；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以及“学雷锋”的思想和表现；最后是否愿意

---

服从分配的教育。这半年的教育，实际上是整人的半年。每个人，人人过关。先是自己总结，然后小组提意见，总结和检查通不过的，再重来。出身不好的同学自然是重点整治对象。但同时，一部分出身好的同学、干部也在整另一部分出身好的同学。那些挨整的人，大都是平时对我们出身不好的同学比较关心、帮助的人。在这种斗争中，有的人是发泄个人的恩怨。我亲眼看到一些人搞小动作，拉帮结派。小组会上，人们开始翻老账，把大学中的一言一行都抖了出来。每个人都很紧张，战战兢兢。为了制造气氛，在这期间，还开大会批斗了我们年级的两名学生徐明耀和张世林，当场给他们戴上了“反动学生”的帽子（后来，徐明耀被分配到唐山，现在他是北大数学系的教授。张世林是“摘帽右派”，当场被送去劳动教养，至今去向不明）。

在毕业分配教育中，许多同学谈到，作为北大学生，有不愿去中学当老师的思想。于是，“四清”工作队决定：我们数学专业的学生，由“四清”工作队直接安排，让大部分学生去中学。这批学生的分配既没有纳入国家分配计划，也没有上报国家计委（我们分配后不久，我父亲碰见关肇直，他是我国著名的泛函分析专家，抗战时期和我父亲同在成都燕京大学教书。父亲问他，科学院数学所为何没要我们北大的这届毕业生？他当时是该所的党委书记，听后很奇怪，说，不知道有我们这届毕业生。而我们下一届的同学，即 60 级的同学，改为五年的学制。我们离校后不到两个月，他们也分配了。那时，北大的“四清”被翻案。他们，包括我们年级因学习不好留级的同学，都分配到了大专院校和国家机关）。

我还是旧习不改，总想念书，想考研究生。但那时报考研究生，要提出申请，得到批准才成。我的申请自然不被批准，我没有权利报考研究生。

## 离开北大

1965 年 4 月 23 日，我和一批同学被分配到北京市教育局。教育局让我们先去京郊农场劳动一年，然后再分配到中学教书。也许这是人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今后一生大概是做中学教员了吧！我从小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即使在大学这样的不如意，也以为将来能在一个学院之类的地方教书。特别是，与中学同学比（北大虽然很左，但我们中学同学中考上北大的，如侯馥兴、石体仁、浦汉昕、谢云瑞、刘可重，比我分配的都好。都在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啊！），使我的心情又变得很坏。

在京郊农场劳动那年，有一段时间是进城掏大粪。一早四、五点，坐着农场工人赶着的马车出发，八、九点钟到城里，在居民区掏粪。虽然浑身臭烘烘的，但活不算累。午后不久就能干完。吃完午饭，在熙熙攘攘的路边行人道上，找一棵大些的树。在树阴下铺上麻袋，躺在上面，脸上盖上草帽，睡上一觉。然后再赶着车慢悠悠地回去。看见旁边飞驰而过的大

---

轿车，我会瞎想：这是哪个研究所的车吧？车里有我的同学吗？我看看自己这身臭烘烘、又脏又破的打扮，心想，我也是北大毕业的呢！

1966年春，北京市决定，与上海一样，办一所为半工半读学校培养师资的师范学院。那年3月，我和几个同去教育局的同学，被提前抽回，参加筹建工作。我们报到后，先下工厂劳动、体验生活。不到两个月，北京市委垮台，“文革”的劫难开始了。不过那是后话了。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应该“感谢”这几年的经历。正因为有了这种种的经历，使得我在后来的“文革”中，在更大的冲击下，能“安然”度过。面对“家破人亡”时，能“心如铁石”。

#### 附件

我二弟张鹤慈劳动教养的事也发生在我上大学期间（1963年）。由于郭世英是郭沫若的儿子，他们的事已经有许多报道。

1992年《诗刊》发表作家周国平的访谈录，其中谈到“文革”后、80年代初中国兴起的朦胧诗时，周说，他早在60年代就读过朦胧诗，是当时不满20岁的张鹤慈写的。作家邵燕祥看见此文后，给我写信，问，张鹤慈是不是我弟弟，并想要他当年写的诗。收到信后，我一时兴起，当晚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这封信被邵略加修改后在国内一杂志发表。该文在网上曾一度流传。许多同学早已知道。现把此信作为附件供校友一览。

#### 给邵燕祥的一封信

燕祥兄：

信和《诗刊》复印件都收到。

张鹤慈是我二弟，比我小二岁，1943年8月生。他从小不像我那样听话，脾气也急。小学六年级，正值冰心去北大附小参观，夸奖过他的作文（冰心和我祖父、父亲都熟，但当时她并不知道我弟弟的家庭关系）。这大概使他比我们更喜欢上了文。我们兄弟读的杂书不少，不过因为祖父的关系，家里是坚决反对我们学文的。而且我们兄弟三人理科都不错，老一辈的学问应该说是一流的（二叔、姑姑都是院士），我和小弟都曾是数学竞赛获奖者（一个在北大数学系，一个在北大物理系），张鹤慈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我们差。因此，在当时大气候下，让他学理，他并不反对，只是对文特别喜爱而已。

年青人都有些狂，他大概比我们更厉害些。初三时的一次“早恋”受到了学校（清华附中）的批评，使他和集体的关系弄得很糟，从而和父母也有了顶撞。到了高中（一〇一中），由于同学大多来自原来的初中，使他一开始就受人注目，造成他更不合群，自傲，愤俗。其实那时他才十四五岁，“恋爱”是从小说中学的，是一种精神恋爱。他长的漂亮（一点也不像我），确有一些女孩子喜欢他。不过，他在模仿书上的口气，声称他的恋爱观是“合则留，不合则去”，似乎是一种不要婚姻的“现代”理念。在那个时代，即使有几个女孩子喜欢他，谁敢按这种理念来做他的女朋友（加上他的政治状况）。反过来，他的心气又高，没有几个

---

人看得上，因此，直到入狱为止，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入狱时他不到 20 岁）。

一〇一中的住校生活也使他受不了（他的高中三年是大跃进的 58 年到吃不饱的 60 年），当时他总千方百计跑回家（家在北大，到一〇一中骑车用不了 20 分钟）。于是为了这种迟到、早退或旷课去看苏联电影的问题，在一次大会上受到通报批评。同时挨批的有一个高干子弟孙经武，孙的父亲是总后勤部的一位副部长，少将军衔的长征干部（确切说，原是白军的军医，后转入红军，参加了长征）。于是，孤独的他与孙相识并成为好友。我不太知道，孙的学养如何，但两人在“政治”上谈得来。他们到底是新中国培养的学生，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的“崇拜”西方，但是很欣赏苏联，喜欢苏联的电影、文学。那是 60 年大批苏联的时候，他们却欣赏着苏联的修正主义，特别是当时挨批的小说，如《一个人的遭遇》等等。孙在这方面走的更远，他要偷越国境去苏联，于是一个人向蒙古方向走去，一个十六七岁，平时娇生惯养的少年，出去不到一周，尚未到边界，就打退堂鼓了，想家了，粮票也没有了，就回来了。

这件事，揭露出来，非同小可。他走之前曾告诉了张鹤慈，我二弟属于知情不举。也许孙是犯罪未遂，更因为是高干子弟，具体的处分我不记得了。只知道其后果是，上大学时，孙去了一个两年制的师专，我二弟到了北京师院数学系（现在是我的工作单位）。从上边说，大概已算十分宽大了，但就我二弟来说，他自己觉得去了一个末流的学校（当时师院确实如此，不过，学生的水平要比现在好得多，因为许多人来此，只因为其出身不好），和我们兄弟比，心中自然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孙经武，当然更不肯去师专。他的父母把他送去当兵，兵种非常好，希望他走从军、当军官的这条路。当然，也希望部队能对他改造，不给家中惹事。

他们之间仍频繁通信，其表现使部队和师院都十分头疼。这时又结识了高中同级不同班的郭世英（注 1）。郭当时在外交学院，而并非人们所说：考上了北大哲学系（那时高干子弟的出路依次是留苏[反修前]、军工院校、外交类院校，也有直接入伍当军官的。然后才是北大清华这类学校）。这个“小集团”就形成了。后来还有一些次要的人受牵连。但骨干是他们三人，劳动教养的也是他们三人。

他们还是不知天高地厚，不守校规、军规，在家顶撞父母。是单位的另类、怪物。举个例子，一次在 32 路公共汽车上，忽然天降大雨，他们就跳下车来，在雨中长啸，让雨把自己淋个透，发泄心中的一切块垒，让行人侧目而视。

其后果是，孙被部队退了回来；我二弟以几门功课不及格为由，被退了学；郭也不能再待在外交学院了。

当时，他们都不到 20 岁，读了许多书，对一切新奇的东西感兴趣。那是 61—62 年，相对比较宽松。除了公开出版的书籍外，还有许多解放前出版过的小说，记得的有屠格涅夫的“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等。肖伯纳的“英雄与美人”给我的触动最大。利用高干子弟的特权还能读到许多内部读物。我也从中看了不少。如“麦田里的守望者”、“向上爬”之类的小说，“椅子”之类先锋派的剧本。有些我看不懂。另外象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萨特、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等。他们接触的面很广，已不再向往苏联了。我相信，就他们的年龄来说，有些东西并没有看懂，但他们很认真地讨论，还时常要与我辩论（那时

---

我思想比较正统)。二弟和我祖父也有了交谈，祖父十分喜欢他。不过，年轻人狂得很， he 觉得祖父在有些方面已经落伍了。当然，他们更看不上郭沫若，我二弟几次和我谈起，郭世英对他父亲的剧本及报纸上的诗作的苛评。

郭由外交学院转到北大，是他自己选择的，没经过任何考试。他和我二弟商量。我二弟对北大比较熟悉，选了一些他们认为有学问的教授去一一拜访。例如，西方经济学家陈岱孙，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洪谦教授。最后，决定上哲学系。

这一段时间，孙经武准备考‘北医’，我二弟‘闲居’在家(他的出身使他再上大学已不可能)，郭在北大念书，几乎天天来我家。母亲发现他们现在在一起念书、讨论，安静多了。尽管讨论的是数理逻辑之类的东西，但却让家里人放心不少。手抄本“X”刊物，应是这时的产物，我没有看过。那时候，我也狂，看不上他们写的东西，宁愿去读他们手头弄来的书。“X”是数学上未知数的意思，表示“未知”。不过，后来定罪时，一定要说这是俄文字母(他们三个人都是学英文的，没学过俄文)，是赫鲁晓夫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其实，那时候，他们已不怎么看得上赫鲁晓夫了。刊物中有诗，有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评论。作者就是他们三个人(?)，我二弟文才最好，他是主笔，他一生狂妄，但和郭感情最好，最谈得来。

就在这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他们被拘捕了。那是 63 年的 5 月 17 号。到了 9 月份，罪名下来，共四条。我只记得前三条(注 2)：1 组织反革命小集团；2 出版非法手抄本刊物；3 企图偷越国境。“企图”出境，是因为他们仅仅是半开玩笑地议论过(他们的生活无疑是上层的精英，可以看内部小说、电影，吃高级宾馆，饭店)，如各自从家中偷些什么东西，等等。因为有孙以前的事，这一条当然算。不过，最主要的是前两条。据说，毛 64 年讲革命接班人问题，就与他们直接有关。两个高干子弟被一个反革命子弟腐蚀了。当然，不止他们，还有别人，如刘亚楼的孩子，也和他们接近(起码，孙的父母，和于立群，当时都有这想法，尽管我父亲为他们的事，多次给郭沫若写信，请他想办法)。

不过，处理还是“宽大”的。周恩来亲自过问，张、孙各教养二年，郭是后来者，劳教一年。开初，张孙在一起，在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的一袜子(?)工厂，实在算不得什么。但要求二人不许联系，不许说话。无奈，两个人仍不知天高地厚，最终，二弟去了延庆砖瓦厂和刑事犯在一起，开始了真正的劳教生活。他老实了，给家中写信，除了要生活必需品外，只报平安，一句话也不说。母亲自然想知道他的情形，一次次探视和打听。有一次他在信的最后引了一首辛稼轩的词：“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当时看了，我心中十分难受。

三个人因表现不好各自延长一年劳教。两年后(65 年 5 月)，郭世英出来了，然后去农大念书，惨死于文革，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了。66 年 5 月，彭、罗把持的北京市委、公安部都已瘫痪，我二弟只好继续劳教。不久，接到“暂不解除”的通知，一直“暂”到林彪垮台后的 73 年，教养了 10 年。其间，他从延庆到海淀，又到邢台。73 年解除教养后，仍不许离场，除了有每年 12 天的探亲假和每月 10 多元的工资外，仍是劳改犯的待遇。78 年落实政策，对前三年的教养并未改正，因为是总理的决定。尽管公安部的人向他说，

---

这种事要放在现在什么问题也没有。只对后一段的教养给予平反。据说那是谢富治等想用此事整总理（我却以为是为了给谢再加一罪状）。我二弟既弄不清也不愿多想，只求公安部赶快把他的户口弄回北京，离开那可怕的农场（当时政策多变，这也颇费了一番周折），毕竟劳教了 15 年了。

到京后，他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曾说，我比那些共产党员更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过，“六四”后，他失望了，不愿再待在这里，现在墨尔本定居（孙在日本）。93 年，50 岁时生了一个女儿。有一个儿子，今年上大学。他无一技之长（入狱时不足 20 岁，出来时已 35 岁），在澳洲开了家洗衣店，买了一所大房子，全为稻粱谋了。大概算是朱学勤所说“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吧！

不过，他还关心人文上的事情，也喜欢您的作品，曾和我说过，希望能得到一本您签名的书。但他自己却什么也不写了。我总劝他写，包括他的经历（十年劳教，他和许多右派曾在一起，如戴煌，每次回国，他都去看他）。他反而劝我写我家的一切。可惜我文笔太差。

收到您的信，我和他通了电话。他的诗、日记全没有了（“日记”没有了，是他不肯写的重要原因）。他告诉我，“X”手抄本和他的“日记”应该是在公安部了。但怕是无法得到的，因为案子由总理定，并没有平反。而且若公安部说文革时已全没有了，你也没办法。他不抱任何希望。周国平处保留了他的四首诗。80 年代，周曾抄录给他。他说，那是他入狱后写的（我怀疑他记错了），不是他最好的诗，如果要发表，他没有意见，可以向周要。

想想过去，有时会感慨万分，一口气写了这么些，但谈不出他的诗，他当时的文字，十分抱歉。

68 年 1 月，祖父、父亲被捕，不知去向。5 年间多方打探，全无音信。以前我只听说国民党时，被捕的人“失踪”。况且祖父入狱时已 82 岁。直到 72 年底才知道他们在秦城。父亲早已疯了，奔波多次，方允许监外就医，送进了精神病院。二叔、三叔、三婶在文革中先后自杀身亡。母亲也被送到海淀公安局，关了近一年。一个堂弟 68 年“为父报仇”，判了 15 年，直到 78 年平反。我虽大学毕业，但因家庭问题，不分配工作，作为下放干部，在农村（京郊）当农民，加上多年的女朋友不得不离去的失恋，一生也算多磨。87 年妻子又患尿毒症，两次肾移植，经济困难不说，低三下四求人走后门，十分令人痛苦，有时胜过文革的挨整。夫人今年初去世。想想我的一家，也许真应该写些什么，只是心很难静下来。静下来回首往事，又夜不能寐，加上工作又忙，去年已该退休，延到今年，尚未退，工作已又找来。

不想今夜心血来潮，乱写一通，字又乱，让你费时间读了，十分抱歉。

饴慈

2002 4 25 凌晨

记得我第一次去探视二弟，是在延庆，天已经很冷了。砖瓦厂的阴森气氛，至今历历在目。会见时，边上有监管人员，只能说些“好好改造”之类的话，他阴沉沉的几乎没说什么。

最后一次探视他是 1967 年冬，家里出事前（父、母、祖父尚未被捕，二叔也还在）。到茶淀他的所在

---

地，要步行经过一大片荒地。我堂弟陪我去（半年后，他被判刑15年）。因为是两个人，谈了几句后，堂弟故意去和监管人员聊天，我乘机告诉二弟，抄家，三叔、三婶自杀的消息。分手时，他为了不让我们见到他难受的样子，抱着我们带给他的东西，飞奔而去，留下让人酸楚的背影。

68年后，家里事太多了。对他已不能多顾。后来在邢台，是母亲和下放到磁县的小弟去看过他。

又及

【注1】我中学的语文老师汪瑞华告诉我：郭和他们是同班的。因为她也教过我二弟他们班。我又去问鹤慈，他说是我弄错了。

【注2】写完这封信想起了最后一条的罪名是：偷听敌台。指在收音机中听美国和苏联的对华广播。

---

# 入学北大五十周年同学聚会有感

力学班 章本照

这是一块民主与科学的圣地，这是一座学子们魂牵神往的殿堂，五十年前，我们怀着无限的遐想从天南海北来到这里；

我们同倚寒窗，聆听名师面授，传承严格推导，质疑切磋同学，孜孜苦读六载，汲取了终生受用的知识；

我们一起被卷入时代漩流，笑语劳作，狂热运动，沐浴于风风雨雨之中，濯洗去年少的娇嫩幼稚；

我们共度金色年华，未名湖畔游戏，博雅塔下叙谈，天真烂漫无间，手足与共六秋，结下了纯真难忘的友谊。

六年后，我们又奔赴天南海北，源于北大传统的厚实基础和事必甚解的严谨思维，在众多领域的各自岗位上，无不展现出独特的理论功底和出众的专业才华，令我们在平凡的贡献中累见辉煌！

北京大学是我们当年选择的荣幸，北京大学是我们丰博学识的源头，北京大学是我们一生无愧的骄傲！

五十年后燕园重相聚，蓦然回首：在纷繁缤呈的人生中，这里真是一片永远梦萦的圣土！

---

## 零星记事

力学班 朱光文

我原是 58 级流体班的，1961 年休学一年在家劳动，1962 年回校复学时与 59 级同学同窗，已是在昌平校区了。往事记不准确了，只能零星地想一些，就算零星记事吧！

1958 年 9 月进校时，大约已是大跃进后期，几件事记忆犹新。一是挖未名湖的泥，运到东门外现工学院附近的麦地里，增加肥料、增加光照、增加麦子的种植密集度，实现亩产万斤粮！二是建造大风洞，似乎没有什么机械，内壁水泥沙石面是靠人工打磨的，最难磨的是天顶；三是批右倾，我睡眠很不好，我说大跃进是体现一种精神，不能靠加班加点不睡觉干活，那样坚持不下去的，于是“大跃进不能持久”就成了我的右倾思想而遭批判。

1958 年末至 1959 年中，在沈阳滑翔机厂半工半读，从南方初到大东北，穿的是南方过冬的衣服，早上扫院子，眉毛都结霜，真是太冷了！白天干钳工活，晚上上课，灯光很暗，上数学分析课的老师是上海人章学诚。年初在沈阳吃得还不错，能吃上东北大米饭，后来就不行了，就逐渐改吃玉米和高粱米啦！1959 年夏天回到北京后，又去低压电气厂劳动，一是搞超声波运动；二是炼铁、抬铁水、浇铸。这一年真是瞎折腾！

1960 年上课时正是困难时期，有几件事难忘。背着书包和碗袋，急匆匆地赶向图书馆或饭堂，端着饭碗在大食堂外面边吃边看报纸新闻，上课时经常有饭碗掉地的声音。这是当时的北大一景。班里领讲义是我的事，讲义用纸就像草纸，字里有字。吃饭很简单，在西边的大食堂，排队划卡，两个窝头、一勺菜，完活！不够时再排队买水萝卜缨子。不过老师的讲课还是十分认真、十分有水平、十分精彩的，例如，杜珣老师上气体力学课时的公式推演，庄圻泰老师上复变函数课时的慢条斯理和休息时喝茶的神态等等，印象深刻。

1962 年到昌平校区，偌大的教室和大操场，后面就是山，山上有柿子树，挺爽！我那时没事就学小提琴，但总是拉不出个调，噪音多，不像蔡振依的吉它和朱蔚文的小提琴那样好听和柔和，但还好，没有同学骂我。“湍流”课难学，真是像日本人讲的“乱流”，1964 年暑假回校后我还补考了一次，真不好意思。我的毕业论文是强爆炸波的壁面反射及传播，似乎当时有电动的计算机，但坏了，是用手摇计算机计算的，导师是黄敦老师。

毕业后，因女友在天津，正好天津有个“海洋仪器研究所”的名额，大概是组织上照顾吧，我就来到天津，于是一辈子与海洋技术装备打上了交道。1982 年以前属海军管，但我没有穿过军装。四十多年来，业绩平平，坎坎坷坷，既蹲过牛棚也进过人民大会堂；没有什么发明与创造，没有去过极地和大洋，但自己努力啦！我们这代人都是学雷锋、学“老三篇”、

---

学焦裕禄成长起来的，一辈子不偷懒，像工蜂一样勤劳。现在国家有钱了，海洋的地位提高了，课题很多，但人老了，所以对海洋事业总是有点依恋之情，有许多的遗憾，有许多的感慨！

1959 级的同班同学中，毕业至今，只有鲁梓成、熊自立、杨有庆、程怀凯、蔡扶时等同学从未谋面，其他同学似乎都见过。大概是 1971 年吧，许国复来天津外调，通过公安局查到了我的地址，来看我，还帮我砸砖头修厨房；王奕昌出差到天津时找到了我；阿本是我老乡，帮了我不少忙；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买进口家用电器很难，要指标，岳曾元帮了忙，用了他的归国购大件指标；康德泉人粗心细，重感情，2004 年我在北京住院期间，他两次专程来看我，真是很感谢他！杨庆曾、许国安等同学热心为同学服务，每次同学见面会他们都是最辛苦的，谢谢啦！

虽然与 59 级的同学只同窗三年，但同学之情是真情的，同学间的友谊是长久的。时间如流水，一去不回头，转眼间五十年过去了，我们都已经或将要进入古稀之年，成绩与过错都已是过去的事，忙忙碌碌一辈子，现在似乎一切都无所谓了。看看我们的国家，看看我们的民族，看看我们的儿女和孙辈，虽然有很多的遗憾，但也可以满足了。